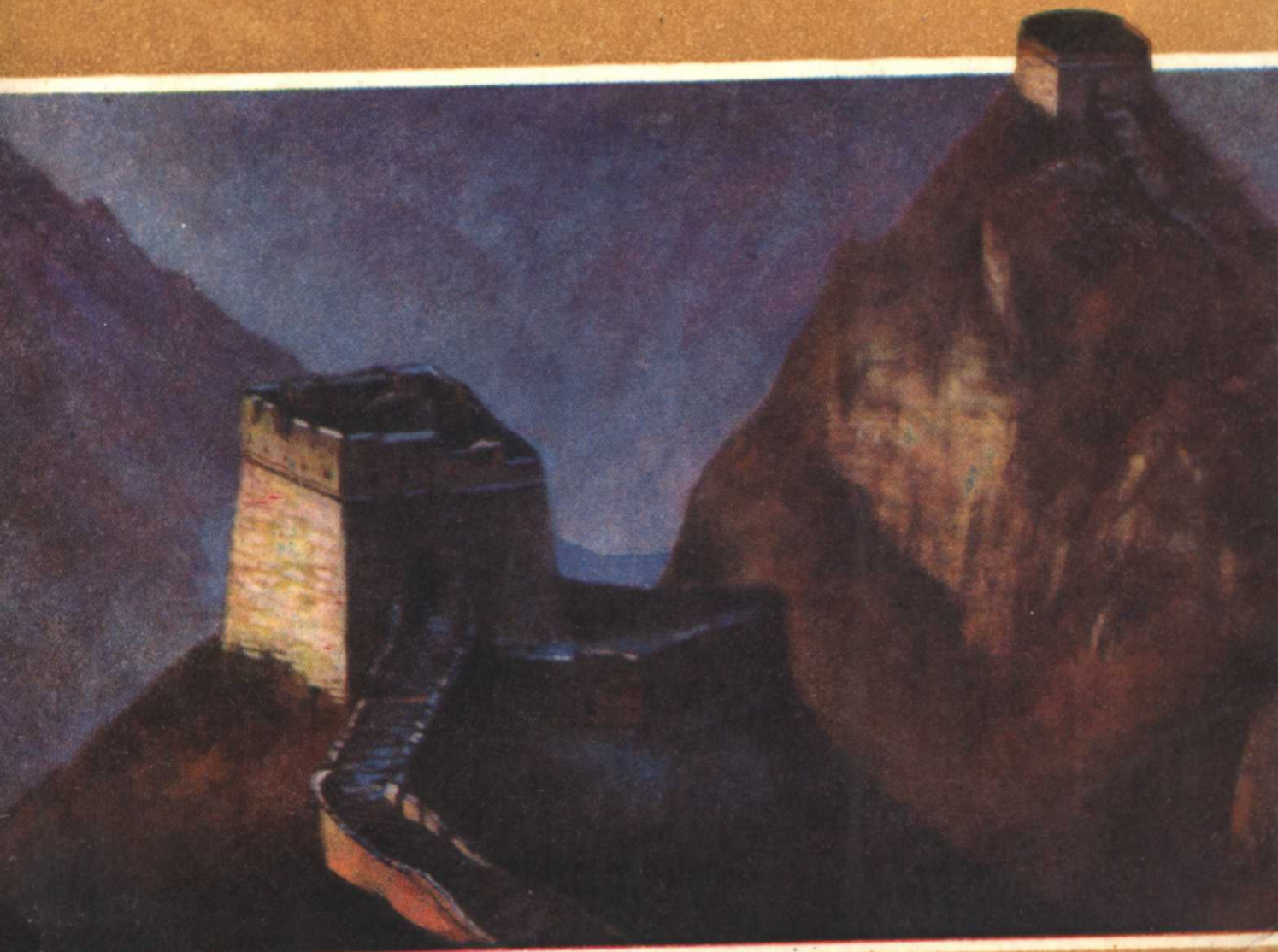


03.15

熱河革命史稿

1919—1955



特约责任编辑 邓一民
封面设计 李义

REHEGEMINGSHIGIAO

ISBN 7-5039-0344-9 / I · 201

定价：7.50元

热河革命史稿

(1919——1955)

邓 一 民 主编

热河革命史编委会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

热 河 革 命 史 稿

(1919—1955)

邓 一 民 主 编

•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

河北省承德地区新华书店发行

承德市双桥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14.125 字数360000插页28张

1988年11月第1版 1988年11月承德第1次印刷

印数0001—6000册

ISBN 7-5039-0344-9/I·201

定价 7.50元

光荣的历史
艰苦的历程

程子华
一九八一年七月

热河党和人民同热河察北老区及辽西地区
结成一体为中国革命胜利作出了不朽
贡献在发动组织群众斗争上在参加
全国解放战争中所有历史事实都
应载入史册的。关于具体工作经验
总结以教育后代也很有必要。

黄火青

一九六六年十月
一日题于北京



热河革命史北京会议会场一角（1985年12月）前排左到右：韩纯德、李运昌、段苏权、常玉林、强晓初、王琪、陈光、王国权、马载、宇光。



热河革命史北京会议留影。前排左起：常玉林、韩纯德、马载、段苏权、李运昌、王国权、强晓初、陈光；后排左起：张志新、洪纹、李俊基、张旭明、宇光、王琪、陈平、王振兴。



热河革命史承德会议会场一角（1985年7月）前排右至左：宇光、王克东、沈毓珂、王国权、段苏权、胡广义、张唤群、郑起茂、郭跃臣、武振城、唐全杰、洪纹、李俊基、罗进、张兴、常玉林、高再唐、陈光、张旭明、秦奎一。

李增 摄



热河革命史赤峰会议会场一角（1986年8月）
前排左起：段苏权、王国权、王克东（左四）、沈
毓珂、高再堂、常玉林、李俊基、董洪业、陈光、
张志新。



赤峰会议会场一角。
段苏权（左一）、王国权（左二）、王克东（右二）、
沈毓珂（右一）。



热河革命史定稿会议合影（1988年5月）
前排左起：王振兴、马刚、洪纹、宋志民、高恒、
沈毓珂、王克东、李运昌、段苏权、陈光、王鹏程、
宇光、武振城、李俊基、陈桐。

序

李 运 昌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过230多年，起过重大历史作用的热河这个地方，对今天的青年人来说，已经是十分陌生了；一些中年人也渐渐的淡忘了。但对曾在这块土地上战斗、工作过的人们来说，却常萦回脑际，系于胸间。每当提起热河，我们都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欣慰之感。现在，《热河革命史稿》出版了，这又引起我对往事的诸多回忆。

热河，与我的家乡——冀东，只有长城之隔，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漫长岁月里，我一直战斗在这块土地上。冀热边区的抗日暴动，长城线上的激烈枪声，“无人区”里的腥风血雨，收复东北的胜利进军以及热北草原上的艰苦转战，锦州承德的胜利凯歌等等，都是中国革命史上的壮举，都是令人难以忘怀并且值得永远纪念的。

热河是个有着古老文明的地方，又有着美丽的山河和勤劳勇敢的人民。据考古发掘证实，早在远古时代，热河大地上就有了原始人群；到了新石器时代，更出现了灿烂的“红山文化”；大辽帝国雄距热河而小视天下，满清王朝修建避暑山庄而控制塞外，这些都说明热河地位的重要，也是热河历史上的骄傲。但热河的广大人民却长期在封建贵族、土豪劣绅、军阀官僚以及日本军国主义和汉奸走狗的统治下，过着牛马不如的悲惨生活。热河人民为谋求解放曾经进行过英勇顽强的斗争，从反对封建主义和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金丹教起义、铧子沟人民抗洋拒官斗争，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热辽义勇军、孙永勤抗日救国军的武装

斗争，流血牺牲，前仆后继，但均因缺乏坚强领导而被敌人镇压下去了。

“七七”抗战开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进入华北，建立了抗日根据地。1938年6月，八路军第四纵队挺进到热河、冀东，配合中共冀热边特委发动了震惊中外的抗日大暴动。从此，热河人民的革命斗争，在共产党领导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从1938年7月起，在热河境内先后建立起11个抗日县政权，组织了众多的抗日游击队和民兵，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虽然遭到日伪军警、讨伐队的残酷镇压，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但坚强不屈的热河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了“无人区”斗争，经过长期浴血奋战，受尽人间苦难，付出10万余人牺牲的代价，终于在1945年8月取得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迎来了热河人民的春天。

日本投降后，热河又成为国民党与共产党争夺的重点，冀热辽部队捷足先登，收复热河，挺进东北，为我党我军完全控制热河，进军东北争得了先机之利。在解放战争中，又建立了以热河为中心的包括冀东、察哈尔、辽西在内的冀察热辽革命根据地。中共冀察热辽中央分局和军区以热河为基地，领导指挥这一地区1800万人民，进行了土地改革和剿匪斗争，进行了多次重大战役斗争，终于打垮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为解放东北、华北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胜利后，热河全境解放，在共产党领导下，热河人民进行了医治战争创伤，重建家园，消除“三害”（土匪、大烟、鼠疫），发展生产的斗争，到1953年实现了有吃有穿的目标，初步改变了热河的面貌。

现在，热河省的建制虽然已经撤销了，但热河人民在苦难岁月中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是不能忘记的，热河人民对中国革命作出的贡献是永远不能磨灭的。

这本《热河革命史稿》如实地记载和反映了热河人民的苦难历史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英勇斗争取得的光辉胜利，对缅怀先烈，启迪后人，总结历史经验，激励人民斗志，发扬革命传统，进行两个文明建设，振兴中华，都是大有益处的，我祝贺《热河革命史稿》的出版。

一九八八年十月

目 录

绪 言

- 一、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 (1)
- 二、雄峙险阻的热河走廊…………… (5)
- 三、前仆后继的反抗斗争…………… (9)

第一编 早期革命斗争

(1919年5月——1937年7月)

第一章 具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热河人民

第一节 五四运动和热河人民反抗斗争的新发展…………… (15)

一、青年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 (15)

二、工人运动的兴起…………… (19)

三、农民反抗斗争的新发展…………… (22)

第二节 共产党在热河的早期活动…………… (27)

一、热河地方党组织的建立…………… (27)

二、工农运动的新高涨…………… (29)

三、建立革命武装的尝试…………… (32)

四、内蒙特委和金沟屯会议…………… (35)

第二章 热河事变和全省爱国军民的抗日救亡运动

第一节 九一八事变后的热河政局…………… (38)

一、日本侵吞热河蓄谋已久…………… (38)

二、汤氏小朝廷的腐败和动摇·····	(40)
三、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43)
第二节 热辽义勇军的抗日战争·····	(46)
一、义勇军的渊源和发展·····	(46)
二、义勇军的抗日战争·····	(52)
三、中共热河特支的建立和党在义勇军中的活动·····	(59)
第三节 热河事变和长城抗战·····	(63)
一、日伪军三路进攻热河，承德失陷·····	(63)
二、国民党爱国官兵的长城抗战·····	(69)
三、热辽义勇军的敌后抗战·····	(72)
第四节 民族英雄孙永勤和抗日救国军·····	(75)
一、日伪的殖民统治和孙永勤抗日救国军的兴起·····	(75)
二、孙永勤抗日救国军的发展壮大·····	(77)
三、孙永勤抗日救国军的失败及其教训·····	(81)

第二编 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7月——1945年9月)

第三章 执行党中央的重大战略决策，创建冀热边抗日 游击根据地

第一节 创建冀热边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准备·····	(85)
一、七七事变前后的热河形势·····	(85)
二、发动以雾灵山为中心的冀热边抗日游击战争战略 决策的提出·····	(88)
三、冀热边早期游击战争·····	(91)
第二节 冀热边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开辟·····	(95)
一、八路军第四纵队挺进冀热边·····	(95)
二、冀热边人民武装抗日大起义·····	(98)
三、多块小块游击区的开辟 ·····	(106)

第三节 冀热察边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形成	(110)
一、游击区向游击根据地的转变	(110)
二、“扫荡”与“反扫荡”的残酷斗争	(121)
三、大规模开辟热南	(124)
第四章 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千里“无人区”，热河军民 艰苦卓绝地反“集家”斗争	
第一节 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的千里“无人区”	(128)
一、“无人区化”政策的提出和实施	(128)
二、杀光、烧光、抢光的“无住禁作”地带	(135)
三、人间地狱——“集团部落”	(141)
第二节 反对建立“无人区”的斗争	(148)
一、破坏“无人区”封锁的军事斗争	(148)
二、“集家”与反“集家”的斗争	(152)
三、建立“两面政权”	(155)
第三节 “无人区”斗争的特殊贡献	(158)
一、“无人区”斗争是一场特殊的战争	(158)
二、“无人区”斗争在战略上的特点	(163)
三、“无人区”斗争的特殊贡献	(166)
第五章 大规模发展和扩大解放区，迎来抗日战争的伟大 胜利	
第一节 恢复和发展抗日游击根据地	(170)
一、粉碎敌人的“奔袭扫荡”恢复基本区	(170)
二、开辟和坚持锦热路北的斗争	(172)
三、日益走向巩固的抗日根据地	(178)
第二节 扩大解放区，准备大反攻	(183)
一、大力向东北发展	(183)
二、大规模地开辟与恢复热辽地区	(190)
三、热察边的攻势作战	(195)
第三节 抗战胜利，热河全境光复	(198)

- 一、苏联对日宣战，解放区军民大举反攻 (198)
- 二、进军东北，收复失地 (200)
- 三、日本投降，热河全境光复 (205)

第三编 解放战争时期

(1945年9月——1949年10月)

第六章 反对国民党武装进攻，解放区实行民主改革

- 第一节 抗战胜利后的热河形势 (210)
 - 一、国民党“接收”热河的阴谋 (210)
 - 二、共产党控制热察和东北的总方针 (212)
 - 三、创建新的冀热辽根据地 (215)
- 第二节 反对国民党武装进犯热河解放区的斗争 (221)
 - 一、第一次承德保卫战 (221)
 - 二、承德三人小组谈判和第二次承德保卫战 (227)
 - 三、朝阳谈判和五月战役 (233)
- 第三节 解放区各项民主改革的初步实施 (236)
 - 一、第一次全省人民代表大会 (236)
 - 二、扩大人民武装和清剿土匪 (238)
 - 三、反奸清算斗争和群众运动的兴起 (243)
 - 四、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和群众运动的高潮 (246)
 - 五、克服财政困难，支援革命战争 (252)
- 第四节 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四三”会议 (255)
 - 一、热河民族问题和党的民族政策 (255)
 - 二、东西蒙承德会议 (258)

第七章 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在艰难困苦中建设热河解放区

- 第一节 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热河解放区的严重困难局面 (260)

一、“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战略方针的提出和在热河的实施	(260)
二、承德撤退，战略转移	(263)
三、终止国民党武装进攻，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265)
第二节 解放区各项民主改革的深入与发展	(269)
一、检查与深入土地改革	(269)
二、建设人民武装与清剿土匪的新胜利	(274)
三、蒙民工作和蒙族武装	(280)
第三节 在敌人进攻中日益巩固的热河解放区	(286)
一、热西地区（十六地委）	(286)
二、热南地区（十七地委）	(289)
三、热东地区（十八地委）	(291)
四、热中地区（十九地委）	(294)
五、昭乌达地区（二十地委）	(297)
六、热辽地区（二十一地委）	(300)
七、乌丹警备区（二十二地委）	(303)
第八章 解放区土地改革的胜利和战略性反攻	
第一节 冀察热辽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	(307)
一、战略反攻前的形势	(307)
二、冀察热辽第一次党代会的召开及其重要历史意义	(309)
第二节 开展战略性反攻	(312)
一、韩梅村起义与反攻作战的发起	(312)
二、夏季攻势，收复赤峰	(316)
三、秋季攻势与辽西大捷	(319)
四、冬季攻势，进军辽西	(325)
第三节 土地改革的伟大胜利	(327)
一、“煮夹生饭”和“砍挖”运动	(327)
二、贯彻土地法大纲，全面开展平分土地运动	(334)

三、平分土地中“左”倾错误的发生及其纠正	(338)
四、土改中的整党建党工作	(342)
第九章 参加与支援辽沈决战，热河全境解放	
第一节 战略决战前的形势	(346)
一、摇摇欲坠的国民党反动统治	(346)
二、夏季攻势，承德外围解放	(350)
三、热南战役，再断北宁路	(354)
第二节 解放区的各项建设	(356)
一、大生产运动与工农业生产的初步恢复	(356)
二、财政和金融贸易建设	(360)
三、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367)
四、《群众日报》和解放区的宣传事业	(371)
五、消灭鼠疫的斗争	(375)
第三节 全力参加与支援辽沈决战	(379)
一、战略决战时机的成熟	(379)
二、全力参加辽沈战役作战	(381)
三、全力支援辽沈决战	(385)
四、承德的解放	(386)
第四节 进入和平建设的新时期	(389)
一、重建省委、省政府，开始和平建设	(389)
二、新收复区的改造和新区土改的完成	(391)
三、继续消灭“三害”的斗争	(392)

第四编 建国后时期

(1949年10月——1955年12月)

第十章 国民经济的恢复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

第一节 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斗争	(397)
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形势与基本任务	(397)

二、首届劳模会和“无人区”代表大会	(398)
三、生产救灾的胜利	(400)
四、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兴起	(403)
五、工商业的合理调整	(406)
第二节 党的建设与政权建设	(408)
一、热河省首届党代表会议	(408)
二、热河省各届代表会议	(411)
三、党内整风运动	(412)
第三节 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斗争	(413)
一、抗美援朝运动	(413)
二、镇压反革命运动	(415)
三、“三反”、“五反”运动	(416)
第四节 国民经济的恢复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 提高	(418)
一、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418)
二、文化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	(419)
三、群众有吃有穿的目标实现了	(420)
第十一章 贯彻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开始社会主义经济 建设	
第一节 一九五三年初的热河形势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 基本任务	(423)
一、一九五三年初的热河形势	(423)
二、“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	(424)
第二节 宣传贯彻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	(426)
一、全面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	(426)
二、增产节约运动和工业生产的发展	(432)
三、对手工业和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 改造	(434)
四、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	(440)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宣传

讨论	(442)
第三节 发扬艰苦朴素的作风，开展反对官僚主义、 命令主义、违法乱纪的斗争	(443)
第四节 工、青、妇群众团体的作用	(448)
一、工会组织	(448)
二、青年团组织	(449)
三、妇女组织	(452)
第五节 热河省建制的撤销	(453)
一、热河省委第五次代表会议和省人大一届三次 会议	(453)
二、省委、省人民委员会的两个《七年工作 总结》	(454)
三、热河省建制的撤销	(455)

后记

附图

热河全图（1933年）

热河省图（1953年）

绪 言

在记述热河人民现代革命斗争史之前，对热河的古代和近代史约略地进行一下追溯也是有意义的。

一、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

热河的建制始自清朝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当时设置热河厅，任命兼管军事和满蒙民族的热河总监。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改置承德府，1928年改建热河省。1956年初撤销省制，分别并入河北、辽宁两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其区划在二百几十年间虽迭有变更，但地理位置变化不大。它东临松辽平原，南瞰华北平原，西连蒙古高原，北接大兴安岭，是蒙古高原降入松辽平原的转移地带。境内多高山大川，有着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

在这块广阔的土地上，远古以来就有人类生息繁衍，创造自己的文化。据考古发掘证实，早在10多万年以前，热河大地上就有了原始人群，史称“鸽子洞人”。^①那时，在这块土地上到处是苍郁的森林和葱绿的草原，鸟飞鱼跃，野兽成群。“鸽子洞人”虽还处于男人狩猎，妇女采集，取火而食，穴洞而居的群居阶段，但热河大地上已露出人类历史黎明的曙光。

人类历史前进到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这里已经出现了原始农业。砍伐树木，开拓荒地，刀耕火种，狩猎野兽，饲养家畜，这就是当时原始人群的主要生活。这个时期在历史上称为

^①1979年，考古工作者在热河省喀左县（今属辽宁省）水泉乡瓦房店村附近的大凌河畔鸽子洞，发现了一颗完整的小孩牙齿化石，称为“鸽子洞人”。考古工作者还发掘出大量石器和羚羊等哺乳动物化石，所以也有人把“鸽子洞人”称为“猎羊人”。

“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因1935年首次在热河省赤峰市（今属内蒙古自治区）郊红山发现新石器时代原始文化遗址而得名。后来，承德的磬锤峰附近，建平、喀左等地都相继发现了这种原始文化遗址。因此，考古学家们认为，红山文化是由一个大的部落集团创造的，分布在东起辽河流域、西至燕山南北，主要是热河省的广大地域内。因为这种原始文化与我国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有某种相似之处，因此，考古界过去认为红山文化是在仰韶文化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是仰韶文化的“支系”或“地方变体”。最近几年的考古新发现，把这个结论否定了。

首先是1979年5月，在热河省喀左县（现辽宁省）的东山嘴村，发现了一处原始社会末期的大型石砌祭坛遗址。1983年以来，又相继在建平县的牛河梁村发现一座女神庙遗址和数处积石大冢群。考古学家根据已出土的大批文物初步推断，5000年前这里曾存在过一个具有国家雏形的原始文明社会。这一考古重大发现，不仅证明了以红山文化和河套文化为主体的北方古文化，是与中原古文化并存的两大文化区系；而且还将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多年，从而使我国的文明史与古代的巴比伦、埃及、印度一样久远。同时，也证明热河大地是人类历史的摇篮之一。至于以热河省赤峰市夏家店命名的“夏家店文化”，则是这种原始文明的继承与发展。^①

殷商、先秦时期的文化遗址，几乎遍布热河各地。喀左的殷

^①夏家店文化，指1960年，考古工作者在赤峰市郊区夏家店和药王庙考古发掘中发现的古代文化。因其分为不同类型的上下两层，因此又区分为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夏家店文化约在4000年前后的夏、商时期，分布地域则非常广阔，包括热河的全部，辽宁的南部，河北的西部和南部等广大地域。

商青铜器，① 凌源的西周青铜器，② 兴隆的铁器，③ 寿王坟的冶铜遗址④ 等等，说明这个地区当时已有了一定规模的农业和畜牧业。

春秋时，北方的山戎族逐渐强盛起来，占据了热河北部广大地区，并逐渐南进，攻伐燕国。燕庄公只好向齐国求救，以致发生了“齐桓公北伐山戎，制令支，斩孤竹”，⑤ “老马识途”的故事。陷齐桓公于绝境而后生的“迷谷”，就在热河省朝阳地区境内。

公元10世纪末，契丹族崛起于热河北部的潢水（即西拉木伦河） 国号为辽。辽帝姓耶律氏，耶律即“黄”之义，由潢水而来。当时潢水南北，均设州县，皆有城池，其国都上京临潢府，即热河省林东县城。⑥ 林东西北的白塔子，即为辽代皇陵。大辽帝国强盛时期的疆域东至渤海，西至金山（阿尔泰山），北至胪朐沟（克鲁伦河），南至白沟河（河北省大清河支流）。南宋朝时则已雄居于黄河以北，威名远扬于西域诸国了。特别是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中称中国为“契丹”，致使“西域诸国只知有契丹而不知有中国”。由此看来，“热河一地，在世界史上所占地位

① 1979年，在喀左县北洞村南一土丘上，发现殷商时期的青铜器12件，其中一件上铸有“父丁鬯竹兕亚”六字，意即孤竹国君微亚为其父丁所作之彝。说明这里曾经是商王朝的侯国——孤竹国管辖的地方。这个孤竹国的南部边界曾达兴隆、宽城、青龙等地。

② 1952年在凌源县海岛营子村发现西周青铜器多件，其中一件的铭文中有“匱侯”字样，匱即燕，是周召公长子的封国。华北北部，东北大部，热河全部为燕国管辖范围。

③ 1953年，在兴隆县大付将沟出土的铁器主要是铸范，包括镢范、锄范、镰范、斧范、凿范和车具范，这是战国时期很先进的生产工具。

④ 寿王坟位于承德市郊区，建国初期调查发现战国末期采铜和冶铜的遗址。

⑤ 《管子·小匡篇》。

⑥ 牟里神甫著《东蒙古辽代旧城探考记》和卞鸿儒《热河游记》。

之高，新大陆之发现，实溯源于是邦，世界人士或有不知热河，但无不知契丹者。”^①

热河地区由秦汉以后，直至明清，长期以来是东胡、匈奴、乌桓、鲜卑、奚、蒙古等各民族的聚居地，他们大多以游牧为主，“贵货易土”，“唯以畜牧”，不重视农业生产，加之连年征战，烽火不息，农业生产遭到很大破坏，但畜牧业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长城以外，古为引弓之国，建庭卓帐，迁徙无常”，^②“虏酒千钟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③则是当时热河人民生活风貌的真实写照。除少数民族外，也有从中原迁徙来的汉人。“故垒开都邑，遗民杂汉编”，曾经到热河省承德地区进行过考察的宋朝文学家苏辙的诗句，即反映了汉族与各少数民族杂居的情况。

在历史上，热河的采矿、冶炼业都有相当的发展。据《辽史·地理志》记载：“太祖于泽州采炼陷河银冶”，也就是在现在的平泉附近开采银矿，并进行冶炼。有银洞36眼，生产规模已相当可观了。另外，还有两所铁冶（炼铁的地方），数处金矿和玛瑙矿，都有一定的规模，说明那时热河的生产力水平已有很大的提高。

热河的鼎盛时期是在清朝。清朝统治者，意图“内控要塞，外怀蒙人”，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筑行宫（即避暑山庄）于承德。避暑山庄工程浩大，历经80多年才始竣工。随着避暑山庄的兴建和承德成为清王朝实际上的陪都，人才荟萃，商旅云集，热河的经济、文化都开始繁荣起来。

首先发展起来的是农业。清以前的热河以游牧为主，垦种土

①《热河形势论》。

②《承德府志·建置》。

③唐朝边塞诗人高适《营州歌》，营州旧址在热河朝阳附近。

地为数不多。清王朝推行“首重农桑”，“重农抑末”的政策，阡陌日开，使“时代常愁烽火惊”的热河大地，“于今此地有人耕了”，^①造成“版图可识同遐远，塞外荒山尽辟田”的局面。^②据《热河志》载：承德四厅有旗地、民地200多万亩，建昌、赤峰、朝阳三厅没有准确数字，估计也在三四百万亩以上。随着土地的大量开垦，粮食产量也大量增加，除自给外，每年还有20多万石粮食运销关里。

随之发展起来的是商业。农业生产的发展和避暑山庄的兴建，承德日益成为各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南北货物集散地，蒙古的皮毛，热北的小米，京津的布匹等都要到这里进行交换。蒙古的骆驼队也常来到这里，与汉族进行贸易。这样，承德就成了酒楼茶肆，鳞次栉比，行人杂踏，商旅云集的塞外有名的都会了。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勤劳勇敢的热河各族人民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成为整个中华文明史中光辉的一章。同时，热河又以其雄峙险阻的战略走廊，奠定了它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

二、雄峙险阻的热河走廊

热河地处内蒙古高原和松辽平原之间的狭长地带，是联结华北、东北的枢纽，沟通关内关外的咽喉，素与辽西走廊齐名，称为热河走廊。“左通辽沈，右引回回，北控蒙古，南制天下”，^③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

热河西北部有内兴安岭山脉和潢水水系，^④构成天然屏障，既能阻挡外蒙古的风沙，又能抵御沙俄的侵扰。东部有松岭山

①②③《热河志》

④潢水亦称西拉木伦河、西辽河。由老哈河、白水等汇聚而成，其下游称辽河，至营口附近入海。

脉、大凌河水系^①和历史遗留下来的柳条边墙，居高临下，俯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西南部有雾灵山脉、滦河水系^②和绵延千余里的长城，进可窥视京津，退可凭险自守。中部又有努鲁尔虎山脉和七老图山脉，是天然的“第二道防线”。由此可见，热河境内大山连亘，嵯峨矗立，河流纵横，水势湍急，而荒河断谷之间多形成小块平原、盆地和村落，又是天然的“隐蔽所”。所以，热河地势，攻守咸宜，古称天险。特别是明朝末年，清兵逐渐强盛起来，欲与问鼎中原，先是屡攻辽西，皆为明将袁崇焕所败，后改为笼络蒙古，假道热河，由塞北而攻中原，京师撼动。清统治者从切身经历中认识到：“明之失策，莫过于放弃热河。”所以才筑行宫于承德，以兹镇守；并为怀柔蒙人，于承德建喇嘛庙，使西藏达赖喇嘛常往返于拉萨、热河之间。这都说明热河地理位置的重要。历代统治者都重视对热河的争夺和控制，是为兵家必争之地。在中国历史上，因得失热河而形成安宁和侵扰的例子数不胜数。

热河地域广阔，人烟稀少，土质肥沃，物产丰富，是个丰足之乡。

热河的面积，据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统计局调查认定为192430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1.67%。^③热河的人口，据热河省民政厅调查为349.5万余人，^④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20人左右。耕

①大凌河由石塔河、固都河等汇聚而成，至锦县入海。

②滦河，古称濡水，由小滦河、伊逊河、武烈河等汇聚而成，经河北注入渤海。

③热河总面积尚无确切数字，民国17年舆地新学社调查为59万多方里，约合15万平方公里。日本满铁调查课1926年8月5日发表为10198方日里（每日里约合我国七里），王金绶编《中国分省地志》则载为381.8万方里，相差甚为悬殊，这里引用数字系根据《热河新志》。

④此系民国19年热河省民政厅调查数字，另外尚有民国7年到8年中华基督教协会调查的831.8万人，民国17年邮政局统计的451.5万人，民国19年12月内政部统计的659.4万人等几种数字。

地1253万多亩。①

热河虽地近寒带，物产却极为丰富，最著名的有矿产、畜产及农产三大类。矿产主要有煤，每年约产5.4万余吨；② 金，年产800多两；③ 其他如铁、铜、铅、银等储量也相当丰富。热北有广垠的草原，水草丰盛，马、牛、羊肥壮，计有马61万多匹，牛20多万头，羊59万多只。④ 农产以谷子、糜黍、高粱、花生为大宗，上述四项年产量可达300多万石以上。⑤ 其它如玉米、大豆、大麻、棉花、土豆等均有出产，产量也较为可观，全省粮食自给有余。朝阳盛产棉花，赤峰盛产小米，唯有承德是个官吏豪绅们享乐的地方，所以自古便有“银朝阳，金赤峰，承德是个黑窟窿”之说。

热河的工商业则较为落后，有工厂220余家，以纺织、制粉、酿酒、榨油业为著，每年的产值约达476万多元（大洋）。⑥ 这些说明热河经济是一个以农牧业为主的，分散落后而闭关自守的自然经济体系，商品经济极不发达。这就形成了热河一方面地域广阔，物产丰富；另一方面经济停滞，闭塞落后这样一种局面。

热河还是个多民族聚居地区，民族和睦团结，民风朴直强悍，极富有反抗精神。

热河属蒙地，系内蒙三省（热河、察哈尔、绥远）之一。在

①毕立著《热河之概况》载为12539247亩，其中荒地5399247亩。

②毕立著《热河之概况》，原载1933年《新亚细亚》。

③热河金银矿产遍布全省各地。当时以围场、隆化、滦平、承德、平泉、赤峰、朝阳、阜新为最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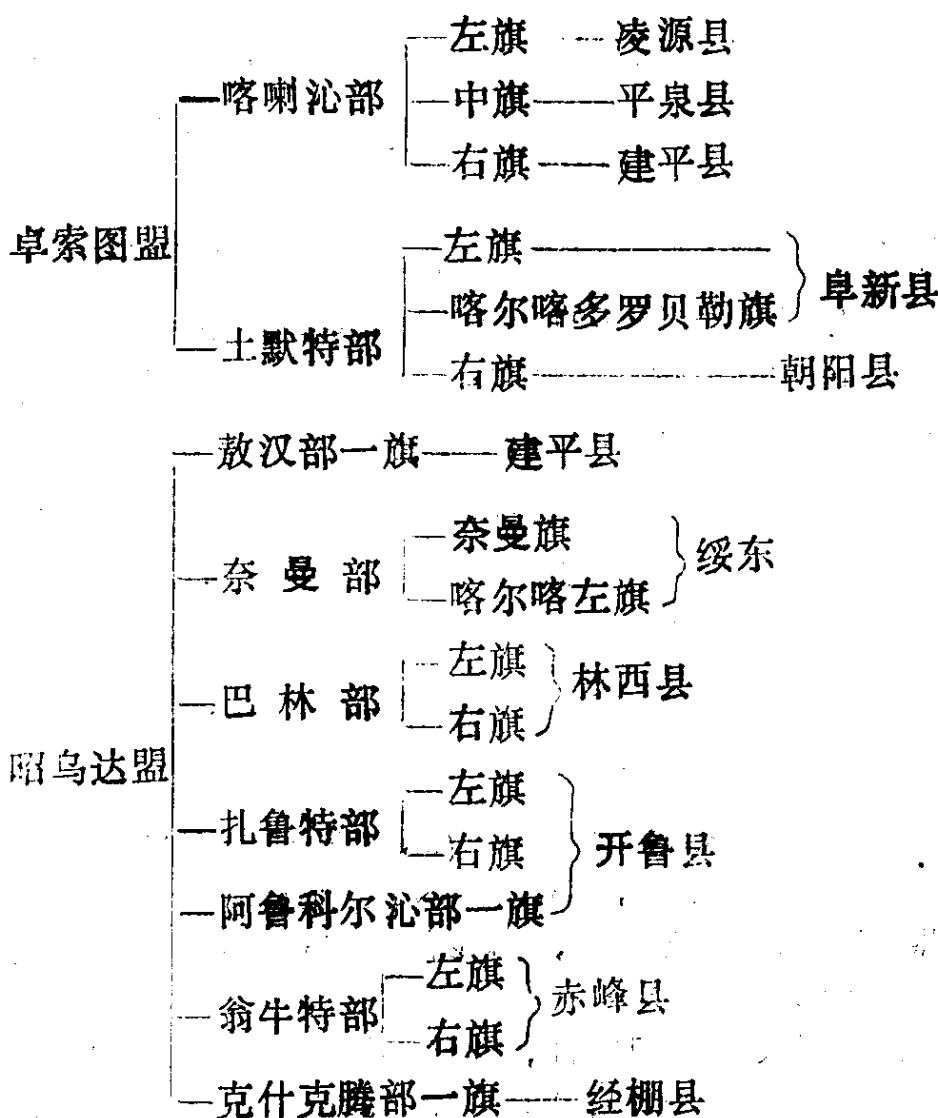
④系日本《满蒙经济大观》所载，19世纪30年代约计数。另外王金法编《中国分省地志》载：热河省牛53万头，马19万匹，羊59万多只，为内蒙三省之冠。日本《满蒙要览》则载有马约80万匹，骡约7万头，驴约50万头，牛约120万头，骆驼4万多头，羊约200万只。

⑤毕立：《热河之概况》，原载1933年《新亚细亚》。

⑥王金法：《中国分省地图》。

清朝中叶尚只有少数汉人，清末大量开垦荒地，汉人北移，耕种土地；东部和南部的蒙人遂亦知稼穡，只有北部蒙人尚保持游牧的生活习惯。这样，蒙族大部居于北部和东南部，地广人稀；汉族居于南部和西部，人烟稠密；其他如满、回等民族则杂居其间，多民族共同繁衍生息在这块土地上。

在清末民初期间，热河的建制是蒙汉分治，旗县并存。当时有2盟17旗15县。①



①武尚权：《热河新志》，系民国3年（1914）时设制情况。后于民国4年设林东县，13年设鲁北县，15年设天山县，20年设凌南县、宁城县、全宁县（乌丹），至1933年热河事变前，共辖21县。

除此以外，热河西南部的承德、滦平、隆化、丰宁、围场5县，因汉、满民族居多，不在蒙旗区域之内。热河由于多民族杂居，民族互为影响，加之交通闭塞，文化落后，所以“居民性质大都鲁直质朴”，^①“重气节，为践信义，虽死不辞”。“颇富冒险精神”。^②“融合蒙汉，耕牧并进，北御强俄，东抗暴日”^③则是热河人民的区域精神。

三、前仆后继的反抗斗争

热河地区土质肥沃，物产丰富，有过一个时期的经济繁荣，但到了“五四”运动前夕，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军阀之间的争战，横征暴敛，蒙古王公贵族和封建地主官僚的残酷压榨和奴役，使热河的自然资源遭到多次大破坏，更加之自然灾害频仍，致使脆弱的小农经济纷纷破产，经济走向全面崩溃。“言及热河之经济，令人不酸而泪，热河经济现已走入死亡道路”。^④热河人民陷入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苦难深渊。但热河人民是具有强烈反抗精神的人民，他们不堪忍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残酷压榨，纷纷揭竿而起，走上了武装反抗的道路。在清末民初的几十年间，热河人民的反抗斗争风起云涌，前仆后继，不仅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势力，而且还为以后的人民革命斗争播下了火种。

热河人民较大规模的武装反抗斗争，有文字记载的可追溯到清同治三年（1864年）的马傻子起义。马傻子原名马国良，起义后改名马震龙，原籍山东掖县人，其先祖在清乾隆年间逃荒到关外。1864年5月，马傻子聚众响应捻军北上，在热辽边境起义，发展到数万人，并用诈降的办法攻占沈阳，然后挥师南下，连破

①毕立：《热河之概况》，原载1933年《新亚细亚》。

②英《拉塞尔游记》，原载英国皇家地学会《地理月刊》，1904年5月号。

③《热河形势论》，原载1932年《国风》半月刊。

④惠我：《热河最近之内容》，原载1933年《村治月刊》。

新民、义县、朝阳数城，一直打到长城要塞喜峰口，清廷为之大震。1866年3月，清廷派户部尚书文祥调集重兵围剿马傻子起义军，经多次激战，起义军退到锦州，最后在辽河全军覆没，马傻子也在战斗中受重伤被俘，解往盛京（沈阳）惨遭凌迟处死。

震惊中外的金丹教（在理会）起义，则是热河人民反抗外国帝国主义侵略和本国封建主义统治的光辉诗篇。

早在19世纪中叶，西欧的天主教便渗透到了热河地区。19世纪末，热东、辽西一带建立了教堂150余处，发展教徒1万多人，教会附设的学校、育婴堂也达100多所。教会势力称霸一方，盘剥百姓，鱼肉乡民。与此同时，热河的蒙古王公、封建地主、贪官污吏对人民的压榨更是日甚一日，稍加反抗，即施以酷刑。土默特旗的蒙古奴隶主，竟“以碗口粗小树，削其顶为尖，将犯人衣服脱尽，将小树弯伏在地，以树尖插入肛门，陡一松手将人掇在空中，旋即落地，摔的脑浆崩裂”^① 这样惨无人道的酷刑，来处罚到自己山林中砍柴的农民，简直令人发指。教堂势力与蒙古奴隶主、贪官污吏们相勾结，肆无忌惮地剥削压榨农民，人民早已恨之入骨。这时，又赶上瘟疫盛行，敖汉旗人、中医杨悦春用草药制成丹丸，救济苦难民众。并以“金丹救世”为相号召，将古老的白莲教改为金丹教，深受民众欢迎。哥老会在北方的变体“在理教”也秘密发展起来。

1891年，朝阳境内“淫雨成灾”，许多村庄颗粒无收，民众已到了无法生存的地步。时值建昌县三十家子天主教堂，因借粮纠纷，杀害了金丹教教徒。于是，金丹教首领杨悦春和在理教首领郭万淳联合一起，在敖汉旗杨家湾子发动起义。起义军提出了“仇杀天主教、仇杀蒙古（王公），仇杀贪官”的口号，深得民众拥护，“旬日之间，由数千聚至数万”。^② 然后起义军分五路

①引自《朝阳县志》。

②引自李鸿章奏折。

出征，分别攻占了朝阳、乌丹、阜新、奈曼等重镇，赤峰、平泉、建昌等地民众也起而响应。起义军所到之处烧毁教堂，抗拒官兵进剿，大有席卷东北之势，引起中外各界的极大震惊。“清朝政府调动热河、奉天、直隶的军队实行残酷的镇压，被屠杀的起义群众2万余人。”^①在理教首领郭万淳在朝阳东部桃花吐被官军杀害，^②金丹教首领杨悦春在金厂沟梁山洞被俘。这场大规模的金丹教起义，在官军和天主教会势力的血腥镇压下，同时也由于错误地杀害部分蒙古族民众，终于失败了。

热河人民的反抗斗争，大规模的还有邓莱峰领导的铧子沟人民抗洋拒官斗争。邓莱峰，字云成，热东朝阳县铧子沟卧佛村人。该地与松树咀子教堂毗邻，经常受到教会势力的侵扰和欺凌。1900年义和团运动中，朝阳义和团数百人曾两次攻打松树咀子教堂，均未能攻下。后来松树咀教堂主教比利时人叶步司，勾结八国联军对朝阳人民进行报复性的血腥屠杀，仅铧子沟一地“死与是难者50余人”，激起铧子沟人民的义愤，奋起进行反抗斗争。邓莱峰联合附近一二百里的乡民组织“拒洋会社”，“纠合民练，起而相抗”。^③多次打退俄兵和教堂武装的进犯，使“洋兵不敢深入，地方得以保全”。^④特别是1901年春节期间，教会武装再次袭击铧子沟，在激战中，两名外国传教士被击毙，多名教堂武装被俘获，为此法国使馆向清廷提出抗议。清廷在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后，更加惧怕外国势力，指示热河都统查办，并于光绪二十七年十月一日（1901年11月11日）签订热河教案合同，“通计各属抚恤赔偿之款尚逾十万金”，^⑤“邓莱

①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第262—263页。

②《光绪朝东华录》3005页。

③④均见直隶提督马玉昆致领班军机大臣荣禄禀文，原载《历史档案》1985年第3期。

⑤热河都统包楞额致荣禄禀文。

峰为永远监禁之犯。”^①而这些赔款还得在人民的身上搜刮，这就造成了“交洋款，则膏髓竭，而无以为生；抗洋款，则兵刃加，而亦不过就死”^②的局面，人民的反洋抗清斗争更加炽烈。于是，清政府在帝国主义指使下，于1902年派直隶提督马玉昆率兵镇压了桦子沟人民的反抗斗争，邓莱峰一家人惨遭杀害，使这次坚持了两年之久的人民反抗斗争又一次被镇压了下去。

热河人民在反抗外国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的斗争中，也同样表现了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

戈壁沙漠以北的外蒙古地区，历史上就是中国领土。沙俄对外蒙早就怀有侵略野心，并且对内蒙、东北等地垂涎三尺。1911年，沙俄竟策动外蒙的哲布尊丹巴等一小撮封建王公和活佛，在库伦（乌兰巴托）宣布外蒙“独立”，成立所谓“大蒙古国”，公开分裂我国北部边疆，理所当然的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外蒙变成沙俄的殖民地后，更进一步向中国内地侵略扩张。在1912年10月分兵两路，大规模侵犯内蒙古地区。热河少数蒙古王公也起而响应，鼓吹内蒙“独立”，并公开发动武装叛乱。

首先发动叛乱的是扎鲁特右旗牧主土木尔乌力吉、扎鲁特左旗协理台吉官布扎普和奈曼旗四等台吉图鲁扎布等人，并于10月20日攻陷开鲁县城。这伙叛匪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县街商铺，尽成焦土，乡村房屋只腾残灭，所有汲水井尸骸填满。大凡居住之地，鸡犬无存……种种残毒，实不忍闻。”^③ 继尔叛乱的有土

①见直隶提督马玉昆致领班军机大臣荣禄禀文，原载《历史档案》1985年第3期。

②马玉昆致荣禄禀文。

③《盛京时报》，1913年2月19日。

默特旗贵族巴布扎布，^①率军2000余人侵扰热北地区，攻占经棚，兵临林西城下。热河军民和爱国的蒙古王公奋起还击，经大小数十战，终将巴匪击退，捍卫了祖国的神圣领土。1916年，日本帝国主义分子企图直接控制我国东北和内蒙地区，阴谋建立“满蒙王国”。巴布扎布又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在日军军官参与下，率军3000余人，再次侵犯热北，占领大片领土，直逼林西县城，热河军民浴血奋战，将巴布扎布击毙于林西城下，其余叛军纷纷逃去，斩断了日俄帝国主义伸向热河的魔爪，使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阴谋破产。

热河人民的反抗斗争，较大规模的还有李白玉率领的挖金工人起义。^②李凤奎率领的挖金工人和破产农民的武装起义，^③武开墓的“黑旗队”起义，^④侯文广、^⑤

①巴布扎布，热河卓索图盟土默特左翼旗彰武人，蒙古族，在清末民初曾任当地巡警局长。1912年投靠外蒙古哲布尊丹巴活佛，被封为宗格德赛义达（即大臣），奉命搞内蒙“独立”活动。1916年投靠满清复辟组织“宗社党”，与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建立了联系。1916年8月，再次发动侵热战争，于13日围困林西城，被热河军队击毙。后来，巴布扎布余党曾侵占开鲁，至到1917年8月，这次叛乱才被平息下去。

②《朝阳史话》载：咸丰四年（1859年）朝阳金厂沟挖金工人不堪封建势力的剥削压迫，在李白玉率领下聚众起义，曾攻克朝阳县城。

③李凤奎，朝阳县腰而营子人，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率众起义，起义队伍很快发展到数千人，并智取朝阳城，连破凌源、赤峰等热河重镇，使在承德避难的咸丰皇帝如坐针毡，调集数千官兵始镇压下去，李凤奎被俘遭杀害。

④武开墓，蒙族，喀喇沁左翼旗东哨人，他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率领蒙汉民众，举旗造反，聚众千余人，击溃前来围剿的奉军统领殷锡恩军，吓得直隶练军统领杨玉书躲进叶柏寿不敢出城，赶跑了建昌县知县罗毓祥，民众中流传着“阴（殷）阳（杨）不合，挤走破罗”的歌谣。

⑤侯文广，建平县公营子人。1915年3月成立联庄会，聚众万余人，反对验契，武力抗捐，三次打败前来镇压的建平县知事高子瞻率领的地方武装，取得“捐税全免，验契停办”的胜利，后来侯文广接受招抚，终被封建势力残害致死。

赵子馥、①高振英②分别率领的三次武装抗捐反军阀起义等等。1915年在承德演武厅广场举行了反对卖国的“二十一条”抗议大会，“成千上万的人参加大会，义愤填膺，声势浩大。③这些都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在热河的反动统治，促进了热河人民的觉醒。同时，在斗争中涌现出了许多英勇不屈，视死如归的英雄好汉。“生死等闲事，成败我所计。大仇未能复，含恨赴西去”。

“宁死不苟全，耻为阶下囚。杀身何足惜，遗恨未复仇”。这是邓莱峰在就义前写下的慷慨悲壮的诗句，他们仇视帝国主义，仇视蒙古奴隶主，仇视封建军阀、贪官污吏的革命精神，和前仆后继，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是热河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在后来的热河革命史上得到了进一步发扬光大。

①赵子馥，朝阳县喇嘛沟村人，是著名抗联将领赵尚志的父亲。1916年组织“清乡会”武装，击毙前来寻衅的12名警察，打败朝阳县长孙廷弼派来的官军，后因寡不抵众而失败。赵子馥全家逃亡东北。

②高振英，绰号高四棒子，1917年5月率众起义，抗捐抗税，坚持了半年之久，终致失败。高振英被俘后遭杀害。

③王逸如：《承德通俗志略》第15页。

第一章 具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热河人民

第一节 五四运动和热河人民反抗斗争的新发展

一、青年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

正当热河人民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深渊中挣扎的时候，“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①十月革命爆发后的第二天；苏维埃俄国就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沙俄在国外攫取的全部特权，更给饱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中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十月革命影响下，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一大批先进分子，开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主张在中国走俄国革命的道路。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论文，满怀信心地指出：“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20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布尔什维克主义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凯歌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②充分表达了中国先进分子对十月革命的热情拥护和对马克思主义的无比坚信。

热河与李大钊的故乡冀东毗邻，当时又同归直隶省管辖。十

①《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1360页，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

②《李大钊选集》第111、117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月革命胜利的消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是首先由李大钊等先进分子传播到热河来的，给苦难深重的热河人民带来了希望的曙光。

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发的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揭开了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这一伟大斗争很快波及热河，在富有革命斗争传统的热河大地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燃起了反帝爱国斗争的火焰。

首先起来响应的是承德的爱国青年学生。北京的学生游行示威和被反动当局逮捕的消息传来，承德的学商各界极为愤慨，热河师范学校、热河女子师范学校等校学生纷纷集会，抗议反动当局逮捕学生。5月中旬，又在承德演武厅广场举行集会，各界代表登台讲演，声援北京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会后举行了游行示威，“人流浩荡，声势雄壮”。^①同盟会会员、热河师范学校校长沈君迟，派人到天津参加李大钊主办的学习白话文讲习班。毕业后，召集热河15所学校的教师开设讲习班，在热河发动白话文运动。^②承德青年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还扩展到附近县城，围场县克勒沟镇的学生就曾高唱“狐日狐日，既夺我权，又占我地，热血青年，能不奋起”^③的诗句，开展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

继之而起的是赤峰。赤峰位于热河的中心，南可与中原取得联系，北可通达蒙满各地，是塞北的重要军事要塞，也是热河的商业中心和对外通商的重要商埠。民国初，日本资本逐渐侵入赤峰，不仅经常有日人来赤峰及热北一带勘测、游历，还有一些日人在赤峰开办厂矿，经营商业。1917年2月17日，日本在赤峰设立了领事馆，更加速了日本资本的侵入，阻碍了地方民族工商业

①王逸如：《承德通俗志略》第15页。

②白雪樵：《辛亥革命志士沉默》，原载《承德文史》第二辑。

③惠世如：《内蒙党的组织在原热河省产生的经过概况》，1983年7月24日。

的发展。五四运动爆发后，赤峰各界纷起响应，以学界为中心，以劝学所长杜泮青和高等国民学校校长阎希圣为首，联合城区9所小学的校长、教师，组成了国民外交后援会，各校学生也成立了学生救国团，学生们纷纷上街游行演讲，演街头活报剧，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反帝爱国斗争。6月5日，正在庙会上演讲的学生，愤怒的痛打了偷偷拍照的日本领事馆翻译，砸毁了照相机。事后，日本领事馆向外交部驻赤峰交涉署提出抗议，交涉署竟庇护日人，指责学生的爱国行动，引起了赤峰各界更大的愤怒。次日，学生救国团集合起来，一部份围困交涉署，不准外国人出入；一部分到日领事馆前举行抗议示威。学生救国团还从高等国民学校学生中选拔出40多名身强力壮的学生，组成“稽查队”，查禁日货。他们砸了贩卖日货的巨庆和商行的货架，勒令关门三天；将德裕亨商行的“洋货”，尽数烧毁，并在大门外贴上俳句标语：“请看德裕亨店，柜伙良心皆无。私行偷卖日货，甘心愿做倭奴。”^① 经过这场斗争，日货在赤峰已经敛迹。

热东重镇朝阳的各界青年学生，“不顾官府法令，不顾军警的限制和阻挠，于1919年6月13日，在朝阳城内召开了响应北京“五四”爱国运动的群众大会”，^② 学生代表及各界代表在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学生团及商务会之一团，各自揭旗，携有排斥日货之檄文，行列市中，至贩卖日货之商店前强制烧弃。”^③ 并且谕告全城各商店，必须将库存的日货，限期送到商务会统一烧毁。谕告发出之后，一些爱国商号积极响应，有的主动送货烧毁，有的将运进途中的日货退回，“日货之输入生意，以至根绝状态”。^④

①焦世民：《五四运动在赤峰》。

②《朝阳史话》第125页。

③④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赤冢正助于1919年6月30日向奉天交涉署递交的336号公文附件。

热河在外地读书的进步青年学生，也积极参加了当地的五四爱国运动，并将外地的斗争消息传回家乡，促进了热河反帝爱国运动的发展。当时，热河有许多青年学生在直隶省会天津上学。五四运动爆发后，他们积极参加了天津的爱国反帝斗争，集会讲演，游行示威，举行罢课，成为天津学生运动中一支重要力量。其中的韩麟符^①被推选为天津学生联合会的副会长；陈镜湖^②是直隶一中“学生救国团”的骨干，参加了天津学生南下宣传团，到北京、广州等地进行了反帝爱国宣传；郑丕烈^③曾参加编辑《天津学生联合会会报》，传播革命思想，指导爱国运动的开

①韩麟符：原名韩致祥，字瑞五。1900年生于热河省赤峰县哈拉木头村，在直隶一中读书时参加“五四”运动。1923年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国共合作期间，参加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925年当选为内蒙古农工兵大同盟中央执行委员、副书记。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任党务委员会委员。1928年4月回到热河，任中共内蒙古特别支部书记。6月，顺直省委以韩“犯了军事上投机及组织上的错误”为由，“特予以留党察看六个月之处分，并开除内蒙特委（支？）书记职务”。1930年12月在天津被捕，1933年3月由军阀孙殿英保释出狱，被任命为四十一军少将政训处长。1934年孙殿英兵败宁夏，韩麟符遂隐居祖籍山西省榆次县乡间。1934年9月22日，被国民党特务郑丕烈刺杀身死。

②陈镜湖：号印潭，亦号小秋，化名李铁然。1901年10月25日生于热河省建平县哈巴沁南井村。1918年考入天津直隶省立第一中学，1923年在南开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被党派到冯玉祥国民军内任热河民军司令、内蒙古特别民军第二纵队司令。1927年当选为内蒙党代表，出席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五大”会议。1930年底中共内蒙特委遭到破坏，陈镜湖负起党的领导责任，1932年9月被选为临时特委书记，年底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被任命为中共内蒙特委书记。1933年日军侵犯热河时，曾组织蒙汉抗日同盟军，抵抗暴日。热河抗战失败后退入察哈尔，参加冯玉祥领导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被任命为参议。1933年5月12日，在去张北点验抗日武装途中，遭反动民团袭击，不幸牺牲。

③郑丕烈，原名郑绍武，1898年生于热河省建平县烧锅营子乡刘牌头沟村。1916年考入天津直隶省立工业专门学校，并在天津参加五四运动。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被党派往冯玉祥军中任国民军团长、内蒙古特别民军第三纵队司令。1930年在天津被捕，1932年3月被河北省委开除党籍。1933年3月由孙殿英保释出狱，同年10月再次被捕。1934年经张学良电保出狱，后被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委任为中统局设计委员，沦为国民党特务。1951年被判处无期徒刑，1966年12月27日病死在四川南通监狱。

展。在北京、奉天等地的热河青年学生，也参加了当地的反帝爱国运动。



陈镜湖烈士遗像

热河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在全国也产生了影响，是全国五四爱国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19年7月2日上海《申报》就报道了朝阳“六·一三”民众大会的情况，对热河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表示支持和声援。这些都使统治热河的直系军阀和统治东北的奉系军阀极为惊慌和不安。热河都统姜桂题曾下令“严加取缔”学生运动。奉系军阀张作霖也以“快邮代

电”的形式，命令毗邻热境的锦西、绥中、义县等六县知事：对热河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应饰警区严密查防，俾免传播，是为至要。”^①但这些反动势力都没能阻挡爱国运动的发展。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承德、赤峰、朝阳数座城镇的几万名青年学生和民众，冲破军阀反动势力的阻挠，走上街头，勇敢地反抗帝国主义和军阀封建势力，形成了热河革命史上空前规模的革命洪流。

二、工人运动的兴起

青年学生运动成了反帝爱国斗争的先声，在热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首先起来响应的是热河的工人阶级，他们由开展提高工资、改善劳动和生活条件的经济斗争，发展到反帝爱国的政治斗

^①《朝阳史话》第126页。

争，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走上了历史舞台。

热河的工业，在清朝中叶曾经有过一个繁荣时期。当时最发达的是金银等矿业，其次是制毡、制革、榨油、酿酒等。据有关资料记载，热河的金矿高峰时期达到30多座，^①专门开采金矿的公司也有10余家，^②采金工人达数千人。银矿就更为发达，高峰时期“每年的平均产量不下数万两”，“每年的银产量在中国素称最丰的地方，占全国第一位。”^③后来，随着清王朝的没落，热河的工业萎缩，商业凋弊，经济萧条，金银矿大多停产，“手工业虽尚颇卓著，近因外国商（品）之输入，亦逐渐淘汰殆尽。”^④商户倒闭的更是厉害，仅赤峰一地，民国初年统计尚有商户3000多家，到民国10年仅剩750家，民国16年只有275家了。朝阳商户也由千多户，减少到600多户。“从前街市栉比林立之商店，现在已无限萧条，通衢冷落。”^⑤

随着近代工业技术的发展，热河的煤炭工业却在萧条萎缩的工业经济中以丰富的储量，优良的煤质，日益发展起来，煤矿工人队伍也日益壮大，成为热河工人阶级最集中最强大的力量，成为热河工人运动的主力。

较早发展起来的是阜新的新邱煤矿，在清朝时就曾由英国人开采。孙家湾、半家窝铺等矿，则为大新、大兴两家公司开采。到民国时期，每年产煤可达9万吨左右，有矿工六七千人。其次是平泉的五家子、石头坟煤矿，光绪初年就有开采，到民国初

①最著名的有朝阳的金厂沟梁、建平的撰子山、成子山、赤峰的红花子沟、鸡冠子、丰宁的铁家营（曾发现大金块重10余两）、隆化的老干沟、平泉的涝泥洼子、承德的碾子沟等金矿。

②著名的有中英合资的平远公司，官商合资的泰丰公司、裕成公司等，但大多数为清政府官方开采。

③武尚权：《热河新志》第141页。

④⑤惠我：《热河最近内容之一般》，原载1933年《村治月刊》。

年,年产量达2万吨左右,有矿工一二千人。赤峰元宝山等三矿^①则开发的较晚,但发展较快,到民国时期,平均年产量也可达2万吨左右,有矿工2000余人。

在热河的煤矿中,开发最早,规模最大的则是北票煤矿,也是热河工人运动最活跃的地方。北票煤矿原为“四票”(北票、西票、东票、中票)煤矿之一。早在光绪年间(1871年)即有“私人领龙票开采,后因矿务调查局设立,即行归公”。^②后来又交给包商承办,每年交包银1.05万两,可见当时规模之大。1917年英国享有了京奉铁路关外区的特权,这个煤矿就为英国人莫勒所看中,由京奉铁路局呈请开采,于1919年5月正式开工,从此变为中外合资、官商合办的煤矿,成为英帝国主义把持下的官僚资本企业。北票煤矿有矿工、职员4000多人,每年产煤30万吨,产量最高的民国20年(1931年)达到57万多吨。

从上述热河工业的发展情况中,可以窥见热河工人阶级状况之一般。热河工人的总数,一般时期约有万人左右,高峰期可达二三万人。^③这些工人的分布,以东南部为最多,中部次之,西部和南部则较少。工人队伍的成份,大多数为本省破产农民,或亦工亦农的农民,手工艺匠人,一部分则是来自山东、河北等省的逃荒难民。工人最多的北票煤矿,从1917年以后才从开滦矿招来一批熟练工人。由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重重盘剥和生产水平低下,热河工人的劳动条件十分恶劣,工人生活十分困苦,采用近代技术设备生产的北票煤矿,井下工人的劳动却象牛马一样,而日工资只有二至六角大洋,^④致使有的工人为了养家

①即元宝山煤矿,有矿工500多人;十大份煤矿,有矿工1000多人;条子沟煤矿,有矿工500多人。

②惠我:《热河最近内容之一般》,原载1933年《村治月刊》。

③《朝阳史话》第128页。

④《朝阳史话》第128页。

糊口，不得不去打连班，甚至连续劳动20多个小时。尽管如此，工人及家属仍过着不得温饱的困苦生活，有的甚至靠沿街乞讨度日。而矿区18家“大柜”的吸血鬼们，却靠残酷地吮吸工人的血汗养肥了。英国人矿长莫勒的日薪高达1300银元，其他如把头的日薪也在200元以上，一个监工头子每日还挣80块银元。更为残酷的是矿工的生命得不到保障。1920年，冠山三坑附近北马路斜井发生瓦斯爆炸，矿方以保护煤田为名，强行将井口封闭，造成了死亡200多人的大惨案。

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引起了工人的强烈反抗。北票煤矿从一开始，工人们就开展了怠工、罢工的斗争，并且一直持续不断。到1923年初，随着中国工人运动出现的第一次工运高潮，北票煤矿也爆发了1000多工人参加的大罢工，不久又爆发了有800多工人参加的大罢工。罢工工人提出了增加工资，改善生活待遇，免扣工具费等合理的经济要求，但却遭到英方和资本家的蛮横拒绝，并用解雇等手段相威胁。帝国主义阻止和破坏工人罢工的种种手段，更加激起了工人的愤怒，他们手拿镐把、铁锹等工具，齐集在一号大井门前，举行抗议集会，与矿方辩理，并不断高呼口号，誓死斗争到底。罢工斗争持续了三天，最后矿方被迫将分“花红”改为包工制，使工人能够从自己的劳动中多得一些经济利益。

北票煤矿工人两次大罢工的胜利，是热河的工人阶级第一次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斗争中取得的胜利，它显示了工人阶级的组织力量和革命积极性的迅速发展，表现了热河的工人阶级已经逐步成熟起来，开始走上了政治斗争的舞台。

三、农民反抗斗争的新发展

青年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工人阶级的斗争，也影响到广大的农村，受苦受难的农民群众纷纷起来，或武装抗捐抗税，或聚

众分食大户，斗争的火焰在各地迅速燃烧起来。农民的反抗斗争比五四运动前又有了新的发展，

热河是以农牧业为主的地区，农牧业经济的繁荣与衰退，直接关系到广大农牧民的命运。早在清朝中叶，热河的农牧业经济曾经有过一个时期的繁荣，但好景不长，很快就走了下坡路。到了清末民初，已经是败象丛生，民穷财尽了。这时，国民政府和热河地方当局，又采取了“蒙荒放垦”^①和“鸦片开禁”^②两项自杀性的农业政策，虽然在一个时期内增加了粮食产量和财政收入，但这是暂时的虚假的繁荣现象，就如同饮鸩止渴一样，很快就带来了农业经济的大衰退。小农经济破产，工商业倒闭。把一个好端端的热河，弄到了千疮百孔，民不聊生的境地。

对于当时热河地区农业破产情况，一记者曾有过生动的描写：“商业日渐倒闭，农村恍若病窟。疾近膏肓，大有不可救药之状！而捐粮号草（驻军征粮草）一夕数至，鞭捶棒撻，视以为常。中产之家破其炕壁，坏其门窗，室内污秽遍布，以防军人之旅寓。农夫则断肘厥踵，妇孺则绽裤露衣，沉靡之气，污秽之状，向所未睹。”“至于围场之情形又自不相同，围场是畏土匪和军队二者，当地之住民常常谈到军队，每以为还不及土匪。因为土

①蒙荒放垦是清朝末年开垦实行的移民实边政策，即将大量未开垦的荒地，作价出售，开荒耕种。其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增加国库收入，另一方面移民实边，防御俄、日的侵扰。但实际上这两个目的都未能达到，却带来了一个灾难性后果，即草地沙化，这给内蒙的农牧业经济带来了毁灭性打击。热河的蒙荒放垦始于光绪三十二年七月（1906年8月），清廷准热河都统廷杰所奏，开放敖汉旗蒙荒2万顷，继之又在巴林放垦蒙荒8000顷，结果一发不可收拾，鲁北、天山、经棚相继开垦，到民国15年统计，已放垦蒙荒15万多顷。

②鸦片开禁，即允许种罂粟，鸦片公卖。民国10年，热河都统、奉系军阀汲金纯，以热河贫瘠民艰为由，大开烟禁，强种罂粟，政府就地征税，名曰禁烟善后局。开禁之时，每亩征税大洋6元，后增加到9元、12元不等，为热河主要财政收入来源之一。民国22年（1933年）种烟亩数已增至6300多顷，使热河人民深受烟毒之害。

匪到来不过把值钱物件取走为止；而军队则偏给地方加一通匪之罪名，借口剿打。”围场“市面萧条尤甚于前，途中罕见行人。”

“土地之给益低，典售无主，上地每亩不满30元，中地则1元左右……此热河之农民最近生活状况也。”^①

农业破产之后，农村出现了三种情况：一是耕地荒废，农民逃亡。“坐载重汽车或马车经过沿路时，各处村庄，可以看见悲惨的穷民及其逃亡的遗迹。”^②到处是“失掉屋顶的破屋，堆满黄沙的农地”。^③到民国22年（1933年）赤峰县“逃难到他乡的空屋，多至8000余户”，^④逃荒人口占一半以上（还有的说占三分之二）。二是铤而走险，哨聚为匪。热河的土匪，多如牛毛。大股的如白三阎王、荣三点、龙三点等不下十几股，聚众数百人至数千人；四五十人的小股土匪，也有百股以上。他们或拦路抢劫商旅行人，或聚众砸抢村镇店铺，烧杀抢掠，破坏性极大。民国12年1月，一股土匪洗劫丰宁县大阁镇，击毙商民20名，抢夺骡马毛驴120匹，焚毁房屋118间、“人尸死畜，横卧于道，凄惨满目，情实可怜。”^⑤热河的土匪还与官府、军队相勾结，官匪一家，兵匪不分，所以成为热河人民一大害。三是举旗造反，抗税抗捐，这是农民反抗斗争的最高形式。

这个时期的农民武装反抗斗争，规模最大，坚持时间最长的是张明久领导的凌南人民的抗捐抗税斗争。张明久，名歧恒，绰号张大胡子，凌源县色木林子村人（今建昌县温杖子乡）。民国11年（1922年）时，封建军阀加在热河人民头上的各种捐税已多如牛毛，地亩捐、附加地亩捐、商捐、房捐、游兴捐、桥捐、路捐等20种，热河都统汲金纯还下令到处设卡，强迫交盐税，并由地方乡绅包办，巧立名目，肆意加码，民众早已恨之入骨。这一年

①惠我：《北游所见述略》。

②③④汤尔和：《哀哉热河》，1933年10月出版。

⑤1923年1月23日丰宁县公安局向热河都统的报告。

的春天，张明久的父亲去绥中运盐，被罚大洋20元。张明久一怒之下，聚众30多人，砸了明水塘门盐局子。他又联络了在民众中深孚众望的姜玉堂和贺殿福，在和尚房子召开了南七会和北八会的联庄会首领会议，共同议决成立“保安总会”，“打击贪官，除暴安良，剪除匪患，以求民安”，武装抗捐抗税。同年秋，入会人数已达5000多人，有火枪2000多支，形成了一支农民武装力量。1928年4月，张明久带领500多保安总会武装，围攻了黑山科盐务督销局，击毙任意欺凌百姓的陈姓“缉私”。1929年7月，张明久又带领3000多农民武装，再次捣毁了和尚房子等七八个盐卡，当场将2万多斤食盐分给了民众。并带人包围了天主教堂，迫使神父交出藏匿在教堂内的包办盐税的蒙绅宫弼臣。这次斗争的规模之大，范围之广，连热河都统亦称：“民国以来所罕见”。

张明久的抗捐抗税斗争，引起了热河封建势力的极度仇视和恐慌。1930年春，热河都统汤玉麟调集重兵，向“保安总会”发动突然袭击，被农民武装击败。5月10日，汤军再次发动进攻，农民武装被打散，姜玉堂被捕就义，贺殿福逃入关内，张明久带领少数人上山坚持武装斗争，官府抄了他的家，挖了祖坟。后来，张明久被捕杀害在狱中。这场坚持了8年之久的轰轰烈烈的抗捐斗争，又被镇压下去了。

张明久抗捐举义的消息，很快传遍热河各地，这如同干柴遇烈火一样，抗捐斗争的火焰很快烧遍全省。承德、平泉、滦平的分食大户斗争，赤峰、围场反对“蒙地升课”的斗争，都给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势力以有力的打击，特别是1929年热北嘎达梅林起义，是对蒙古族封建专制制度的一次挑战，标志着蒙古族人民的新觉醒。

热河为蒙地，东蒙四盟热河有其二，蒙古族人约在40万以上。随着汉人增多和农耕技术的传入，卓索图盟的蒙人大部已弃牧从农，只有热北昭乌达盟的蒙人还大部保留着游牧生活的习

愤。热河的蒙族实行蒙旗制，各个王府都有自己的军队、公堂、监狱，并备有蟒鞭、枷锁、木笼、老虎凳、滚杠等多种刑具，蒙古王公、贵族在自己的领地内执掌着生杀大权，王爷的一句话，就可以置人于死地。虽然辛亥革命早已发生了，但热河蒙旗内的广大牧民仍然过着农奴式的生活，在黑暗、残酷的封建专制下呻吟。这种黑暗的封建专制统治，也激起了以嘎达梅林为首的广大牧民的强烈反抗。

嘎达梅林，蒙名老嘎达，汉名孟青山，是哲里木盟达尔罕王旗的带兵福林，他因反对达尔罕王爷出卖蒙民土地，被王爷关在土牢里，准备处死。后被牧民救出，举旗起义，开展武装斗争，热北地区的贫苦牧民也纷纷响应，参加了嘎达梅林的起义部队。起义队伍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由80多人发展到1000多人，^①到处打击“清支局”、“安垦局”，震撼了整个科尔沁草原和热北地区，使蒙古王公和封建军阀十分惊恐不安。热河都统汤玉麟调动骑兵第十七旅前往镇压，经过多次激战，在1931年春，终因寡不敌众，嘎达梅林被热河骑兵三十四团团长李守信枪杀在达尔罕旗洪格尔敖包的老哈河边。^②嘎达梅林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却迫使反动当局不得不暂时停止了“垦荒”计划。

五四运动是一次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这次斗争在热河的展开及其深入发展，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显示了热河人民不畏强敌的斗争精神，是热河革命史上的重要篇章。但是，由于热河文化落后，交通闭塞，先进的思想还不能广泛传播，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在热河也还处于初创阶段。所以不能不使热河人民的许多英勇悲壮的斗争，仍然带有浓厚的自发斗争的色彩，最终被反动统治阶级镇压下去。只有

①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编写的《中国现代史》，1983年9月版，第459页。

②内蒙古文史资料第20辑《李守信自述》，第94—98页。

中国共产党在热河的党组织建立之后，才使热河人民逐渐从自发的斗争转变为自觉的斗争。

第二节 共产党在热河的早期活动

一、热河地方党组织的建立

1921年7月，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中国有了无产阶级政党，革命面貌就焕然一新”。1925年初，中共北方区委决定建立中共热河工作委员会，这是在热河地区建立的第一个党组织，热河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也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热河地方党组织的建立，是经历过一个较长时期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的，早在五四运动时期，在天津读书的一批热河进步青年，就组织成立了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团体“新生社”，并且出版了《新生》杂志，于方舟、韩麟符、陈镜湖等都是“新生社”的骨干。中国共产党的卓越创始人之一李大钊，非常重视这一革命团体。在李大钊的指导下，1920年秋，将“新生社”改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北方地区少数几个马克思主义组织之一。1923年1月，经李大钊介绍，韩麟符、陈镜湖等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热河地区最早的党员。后来，在李大钊的关怀下，又吸收一批热河蒙、汉族青年入党，并且派这些党员回到热河，开展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使马克思主义与热河的群众斗争实际结合起来，做建立地方党组织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1924年1月，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韩麟符和陈镜湖作为直隶共产党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韩麟符被选举为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①大会以后，韩麟符、陈镜湖积极从事热河建党筹备工作。

^①魏宏运主编《中国现代史稿》上册第135页，黑龙江出版社出版。

他们一面在党刊《向导》上发表《内蒙古及热察绥三区近状》^①和《洛吴对内蒙之新政策》^②等文章，阐述热察绥三区的斗争形势，揭露帝国主义、封建军阀、蒙古王公互相勾结，狼狈为奸，残酷地剥削压榨蒙汉民众的罪行，号召“内蒙同胞，从速觉悟，不要忍受非人类的生活，快与军阀及王公斗争，夺回自己应有的权利”。^③另一方面，深入工农民众，宣传革命思想，发展党员。1925年初，经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方区委批准，正式成立中共热河工作委员会，陈镜湖为负责人。当时正处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同时也成立了国民党热河省党部，由共产党员陈镜湖等领导，党部设在承德南营子大街三条胡同。

热河工委成立后，积极领导热河人民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年初，广泛散发了孙中山《北上宣言》，发动了拥护孙中山北上，拥护召开国民会议的运动；3月，派代表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国民会议促进会。5月，在承德演武厅广场举行了有1000多人参加的纪念“五四”运动六周年大会，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平均地权！”等革命口号，并举行了游行示威。6月，上海“五卅”惨案的消息传来后，热河工委再次组织工人、学生，高唱“叹，上海繁华世界已成屠杀场，工人流血学生死，残忍似豺狼。劝我国民急速起，誓死雪此耻，舍命救同胞，义气高千丈！”的歌曲，举行游行集会，抗议英、日帝国主义的暴行，声援上海的工人阶级，热河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向前跨进了一大步。

①《内蒙古及热察绥三区近状》为韩麟符所作，刊登在《向导》第75期上（1924年7月23日）。

②③《洛吴对内蒙之新政策》为陈镜湖所作，刊登在《向导》第75期上（1924年7月23日），引文与上同。

二、工农运动的新高涨

中共北方区委为了更好地团结内蒙古地区蒙、汉各族劳动人民共同进行革命斗争，决定成立农工兵大同盟。1925年冬，李大钊亲自到张家口，主持成立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有热、察、绥各地各族的工人、农民、牧民、士兵代表200余人，选举李大钊为内蒙古农工兵大同盟书记，赵世炎、韩麟符为副书记，陈镜湖等为执行委员，杜真生^①任中共热河工委负责人，兼农工兵大同盟热河支部书记。内蒙古农工兵大同盟是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发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是这个组织的中心任务。这个时期，在李大钊的亲自指导下，热河的革命群众运动又有了新的高涨。

北票煤矿的工人运动有了新的发展。1925年秋，唐山党组织负责人阮章任锦州铁路段车头房副稽查(相当于机务段副段长)，他多次到北票进行组织铁路工会和煤矿工人工会的活动；热河的党组织也派人到北票煤矿开展工运工作。到1926年，已经培养出一批工会骨干，建立起工会组织，使北票煤矿的工人运动接受了党的领导 and 影响，提高了工人斗争的组织性和策略性水平。

1926年4月，发生了北票路矿工人联合大罢工，“北票煤矿工人之要求改善待遇，与经理作激烈之斗争。”^② 火车停驶，煤矿停产，工人组成纠查队，手持镐把在各坑口和路上维持罢工秩序，并到处张贴“打倒帝国主义”，“给工人长工钱”的标语。

^①杜真生，字天铎，1901年生于热河省建平县北公营子村。1919年在天津读书时参加了五四运动，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冬接任中共热河工委负责人。1930年12月在天津参加反立三路线扩大会议时被捕，1932年3月被河北省委开除党籍。1933年3月由孙殿英保释出狱，同年10月再次被捕，1937年第二次国共合作时释放，任国民党胡宗南部上校参谋，1948年任国民党热东七县办事处主任，热东支队司令，1950年9月在北京被捕，1951年3月25日以反革命罪被处决。

^②《内蒙古特委书记李铁然报告书》1932年12月16日。

矿方派出全副武装的矿警队，用上了刺刀的步枪驱赶工人，并鸣枪威吓，强迫工人复工，但工人毫不示弱，用石块进行回击。罢工一直坚持35天，终于取得了胜利。1926年10月到1927年3月，由共产党发动并领导的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这一胜利消息传来后，北票工人很受鼓舞，在煤矿工会领导下，1500多工人捐献银元1000多元，支援上海工人兄弟。1928年初，北票煤矿发生了2000多名采掘、机电、运输工人大罢工，坚持了6天。1929年，北票煤矿矿长、英国人莫勒，携带大量财物准备回国，工人闻讯后，将莫勒的专车围住，不准他离开。罢工工人聚集到2000多人，坚持3天，最后，莫勒被迫吐出侵吞工人的血汗钱，才被放出境。从五四运动到九·一八事变，北票煤矿工人的罢工斗争一直时起时伏，从没有间断过。

这个时期热河的农民运动也有了蓬勃发展。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问题，是当时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陈独秀以“农民难以参加革命”为理由，对农民运动采取压制和指责的态度。李大钊则积极支持农民斗争。热河的农民运动就是在李大钊直接领导下开展起来的。

1926年初，李大钊选派马德元等4人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同时，李大钊还在北方区委党校农民运动训练班，亲自讲授农民问题，内蒙及热河许多农民运动骨干参加了这个训练班。这两个班的农运骨干回到热河后，对农民运动的开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到1927年4月，平泉、赤峰、建平、朝阳、凌源、围场、隆化、丰宁、滦平9县建立了县农民协会，同时还建立了13个区农会和56个乡（村）农会，会员人数5423人。在全国占第12位，在北方仅少于山西省，居第2位，^①这是热河农运的第一个高峰期。

^①国民党热河省党部1927年4月份报告，原载1928年出版的《中国劳动年鉴》。

对于热河农民运动的方向和任务，中共顺直省委在《关于内蒙古目前工作计划》中做了明确规定。计划指出：“目前在热河最重要的斗争，应该是反（对）军队的勒索，反对豪绅地主的压迫和剥削，反对一切捐税，有组织的作大规模的借米运动”。^①热河的党组织和农会组织，认真地执行了这个工作计划，开展起大规模的抗捐抗税斗争。其中较为著名的除热东张明久领导的抗捐斗争外，还有农民反对清丈土地的斗争和分食大户的斗争。

反对清丈土地的斗争发生在1929年末和1930年初。当时，热河都统、奉系军阀汤玉麟为了搜刮民财，成立了热河省经界委员会，各县设经界局，进行清丈土地，验检地契，蒙地升课，以图增加地税收入。另外，在清丈中，还要征收土地注册费（每百亩大洋5元）、经费（每百亩大洋2.5元）、契照费（分三等，收大洋2元至5角不等），^②再加上地主豪绅包丈，层层加码，从中渔利，给农民增加了沉重负担，受到中小地主和农民的普遍反对。首先起来反抗的是平泉县民众，聚众围攻省里派去的测量员，阻止清丈。继之而起的是围场县民众，自发地起来举行暴动，“打伤县政府所派前去的调查人员，参加者约2000余人。”^③热河的党组织派人前去领导，因缺乏斗争经验，终于被驻军镇压下去。赤峰县民众2000多人也揭竿而起，进城围攻了赤峰商会会长杨子彬的住宅，迫使赤峰县长当众道歉，宣布停止清丈，随即出动大批军警，民众才分散退去。^④热东民众的反抗斗争也很活跃，大城子孙成功和叨尔登魏俭分别领导的民众抗捐斗争，都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①中共顺直省委《关于内蒙目前工作计划》，1928年9月。

②《建平县公署报告》，1933年4月11日。

③李铁然：《内蒙古一般的政治经济状况》，约1932年春。

④《赤峰市地方志·概述篇》第129页。

农民分食大户的斗争，则主要发生在热中、热西一带。1929年热河全省荒欠，粮食收获只有二成，但官方捐税却有增无减。仅各县应缴驻军粮秣款即达200多万大洋，农民收获的一点粮食被搜刮殆尽。1930年春，农民衣食无着，走头无路，自发地起来分食大户，热河的党组织和农会“领导饥民吃富户，分粮食”，支持并领导了这一斗争。

农民最早起来分食大户的是平泉县。5月1日，六区霍神庙、平房村饥民300多人，齐聚大户之家，讨粮索米，不分不散。这个斗争很快扩展到全县。“二、六两区，灾黎遍野，满目凄凉，而一般贫户颗粒无存，剥餐树皮，采食树叶，苟延残喘者时已多日，鹄鸿菜色，惨状堪怜，纯为饥馑所驱，始有聚食之举，达50多处”，^①有1万多人。承德、滦平县也相继发生多起千余人的分食大户斗争。

反对清丈土地和分食大户的斗争，是在奉系军阀的白色恐怖下进行的。当时，热河的党组织已经转入地下，对于这些斗争，只能“设法参加进去，予以指导”。尽管如此，仍然取得许多胜利，使热河农运走向第二个高峰期。

三、建立革命武装的尝试

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方区委，很早就注意抓枪杆子，建立工农武装，实行暴力革命，并且多次进行建立革命武装的尝试。李大钊建立工农武装的伟大尝试，主要是在以热河为中心的内蒙古三特别区进行的。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中国，仍然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军阀连年混战，人民痛苦不堪。在当时，李大钊就认为：欲改良社会，非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不可。而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来到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实行

^①平泉县长贾如道致热河省主席汤玉麟电报。1930年6月5日。

‘暴力革命’”。他还强调：“唯有枪才能对付枪，唯有暴力才能打倒暴力”。^① 旗帜鲜明地阐明了建立革命武装的极端重要性。从1924年起，李大钊领导的北方党组织就开始了组织武装，建立革命军的准备工作。首先是选送内蒙各地进步青年到广州黄埔军校学习，前7期共有热、察、绥学员30多人。热河喀喇沁旗蒙古旗青年白海风、^② 王秉璋^③ 就分别参加了黄埔军校一、二期学习，毕业后，都成为中共党员，革命军队的领导骨干。其次，秘密地往冯玉祥的西北军中派遣党员干部，在中下层官兵中进行建军的组织工作。

从1924年10月起，李大钊和北方党组织多次进行了建立工农武装的尝试。

第一次建立革命武装是在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以后。当时，冯玉祥将自己所部改称国民军，北方形势发生了有利于革命的转化。李大钊领导的北方区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采取了联合国民军，反对奉系军阀的策略。李大钊还亲自作冯玉祥

①由李大钊撰写的中共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敬告国人书》和《敬告劳动者书》，1922年双十节。

②白海风，蒙名都愣仓，1904年生于热河喀喇沁右旗。早年毕业于热河师范学校，1924年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出席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927年8月出席在乌兰巴托召开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特别会议，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并被指定组建内蒙古人民革命青年团，任团中央委员长。1937年以后，曾任抗日武装蒙旗保安总队队长、蒙旗独立旅旅长、第三师师长等职。1941年脱党后，又参加伪西蒙古自治活动，1949年9月率部起义。解放后任西北民族学院副院长，全国政协委员等职。1956年病逝。

③王秉璋，蒙名道尔吉苏伦，热河喀喇沁右旗人，黄埔军校第2期学员，中共党员。1926年任李大钊创办的内蒙古军政干部学校校长。1927年9月，白云梯叛变革命后，王秉璋仍在呼和浩特、包头一带坚持党的地下工作。1928年赴蒙古人民共和国，后在中央银行工作。

的工作，派一批共产党员和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党员，直接到国民军中去掌握武装，作为发展红军的基础。热河党组织负责人陈镜湖等就是在这个时期到国民军中担任热河民军司令等职务的。他们曾到热东、热西一带招收骑兵，壮大队伍，很快建立起一支千余人的由共产党员掌握的武装力量。^①

第二次是在1925年，内蒙古农工兵大同盟成立之后，冯玉祥接受了共产党反帝反军阀的政治主张，又得到苏联的军事援助，李大钊派出30多名党员，单独组织了“内蒙古特别民军”三个纵队（相当于三个团），^②由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党员乐景涛、^③共产党员陈镜湖、郑丕烈分别担任三个纵队的司令。这是一支由北方党组织领导和影响的军队，是内蒙古第一支革命武装力量。这支部队军纪严明，不扰民，不害民，帮助民众进步；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深受热、察、绥人民的拥护。12月，冯玉祥国民军向奉系军阀发动进攻，热河特别民军配合宋哲元部进攻承德，赶跑了奉系军阀热河都统阚朝玺。特别民军还独立出师北征，连克赤峰、建平、朝阳、开鲁数城，军威大振。以后又配合国民军，对奉直晋三系军阀的联合势力进行过多次战斗，均立有战功。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冯玉祥礼送共产党员出境，这支部队才被宋哲元部收编。

第三次是在1927年9月，在“八一”南昌起义的影响下，中共北方局负责人蔡和森指示热河党组织发动农民暴动，建立革命

①《陈镜湖烈士传略》，载《朝阳党史资料简报》第27期。

②《郑丕烈自传》，1951年，郑丕烈：《我自己的历史》，1951年。

③乐景涛，蒙族人，蒙名木荣嘎，热河省克什克腾旗人。1925年参加革命统一战线组织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被选为中央党务委员。同年冬在克什克腾旗组织军队，担任内蒙古特别民军第一纵队司令。1927年8月参加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乌兰巴托特别会议，以后追随国民党分子白云梯，脱离人民革命党，充任国民政府监察委员。

武装。热河党组织派人深入到赤峰、建平交界的山区，在一个多月里发动起千余人的农民武装，建立起300多方里的游击区。^①这一小块红色区域使奉系军阀惊恐不安，建平县警察所长就惊呼：

“前国民军团长郑丕烈潜迹赤建交壤之地，搅乱商民。”^②热河都统汤玉麟亦悬赏缉拿，并派兵赶来镇压，使这次建立起来的农民武装，又归于失败了。

北方党组织建立武装的尝试都失败了，没能搞起象南方武装斗争那样轰轰烈烈的局面来。这主要是由于北方封建军阀势力的强大和北方共产党组织力量的弱小的缘故。李大钊在1927年被奉系军阀杀害，也是北方武装斗争没能继续发展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李大钊和北方共产党组织第一个进行了建立自己武装的尝试，这个尝试是伟大的，是中国革命史上的光辉篇章。

四、内蒙古特委和金沟屯会议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全国处于白色恐怖之中，革命转入低潮。热河的共产党组织及其他革命组织转入地下，革命斗争出现了非常艰苦的局面，党内斗争也出现了错综复杂的情况。

1927年10月，中共顺直省委在中央“左”倾盲动主义的指导下，通过了“北方暴动计划”，规定在热、察、绥三特区和京、津、唐等地发动大暴动，并准备在京、津站不住脚时退往热河，以保持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联系。这个脱离实际的冒险计划，虽然也曾动员一部分党员和群众，掀起了规模比较大的群众暴动，但却失败了，有许多党员被捕、牺牲，使北方党组织蒙受了重大损失。热河地区的党组织也遭到严重破坏，“处于有党员无组织的

^①建平县党史办《星火春秋》第5页。《郑丕烈自传》，1951年。郑丕烈：《我自己的历史》，1951年。

^②建平县警察所长张麟阁向热河省民政厅的呈文。

状态”。1928年4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在顺直省委领导下，建立内蒙特别支部，并建立了赤峰、建平、朝阳三个支部，共有20名党员，恢复了党的组织活动。但不久又发生了内蒙特支与顺直省委的矛盾，使党内斗争复杂化了。

1928年6月15日，内蒙特支向中央报告并指责顺直省委“对内蒙工作毫不了解，且有极多的错误观念”，要求内蒙工作直接由中央指导。报告中还讥笑顺直省委在实际上已等于零，在热、察、绥建立三个县委是个“笑话”，^①更激化了两个地方党组织之间的矛盾。于是，顺直省委在天津召开的扩大会议上，指责韩麟符“犯了军事上投机及组织上的错误”，“特予以留党察看6个月之处分，并开除内蒙特委（支？）书记职务，请求中央批准”。^②

1930年12月，由于叛徒的出卖，内蒙特委的主要负责人和其他党组织的负责人60多人在天津相继被捕。这样，热河的共产党组织，就因领导机关被破坏再一次中断了与中央和中共河北省委的联系。

但是，热河的党员是经过革命风浪考验的党员。在极为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同志们仍能在下层刻苦切实地去干，由是内蒙党务始能稍有进展，而赤卫队之组织尤具突飞猛进之形。”^③个别党员还参加到张明久领导的农民武装中进行工作。在张明久抗捐失败后，“遂下令将武装埋藏，暂时编散乘机而动。”^④1931年10月2日，由原中共内蒙特委委员李铁然（即陈镜湖，因遭敌通缉而化名李铁然）、刘刚召集，在热河省滦平县金沟屯举行了

①《内蒙特支给中央的报告》，1928年6月15日。

②中共顺直省委扩大会议作出的《政治纪律议案》，1928年6月。

③李铁然、刘刚：《内蒙党报告》，写于1931年10月2日金沟屯会议后去乌兰巴托途中的哈尔滨，约为1931年冬季。

④李铁然：《内蒙古一般的政治经济状况》，约写于1932年初。

内蒙各旗县党部代表联席会议。到会10多名党员，代表了热、察、绥3省11个党部、93名党员和176名青年团员。^①

金沟屯会议“曾把内蒙古过去的工作很详慎地审查了一下，指出了许多严重的错误事实与倾向，同时议决以后应有的方针。”^②会议指出的目前最紧急的中心任务是：扩大和发展产业工人和贫农组织，充分准备工人罢工、农民暴动事项；造成大规模的反帝国主义、反天主教、基督教运动，没收其土地和羊牛；极力发展游击战争，尤其不可忽视引导和扶助蒙古民族做单独的反对王公喇嘛的斗争；彻底肃清“左”倾机会主义倾向和立三路线残余，等等。

金沟屯会议是一次重要会议，在内蒙古特别是热河党组织的发展史上占有一定的位置。这次会议的重要意义在于，在与上级党组织失掉联系的情况下，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把内蒙古地区处于分散的、瘫痪状态下的党组织重新组织了起来，并使各级组织充满新的生机，投入了新的战斗。同时，会议还检讨了内蒙党过去的错误，在对内蒙古地区革命的任务、动力、对象等问题的认识上有所前进。但是，金沟屯会议仍然存在着“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主要是没有充分估计到九·一八事变后，社会主要矛盾可能由阶级矛盾向民族矛盾的转化，因而也就没有提出发动全民族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任务，这是一个失误。这个失误在以后的热河抗战中产生了严重影响。

①李铁然、刘刚：《内蒙党报告》，约1931年冬。

②李铁然：《内蒙古一般的政治经济状况》，约写于1932年初。

第二章 热河事变和全省爱国军民 的抗日救亡运动

第一节 九一八事变后的热河政局

一、日本侵吞热河蓄谋已久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摆脱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经济危机，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决心乘欧美各国忙于内部事务和国民党政府大打“剿共”内战之机，首先用武力侵占中国东北，进而实现其独占中国的美梦，于1931年制造了九一八事变。由于国民党政府推行不抵抗政策，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相继沦陷。翌年3月，又建立了傀儡政权伪满洲国，我国的东北三省遂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并进而把武装侵略的矛头指向热河。

热河与日本的关系，可谓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辽代。辽太祖天赞四年十月（公元925年），就有“日本国来贡”^①的记载。辽道宗七年九月（1091年），“日本国遣郑元、郑心及僧应范等28人来贡”。第二年，又有“日本国遣使来贡”^②等记载。当时，中京大宁府（热河省宁城县）是接待外国来宾的地方，可见，这些日本人已深入到热河腹地。不久，辽国也派商人道言、能算去日本，“因事相争，终于禁绝之”，^③以后就很少往来了。

到了近代，日本资本大量侵入东北，攫取了许多特权，并希

①《辽史·太祖本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本第21页。

②《辽史·道宗本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本第300页。

③岛田好：《热河史话》，昭和八年（1933年）出版。

图进一步染指以热河为中心的东蒙地区。在清末民初，中国政府
和热河地方当局，对日本人在热河经商、开矿、游历等活动进行了
严格限制，致使日本人在热河开办的规模最大、资本最厚的复
兴垦务公司，只能利用中国人代其出名。^①1915年，日本人制定
的《日本经营东蒙之计划》，对这种状况“遗憾至极”，鼓吹攫
取东蒙地区的特权，是日本“急不容缓之要图”，“苟延缓一
日，则有一日之损失。”^②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强迫袁世凯
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其中第2条第2款就规定：日本国臣
民在热河“有盖造商工业应用之房厂或为耕作，可得其须（需）
要土地之租借权或所有权”。在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下，“二十
一条”自始未能生效。此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热河之心不死，
又改为派遣大批浪人，潜入热北地区，与蒙奸、土匪结合，资以
枪弹，发动叛乱，妄图扶植傀儡，变东蒙为日本殖民地，这些活
动也都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在热河人民的强烈抗议下，日本设在
赤峰的领事馆也被迫于1921年撤销了。1927年，日本政府又炮制
了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进一步鼓吹“满蒙非支那领土”，鼓吹
通过热河的铁路在满蒙铁路中“最有军事及经济之价值”，“盖
我帝国主义对内外蒙古之沉浮，尽在此路线已耳”等谬论，^③充
分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对热河的侵略野心。

到了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东北的阴谋得
逞，更进一步制造“满蒙一体”、“满热一体”的舆论。制造九
一八事变的罪魁祸首板垣征四郎，在他所作的《从军事上所见到的
满蒙》的讲话中就曾说：“从战略上观察，满蒙北以黑龙江、
西以大兴安岭与俄国为界，东南以鸭绿江与朝鲜为界，西南以松
岭、七老头、阴山等山脉与中国本土相隔，划出了四周的天然屏

①李铁然：《内蒙党报告》，约1931年冬。

②《日本经营东蒙之计划》，北洋政府农商部咨议张鹏飞译。

③《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绪编》，1981年9月台湾出版。

障，它本身就形成了一个战略据点。”1931年12月，日本内阁又制定了攻热计划。日本关东军炮制的第一个东北傀儡政权的方案也规定满洲国的“领土包括东北四省及蒙古”，^①即把热河置于他们所谓的“新国家”之内了。

同时，日本侵略者还亟欲把它的殖民势力扩张到华北以至全中国，而热河却是横亘在它侵略扩张道路上的一个严重障碍。所以，侵吞热河及东蒙广大地区，早已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既定国策了。国策即定，下一步就是采用什么方法的问题，是武力占领呢？还是引诱迫降呢？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及汤玉麟的腐败和动摇，则使热河处于任凭侵略者宰割的可怜状态之中。

二、汤氏小朝廷的腐败和动摇

热河省主席兼东北边防军热河驻军司令汤玉麟，出身绿林，曾经是奉系军阀张作霖的一员“虎”将，在军中素以骄横跋扈著称。1926年，在与冯玉祥的国民军作战中，率部进入热河，被委任为热河都统。1928年热河改建行省，又被任命为省主席。汤玉麟治热期间，昏庸残暴，任用私人，横征暴敛，纵兵殃民，政治上已腐败到了极点，使热河经济趋于崩溃，更加民不聊生。

汤玉麟视热河为私产，要职肥缺，几乎控于汤氏一族之手，数年间，经营起一个封建军阀的汤氏小朝廷。他的长子汤佐荣任热河省禁烟局长，次子汤佐辅任热河省财政厅长，独揽全省财政经济大权。他的三个弟弟分任三十六师炮兵团、骑兵团和五十八团的团长，又网罗一些亲朋故旧、马贼土匪，控制军事大权。汤玉麟的倒行逆施，多次遭到热河人民的激烈反抗。1931年12月，朝阳人民又开展了“驱汤灭周”斗争，^②31日夜间攻入朝阳县

①东北四省指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蒙古包括东西蒙。

②也有称“吃粥喝汤”的。粥，指汤玉麟女婿、朝阳县长周铁铮；汤，即汤玉麟五弟、三十六师骑兵团长汤玉书。

域，汤玉麟女婿、朝阳县长周铁铮，汤玉麟五弟、骑兵团长汤玉书大败而逃。事后，汤玉麟动用重兵对朝阳人民进行血腥屠杀，爱国名士沈鸣诗、吕善著等人惨遭杀害。

汤玉麟横征暴敛，苛税杂捐，有增无已，光土地税金每亩地就有28种之多，折合大洋1元至数元，另外还要交纳军粮7.5斤，军草19.5斤。鸦片税由初期的每亩3元大洋增加至12元，最多的19元，并且，还一再预征。如由1931年竟有预征到1961年至1971年的。更加之滥发纸币，兴业银行券^①在1925年1元兑换1元大洋，到1933年50元兑换1元大洋，^②甚至72元兑换1元大洋，^③如同废纸一样。民众交纳不起捐税，又怕吊打坐牢，有些人便将地契文书贴在门窗或树上，弃家逃亡。

汤部官兵专以欺压百姓为能，中上级军官大半染有吸毒嗜好，又经年累月不发军饷，^④士兵服装寒暑倒置，给养柴草全由地方摊派，官兵形同官匪。九一八事变后，由于热河鸦片在东北的销路已绝，招致财政困难，汤氏父子更变本加厉地搜刮人民，将热河变成了人间地狱。贫苦的人民在隆冬季节，多数糊不上窗纸，十几岁的女孩穷得一丝不挂。而汤氏父子却在天津租界里用搜刮来的人民血汗钱营造别馆，过着奢侈糜烂的生活。汤氏家族对热河的腐败统治，使热河民心背离，怨声载道。这个事实，连

①兴业银行，其前身为热河官银号。1917年改为兴业银行，当时以地方收入担保，发行金额又少，故信用卓著。1922年嗣朝玺都统，一次发行2000万纸币，后又兵败撤走，使纸币毛荒，只好声明作废，热河人民蒙受重大损失。汤玉麟都热后，继续用兴业票搜刮热河人民。1929年发行600万，1932年10月发行300万，到11月就跌价75%。

②汤尔和：《哀哉热河》，1933年10月出版。

③陆诒《热河失陷目击记》，第23页，中外出版公司出版。

④陆诒《热河失陷目击记》中说：“经我一度探询，才知道汤玉麟对于所部热军已有16个月不发一文，此次因日军侵热，要叫他们上前方去抗敌，所以才开宏量的发了20元热河省兴业银行的钞票（实际上仅等于沪上通用之银币4角）。”

汤玉麟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他说：“你们看我热河的军政，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若两眼同时看，那就错了。”^①一名在热河事变时曾到过热河的美国记者也这样写道：“我现在还能记得，1933年热河省发生的类似情况。当时，日本人10天就占领了10万平方英里的中国领土。有一回，我同一群农民聊了起来，当时日本人已经推进到离当地只有几英里远的地方，这些农民正在等着日本人来。我问他们怎么办？他们满不在乎地说：‘日本人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省长怎么样，我们很清楚，恨不得吃他的肝，喝他的血。’”^②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东北抗日义勇军声威浩大，牵制了日军，以及国际舆论的反对和“国联”调查团来华，日本侵略者对汤玉麟不得不采取军事威胁和拉拢诱降的两手政策。汤玉麟因在沈阳、哈尔滨等地有巨额财产，同时为了保住热河地盘，满足一己之私利，其对日、对伪满政权的立场，始终摇摆不定。

1932年2月，关东军导演下的东北行政委员会发表《独立宣言》，汤玉麟竟派其代表谢吕西（伪满外长谢介石之胞弟）出席会议并签字。伪满洲国成立时，汤被任命为参议府副议长兼热河省主席，汤玉麟表面上表示反对，拒不到职，私下里又让谢吕西代其表示歉意。同年4月，关东军司令制定了“热河政策”，决定暂时支持汤玉麟，使之从速服从满洲国的统治为首要措施，进一步加紧了对汤玉麟的拉拢诱降活动。日本侵略者除了利用汉奸、汤的盟兄张景惠和张海鹏等派人到热河劝降外，还派遣与汤玉麟熟识的日本浪人高原卡见化装到承德对汤进行诱降。与此同时，日本关东军还于1932年冬，以伪满洲国名义通知汤玉麟派代表到北票开会，提出要汤玉麟派亲信负责的人为代表常驻长春；把铁路由北票延长修到承德；日本军部在承德架设无线电台等项要

①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第26页。

②即美国记者欧文·拉铁摩尔，原载《中国震撼世界》序言。

求。汤玉麟在张学良的坚决反对下，不得不拒绝。

这时，张学良鉴于热河地位重要，汤玉麟对抗战态度暧昧，在热河又已人心丧尽，难当国防重任，有撤换汤之意。事为汤玉麟所悉，大为愤懑，阴谋与伪满勾结。后经张作相派人劝解，婉陈利害，加之汤玉麟见当时全国人民抗日声浪甚高，其左右爱国少壮军官极力怂恿抗战，故不得不作出抗战的姿态，表示抗日，但并没有多少实际行动。因此，在热河失陷前，汤玉麟既没敢公开降日，也没有抗战的决心，始终心怀携贰，摇摆不定。

三、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1932年1月，日军进犯与热河毗邻的辽西重镇锦州，数万严阵以待的东北军，竟奉命撤向关内，不战而逃。3日，锦州失陷。不久，锦西、兴城、绥中等县城也相继沦于敌手，热河的开鲁、朝阳、北票等地就成为反击日本侵略的前哨阵地。

锦州失陷，唇亡齿寒，热河危机日益加深，政局更加动荡。但这也使热河“成为远东斗争的焦点”，“忽然名震环球”，^①成为全国舆论的中心，各种矛盾，如中国人民反抗侵略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间的矛盾，中国人民坚决抗战和国民党政府不抵抗主义间的矛盾，共产党与国民党间的矛盾，蒋介石与张学良间的矛盾，张学良与汤玉麟间的矛盾，还有日本政府与关东军间的矛盾，等等，都错综复杂地交织在热河一隅之地。

由于热河战略地位的重要，热河的得失就成了关系中华民族存亡的重大事件。对于日本侵略者来说，欲灭亡中国，在灭亡东三省之后必灭亡热河。只有灭亡热河，才能屏蔽满洲，出击西蒙；才能关闭关内外联系的门户，堵死收复东北失地的要道；才能居高临下，威慑平津，控制中原。对于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来说，也只有控制热河，才能确保中原，巩固华北，收复东北；失

①黄炎培：《一枚大炸弹的药引——热河》，原载《申报月刊》。

去热河，不但收复东北无望，大半个中国都亦难保。所以，中国人民坚决要求抗击日军侵略，保卫祖国领土，不能再从热河后退一步。国民党政府为了买办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之私利，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直步步妥协退让，先以“绝对抱不抵抗主义”，丧失了东北三省，^①在日军兵临热河的时候，又“确定交涉与抵抗并行之方针”，^②实际上仍没有全面抗战的决心。张学良是以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为其根本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已失，热河再要丢失，不但无颜见东北父老，连个站脚的地方都没有了，所以，他的抗战决心还是坚决的，但这又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发生了矛盾。因此，蒋张之间在热河抗战问题上就有了许多明争和暗斗，结果是张学良完全被置于欲进不能，欲罢不得，优柔寡断，首鼠两端的境界，内外都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与中国人民的抗战救亡要求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国共产党则坚定地站在人民一边，领导和支持全国的抗日救亡斗争。

早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中国共产党就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9月22日中共中央又作出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上海一二八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又发布了《对日宣战通电》和《关于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在这些文件中，都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目的是“使中国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③揭露了国民党政府的投降卖国政策，同时号召“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斗争，……组织东北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打击”。^④

国民党政府不但拒绝了这些正义要求，竟不顾日本侵略者已

①魏宏运主编：《中国现代史稿》，黑龙江出版社1980年版，上册第388页。

②《行政院长汪兆铭对暴日侵略宣言》，1933年1月12日。

③④《红旗周报》第19期，1931年10月18日。

登堂入室，亡国在即的危机状况，集中兵力向苏区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围剿，这就更激化了国民党政府与人民之间的矛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号召下，蕴藏在中国人民心中的抗日怒火，如火山爆发般地迸发出来，掀起了全国规模的抗日民主救亡运动。

热河人民站在了全国民主救亡运动的前列，纷纷组织救国团体，宣传鼓动群众起来抗日。最先是参加了爱国人士高崇民等在北平建立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决心“抵抗日人侵略，共谋收复失地，保卫主权”。9月29日，热河旅平同乡救国会连续发出两封告热河同胞书，指出：“山河惨变，国土沦亡，灭种之祸，迫于眉睫。东北灭亡，热亦不保，当此大难之来，若采取不抵抗主义，即无异于自杀”。热河省立第九中学反日会、朝阳旅平反日会等团体，也同时发表告热河同胞书，号召民众“吾家可弃，吾身可死，宁作疆场上战死之好男儿，亦不为奴隶牛马杀留任人之亡国奴！”热河各界爱国人士更是纷起响应。著名人士胡家钰编译出版了《热河内属中国及行宫驻防始末记》，概述了热河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的事实，批驳了日本侵略者散布的“满蒙非支那领土”的谬论。他面对日本侵略者即将发动的进攻，大声疾呼：“热河全省早隶神州，宜谋捍卫或可保邦于未危欤！”。^①汤玉麟部爱国官兵也行动起来，有的力主汤玉麟抗战，有的携枪带队参加抗日义勇军。来热河诱降汤玉麟的日本浪人高原卡见，归途行至朝阳附近，也被汤部爱国官兵截击杀死。^②抗日救亡已是热河全体人民的一致行动。

热河的共产党组织也积极参加到抗日救亡运动中来。九一八事变一周年的时候，中共内蒙特委在围场县召开紧急会议，发表了《为纪念“九一八”反对帝国主义进攻热河告蒙汉劳苦民众

①胡家钰：《热河内属中国及行宫驻防始末记》序言，1932年5月。

②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第43页。

书》，痛斥“国际帝国主义是一群瓜分中国的恶魔”，痛斥国民党假“长期抗战”之名，“而骨子里却准备着新的投降，新的卖国”，号召蒙汉族平民大众：“团结起来，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热河而斗争，”还提出了组织工人义勇军，扩大民族革命战争等正确主张。但内蒙特委当时受“左”倾路线影响较深，也错误地提出了“打倒王公，平分牧场”、“建立内蒙苏维埃共和国”、“武装保卫苏联”等“左”的口号，这就脱离了热河人民团结抗日的实际，终致在汹涌澎湃的抗日救亡浪潮中，没能更好地发挥领导作用。

热河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主要的还是通过武装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遍地而起的抗日义勇军，为打击侵略者，保卫祖国领土，在黑山潢水^①之间进行了英勇悲壮的战斗。

第二节 热辽^②义勇军的抗日斗争

一、义勇军的渊源和发展

九一八事变后，为了拯救民族危亡，热辽民众和国民党爱国官兵，纷纷揭竿而起，组织抗日义勇军，开展武装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侵略者的气焰，表明了热辽人民不甘屈服，捍卫民族独立的坚强意志。

抗日义勇军，最早发源于辽西。九一八事变之初，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声率部分公安总队退到锦州，把当时在黑山、北镇、新民等地已经出现的自发的民众抗日武装组织起来，命名为抗日

^①黑山在热北，潢水即西拉木伦河。如同历史上称东北为“白山黑水”一样，热河亦称为“黑山潢水”。

^②义勇军发起于辽西，但根据地在热河，主要战斗又大多在辽西，因此，热河义勇军和辽西义勇军很难分得清，这里统称“热辽义勇军”。

义勇军，并委任了司令、参谋长等职。到锦州失守前，共发展22路，但抗日义勇军的前身却是遍布热东、辽西各地的联庄会。

早在清末民初，由于日、俄帝国主义的侵扰，军阀、土匪的横行，热辽地区的社会非常动乱，各地的地主阶级纷纷组织农民武装以自保。开始是村自为战，互相孤立的，随着斗争的发展，附近的几个村子联合起来，一方有事，八方响应。这种松散的武装团体就叫联庄会。各地联庄会、自卫团和民户的枪支“总数不下200万支”。①联庄会基本上是地主武装组织，领导权掌握在当地的大地主手里，但是在防御兵匪侵扰，维护一个村或几个村民众的共同利益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众的意愿。九一八事变后，国破家亡，同样威胁到地主阶级的利益，其中一部分人基于爱国热情和抗击侵略者的需要，就把联庄会改变成抗日义勇军，使之成为热辽义勇军的基本力量。

热辽地区义勇军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九一八事变到1931年末，这是热辽义勇军兴起时期，在热东出现了7支义勇军队伍，②热北出现3个梯队，③辽西出现7支义

①《申报月刊》，第一卷第5号第134页。

②热东的7支义勇军是：1、东北抗日义勇军第十路军，1931年10月成立，司令吴朝纲，1932年6月被撤职，由陈星三接任，约2000人，活动在热东一带。2、东北抗日义勇军第十三路军，1931年末成立，石盘为司令、后张镇，2000人左右，活动在建昌、绥中一带。3、第十七路军，1931年末成立，司令原为李芳亭，李投降日伪，由李昆山任司令，2000人左右，活动在朝阳、建昌一带。4、第二十路军，1931年末成立，司令为金子明，约1.2万人，活动在阜新、通辽一带。5、第一军团第一支队，1931年10月成立，司令李海峰，约2000人。6、东北抗日拥张铁血军，1931年10月成立，司令为兰天林，1600多人，活动在北票、朝阳、北镇等地。7、第四十八路军，1931年12月成立，司令郑桂林，1.4万人，活动在建昌、绥中一带。

③热北义勇军3个梯队：第一梯队，成立于1931年末，司令李海山，约4000人，主要活动在开鲁、通辽地区。第二梯队，成立于1931年末，司令刘振玉，约4000人，主要活动在开鲁地区。第五梯队，成立于1931年末，司令谢国忱，约3000人，活动于热东一带。

勇军队伍。①第二阶段，从1932年1月至1933年2月，这是热辽义勇军蓬勃发展时期，本年1月锦州失陷，日军企图西侵热河，朝阳、北票等地已处于与日军短兵相接的第一线，热河形势异常紧张，抗日烽火燃遍了热东、辽西大地。这一年在热辽地区，又组建了19支义勇军，②使义勇军的抗日斗争达到了高潮。第三阶

①辽西的7路义勇军是：1、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一路军，1931年10月初建立，司令王显廷，约6000人，活动在黑山北部，后转入锦西。2、第四路军，1931年9月末成立，司令耿继周，约1万人，主要活动于新民、锦西、朝阳一带。3、第十二路军，1931年11月成立，司令于会川，约4000人，活动在北镇、黑山一带。4、第十八路军，1931年末成立，司令段景奎，约1000人，活动在黑山、北镇。5、第二十二路军，1931年末成立，司令齐献廷，约1500人，活动在锦西北部。6、东北国民救国军，1931年10月成立，司令高振鹏（老梯子），约4000多人，活动在辽西阎山一带。7、马子丹抗日义勇军，1931年10月建立，司令马子丹，约千余人，活动在义县热辽边地区。

②热河11支：1、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二十六路军，1932年初成立，司令张同武，约2000人，活动在朝阳、义县一带。2、第二十七路军，1932年初成立，司令李宝连，约3000人，活动于热东一带。3、第四十二路军，司令张宝全，主要在凌源县，任命后未活动。4、第一军第十二支队，1932年5月成立，约2000人，活动于建平、朝阳一带，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一支义勇军。5、第十三支队，1932年3月成立，司令刘振东，约1500人，活动于羊山一带。6、第十四支队，1932年初成立，司令孟昭炎，约千余人，活动在北票一带。7、东北抗日救国军总监部，1932年春成立，总监朱霁青，约万余人，活动在朝阳热辽边一带。8、蒙汉抗日同盟军，1933年2月22日成立，共编5路军，由中共内蒙特委领导。9、中华民众抗日救国军，1932年11月20日成立，总司令李玉麟，第一军司令黄守中，活动于热西地区。10、围场抗日义勇军，活动情况不详。11、丰宁抗日义勇军，活动情况不详。

辽西8支：1、第二十五路军，1932年初建立，司令赵大中，约3000人，活动在北镇一带。2、第二十九路军，1932年2月建立，司令肖汉臣，约3000人，活动在锦西西部。3、第三十路军，1932年2月建立，司令穆德山，活动在绥中一带。4、第三十三路军，1932年3月建立，司令孙洗臣，约3000人，活动在锦西。5、第三十四路军，1932年初建立，司令刘纯启，约3000人，活动在锦西、建昌。6、第三十七路军，1932年2月建立，司令杜成栋，约千余人，活动在北镇。7、第四十九路军，1932年春建立，建军后未见活动。8、第一路军浑九沟支队，1932年4月建立，司令何占林。

段，是从1933年3月到1943年底，义勇军抗日斗争进入了艰苦的敌后抗战时期，原来的义勇军有4支继续坚持斗争，^①又新成立了5支义勇军，^②给日伪军以有力打击。同时，也作出了重大牺牲，直至流尽最后一点血。

热辽抗日义勇军的领导关系和各路军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派系较多，大致可分为东北军系统、救国会系统和后援会系统，有归共产党领导的，也有归国民党领导的。大多数名义上归东北抗日救国会及后援会等抗日群众组织领导，这些组织也对热辽义勇军给予了经济上的接济，但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没能起到切实的领导作用，加上热辽义勇军的领导成份也比较复杂，有的是从旧军队、旧政权中分化出来的，有的是当地的大地主，也有的是从“胡匪”中转化而来的，还有退役军人和封建迷信组织红枪会、大刀会等，内部思想动机、政治主张不一，实际上大多数情况下是各自为战的，这就给义勇军的发展和抗日斗争带来了不利影响。

有一定战斗力的热辽义勇军的领导人物中，有不少是东北军军官。他们对不战而丧失东北感到耻辱，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感到极大义愤，或是受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派遣，或者私自潜回家乡，同当地的抗日民众组织相结合，拉起抗日武装，进行抗日斗争。其中较著名的有耿继周、郑桂林、宋九龄，其他的如孟昭炎、李昆山、赵大中、于会川等也有一定影响。

耿继周，新民县八里铺村人。九一八事变时任热河炮兵总监兼炮兵独立营长。他目睹家乡沦亡，东北军奉命不抵抗，悲愤交加，毅然潜回家乡，联络爱国志士，建立抗日武装。不久，即组织起一支约万余人的抗日队伍，士气盛旺，多次打击日军的进

①②热河事变后，仍在热河坚持斗争的有高体乾部、兰天林部、孟昭炎部、刘振东部，新成立的义勇军有孙永勤抗日救国军、李天德、李凤春抗日救国义勇军、邓文山抗日军、郭文联反满抗日仁义军、王文福石明信沟抗日武装。

犯。

郑桂林，字香庭，报号“郑天狗”，取天狗吃日（本）之意。祖籍热河建昌县郑家沟屯，九一八事变前任东北军十三旅中尉副官。事变发生后，他拍案而起，毅然离开驻防地保定，乔装回到东北，联络同学故友，在热东建立起一支抗日武装，高峰期达到1.4万余人，曾多次攻打兴城、绥中等地，是热辽义勇军的主力。

宋九龄，东北军中将参议，由张学良派遣回热河地区组织抗日武装。他同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朱霁青一起，在朝阳组建东北抗日救国军总监部，联合热东地区的联庄会武装，高峰期达到万余人，在西起建昌、东到锦州的地域，频繁地打击日本侵略军。

联庄会中也产生了一批著名的领导人物，如金子明、马子丹、李海峰等。

金子明，热河阜新索公营子人。九一八事变时在沈阳行医，“目睹日军残杀暴行，义愤勃然，已动杀敌御侮之念”，^①毅然回归家乡，秘密组织抗日武装，后来发展到1.2万多人，活动在阜新、朝阳一带，曾攻占彰武县城，也是热辽义勇军的主力军。

马子丹，辽宁义县人，1931年10月，将刘龙台附近的联庄会组织起来，成立一支30余人的抗日武装。后在双山口一带截击退往关内的东北军，十九旅宋子泉营自动缴械，就地参加马子丹军，又与热河北票人李海峰的义勇军联合，组成东北抗日义勇军西路军，多次截击日伪军，给敌以打击。

绿林英雄人物在热辽抗日义勇军中起着重要作用，他们不仅数量多，活动范围广，而且坚持的时间长，是一支战斗力相当强的队伍。热辽地区首先起来抗日的是高老梯子队伍，其他如兰天林、刘纯启、刘振东、李天德、郭文连、邓文凤、邓文山等也相

^①印维廉等：《东北血痕》，第5章第16页。

继而起，参加抗日斗争。

高老梯子，原名高振鹏，是辽西一带绿林的盟主。九一八事变的当夜，他从沈阳返回，于10月10日在新民沙岭岗子召开绿林首领会议，宣布举旗抗日，成立东北国民救国军，高振鹏被公举为司令，向进犯辽西的日军进行了英勇的抗击，后来转战热东地区，1935年11月，在一次战斗中牺牲。^①

同时，由于义勇军渊源和发展存有自发性和广泛性这两个特点，所以，在义勇军队伍中，特别是上层领导人物中，难免存在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现象。特别是日伪对义勇军施行武力进攻和拉拢引诱的反革命两手，致使热河地区的原有地方武装很快发生政治分化，使一部分成为汉奸武装，在义勇军内部也出现了一些叛徒、特务，迫使义勇军不得不进行两面作战。如邓文凤歼灭汉奸武装陈老升部之战，第十七路军与原司令、投敌分子李芳亭的斗争，第二十二路军与原司令、投敌分子齐献廷的斗争，以及兰天林义勇军清除“天和”匪徒的斗争等等。这些斗争虽然都取得了胜利，但也从内部给义勇军带来了消极影响。

热辽两省义勇军(包括辽东、辽南、辽北)的高峰时期约计30余万人。^②1932年5月，为便于领导，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和辽吉黑民众后援会合作，将热辽两省抗日义勇军划分为五个军区。热河、辽西地区为第一军区，总指挥部设在热河省青龙县干沟镇，总指挥彭晓秋(彭振国)，管辖辽西、热东十余县的14路军和5个支队，^③总兵力约7万人。第二军区主要是辽东地区，总指挥王化一，副总指挥李纯华，共辖17路军和6个独立支队。第三军区设在通化，总指挥为唐聚五，共辖37路军和9个独立支队。第

①《盛京时报》，1935年11月22日。

②潘喜廷等著：《东北抗日义勇军史》第67页。

③即第1、4、12、13、17、20、25、26、29、30、33、34、37、48路军和第1、12、13、14支队和兰天林“农民抗日军”。

四军区在辽北，总指挥熊飞(没到任)，所辖6个路军，骑兵2个军和5个县的抗日救国军，只能单独活动。第五军区在辽北和蒙边，总指挥高文彬，共辖9个梯队、10个支队和几个独立团，其中包括热河3个梯队。

热辽义勇军是在异族入侵，国破家亡，而国民党政府又抱定“不抵抗主义”政策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发展起来的，是自发的、群众性的抗日武装。热辽义勇军的发展壮大，是中国人民日益高涨的抗日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他们克服种种困难，冲破重重阻力，以血肉之躯与武器精良的日本侵略军进行了艰苦卓绝、英勇悲壮地武装斗争，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取得了多次重大胜利。

二、义勇军的抗日斗争

活跃在热辽地区的抗日义勇军，自1931年9月末以来，到1933年3月热战开始前的一年多的时间里，“与日伪作战历数百次之多”。^①其中较著名的、规模较大的战役有：

开鲁阻击战。开鲁位于热河的北部边界，是个战略要地，也是民族关系较为复杂的地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急于向辽西、热河扩张，企图占领蒙边地区，打开通往内蒙腹地的道路。1931年底，关东军在通辽设置特务机关，专门作进攻蒙边的准备。他们一方面散布“蒙族久受汉人压迫，应乘机起而复仇”^②等谬论，挑拨蒙汉族关系；一边收编蒙古王公贵族武装，组织了所谓的“内蒙自治军”，^③由关东军发给3000支步枪和6

①潘喜廷等著《东北抗日义勇军史》第205页。

②辽宁省政协《文史资料选编》第2辑第97页。

③“内蒙自治军”共辖四军，由博王旗统领包善一（额尔敦毕力格）任第一军军长，达尔罕王旗韩色旺任第二军军长，热河土默特左旗甘珠尔扎布（著名日本特务川岛芳子（金壁辉）的丈夫）任第三军军长，莫力庙小佛爷阿旺图丹巴任第四军军长，热河库伦旗的鲍殿卿（那钦双和尔）为联队长，实际不足4000人。

万发子弹，派松井清助等为顾问，积极准备进犯热河。

1931年11月中旬，张学良委派的辽北蒙边宣抚专员高文彬，带领20多人来到通辽，成立宣抚公署办公处，着手做蒙族上层人物的工作。先联络了哲里木盟的李海山、刘振玉两统领，任命为骑兵第一、二路军司令，归宣抚专员管辖。接着，又做“蒙古自治军”包善一、韩色旺等人的工作，申明大义，晓以利害，他们表示愿意参加抗日，遂接受改编。热河民团司令谢国忱，眼见各地民团纷起抗日，汤玉麟有意逃跑，也毅然参加到抗日行列中来。李海山等分别被编为第一、二、三、四、五梯队。至此，除甘珠尔扎布死心塌地附逆外，蒙边20余县全部卷入抗日洪流之中。1931年末，高文彬将宣抚公署和主力部队移住开鲁。

日本侵略者收编蒙匪和挑拨蒙汉关系的阴谋破产后，松井又亲自到开鲁拉拢引诱热河守军崔兴武骑兵旅降日，^①崔兴武欲降日，但又惧怕民众反对，就把责任往汤玉麟身上推。松井派仓林到承德与汤玉麟谈判，也没谈出结果，便匆匆返回通辽。这些阴谋都失败后，日军决定武装进攻开鲁。

1932年1月初，以甘珠尔扎布的500余伪军为前驱，松井大佐带日军四五十人，欲由舍伯吐绕道曹家营子迂回占领开鲁。义勇军第二梯队司令刘振玉侦悉这一情报后，遂联合李芳亭部、^②蒋连瑞部^③义勇军，在曹家营子设伏，并派骑兵相接应，配合热军，阻击敌人。当日伪军进入伏击圈后，突然伏兵四起，喊声震

①《内蒙古文史资料》第20辑《李守信自述》第104页。

②李芳亭，热河朝阳县人，原为汤玉麟部副官处副处长，后参加义勇军，被任命为第十七路军司令。1932年6月被崔兴武旅收编，后随李守信降日。

③蒋连瑞，辽宁海城人，原任通辽公安局长，1931年11月组织义勇军，被任命为第八路军司令。1932年1月在曹家营子击毙松井大佐。同年秋，在开鲁北部的哈拉毛都，被投降派崔兴武派队缴械，蒋亦遭杀害。

天，将日伪军包围起来。伪军乱作一团，不战而溃，松井大佐等日军负隅顽抗，当场被蒋连瑞击毙，取得了首战胜利。

日军惨遭失败，恼羞成怒，立即纠集驻通辽的羽山部队和伪军六七百人，再次进犯开鲁。义勇军在王家油坊一带再次阻击敌人，由拂晓激战到深夜，重创敌军，使其不能前进。后因弹药不足，遂留一连人阻击，其余转移阵地。留下的一连义勇军未能退出，与冲进村的80多名日军展开血战，杀到第二天夜间，日军仅逃出6人，其余全部被歼；义勇军也仅剩5人，余皆壮烈牺牲。两次开鲁阻击战，使日伪军不得不退回通辽，好几个月不敢前来袭扰。

锦西争夺战。锦西县城——江屯，位于热辽边界的虹螺山下，是西进热河的一个桥头堡，是敌我双方争夺的焦点，展开过多次的争夺战。

日军占领锦州后，即派出古贺传太郎中佐的第二十七联队200余名日军，向锦西进犯。1932年1月6日，在国民党锦西县长张国栋等的欢迎下，开进锦西县城。7日晚，日军松尾少尉率运输队和由石野中尉率领的步兵小队，也到达锦西县城。张国栋引狼入室的汉奸行为，激起热辽边界人民的愤怒和反对，纷纷串联，集结武装，准备迎战日军。

锦（西）朝（阳）边界的抗日武装，主要有两部份。一是绿林抗日武装亮三部（刘纯启）、德全部（刘春山）和震东洋部（张恩远）等，约2000余人。二是由黄显声组织起来的“西五会”抗日民团，约有三四千人。

古贺联队进占锦西的第二天夜里，刘纯启率数百名抗日武装，在县公安局长苑凤台的配合下，潜入县城，打开监狱，释放被关押人员，然后安全撤离。8日，抗日武装侦悉古贺即将出城扫荡的消息，连夜聚会，商讨对策，决定采取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战术，在上坡子、龙王庙等地伏击敌人。并公推刘纯启为总首领，负责全面指挥。

9日上午，古贺命令松尾少尉率运输队回锦州取弹药给养，留下骑兵小队守城，亲自率领百余步兵骑兵出城西，分两路对抗日民众武装进行扫荡。当古贺率领的一股日军进至上坡子屯时，突遭“西五会”民团猛烈袭击，古贺抵挡不住，率队夺路后撤。由石野率领的另一股日军，进至龙王庙西山时，也遭到刘春山等部的袭击，石野被击毙，余敌且战且退。这两股日军会合后，仓惶回窜，逃到县城附近的西园子，又突遭刘纯启部的截击。义勇军战士占据了村北土坎子上的一座旧炮楼，居高临下，以猛烈火力封锁了古贺的退路，古贺中佐、星野大尉等当即被击毙。这时，城内敌军赶来增援，用炮火攻击炮楼，引起火药爆炸，12名义勇军战士除3人幸免外，其余全部壮烈牺牲。这次战斗，击毙日军军官4名，士兵40余名，重伤20余名，缴获古贺指挥刀一把，长短枪数十支，打死和缴获战马三四十匹。

在古贺联队被歼的同时，松尾运输队30余人也遭到同样的下场。9日晨，当松尾运输队行至城东30里的钱塔屯时，遭到民团首领高福瑞的伏击。枪响后，附近的民团赶来增援，约有千余人，将敌重重包围，激战4小时，松尾运输队全部被歼，计缴获机枪1挺、大枪27支、大车5辆，打死战马19匹。民团武装牺牲9人，负伤4人。^①

义勇军聚歼古贺、松尾两战后，残敌丧胆。1月10日，日军挟带汉奸县长张国栋，把伪县政府机关由江屯迁至连山（今锦西县城）。刘纯启立即率抗日武装进城，布告安民，维护治安，并受民众推举，代理锦西县县长40多天。

古贺联队被歼后，关东军和日本政府感到非常震惊，他们哀叹：“锦西冬季之风暴闻之皆血泪也”，^②不得不承认古贺联队被歼“实在是满洲事变以来最大的悲惨事件”。^③此后，日军对锦

①辽宁省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106页。

②③关东军参谋部：《满洲事变实志》，日文版，第99页。

西进行了重兵“讨伐”，于2月中旬再次侵占江屯城，刘纯启部主动撤出城外，相机打击外出扫荡的日伪军。

1932年9月27日，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一军团总指挥彭振国，以朝阳六家子为基地，集中刘纯启、高体乾等部义勇军4000多人，再次攻打江屯城。拂晓开始攻击，一举攻入城内，消灭了守城的日伪军大部，少数日伪军退到大院内顽抗。这时，日军从锦州增援，另有飞机助战，傍晚时，义勇军主动撤出战斗。

绥中攻坚战。绥中是北宁路上的一个重要站点，又是通往热河的要道，是热辽边地区敌我争夺的又一个焦点。1932年初，绥中失陷后，活动在这一带的李昆山第十七路和郑桂林第四十八路义勇军4次主动攻打绥中，给敌伪以重大打击。

第一次在1932年3月4日。已经辞职还乡的汤玉麟副官李昆山，在建昌大屯乡拉起1500多人的抗日队伍，被编为第十七路军。不久，第十三路军在绥中北部被日军围困，李昆山率队赴绥中，解十三路军之围。随后，李昆山乘胜追击，于3月4日袭击绥中县城，日军龟缩城中顽抗，李昆山毙敌一部后，主动撤出战斗。

第二次在1932年3月18~21日。义勇军集中第十三、十七、三十二路军和几小股抗日武装，共5500多人，共商攻打绥中计划，公推十三路军司令石盘为总指挥，于18日开始攻击，将绥中城四面围困，奋力攻坚。21日夜终于攻入城内，打死打伤日伪军90多人，在激战中，石盘不幸负重伤，李昆山中弹牺牲，军中无主，遂撤出战斗。

第三次在1932年4~5月间。第四十八路军司令郑桂林，探知绥中城内只有百余名日军，即拟定了清明节攻打绥中城的方案。^①当日夜发起总攻，首先击毙了瞭望台上的日军哨兵，然后攻入城内，日军乘两辆装甲车冲出营门，行至车站附近时，义勇

^①《辽宁文史资料》，第6辑，第105页。

军督战队长管长春飞身跳上车，用手榴弹炸毁前面一辆，后边一辆与前辆相撞，滚到沟里。这次战斗约3小时，俘虏17人，缴枪20余支，义勇军也有伤亡。天亮前，郑桂林率部撤向城西。

第四次在1932年9月，接任石盘为十三路军司令的张镇，侦知绥中日军不多，遂率150余骑兵，从朝阳六家子出发，星夜飞奔绥中，晚10点开始发动攻击，攻入城内，重创敌军。日军出动了6架飞机，4辆坦克援救被围困的日伪军。张镇遂撤出战斗，转移山区。

另外，在1932年6月中旬，郑桂林、邓文凤部义勇军曾攻克绥中之四方台，激战5小时，打死日军200多人，^①抗日军狄占魁团40余人在战斗中大部牺牲。1933年1月间，郑桂林又在红庙子设伏，歼敌百余人。^②当地曾流传着：“天狗咬，蜂子蜇，座山旅打的恶，杨麻子不用说”^③的民谣，真实地反映了义勇军的顽强战斗精神和民众对义勇军的敬佩心情。

石本事件与南岭保卫战。南岭位于热辽边界，当时热河唯一的一条铁路——锦朝路（仅通到北票）就通过这里。这条铁路连接热河煤城北票，是日本人早就想攫取的地方。早在1932年3月21日，日军派出满载武装士兵的第三装甲列车，从锦县出发，强行开向热河一边的南岭车站，做试探性、挑衅性运行。沿途受到义勇军阻击，在南岭又与热军开火，被迫退回义县。事后，日军把“第三装甲列车最先开入热河省”的侵略行为，吹嘘为“英雄列车”。其后日军又多次进行武装挑衅，均被击退。1932年7月17日，东北义勇军第一军团第一支队司令李海峰，带领50多名义勇军战士，在朝阳寺附近的列车上，用计捕获了日本特务头子石本权四郎，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石本事件”。

①②潘喜廷等著：《东北抗日义勇军史》第225页。

③“天狗”指郑桂林，自号郑天狗，取“天狗吃日”之意。“蜂子”指邓文凤，“座山”指刘明和，“杨麻子”指杨尽忠，均为第四十八路军首领。

当时，正是关东军对热河的“外交手段”没能明显奏效，而欲发动武装进攻的时候。于是，关东军抓住石本事件大作文章，妄图武力占领热河。7月18日，一方面派5架战斗机，对朝阳城进行狂轰滥炸；一方面派出中村大佐指挥的第三十一联队，以装甲车为先导，向热河进犯，在朝阳寺遭热军和义勇军的阻击。19日，日军派高桥支队增援朝阳寺，热军和义勇军退守南岭。日军再犯南岭时，遭猛烈阻击，伤亡十数人，两辆装甲列车被炮火击中脱轨，不得不退回朝阳寺。正在关东军欲再次向热河发动大规模进攻时，日本政府为应付国联调查，改变它在国际上的孤立处境，遂命令关东军暂时停止进攻热河，这件事才渐趋平息。

日军为了救回石本，曾派朝阳寺主持喇嘛马洪志到李海峰处说情，并许以重金，遭李海峰严词拒绝。又派李海峰的结拜兄弟，原朝阳抗捐领袖毕占一说情，李海峰毅然将毕占一交热军处死。后来，又曾采取“换俘”的花招，也破产了。日军更加恼羞成怒，于8月18日派遣装甲列车多列，满载士兵，开到南岭。19日激战一夜，20日南岭失守，再战口北营子，进犯日军终被击退。9月9日，日军从义县出发，分三路向李海峰部驻地猛烈进攻，并派飞机助战，激战后李海峰部转移。1932年末，李海峰于朝阳城北十家子河套将石本处决，除了一大害。

这次南岭保卫战，是以国民党军队为主，由义勇军配合进行的。“一战于朝阳寺，再战于南岭，三战于口北营子，均以兵力单薄，后援不继，热边天险，与人共有”，^①但终于击退敌人进攻。这是热河国民党军队打响的抗日第一枪。

活动在热辽地区的抗日义勇军进行的其他较大规模的战役、战斗还有：1932年5月至10月间，朱霁青调集各路义勇军会攻义县之役；1932年11月22日进行的各路义勇军会攻锦州之役，以及

①张其昀：《热河形势论》，原载1932年《国风》半月刊。

在广宁山、虹螺山多次进行的反扫荡战等等，都给日伪军以重创。其他各路义勇军和各种抗日武装力量，在各地袭击日伪军，破坏交通电讯等的斗争，也打击了敌人，壮大了人民的力量。另外，各路义勇军歼灭汉奸的武装斗争，清除内部叛徒的斗争，也是义勇军抗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个时期，是热辽义勇军活动的高峰时期，抗日斗争的烈火燃遍热河、辽西大地。这些斗争，不仅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反动气焰，而且牵制了日军很大一部份兵力，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日军西侵热河，控制华北和欲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进程。同时，东北义勇军打响了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第一枪，振奋了民族精神，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这些历史功绩都是应该永远载入史册的。

三、中共热河特支的建立和党在义勇军中的活动

1932年6月，中共河北省委在北平建立了热河特别支部，赵玉祺任支部书记，王本初和周复苏为支部委员。当时河北省委指示热河特支，以高体乾^①发动的抗日民众为基础，组建红军，开辟苏区，建立根据地。6月20日，热河特支的3名负责人与去北平的高体乾一起来建平，在朱碌科一带开展抗日活动。

^①高体乾，原名高赞兴，热河省建平县白音代沟人。九一八事变时，他正在沈阳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目睹国破家亡的现状，毅然弃学，于1931年10月来到北平，1932年初参加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举办的军政训练班。1932年6月受党组织派遣，到热河组织起2000多人的抗日武装，被任命为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一军团第十二支队司令。1933年热河失陷后，撤退到独石口，后与党失掉联系，被国民党军队收编。1934年7月，高体乾再次回到家乡，建立起一支50多人的抗日武装，坚持了2年多，1936年初，队伍被打散，回到北平，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平西游击根据地的开辟工作。抗战胜利后，率领太岳支队赴东北，后任第七纵队参谋长。1948年随军南下，转战江西、广西、广东，解放后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等职，已离休。

他们到建平后，由高体乾出面组织和联络人员，特支的领导人负责接待参加义勇军的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经过一段工作，很快组织起一支约百来人的抗日队伍。特支准备以这支武装为基础，进一步扩大队伍，攻打建平县城。由于走漏消息，热河军阀汤玉麟下令逮捕高体乾和热河特支的领导人，他们被迫于7月返回北平。8月，东北抗日救国会派军事部副部长彭振国到热辽边界指挥抗日义勇军活动。经党组织同意，高体乾随彭振国回到建平县。到11月，在建平、朝阳、敖汉等地发展到2000余人，组建了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一军团第十二支队，多次参加对日伪军作战。中共热河特支的建立和活动时间虽短，但扩大了党的影响，进一步激发了热东民众的抗日救国热情，使高体乾那样的爱国志士走上党所指引的革命道路。

中共内蒙特委也在抗日义勇军中做了不少工作。

1932年9月，原内蒙党组织在与党中央失掉联系的情况下，与中共河北省党组“见面办妥联系”，^①重建中共内蒙特委，临时书记兼组织委员李铁然（即陈镜湖）、委员还有刘刚、张一川（张揖山）、郭品端（郭聘三）、刘汉民（王汉民）、肖生嘎等，并成立了军委，由李铁然任军委书记，委员有陈修元（陈修武）、宫恕孔（宫希孔）、王仲华等。特委地点暂设热河省滦平县金沟屯。在重建内蒙特委时，还拟定了最近工作计划，主要是整顿各地组织，发展建平游击战争，加入义勇军起领导作用，成立蒙汉民众抗日联合会等11项；^②在九一八事变一周年时，又发

①《内蒙特委关于整顿党的组织等致中央信》，1932年11月9日。

②《内蒙特委的组织及工作计划》。原文只注明9月16日，没有年号，中央档案馆归入1930年卷。经我们研究，认为成文时间应为1932年9月16日。这是因为该文中所列11项工作计划都是1932年左右的事，与1930年情况不符。如“加入义勇军起领导作用”一项，义勇军这个名字最早出现在1931年10月，真正发展时期是在1932年。再加“成立蒙汉民众抗日联合会”一项，提出“抗日”只能在1931年9月18日以后，1930年不可能提出成立抗日组织问题。

表示了反对帝国主义进攻热河，告蒙汉劳苦民众书；11月，内蒙特委就整顿党的组织情况向党中央作了报告，这些都使内蒙党的工作彻底摆脱了分散、瘫痪状态，走上了正常发展的轨道。

1932年底，李铁然亲自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了内蒙党的工作，党中央批准内蒙特委正式重建，又吸收了热河的年轻共产党员王逸伦、①惠世如②等参加内蒙特委工作，使热、察、绥三省党的工作有了新的生机。

这期间，内蒙特委虽然还没有完全摆脱“左”倾错误路线的羁勒，但已开始注意到抗日义勇军的斗争问题。“最近反日民气激昂，各旗各县成立了义勇军，特委会用全力看重了以上这些事实，积极的运用办法，从事领导，使各项斗争走向我党的策略方面来”，③并着手做组织义勇军的工作，特别李铁然由党中央接受指示回来后，分别在北平、围场召开的两次特委紧急会议，已把工作中心转移到义勇军的抗日斗争方面来，工作有很大进展。主要有以下几点：

（1）特委将工作中心转移到建（平）朝（阳）赤（峰）开（鲁）抗日前线地区，并派刘刚、王逸伦到上述地区做组织义勇军工作。

①王逸伦，1904年生于热河省赤峰县一个农民家庭里，1923年在赤峰中学读书，后在赤峰任教，1932年在北平经李铁然等介绍入党，年末参加中共内蒙特委为委员，1933年初，回到赤峰组织武装抗击日军侵占热河。1935年秋去苏联，在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研究院学习，1938年秋回国到延安。1942年受“东工委”派遣，回到赤峰做地下工作，1945年苏军进攻赤峰后，被任命为热北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1947年5月，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成立，先后任财委主任、自治区委书记、副主席、人大副主任等职，1980年退休，1986年去世。

②惠世如，热河围场县人，1928年毕业于热河师范学校，后回县任教师，在党组织指导下，曾发动“五青年控皮案”，赶走学阀皮献廷、张树如，1932年入党。现任贵州省委统战部长，省政协党组书记、副主席。

③《内蒙特委书记李铁然报告书》，1932年12月16日。

(2) 已建立起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义勇军组织，建朝方面的十五混成团，有士兵支部和训练班；朝阳老虎山的宫希孔(党员、特委委员)已组织起一支400多人的义勇军队伍，公开扯起抗日大旗；赤峰方面田子芳义勇军受党的影响，派人到退入热境的冯占海义勇军中进行活动。

(3) 在日军进攻热河在即的严重关头，内蒙特委组织了蒙汉抗日同盟军军事委员会，并通电全国：“分别成立5路，各路人员均已出发”，^①还给热河朝(阳)建(平)区义勇军支部发了指示信。

内蒙特委的这些工作和斗争，无疑地扩大了党在义勇军中的影响，促进了义勇军运动的发展。但是，就是在这些活动中，仍然深深地打着“左”倾路线的印记，突出地表现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

1933年初，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鉴于异族入侵，民族矛盾已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情况，于1月17日和26日分别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中共中央名义发出了《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前者提出了建立武装反日统一战线问题，后者则提出了在日本侵占的特定区域内造成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问题，并放弃了土地革命和建立红军与苏维埃的口号。无疑这是一个正确的反日统一战线的方针，但这时期的内蒙特委仍然抱着实行土地革命、创造蒙古苏维埃政权和红军，“武装保卫苏联及外蒙”等脱离实际的“左”的口号，并且硬要把义勇军的抗日活动与实行土地革命联系起来。“义勇军必须在一切可能内实行土地革命，每到一地没收豪绅地主的财产、土地，分配给贫农、雇农、中农，宣布取消苛捐杂税，焚毁

^①《内蒙古特委三个月(自廿二年二月十日)工作计划草案》，1933年2月22日。

一切债务田地文契”，还认为“如此做去，必得大多数劳苦群众的拥护。”^①这些脱离实际的口号和行动，招致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在那样汹涌澎湃的义勇军抗日斗争中，内蒙特委的建树甚少，已建立起的5路军，在日军的进攻下，很快溃散了，这是热河革命史上的一个严重教训。

第三节 热河事变和长城抗战

一、日伪军大举进攻热河，承德失陷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热河前，策划了山海关事件。当时山海关的中国守军是东北军第九旅，旅长兼临永警备司令为何柱国。该部官兵饱尝国民党不抵抗政策之苦，希望打回东北，收复国土。日本侵略者从1932年下半年起，通过其驻山海关守备队长落合正次郎多次对何柱国进行威胁利诱，妄图使其“独立自治”，并提出创立包括冀东、热河在内的缓冲区的要求，均遭何柱国的拒绝。

1933年元旦之夜，山海关的日军守备队向南关外中国守军步哨射击，投掷手榴弹。何部向日军责问，反被诬为挑衅。随后，日军无理要求撤退南关和城上中国驻军，否则以武力夺取。何柱国为避免事态扩大，答应南关暂由日军警戒。但日军得寸进尺，提出开放南门等无理要求，遭到拒绝。1月2日，日军炮击临榆县城，随之步兵发起进攻。中国守军步兵第九旅六二六团官兵忍无可忍，不顾当局的不准还击命令，奋起自卫，击毙儿玉中尉等日军官兵多人。这时，日军从绥中增调了3000余人，向石河铁桥、南关、二里店、五眼岭和吴家岭一线进攻。何柱国遂下令还

^①《内蒙特委给热河省朝建区义勇军支部的指示信》，原件无日期，内蒙特委三个月工作计划草案稿中有“内蒙党对于义勇军的支部有特别的指示信（见另信）兹不赘”的记载，所以应认定为1933年2月22日。

击，揭开了长城抗战的序幕。1月3日，日军第八师团、铃木第四旅团在飞机和坦克的配合下，猛攻临榆县城，中国守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终因寡不敌众，临榆失陷。1月12日，日军又侵占了长城要隘九门口。

山海关事件，是日军侵占热河的前奏。东北军何柱国部抗击日军的侵略，是对蒋介石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奉行的不抵抗政策的否定。何部官兵的爱国行动，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声援。

山海关失守，热河形势更加危机，日军侵热之战迫在眉睫。对此，国内的有识之士，都对热河的前途担忧。全国各地民众也极为愤慨，纷纷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宣言，提出在停止进攻苏区、保证民众民主权力和武装民众的三个条件下，和国内任何军队订立抗日作战协定。但是国民党当局置这些正义主张于不顾，仍继续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对日军新的侵略则采取“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方针。

为商定热河大策，1月下旬，张学良亲赴南京秘密拜会蒋介石。蒋介石为了应付全国舆论，答应派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北上解决热河问题。11日，宋子文飞抵北平，同张学良商定了热河防守计划。并匆匆赴热河视察，借以敷衍舆论，捞取个人的政治资本。

热河战事开始之前，在热河境内，中国守军有10余万人，成立两个集团军。第一集团军由张学良自兼总司令，以张作相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任命万福麟为第四军团长，率5个旅在凌源、平泉一带布防，归张学良节制。任命汤玉麟为第五军团长，率6个旅在热辽边境迎击进犯之敌；义勇军冯占海（被编为六十三军）、邓文等部则配合汤部在热东、热北狙击日军；令孙殿英率所部第四十一军由山西驰援热河，进抵围场、赤峰一带布防，归张作相节制。在实际上，这些部署全是“马后炮”。部署未定，日军发动的侵热战争已经开始。

原来，日军侵占山海关后，一方面竭力制造侵热舆论，诡

称：“热河省为满洲国之一部乃属俨然之事实”，“决定与满洲国军队合作，肃清热河军，确保满洲国之基础”，^①日本的报刊竟颠倒黑白地说，张学良军越过长城，是“侵入热河”，日本军武力进攻热河是“讨伐叛逆”^②等等。另一方面，积极部署侵热军事行动。1月，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在锦州召开攻热军事会议。1月28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密发准备进攻热河的466号作战命令，要求各军做好在2月24日以后开始行动的准备，并要“周密准备，严禁轻率妄动，一旦令下，坚决完成任务。”^③2月10日，武藤召集各军主任参谋会议，具体部署攻热计划：首先以第六师团和张海鹏伪军在热东作战，把中国军队牵制在北方，然后第八师团迅速占领长城沿线，把华北与热河割断。^④17日，各部调动就绪，武藤下达侵热命令，限定23日开始行动。

日军侵犯热河的军事行动，实际上是从1933年2月21日开始的。日伪军10余万人，以锦州为基地分三路向热河进犯。北路由日军第六师团与伪军张海鹏、刘桂堂、程国瑞等部从通辽侵开鲁。中路由日军第八师团从义县犯朝阳。南路由日军混成十四旅团从绥中寇凌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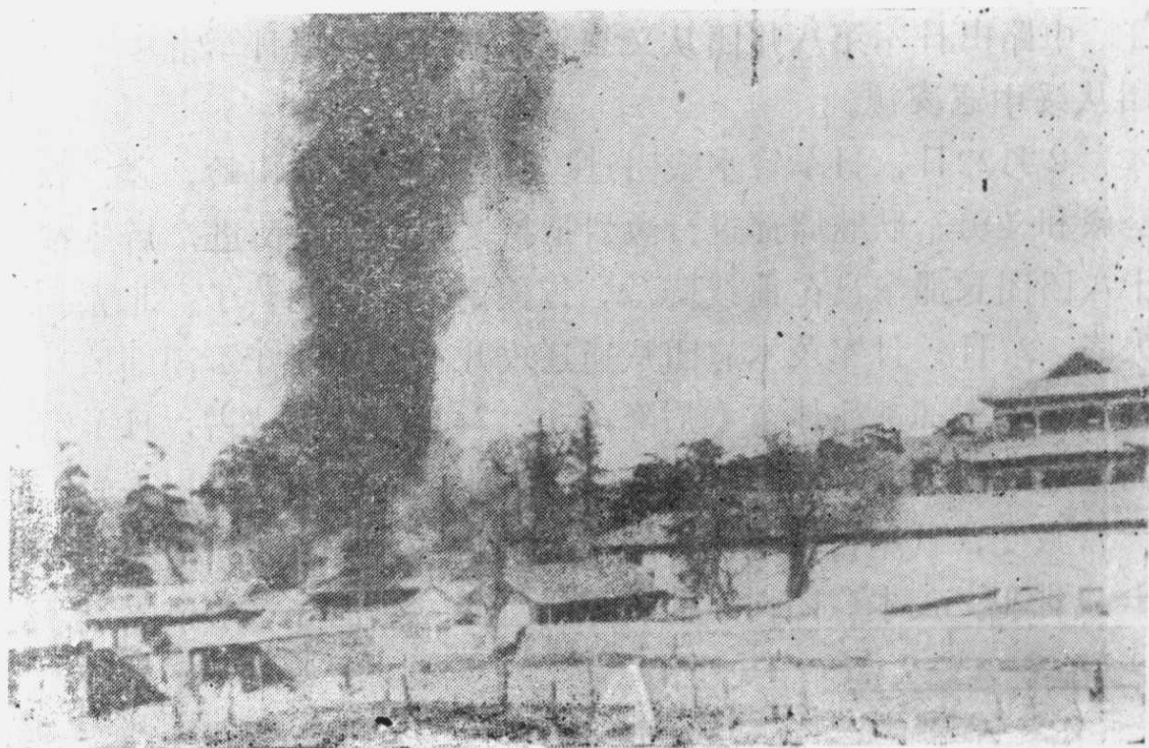
2月22日，日军铃木旅团进攻热辽边境上的南岭，守军董福亭旅和义勇军耿继周部进行激烈抵抗，阻敌不能前进，后热军五十八团团长沙本良在前线降敌，遂使南岭、口北营子、北票相继失陷。23日，日军茂木旅团从通辽攻开鲁，中国守军汤部骑兵旅长崔兴武率部逃往林东（后降敌）。24日，开鲁被占，日军沿辽河直趋下洼。25日，日军第八师团进犯朝阳，守军董福亭旅复有一营叛变，日军占领朝阳。随后，日军第八师团向叶柏寿、凌源一线进犯。茂木旅团向下洼、赤峰进犯。热河守军节节败退，退

①②大阪每日新闻：《为什么讨伐热河》，1933年2月。

③④日本参谋本部：《满洲国作战经过概要》，田琪之译。

入热河的各路抗日义勇军也因指挥不一，各自后撤。28日，日军第十四旅团攻击纱帽山附近阵地，同日占凌南，中国守军进行了一些抵抗，即后撤。3月1日，日军铃木旅团进攻叶柏寿，中国守军于兆麟旅进行顽强抵抗，激战六七小时，六八八团第一连连长以下全部阵亡，但阵地始终在中国军队手中，日军只好绕过叶柏寿直攻凌源。3月2日，凌源失陷。驻平泉的万福麟不战即率队退往喜峰口。于是，从朝阳至承德的大路完全敞开。

这时，从北平抵承德仅数日的张作相见大势已去，率第二集团军司令部人员于3月3日撤往古北口，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更是惊慌失措，早在3月1日，他就急电平津，征集汽车并扣留前线军车共200余辆，装载私产运往天津租界。3月3日，仓皇西逃，后听说平泉尚未失守，又返承德。3月4日晨，他终于弃热河民众于不顾，率千余人逃往丰宁。义勇军李纯华部与承德一部守军，在敌兵压境，主帅出逃的情况下，还在承德县红石砬进行了英勇的阻击，夺取小炮4门和大批弹药，后因寡不敌众而撤退。3月4日，日军川原旅团先头部队仅128骑就占领热河省会承德。



汤玉麟溃逃时放火烧毁了热河都统公署。



侵占承德的日军在避暑山庄内焚木取暖。

当日军第八师团进攻凌源、承德之时，日军茂木旅团于3月1日进犯赤峰，当即遭到由山西援热的四十一军孙殿英所部的阻击。3月2日，日军炮火轰开赤峰东门附近的一段围墙，大批日军涌入街内，孙殿英指挥士兵进行了激烈的抵抗。在日军的强攻下，被迫撤退，当天赤峰失守。3月4日，日军占领林西。热军崔兴武旅所部团长李守信叛变投敌，孙殿英部又在围场的津生泰和广德号阻击日军，因孤立无援，于3月8日撤出围场，向沽源、多伦一带败退。抗日义勇军邓文等部也退入察哈尔境内。3月21日，日军占领兴隆。至此，除热西的丰宁等县外，热河全境沦陷。

热河失陷，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纷纷要求追究责任，矛头所向，直指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本人。这时蒋介石慌忙北上，为了抓个替罪羊，他对张学良说：“现在全国舆论沸腾，攻

击我们两人，我与你同舟共命，若不先下去一人，以息全国愤怒的浪潮，难免共遭灭顶。”^①迫使张学良于3月11日通电下野，汤玉麟被免职通缉。3月12日，国民党政府任命亲日派何应钦为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这样，蒋介石既转嫁了热河失陷的主要责任，又轻而易举地取得了对东北军和华北地区的直接控制权。

但是，这种伎俩是不能欺骗全国舆论的。宋庆龄就曾尖锐地指出：“这种卖国行为谁负责任？是蒋介石政府。为什么？这个政府用它的主要军队打中国人民；它任用叛逆的将领还坚持不肯撤换他们；并且它不肯武装人民，不肯组织义勇军来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斗争。”“蒋介石政府所宣传的对日本的长期抵抗，已经不能再遮掩他们的背叛、怯懦与不抵抗了。”^②宋庆龄正义凛然的讲话，道出了全国人民，特别是热河人民的心声。

承德失陷，国民党军政大员纷纷发表谈话，鼓噪一时，但大多是陈词滥调，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宋子文的两次谈话。第一次是在视察热河时，他信誓旦旦地说：“你们尽管打，子文敢断言中央必为诸君作后盾，诸君打到哪里子文跟到哪里，诸君打到天边，子文跟到天边；诸君打到海里，子文跟到海里。”^③第二次是承德失守后的次日（3月5日），他在上海发表谈话时又说热战结果在预料中，他说：“余自热河归后，各军军事长官询余个人观察热河可守若干时，余答一星期至10日。当时闻余言者，咸笑谓即便日军长驱直入，一无阻御，亦须数星期之步行，方能自热边以达承德。10日之期毋乃滑稽。余答以日方行军不可以步行计程也。”^④两次谈话，对照鲜明，热河失陷，国民党政府实难辞

①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第72页。

②宋庆龄：《为新中国奋斗》第55—59页。

③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第27页。

④《热河弃守》，原载天津《国闻周报》第10卷第10期。

其咎。

二、国民党爱国官兵的长城抗战

日军占领承德后，为进一步对蒋介石施加压力，实现其军事上击破国民党中央军，政治上控制平津的阴谋，继续向长城各口进攻。

当日军向长城各口进犯时，国民党政府一方面企图依靠古老的长城作为唯一的防御工事，阻止日军进入关内；另一方面准备随时与日军交涉，结束战争。国民党的消极防御战略，注定了长城抗战的必败。

在长城抗战中，首先痛击日军的是驻守喜峰口的二十九军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和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1933年3月8日，该两师奉令接喜峰口的防务。9日，从热河溃退至此的万福麟部，在日军服部、铃木旅团的步骑炮兵混合部队的冲击下，迅速败退，日军占领了口上高地，控制了口门。这时，三十七师先头部队特务营和王长海团赶到，立即投入战斗，将高地夺回，稳定了口上的战局。次日，日军向喜峰口守军发起猛攻。二十九军后续部队赶到，与日军展开激战。几处高地敌我数易其手，两军白刃相搏。11日，又激战一天，敌我双方死伤很重。是日夜，赵登禹、佟泽光两旅采取迂回夜袭战术，分别出潘家口和董家口，绕攻敌侧背。夜半，敌正酣睡，两旅发动突然袭击，敌人未及还击，多被大刀队砍杀。夺获的敌炮和坦克，都予以炸毁。此役敌伤亡惨重，取得了长城抗战以来的唯一的一次胜利。捷报传来，全国振奋，二十九路军被誉为“喜峰口英雄”。日军遭此打击，在喜峰口方面未再发动大的进攻，战事重心转移到罗文峪方面。



国民党二十九路军大刀队冲出战壕拼杀。

罗文峪在遵化以北18里，距喜峰口110里，其地适当喜峰口与古北口之间的城凹处，倘被敌占，则喜峰口的左后方受到威胁。因此，二十九军在此驻有刘汝明师防守。3月中旬，日军三十一联队和第八联队协同一部分伪军，由兴隆东北的鹰手营子进犯罗文峪。16日拂晓，日军先头部队沿兴隆半壁山向罗文峪进攻，企图夺取三岔口高地，被守军击退。次日，日军大举向罗文峪、山渣口、沙石峪进攻，中国守军诱敌迫进，肉搏冲杀，敌军被迫退却。18日夜，刘汝明派李金田旅长率兵一团由沙石峪绕攻敌侧背，连越七座山头，摸至敌军机枪阵地，适从左翼绕攻敌后的祁光远团亦到，两部合力攻入敌阵。正面守军也全线出击，前后夹攻，迫敌全线撤退。

古北口方面是日军进攻的重点。3月5日晚，国民党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第一〇七师（师长翁照垣）在古北口外的老虎山、马圈子等地与日军接战，历经四昼夜，后撤至北甸子。10日，日军猛攻第一一二师（师长张廷枢）阵地，同时向驻守古北口

的国民党中央军第十七军第二十五师发起攻击。从3月11日至13日，关麟征率领的第二十五师在古北口与日军第八师团和骑兵第三旅团激战三昼夜，古北口终于失陷，在这次战斗中，二十五师伤亡4000余人，日军伤亡也不下2000人，可见战斗之惨烈。在此役中，二十五师一四五团派出的一个军事哨，因远离主力，未及撤退，仍在顽强抵抗，毙伤日军百余名。后来日军用飞机、大炮袭击，才摧毁该哨。日军曾把该哨的中国士兵尸体埋葬，并题“支那七勇士之墓”。

古北口战役后，十七军第二师接替二十五师，退守南天门一线。南天门左翼有个制高点叫八道楼子，该处有8座碉楼，地势险要，以一连据守。4月20日，8座碉楼全被日军袭占。23日，日军利用八道楼子瞰射之利，向中国守军南天门阵地的中央据点四二一高地猛攻，经5天激战，第二师放弃了南天门阵地，退守新开岭一带继续抵抗。5月11日，接替第二师的八十三师又与敌展开激战，伤亡惨重。5月13日，国民党的十七军全线溃败。

至5月下旬，日军已侵占了秦皇岛、昌黎、唐山、密云等地20多市县，进逼平津，并派飞机到北平上空侦察，欲迫使国民政府缔结城下之盟。

面对这种局面，何应钦惊恐不已，急于向日本求和。经国民党另一亲日派黄郛（国民党政府华北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的奔走，5月31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根据这一协定，国民党政府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占有东三省和热河，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的地区，并将整个华北都置于日军的监视下，为后来日本侵略者策动华北“特殊化”准备了条件。

这个协定的签定，标志着长城抗战的最终失败。但是，国民党军队爱国官兵英勇的长城抗战，却证明了中华民族有能力抵御外侮，激励了中国的民心与士气，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这是长城抗战的历史功绩。

三、热辽义勇军的敌后抗战

热河沦陷后，热辽义勇军队伍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大部撤退入关，小部分留了下来，在敌后继续进行艰苦的抗日斗争。撤退入关内的义勇军，有的被国民党军队收编、遣散，有的参加了冯玉祥领导的抗日同盟军，有的秘密潜回热河地区，再次举起武装抗日的大旗。

挺进敌后的中华民众抗日救国军。1933年4月，正当国民党军队在日军追击下，失地数百里纷纷往察哈尔溃败的时候，中华民众抗日救国军的一支2400余人的骑兵队伍，却由丰宁大滩出发，挥师东进，连克桃山、半截塔、郭家屯等镇，挺进300余里，毙日军26名，俘伪军300余名，缴获枪炮马匹甚多。13日，收复围场县城，毙敌200余名，救国军战士也伤亡百余名。并前出到广义城、庙宫一带阻击增援敌军，激战四昼夜，毁坏敌坦克1辆，收复隆化县之唐三营、少府、蓝旗等地，在唐三营战斗中又击落敌机1架。抗日军“深得民众伙会援助，遍地邀击，阻敌援军，不敢前进。”^①后来，这支队伍终因得不到国民党政府的支援，弹尽粮绝，不得不退回察北。

血战到底的抗日灭满救国军。1933年2月，兰天林部铁血军在往关内转移中就地分散，他带十余名骨干携械回到家乡兰家窑。经数月发动，于11月27日，在今北票大甲营子再度举起抗日义旗，建立了抗日灭满救国军。提出了“推翻满洲国，驱除日寇，消灭汉奸，还我河山”的战斗口号。到1934年4月，这支队伍已扩大为千余人，整编为10个大队。6月，奈曼旗八仙洞的抗日武装领导人周荣久率千余人与兰部会合。另外，苑久战等部700余人也纷纷来投。这时抗日灭满救国军已达4000余人，由兰天林任总司令，周荣久任副总司令，王品清任参谋长。救国军有

^①黄守中致行政院长汪兆铭电报，1933年4月20日。

严格的军纪，受到民众的拥护。“说是官军不开饷，说是胡匪不许抢”，这是当地民众对救国军的由衷称赞。救国军还利用避实攻虚，声东击西，出没无常，飘忽不定等游击战术，到处打击敌人。蒙奸沁布多尔济，在日本的扶持下，出任伪土默特右旗旗长，在北票横行霸道，血腥地镇压民众。7月15日，兰天林率部包围了黑城子王府，给蒙奸以打击。1935年8月7日，兰天林又率部在蒙古营子附近截击了伪军第四十团，毙伤和俘虏伪军骑兵160余人，夺获战马100多匹，各种枪支110多条，迫击炮1门。第二天，兰天林率2000余义勇军围攻北票，攻入城内，激战两昼夜，给日伪军以很大打击。10月，日本侵略者将兰天林部列为“满洲肃整工作重点”，大举兴兵“围剿”。在日伪军重兵的追击下，抗日灭满救国军被迫化整为零，继续坚持斗争。1937年7月，在北票南平安地，兰天林只身被围，英勇战死。

威震敌胆的刘振东部义勇军。曾经全歼古贺联队威震敌胆的刘振东部义勇军，在西撤的中途，即返回热东地区，利用深山和群众基础好的有利条件，并与王震、李树珍等部义勇军联合，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1933年10月，刘振东等部义勇军1500多人，在羊山附近与日军芦冢部队展开激战，日军死伤惨重。在伪《大同日报》10月7日的一篇多方掩饰的报道中，也不得不承认有22名日军死亡。1934年8月6日，刘振东部又攻占了朝阳南部重镇二十家子，处决了做恶多端的伪警察署长马兰廷，使日伪军和汉奸极为惊恐不安，他们多次聚集重兵，进行讨伐扫荡，都被刘振东部所粉碎。1935年10月7日，刘振东部在镜子山被松井讨伐队包围，经过激战，因众寡悬殊，大部分人战死或被俘，只有少数人化装潜出，这支坚持了4年之久的抗日武装遭到了失败。10月19日，伪《新京日日新闻》在头版头条位置，用“古贺联队以来的宿怨，刘振东匪被消灭”的大字标题，报道了这次战斗。可见，日伪对刘振东部义勇军的仇恨程度。

威武不屈的反满抗日仁义军。1935年夏季，曾任过马占山部

义勇军团长的喀左羊角沟人李天德回到家乡，组织起一支抗日武装，以楼子山为根据地进行抗日活动。1936年春，郭文连等10几支绿林抗日武装来投，到年末，已发展到700余人，有轻重机枪3挺，长短枪也比较齐全。曾经多次出击，打击敌伪，受到民众的拥护。1939年春，李天德在行军中摔伤后牺牲，余部由郭文连率领，成立反满抗日仁义军，继续抗战。在6年多的时间里，就与日伪军作战百余次，处死日籍警察署指挥官小田宫平、日高宗秋等，给予敌伪政权很大打击，日伪当局曾悬赏万元巨款捉拿郭文连。由于叛徒的出卖，1942年3月5日，郭文连在从翁牛特旗孟家店向林东转移途中，被日军抓获。5月18日，在建昌集市英勇就义。郭文连就义那天，正是建昌大集，人员很多，日伪戒备森严，如临大敌。在“审判”时，郭文连昂首挺胸，毫无惧色，并当众痛斥日本侵略者说：“你们侵占中国国土，杀害中国人民，罪恶滔天。我打死你们是给中国人民报仇！”在就刑时，郭文连仍然大义凛然，威武不屈。当日本刽子手石冢举刀欲砍时，他竟猛回头在石冢的手腕上咬下一块肉来。在场的中国同胞，无不为之流涕。

日伪军制造的下五家子惨案。1935年3月15日，锦西县伪警察局的日本指导官平间率领讨伐队长汉奸曹荣轩及伪军百余人，到下五家子骚扰。当地民众尹少明、邵连起、刘国儒等带人伏击了这伙敌人。平间奔马逃窜，讨伐队被打伤17人，被俘5人。同年9月，平间又率伪军警三次进犯该村，均被当地武装民众击退。11月16日晨，日伪军乘该村民众不备，出动大批军警包围了村庄，进行血腥的报复。敌军在下五家子烧杀了3个小时，全村34户人家400多口人，被杀死370余口，除当天外出的人外，从敌人的枪口和屠刀下仅逃出11人。全村400多间房子被烧成一片焦土，到处是血肉模糊的尸体，惨不忍睹。这就是日本侵略者制造的“下五家子惨案”。

日本侵略者残无人道的暴行，激起了热河人民更强烈的反

抗。继之而起的还有邓文山领导的“平康德”反满抗日军，多次粉碎日伪军的围剿，坚持到1938年春，邓文山受伤牺牲。李天德的侄子李凤春，继承叔父遗志，坚持抗日斗争，曾亲手处决了汉奸梁秀峰等人，一直坚持到1944年，李凤春受害身死。在热辽义勇军的敌后抗战斗争中，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影响最深的是孙永勤领导的抗日救国军。

第四节 民族英雄孙永勤和抗日救国军

一、日伪的殖民统治和孙永勤抗日救国军的兴起

1933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热河省后，实行了残酷的殖民统治。

政治上，在省、县（旗）设行政公署，日本人虽任副职，但掌握实权，汉奸任正职为虎作伥。县（旗）之下设村、甲、牌，组成伪政权的基层组织网络。在省、县（旗）公署内设警务所（科），大村镇设警察署，是个警特密布，岗哨林立的社会，热河人民完全陷于日伪殖民统治的恐怖之中。经济上，日本侵略者为了掠夺战略物资和控制人民生活必需品，成立所谓“组合”，实行配给制，造成产棉区不能纺线织布，产豆区不能榨油，产粮区不能售粮的畸形经济。此外，日伪对农民除征收高额的地亩税外，还征收诸如生死、嫁娶手续费、门牌费等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并要负担“出荷”、劳工等无偿劳役，使人民处于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困境之中。思想上，日伪当局通过“协和会”、“道德会”和学校等对人民进行奴化教育和欺骗宣传，以加强思想统治。但是，热河人民毕竟是不屈服的民族，敌人压迫愈深，人民反抗愈烈。当时，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烈火燃遍热河各地。其中最著名的是民族英雄孙永勤领导的抗日救国军。

孙永勤（1893年—1935年），兴隆县黄花川孙杖子村人，生

长在一个较为富裕的农民之家。少年读书，长大习武，为人正直，性格豪爽，“未尝欺凌弱寡，且常周恤贫寒”，在黄花川一带很有威望。汤玉麟统治热河后，横征暴敛，匪患丛生，为保护身家性命，黄花川成立一自卫团，孙永勤出任团总，有枪50多支。热河沦陷后，日伪委任汉奸汪海澂为兴隆办事处长，他笼络全县地主豪绅，充任大小官吏，加强殖民统治。日伪又通过伪警察机构推行“銃器回收”政策，强迫农民交出手里的枪支弹药，妄图以此扑灭热河人民反抗斗争的火焰。伪上板城警察署和车河堡警察队多次找孙永勤要枪，均遭拒绝。孙永勤严正地说：“人是中国人，枪是中国枪，要我当汉奸，只能是妄想！”



民族英雄孙永勤塑像

正当日伪当局收缴农民枪支甚急，孙永勤徘徊忧虑之际，中共京东特委派人来黄花川一带活动，以卖水鞋为掩护到孙永勤家，向他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当孙永勤听到迁安、遵化的农民暴动，开滦煤矿工人罢工的消息，犹如在茫茫的黑夜里见到了光明，点燃了他胸中的抗日怒火。

此时，车河口“大成兴”商号股东、汉奸岳荫臣，为土匪窝藏的枪支被外地民团抄走，他借机向日本人告发孙永勤劫走枪支，煽动抗日，图谋不轨。警察几次前来抓捕，孙永勤虽得逃脱，但家中已难存身。1933年12月上旬，伪兴隆办事处长汪海澂派伪军头目李海山率200余人再次到黄花川逼枪逼债，抓捕10多人，并限3日内交齐，否则就将杀头。官逼民反，孙永勤决心走武装反抗的道路。

1933年12月10日，孙永勤来到承德县路通沟村赵家庄，串联了赵林、赵来、赵友和马宝德、关元有、赵四川等7人，共议暴

动大计。12月11日，孙永勤带领赵林等回到黄花川，同团丁等共17人聚集在自卫团部院子里，宣布暴动，并庄严宣誓：“见贼就杀，毫不留情；有死无降，向前拚命；爱护百姓，不害好人；精忠报国，永无二心！”^①在村里树起“天下第一军，均富又济贫”的大旗，拉起一支农民抗日武装，命名为“民众军”，推举孙永勤为军长，发动了黄花川农民抗日武装起义。

二、孙永勤抗日救国军的发展壮大

黄花川农民抗日武装起义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33年12月11日武装起义爆发，至1934年5月整编。

孙永勤率领农民举行抗日武装起义以后，黄花川附近一带的农民200多人，拿着刀枪、斧头，找到孙永勤，参加了抗日民众军。这时，民众军最缺的是枪支弹药，孙永勤率队来到临村大地主张如增家，起出14支步枪，几支手枪。然后连夜袭击车河口伪警察分驻所，又得步枪7支。接着，关元有率百余人到大彭杖子攻打汉奸岳荫臣的煤矿城，在南山歼灭赶来增援的日伪军几十人。连夜登上海拔1383米的五指山，休整几天后，南奔50多里，袭击伪兴隆县半壁山警察分驻所，得步枪10几支，子弹甚多，并开仓济贫，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民众军连战皆捷，军威大振。当地农民纷纷赶来参加，“共得健儿500余”。1934年1月，民众军编为3个（中）队，每个中队150余人，由关元有、王殿臣、赵四川分任各队队长。军部设立了军法处，专管部队纪律，提出了“不贪财，不扰民、不好淫”的约法三章。

1934年农历腊月二十九日，乘即将过年之机，一支日军突然来袭，民众军撤到长峪沟山梁，与赶来的日军展开激战，毙伤日军几十人，然后转移到邢杖子烧板子沟，又被日军包围，激战后突围，

^①1935年，王亚编《东北抗日烈士传·孙永勤烈士传》第31页。

攀上海拔1475米的五凤楼山，甩掉了日军，民众军就地进行休整。

两个月来，民众军转战车河、黑河、洒河、柳河4条大川，打击日伪，发动民众，影响遍及长城内外。热南地区又有4支抗日暴动队伍^①先后与孙永勤部会师，民众军队伍迅速扩大到千余人。在五凤楼进行了第一次整编，孙永勤仍任军长，赵四川、王殿臣、关元有、张福义、李连贵、年焕兴、康永贵等任队长。整编后，民众军南下迁安一带作战。

3月中旬，民众军再次袭击半壁山伪警察分驻所，得枪9支。次日，在西大石洞附近设伏，打死赶来追击的日军20多人，后转移到小十二岭，遭伪军袭击，民众军战士30多人牺牲。3月20日，孙永勤率队东出50里，夜袭潘家口税关署，毙日军7人，得步枪10余支。然后挥兵北上，再次围攻大彭杖子岳荫臣的煤矿城，拔除了这个顽固据点。民众军在承德县的老梁休整7天后，兵分两路，流动游击。一路沿滦河南下，在贾家安附近，袭击日军3艘货船，打死日军20多人，获面粉、大米3000多斤，衣服350多件。一路威逼下板城，以声东击西的战术，连续攻克武厂、黄杖子等敌据点，并攻克正在修建中的承德县上谷火车站，歼灭伪军30余人。

民众军节节胜利，使敌伪大为震惊。伪热河省当局撤了汪海激的兴隆办事处主任职务，调吕俊福继任。吕上任后，对民众采取反革命两手政策，一面派人向孙永勤“疏通”，约会地点，声称亲自与孙永勤“谈和”；一面密遣千余名伪军，从东西两路合击，妄想一举消灭民众军。孙永勤洞悉吕俊福险恶用心后，将计

① 4支暴动队伍是：①兴隆县苇子峪自卫团总李连贵，率团丁、农民18人暴动，收缴附近各村大枪50多支，袭击了白旗营敌伪据点；②蓝旗营村年焕兴，组织了30多名农民暴动，与李连贵会合，袭击半壁山警察所，于3月与孙永勤部会合；③承德县八挂岭村张福义，组织百余农民暴动，转战到乌龙矶，与民众军会合；④下板城火车站工人单忠英（辽宁兴城县人），联络20多名劳工，打死两名日本人，夺得一支大枪，到老梁投奔孙永勤部。

就计，诱敌进山。4月上旬的一天，吕俊福率500余伪军东犯，上板城警察署出兵500余西犯。王殿臣、李连贵、年焕兴率队在五凤楼西侧伏击，吕部伤亡过半，狼狈逃回。东路伪军也中伏溃败。这样，吕俊福合击民众军的阴谋彻底破产了。

第二阶段，是从1934年5月民众军在五指山整编，至1935年2月中旬救国军南征。

1934年5月1日，民众军已猛增至5000余人，在五指山（兴隆县境内）休整。中共遵化县委秘密派遣军事干部徐英等到五指山下与民众军中的共产党员关元有接头，并会晤孙永勤，宣传了我党的抗日政策和关内的抗战形势，建议他把“均富济贫，唤起民众”的口号，发展为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抗日救国。加强军队纪律，密切联系群众，争取广大群众的支持。孙永勤接受了这些主张，把他领导的民众军改称为抗日救国军，并提出了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打击地主，严惩汉奸，与日寇血战到底的行动纲领。同时，对部队进行了整编，由孙永勤继续担任军长，赵四川、马保德任副军长，王殿臣、关元有（党员）任参谋长。全军设4个总队（大队），张福义任第一总队长，年焕兴任第二总队长，关元有兼任第三总队长，李连贵任第四总队长。各总队1000人—1200人，下设中队、小队和班。军直设稽查处和直属队。在组织整编的同时，还进行了纪律整顿，处决了2名抢劫、奸淫罪犯，并晓谕全军，人人不得违犯。

整编后的抗日救国军，在战略思想和战士士气等方面有了质的飞跃，出现了争取各方，坚决抗日的新气象。救国军以总队为作战单位，分散活动在兴隆、承德、青龙、平泉、迁安和遵化等长城一带，予日伪军以重创。

6月20日，孙永勤率第一总队攻克伪承德县乌龙矶警察分驻所，缴枪40多支。又攻克兴隆县佛爷来据点，击毙日军19人，毙伤警察50多人，并将仓库打开，把粮食、布匹等物品分给贫苦农民。赵四川率领二、四总队攻克兴隆县孤山子、遵化县罗文峪两



孙永勤领导的抗日救国军军旗

据点，毙俘伪军70余人。第八大队长何广永率20多名战士在大厂村活捉孤山子海关关税总长佐藤等2名日本人。然后转战瀑河川。6月22日前后，又围困宽城，战斗三天三夜，因敌伪增援，遂撤出战斗。转移途中，在九虎岭与千余日军激战，救国军伤亡80多人，关元有率第三总队赶来增援，歼日军一部，使其载着许多尸体向平泉退去。

1934年8月，日本侵略者看到孙永勤的抗日救国军在长城内外燃起的抗日烽火越烧越旺，对救国军的“清

剿”未能奏效，便转而采取拉拢引诱的手段。伪热河省当局先是派两名日本人来劝降，孙永勤拒而不见，命战士怒斥逐出。后来又命几个汉奸向孙永勤游说，并呈上任其为热河省警察讨伐大队长的委任状。孙永勤将委任状撕得粉碎，并厉声痛斥汉奸：“你们不要脸，以为别人也不知耻吗？我是堂堂的中国人，岂能做日贼的狗下之狗！”几个汉奸羞得无地自容，抱头鼠蹿。

抗日救国军威震热南，日本侵略者十分恐慌，惊呼“匪势强大”，“讨伐殊难进展”，于是不得不出动4000多日伪军进行讨伐，以图消除伪满“西南国境的最大障碍”。

1935年1月，抗日救国军一部正在承德县老梁一带集中，突然遭到500多日军和600多伪军的围攻。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抗日救国军领导人本应组织部队突围，但由于接连几次打了胜仗，

自满情绪不断增长，错误地与敌人硬拼。结果激战一天，虽然打死打伤日伪军一部，抗日救国军也伤亡很重。傍晚突围转移到王宝石，又遇日军追击，激战多时，毙日军一部，孙永勤腿部受伤，且战且退，摆脱了敌人，转移到洒河川的青杏沟与李连贵大队会合。这时抗日救国军仅存千余人。

老梁战斗失利后，敌人步步紧追，使部队大量减员，活动范围不断缩小，武器弹药奇缺，军需来源发生严重困难。这时，有人提出集中全军兵力与日军决战，孙永勤认为，在山地与日军作战，军需供应都有困难，如全军转移冀东，可争取到各方面在军火、财力和物力上的支援，待找到共产党和红军后再图下步。

1935年2月中旬，孙永勤率领全军放弃了热南山区，进行南征。

三、抗日救国军的失败及其教训

1935年4月间，抗日救国军南征途中在兴隆洒河川一带转战，部队又发展到1700余人。日军第七师团一部、伪军两个团和承德、兴隆、青龙三县警察讨伐队共五六千人，于半壁山地区又将孙部包围，日伪军还出动飞机助战，以毒气弹向救国军进攻。救国军战士以陈旧的武器与敌军血战，毙伤日伪军700余人，救国军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战斗严重失利，孙永勤指挥部队撤往长城沿线。

这时，中共冀东地区党的组织委派中共遵化县委和孟家铺游击队与孙永勤取得联系，帮助抗日救国军开进长城，并运去一部分武器弹药。5月15日，孙永勤率军由洪山口、马蹄峪越过长城，开进遵化、迁西交界一带。孙永勤出布告安民，号召军民团结抗日。并派人与国民党遵化县政府联系。遵化县政府曾给救国军以方便，还送去部分粮食、药品。16日深夜，救国军与尾追入关之部分日军接战，毙伤日军40余人后，即避往深山。

5月20日，日驻华武官高桥致函国民党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

何应钦，以“遵化县长等确有庇护孙永勤‘股匪’的事实”为借口，悍然派遣关东军大举越过长城，扫荡孙军。日军松井部由洒河桥西进，石井部出古北口南下，八本原旅团和山田部也相继越过长城，布成对抗日救国军三面包围之势。同日，救国军在尖山屯与日军激战，救国军且战且退。21日，国民党河北省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汉奸殷汝耕与高桥商定协剿抗日救国军计划。在日军的威迫下，国民党遵化县政府也一反前态，竟以给救国军换发春装（当时战士还穿棉衣）为条件，诱骗救国军集中茅山地区剿匪。22日，殷汝耕指使国民党保安总队张庆余、张砚田等部，从南面向救国军进逼，国民党河北省政府的两营军队也加入合击救国军。此时，由5000多日军、1000多伪军和5000多国民党保安队，总计共1万多人的协剿军，形成对救国军的四面包围之势。23日，日伪蒋三方协剿军在总指挥日军少将旅团长川岸文秀指挥下开始联合协剿。救国军在鸡鸣村、三家店一带，与日军激战，双方伤亡甚众。孙永勤部被压缩在茅山、十里铺、吴家沟一带。24日拂晓，日军用飞机在空中指示目标，以大量炮火摧毁救国军阵地，接着敌军从四面发起总攻。孙永勤旧伤未愈，又挂新采，但他仍镇定地指挥全军英勇反击，经浴血奋战，终于掩护张福义、年焕兴、李连贵、何广永等率领二三百名战士突出重围。孙永勤、赵四川、关元有、王殿臣等抗日救国军领导人，率余部500多人酣战至中午12时，全部壮烈殉国。①轰轰烈烈的孙永勤抗日救国军的抗日斗争又被镇压下去。

由孙永勤创建并领导的抗日救国军，是在国民党长城抗战失败之后，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农民群众自发地组织起来的，是在中国共产党“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号召和支持下发展壮大起来的。在一年半的时间内与日伪军作战200余次，攻克敌人大小据点100余处，毙伤俘日伪

①1935年5月26日，上海《大美晚报》。

军数千人，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这支抗日武装虽然失败了，但它却在长城内外撒下了抗日的火种，激励了人民群众抗日救国的决心，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高度赞扬。1935年8月1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中，赞扬孙永勤是为国捐驱的民族英雄，“都表现我民族救亡图存的伟大精神，都证明我民族抗日救国的必然胜利。”

这次轰轰烈烈的抗日武装起义之所以遭到失败，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教训也是深刻的。首先，没有党的坚强有力的领导，这是它失败的根本原因。尽管在这支起义军中有少数共产党员参加，有的甚至担任了领导职务，如参谋长关元有等，在起义过程中也得到党的地方组织领导人的支持和帮助，但在起义军中始终没能形成党的领导核心，也就是说没能使这支很好的农民起义军置于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这一方面由于中国共产党正处在艰苦的长征途中，无暇北顾；另一方面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影响下，热河和冀东的党组织都受到严重破坏，力量很弱小，不足以担负起这样一支大的起义部队的领导责任。这样，就使这支起义队伍始终没能完全摆脱自发性和狭隘性，在战略和战术上都犯了不少错误。特别是在敌强我弱又无后方接济的情况下，集中部队与敌人打运动战，给敌人造成集中优势兵力围歼之机。其次，国民党执行不抵抗的反动政策是这支农民抗日武装失败的重要原因。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者妥协退让，却反对一切抗日力量，致使国民党地方当局竟敢出卖民族利益，出卖抗日救国军，甚至与日伪互相勾结，日伪蒋合流，联合绞杀了这次农民起义。最后，敌强我弱，这是救国军失败的客观原因。当时热河日伪军的力量大大超过了抗日救国军。这支农民抗日武装，基本上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加之它在战略和战术上的错误，最终也就不可避免地遭到失败。

抗日救国军虽然失败了，但孙永勤和为民族解放而献身的救

国军将士们的英名将永垂青史。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抗日救国军余部会合于中国人民的抗日革命洪流，继续为民族解放而战。

日本帝国主义将孙永勤抗日救国军镇压下去后，进一步将它的势力扩大到平、津、冀、察，并以孙永勤抗日救国军进入所谓“非武装区”，受到遵化县政府“接济”，破坏了《塘沽协定》为借口，提出种种无理要求。6月初，国民党政府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同日本华北驻军司令梅津美治郎开始秘密谈判。7月6日，何应钦致函梅津，承认日本的要求，达成协议，习惯上称为《何梅协定》。6月27日，又签订《秦土协定》。^①这两个协定的签订，使日本帝国主义攫取了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华北形势愈加危机。

^①1935年5月，察哈尔驻军逮捕了在察哈尔省活动的日本特务，随即释放。日本以此为借口，提出蛮横的要求。6月27日，察哈尔省民政厅长秦德纯和日军代表特务头子土肥原达成《秦土协定》，内容包括成立察东非武装区，国民党军队从察哈尔省撤退等。

第三章 执行党中央的重大战略决策

创建冀热边抗日游击根据地

第一节 创建冀热边抗日游击 根据地的准备

一、七七事变前后的热河形势

日本帝国主义者为实现其“速战速决”，吞并全中国的战略野心，于1937年7月7日在卢沟桥发动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新战争。爱国的国民党军官兵在人民的支持下奋起抵抗，从此爆发了全国抗战。

沦陷敌手，身受4年多亡国奴痛苦的热河人民，早就急切地盼望摆脱奴役的枷锁，听到卢沟桥抗战的消息，更是同仇敌愾，以各种方式投入了抗日斗争的洪流。青龙县境内纷纷建起报国会组织，发动民众，利用公开的隐蔽的多种形式，打击日伪反动统治。孙永勤抗日救国军余部和绿林英雄杨二的民众抗日武装会合，在长城沿线频繁出击，抗日斗争更加活跃。不久，张福义为国捐躯。^①热河其他县的民众，也以不同形式打击日伪，支援卢沟桥抗战。

卢沟桥事变是中国历史发生根本转折的大事件。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由发动局部战争转变为发动全面战争，走上了大规模侵华战争的罪恶道路；另一方面，中国也由自发地局部抗战发展为全国性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解放的全面抗战。

在七七事变前后，热河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33年2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热战争至1935年

^①引自《兴隆县抗日斗争大事记》。

6月《秦土协定》签订,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在热河的殖民统治秩序确立时期。日本侵略者用武力占领热河,镇压热河人民的反抗斗争,建立起一整套殖民统治秩序,把热河完全纳入了伪满洲国的版图。

第二阶段,从1935年6月至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在热河的殖民统治秩序加强时期。日本侵略者为使热河变成它的永久的巩固的殖民地和继续侵略扩张的基地,对热河人民实行残暴的军事镇压、政治控制、经济掠夺和奴化教育,使热河完全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第三阶段,在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是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强化对热河的殖民统治秩序时期。日本侵略者把热河变成了全面侵华战争的前哨基地,疯狂地推行法西斯统治和战时经济体制,进行穷凶极恶地搜刮和横暴的掠夺。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热河后,更加积极地推行野蛮的军事镇压和血腥的屠杀政策。把热河沿长城一线划为“西南国境”,派重兵驻守。在承德设立伪第五军管区,辖4个步兵旅、1个步兵团和2个炮兵队。在所有驻宪兵队的地方,机关、企业和学校都组织了秘密情报网,搜集各方面的情报,监视各阶层的动态。并强化警察机构,在全省建立警察署70处,^①每个警察署都设有几处警察分驻所。日伪军、警、宪、特互相配合,对热河人民实行灭绝人性的屠杀。1935年11月16日,日军制造了朝阳下五十家子惨案,一次屠杀无辜群众378人,全村391人,只有13人幸免,同时烧毁房屋400多间。1937年7月30日,日伪军又在朝阳县北水泉和东杖子两个村制造两起大惨案,用机枪扫射、放火烧尸等极野蛮的手段,屠杀无辜群众100人。

其次是对热河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经济掠夺。早在热河事变前,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最大垄断资本“满铁”,就窃取了阜新新邱煤矿的矿权和赤峰的电力工业开发权;热河事变后,日本

^①大连图书馆存《满洲国地方志》。

垄断资本攫取了热河的铁路建筑权、矿产开采权、土地使用权等几乎全部经济权利，修筑了锦承铁路和锦朝铁路北票至朝阳段；^①北票、赤峰的大型煤矿全为日本所有；电力、交通等部门多为日本资本所占据，本来就非常脆弱的热河民族工商业，经日本垄断资本的排挤，多数倒闭，少数勉强维持的企业也处在慢性萧条之中。日本帝国主义对热河经济摧残、掠夺最大量、最毒辣的莫过于推行鸦片政策。他们制订了《满洲国鸦片法》，指定热河全省为种植鸦片重点区，将鸦片的种、吸、制、运、卖等完全合法化、专卖化。据伪热河省公署警务厅烟务科调查统计，在全省22个县旗，1935年指定种植罂粟3098顷，1936年就扩大到6000顷，1937年7000顷，^②比1935年增加一倍多。同时，日本帝国主义还通过政权、法令等强制手段，规定鸦片由日本专买专卖，从中获取了大量收入，^③他们还把大量剩余鸦片秘密运往大连，加工后销往世界各地。据伪热河省公署警务科统计：1936年全省收购鸦片795万多两，而全省城乡销售不足35万两，尚有760多万两鸦片全部销往它处。这样大规模纵毒，使许多人不仅丧失民族意识和反抗意志，而且成为失去劳动能力的废人。

再次，日本侵略者还极力摧残中国民族文化，推行奴化教育，实行殖民地文化统治。日伪当局强令热河人民不得挂中国地图，不得使用“中华”字样，对带有中国民族意识的书刊一律禁绝。从省到各县、旗、村普遍设立了协和会和协和分会，作为进行反动宣传的机关，鼓吹“日满亲善”、“日满一德一心”等胡言乱语。在学校由日本军国主义爪牙和汉奸文人总揽教育大权，他们一方面迫害有爱国思想的师生，另方面推行所谓日语化、共荣化和职业化的殖民地愚民教育，向学生灌输奴化思想。中小學生每天早晨上课之

①据锦州铁路局敌伪档案载：锦朝路北票至朝阳段于1933年9月建成通车。锦承路于1936年3月建成通车。

②大连图书馆存《满洲国地方志》。

③据统计，伪满洲国1932年鸦片收入为1940多万元，1936年就增加到3769万元，其中增加部份大多为热河鸦片收入。

前,必须举行“朝会”,分别向东京和新京“遥拜”。每月还要举行一次“诏书奉戴日”,向师生宣读伪满皇帝国本奠定诏书,这些都使本来就比较落后的热河教育事业,又一次蒙受了严重摧残。

日伪在军事、政治、经济上的强化统治,象套在热河人民身上的枷锁,迫使穷困的热河人民生活愈加穷困,也更激起热河人民对日伪统治的切齿痛恨,和对独立自由生活的渴望。热河人民的抗日烈火,只要遇到火种,就会更加炽烈地燃烧起来。

二、发动以雾灵山为中心的冀热边抗日游击战争战略决策的提出

从七七卢沟桥事变到1937年12月底,国民党军队在华北主战场上,虽然进行了一定的抵抗,但由于国民党政府推行单纯的消极防御的错误战略,加上政治制度和军队制度的腐败,所以在武装到牙齿的日本法西斯军队的进攻面前,一溃千里,河北、山西、察哈尔、绥远、山东等大片国土相继沦于敌手。这样,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既已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就进入了主要地位。

在这一历史转变关头,为进一步具体地确定全面抗战纲领和政策,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于1937年8月22日至25日,在陕北洛川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规定》,制定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会议确定党在这一阶段最中心的任务是,在敌后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早在会议前的8月初,毛泽东、洛浦和周恩来、朱德之间往返的3封电报中,就提出了派一部分军队远出热河,发动冀热察的游击战争,胁敌后方的意见。会议中又根据毛泽东关于红军可出一部于敌后的冀东,以雾灵山为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①的提议,确定发动冀热边地区游击战争,创建冀热边抗日根据地。

^①《聂荣臻回忆录》中册,第398页,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出版。

党中央、毛泽东关于发动以雾灵山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战争的决定，是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1937年9月25日，毛泽东又致电中共中央北方局，指出：整个华北工作，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民运、统一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同月，刘少奇指示中共河北省委：八路军已渡过黄河，正向太行山及北岳地区进发，河北省党组织的中心任务是配合八路军，广泛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党的注意力和工作重点要放在农村，要不失时机地抓紧准备冀东抗日武装起义，发动冀东游击战争，配合八路军建立以燕山山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①1938年2月，毛泽东电示八路军总部，指出：“雾龙山^②为中心之区域，有广大发展前途，且是独立作战区域，派出部队应较精干，且不宜过少。军政党领导人员需有独立应付新环境之能力，出发前应做充分准备。”还指出“应准备至适当发展时期，派高级领导人去雾龙山。”^③同年5月，毛泽东又把以雾灵山为中心的燕山山脉确定为全国六大山区根据地之一。^④这些指示，进一步完善了关于发动以雾灵山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思想。

毛泽东指出的以雾灵山为中心的区域，主要是指河北的冀东和热河的南部、西部地区，广义的则指与燕山山脉相连的热察边、冀热边和冀热辽边广大地区，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雾灵山是燕山山脉的主峰，位于冀热边界的热河省兴隆县境内，海拔2116米，素有京东第一峰之称。燕山是个大山脉，东西千余里，南北数百里，地域广阔，山高林密，海拔千米以上的高峰不下十几

①《李运昌同志谈冀东暴动》，1984年2月13日。

②雾龙山即雾灵山。

③毛泽东致前总、汉口、朱德、彭德怀电报，1938年2月2日。

④六大山地根据地，即长白山、五台山、太行山、泰山、燕山、茅山，见《毛泽东选集》袖珍本第388页。

座，有广阔的回旋余地，雾灵山则雄踞为满洲国的“西南边境”，跨越长城内外，西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为依托，有坚强的后方基地；南临华北平原，有取之不尽的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东进承德、朝阳、赤峰、锦州，可与东北抗日联军相配合，直指日伪心脏。而且，这一带人民受日伪殖民统治压迫深重，反抗精神很强，是发动抗日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理想地方。

对于冀热边抗日游击战争的性质、特点和道路，早在冀热边游击战争还没有大规模发动起来的1938年5月，毛泽东就有了英明的预见。他指出：冀热边游击战争，与四周已被敌占但中间未被敌占，或虽占而已经恢复的“现成的根据地”不同，“那里已有长期的伪政权，当地起义的民众武装和从五台山派去的游击支队，整个活动地区开始都是游击区。他们在开始活动时，只能在此区中选择好的地点作为临时的后方，或叫做临时根据地。要待消灭敌人和发动民众的工作开展之后，才能把游击区状态消灭，变为比较巩固的根据地”^①。毛泽东在这里指出的高度流动、高度游击、较长时期难以建立巩固根据地等特点，完全被后来的实践所证明。

总之，党中央、毛泽东不仅提出了发动以雾灵山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战争的重大战略决策，还为这个决策的具体实现指明了方向和道路，这是创建冀热边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根本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它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决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政治主张，和以大无畏精神坚持独立自主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原则，给冀热边地区广大人民群众以极大的鼓舞和力量。后来的实践证明，冀热边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不仅给伪满洲国的统治以沉重打击，而且钳制了日本侵略军南逼武汉、西

^①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见《毛泽东选集》袖珍本第391页。

进黄河的战役行动，支援了全国抗战。更重要的是在全国抗战胜利后，由冀热边游击根据地发展起来的冀热辽解放区，成为八路军挺进东北的重要前进基地，对于迅速出兵东北，收复失地，夺得先机之利，起到了重大的历史作用。这是党中央、毛泽东关于发动以雾灵山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战争战略决策的重大胜利，也是冀热辽的党、军队和人民艰苦卓绝斗争的重大胜利，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闪烁光辉的一页。

三、冀热边早期游击战争

党中央、毛泽东关于发动以雾灵山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决策，象一座明亮的灯塔，照亮了冀热边人民抗日斗争的道路。冀热边党组织坚决执行这一战略决策，很快发动并领导了冀热边的早期游击战争，为冀热边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创立作了准备工作。

冀热边地区山高林密，物产丰富，长城盘旋，形势险要，是个有着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地区。在清末民初，热河和冀东同归直隶省管辖。1928年成立热河省后，长城外的兴隆、青龙仍归河北省管辖。直到日本侵占热河后，才强行把河北的兴隆、青龙以及察哈尔的部分地区划归热河省管辖。所以，冀热边地区历史上的经济联系，人际往来等都非常密切。这个地区的革命斗争也始终是在中国共产党冀东地方党组织的领导和影响下进行的。早在1929年前后，中共迁安县委曾多次派人到宽城做地下工作，秘密发展党员。1931年7月，由共产党员韩平在宽城峪耳崖的北大岭村建立起一个党支部，袁明为支部书记，到年底已发展党员8名。1935年8月，建立了中共冀热边特委，赵仲池为书记。10月，特委机关遭破坏。1936年，彭真到冀东巡视工作，恢复了冀热边特委，管辖兴隆、青龙、迁安、遵化、蓟县5县，王平陆任书记。1937年1月，遵化共产党员高升在兴隆县驴儿叫村建立一个党支部，有7名党员，窦永旺为支部书记。这样，冀热边就完全结为一个革命整体了。

1937年9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指示当时已任河北省委书记的李运昌，①速返冀东，重建冀热边特委，着手组织发动冀热边抗日游击战争。10月，在北宁路以北正式重建中共冀热边特委，李运昌任书记。在北宁路以南成立京东特委，胡锡奎②任书记。这样，冀热边的党组织按照上级指示，全面开展了发动冀热边游击战争的准备工作。

①李运昌：1908年9月生于河北省乐亭县。1926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1927年至1937年先后任广东惠潮梅工农革命军第二团党代表、乐亭中心县委书记、顺直省委代秘书长；铁总满洲办事处主任、特派员；中共京东特委书记、河北省委书记等职。

1937年10月后，在任冀热边特委书记时，组织并领导了冀热边人民武装抗日大起义和创建冀热辽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在任冀东军分区司令员、晋察冀军区第十三军分区司令员和冀热辽军区（二级）司令员兼政委、晋察冀中央局委员期间，始终战斗在抗日最前线，坚持并发展了冀热辽抗日根据地，并率领冀热辽部队胜利进军东北，配合苏军收复热河、辽宁全省和吉林、黑龙江的一部分地区。在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副司令员、冀察热辽军区（大军区）副司令员和东北行政委员会冀察热辽办事处主任、热河省主席，领导并坚持了热河解放区的革命斗争和建设。热河解放后任省委书记、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和热河省省长。1949年11月后任政务院交通部党组书记、副部长，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全国政协常委。文化大革命时期受迫害，坐牢8年。1979年7月恢复工作后，任国务院司法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党的十二大代表，中顾委委员。

②胡锡奎（1896年11月17日——1970年10月23日），湖北省孝感市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出席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1928年回国后先后担任中共北平、天津、唐山市委书记，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1931年6月，被反动派逮捕，度过5年监狱生活，历数次生死考验，始终坚贞不屈。出狱以后来到冀热边，是震惊中外的冀热边人民武装抗日大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1939年8月，到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任常委、宣传部长，出色地完成了党的宣传工作。1945年日本投降后，奔赴承德，出任中共热河省委书记、中共冀察热辽中央分局社会部长，对于巩固和发展冀察热辽解放区作出了贡献。建国后，历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中共西北局书记处书记等职，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

准备工作主要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一方面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各县各阶层群众投入到抗日斗争中来；另一方面积蓄力量，培训骨干，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活动。

七七事变后，冀热边地区完全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的统治，威胁到各界各阶层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冀热边人民，包括富有阶层的抗日要求日益增长。根据这个形势，由共产党倡导在天津成立了华北人民武装抗日自卫会，并在各地成立了分会，在基层成立报国会和自卫会，广泛吸收各阶层人士为会员。上层社会的著名人士杨十三、洪麟阁、高志远等也都参加了这个由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组织。

1937年12月底，中共冀热边特委以华北人民武装抗日自卫会的名义，由李运昌主持，在滦县多渔屯召开了京东10县抗日人民代表会议。到会代表20多人，代表1.5万名会员。会议经过民主协商，正式成立了“华北人民武装自卫会冀东分会”，李运昌为主任。会议除讨论了继续加强抗日宣传、组织工作外，还决定组建华北抗日联军冀东第一游击支队，在冀热边地区发动小型游击战争。

与此同时，根据刘少奇的指示，河北省委专门就冀热边游击战争问题进行了研究，决定从北平、天津等大城市动员共产党员、青年学生，脱下长衫，到冀热边农村去，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派周文彬等去开滦煤矿开展工作，支援冀热边游击战争；北方局也派红军干部李润民（团政委）、孔庆桐（营长）到冀热边开办两个游击干部训练班，积聚力量，培训骨干。

这样，抗日的宣传日益深入，抗日武装力量不断扩大，于是，在冀热边特委领导下，连续发动了三次小型游击战争，为冀热边抗日武装大起义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

第一次是在1938年初。多渔屯会议后，很快组成了华北抗日联军冀东第一游击支队，共17人，王平陆任司令员，孔庆桐、刘永丰任正副支队长，史真、李润民任正副政委。组成后一面开到上梨树峪村进行整顿，一面派人外出侦察情况，决定利用年关

的时间，首先攻取热河省青龙县青河沿据点。

1938年1月8日夜，王平陆率队出击，一举攻入伪警防所院内，在战斗即将结束时，王平陆的胸部被敌人冷枪击中，遂撤出战斗。第二天，王平陆不幸牺牲。他是冀热边抗日游击战争中第一个牺牲的党的重要领导干部。第一次游击战争只坚持了20多天，不得不暂时潜伏下来。

第二次是在1938年2月。冀热边特委调来张鹤鸣、张振宇等18名党员骨干，充实第一支队，由彭夫任支队长，高存任政委，挺进兴隆县大洼、宝地一带，当地有数名群众参加，使这支队伍壮大到50余人。一天夜间，利用“火攻”战术，攻克药王庙伪军据点，打死打伤30多名敌人，生俘1人，缴获步枪7支（因其余枪支被烧毁），游击队只有1人负轻伤。这一行动惊动了敌人，他们紧急调来400多名日伪军穷追不舍，游击队在关外站不住脚，只好撤回关内，再次潜伏起来。

第三次是在1938年3月。冀热边特委及时地总结了两次小型游击战争的经验教训，认为在冀热边发动小型游击战争，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非常必要的，在不断的游击战争中，才能壮大队伍，以发展为大规模的游击战争。当时，特委利用冀热边人民反对敌伪收枪和发行伪币的心理，组织三三五五的游击小组，昼伏夜出，神出鬼没，打特务、除汉奸、剿赌局、砸白面馆（即日韩浪人开的鸦片烟、海洛英馆，当时遍及冀热边各县，危害甚重，人民极为痛恨），此起彼伏，颇有声色，得到群众的广泛支持，取得很大的成功。

冀热边三次小型游击战争，虽然规模不大，未能从根本上触动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秩序的基础，但“也有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主要是解决了人民最痛恨的关卡，烧了警察局，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锻炼了军事骨干，积累了斗争经验，是冀热边人民武装抗日大起义的先导。同时，冀热边特委不怕挫折，不怕牺牲，前仆后继，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也大大激励了冀热边人民的斗志，为领导和发动冀热边人民武装抗日大起义准备了条件，开辟了道路。

第二节 冀热边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开辟

一、八路军第四纵队挺进冀热边

为了把发动以雾灵山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决策付诸实施，党中央、毛泽东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调兵遣将，在冀热边广大地区创造出了一个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局面。



八路军第四纵队一部挺进到承德附近。1938年。

晋察冀军区根据毛泽东1938年2月的电报指示，抽调骨干较多、战斗力较强的第一军分区部分军政干部和第三团，组成八路军第十一支队，由邓华任司令员兼政委。2月30日，邓华率领全支队1000余人，从涞源出发，先行开辟平西根据地，做挺进冀热边的准备。4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巩固与扩大晋察冀根据地指示》中，要求晋察冀军区再分出一部分兵力，“向冀东、热边发展”。①月底，又从一二〇师抽调一部较强的干部和部队组成八路军第十二支队，全支队共2800多人，宋时轮任司令员兼政

①毛泽东、刘少奇、张闻天：《关于巩固和扩大晋察冀根据地指示》，1938年4月20日。

委。随后由宋时轮、伍晋南率领，从山西大同一带出发，分两路挺进平西。5月中旬，经八路军总部批准，宋、邓两支队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宋时轮任司令员，邓华任政委。辖三十一、三十三、三十四、三十六大队（团级）和直属独立营、骑兵大队，共5300余人。

6月1日，第四纵队主力集中在宛平斋堂，誓师东征。响起了气壮山河的抗日战歌：

炮火连天响，战号频吹，决战在今朝。我们抗日的先锋军，英雄的武装上前线，用我们的刺刀、枪炮、头颅和热血，坚决与敌决死战。

挺进军兵分三路。宋时轮率三十四大队和独立营，沿途打南口，出居庸关，克昌平，直指冀热边境。邓华率三十一大队和三十三大队，从康庄附近过平绥路，连克延庆、永宁、四海、沙峪，进占冀热边界重镇古北口。伍晋南率三十六大队和骑兵大队，从青龙桥附近，经永宁、千家店，直到丰宁县的大阁。四纵队东征10余日，行程500里，共毙伤敌600余人（其中日军330多人），缴获大批枪支、物资，四纵队也伤亡200余人。其中，怀柔沙峪一战尤为激烈，歼灭日军100余人。丰宁花盆战斗歼灭伪满洲军一个营，毙俘300余人。

6月17日，第四纵队经彻夜激战，袭入热河省兴隆县城，拔掉敌9座炮楼，歼敌一部。次日，敌从承德开来800余人增援，并派3架飞机助战，四纵在兴隆东部与敌激战，歼敌200余人，自身也伤亡近百人，遂主动撤出县城，继续战斗在周围山区。后来四纵队战士多次在夜间攻占兴隆南北山敌人炮楼，并集体高唱《五月的鲜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等抗战救亡歌曲，使日军胆寒，伪军神伤，人民受到鼓舞。

八路军第四纵队挺进冀热边，攻克兴隆县城，使日伪军惊恐不安。他们惊呼：“延安触角伸进满洲，打乱了满洲的秩序。”正当四纵队按照聂荣臻司令员“依靠雾灵山向四周发展”的部署，向雾灵山四周进军时，日伪调集重兵，不断向四纵队围攻。但四纵队英

勇善战，机动灵活，历尽艰险，冲破敌人重重阻截，从6月下旬到7月中旬，连续打破了敌人的三次包围，攻克平谷县的镇罗营、将军关、靠山集和兴隆县的六道河、九神庙、马圈子、五道河等据点。其中，奇袭九神庙一战，击毙日军90余人。六道河子一战，歼敌200余，光尸体拉了六七汽车，从而打破了敌人的包围。①

6月下旬，第四纵队在雾灵山东麓马圈子召开党委扩大会议。鉴于雾灵山主峰地区山高林密，人烟稀少，给养不足，且交通不便，敌伪组织严密，大部队活动比较困难等情况，会议决定分兵四路，向雾灵山西、南、东等方向发展，扩大游击区，创立游击根据地。

北马圈会议后，宋时轮率三十四大队南进至密（云）平（谷）蓟（县）地区，再克镇罗营、靠山集。6月下旬，在镇罗营建立密（云）平（谷）蓟（县）联合县政府，王树梅为县长。促使蓟县马伸桥民团300余人起义。邓华率三十一大队和直属队东进至承（德）滦（平）平（泉）地区。派孔令英连前出至承德街，袭击了敌人飞机场。7月16日，在承德县的车河川建立承（德）兴（隆）平（泉）联合县政府，县长王巍，工作队长（县委书记）赵振忠。三十三大队向兴隆东南方面出击，在兴隆县半壁山歼灭日伪军百余人，进至迁（安）遵（化）丰（润）地区。独立营留下开辟雾灵山，攻克东麓重镇鹰手营子，摧毁了警察署，毙、俘敌50多名，缴获机枪1挺，步枪30多支。7月中旬，在兴隆县大、小黄崖及兴滦交界地区建立兴（隆）滦（平）丰（宁）联合县政府，杨春圃任县长。与此同时，由四纵政治部主任伍晋南率领的三十六大队和骑兵大队，在丰（宁）密（云）怀（柔）地区

①宋时轮、邓华致聂荣臻并朱德、彭德怀电：《冀热边情形报告及其意见》，

频繁出击，粉碎日伪军的两次大扫荡，于7月初在滦平县的头道梁建立滦（平）昌（平）怀（柔）联合县政府，县长张书砚，地方工作委员会主任刘国梁。

八路军第四纵队突破伪满洲国的所谓“西南国境线”，深入热南、热西山区，摧毁伪据点，消灭日伪军，使沦陷5年之久的热河人民第一次看到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的抗日部队，受到很大鼓舞，提高了抗日勇气，他们纷纷自动组织起来，参军参战。原孙永勤抗日救国军第二总队长年焕兴率余部在将军关加入四纵；在冀热边地方党组织的组织发动下，兴隆县茅山、六道河、半壁山、蓝旗营等地800多贫苦农民举行武装起义，迎接八路军。特别是第四纵队严明的军纪，更使热河人民称赞不已。当时正值淫雨连绵，山洪暴发，部队跋山涉水，历尽艰辛，日夜行军过河，有的战士的脚泡烂了，军马的蹄子泡软了。在这艰难的时刻，战士们每到一村，大多露宿在屋檐下，饿了吃一把炒面，渴了喝一口雨水。群众见此情景，深为感动地说：“自从盘古开天地，就没有不欺压老百姓的军队。你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真是救国救民的好军队呀！”这样一传十，十传百，都知道八路军是坚持抗日的队伍，是为老百姓打天下的队伍，纷纷送子送夫参军。独立营在兴隆县大黄崖、小黄崖就扩军300多人。

二、冀热边人民武装抗日大起义

1938年7月，经中共中央批准的、由中共冀热边特委直接领导和发动的、以冀东为主体的冀热边人民武装抗日大起义，终于爆发了，20万各界人民揭竿而起，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摧枯拉朽般地瓦解了20几县的敌伪基层政权，使10几万平方公里的地方，成为起义军的天下。

1938年5月，拟议中的冀热边大起义已经到了实施阶段。5月下旬，中共河北省委书记马辉之奉刘少奇急电，到延安汇报起义的准备情况。刘少奇在听取汇报后着重指出：中央已派邓华、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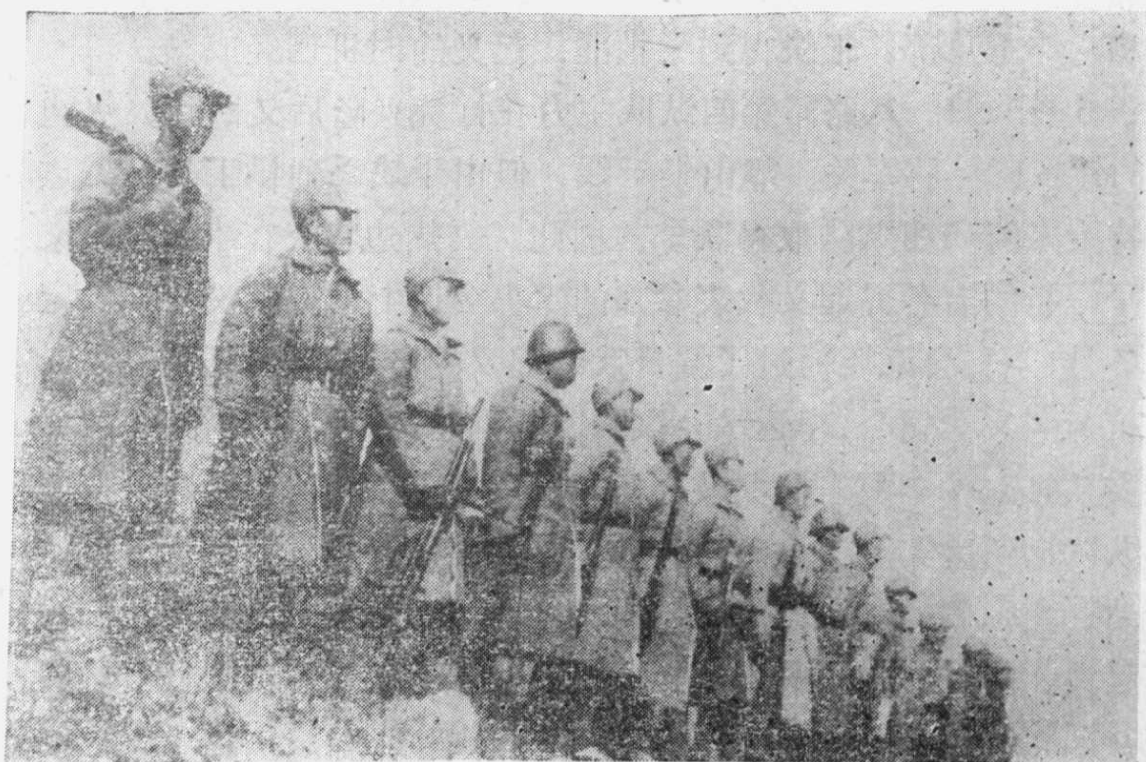
时轮率部队挺进冀东，起义的时间要以八路军到达的时间为准；起义后，要以八路军为主，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建立以燕山山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并在根据地建立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①随后，起义计划和四纵挺进计划上报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很快得到了批准，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

6月22日，八路军第四纵队主力在打完兴隆后又回到冀热边界的镇罗营、将军关、靠山集一线，但由于缺乏通讯工具，冀热边特委未能和四纵队取得联系。因此，冀热边特委在丰润县田家湾子举行的有各界起义代表参加的军事会议上，把起义日期确定为7月16日。会议还通过了抗日武装起义的行动纲领，推举高志远任抗日联军总司令，李运昌、洪麟阁任副总司令。7月初，冀热边特委从打入伪“冀东防共政府”内部作地下工作的朱欣陶处获得四纵队已到达冀热边的确切消息，并获悉敌人已觉察到大暴动的行动，企图收缴散在民间的23万支枪支，于是冀热边特委决定提前起义。同时，中共中央电令四纵：速向迁安、遵化、卢龙挺进，同抗联会合。

7月6日，李润民、高培之、张鹤鸣等首先在滦县港北庄起义，成立抗日联军第五总队，并在杨家院设伏，击溃出扰的滦县警察大队，击毙两名中队长，生俘警察大队长，缴枪200多支；起义部队发展到1.1万余人。

7日，李运昌、胡锡奎、苏林燕等在丰（润）迁（安）交界的岩口镇起义，成立抗日联军第四总队，在铁厂北之玉皇庙迎击前来窜扰的遵化县伪保安队，激战两小时，歼敌大半，俘获80余名，缴枪80多支，马13匹。随后，起义部队迅猛发展到1.3万多人，攻占古冶、洼里火车站，把昌黎至唐山间铁路截成数段。

^①陈绍畴：《刘少奇与冀东暴动》，



冀热边人民武装抗日大起义中的抗联队伍。

8日，洪麟阁、杨十三、李楚离等在遵化县地北头村起义，成立抗日联军第一、二总队，并与蓟县起义部队配合，攻克玉田县城，一度发展到4000多人。

9日，高志远、陈宇寰、王仲华等在滦县马城、胡各庄起义，成立抗日联军第六总队，后发展到约万余人，活动在滦县南部，乐亭一带。

14日，李子光、①王崇实、商香阁等在盘山起义，成立抗日联军第三总队，并以突然袭击方式攻克邦均伪警察局，生俘伪警察30多人，后又配合四纵主力攻占平谷、蓟县县城，队伍发展到5000多人。

18日，周文彬、节振国领导开滦煤矿工人起义，袭击了唐家庄包工大柜和民团武装，队伍扩大到3000多人，编成工人特务大队。

此外，国民党组织的七、九路军也在宝坻起义。

这次起义，在热河境内共组织起4支抗日武装队伍。

第一支是由共产党员高升领导的起义军。高升是由冀热边特委很早就派往兴隆的地下工作人员，在大洼、宝地一带成立游击小组，组织农民武装，开展抗日活动。四纵挺进兴隆后，主动为部队作向导，转战洒河一带。冀热边抗日武装起义爆发，他立即拉起三四百人的队伍，被编成第四总队特务大队，多次神出鬼没地打击日伪军。后来，高升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第二支是孙永勤“抗日救国军”的余部，由年焕兴、何叔权率领，曾配合四纵队攻打兴隆。之后，在半壁山一带割电线，破坏交通，摸哨卡，开展游击战争，冀热边起义爆发时，已发展到七八百人，先后攻克4个伪警察署和5个伪警察所。

①李子光：原名贾一中，1902年10月7日生于河北省蓟县，1926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归绥市特支书记、蓟县临时县委书记、迁遵蓟中心县委书记。1938年参加冀热边人民武装抗日大起义，是冀东西部地区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后来历任晋察冀第十三地委西部分委书记、冀热辽第十四地委书记等职。坚持“无人区”斗争，坚持冀热辽抗战，与日伪军进行了艰苦卓绝地斗争。抗战胜利后，被选为热河省政府副主席，参加并领导了热河解放区的创建、坚持和解放后的恢复建设工作。1949年调任河北省委书记、农村工作部长、副省长等职，1967年3月1日在唐山被残害致死。1980年11月15日，中共河北省委为李子光同志平反昭雪。

第三支是青龙县的刘青山部。刘原是抗日义勇军军官，义勇军失败后，隐蔽在青龙一带。冀热边起义全面爆发后，他在青龙组织义勇军旧部，拉起近千人的抗日武装队伍，抗击日伪军的镇压，捣毁伪乡、村政权，主动投奔抗日联军。

第四支是活跃在遵化、兴隆边界的杨二部。杨二系兴隆县人，20多岁时被迫投身绿林。热河事变后，他奋起抗日，多次与日伪激战，给敌以杀伤。冀热边起义后，他于7月中旬宣布起义，组成五路军，杨二任司令。随之，遵化马兰峪、兴隆挂兰峪一带农民，纷纷前来投军。3个月时间，部队就扩大到2000多人，转战长城内外，和日伪军多次交战。9月23日，2000多日伪军对杨二部进行围剿，在弹尽援绝的情况下，杨二宁死不屈，用最后一颗子弹自杀身亡。

8月中旬，邓华率四纵队一部，攻克迁安，然后进抵遵化县铁厂镇，与抗日联军李运昌部胜利会师。至此，冀热边人民武装抗日大起义进入全盛时期。冀东和热南22县、20多万群众参加了起义，共组成39个总队和若干独立大队，有组织的抗日武装达10万多人，其中由共产党直接组织和领导的抗日联军有7万多人。这支队伍先后攻克了玉田、乐亭、卢龙、蓟县、平谷、迁安、宝坻7座县城，解放了数以百计的集镇，在西起潮白河，东到山海关，北至雾灵山、都山，南达渤海之滨的广大地域内，摧毁了除铁路线以外的所有敌伪政权，挣脱了日本侵略者的殖民统治，冀热边大地到处喜气洋洋，欢声雷动。同时，这次大起义形成了广泛的统一战线，不仅有数以万计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还有爱国抗日的地主和上层人士，有的伪军、民团也参加了起义，各个阶层都卷入了抗日起义的洪流。冀热边人民抗日武装起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中共中央和北方局十分关心冀热边起义和与四纵队的会合。铁厂会师后，马上发来贺电：“以十万分的高兴，庆祝抗日联军反日反汉奸起义的胜利及八路军四纵队的会合”。贺电信心坚定

地指出：“我们相信这一支在抗战中新成长起来的生力军，定能在冀东各党派领袖的合作与正确领导下，继续胜利创造冀热边新的抗日根据地，长期坚持抗战，给日寇的野蛮侵略以沉重打击。”“望你们继续巩固团结，集中注意力，打破敌人对你们的围攻，扩大与巩固部队，组织民众，建立冀热边抗日政权，肃清汉奸，扩大与巩固你们的胜利，为驱逐日寇，建立独立自由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①党中央的贺电，肯定了冀热边大起义的胜利，并为今后的发展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会师之后，四纵队党委和冀热边特委共同召开了铁厂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邓华、李运昌、胡锡奎、李楚离等领导干部，其他各路起义部队也派代表参加，由邓华主持。会议正确地分析了大起义后的形势，充分肯定了起义的胜利，确定了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方针。会议针对队伍多，秩序乱等情况，提出了统一指挥、统一行动、统一纪律问题，并决定整训部队，成立冀察热宁军区和冀察热宁边区行政委员会，公推宋时轮为司令，邓华为政委，下设5个军分区。

铁厂会议的各项决定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也有不足。9月10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联合来电批准会议决定，同时指示宋邓以团、营为单位，分散到各军区与起义队伍合编，以使冀东游击队迅速正规化。电报还指示各军分区正副司令员由八路军干部和地方干部共同担任，并立即着手建立各县、区政权。

党中央的指示弥补了铁厂会议的不足，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但是，由于主客观等方面的原因，铁厂会议决议和中央电报指示，均未能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在部队没有进行合编（部分原因是四纵队领导害怕部队分散后失去战斗力；高志远、洪麟阁等

^①中央与北方局祝贺抗日联军起义电，1938年9月1日。

非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则害怕被吃掉）、训练和休整的情况下，放弃群众基础很好的丰（润）滦（县）迁（安）地区，盲目决定东渡滦河，向抗日义勇军早已失败，日伪统治已经巩固，群众基础甚差的热河都山地区进军，结果在抚（宁）青（龙）边界连续遭敌阻击，加之多日淫雨，山洪暴发，行军困难，虽取得歼灭一营伪满洲军的胜利，但终是得不偿失，被迫又退回滦河以西地区。这时，如果决心执行铁厂决议和中央指示，在雾灵山和都山之间千余里的广大地区，整编部队，建立游击根据地，还是有可能的。但四纵队的领导对于武汉失守后的敌情估计过于严重，认为青纱帐倒后，平原地区无法坚持，山区又解决不了补给，对坚持冀热边抗日游击战争动摇了信心，于是产生了将“主力转到潮白河以西，地方武装则尽量拉到平西整训”^①的想法。这个想法的错误就在于，既违背了党中央、毛泽东关于发动以雾灵山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决策原则，也脱离了当时冀热边抗日斗争的实际，脱离了冀热边的人民群众，必然招致极为严重的后果。党中央、毛泽东发觉大撤退的思想后，于9月26日复电：

“有全国坚持抗战的有利形势，有华北普遍的游击战争，加以八路军远近距离的配合，有广大群众的掩护，有雾灵山、燕山、五龙山东西千余里之大山脉便于回旋，地方党有相当基础。根据以上各种条件，创造冀热边根据地，创造相当大的军队是可能的。但是环境是严重的，工作是困难的，必须以高度革命精神，克服斗争中的一切困难，坚持统一战线原则，建立坚持持久抗战的胜利信心，克服起义新军中不可避免的复杂现象。”^②随后，八路军前方总部也来电，严令四纵队首先在冀东站住脚跟。

①邓华致晋察冀军区电报，1938年9月17日。

②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刘少奇复电聂荣臻并宋时轮、邓华及冀热边特委。
1938年9月26日。

接到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邓华邀李运昌、胡锡奎等在迁安县新庄子召开会议，一致决定继续贯彻铁厂会议和中央一系列电报指示精神，继续坚持冀热边区抗战，创造以冀东为中心的冀热边抗日根据地。但为时已晚，这时，四纵队主力已西撤到潮白河两岸了。

10月初，邓华又主持召开了九间房（丰润县）会议，决定留下包森、陈群、单德贵三个支队，坚持冀热边游击战争，四纵队主力和抗联部队全部西撤。会议后，总撤退开始，5万多没有经过训练的大军蜿蜒西行，道路拥挤不堪；沿途供给无着，纪律无法维持，步步遭敌阻击，多次激战，伤亡甚多；中央电报中预言的严重情况终于发生了。西撤部队除宋时轮、邓华率四纵队全部和起义部队2000多人到达平西外，其余大部伤亡、溃散。冀东原有的基层组织也遭到很大破坏，西撤遭受的损失是严重的。

在西撤遭受重大损失的严重关头，李运昌在平谷县樊各庄召开冀热边特委紧急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决定停止西撤的错误行动，并收容余部6000多人返回丰滦迁地区，继续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并与四纵队留下的三个支队相配合，成为以后长期坚持冀热边游击战争的基础力量。

冀热边人民武装抗日起义，是抗日战争时期全国规模最大的一次人民武装抗日起义，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的意义主要在于，正当日本侵略军南逼武汉，西进黄河，妄图一举灭亡中国的时候；正当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失地千里，“亡国论”甚嚣尘上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和它的军队、地方党组织，在敌人的深远后方，在联结东北华北的咽喉地带，发动几十万人民群众，燃起了抗日烈火，给日伪的殖民统治以严重打击，在伪满洲国插进了一个楔子，打开了一个缺口，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这次大起义的胜利，是党中央、毛泽东发动冀热边抗日游击战争战略决策的伟大胜利，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伟大胜利。虽然由于主客观等方面的原因，没有尽可能的保持和发展

这一胜利，但它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三、多块小块游击区的开辟

冀热边人民武装抗日大起义，虽然遭受了严重挫折，但抗日斗争的火焰并没有熄灭。李运昌领导的抗联部分战士和四纵队留下的三个支队相配合，继续坚持游击战争，在冀热边地区开辟了多块小块游击区，进而发展成为多块小块的游击根据地，走上了独立自主地创建冀热边抗日根据地的道路。

冀热边大起义的后期，在全国战场上，日军虽然占领了广州、武汉，但妄图“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幻想破灭了。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蓬勃发展，危及敌人后方，使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方针，不得不有所改变，这就是“‘以华制华’的政治进攻和‘以战养战’的经济侵略”。^①在军事上停止了正面进攻，转向强化后方占领区的统治。从而，使全国抗战转入了相持阶段。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扑灭大起义的火焰，敌人调来日军精锐小林部队，配合当地日伪军，开始了对冀热边地区的进攻“扫荡”，一部分地主、资本家投降了敌人，纷纷成立伪政权，许多参加起义的抗日群众遭到屠杀和镇压，整个冀热边地区处于日伪的殖民统治恐怖之中。

由李运昌率领东进的抗联队伍，经过与小林部队的多次激战，辗转回到迁安县柳沟峪一带山区。11月底，在柳沟峪召开了抗联干部会议，李运昌向干部作了动员报告，肯定了大起义的胜利和历史作用，表明了坚持冀东游击战争的决心。他形象地说：“我们队伍虽然少了，只要心不死，就一定能取得最后胜利。我们要象孙悟空一样，变成个‘虫子’，钻进敌人的心脏里，让敌人日夜心神不安，最后就让他死在我们手里。”^②会议决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72页。

②引自《冀东革命史》

定抗联队伍适当分散,组织小股游击队,恢复党的组织,积蓄革命力量,一点一滴地扩大抗日队伍。1939年1月,中共中央撤销了河北省委,成立冀热察区党委,统一领导平西、冀东和平北的工作。冀热边特委也改为冀东地委,着手恢复党的组织。到五、六月间,已建起遵化县委和10几个基层支部,热河兴隆县的西部、东部山区也开始了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工作。

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核心堡垒作用;四纵队的三个支队和抗联战士则是开展游击战争的中坚力量。到1939年6月,冀热边地区已组织起20多股小游击队,开辟出10多块游击区。在关里的有柳沟峪、潘家峪、鲁家峪、盘山、鱼子山等,在关外的有驴儿叫、五指山、洪山口、大黄崖、小黄崖、狗背岭、头道梁等。据不完全统计,这期间有组织的武装力量达3000多人,发生的大小战斗233次,毙伤俘及投诚来归的伪军、警察、自卫团等1500多人,并创造了不少以少胜多的战例。

驴儿叫、五指山游击区是由包森支队的赖邦游击队开辟的。

在四纵队挺进冀热边时,三十三大队一营营长赖邦带一连人(十一连)在兴隆县驴儿叫、大洼一带养伤。四纵队西撤时划归包森第二支队建制,仍在这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当时环境艰苦,敌人不断扫荡,连长和一些人跑掉了,100多人只剩下28名伤病员。1938年11月,赖邦等28人在当地群众配合下,于半壁山南沟伏击了一股“扫荡”的伪军,俘虏了50多人。紧接着又攻打了半壁山,包森也带队赶来,攻克了伪警察署,敌人退入药王庙,包森等就地开仓济贫,受到群众欢迎,队伍很快发展到200多人。11月底,赖邦率部在兴隆县寿王坟南沟伏击扫荡的日伪军,毙俘伪军30多人,缴获1门小炮、1挺机枪和20多支步枪。到1939年春,包森支队已发展到900多人,编为4个大队(也叫总队),活动在兴(隆)遵(化)迁(安)地区,又接连攻克遵化县东辛庄子据点,打死日军10多人,毙俘伪军90多人,把几小块游击区联成大片的游击区。

1939年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活捉日军赤本大佐事件。当时，包森支队频繁出击，名声大振，赤本大佐专程到遵化捉拿包森。4月26日，在被捕的包森支队战士王振锡诱骗下，赤本布置大队人马在后尾随，自己仅带一名翻译和王振锡到遵化北山寻找包森。当他们进入离长城20多里的张家坟村时，被包森支队战士年焕兴、贾振远、马兰田等抓获。尾随的敌军发觉后鸣枪追击，年焕兴等已携赤本越过了长城，不久即在兴隆县苇子峪附近将赤本处决。赤本的被捉，在敌伪内部引起很大震动，敌人出动大批兵力，并动用飞机，对洪山口游击区进行一个月的大扫荡，妄图夺回赤本，但终是一无所获。

包森支队游击队员活捉并处决赤本的英雄行为，不仅鼓舞了冀热边人民的抗日斗志，也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受到了上级的嘉奖。1944年6月22日，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在延安对外记者参观团的谈话中，对这件事也给予很高的评价。

以大黄崖、小黄崖为基地的雾灵山游击区是由第三支队政委赵立业率部开辟的。

赵立业是四纵队独立营营长。四纵队在马圈子分兵后，留独立营开辟雾灵山区，连续攻克鹰手营子、红梅寺等敌军据点，队伍发展到2个大队5个中队和1个特务连，共三四百人。1938年10月，四纵队西撤后，赵立业奉命与坚持在鱼子山的单德贵部合并组成第三支队，单任支队长，赵任政委，仍分别活动于原来的地区。11月，敌人开始向雾灵山区扫荡，赵立业部被敌包围，在危急关头，一大队的队长、教导员带部分战士追赶西撤的主力部队，赵立业指挥余部，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保住了雾灵山游击区。12月，赵立业率3个中队和特务连赶赴鱼子山，消灭了占据鱼子山的伙会，解了单德贵部之围。二大队的两个中队继续坚持雾灵山区。后来，四纵队第三十六大队一营教导员李满盈也带队来到大、小黄崖一带，就地坚持游击战争，逐渐扩展到兴(隆)滦(平)、兴(隆)承(德)、兴(隆)密(云)边界，发展成为以大、小黄

崖为中心的雾灵山游击区。

狗背岭游击区是由第三支队长单德贵率部开辟出来的。

单德贵（后叛变投敌）原系四纵队营教导员。挺进冀热边时率部开辟了以鱼子山为基地的四座楼、狗背岭一带山区。四纵队西撤后，单德贵被任命为第三支队长，奉命坚持鱼子山地区游击战争。当时有8个中队，1个特务连，共有三四百人。11月，鱼子山游击大队长孙峰扔下部队出走，游击大队变成了伙会的队伍，单德贵只剩200多人被围困在密云老鹅顶山的狭小地区。赵立业闻讯后，率一、二大队由雾灵山迅速赶来，攻下鱼子山，歼敌200多，解了单德贵之围。这一仗打击了反动地主的气焰，稳定了鱼子山一带的局势。投敌的原鱼子山游击大队又携带全副武装归来，加上当地群众踊跃参军，队伍扩大到六七百人，新成立了第四、五两个大队。

1939年2月，敌人从承德、冀东两地出兵，对冀热边发动大规模围剿，第三支队决定全部转移到雾灵山区。赵立业率一、二、三大队先行至狗背岭被敌包围，经一日激战，敌我均有重大伤亡，二大队伤亡200多人，有一个中队只剩下一个人。夜间突围后，一、三大队转移到雾灵山，赵立业率二大队接应单德贵率领的四、五大队。不料，四、五大队已被单德贵遣散，单德贵只身带五六个警卫员走掉了。

赵立业在鱼子山、狗背岭地区整整被敌围困45天，敌人撤退后，立即率队攻克独乐河警察署，打死打伤伪警察署长以下40多人。又通过政治瓦解，使狗背岭、南水峪等7个临时据点的伪军警交械投诚，第三支队迅速恢复起来，狗背岭游击区也有了大的发展。

头道梁游击区是由钟辉琨率部开辟的。

四纵队东进时，将钟辉琨的一个连留在滦（平）昌（平）怀（柔）地区，开辟出以滦平县头道梁、秋场、大地为中心的游击区，并建立滦昌怀联合县政府，作为冀东与平西联系的通道。1938年7月下旬，四纵队政治部主任伍晋南率三十六大队和骑兵

大队挺进这一地区，在密云东部、丰宁南部、滦平西部的广大地区建立了抗日基层政权。10月初，四纵队西撤，滦昌怀联合县政府和两连部队，在滦平八道河被扫荡的日伪军包围，突围后东渡潮河，回归主力部队，这个游击区遂被敌占领。

1939年4月，伍晋南又率三十四大队挺进滦昌怀地区，建立了县政府，坚持了3个月，不久因敌扫荡，形势恶化，再次撤出。

遍布冀热察边界地区的小股游击队和小块游击区，象点点星火，照亮了冀热边人民前进的道路。

第三节 冀热察边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形成

一、游击区向游击根据地的转变

1938年冬至1939年6月，冀热边军民连续战胜了日伪军的5次比较大的“扫荡”、“围剿”，在斗争中，建立起多股小股游击队，开辟出多块小块游击区，保存和发展了革命力量，党的组织也得到了初步的恢复和发展。

6月，中共北方局召开军城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坚持冀热边游击战争的方针。会议明确指出：“冀东的坚持与发展，主要依靠冀东的党和人民的艰苦奋斗，由多股小股游击队发展成为大股游击队，由多块小块游击根据地，发展成为大块游击根据地的方针。但是外援和主力也是不可缺少的条件”。会议还决定“由挺进军派出一部分队伍到冀东来，帮助冀东坚持与开展游击战争”。9月，肖克发表《挺进军三位一体》一文，提出了“巩固平西，坚持冀东，开辟平北”的战略任务，明确了热冀边、热察边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同年秋季，到平西整训的蓟（县）遵（化）兴（隆）游击队和一批领导干部回到冀东，根据上级指

示，把冀东所有武装力量统一改编为冀热察挺进军第十三支队，李运昌任司令员，包森任副司令员，李楚离任政治委员，实现了党和军队的统一领导。

第十三军分区司令员李运昌。（1941年）



1940年元旦，冀东区党分委在遵化县阁老湾召开会议，全面研究了坚持游击战争的各项政策。会议决定：肃清土匪，大力开辟新区，巩固和扩大游击根据地；建设政权，实行财政统筹统支；建立公开的群众团体——青年报国会，广泛动员与组织群众

开展游击战争。并将冀热边所有武装力量，编成9个游击总队，集中力量开辟游击区和建设游击根据地。同月，冀热察区党委和挺进军决定建立平北工作委员会，由王伍任书记。并将原九团八连和30多名地方游击队改编为平北游击大队，由钟辉琨、刘汉才率领，再次开辟平北游击区。

阁老湾会议的召开和平北工作委员会的成立，使冀热边、热察边的游击战争，走上了由发展多股小股游击队，开辟多块小块游击区，转变为发展大股游击队，开辟大块游击根据地，最终发展为冀热边和热察边两大块抗日游击根据地的道路。



第十三军分区副司令员包森

1940年7月，在冀热边建立晋察冀军区第十三军分区，辖十二、十三两个团，李运昌任司令员，包森任副司令员，曾克林任参谋长，刘诚光任政治部主任。晋察冀第十三专署由焦若愚任专员。同时，平北军分区和专署也

正式成立，程世才任司令员，张致祥任专员。到1941年8月，在热河境内及边界地区，已建成迁遵兴、丰滦密、平兴密、迁青平4小块游击根据地和一批新开辟的小块游击区。

(一) 五指山游击根据地和迁遵兴联合县

五指山，在雾灵山以东，北与承德县接壤，南和迁安、遵相邻，东隔滦河与都山相望。境内有五指山、五凤楼、大石砬、月芽山、獐帽山等千米以上的大山脉相连，有横河、柳河、洒河等河流穿过，是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的深山区，面积约4000多平方公里。这里进可以跨长城进入富庶的冀东平原，退可以回旋于雾灵山群峰之间，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

包森支队在五指山附近地域开辟游击区后，洪山口、驴儿叫、沙坡峪等地的党组织有了恢复和发展，抗日武装力量也日益增长。根据阁老湾会议决定，1940年3月，建立了迁（安）遵（化）兴（隆）联合县，设4个行政区，共200余村。第一任县长姚铁民，县委书记王克儒，县委、县政府经常活动在以五指山为中心的洒河两岸。

迁遵兴联合县一建立，就把着眼点放在放手发动群众，建立各级基层政权，组织群众抗日武装等长久斗争建设上。到1941年夏季，联合县政权在长城内外又新开辟了9个区，共辖13个区（其中长城外8个区）。区区建立了党支部、党小组，在少数基本村建立了一面政权，在多数敌占区，建立了两面政权。一面政权的村有武装民兵班（排），区建游击小队，县建游击大队。当时民兵手中武器紧缺，主要任务是站岗放哨，传递消息，防奸防特；配合政府征粮征物，转贮物资，坚壁清野；配合主力部队和县、区游击队作战；破坏敌人交通，开辟抗日秘密交通线等。1941年冀热边在全区大“破交”中，八区区长张有德率领区干部、区游击队和全区民兵统一行动，一夜之间将洒河川蓝旗营子一带40华里的电线杆全部砍倒烧毁，电线运走埋藏。

五指山游击根据地的开辟和发展，主要还是靠武装斗争。由曹致福任队长的迁遵兴游击队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队伍，他们经常配合十三团，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1941年5月，曹致福率80多名游击战士，一举攻克兴隆县西台子伪警察分住所，毙俘30多人。

（二）莲花瓣游击根据地和丰滦密联合县。

莲花瓣，位于滦平县西部山区，是丰（宁）滦（平）密（云）三县的结合部，丰滦密联合县县委、县政府就设在这里。丰滦密地区是一大战略区域。境内有潮河、白河、滦河三大水系，纵横交错，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西经延庆、赤城，直达平西根据地；东下平谷、蓟县，与冀东根据地相连；南进顺义、通州，直逼北平；北越围场、赤峰，跨进内蒙古草原；是沟通平西、冀东的桥梁，也是日伪重兵设防的地区之一。1936年开始修建平（北平）古（古北口）铁路，并欲续建承（德）古（北口）路，以便与锦（州）承（德）路相接。因此，这一地域始终被日伪视为“西南国境”地带的咽喉要地。早在芦沟桥事变前就在古北口驻扎了日本关东军部队。1941年，又增设满州国西南地区防卫军，辖承德支队（相当于师团），由大村少将指挥，驻守承德。在古北口设西南防卫司令部，驻有关东军一七四部队和大批宪兵、警察、特务、伪军，经常残害人民。

1940年初，钟辉琨率挺进大队进入平北后，恢复了昌（平）延（庆）地区的抗日政权。接着北进丰宁县的黑河川，以千松台为中心，开辟一小块游击区。

4月，大规模开辟平北，冀热察挺进军再派第十团进军丰滦密地区。为避免过分刺激敌人，十团改称“平北游击总队”，采取“隐蔽发展”的方针，以梯次增兵的办法，分三次开入平北。

4月26日，挺进军第十团参谋长才山，政治主任吴涛率团直一部及第三营进入密云北部、滦平西部地区，组成地方工作团，分兵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和群众工作。4月底，平北工委书记苏梅，率警卫连进至丰宁，攻克千家店、杨木栅子据点，全歼伪警察。5月20日，十团团长白乙化率第一营和团直属队挺进丰滦密。途中，首战昌平沙塘沟，毙伤伪满洲军60余人；再战山神庙，歼满洲军一个排；三战滦平琉璃庙，仅用10多分钟时间即击毙和俘虏

伪军200多名，为莲花瓣根据地的再次开辟举行了奠基礼。

紧接着，十团又从团部抽出精干干部和随队过来的地方干部40多人，组成地方工作团，在三个武装小分队的掩护下，于白河东西两岸，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斗争，建立地方政权。还开办了地方干部训练班，有近百名当地干部参加，白乙化亲自讲课。这些骨干回到各地后，便相继发展党员，建立基层党的组织和政权组织，使武装斗争和群众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十团还派出一个连到四海、延庆一带，开辟了三条秘密交通线，沟通了冀东与平北、平西，冀东与晋察冀边区之间的联系，每年都护送大批干部、知识分子来往于此间，为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加强抗日根据地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

6月，上级派马力、王森等党政干部，正式建立丰滦密联合县，由马力任联合县工作委员会书记，王森任县长，辖4个区政权。

6月初，平北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段苏权，率挺进军一部进至丰宁大阁以南的老米沟门、喇叭沟门、五道营子地区，成立丰（宁）滦（平）办事处，王启刚任主任，做群众工作，征集粮食，准备迎接七团主力。7月，平北军分区司令员程世才及七团团团长陈坊仁等率团直及一、三营进入滦平五道营子与七团二营和白乙化团长率领的十团第一营会合。8月，配合“百团大战”，两次出击平古路，攻克小营车站，炸毁潮河大桥，给敌伪以很大杀伤。至此，丰滦密联合县将冀东抗日根据地与平北联成一片，象一把尖刀，插进伪满“西南国境”之内，引起日伪当局的极度恐慌。

9月11日，敌人纠集密云、丰宁、滦平的日伪军4000余人，采取多头并进、合围聚歼、反转电击等战术，开始了78天的“扫荡”，企图摧毁丰滦密抗日政权，确保“西南国境”的安全。

十团和丰滦密地方武装紧密配合，采取灵活多变的战术，有效地打击了来犯之敌。还大踏步迂回到日伪包围圈之外，开辟了白河以西的贾家峪和白河以东的上甸子、半城子、兵马营等大片地区。11月25日，日伪军不得不从丰滦密地区撤退，自诩为常胜部队的日军哲田中队130人撤至冯家峪南湾子，被十团王亢率领的一营包围，经激战，哲田以下90余日军官兵被击毙，十团也有67名指战员为国捐躯。这次战斗是丰滦密抗日游击根据地开辟以来的第一个重大胜利。

这次反“扫荡”的胜利，使丰滦密的群众坚定了抗战的信心，改变了八路军正规武装无力坚持热西山地的观念。12月底，丰滦密地区又有400余青年报名参军，使十团人数增加到1300余人。

1941年2月4日，伪滦平县警察科长关直雄（日本人）指挥道田讨伐队170余人，沿白河向根据地进犯，白乙化指挥十团与敌在鹿皮关附近的马营西山激战，毙伤敌人117名。白乙化团长在战斗结束时，不幸被冷枪击中，光荣牺牲。他的牺牲，正象挺进军《告全军同志书》中所说：“不但是八路军挺进军的损失，而且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一个很大损失”。

白乙化牺牲后，十团由王亢继任团长，吴涛任政委，全体指战员高举烈士的旗帜，给敌人以更坚决的打击。3个月时间，6战皆捷，消灭日伪军300余人，切断平古路，烧毁军车一列。6月底，丰滦密抗日政权所及范围已达潮河以西，四海以东，大阁以南，丰村以北，面积约达1万平方公里，人口17万的广大地区，辖有16个区政权。丰滦密游击大队也发展到1700余人，丰滦密根据地进入发展时期。伪军士气下降，军心动摇。7月末，驻守董各庄之伪满讨伐大队百余人携械投诚。8月29日，随日军到赶河厂讨伐的密云县伪警防队张博中队70余人，也乘机反正，受到解放区军民的热烈欢迎。

8月，中共丰滦密联合县工委扩建为县委，黄叶为县委书记

记，马力任副书记。9月，又派沈爽接替王森任县长。9月13日，十团主力在“一撮毛”山下设伏，将日军朱狩中队长以下56人全部击毙，关东军大本营惊呼：“八路军大大的厉害”。

（三）大、小黄崖游击根据地和平密兴联合县。

大、小黄崖游击根据地，位于燕山主峰雾灵山西麓。由大黄崖川、小黄崖川和狗背岭等地组成，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东部与五指山根据地相望，西部与丰滦密根据地相连。境内山如连城，谷多深涧，是一个独立作战区域。

1940年4月，兴隆县大、小黄崖、狗背岭，密云县鱼子山，蓟县盘山等小块游击区得到迅速巩固和发展，冀东区党分委决定成立蓟（县）平（谷）密（云）联合县，县委书记李子光，县长张耀东。6月，建立蓟平密联合县西北办事处（也称特区政府）和区委，开始在兴隆县椴洼、梨树沟、南水峪、狗背岭等地建党、建政工作。不久，敌人就发起对蓟平密根据地的大“扫荡”，蓟平密根据地军民与敌展转作战5昼夜，终于粉碎了敌人的“扫荡”，巩固并扩大了根据地，到1940年冬已发展到200多个村庄。11月下旬，蓟平密联合县扩建为两个县，南部为蓟（县）宝（坻）三（河）联合县，北部撤销西北办事处，建立平（谷）密（云）兴（隆）联合县，辖平谷、密云东北部，兴隆西南部的大、小黄崖和狗背岭一带。共6个区，大、小黄崖为第三区，狗背岭为第二区。县委书记由李子光兼，县长为李光汉。

平密兴联合县建立后，积极发动群众，建党建政。1941年春，李子光来到兴隆小西天一带，组织老党员吉祥、范山林、山田等10余人参加政治训练班，在“六一”大扫荡的残酷环境中，坚持学习50多天，为狗背岭根据地培养了一批坚强的党员干部。1941年下半年，南水峪中心村（包括小西天、朱家沟等）建立党支部。大、小黄崖地区也开始建党。到年底，平密兴联合县已有党支部54个，拥有党员644人。

县、区政权建立后，平密兴联合县政府立即着手村抗日政权

的建设。由于日伪统治多年，已经建立了一套“村、甲、牌”的伪政权体系，而抗日武装和抗日政权还不具备完全摧毁伪政权的能力，因此，只能执行两面政权的政策。即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暂时保留伪政权，允许伪保甲长在不损害抗日利益的前提下应付敌人。同时，运用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对伪政权人员进行争取改造，使敌伪的一面政权转变为中间的两面政权，再转变为抗日的两面政权；在抗日力量占优势的地方，则完全摧毁伪政权，建立抗日的一面政权。在抗日的两面政权村，开始是利用保甲的合法组织，保甲长两面应付。后来，发展到村有一名专为抗日工作服务的办事员，这是冀热边特有的基层政权组织形式。到1940年底，在游击队活动的地区，抗日的两面政权已占到半数以上。

游击根据地的建立，主要靠游击战争的胜利来巩固。1941年7月，兴隆县刘文讨伐队到六道河一带讨伐，在明子沟遭十三团郭子忠连伏击，当场击毙20多人，生俘副官赵广璧等多人。9月18日，蓟宝三联合县八区队，在当地民兵配合下，攻克兴隆县第三警察署及花石金矿矿警队，击毙矿警队长大越定雄（日本人）和警察署长关树春，促使100多名伪警察携枪反正，使这块游击根据地日益巩固起来。

（四）王厂沟游击根据地和迁青平联合县。

1941年4月，冀东党分委决定将迁遵兴联合县滦河以东地区划出，单独建立迁（安）青（龙）平（泉）工委和办事处。工委书记韩东征，办事处主任刘全民。同年秋，将工委改为县委，办事处改为县政府。辖青龙西部（今宽城）、平泉南部共10个区。其中关内3个区，关外7个区。

王厂沟系迁青平联合县的第七区，南靠长城，西临滦河，北有瀑河，山高林密，谷阔沟深，是冀东党、政、军出入长城，沟通热南，扩大游击区，建立根据地的中心地之一。

早在1940年春，冀东军分区三总队进入宽城境内，打了几个

漂亮仗，即撤回冀东。随后又派地下工作者深入到这一地区，组织群众进行抗日斗争。留在宽城北大岭楼台子养病的特务大队指导员周治国，病愈后仔细观察了附近的地形，又深入到平泉等地与地下党组织接上了头，较全面地了解到宽城、平泉地区的敌我情况。6月，周治国在迁西县东荒峪见到冀东军分区司令员李运昌，汇报了开辟这一带根据地的想法。李运昌当即予以批准，并以军分区司令员的名义，亲笔给宽城开明绅士孙景华、刘凤年、韩凤武三人写了信。周治国等人进入这一带后，很快和地方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动员出一批党员和抗日骨干组成游击队，广泛发动游击战争。8月，十三军分区为配合“百团大战”，广泛大出击，迁青平地区出动几千人“大破交”，在喜峰口至平泉、董家口至青龙、宽城至东大地的几百里长的公路上，挖路沟，割电线，砍电杆，使敌人消息不通，汽车断绝，有力地配合了主力部队作战。

1940年12月27日，周治国游击队偷袭了驻峪耳崖金矿的日军和矿警，22名日军被消灭21名，30余矿警全部被俘，共缴获三八式步枪37支，手枪6支，子弹3箱及大批货币、物资，游击队无一伤亡。1941年1月末，周治国又带队包围了三道关警察分驻所，打死日军两名，活捉伪军警30余名，缴获步枪20多支，“歪把子”机枪一挺。两战皆捷，游击队声威大振，陆续发展到140余人。冀东区党分委正式命名为青平游击队，周治国任队长兼指导员，将这一带开辟成游击区。不久，又组建青平工作团，由周治国任主任，葛春生任副主任。工作团的任务是：建立群众组织，建立地方政权，进一步开辟口外游击根据地。经过几个月的努力，青平工作团开辟出4个区，游击队员也扩大到230多人。

随着斗争的深入发展，王厂沟地区人民的抗日热情更加高涨，很快地建立起党支部及报国会、武委会、妇救会等群众组织。当地群众配合游击队割电线，破交通，侦察敌情，传送情报，护理伤员等，使军民建立起鱼水关系。1940年冬的一天，地

下工作者郑子阳，住在报国会员刘殿贺家里，刘给放哨，不幸被敌打死在途中，正在“坐月子”的刘妻，见敌人要闯进家门，便忍住悲痛，把老郑蒙在生孩子时的破被里，当作自己生病的男人护理，终于瞒过了敌人，使老郑安然脱险。这年冬季部队急需大衣，王厂沟妇救会的刘素珍、石玉莲、段叔凤等10余名妇女，忙碌了几个昼夜，给部队做了200件军大衣。由于王厂沟群众基础好，冀东军分区、迁青平县政府在这里设立了情报站，把各地传来的重要情报及时送达到上级，又把上级重要指示及时传达到各地。

1941年秋，迁青平已发展到西至滦河，东到都山，南起太平寨，北到锦承路的广大地区，经上级批准，建立迁青平县委和县政府，黎文（李海涛）任县委书记，刘全民任县长。至此，迁青平已发展成比较巩固的游击根据地。

在这期间，平北军分区还在滦平西部的游击区成立滦（平）昌（平）怀（柔）办事处（1941年4月），主任张庚生，工委书记樊凌玺。划一、四、九区为中心区。5月，张庚生被敌包围，残遭杀害。6月，游击区更加巩固和扩大，成立滦昌怀联合县，共辖5个区，县委书记樊凌玺，县长倪蔚廷。同年冬，樊凌玺在反“扫荡”战斗中牺牲，50多名干部只剩下5人，这块游击根据地没能坚持下来。此外，平北军分区还于1941年开辟了丰宁县西部，建立龙赤特三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

冀热边、热察边的多块小块抗日游击区向游击根据地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它标志着这里的抗日游击战争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对于冀东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在根据地的创造上，冀东自1941年起开始形成大块游击根据地……，拥有数千村庄和数百万人民的冀东游击根据地，在4年来的斗争中，已经成为不可摧毁的力量”。①另外，平北地委

①中共中央北方局《对于冀东工作的指示》，1943年3月25日。

对1941年的平北形势分析中也指出：“经我党我军一年半的努力，恢复了冀热察三省交界的一块领土，解放了40余万被奴役的人民，创造起大块游击根据地。”①

二、“扫荡”与反“扫荡”的残酷斗争

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伪军集中主要力量进行敌后的军事“扫荡”，妄图在“扫荡”中彻底消灭八路军和游击队。因而，“扫荡”与反“扫荡”是游击战争的主要斗争形式，冀热察边的几块游击根据地也是在“扫荡”与反“扫荡”的残酷斗争中发展巩固起来的。从1940年6月至1941年底，大的“扫荡”与反“扫荡”斗争有3次。

第一次在1940年6月——9月，由华北驻屯军和满洲国伪军向几块游击根据地发动了分区大“扫荡”。

6月初，驻冀东的日伪军，凭着已建立起来的400多个据点，4.7万多兵力，对冀热边的丰玉遵、丰滦遵和蓟平密三大块游击区发动分区“扫荡”，冀热边军民奋起开展反“扫荡”斗争。第十三支队指挥所属部队，机动灵活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避强击弱，与敌辗转周旋，不到一个月时间，就打破了敌人的“扫荡”，十三团在田家峪歼灭日军武岛中队，创造了冀东部队第一次成股全歼日军的战绩。十二团连克玉田鸦鸿桥、丰润三女河、任各庄等据点，给进剿之敌以重创。这样，不仅粉碎了敌人的“扫荡”，还“将三块不相连接的游击区形成为地跨11个县份的广大游击区，并在这广大的游击区中创造了较巩固的游击根据地”②。

①中共平北地委《为粉碎敌寇“扫荡”的布置及争取反“扫荡”的胜利的指示》，1941年9月10日。

②中共冀热察区委冀东分委：《一九四一年夏季反“扫荡”的经验教训与冀东今后的武装工作》，1941年11月18日。

9月，日伪军又在平北地区进行了两次大“扫荡”。11日，敌人纠集密云、丰宁、滦平等地日伪军共4000多人，步骑配合，对丰滦密游击根据地进行了78天的大“扫荡”；另一次以1500余兵力，分四路“扫荡”大海陀山区。这两次“扫荡”都采取了多头并进，合围聚歼等多种战术，残酷的施行烧杀，妄图消灭或驱逐平北八路军，摧毁新生的抗日政权。平北军分区指挥所部十团和游击支队，采取避强击弱、内外线结合的反“扫荡”方针，连续作战37次，毙伤敌伪军600余人，夺取了反“扫荡”的胜利，开辟了大片新的游击区。

第二次是1941年的夏季大“扫荡”。这次“扫荡”是从平北地区首先开始的。

日本侵略者为确保华北，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从年初开始，连续分区“扫荡”平北根据地，均被平北军民所粉碎。到5月初，敌人又从各据点抽调2200多日军和2300多伪军，向平北中心区“扫荡”。平北军分区主力在当地游击队配合下，内外线结合，给进剿军以打击，经一个月的战斗，粉碎了敌人的“扫荡”，缴获战利品一部。

6月，敌人又在冀热边地区发起空前规模的大“扫荡”。这次大“扫荡”与以前的“扫荡”不同，是在日军华北最高指挥官直接指挥下，有关东军和满洲军配合，经过详细计划和周密部署的统一军事行动。敌人从冀中及东北调来华北军、关东军各一旅团，配合2万伪满军，连同治安军共达4万余人，进行空前规模的大“扫荡”，妄图一举摧毁冀热边各抗日游击根据地。对此次“扫荡”，冀东的党和军队虽早有准备，但被敌人故意做出的一些假象所迷惑，以致滋长了麻痹情绪。6月1日，敌人突然袭击，冀东主力部队被压缩在玉田以南，运河以北的狭小地域内，当发现这种不利形势，决定分散突围时，早已陷入几十倍敌人的重围之中。十三团经过杨家套南、杨家板桥、鲁庄子等数次激战，在杀伤500多敌军后，李运昌率一营突出重围，军分区机

关和二营、特务连，被敌拖住，只好插枪潜伏，人员大部脱险，枪支大部损失。十二团一营在大韩庄与敌苦战竟日，杀伤敌200余后，营长杨作霖以下200余名指战员光荣牺牲。6月2日，十二团团长陈群中炮弹牺牲。这次空前规模的大“扫荡”，使冀热边军民蒙受了重大损失。经受了一次严峻考验。

第三次是1941年秋季，主要在北平地区。本年7月，冈村宁次就任侵华日军华北最高指挥官，8月就策划了对北岳和平西根据地的“铁壁合围”、“梳篦清剿”等残酷的大“扫荡”。同时，伪满制定了《西南地区肃正工作实施纲要》，把丰滦密长城沿线山地作为实施“肃正”计划的三个重点区域之一。10月4日，华北日军和伪满日伪军达万人，联合对平北地区进行了60天毁灭性大“扫荡”，敌人首先集中密云、古北口、渤海所等主要军事据点的兵力，然后分兵由东向西，由南向北，交插反复“扫荡”、“清剿”，并将东起半城子，西到渤海所，南从白道峪，北至于营子，四面各长约120华里的广大地区划为“无住禁作地带”，实行惨无人道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这次大“扫荡”，尽管事先平北地委做了很好的准备，但由于敌强我弱，仍受到严重损失，共有八路军干部战士和群众431人被杀害，1112人被抓捕，烧毁房屋25581间。丰滦密的平原根据地几乎丧失殆尽，山区根据地所剩无几，丰滦密游击根据地的斗争进入了困难时期。

除了几次大的“扫荡”外，在冀热边地区零星的“扫荡”几乎无日不有。同时，日伪的大“扫荡”总是与大屠杀联系在一起的。1939年9月，八路军游击队将无恶不作的兴隆县南双庙警察分驻所所长刘贵才抓获后处决，日伪军进行报复性“扫荡”，残杀22名无辜群众，制造了“煮吃人心，百人吊孝”的惨案。

日伪军制造的大屯惨案更是令人发指。青龙县碾子峪乡大屯村（今属宽城县），座落在燕山深处长城脚下的长河北岸，在迁青平联合县第五区境内。早在1939年大屯人民在游击队长周治国

的组织下，组建了反满抗日救国会，翌年成立了党支部。1941年1月末，周治国游击队在大屯人民配合下，一举拔掉了三道关据点，毙伤日伪官兵多人，缴获大批枪支弹药。2月10日，青龙县警务科长铃木（日人），纠集青龙、喜峰口等地300多名日伪军，突然包围了正在酣睡的大屯人民，立时炮声、枪声四起，村里浓烟滚滚，火光冲天，随之敌人端起刺刀，提着油桶一起闯入各户，见房就烧，见人就杀，顿时，大屯成了一片火山血海。大屯人民在党的地下工作者张永保和党支部成员的领导下，纷纷拿起菜刀、斧头、镐把、铁锹等器具，同敌人展开了厮杀格斗，有的咬住敌人的手指，有的卡住敌人的脖子，有的砍坏了敌人的双脚，给敌人以杀伤，但终因寡不敌众，全村460口人，只有200多人突出重围，178人惨遭杀害。全村共烧毁房屋535间，烧死毛驴10头，猪120口，粮食30多万斤。

日军在大屯制造骇人听闻的惨案，更加激起了大屯人民无比仇恨，他们在党支部的领导下，一面重建家园，一面开展对敌斗争。惨案后的第3天，就有10名青年参加了八路军，村抗日救国会、妇救会等群众组织很快得到恢复，配合游击队不断打击日本侵略者，用鲜血和生命捍卫家乡田园。

三、大规模开辟热南

1941年的夏季大“扫荡”使冀热边地区的党、军队和人民蒙受重大损失。8月，冀东区党分委和军分区召开大张屯会议，总结了反“扫荡”失利的经验教训，着重检查了对冀热辽地区战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认识不足，不懂得隐蔽发展的重要性，忽视了对山地的开辟等反“扫荡”指导思想上的错误，记取了麻痹致遭重大损失的沉痛教训。会议根据苏德战争爆发后的形势，着重研究了如何巩固和扩大根据地，特别是热南根据地问题。因此，会议决定，在恢复和巩固原有根据地的同时，大力开辟热河新区，建立基层政权，以扩大回旋余地。

所谓热南，主要指与河北省接壤的热河省南部兴隆、青龙、凌源等县，有时也把热中的平泉、宁城，热西的滦平、丰宁等县划入其中。这里由于日伪长期摧残剥夺，人民生活十分困苦。尤其是日伪的经济掠夺手段更为残酷，一切生活用品都实行“配给”制，粮食、食盐、火柴、石油、棉花、布匹奇缺。多数农产品每年收入交去租税和“出荷”粮食，余下的不够半年吃用，靠糠菜和树叶充饥，衣着更是褴褛不堪，很多农户全家只有一床破旧的棉被，十七、八岁的姑娘没裤子穿。在这种痛苦生活的熬煎下，人民盼望八路军的到来，真如大旱之望云霓。

热南地区 经过1938年四纵队挺进、1939年第二、三支队的工作和1940年阁老湾会后的三期开辟，已有了相当的工作基础。大张屯会议后，先派出由周治国领导的青平工作团和游击队，出喜峰口向滦河东岸青龙、平泉方向发展。又组织以高敬之为团长的长城工作团和游击队，出长城沿滦河西部向西北发展。在很短的时间内，两支远征工作队就深入到天桥峪、黄花川、车河川、柳河川、暴河川一带，开辟出大片隐蔽区，并在沿线建立了长达百十里的秘密交通线，为主力部队活动开辟了道路。1941年秋，由李运昌亲自带领十二、十三团各两个营及地方干部共3000多人，分数路越过长城，与周治国、高敬之两工作团紧密配合，大规模开辟热南新区。

这次开辟热南山区，事先就做好了周密计划，根据敌人在军事上占有绝对优势的特点，主要采取隐蔽开辟的方针。具体做法是：（1）不是大部队作战，而是以排为单位，和工作团人员一起分散做武装宣传工作，争取群众，力求站住脚。（2）执行通商自由和武装保护“走私”的政策。由于敌人的贸易封锁，热南人民生活极为贫困，生活必需品极度缺乏。在开辟时，不仅部队干部、战士都带着大量布匹、食盐、火柴、针线和剪刀等日常生活必需品，随时发给群众，或换取部队所需的粮食；而且夜间在要路放哨，武装保护商贩出入关内外进行贩运活动，发展历史

上就非常密切的关内外贸易，受到群众、商人的广泛拥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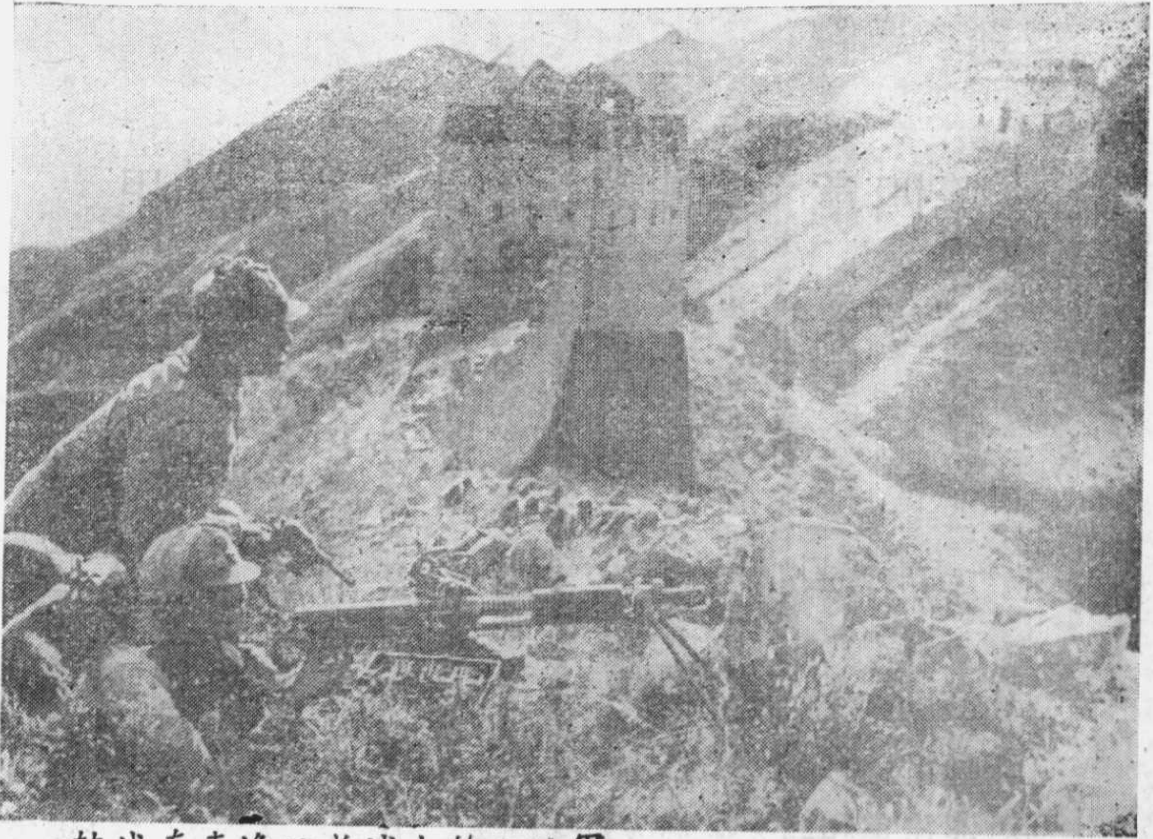
(3) 在部队和干部中开展节衣缩食活动，救济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灾民。有时见到那些穿不上衣服的老人、孩子，战士们当场脱下多余的衣服，给他们穿在身上，群众非常感激。

(4) 严守部队纪律，经济纪律，部队吃老百姓粮食开条子，由地方政府按条子付现款，坚决不扰民，以建立政权威信。(5) 为不惊动敌人，暂不打敌据点，对伪军伪职人员，则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共同抗日”为号召，积极争取他们。对在日军淫威下做事的伪职人员，一律不捕不杀。对极个别真心忠敌分子，则千方百计争取他们的家属。这样，许多伪军伪职人员与八路军保持相安，并开始与抗日武装建立联系。

由于政策对头，方法得当，这次大规模开辟热南的斗争，只进行了4个月时间，就把西起雾灵山，东到都山，北到锦承铁路，南临长城，有40多万人口的广大区域开辟了出来，并开始向锦承铁路以北的敌人深远后方挺进。从此，雾灵山周围与冀东、平北根据地和游击区基本上联成了一片。

这次大规模开辟热南，使日伪大为震惊和头痛。当冀东主力部队不声不响地分散开赴热南，敌人尚未觉察之际，他们大吹大擂：“八路军都没了，就剩下18个人在长城上哭呢！”“八路军已不足为患了。”当热南大片地区被开辟出来后，敌人又如大梦初醒，深感头痛地说：“由于八路军地下策动极为巧妙，待表面出现某些征兆时，往往已经无法对付了。”

1941年底，日本关东军和华北日本驻屯军大部撤离冀热边，由23个团的治安军3万余人接替他们在冀东的防务。这时，冀东军分区司令员李运昌，在青龙县王厂沟根据地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部队回师关内，发动打治安军的战役。这一战役前后4个月，共歼敌7个整团，毙俘敌伪5000余人，缴小炮、迫击炮12门，重机枪9挺，轻机枪63挺，长短枪3000余支，取得了重大胜利。从此，冀热边已发展成有5个联合县、150多万人口的重要抗日游击根据地。



转战在喜峰口长城上的八路军



塞外篝火 图为转战在热南山区的八路军

第四章 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千里

“无人区” 热河军民艰苦卓绝地

反“集家”斗争

第一节 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的千里“无人区”

一、“无人区化”政策的提出和实施

1941年12月8日，日本帝国主义偷袭了美国珍珠港，同时还分别对菲律宾和马来半岛发动了进攻。从此，太平洋战争爆发。

为了保证太平洋战争的实施，日本军本部早在本世纪20年代就提出了“在对美作战上，满蒙是补给的源泉”的论断，并以此作为其“大陆政策”的核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保持后方基地的稳定和最大限度地掠夺战争物资，对伪满洲国这块殖民地，疯狂地进行法西斯统治。1941年，伪满洲国发布了所谓“战时法令”，宣布“满洲国处于战争状态”。同年12月，伪政府发布《治安维持法》，宣布对于所有的变革或否定“国体”为指导的人都要处以死刑或无期徒刑。尽管如此，仍然难以扼杀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特别是冀热察边界地区人民的武装抗日斗争的烈火，越烧越旺，一直烧进了它的“后院”，使得日伪当局日夜惊恐不安。于是，日伪当局为确保满洲，“头等要紧的事是无论如何首先做到民匪隔离”，以日本关东军为主，在伪满洲军、伪蒙疆军和华北方面军的配合下，在冀热察边界地区推行了一项最残酷、最野蛮、最毒辣的“集家并屯”政策。从1939年秋起到1944年春止，在东起山海关以西的九门口，西抵独石口以北的老丈坝的千里长城线上，在宽32~250公里的广

大地域内，一手制造了世界罕见的千里“无人区”。冀热察边界地区的抗日战争进入了最困难时期。

热河的千里“无人区”，总面积约17万平方公里，人口140余万。这主要包括三个层次：一是“无住禁作”地带，即不准住人、不准耕作、实行彻底杀光、烧光、抢光的区域，主要是长城沿线的冀热察三省边界及热中一带敌人无力控制的深山区，总面积约8500平方公里，这是狭义的“无人区”。二是“集团部落”，即在平地大川地域修建有围墙、有武装看守的“人圈”，把居民驱入“人圈”，没有行动自由。被集家的自然村1.7万多个，共造“人圈”2506座。三是“无住禁作”地带和“集团部落”之间的“禁住不禁作”地带，一般在“人圈”的3~5里之内。

在热河推行“集团部落”政策，推行“集家并村”，搞“无人区”化，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一项国策，是有计划、有目的的发动的一场特殊战争。它的提出和实施经历过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日本帝国主义者制造的“无人区”化，起源于东北。早在1933年12月3日，伪满洲国民政部就发布了“集团部落建设”文告，在吉林、奉天、间岛等省的13个县重点推行了“集团部落”政策。1935年，敌伪开始在东边道大力修筑“集团部落”，到年底已修筑1172个，并强迫农民离开世代耕作的土地和田园，迁往指定的“集团部落”，将原来的村庄一律烧毁，将拒绝搬迁的居民杀尽，以达到把群众与抗日武装割离的目的。日伪就是用这种残酷的办法，持续5年多，把东北抗联武装的主要根据地基本上搞掉了。

以后，随着热河人民抗日战争的兴起，“无人区”化也逐渐南移。1936年7月，日伪在朝阳地区大黑山进行烧杀抢掠，实行“集家并屯”，在郭家湾修筑了“人圈”，用这个办法又搞垮了坚持6年之久的兰天林领导的抗日灭满救国军及其他人民抗日武装。

日本帝国主义在冀热察边界长城沿线制造“无人区”的行动，早在1939年就开始了，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39年秋到1940年秋为局部小集家阶段。当时，冀热察边界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有了新的发展，抗日战火烧进伪满洲国，把伪满洲国“西南国境”打开一个缺口，插进几个楔子，使侵略者有一种危机感。1940年4月17日，承德日本宪兵队队长早川唯一，在向日本宪兵总部报告“西南边境”的危急情况时说：“敌方为了死里求生，以全面游击战相呼应，又对民众及武装团体施展了阴险的手段，而且越来越积极顽强的，或以巧妙的抗日救国宣传和武装威力并用，或以激发民族运动之裂痕为基调而策划动员民众之抗日斗争。军政两方面的工作则专极力扩大和加强赤色地盘。”^①当时，日伪为扑灭刚刚燃起的抗日火焰，在五指山游击区的腹地实行了小集家，将黑河上游、兰旗营北山和横河北山20多个村落的居民，集中到孟大地、杨树台、鞍子岭等“部落”。同时，日伪四五百人到横河北山的14条山沟“扫荡”，把这一带的1500多间房屋全部烧毁，大部粮食烧光，有500多名群众被赶入集家村。到1940年秋季，在抗日游击队的帮助下，大部分群众才得迁回原地。

这个时期的“无人区”，虽然规模较小，范围不大，尚不属于统一计划下的统一行动，但已是伪满大规模制造“无人区”的前奏。

第二阶段，从1940年秋到1941年10月为制订计划和试行阶段。这期间，冀热察边界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迅猛发展，冀东、平北、热南三大块游击根据地连成一片，抗日政权下的人口由120万发展到160多万（不包括平北）。日伪即在兴隆县的冷咀头、大小黄崖、横河上游等八路军经常活动的深山腹地推行大范围的小集家，并在“部落”里设警察分驻所，由1名日本人带领

①《有关满洲国各论、承宪兵大队本部文件的敌档》第54页。

20多名警察长期驻守。1941年春，“人圈”里闹瘟疫，光兴隆县羊羔峪“人圈”就死了400多人，占人口总数的30%。驻守的日本人松山也患了病，只好撤走。这样，群众又推倒了围墙，搬回了深山区。

1941年9月，热河日本宪兵本部对冀热察边区活跃的抗日游击战争再次告急，并提出了《灭共对策资料——国境地带无人区化》的文件，决心在所谓“大满洲国西南国境线”上大规模地制造“无人区”。10月，在关东军西南防卫司令官大村的主持下，制定了《西南地区肃正工作实施纲要》，要求从山海关到古北口的长城线900公里范围内，将从长城一线起32公里地区定为无住禁耕地区，拆毁和烧毁民房，将村民迁走。为容纳上述地区居民，在安全地区建设“部落”，^①从而，使在热河制造“无人区”的计划全面形成。

与此同时，日伪任命“满洲国”治安部地方处处长岸谷隆一郎出任伪热河省次长。岸谷是率先提出“治安肃正”、“集家并屯”方案并在东边道推行集家并村血腥政策的罪魁之一，也是围剿和屠杀东北抗日联军杨靖宇将军的刽子手之一。他到任不久，立即请求将前通化省省长、汉奸姜全我调任伪热河省长，通化省警务厅长皆川（日本人）调任伪热河省警务厅长，前通化省协和会长仓胜（日本人）调任伪热河省协和会长，组成了以在东边道共同推行“无人区”化同僚为核心的伪热河省政权。以后又陆续调入大量的伪满军和警察讨伐队，准备在“西南国境”上大规模实行“无人区”化。

这些杀人魔鬼到任后，就迫不及待地在地热河西部的丰滦密地区试行“无人区”化计划。他们先是集中1万多日伪军进行大“扫荡”，然后将东起半城子，西到渤海所，南从白道峪，北到于营子的总面积约3600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划为“无住禁作”地

^①日本出版的《满洲国史·各论》。

带，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共修建了93个部落。同时，在丰滦密南部，强迫群众沿山边挖宽3.6丈，深1.6丈的封锁沟，仅在怀柔境内，西起沙峪口，东到大风峪，全线达40公里。这也是在长城沿线大规模集家并村之始。

第三阶段，从1941年11月到1944年春，是大规模集家并村阶段。这次大集家，实质上是日伪军对冀热察边界地区数百万人民发动的特殊战争，虽然敌人兵力增加到10余万，但仍无力在长1000多公里的长城沿线同时动作，只能采取伪满、华北和伪蒙疆三方协同行动的办法，长城内外并进，以滦平、兴隆、青龙为重点，由西向东逐次推进。就这样，还是经过两年多的大屠杀，才基本建成。

首先开始的是从独石口到古北口的西部地区，在古北口设立了西南防卫司令部分部，增调关东军一七四部队、伪满军第八旅和3个讨伐大队。除由渤海所到半城子的大块“无人区”外，1941年12月，又将秋场、大地、琉璃庙等丰滦密北部山区的123个村、498个自然村，总面积约500平方公里的地方划为“无人区”，将3万多人口驱赶进99个“人圈”。1942年初，将丰宁县黑河地区南起古子房，北到老丈坝头约100多公里的广大地区划为“无人区”，后来又将整个黑河川全部划为“无人区”，前后修筑了64个“人圈”。6月，伪蒙疆自治政府又将以大海陀山为中心的广大区域划为“无人区”，并与黑河川、汉河川的“无人区”相衔接，构成了沿古长城走向的一条宽大封锁线。紧接着就在滦平县普遍实行集家并村，划出230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8.7%）的“无人区”，将24万多人，全部赶进543个“人圈”之中。

从古北口到喜峰口的中部地区是从1942年4月开始大规模“集家”的。兴隆县日伪军接到大规模集家并村的命令后，即组成“社会调查队”，由副县长西山（日本人）等带队，到各村调查居民的人口、牲畜、家具、房屋等情况，然后召集各方面头目

和19个大村的村长开秘密会议，策划“无住禁作”地带和“集团部落”地址。同时，集中全县25个讨伐队，9000余人进行大“讨伐”，首先将大小黄崖、狗背岭游击根据地划为“无人区”，实行“集家并村”。

在长城内侧的冀东，敌伪也从4月开始，用武力驱赶当地群众挖封锁壕，由于八路军动员群众采取怠工、白天挖晚上平等反挖沟斗争，整个工程进展缓慢。8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岗村宁次在北平召开会议，策划对冀东的“五次治强”大扫荡和修建长城内侧的“无人区”、“惠民壕”。9月，在敌人大举“扫荡”的同时，将东起迁安县建昌营，西至遵化县石门镇，长100余公里，宽约4公里，总面积约640平方公里的地域划为“无人区”，200多个村庄，约10万人口被赶进“人圈”，有200多人由于拒绝进“人圈”而惨遭杀害。还从山东、冀中等地调来大批民工，加上当地群众达二三十万人，挖了东西4道、南北4道、宽深各5米的封锁沟，然后沿沟建碉堡，分驻伪军。这样，不仅割断了关内外的联系，还把基本区细碎分割，其目的在于从根本上摧毁抗日武装和抗日组织。在伪燕京道，东起蓟县的壕白村，西抵昌平的桃义口的数百里的长城内侧也构筑了多条沟壕、封锁线，把盘山、鱼子山、云蒙山三块抗日游击根据地，分割包围起来，许多地区被划为“无人区”，仅蓟县就有157个村庄被制造成“无人区”。

1943年3月——6月，日伪集中人力，统一行动，在兴隆全县疯狂大集家，那真是“山火连四月，天地昏百里，千村一片黑，万户闻鬼泣”，将11万多人（占全县总人口的81%）赶进199个“人圈”。制造“无住禁作”地带1195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72%）。

从喜峰口至山海关附近的东部地区，从1942年就开始了局部的集家并村活动，大规模的集家并村则是在1943年秋。敌人从春天就开始向青龙县大量增派兵力，实行小范围集家。秋天时又调集锦

州、唐山、承德、秦皇岛的万余日伪军，对凌（源）青（龙）绥（中）、承（德）平（泉）宁（城）抗日游击根据地 进行大围剿，普遍推行集家并村，以上两个抗日联合县有4527个村庄被摧毁，42万多人被赶入831个“人圈”，把西起清河沿，东到义院口的120多公里的长城沿线地域划为“无人区”。在宽城则把西起燕子峪、东到华尖长达50多公里的深山区划为“无人区”。这期间，日伪军在热河内地的隆化、围场、凌源、建昌、喀左等地也划了多块小块“无人区”。

由于冀热察边界地区军民激烈的反“集家”斗争。许多“人圈”都经过修了拆、拆了修的多次反复，到1943年底，伪满洲国政府宣布完成武力集家并村的计划。但实际上并未完成，热河人民反“集家”的斗争，又以新的形式更广泛地开展起来。

二、杀光、烧光、抢光的“无住禁作”地带

“无住禁作”地带，就是在高山、峡谷、沟壑、密林等地形复杂和抗日游击武装活动活跃的区域，绝对禁止一切居民居住、耕作，以利于随时发现任何活动目标，进行军事围剿，切断抗日游击武装与人民群众的联系，铲除八路军游击队的活动屏障。

当时的热河，是一个十分落后的山区农业省份，大部分居民错落分居在沟壑山梁上，生产力低下，生产手段原始，依靠广种薄收来维持最低的生计。

1942—1943年，伪热河省当局在日本关东军的操纵下，在热河省全境沿长城线划出了近1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为“无住禁作”地带，强迫百多万世代在这块土地上居住、耕作的农民，必须在数日中将家搬到指定的“部落”中去，这无疑夺去了他们的生路，等于把人民驱向死亡的深渊，必然要引起强烈的反抗。故此，

“无住禁作”地带从一开始实行，日伪军警就施以野蛮残酷、灭绝人性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

杀光：日伪当局在“无人区”中的屠杀有两种，一种是对“无住禁作”地带的“大扫荡”；一种是对“集团部落”中的“大检举”。日本关东军曾给所有的军事武装下过严格命令，凡在“无住禁作”地带发现任何有生命的东西，都可以“格杀勿论”，甚至连一只狗、一只鸡也不放过。

1941年10月，伪满和华北日伪当局出动万余兵力对丰滦密地区进行毁灭性“扫荡”，前后60天时间，杀害群众和抗日武装430余人，抓捕1100余人，滦平县快活峪村被划作“无住禁作”地带后，初次扫荡达50多天，32位不愿离村的群众被杀死。从这以后，快活峪一带就再不准中国百姓进入，农民孙怀清回自己的地里掰了几穗玉米，被敌人发现后枪杀。农民张家书的女儿张小冬在山上拾柴，亦被打死。象这样被零星杀死在自己世代耕种的土地上的农民，仅这一个自然村就有14人。更残酷的是，这年10月，这个村的卢文清、卢文光、尚文德等18名村民回村收割庄稼，被关东军和讨伐队得知全部逮捕，经严刑拷打后一个个推入土坑开枪射杀，再往人堆里投掷手榴弹，最后，日伪军还跳入大坑中用刺刀过“筛子”。18人中，仅有5人幸免一死，其余13人当场死亡。

兴隆县是日本关东军推行“无人区”化的重点地区，1942年以来，调入日军山田队300余人，“满洲国”兵三十四团、十二团、步兵八团、步兵三团、步兵二十四团约8000人，省属警察讨伐大队10个，约4500人，加上县属警察讨伐队7000人和日本驻军881部队千余人，计2.1万余日伪军。^①当时，兴隆县仅3万户居民15.7万余口人，几乎平均每个武装士兵对付1.4户人家或7.5口和平居民。而在敌人重点进攻五指山根据地时，则合3个敌人对付1个老百姓。据承兴密联合县武装部统计，日伪在集家过程中，向雾灵山、狗背岭根据地出击438次，其中较大规模的

^①兴隆县委党史办：《兴隆“无人区”里的抗日根据地》。

扫荡就有50次，出动兵力达3.7万多人次。日伪军对于不离开“无住禁作”地带的百姓，象狩猎一样追逐杀害，然后割下耳朵，串在铁丝上回去领赏。1943年以后，全县的“无住禁作”地带，除了坚持山地游击战争的抗日军民外，连大小牲畜都被屠杀得干干净净。羊羔峪村张村长养着一只劫后余生的小猪，每当山头报警，它就立即从圈中窜出，乖乖地跟在人们后面跑。1943年初，仪兴隆县中田、上庄、大小黄崖等9个自然村，一个月中就被杀死723人。有名的杀人魔王黑烟股长，被群众作为吓唬儿童的工具。每当有小孩啼哭时，说一声“黑烟股长来了！”啼哭声马上停止。

青龙县花厂峪村是凌青绥抗日联合县所在地，该村全体村民坚持不离开“无住禁作”地带，170户人家的村庄，从1943年开始，3年中被杀害了86人。

宽城县王厂沟、转水汀、石子沟、美界村、瀑河口等9个自然村被划作“无住禁作”地带后，在1943年4月至11月的8个月中，遭到日伪军7次大屠杀，被杀害男女老少71口。农民刘殿甲一家7口，被抓住的6口全遭杀害，其中5口成人被枪杀，一个17岁的孩子被头朝下夹在树上夹死。农民关贞瑞一家老少三辈6口，祖父被挖出双眼后砍死，父亲被枪杀，11岁的哥哥被劈成两半，4岁的弟弟被摔死，母亲被轮奸后豁开胸膛，唯有她被敌人捅了3刀后倒在死人堆的血泊里幸免一死。

烧光：为了最快、最有效地摧毁“无住禁作”地带居民的生存条件，日本关东军和讨伐队将一切建筑物、庄稼、生活用具等资料，凡抢不走的均予以烧光毁净。

龙赤联合县的黑河川，是热河省与华北、蒙疆的结合部，1942年，关东军率先在该地区千松台一带划出“无住禁作”地带，将30多个自然村250多户人家迁往千松台子一个自然村中，没按时搬走的所有建筑物连同生产、生活资料全部放火焚毁。1942年，该村于二丑偷回故居种地，竟被敌人连窝棚带人一起烧掉。

兴隆县驴儿叫村，地处雾灵山腹地，山大沟深，也是建党最早

的地区之一，群众一直坚持山地抗战，日伪军对此恨之入骨，每次围剿都要放火烧山。从1941年至日军投降，驴儿叫村被焚毁过22次，到最后，驴儿叫村的房屋全部是石头垒的“马架子”，有柱子没墙，顶上盖茅草，连炕都是青石板上铺桦树皮。

青龙县抗战初期有房屋13万余间，被毁8.7万余间，其中抗日根据地的368个村庄的房屋2.7万余间，被烧得片瓦无存，一片焦土。

长城内侧，由日本驻华北方面军一手制造的“无人区”，在驱赶百姓离开“无住禁作”地带时，全部采用的是火烧。日军驻防唐山的第二十七步兵团团长铃木启久战后供认了他乘飞机巡视长城沿线的情况：

“飞机一直沿着长城线向西飞，向南拐，逐渐飞到迁安县北部山区来了，从这里，美丽绿色森林出现了烧焦的黑点点。

“当然庄家院是一个也没有了，和平的村庄现已变成焦土。焦黑的炉灶，烧掉半倒塌的墙壁等都满怀仇恨地寂寞地呆在那。潺潺细语很舒服绕村庄流着清晰小河。现在被烧焦的木头块、破布、树叶堵塞住不能畅通。到处是汽油。

“当然一个居民也没有，变成无人烟、无表情的土地，过去曾经有过那样多的家禽。现在是一头猪崽也看不到了，每逢清晨报晓的雄鸡声也听不见了。就这样，这块土地在可怕的沉默中变成了怀恨愤怒的土地。”以上这一次行动，就烧毁31.9万户民房，山场、森林则无法计算。

日军为使“无住禁作”地带更加便于控制，在烧毁一切建筑的同时，还大面积纵火焚烧复杂地区的森林。1943年3月至6月，关东军和伪满讨伐队在兴隆县出动2万余人，再次驱赶百姓离开“无住禁作”地带，在五指山区、大小黄崖、狗背岭3块抗日游击根据地放火烧山，致使山火连绵4个月不息，数百里天昏地暗，参天的森林化为焦木，满山的灌木化为灰烬。

特别在冬末春初，山区气候干燥，季风正起，日本关东军则乘机放火烧山，从开始实行“无人区”化到日本无条件投降，热

河全省每逢此季，长城沿线即山火连天。铃木启久还供认：“在下面，树林中有很多烧焦的黑印。很多地方大火一直在烧入森林，把村庄附近的森林烧成长方形椭圆形的黑印。看起来是有很多住户过去在这里，不过现在只有痕迹。树林中几处还有淡紫色和白色烟丝丝上升。”

抗日战争胜利后，长城两侧一片焦土，唯有长城屹立在光秃秃的山背上。据中国解放区临时救济委员会晋察冀边区分会公布的《日本法西斯8年来在边区的暴行》统计，冀热边区在抗日战争期间被烧毁333.5万多间房屋，其中热南山区的“无住禁作”地带占205.6万多间。至于被焚毁的森林、农作物，则因面积大，数量多而无从考证。



抢光：在“无住禁作”地带，除杀光、烧光之外，还有抢光。粮食、牲畜、农具、衣被等生产、生活必需品是第一个抢劫对象。据冀东党组织的资料统计，抗战期间，冀热边区被抢走的粮食超过103亿斤，马、牛、驴、骡6万头，猪、羊200万只，农具18万件，被服320万件，至于其中到底

图为日军正在烧毁民房

有多少是在推行“无人区”化时期劫掠的，因战争残酷无法留下记录，但1946年1月20日中国解放区临时救济委员会晋察冀边区分会公布的《敌伪烧杀抢掠统计表》很能说明问题，仅以富庶的冀中区与贫困的冀热边区比较，冀中被抢掠的粮食为78.78亿斤；尚比冀热边区少20余亿斤；冀中被抢的猪羊为37.8万只，仅接近冀热边区的六分之一。就因为冀热边区大片土地被划作“无住禁作”地带，才遭到如此疯狂的掠夺。对此，承平宁抗日联合县政权有过一个较具体的统计，该地区实行“无住禁作”地带期间，就有1.2万头大牲畜、18万只羊、22万头猪被日伪军抢去，有4.5亿斤粮食被抢去或烧掉，有1.6万余件农具被抢走或烧毁。而承平宁地区的“无人区”化无论从面积和程度上来讲，远不如兴隆、青龙、滦平等县。据此推算，整个热河“无人区”中被抢掠的财产就可想而知了。

除去以上物资外，“无住禁作”地带中的任何物件都是被销毁的对象，石碾、石磨、水井、轱辘、水缸直至锅碗瓢勺等，全部被日伪军炸烂捣毁，凡划在“无住禁作”地带中的村庄，满目废墟，遍地残骸，连断壁残墙都被全部推倒捣毁。1943年以后，兴隆县坚持山地斗争的群众，每户仅剩有一口铁锅，做完饭后立即埋起来，以防被日伪军清剿抢掠。不少人家连饭盆、饭碗都没有，只好用桦树皮代替。冬季没有棉衣，更谈不上被褥，人们就穿单衣盖黄白草取暖。有个民兵于连海，是光着脚进雾灵山的，直到抗战胜利后他才穿上了鞋。

坚持山地游击战的八路军就更艰苦了。1942年秋天，冀东西部地分委书记李子光在雾灵山的“无住禁作”地带开辟工作，已经多日没有尝到盐味了，同志们从山沟里拣到些大芸豆，专为他放了些盐煮了煮，他感到同志们都没吃到盐，随即将芸豆每人儿颗分给了大家。吃糠咽菜苦，可有时有了糠菜加工制熟更难。碾子、石磨、锅、碗都被炸毁了，坚持抗战的群众就用石臼脱壳捣粮，用日本钢盔煮饭，在青石板上烙饼，挖土坑当灶，把南瓜瓢

掳去做瓢等等。

对于“无住禁作”地带的青苗，敌人更是从不放过。从实行“无人区”化后，日伪军和讨伐队即每年几次按节气到“无住禁作”地带去割毁青苗。在丰滦密联合县，仅1942年7月，敌人一次割毁“无住禁作”地带的二区、五区、七区三分之一的青苗，其中莲花瓣、化石峪、大牛圈、西口外、黄峪口、孟思郎峪等村的庄稼被全部割光。敌人的目的就是为了毁灭一切能够使人生存的条件。

三、人间地狱——“集团部落”

日本帝国主义推行“无人区”化这种特殊的战争，同帝国主义发动的其他侵略战争一样，不是以杀光人民为目的，而是为了奴役人民。故此，推行“无住禁作”地带，实行集团部落，最终目的是达到“匪民分离”。

部落，是日本封建时代贱民聚居的地方。“集团”则是“组织”起来，加强控制的意思。实际上是一座座集中营。1942年10月29日，热河日本宪兵队队长在《热警情发第324号》报告中，对集团“部落”作了解释：“鉴于冀察热国境地区当前的形势，其治本上第一要谛，无论怎么说也是匪民隔离”。“所谓集家，是为了把可能成为敌人游击区的国境地区的住民，集结到我方据点及附近地区，使之完全与敌人的活动隔绝，由我方掌握，从而封锁扼杀敌人所谓人力物力的动员工作”。“这样切断其与民众联系的纽带，救命之纲绳，此实致命之打击。”

该报告还对推行“集团部落”作了进一步的论述：“孙子兵法云：伐人之计，上兵伐谋，其次伐交……所谓伐交，即攻伐支援敌人之第三者。在这里谈，即对民众予以讨伐，把支援敌人的民众从敌人手中争取过来，而归顺于我方……，集家之作最大意义即在于此……。”

出于这种战略考虑，日本关东军和华北方面军协同动作，将“西南国境”两侧划入“无住禁作”地带的绥中、凌源、建昌、

宁城、平泉、青龙、宽城、兴隆、承德、滦平、隆化、丰宁、赤城13个县的18万多个村庄，武装合并为2500多个“集团部落”，强迫140多万人口聚居在不到过去五分之一的土地上。

各地的“集团部落”的规模和设施不尽相同，按日本关东军1935年在东边道推行“集团部落”的设计，通化地区“部落”多为100米见方，每个“部落”居住350人左右，平均每人约28.5平方米。故此，该地区的“部落”往往还有比较齐全的生活设施。而热河省在1942年推行“集团部落”时，太平洋战争日益不利于日方，关东军精锐大批南调，日军在“满洲”已经失去了1935年时的军事优势，殖民经济也濒临崩溃边缘，只得把越来越多的人口驱赶进“人圈”，当地的老住户尚能在原来的宅基上挤缩，后迁进的居民就只得“见缝插针”，人和牲畜混住在一起了。

热河实行“集团部落”所限的时间，多则10天半个月，少的不准超过3天，被强迁的居民根本来不及拆走原来的住房，更无力运输建筑“部落”里新房的建材。“集团部落”除去四周的围墙和日伪军的住所是经过精心修建的外，老百姓的房屋几乎全是仅能避风雨的马架窝棚，甚至很多人家就是在地上挖个坑盖上点茅草。塞外的冬季，长达5个月之久，一遇寒流，飞雪漫漫，寒风呼啸，气温常降至零下二三十度，冻死人的事屡见不鲜。夏季，由于人的吃穿拉撒都被限制在很小的范围内，加之所有的牲畜、家禽均混杂其间，“部落”里到处都是粪便、污水、泥泞，苍蝇、蚊子、臭虫、虱子、蟑螂、老鼠恣意肆虐，伤寒、痢疾、疟疾等疾病无不泛滥。1943年夏，兴隆县各“部落”开始大规模流行瘟疫，一次死亡6000多人，靳杖子“部落”一天就死亡40多人。青龙县老李洞“部落”，共计千余口人，一年病饿死200多口。该县官厂“部落”2400口人，两年病死530多人，接近其总人数的22%。

为了达到奴役中国人民的罪恶目的，日伪当局对“集团部落”完全实行的是集中营式的管理方法。在全热河境内，除各“部落”中大部分驻有日伪武装军事力量外，凡划“部落”的区

域均派驻了大批警察、宪兵和讨伐队。当时的建制是，村公所所在地设警察分驻所，配置伪警察二三十人（边远地区增设警防所），同时还驻有由各“部落”选拔的青年自卫团（亦称“部落团”）30~50人，在“无住禁作”地带的边界上，驻有满洲国军和讨伐队；在交通要道驻有日本宪兵、日军守备队。

对“部落”内的居民，则普遍实行联防组织（“村落总动员警备”）和联保组织（“保甲精神之普及”）。所谓联防组织，即是把“部落”内18~50岁的男性青壮年编成“自卫团”，轮流站岗、送情报，规定每个部落每天必须向伪警察分驻所送一次情报。青年还要专门接受军事训练。开始是每人发一根木棒，群众俗称“棍儿团”、“棒子团”，以后在抗日武装的打击下，又逐步增设了一些“武装部落”，直接给“自卫团”发了武器。所谓联保组织，实际上就是“保甲联座制”，30户左右为一牌，一家出事，全牌牵连。几牌为一个“部落”，几个“部落”为一甲。牌长、部落长、甲长均由日伪当局指定，“集团部落”中还普遍设有村协和分会，是由日本特务机关操纵的基层组织，除公开活动外，还秘密发展人员，暗中打探抗日武装的活动以及“部落”中居民的思想等情况。

有了这一整套的组织机构，日伪当局就将“集团部落”完全置于其军事、政治的控制之下，对“部落”居民任意实行残暴的统治。当时的各种罪名简直多不胜数，“国事犯”、“思想犯”、“经济犯”、“密输犯”、“通匪、济匪、资匪犯”等无所不有。例如：家里有茶缸、灰布、草绿色衣服，上衣有5个扣子，布鞋超过两双，就是“通八路”；谁有中华民国出版的书籍、信封、信纸、甚至不慎说一句“我是中国人”，就是“思想犯”、“政治犯”；家中有大米、白面、布匹、纸烟等物品，就是“经济犯”。对以上“罪犯”，轻的施以夏天晒太阳，冬天扒光衣服冻、跪石渣子、互打嘴巴等刑罚，重的则如：

“倒栽莲花”，即人头朝下活埋，行刑者眼看着受刑人双腿在外挣扎断气。

“军犬舞蹈”，令军犬将人活活咬死。

“滚绣球”，将受刑者扒光，塞进一只钉满钉子的木笼里来回滚动，直至死亡。

“电磨粉身”，用特制的电磨把活人磨成肉酱。

“枪戳沙袋”，将受刑者装入口袋里命新兵用刺刀劈刺。

“虾公见龙王”，将受刑者头脚绑在一起投入水中淹死。

“开膛取心”，即活剖人心，然后食用。据《兴隆县志》记载，双庙据点的日军中川曾吃过50多颗人心。

“钢针透骨”，用大铁钉往手指或头顶上扎进5寸至1尺。

此外，还有“烙铁烙”、“背火炉”、“打油锤”、“站木笼”、“皮鞭沾凉水”、“辣水涨肚”、“熏烧活人”等等，闻所未闻，残不忍睹，真是一座人间地狱。

1942年，滦平县伪县长张祥廉在吴栅子修建了一个模范“部落”，“满洲国”还特意派出一个大臣来检阅并拍摄了电影。张祥廉得意之余，为该“部落”做了一首歌：“自兴乡土部落建设完，自卫强化，男男女女责任担。不怕匪，不受难，大门小户保平安。钢枪洋炮手榴弹，铁锹镐头准备全。匪民分离两刀断，八路灭亡在今年。自卫团，自卫团，保护部落得安然。远打探，近防范，匪要来时发狼烟。大门番，内部巡查番，钢墙铁壁守卫严，哎！检索不容宽。夜间警备更要严，刮风下雨别偷闲。炮台射击班，马道扎枪端，群策群力保乡关，明朗的滦平与世万万年。”①

这首“马屁歌”虽然满篇胡言，但其内容却真实反映出日伪对“集团部落”的期望。统治者就是想通过严密的组织、高压、奴化等一系列手段，把“民众从敌人手中争取过来，而归顺于我方”，达到其“匪民分离”的目的。

“集团部落”内对人民还实行最残酷的超经济剥削。“满洲

①《暴行与血泪》第110页，承德地委党史办编。

国”的“组合制度”规定，“部落”居民所生产的农副产品除大部交给“组合”外，其它的实物税、捐款和日伪军敲诈达26项之多。

“粮谷出荷”，每亩土地缴粮1斗（每斗30市斤）；

“民生集谷”，每亩土地缴粮1斗；

“义仓粮”，每亩土地缴粮1升；

“地亩捐粮”，每亩土地缴粮2斤；

“地亩附加粮”，每亩缴1斤。

以上合计每亩地缴粮66斤。

“民生税”，每亩地2角4分；

“地亩税”，每亩地五角；

“地亩附加税”，每亩地2角5分；

“门牌税”，每户1元；

“协和会税”，每个成年人2元；

“牲口费”，驴4元、羊7角5分、牛马骡5元；

“出生费、死亡费”各2角；

“宰杀费”，猪4元、羊2元；

“材料费”，每亩地2角；

“兴农合作社股金”，每户1元；

“义款”，每户6角。

再次是伪军警的敲诈，因为实在无以为名，则称以“杂项税”：

“送草”，每甲3天1次，每次50至100斤；

“送柴”，每甲3天1次，每次500斤；

“送猪”，每甲每月3至10口，每口猪至少出净肉80斤；

“送鸡”，每甲每月5至12只；

“送礼”，宪兵队长结婚、寿辰，每甲70元；警察中队长以上官员，每甲30元；

“团员费”，每甲经常派两名“自卫团”到村公所听差，月需150元至200元；

“棍团费”，每甲抽10人受训，月需100元；

“劳工费”，每甲每月抽10人次到300人次不等，月需200元；

“村甲职员费”，每人月需100至150元。

除此以外，钢铁、皮张、蛋、蔬菜、杏仁、核桃等所有物品，都包括在支持“圣战”的“纳献”之列。

出于战术要求，“部落”全部修建在平缓地带，相隔最远不超过2小时路程，“部落”外方圆5里为“无住准耕”地带，5里外一律为“无住禁作”地带。这样，每个“部落”聚居的几百口人根本摊不上多少耕地。据平泉县统计，“部落”的荒地在30%左右，最多的达50%。1943年，该县124个“部落”有耕地34万多亩，荒废达8.8万亩，占26%，加之“部落”要日上三竿才开门，太阳落山就关门，遇有“敌情”还几天不准出入，那一点可怜的耕地更打不出多少粮食。据统计，当时热河省平均亩产不到80市斤，“部落”的生产水平就更低下了。但是，“部落”的各种捐税依旧照未集家时的生产水平和耕地面积收缴。如滦平县琉璃庙“部落”，原有3000只羊，两年后只剩下11只，纳税额仍按3000只计算。微弱的生产能力要负担如此苛刻的税捐，人民身上的一点油水也被榨干了。

“部落”的百姓要活命，只有靠当局的“配给”。当时“配给”的主要粮食叫“共和面”，是用橡子、高粱帽、豆饼、霉烂的粮谷等混合粉碎而成的，做饭时粘不到一块，吃到肚子里又排泄不出来，有人就是吃“共和面”后撑死的。“配给”的布是质量极差的人造纤维，一沾水就提不起来，人们称为“唾沫缎”。按规定，每户每年“配给”这种布7.5尺，白面1.8市斤，其余每人每天半斤的口粮均为“共和面”；每人每月盐7.5两；每户每月火柴1盒；每人每年豆油4两。这些物资本来就很难维持正常的生活，但不光伪满当局明里一减再减，而且县、村、甲、牌更是层层克扣，发到“部落”居民手中，已经所剩无几了。有的“部落”，从建立到拆毁，根本就没见到过“配给”的布，就是较好的“部落”，每年每户也分不到三四尺。很多“部落”的居民已经几口人才有一件能穿在身上的衣服，妇女多的人家只好挖“遮

羞坑”，大姑娘、小媳妇遇有人来，立即躲到土坑里去。龙赤联合县黑达营“部落”季连明一家八口，夫妻只有一条破裤子，谁出门谁穿，来人没裤子的就用扫帚遮羞。孩子只有穿树皮、破纸，睡觉盖锅盖、箩筐，在锅灶的灰堆旁取暖。点火用火绒，照明用松柴，吃盐用舌尖舔，这都是“部落”中维持活命的基本方法。人民群众为此编的一首歌谣广为流传：“日本强盗霸占我地方，集家并村又烧房，拿着我们当牛羊，男女老少‘人圈’装。立好组合抢去吃粮，一天配给几两糠。三尺麻布怎做衣裳，又冷又饿怎么当？”



“人圈”里的儿童

日伪当局还严令“部落”里的居民一律“夜不闭户”，驻军、警察、汉奸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愿什么时候行动就什么时候行动。龙赤联合县千松台李姓一家7口人，进入“部落”后挤在一条炕上，特务每天夜晚当着全家人的面强奸他的新婚妻子，结果把一个女人活活折磨死了。张家营“部落”苏生一家5口人，儿媳被汉奸霸占死去，儿子被协和会打死，最后老两口和闺女也死去，一家人全部死绝。

不仅如此，日伪当局还在“集团部落”中实行频繁的大检举。开始还给被检举的人加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后来干脆是突然出动军、警、宪、特包围“部落”，凡是青年全部逮捕，男性或就地屠杀，或送东北做劳工，女性则任意凌辱。实际上，后来的“大检举”就是大屠杀。伪热河省协和会特别室特务郝席庵在供词中提供，兴隆县日伪当局曾在该县进行4次大规模的检举：

第一次是1942年旧历腊月20日至正月，全县逮捕2000多人，就地屠杀400多人，刑讯后判死刑200人，其余送东北做劳工。

第二次是1943年旧历腊月28日至正月初，全县被“检举”5000多人，也是除屠杀者外，全部送往东北做劳工，其中大帽峪“部落”仅42户人家，就被屠杀男青年72人，有13户人家没了男人，8户被杀绝，成了热南山区有名的“寡妇村”。

第三次是1944年旧历腊月28至正月初，全县被检举2000多人。

第四次是1944年6月间，主要“检举”对象为军属、干属，全县约逮捕500人，在兴隆刑讯后，全部送往东北做劳工。

如果说，坚持在“无住禁作”地带的群众，在日伪严密封锁下，尚能过上野人般的生活，那么，在“集团部落”中的百姓，纯粹是在人间地狱中煎熬的幽魂。

第二节 反对建立“无人区”的斗争

一、破坏“无人区”封锁的军事斗争

日本华北方面军和伪满当局制造“无人区”的行动，引起了冀热察地区党和军队领导同志的警觉。1942年夏，在兴隆县缴获了一批敌伪文件，发现了伪满方面“集家并村”实施方案。后来，又从多方面情报了解到敌伪将从山海关到独石口一带沿长城制造“无人区”的具体计划，而且分析出敌人的战略目的，是想用“无人区”这种特殊的战争手段，实行所谓的“匪民分离”，以防止抗日游击战争向“满洲”蔓延，阻止抗日武装向东北进军。

由于日伪的“无人区”化政策，是“对民众予以讨伐”，是军事行动，所以，反对“无人区”化的斗争，首要的是军事斗争。

在热察边，主力十团和地方游击队，积极开展打击伪满军的战斗行动，丰滦密之云蒙山周围，是敌人制造“无人区”的重点地区，集中兵力反复扫荡。1942年一年中连续“扫荡”达8个月之久，房屋全部被烧光。十团部队就带上帐篷坚持在山区，支持地方干部领导群众坚持斗争。为了进一步粉碎敌人制造“无人区”计划，平北地分委发出了《反并村斗争的指示》，实行党政军民总动员，部分地粉碎了敌人的阴谋计划。在西部汉家川一带，党政干部在游击队配合下，领导群众积极开展反集家斗争，汉家川、二道关等部落，几次建起几次被拆毁，使敌人制造“无人区”的计划长期未能实现。在大海陀山区，平北军分区粉碎了3000多敌军，连续6个月的步步为营式的大扫荡，保卫了基本区，使敌人制造“无人区”的计划破产。

在冀热边，1942年2月底，胜利地结束了打治安军战役。4月间，又出长城发起了热南战役。经一个多月的连续作战，先后拔除小白旗、马圈子、汤道河、车河铺、熊虎斗、六道河等13个重要敌据点，给日伪的集家并村计划以沉重打击。但此时，华北方面敌人，又集中兵力对冀东进行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基本区受到严重摧残。6月间，主力部队返回基本区，发动“复仇战役”，粉碎敌人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乘此时机，长城外敌人更加疯狂地推行“无人区”计划。从9月开始，冀东主力又分兵三路，向长城外线出击，发动一次更大的战役行动。十三团向雾灵山一带出击。新建的十一团和军分区直属部队向都山、五指山一带出击，连续拔除上谷车站等10多处重要据点，并跨过锦承路，出击到七老图山及老哈河流域，支持地方党政干部，在平泉和承德北部，宁城、建平、喀喇沁旗等地，开辟出广大游击区，并以七老图山主峰光头山为中心创建游击根据地。十二团则跨过滦河，开

辟出昌黎、卢龙、抚宁、榆关等新的游击区，并迅速出长城，向热东和辽西地区出击，在青龙、凌源、建昌、绥中等地开辟大片新区，以老岭为中心着手创建游击根据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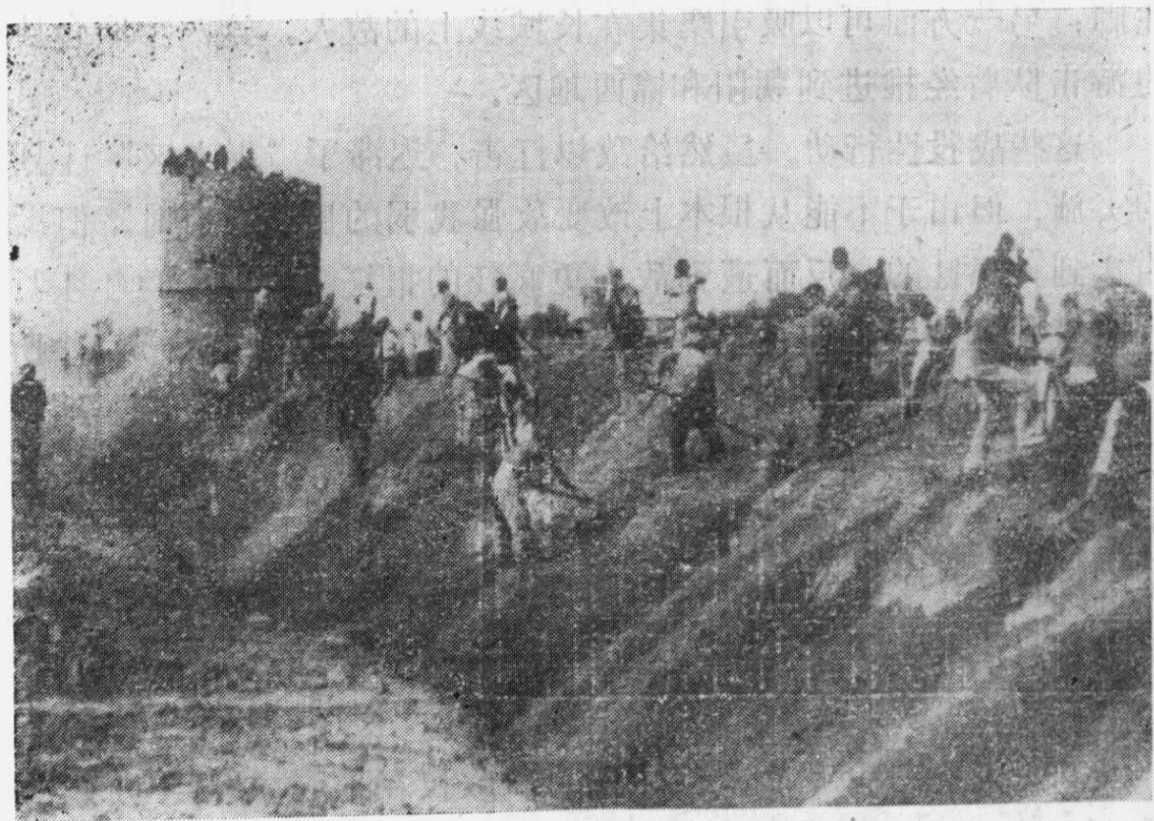


转战在热河“无人区”敌碉堡之间的八路军部队

由于冀察热辽边界地区军民的有力反击，敌人制造“无人区”的计划被打乱。而在热南、热中更广大山区，特别是游击根据地，在武装部队支持下，党领导群众积极开展反集家斗争，尽管敌人疯狂摧残，群众誓死不进“人圈”，许多村庄彻底断绝同敌人的关系，成为抗日一面村。

但是，敌人制造的“无人区”，确实给抗日军民造成极大困难。特别是伪满、华北、伪蒙疆三方面敌人在长城线上内外结合，协同动作，给各个根据地造成了腹背受敌、两面夹击的被动局面，热河地区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而冀东基本区也是岌岌可危。为了摆脱这种险恶的被动局面，必须一面继续顽强地坚持反集家斗争，一面集中力量保住冀东基本区。1943年春季和夏季，

连续发动两次恢复基本区战役。首先突破华北方面敌人在长城内侧制造的“带状无人区”封锁线，网开一面。随着战役行动的胜利进展，陆续荡平了所有封锁线上的沟壕堡垒，摧毁了长城内侧的“无人区”，群众又回到了家园，重新建设更加巩固的游击根据地。



我抗日军民协同一起，平毁敌人的碉堡、封锁沟。

为了支持热河地区人民的反集家斗争，在第一次恢复基本区战役后的1943年五六月间，又发动一次热南战役。三个主力团和区队、游击队、民兵密切配合，分三路向热河地区出击。当时正处在敌人制造“无人区”的高潮之中，敌人兵力强大，根据地受到严重摧残。在异常不利的形势下，冀热边区部队英勇奋战，打了许多硬仗。如6月5日的王厂沟战斗，一举全歼日军一个中队150多人。7月中旬，七区队强攻柳江煤矿，歼敌200多人，除缴获大量武器外，还缴获黄色炸药2000多箱。由于一系列战斗的胜利，曾使热辽形

势一度好转。

1943年9月19日和10月11日，冀热边特委连续发出指示，再次发动战役行动，恢复热河地区。除主力部队进入热南，支持山区根据地群众斗争外，并且要求凌青绥、承平宁两联合县组织力量，向伪满深远地区推进。一方面使这两个地区在扩大中求得站住脚；另一方面可以吸引麇集在长城线上的敌人。这两个联合县的游击队曾经推进到朝阳和锦西地区。

这些战役性行动，虽然给敌以打击，迟滞了“无人区”计划的实施，但由于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敌强我弱的局面，有时不但没有达到预想目的，反而遭到敌人更疯狂的报复。正如1944年4月18日冀热边特委关于《热南地区一年以来的敌我斗争》一文中所总结的：“满洲敌人残暴，后备力量强大，几次战役行动都证明这点，无论打了多大胜仗，不但不能给敌伪以相当镇压，反而刺激其以更大兵力对我。”这些说明，光靠军事行动不能打破“无人区”的封锁，需要改变斗争的战略策略，才能赢得这场斗争的最后胜利。

二、“集家”与反“集家”斗争

1942年秋季以后，冀热察边抗日政权在采取军事行动破坏长城两侧“无人区”封锁的同时，还重点在热河全境发动了大规模的反集家运动，领导山区人民坚持山地斗争，粉碎敌人妄图断绝八路军与人民联系的阴谋。

抗战胜利不久，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报道了热河军民反集家运动的史实：“1943年夏季……敌人野蛮烧杀掳掠毁灭热河广大农村进行‘集家’的时候，全体军民曾广泛开展多次反‘集家’斗争的群众运动，给敌人以严厉打击。

“自1942年到1945年6月，我热南地区，西起丰宁、沿滦平、承德（包括今承德市）、兴隆、平泉、青龙，东至凌源，在这峰峦千里的广大土地上展开了激烈的‘扫荡’与反‘扫荡’，‘集家’与反‘集家’，‘割青’与反‘割青’的保卫人民的生死斗争

……”。这两段报道，不但记录了热河军民反集家斗争的规模 and 范围，而且准确地评价了热河军民反集家斗争的战略意义。

1943年夏季，在凌青绥战斗的七区队再编成数个武工队，配合地方干部深入到广大村镇宣传反集家斗争。日伪当局白天强迫群众修建“人圈”，武工队晚上带领群众拆毁它。有的敌人晚上住在未落成的“人圈”里守卫，武工队就组织力量进行夜袭，打击敌人。群众在武工队的鼓动和支持下，斗争的信心日益坚定，白天修“人圈”磨磨蹭蹭，晚上拆“人圈”如虎下山，拖延了敌人修建“人圈”的进程。坚持山地的群众更坚决，住房虽然被敌人几次烧毁、扒倒，但他们几次盖起窝棚马架，就是住在山洞里，也坚持不下山，不进“人圈”。三十家子的董秀云，3年时间一天也没进过“人圈”，家被烧光，人被几次毒打，就是住在地窖里，仍坚持给武工队送信送饭。这个县沟门子区老杖子村李同林、林贵等13户人家，佛爷洞区果子沟全村群众，房子烧了住窝棚，窝棚烧了住地窝子，地窝子烧了住山洞，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才下山。有这样群众的掩护和配合，武工队的活动也日益活跃，不断打击日伪军。凌源县的日伪当局不得不宣布，1943年的5次“集家并村”均告失败。

青龙县花厂峪是1942年秋季开辟的抗日游击根据地。1943年，日伪当局将该地10余公里长的山沟全部划为“无住禁作”地带，多次调动大批军警宪特强迫群众进入“集团部落”，但该村850多口人在抗日政权的领导下，誓死不进“人圈”。敌人“集家”，他们进深山；敌人“扫荡”，他们反深入据点去抓汉奸；敌人实行“三光”政策，他们宁愿自己吃草根树皮，却长年为八路军保管着3万余斤公粮，500支步枪和一大批鞋袜，直到抗战胜利，也没损失过任何物资。花厂峪人民为坚持反集家斗争，3年内不光被屠杀了80余口成人，还有8名未成年的孩子死于非命。党员米恩林是日伪当局悬赏两石小米捉拿的“共匪”，一次他和乡亲们被围在深山里，为了保护大家不被发现，第一天，他就把4岁的女儿按在水坑里溺死。第3天，他妻子怀中刚满周岁的孩子

哭叫起来，他又和爱人忍痛把孩子憋死。共产党员吴尚庚的妻子怀抱着两岁的儿子在山洞里避难，正当日伪军搜山时孩子哭叫起来，妈妈怕儿子的叫声暴露了大家，便用奶头紧紧塞住了孩子的嘴，等敌人走后，孩子已经活活憋死在母亲的怀里。

1943年农历的腊月二十六日，日伪当局出动1万多军警，对兴隆县的“无住禁作”地带进行“铁壁合围”，一次屠杀坚持山地斗争的群众3000多人，使1000多人冻死在山上。成功村李存隆的妻子怀着身孕，敌人抓住她后，活活剖腹挖出胎儿。该村贾成岗被捕后，日军先用刀割他的肉，又令军犬撕咬，直至死亡。坚持山地英雄赵春的儿媳妇，跑“反”时，在冰上生了一个孩子，为了纪念这段艰苦的日子，给孩子起名叫“冰儿”。面对敌人的屠杀，兴隆县人民象横亘在燕山山脊上的长城一样屹立着。

1943年秋后，在抗日军民反集家斗争的打击下，日伪热河当局修订了集家的方案，除集结兵力加紧对“无住禁作”地带进行“合围扫荡”外，开始派出大批军警宪特驻扎在“集团部落”之中，并以协和会为主加紧“部落”中伪政权的统治，强行把“人圈”内的居民编成“灭共义勇队”或“自卫团”，发给18至35岁的每个男子步枪1支、子弹50发。发给36岁至50岁的每个男子步枪1支、火药2斤。发给青壮年妇女每人扎枪1枝。晚上以军警带队巡逻放哨，遇有情况即敲锣放炮，点火报警，以相互支援来对付抗日游击队的袭击。青龙县计有500多个“集团部落”，其中有105个建成了武装“人圈”。滦平县计540多个“集团部落”，武装“人圈”也达100多个。

当时，抗日游击武装还没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攻坚战，不能彻底打破日伪的“无人区”计划。随着各地“人圈”的逐渐建成，应该改变反集家斗争的策略。但在一些地方，依然坚持动员群众不进“人圈”的做法，给人民群众带来了很大困难。特别在一些群众工作还没有全面展开的新区，遇到老百姓实在坚持不住，进了“人圈”，竟被认为是通敌。这种做法，反而失掉了群

众的拥护，给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一些部队和地区政权不得不离开平川和新区，向深山区、老区撤退。

这种状况很快引起了领导同志的警觉。承平宁抗日联合县办事处主任周治国在被迫撤出锦承路北地区后，就向上级反映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在反集家斗争中，我们对敌人的计划和力量及敌人的政策考察不够周到，我们所实行的政策对群众不利。群众响应我们反集家斗争的号召，曾遭数次摧残，最后弄成无家可归，我们也无力挽救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同志还说，进“人圈”就是投降敌人，谁进“人圈”以汉奸论罪等。这些“左”的口号危险很大。^①

周治国的报告代表了坚持“无人区”斗争的广大干部群众的意见，引起了上级党委的高度重视。冀热边特委在《关于恢复热南的决定》中，特别指出今后的反集家斗争，应“加强‘人圈’工作，争取‘人圈’中群众，建立抗日两面政权。”^②

这时，冀热边特委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反集家斗争中的偏差，开始改变斗争策略了。

三、建立“两面政权”

从1943年冬开始，冀热察边区各级抗日政权不再强令群众拆毁“人圈”或简单地采取不进“人圈”的做法，相反却动员老弱病残和儿童在冬季严寒季节暂时进入“集团部落”，只留青壮年和武装民兵坚持山地斗争。同时，派出大批有斗争经验的地方干部和八路军组成武工队，深入到群众基础较好的“人圈”和自然村去开展工作，加紧“两面”政权的建设。

①《承宽宁平抗日斗争史料选编》第205页。

②《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通讯》19期第12页。

冀热边特委十四地委书记李子光派出王泽民等3人，带领20多名地方干部、一个排武装战士，回到雾灵山东北部的承德县柴河川、兴隆县柳河川等承（德）古（北口）路以南地区，放手发动群众，团结各阶层爱国人士，发展和建设“两面”政权，重建游击根据地。他们白天在深山区组织坚持山地斗争的群众重新武装起来，夜晚进入条件适宜的“人圈”开展工作。武工队每进入一个“人圈”，都先把伪甲长、“部落长”、“自卫团长”三方面伪政权的头目争取过来。然后再广泛发动群众，在宣传鼓动中寻找和发现抗日积极分子和隐蔽下来的党员干部，尽快培养成抗日政权联络员、办事员。最后以这些人为骨干组成新的保、甲，表面上为日伪当局服务，实际上为抗日政权出力。针对“人圈”中老百姓长期生活困难的实际，武工队还用武装力量保护群众开展“走私”活动，在长城内侧的令官、吉家营、新城子等地设立了粮食兑换站，收购粮食、布匹、盐，让住在“部落”中的居民以抗日政府发放的粮票兑换，解决了群众的生活困难。

兴隆县的群众基础好，大多数“人圈”从一建立就有抗日组织活动。1943年冬，当日伪当局疯狂扫荡山区根据地时，八区区长王佐民就采取了动员老幼病弱进“人圈”的策略，有效地减少了人民群众的伤亡。特别是八卦岭一带，还流传着一个“万警尉”的故事。“万警尉”叫万全，是草场村的共产党支部书记。草场被建成“部落”后，万全就当上了“甲长”，一直没有中断抗日活动。日伪当局曾经怀疑过他，多次进行试探。一天夜里，一队日军包围了草场“部落”，谎称是李运昌的队伍，只等一旦骗开大门，即对草场进行屠杀。但万全觉察到其中有诈，机警地敲锣聚众，指挥大家搬起石头砸下去，当场砸伤了几个日军，反而受到了日军的“嘉奖”。后来，日伪当局提升他为“警尉”，使草场“部落”的两面政权更隐蔽、更巩固了。对那些敌人统治严密、顽固不化的“部落”，则利用新发展的“关系”为内线进行军事打击，待消灭掉日伪武装和

伪政权后，再换上“两面”甲长，“两面反共自卫团”。到抗战胜利时，兴隆县的199座“人圈”，已有20%变为抗日“两面”政权，60%可以进行秘密抗日活动。



地方干部坚持在“无人区”工作

随着抗日根据地政权的逐步建立，冀热边特委发布了《关于减租运动决定》，广泛发动以“二五减租”，取消“上打租”为中心的减租减息和给雇工增资运动。减租的标准，因战争情况紧张，当时还没有统一规定，但总的原则是根据具体情况，由双方协商自愿决定。给雇农增加工资，大体和减租的情况相同。就是抗日政权在执行合理负担中，也做了相应的调整。如战勤工，一般是15至60岁的男整半劳力出一半工，耕地所有者出一半工。兴隆县上庄村吴老振常年雇工10多人，抗日政府就同意他每年抽出2个长工出战勤工，其余的均免。有的富户顾虑敌人割秋，不愿多种地，抗日政府还允许土地所有者把不种的耕地转给贫雇农耕种，由耕种者负担战勤抵顶地租。到年底，整个冀热边区抗日根

根据地就有一半村庄实行了“双减”和增资，这对开展“两面村”建设，更是一种内在的强大推动力。据承兴密抗日联合县统计，该县有191个行政村，其中抗日“一面村”77个，“两面村”76个（其中抗日力量占绝对优势、抗日武装能公开活动的47个）亲敌“一面村”仅剩2个。当时全县的人口约15万人，抗日一面村人口仅占全县人口的五分之一，耕地所占比重就更小了，抗战经费的取得主要依靠“两面村”。这就不难看出，抗日“两面村”不光为抗日游击战争提供了隐蔽地点，而且为抗日政权提供了大批人力物力，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下，是使日伪当局“匪民分离”阴谋破产的一股很重要力量。

第三节 “无人区”斗争的特殊贡献

一、“无人区”斗争是一场特殊的战争

日伪投入10余万众的军事力量（高峰期包括华北、伪蒙疆部队，可达20多万），在热河进行制造“无人区”“讨伐民众”的战争，是一场特殊的战争。因为它面对的不仅仅是冀热察边界地区的6000多八路军、游击队等武装力量，主要的是面对着冀热察边界地区的200余万抗日的人民。所以，“无人区”的斗争，实质上也是一场由共产党组织和领导的，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在特殊环境下进行的一场特殊战争。是用人民的革命战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光辉典范。

人民战争，就是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战争。据统计，在敌人宣告集家并村完成后，坚持在热河山区几块根据地的群众约有3万多人，而参加民兵自卫队的有近万人。兴隆县境内雾灵山、狗背岭、五指山三块根据地中，有群众2.3万多人，民兵、自卫队达6000多人。而许多不是民兵、自卫队的青年妇女也同男人一样，站岗放哨，拿起武器同敌人战斗。不少老人、儿童也随身带上一颗手榴弹，随时准备同敌人拚命。在“无人区”里，人人

武装，人自为战，真正达到了全民皆兵。

“无人区”里的人民战争，还创造了许多特殊的斗争形式。如通讯联络，这是进行任何战争必备的手段。但“无人区”里的根据地，大多都是由分散在高山绝顶之上的小村落结合起来的，各块根据地之间，又被敌人分割封锁着。所以，通讯联络非常困难。“无人区”人民除采用鸡毛信、消息树等办法外，在一些地方还创造了喊哨联络的办法。承兴密地区从雾灵山根据地中心的大小黄崖，向南到狗背岭根据地的南北水峪、朱家沟以及平谷边境的四座楼、罗家沟一带，建立了长百余里的喊哨联络站，把几块根据地密切联系起来。那是仿古代烽火台的办法，山头接山头，三五里一个联络哨，昼夜监视敌人，群众称“活电话杆子”。敌人一出动，联络哨一喊，几分钟就可以传出几十里远。特别是设在面对敌据点附近的武装岗哨，敌人最头痛。敌人一出来，先吃冷枪；敌人要追，早已无影无踪。敌人分兵扫荡，民兵就在山顶对群众喊话，指挥群众转移。敌人抢山头，民兵就和敌人转山头，打麻雀战。敌人搜山沟，又会遇上民兵埋设的地雷、石雷。当敌人重点进攻哪一块根据地时，周围村的民兵尽力支援策应，而本村民兵更是顽强战斗。一般的都是采取三段战法。敌人来了打迎头，迟滞敌人的进攻，掩护机关和群众转移隐蔽；敌人闯进根据地时，民兵就分散转山头，打麻雀战，骚扰敌人的活动；敌人走了打尾追，截下敌人抢走的物资。

在艰苦的战斗中，民兵们创造了许多英雄战绩。如兴隆县狗背岭根据地的民兵们，为了打击经常进攻根据地的六道河子据点的敌人，在从六道河子进山的山口处，找到悬崖上一个山洞，民兵们组成几个战斗小组，昼夜警戒在山洞里。1943年12月的一天，连续打退了两次进山扫荡的敌人。12月19日，敌人出动300多人前来报复，将山洞包围起来，以密集火力疯狂射击了一整天，洞内石碴堆积一尺多厚，李秀峰、王玉祥、杨长起3人都负了伤，但仍顽强战斗。第二天拂晓，敌人再次猛烈攻击时，洞内已杳无人

迹，李秀峰等已在午夜被援救出去。据敌人内部情报透露，这一仗打死日军18人，还有一批伪军。在冀热边第一地委召开的英模会上，狗背岭中心村民兵中队被誉为“民兵模范”，那个山洞被誉为“英雄洞”。

地雷是民兵最有力的战斗武器。当时，在云蒙山、四座楼、五指山、王厂沟、花厂峪以及绥中周岭沟，都设有炸弹厂，生产大量地雷、手榴弹，供应部队和民兵使用。在“无人区”的恶劣环境下，制造地雷是异常艰难的，产量小，不够用，就根据山区特点普及造石雷的技术。石雷的杀伤力虽小些，但也有它的优点，就是敌人用探测器难以发现。因为山里头到处怪石嶙峋、熊蹲虎踞，块块可怖，谁知道哪一块会轰然炸响呢！有了大批的石雷、地雷，在根据地周围就可以布起地雷阵，发挥极大作用。如平兴密联合县的四座楼、罗家沟、白草一带，曾是冀东西部地区领导机关和部队供给部、卫生所的所在地。为保卫后方机关的安全，周围民兵组成联防体系，层层布雷成网，使敌人难以轻易袭击根据地。

五指山根据地的成功村，是根据地的“西大门”。为了保卫抗日政权的安全，这个村组织了4个地雷爆破组，分头把守在村的四面，不管敌人从哪路来犯，他们都先炸它人仰马翻，同时也用爆炸的响声报告了敌情。鼎鼎大名的“五虎”爆破组，就是其中之一。其实，“五虎”并不仅5人，更不是名字都带虎字的几个兄弟，而是化名带虎字的民兵集体。他们认为日本鬼子是“洋”人，虎能吃羊，故此命名为“虎”。虎山李青，是武装民兵中队长、村党支部书记。虎明傅惠，是民兵指导员。虎义傅莹，是村财粮委员。虎春李常，是青年报国会主任。虎文熊斌，是民兵干部。后来又陆续参加了虎林、虎平、虎地，但他们仍叫“五虎”爆破组。有敌来犯，他们先搞“预埋待炸”。敌人挨炸后探雷排雷，他们便看准敌人行进路线，迅速从山脊上绕到前方临时埋雷搞“飞行爆炸”。待敌人排雷失败后改走山坡时，他们又

占领制高点使用“树挂雷”、“张手雷”。由于战术灵活多变，巧妙地利用地雷可以先埋后炸的特点，使敌人看不见，打不着，弥补了枪弹不足的劣势。有一次还炸死了日本讨伐队队长松泽和翻译等4人，威名大振。据几年累计，“五虎”爆炸组共炸死炸伤敌人50多名，打死打伤60多名。迁遵兴联合县政府推广了成功村的经验，在五指山根据地的各行政村都建起了爆破组，同时组织民兵开展广泛的夜扰战、麻雀战、攻心战等游击战，打击了敌伪的有生力量。

凌青绥联合县的加碑岩一带，于1943年刚开辟不久，就遭到敌人疯狂摧残，周岭沟老石匠董万功带头成立20多人的自卫队，只有3条旧枪，董万功便组织大家学造石雷技术，培训出50多名爆破手。地雷战很快广泛开展起来，不但多次阻止了敌人的进攻，炸死炸伤众多敌人，后来还步步扩展，把地雷埋到明水塘一带敌据点周围，吓得敌人不敢轻举妄动。这块新区竟然在极残酷的反集家斗争中成了一块根据地。党和政府曾授予董万功“人民柱石”锦旗一面，誉为“董老英雄”。

战争的深厚伟力蕴藏在民众之中。抗日武装能够以落后的武器指到哪里打到哪里，主要是有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迁遵兴联合县境内的五指山区，有一处最难攀登的地方叫“九级石湖”，是大自然造就的“无人区”。张海城、张海振两位老人为坚持山地斗争，分别举家全迁，毅然攀上“九级石湖”，开荒种地，经营山果，把这块天然“无人区”建成了八路军的隐蔽所。刘杖子村的陈广起夫妇，敌伪集家后搬到“无住禁作”地带的鸡冠砬后的密洞里居住，多次营救遇难的子弟兵和乡亲们。到日寇投降时，他们在洞中居住千日有余，双双满头白发，成了兴隆县的“白发夫妇”。1942年6月，冀东十三军分区将热南部分抗日游击武装编为十一团，500多指战员驻扎在只有60多户人家的兴隆县水泉村集训，5天时间，全村百姓拿出了10石小米和大批副食、蔬菜，支援了子弟兵。当时天旱，全村仅有的一口小水泉的水被部队吃干了，军分区司令员李运昌亲自带人去挖泉，群众编

了皮影戏唱道：

“李运昌司令员，带领十二、十三团，回旋冀东地，来到五指山，发动边外民，开展游击战……。群众缺水喝，司令给挖泉……。”表达了军民亲如一家的感情。

特别是“无人区”的妇女，也加入到人民战争的洪流之中。她们不仅为八路军、游击队做衣做鞋，做菜做饭，还英勇地上前线，用鲜血和生命同敌人作斗争。在兴隆县始终坚持山地，不进“人圈”的3万多人中，就有9600多名妇女。

小河西村霍大娘（司桂荣），是1938年入党的老党员。在日伪集家并村后搬到五指山大马架沟的石烟筒山上居住。那里山高林密，罕无人迹，为此，十一团安设了一个卫生所，常年收有50几位伤病员。霍大娘一家与卫生所相依为命，除了将开荒耕种的粮菜全部供给部队外，大伯还担任了卫生所的专职背水员。每天几次到几里路外的水泉去背水。就是这样险峻的地方，日伪当局也曾几次扫荡，逼得卫生所一天换几个营地。一次，区长王佐民在霍大娘家养病，正值日伪军搜山，霍大娘把王佐民背上五指山的顶峰十八盘去隐蔽。八路军战士尊敬地称她为“子弟兵的母亲”。

兴隆县梓楞坑村妇救会主任白玉春，在一次扫荡中被包围，她赤手空拳与敌人搏斗，英勇就义。平泉县西杖子村的鲍金霞，多次掩护八路军伤病员脱险，在最后一次掩护3名战士时，她连中两枪，光荣牺牲。青龙王厂沟妇救会的翠珍嫂，亲自参加了歼灭日本春田中队的战斗，用红缨枪扎死一名日军。她还多次出入“人圈”购买药品，为八路军伤病员治病，被誉为“女英雄”。

日伪制造的“无人区”，用侵略战争的残酷手段来对付手无寸铁的和平百姓，人民自然也需用自卫战争的手段来对付日伪军，所以，在冀热察边广大抗日游击根据地里，确实是人人皆兵，军民一体化了，这就造成最终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

二、“无人区”斗争在战略上的特点

“无人区”斗争是一场战争。但它与一般的运动战不同，与一般的游击战也不同，而是一场特殊的战争。

这场战争的特殊性主要有三点：一是战争目的不同。一般战争的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对方。而日伪发动“无人区”战争的直接目的则是“匪民分离”。当然，这场战争的最终目的还是要达到保存自己，消灭对方的。正因为最终目的相同，所以才称其为战争；也正因为直接目的不同，所以才称其为特殊的战争。二是战争的对象不同。一般战争的对象是敌我双方的军事力量，日伪发动的“无人区”战争的直接对象则是“讨伐民众”，即千百万手无寸铁的普通老百姓。这就决定了这场战争比一般的战争更残酷、更野蛮。三是战争的方法不同。主要是用野蛮屠杀的办法制造一个隔离带，防止关内的共产党、八路军向关外伸展；用集中营式的“人圈”把人民关起来，切断人民与八路军的联系。

由此又产生了“无人区”斗争的四个主要特点：第一个特点，这场战争是在伪满洲国所谓的“西南国境”这个特殊的地域，又经过了1935~1942年8年抗日游击战争这个特殊情况下进行的；第二个特点是敌人设防固守，兵力强大；第三个特点是冀热察边抗日武装力量在发展中比较弱小；第四个特点是人民群众自觉地站到反抗异民族殖民统治斗争的前列，是这场战争的直接参加者。这些特点，一方面规定了“无人区”斗争必然发展和必然胜利；另一方面也规定了“无人区”斗争不可能很快发展和很快胜利。它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战争整个链条中的一环。

有了这些特征和特点，就不能不产生指导这场特殊战争的特殊战略战术。

敌来我走，敌走我来，反复争夺，高度游击，这是“无人区”斗争在攻防问题上的一个重要战略战术原则。

1943年春节，迁遵兴抗日联合县县长田赛，在他住的一间草

窝棚的门口贴了一副对联，上联是“敌来我走，敌走我来”，下联是“有你没有我，有我没有你”，横批是“烧了再盖”。这诙谐的词句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不仅是与敌斗争到底的决心和誓言，而且是冀热察边抗日游击根据地的真实写照。

以五指山为中心的迁遵兴联合县，是屹立在“无人区”腹地的坚强堡垒，也是整个热南山区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中心，冀热边特委、军分区的领导机关曾多次在这里安营扎寨，指挥战斗。但即便是这种老区，也多次被敌人占领以至受到很严重的摧残。1943年2月9日，原迁遵兴联合县县长姚铁民就是在兴隆县上红石峪进行工作时，被敌人逮捕后牺牲的。

丰滦密抗日联合县的臭水坑是一小块比较巩固的根据地，十团后勤机关和县委、县政府就设在这里。1942年，敌伪以6000兵力进行“肃正扫荡”，加强“无人区”化，采取在长城关隘和交通要道等处增设据点，将山区分割成若干小块，以机动兵力在其间穿插迂回的办法，使游击武装的活动区域越缩越小。4月8日，发生了“臭水坑惨案”，县长沈爽等30名干部、战士壮烈牺牲，45人被捕，使抗日政权蒙受严重损失。但他们总结了这次失败的沉痛教训后，运



姚铁民烈士遗像

用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指导反“无人区”化的斗争，对主力部队进行了精兵简政，取消营建制，化整为零，以连为单位分散活动。联合县政府也提出了变“无人区”为少人区，变少人区

为多人区的口号，领导群众全力开展反“无人区”化的斗争。春耕季节，县政府宣布群众“归山”以后，既不向敌人纳捐款，也免缴抗战粮款负担；对生活困难者，给予救济等项政策。山区群众不堪忍受“人圈”之苦，感于抗日政权的召唤，纷纷返回“无住禁作”地带。到1943年底，回到山区的群众已占“部落”总人数的一半以上。这样，“无人区”变成了有人区，恢复了部分游击区。这个县的二区原有党员128人，集家后只剩下64人，经过这段工作，又发展了32人，并且恢复和新建了17个党支部。

在冀东和热南这两大块游击根据地之间互为依托的关系中，更是充分体现了敌来我走，敌走我来的战略战术原则。当敌人在冀东发动进攻时，八路军主力部队就进入热南“无人区”；当敌人在热南“无人区”发动进攻时，八路军主力部队又回到冀东；当冀东和热南的敌人同时发动进攻时，他们就化整为零，分散到各个小块游击根据地去。在整个“无人区”残酷斗争的4个年头中，这样大的流动游击也有七八次之多。许多根据地是建了被毁，毁了又建；同样，敌人的许多集家区也是建了被毁，毁了又建。可以说，在整个冀热察边，没有一块敌人没进来过的根据地，也没有一个八路军进不去的集家区，这就从根本上打破了日伪实行“无人区”隔离带的战争阴谋。

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包围与反包围，这是“无人区”斗争的又一重要战略战术原则。

在这场高度流动，高度游击的“无人区”斗争中，共产党、八路军领导下的抗日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地斗争，遭受了几乎无法忍受的苦难，干部前仆后继，群众舍生忘死，就是在敌人集中最大兵力进行围剿时，也不能把共产党、八路军与人民群众分开，更不能把共产党、八路军消灭，相反却形成了敌中有我，我中有敌，敌人包围我，我包围敌人这样犬牙交错的斗争局面。也就是说，日伪军队以平川包围山地，暂时把大片抗日游击区分割成小块；而抗日武装又以山地为依托，努力向四外发展，并反过

来夹击、包围平川。敌人以“人圈”阻隔共产党、八路军与人民的联系；共产党、八路军则打入“人圈”中去，建立“两面政权”，“人圈”中的人民也打出来，这就从根本上打破了日伪发动“无人区”战争，实行“匪民分离”的战略目的。

在热南山区，1943年伪满大规模推行“无人区”化以后，五指山游击根据地虽然被万余敌军重重包围，但从战略上，五指山又与雾灵山、狗背岭两块游击根据地鼎足而立，进而与转战长城两侧的冀热边八路军主力部队遥相呼应，形成了对敌人的反包围，使得敌人不得不多面设防，分散兵力，穷于应付。

云蒙山游击根据地，处在伪满洲国和华北方面日伪的多重包围之中，但由于地域的广阔和敌人兵力的不足，敌人只能占领由据点组成的点和由公路组成的线，广大农村仍然是抗日军民的天下。这样，又形成了反包围的局面。只要敌人从点线上钻出来，就遭到游击队的袭击。1943年7月7日，丰滦密联合县支队在香水峪设伏，击溃伪满军1个营，毙俘敌人50余名，缴获重迫击炮1门，轻机枪2挺，步枪130枝及大批弹药。年底，又围歼伪满讨伐大队刘翰部，毙敌100余，俘敌70余，缴获轻机枪3挺，步枪200余枝。丰滦密地区的敌军，在抗日军民反包围战的打击下，1943年后兵力由4000多减少到2000多，42个据点只剩下23个，大部分“集团部落”已经名存实亡，“无住禁作”地带全部变为抗日游击武装活动的区域。尽管1944年初出现了十四专署武装部长单德贵投敌叛变的事件，但丰滦密抗日武装已经打破敌伪从华北和伪满两个方面的包围封锁，全面恢复了被蚕食的游击根据地，同时形成了对敌伪仍占据着的点线反包围的局面。

三、“无人区”斗争的特殊贡献

任何向人民发动的侵略战争，侵略者最苦恼的就是，在军事占领之后，无法长期奴役人民。日本帝国主义在冀热察边区制造的“无人区”，正是为解决这一难题而做的一种徒劳努力。

日伪用“三光”政策制造的“无人区”，有两大功能：一是将武力无法控制而必须摧毁放弃的土地变成隔离带，即“无住禁作”地带；二是把能够用武力控制的地方，变成由它任意统治、掠夺、奴役的社会，即“集团部落”。这样，“无人区”就不仅仅是适应战术需要的封锁线，而且是适应战略需要的统治区了。

30年代末期，伪满洲国在东边道所推行的“无人区”化，就是利用这两大功能，达到“匪民分离”的目的，然后对抗联武装剿而灭之的。但热河的“无人区”化，无论是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时间之长，情况之复杂，手段之独特，斗争之激烈等方面，都要超过其他地区的“无人区”化，是中国仅有世界全无的。然而，冀热察边区的党、军队和人民并没有被日伪的“无人区”化所吓倒，而是采取了许多特殊的斗争手段来对付这种特殊形式的战争。虽然这个斗争极其残酷，极其壮烈，付出了10多万军民生命的代价，但冀热察边的党、军队和人民（最困难时期坚持“无人区”斗争的仍有5万多人）终于坚持下来，并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这本身就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伟大创举。

热河的“无人区”斗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特别是对中国的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斗争，是做出了卓越贡献的。

首先，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独霸亚洲，称雄世界的第一步，就是所谓的“满蒙独立”。而热河的“无人区”抗日斗争，深入到伪满洲国国境之内，用铁的事实打破了“满蒙独立”的梦幻，这对日本帝国主义称霸世界的野心是个沉重打击。

早在“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关东军野蛮侵占了我东北四省，首先扶植起一个傀儡“满洲国”。而国民党政府，在美、英、法等帝国主义的“远东慕尼黑”政策影响下，奉行“不抵抗主义”，不但在战场上节节败退，而且在政治上先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更有甚者，“芦沟桥事变”后的1939年1月，蒋介石居然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声称，他的抗战到底的“底”，就是“恢复芦沟桥事变以前的状

态”。^①这实际上已经承认了“满洲国”的存在。

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和立场十分坚定明朗。毛泽东曾在《反对投降活动》一文中，针对蒋介石放弃东北国土的言论明确指出：我们党的“抗战到底”，是要“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②而“无人区”的斗争正是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抗战到底的政治主张。在日伪军重兵压迫下，围不垮，剿不灭，挑起了在伪满洲国坚持抗战的重担，并且坚持下来了，发展壮大，最终胜利了。这个历史性贡献是十分重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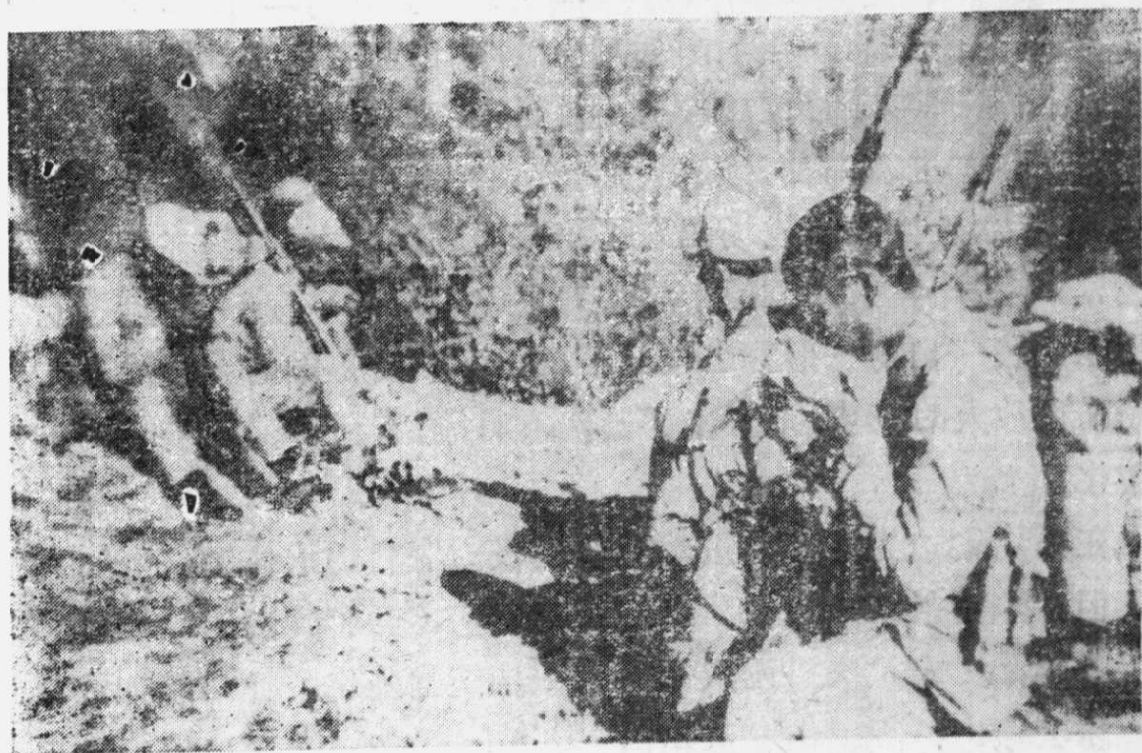
其次，坚持“无人区”的斗争，牵制住了大量的敌伪力量。由于日伪当局“无人区”化的严密封锁，冀热察边抗日武装不得不以平北、热南、辽西的险峻山区为周旋战场，以富庶的冀东为补给依托，充分利用日本侵略者的行政、军事交界线——“满洲国界”和长城的自然地形开展游击战争。1942年前后的3次热南战役，都是以雾灵山区为整训集结基地，突然集中所有武装力量打击敌伪的。这样，长城外侧的日本关东军和长城内侧的日本华北方面军，都必须留下重兵以维持“无人区”的统治。据粗略统计，“满洲国”方面，用于热河“无人区”的关东军部队虽然不足1万人，但却调用了可以机动的满洲国兵、警察讨伐队、宪兵等大约10万人，约占“满洲国”所有军事力量的三分之二。伪蒙疆参加“无人区”化的部队也有1万多人。华北方面，仅驻扎在山海关至独石口的日本军队即达一个师团，其主要任务就是协同关东军进行“无人区”化。在华北方面的几次“治强运动”中，日本军方还调用了汪伪政权的齐燮元部到冀东“扫荡”，每次兵力均不下万人。特别是1943年以后，日本政府看到亚洲战场的形势发生逆转，立即调整作战方案，搞冀东的“满洲国”化，并将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562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550页。

驻在冀东的日军二十七师团编入关东军序列，又从东北腹地调出“铁石部队”、“铁心部队”、“铁血部队”等“满洲国”兵加强热南、冀东防务，使华北战场和中苏边境的兵力更加空虚。

第三，日本侵略者在热河推行“无人区”化，以其各种残酷绝伦的手段，控制广阔的地域和上百万民众，使得华北战区和“满洲国”之间的1万多平方公里的地方成了“绝缘地带”。但是，正是这块“绝缘地带”，对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来说，却起到了政治“过滤网”的作用，它将任何不是以解放人民群众为唯一目的，不能发动广大民众打一场持久战的武装力量拒之于“网”外。这张“网”，滤去的是独裁专制的泥沙，挡不住的是人民战争的洪流，待到抗日战争胜利以后，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时，立即显示出了这种内在的动力。



战斗在古长城线上的八路军战士，吃炒米、野菜坚持抗日斗争。

第五章 大规模发展和扩大解放区

迎来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第一节 恢复和发展抗日游击根据地

一、粉碎敌人的“奔袭扫荡”，恢复基本区

进入1944年后，冀热察边界地区的抗日斗争形势，仍然是很严峻的。虽然在苏德战场上，早在1943年2月，世界反法西斯战线就开始了战略反攻；太平洋战争也朝着不利于日本方面转化。特别是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的争夺战中，日军遭到惨败，成为太平洋战争的转折点。此后，美军即转入战略反攻，日军则节节败退。但在中国战场上，抗日战争仍然处在最困难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打通从我国东北至越南的大陆交通线，从4月起，发动了豫桂湘战役。国民党军队在日军进攻面前，连遭失败，日丧一城，月失千里，军队损失六七十万人，使国民党战场出现了第二次战略性大溃退。在解放区战场，日本侵略者投入其侵华总兵力的60%及几乎全部伪军，进行疯狂地奔袭“扫荡”，形势也很严峻。由于敌后军民的艰苦抗战，不断粉碎敌人的进攻，形势才开始向不利敌，有利于抗日军民的方向转化。

在冀热察边界地区，虽然对抗战极为有利的条件已开始到来，但斗争仍很激烈。在冀热边，冀东基本区有所恢复，但热南、热西已变成大块“无人区”，敌伪统治强化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除云蒙山、雾灵山、五指山、老岭、光头山还有小块游击根据地外，其余大部变为敌占区，斗争异常艰难复杂。热察边的形势也基本相同，长城外变成大块“无人区”，各项工作基本上退了出来，龙赤、昌延基本区经常遭敌围攻扫荡，困难很大。特别是日本侵略者为确保满蒙这个“生命线”和侵华的咽喉要道，就

更加拼死争夺冀热察边界地区。由于日军已濒临穷途末日，无力推行其“沟壕堡垒”的蚕食政策，于是，被迫收缩一些据点，以加强交通要道和县城大镇的兵力。在战术上，敌人无力进行长时期的疯狂扫荡，改为“重点扫荡”和“长途奔袭”。仅1944年秋前后，敌人就对兴隆南部地区“扫荡”3次，迁安、青龙、宽城地区3次，丰滦密地区2次。在“扫荡”中，敌人实行了分期、有重点地全面进攻。第一期是奔袭八路军领导机关，企图与主力部队决战；第二期实行清剿与政治瓦解，企图建立与发展伪组织；第三期则是大举抢掠粮食、物资，割青苗，抓壮丁，企图彻底摧毁根据地经济。

冀热边地区军民反奔袭“扫荡”的斗争，进行的非常紧张激烈。在开始阶段，对敌人新的阴谋注意不够，抗日军民受到重大损失。1944年5月18日，冀热边第一专署专员杨大章等在蓟遵兴联合县甯岭庙召开县、区干部会议，被数千日伪军包围，在激战中，杨大章、廖峰（十三团副政委）、占中（蓟遵兴联合县县委书记）等35人壮烈牺牲。经过这次血的教训，加强了反“奔袭扫荡”的斗争，取得了很大的胜利。1944年春，冀热边特委、行署和军区等领导机关，设在兴隆县黑河川的五指山、楼上等村，日伪军集中2万多人，配以飞机、大炮，长途奔袭黑河川，妄图摧毁冀热边区的领导机关。冀热边特委预先得准确情报，指挥十一团在当地游击队的配合下，诱敌西上，然后率主力巧妙地躲过敌人，东渡滦河，回到关内，发起了第三次恢复基本区战役。6月3日，十三团和二区队，将1100多日伪军围困在土门和熊儿寨两地，经过两天一夜的连续战斗，打死打伤日伪军500余人，把经常到这里扫荡的伪程斌队、刘其队、石振队打得溃不成军。敌军退回兴隆街时，许多伪军家属带着烧纸、香烛和棺槨迎接，到处是一片哭嚎声，预示着敌伪末日的即将到来。

李运昌率十一团和第四、六区队挺进蓟（县）玉（田）宝（坻）地区，连续攻克孔庄子、三岔口、鸦洪桥等敌伪据点10余

处，迫使这一地区的敌军退守大城镇，凭借坚固工事，固守待援。同时，地方党政工作干部与军队配合，恢复和整顿了地方党政基层组织。经过多次战役行动，不仅恢复了基本区，而且使冀热边东西两大块根据地连成一片。游击根据地和游击区扩大到东自辽西，西至通县，南濒渤海，北到热中的广大地区。冀热边地区的主力部队、地方区队和县区游击队扩大到1.5万余人，全区已建立25个联合县，人口有400余万，奠定了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坚实基础。

热察边界的平北地区，经过1943年的反“蚕食”斗争，形势也开始好转，部分的恢复了1942年失去的地区，并开辟了新区。1943年3月，平北地分委召开扩大干部会议，分委书记段苏权作了《1943年工作总结与1944年工作方针报告》，分析了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后期的平北形势，确定1944年的总任务是：大刀阔斧地发动群众，以巩固现有阵地为主，同时也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积极扩大和发展。会后，平北支队和地方游击队广泛出击，连续打了太子沟战斗，全歼伪满军三十五团第二营200多人；石窑子伏击战，击毙伪军中队长以下10余人，俘百余人。并连续拔掉九渡河、西辛营等20多个据点，争取伪警察120余人携枪投诚。到5月，敌人兵力大为减少，只能龟缩进几个大的据点和县城。针对这个情况，平北地分委作出《关于平北目前形势认识中的几个问题及恢复地区工作的指示》，要求在新恢复区（包括新开辟地区）要彻底摧毁敌伪的各种反动组织（包括公开的敌伪政权和秘密的特务奸细），建立抗日的各种组织与抗日秩序，并抽调大批干部，组成突击工作组，到新恢复地区工作，抗日的基层政权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

二、开辟和坚持锦热路北的斗争

进入1944年，位于锦热路以北的承（德）平（泉）宁（城）游击根据地得到迅速发展。2月6日，联合县工委书记黄

云,①三区队队长高桥,②经过周密侦察和筹划,只用一个多小时,就攻克宁城县城(小城子),歼敌一部,缴获大批物资,受到了晋察冀军区的嘉奖,使热河的敌伪军大为震惊。这次战斗标志着以承平宁抗日游击根据地为中心的锦热路北的抗日游击战争,已发展到高峰期。

锦热路北,主要指热河省承德、平泉县的北部、宁城全部,总面积约1万多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有时也将其范围扩大到西至围场、隆化,北至赤峰,东至朝阳的广大地区。这一地区峰峦绵延起伏,河谷纵横交错,地势非常险峻。七老图山脉由北向南贯穿全境,海拔千米以上的大山有北大山、光头山、龙潭梁等10几座,主要河流有老哈河、武烈河、老牛河、瀑河等。这里盛产玉米、高粱、谷子、大豆和金、银、煤等矿物,物产极为富饶。蒙、汉、回等多民族杂居,民风朴实强悍,具有很强的斗争精神。早在1933年日本侵占热河之初,宁城、平泉就爆发了由陈国军、田宗起领导的以黄枪会、红枪会为主体的武装抗日起义;

①黄云,即杨雨民,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郊区人(原热河省赤峰县),1910年生。1935年在北平大学读书时,积极组织并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1937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北上先遣支队政治部主任、冀中军区第五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等职。1942年,党派黄云同志到热河中部开辟地区,任冀东军分区第三区队政委、中共承(德)平(泉)宁(城)工委书记,是开辟和坚持承平宁抗日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45年抗战胜利后,杨雨民历任中共热河省委常委、省政府副主席、副省长,参加并领导了热河解放区的创建、坚持和解放后的恢复建设工作。1955年底热河省建制撤销后,历任河北省副省长、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河北省政协党组书记、副主席等职,1971年6月9日逝世。

②高桥,即苏然,黑龙江省密山县人,中共党员。1936年洛阳军校毕业后到冀东找到党组织,参加冀热边大暴动,任第十四总队队长,以后相继任十三团一营营长,十一团参谋长,第三区队队长等职,久历沙场,身经数十战,取得很大战果。1944年3月29日,在宁城县八素台牺牲,时年28岁。敌人残暴地将其首级割下,在承德街示众。

1933年5月，宽城爆发了由孙景华领导的几千名群众抗捐斗争；1933年2至10月，承平宁地区两次爆发了由几千人参加的抗捐斗争，捣毁当地捐税机关，并进军承德，逼迫伪热河省长张海鹏答应减免捐税。这一次一次群众自发的反日斗争，虽取得一定胜利，但最终都被日伪疯狂镇压下去。

1940年，冀热边抗日游击战争有了大的发展，决定开辟锦热路以北地区，以便扩大回旋余地，进而与东北抗日联军联系。9月，周治国在宽城东大地成立路北工作组，由李青山任组长，带领5名游击战士，跨越锦热路，到达宁城的黑里河川，与头道营子、喇嘛洞的红枪会老师李文彪、西范杖子黄枪会老师裴文和等取得联系。10月中旬，李青山等带10多名红枪会老师返回关里，学习革命道理和游击战争经验。12月，这些骨干回到锦热路北，成立起路北第一支游击队，有20多名游击队员，由裴文和任队长，李青山任副队长兼指导员，后被编为青平游击队第二中队，经常活动于承平宁地区。1941年8月，游击队在平泉县松树台处决了两名特务，又击毁了敌人的一辆汽车；在宁城县热水附近，击溃了一小队前来追剿的伪军，打死30人，伤五六人，游击队也牺牲了2名战士，然后返回关内休整。1942年初，青平游击队又突击到围场，然后向东突击到黑里河川，艰苦转战4个多月，开辟出一片隐蔽的游击区。李青山在承德县三沟、平泉县车轮轿川发展起一支40多人的游击队，开辟出一小块游击区。这些小的游击活动，虽不能给敌伪以严重打击，但却扩大了共产党、八路军在群众中的影响，鼓舞了锦热路北人民抗日斗争的勇气。

1942年5月，冀东区党分委根据党中央关于“到敌后之敌后去”的方针，决定组建承平宁武装工作队，由周治国任队长，28名干部和一中队的武装，挺进到锦热路北地区。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发动路北人民反满抗日，并要努力向东北发展，争取与东北地下党和抗日联军取得联系；扰乱锦热路，发展地方武装，打击小股敌人，扩大抗日游击区。武装工作队5月出关，6月在承德县三沟

东沟建立第一个抗日的区政权，姜建舟任区长。不久，又在平泉县的车轮轿川建立二区，高捐雨任区长。9月，游击队已发展到100多人，又建立两条通往冀东基本区的地下交通线。与此同时，根据承平宁工作的进展，十三地委又派来苏振东（王旭昌）、赵进英（贺文涛）等70多名干部，加强武装工作队 的力量。相继在承（德）隆（化）围（场）宁（城）交界地带建立第三区，在承德县下板城一带建立第四区，并在近50多个村建起“两面政权”，选配了武装班长和办事员。

1942年11月，八路军太行军区敌工部派往锦州的地下工作者金荣久和锦州爱国青年张一字，也到宁城开展地下工作，在爱国开明绅士韩佑庵的协助下，建立了联络点，做了许多争取上层的工作。

这样，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开辟，已把几小片游击区联成大片游击区，稳步地向游击根据地发展。

1942年秋，在第十三军分区发动的热南战役中，十一团参谋长高桥（苏然）、十二团副政委曾辉和参谋长周家美率主力一部，共1200多人，进入承平宁地区，连续攻克上谷、永和2个火车站，三沟、黄土梁子、八里罕3个警察署和六沟、七沟等11个警察分驻所，地方武装配合破坏公路、电线，给日伪的殖民统治以沉重打击。伪第五军管区立即调集7个团的伪军和承平宁地区的日本宪兵队、守备队、讨伐队，共8000多人进行围剿扫荡。主力部队在承德三沟、宁城黑里河川等地，多次作战，再给进攻之敌以打击。这时，关东军西南防卫司令部又调来1000多日军和7000多伪军、讨伐队，共1.6万多人进行大清剿。主力部队为避免与敌人决战，留下十一团二连和十二团一连，由高桥率领继续坚持承平宁地区，其余则撤回关内。

主力部队撤走后，敌人的扫荡仍未停止，高桥、周治国等进行了坚持承平宁地区的艰苦卓绝的斗争。1943年2月初，承平宁地区主要干部、战士集中在承德县三沟东沟开会，4日遭敌围攻，在大

风雪中，与敌人周旋多日，30多名战士被冻伤，有些干部战士的手指和脚趾都冻掉了，仍不懈地坚持斗争，最后突围到隆化千松甸，才摆脱了敌人的包围和追击。这次战斗，共有70多名干部、战士牺牲（包括被捕后死在敌人监狱中的），为坚持承平宁地区的抗日斗争，付出了重大代价。不久，高桥带队回冀东休整。

1943年5月，冀东地委决定第三次开辟锦热路北地区，撤销承平宁武装工作队，建立承平宁联合县工委和办事处，任命黄云（杨雨民）为工委书记，周治国为办事处主任。又派十一团团长江文进率全团挺进承平宁地区，在承德县十一道河包围了一个营的伪满洲国兵，击毙50多人，最后伪营长举白旗谈判，为了争取和瓦解伪军，以伪军不再到该地区扫荡为条件，遂撤出包围。月末，十一团返回关内。与此同时，冀东地委和军分区又从十一团抽调两个主力连，组成三区队，由高桥任区队长，黄云任政委，郝福鸿任总支书记，共300多人，开赴承平宁。6月，承平宁联合县工委、办事处和三区队在平泉旗杆子山召开第一次联席会议，确定了建党、建政、发展武装、贯彻统一战线的四大任务，并随时准备向北、向东发展，扩大抗日游击根据地。会后，三区队袭击了承德县烟筒山银矿、宁城三座店鸦片组合等地，缴获大批物资，并将其中一部送往冀东，支援关内抗战。这时，承平宁地方武装也有很大发展，除原有的武装二中队外，又建起6个区游击队，共200多人。1943年6月18日，二中队和张野溪基干队配合，袭击凌源宋杖子车站，击毙日本特务马昶夫妇和另一名日本人，缴了车站警护队和勤劳奉公队的械，从平泉和叶柏寿两地乘车增援的敌军也被打得车翻人溃。这一仗打开了承平宁往东发展的大门。7月，日伪派老牌特务仁科信夫任喀喇沁中旗（平泉、宁城合并为喀中旗）协和会事务长，推行一系列强化殖民统治的政策，给承平宁的抗日斗争造成很大困难。8月20日，五区、六区基干队在三区队配合下，在平泉县长胜沟盘道梁设伏，一举击毙仁科信夫、夏谷（日本宪兵队长）等七八名日军，击溃伪

协和队。9月15日，三区队和基干队又用引蛇出洞的办法，将继续任为喀中旗协和会理事长的山本和日本守备队长东山岛及100多日军，诱至平泉县平房大沟，高桥指挥早已埋伏好的三区队奋力围歼，当场击毙山本和东山岛等25名日军，其他狼狈逃回宁城谢杖子据点。9月17日，又在宁城驿马吐川将前来围剿的黄土梁子警察署的警察队包围，97名警察全部被俘，教育后释放。9月，三区队与挺进凌（源）青（龙）绥（中）的七区队，在驿马吐川卧龙泉子会合，正值伪满军一个团前来讨伐，三、七区队就地设伏，全歼一连伪满国兵，其余溃逃。此役缴获重机枪2挺，其他枪支很多。

卧龙泉会师后，三区队和部分县区干部又转移到平泉东部的裂山沟一带，被敌侦察飞机发现，旋即派重兵包围。县工委、办事处和三区队干部召开了第三次联席会议，决定三区队摆脱敌人，回关里换冬装，地方干部分散突围，继续坚持工作。

11月初，换完冬装的四区队和以周治国为队长、周哲民为指导员的锦热边工作队返回承平宁。周治国率队在建平北部开辟一大片游击区，建立承平宁第七区，并先后派张瑞廷、周哲民潜入吉林与抗日联军联系。高捐雨等深入到宁城北部、赤峰南部喀喇沁地区，扩大了游击区，建立了第八区。

1944年2月攻克宁城县城后，伪热河省军警机关一再向上告急，伪治安部调集了骑兵旅、装甲兵旅和程斌等20多个讨伐队共万余人，联合讨伐承平宁地区。承平宁工委和三区队在宁城八素台召开会议，决定改变战术，将部队分成小分队活动，机动灵活地粉碎敌人的合围。3月29日，高桥和他带的22名战士，在八素台附近的双庙村被200多敌人包围。在突围中，高桥受重伤后，举枪自戕，其他22名战士也大部壮烈牺牲。4月25日，赵洪武游击队70多人在宁城老西沟被敌人包围，激战一天，除6人突围外，大部牺牲，赵洪武等18人被捕，不怕敌人的威胁利诱，英勇不屈，壮烈就义。年仅16岁的战士丙丁火，面对倒在血泊中

的战友，不畏恫吓，痛骂不止，也惨遭敌人杀害。

从此，承平宁地区的抗日战争进入了最困难时期。

三、日益走向巩固的抗日根据地

从1944年上半年开始，冀热察边界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日益发展，走向了建设巩固的抗日根据地的阶段。

冀热察边界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自1938年发动以来，始终处于高度分散、高度游击的状态，未能建成一块较大范围的，长期与敌人完全脱离关系的、敌人进不来的根据地。这是因为这里处于敌人的深远后方，敌人建立了比较稳定的统治，在军事上又一直处于优势的缘故。在这种情况下，欲使游击根据地完全脱离敌人统治，造成稳固的根据地是不可能的。在另一方面，由于共产党和八路军在政治上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民族统一战线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随着抗日武装部队、战胜敌人和发动民众这三个条件的日臻完善和成熟，完成由两面政权到多块小块的抗日一面政权，再到大块的抗日一面政权这样一个艰苦缔造过程，也是完全可能的。1944年初的冀热察边境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正处在向大块巩固的根据地转折的过程中。

1943年7月，晋察冀中央分局鉴于冀热边地区已建成大片游击根据地的情况，为加强党、政、军各方面的领导，决定将中共冀东地委（第十三地委）改组为中共冀热边特委，冀东专署改为冀热边行署，由李运昌任特委书记、行署主任、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李楚离任副书记、副政委，朱其文任行署副主任。下辖5个地委和专署。月底，在迁安县东水峪召开第一次全会，根据北方局1943年3月25日的指示，总结检查了4年来的工作，并就以后一个时期的工作进行了全面研究部署，作出了决议。这次会议规定冀热边的总方针仍然是“坚持游击战争，克服困难，积蓄力量，准备反攻和准备战后建国”。主要斗争任务是：（1）在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中建立多块游击根据地；（2）向东北方向发展，加强东北山地

工作，以便建设东北山地游击根据地；（3）在长城内外、北宁路南北、滦河东西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破坏敌人社会秩序；恢复与坚持冀东平原基本区。冀热边特委的建立和第一次全会的召开，使冀热边地区的抗日战争走上了巩固发展的新阶段。

在热察边界地区，平北党、政、军的组织机构也有了大的变动。1943年2月18日，中共北方分局作出了《关于三年来平北工作总结的决定》，指出“平北在1941年初已经基本上成为大块根据地”，“是北岳区与冀东地区相联的桥梁”。同时，为使平北各项工作走向正轨，决定将平北划为两部分，东部（丰滦密）归冀东，西部成立中共平北地分委、平北办事处和平北支队，归平西地委领导。5月，平北地分委、平北办事处和平北支队同时成立，由段苏权兼任分委书记、陆平任副书记、张孟旭任办事处主任。并在龙赤县西坡召开扩大的干部会议，会议确定了巩固现有根据地，在巩固中求发展的方针；并提出扭转根据地困难局面的关键在于加强党的领导，认真贯彻一元化的领导原则，作出了《关于各级党委树立严格工作制度的决定》和《关于进一步贯彻执行减租减息和劳动政策的决议》，使热察边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也走上了恢复发展的新阶段。

1944年初，日本帝国主义完成了用武力制造千里“无人区”的计划，使冀热察边界地区的抗日战争形势有了很大变化。一方面，热西、热南、热东、热中的大片游击区和游击根据地变为敌占区；另一方面，也使这些地区的抗日战争明朗化了，在敌人无力统治的地区建起了抗日一面政权，又在“人圈”中建立了“两面政权”，即在无人区里还有我们的人，集家圈内还有我们的“家”。同时，与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的千里“无人区”相对应，共产党、八路军开辟了以长城为轴线的千里游击长廊，12个抗日联合县（办事处）政权，象颗颗珍珠，镶嵌在千里游击长廊上。八路军、游击队神出鬼没地战斗在长城内外，主动出击，打击日伪，逐渐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

建立在长城内外的抗日联合县（办事处），由西向东主要有：

龙（关）赤（城）特三区。辖丰宁西部黑河川，赤城东北部白河川。1942年开辟，曾发展到丰宁潮河上游的窄岭一带。1942年下半年，敌伪实行“肃正作战”，调日军独立第二、第十五混成旅、第二十六混成师团各一部，伪满洲军周大鲁旅、冯秉承旅及伪蒙疆部队，聚集在以丰宁大阁为中心的地区，经常到长城内外讨伐、扫荡，除少数游击队坚持地区外，大部撤出。

昌（平）延（庆）联合县。以大海坨山为中心，包括当时归热河省管辖的千家店、花盆、沙梁子等地区。1938年开辟，1940年以后成为平北根据地的基本区。

滦（平）昌（平）怀（柔）联合县。1943年秋改建县委、县政府，到年底已向南开辟到顺义地区，改建滦（平）昌（平）怀（柔）顺（义）联合县，共辖7个区，近200个村。

丰（宁）滦（平）密（云）联合县。1944年初，丰滦密地区的抗日力量有了很大的恢复和发展，而敌人兵力则更为不足，抗日武装主动出击，连续逼退孝女台、镇罗营等敌人重要据点，仅河西地区的敌伪据点就由42个减少到23个。

承（德）兴（隆）密（云）联合县。1943年7月，撤销承（德）滦（平）兴（隆）联合县后建立承兴密联合县，到1944年5月，共辖220个村，其中抗日一面村108个，抗日两面村69个，中间两面村14个，亲敌一面村只有29个。

承（德）兴（隆）办事处。1944年春将原迁遵兴联合县长城外7个区改建承兴工委和办事处，始终坚持五指山“无人区”的斗争，成为“无人区”里一面不倒的抗日红旗。

承（德）青（龙）遵（化）联合县。1943年7月撤销迁遵兴联合县后建立，共辖6个总区，1944年2月并入迁遵青联合县。

迁（安）遵（化）青（龙）联合县。1944年2月成立，辖承

兴、青平和承平宁三办事处，是冀热边特委的直属县。10月份并入迁卢青联合县。

迁（安）卢（龙）青（龙）联合县。1944年3月建迁卢青工委和办事处，1944年10月改建县委和县政府，共辖10个区和承兴、青平、承平宁三办事处。

迁（安）青（龙）平（泉）联合县。是长城东段最早建立的抗日政权之一，1942年2月改建青平办事处，1945年1月恢复迁青平联合县建制，辖6个区。

凌（源）青（龙）绥（中）联合县。1943春建立，是在冀热辽三角地带建立的第一个联合县政权。

承（德）平（泉）宁（城）联合县。1943年5月建立，是深入到热中地区的一个联合县。

为了巩固各抗日根据地，冀热边特委和平北地分委还针对热河的实际情况，正确地实施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系列方针政策。

在政权组织上，县以上抗日民主政权实行了“三三制”原则，吸收进步人士及中间分子参加政权，注意克服对党外人士不信任，不给人家以实权的“左”的倾向。在保持工农基本群众的政治优势情况下，广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扩大抗日民主政权的群众基础。

在经济上，认真贯彻了减租减息和合理负担政策。一方面，保证工农劳动群众的基本利益，另一方面又不伤害地主、富农必需限度的利益，以调整阶级关系，团结一切抗日的阶级和阶层共同对敌。

鉴于热河人民在敌伪的“配给”政策下，生活必需品如布匹、针线、食盐等奇缺，冀热边八路军打通了关内外的贸易关系，既解决了群众的困难，又扩大了党的影响，有助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巩固。在战争的环境下，各抗日民主政权始终注意领导和保护群众努力进行生产，以支持抗日游击战争和改善广大人

民群众的生活。

在党的建设上，努力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由于敌伪在热河大搞集家并村，使党员脱离党的组织，党的基层组织多遭破坏。冀热边特委在恢复和发展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把恢复发展党的组织放在重要地位。在已建立过党组织的集家并村区，根据党员的不同表现，分别采取恢复党籍、重新入党、或在斗争中继续考察、或不予恢复党籍等办法纯洁并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在新开辟地区，克服关门主义倾向，在斗争中大量的发展党员。党的组织尽量精干、隐蔽，以适应残酷的斗争环境的需要。

另外，冀热察边界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之所以能够百折不回，在苦斗中不断发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认真地贯彻了党中央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极大地孤立了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抗日战争时期，在党的救亡图存号召下，许多知识分子加入革命行列，承平宁联合县的韩佑庵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韩佑庵是宁城县平房村人，学生时代就读于热河省承德中学。毕业后，当过职员、小学教员、喀喇沁旗财政局长等职。九一八事变后，他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深为愤慨。热河沦陷后，他坚持民族气节，弃职还乡。他的一些旧友和同事多次登门，劝其出来为日本人做事，他均以“我是中国人！”一言以拒之。1942年春开始参加秘密抗日活动，收集敌人情报，支援游击队粮米，掩护八路军活动，协助三区队一举攻下了宁城县城。后来，在承平宁游击根据地最困难时期，仍然坚持抗日斗争，始终不渝，直至抗战胜利。

在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热河各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党组织，在坚持以武装斗争为主要的斗争形式的同时，还分化瓦解敌伪军，争取敌伪人员站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来，或使之暂时保持中立，以利于打击最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由于八路军武装斗争的威慑，党的统战政策的感召，使许多敌伪人员向

共产党、八路军靠拢。一些敌伪基层的牌、甲成了“两面”政权。如在凌青绥根据地的建昌老达杖子地区，就有51名伪牌、甲长暗中为抗日政权办事，其中有些人因此被敌人抓去坐牢。吴坤杖子就有6名牌、甲长因反满抗日的“罪名”被捕，4人死于敌伪的狱中。对某些比较顽固而有实力的伪军政头面人物，通过写信、派人传话、直接谈判等各种方式，对他们进行警告、争取和教育，虽然还不能使他们站到抗日方面来，但也起到了杀敌气焰的作用。

党的统战工作还深入到日本军队和驻华日人之间，向他们宣传日本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共同敌人的道理，争取他们对中国人民进行的正义战争的支持。从1938年开始，日伪在平泉煤岭子修建瀑河大桥，有个日本工程技术人员井上，逐渐了解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由同情到支援，为冀热辽军工厂输送了大量炸药、雷管和胶鞋等军用物资，数次解救20多名被捕干部、群众脱险，还掩护八路军侦察员刘仲达到平泉、承德完成侦察任务。特别是他利用工作之便，想法破坏日伪的修桥计划，6年时间连续4次修桥，始终也没修成，使日伪不能正常往冀东运送兵力、物资，对支援冀热辽人民的抗日斗争，是有很大功绩的。

冀热边各游击根据地在教育和争取敌伪军政人员的同时，还坚决打击了一批死心塌地的汉奸。这样，教育、争取了多数，震慑了极少数，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综上所述，由于冀热察边界地区军民军事斗争的胜利和正确实行了党的一系列抗战政策，使热河各抗日联合县政权进一步巩固和壮大，迎来新的发展时期。

第二节 扩大解放区 准备大反攻

一、大力向东北发展



冀热辽子弟兵在帮助农民翻地

1944年7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晋察冀边区划为四个区党委和军区的指示》指出：“在冀东建立冀热辽区党委和冀热辽军区”。9月19日，晋察冀军区下达成立冀热辽军区（二级军区）的命令。当时冀热辽地区正处在敌人第一次大扫荡的紧张时刻，没有来得及进行机构调整，直到1945年1月，第一次大扫荡结束，才进行机构改组，正式建立冀热辽区党委、行署和军区，由李运昌任党委书记、军区司令员、政委，李楚离任副书记、副政委，詹才芳任副司令员，张明远、朱其文任行署正副主任。同时，将原来的第一至第五地区委、专署和军分区改为第十

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5个地委、专署和军分区，使党政军的组织机构更加完善化了。这次组织机构变动，不仅标志着冀热边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已发展为巩固的解放区，而且将热河、辽宁全境划入发展区域，为进军东北，收复失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打破所谓的伪满洲国“国境线”，向东北发展，与东北的党组织和抗日联军建立联系，并进而发展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用武力收复失地，是党中央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也是冀热边地区党组织和军队从建立那天起就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

早在1942年初，中共中央根据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变化，就为开辟东北，收复失地作了准备。从各单位抽调40多名东北籍干部，在中央党校成立东北干部训练班，经过4个月的培训，分配到晋察冀中央分局工作。晋察冀中央分局成立了东北工作委员会，由聂荣臻任书记，规定“东工委”的工作任务是：

“打破长城封锁线，牵制敌人，向东北开展工作，配合反攻。”^① 11月，又成立了冀东“东工委”，李楚离任书记，赵濯华任副书记，委员会成员有张化东、宋国祥、杨雨民，并召开第一次工作会议，决定冀东“东工委”的任务：一是向东北开展，建立抗日根据地；二是培训干部，向伪满派遣秘密工作人员。并决定将“东工委”分为两部分，杨雨民带一部分人，开辟锦热路北地区，赵濯华、张化东带一部分人开辟滦东地区。两部分各自相机向东北发展。

11月中旬，赵濯华、张化东带“东工委”部分干部来到滦东地区，与先期到达这一地区开辟工作的宋国祥第三远征工作队会合，在青龙县东部的花厂峪建立临（榆）抚（宁）凌（源）青

^①张化东、刘云鹤：《关于冀东东北工作委员会工作情况以及日本投降后挺进冀北工作概况的回忆》，1984年4月2日。

(龙)绥(中)联合县工委和办事处，张化东任工委书记，宋国祥任办事处主任。从此，滦东地区开辟成挺进东北的抗日游击根据地。

滦东，是指西以滦河为界，南临渤海之滨，以长城为中心线的长城内外广大地域。主要包括河北的迁安、卢龙、抚宁、临榆县和秦皇岛；热河的青龙、建昌、凌源、朝阳（朝阳当时属锦州省）和辽宁的绥中、兴城、锦西（当时属锦州省），是冀热辽三省的三角地带，北宁路和锦热路横贯东西，面积1.5万多平方公里，人口130万。这一地域群山耸立，丘陵起伏，雄关对峙，险要无比，历史上就是进出东北的要冲。更加之人民受日伪的殖民统治甚深，反抗之情甚烈，是发展抗日游击战争，潜军伏兵，待机进军东北，收复失地的理想基地。1941年初，冀东区党分委就派出以信修为队长的抗日武工队，从桃岭口进入青龙，秘密开辟这一地区。1942年4月初，又组成以宋国祥为队长、张仲三为指寻员的第三远征工作队，从义院口进入青龙，以老岭为中心，开辟出了300余村的游击区。

1942年6月，在“复仇”战役中，八路军主力部队摧毁了敌人的滦河封锁线，为滦东地区的开辟打开了一条道路。

7月4日，冀东区党分委和第十三军分区遵照晋察冀中央分局关于“巩固口里，发展口外，扩大根据地，武装开辟满洲国”的指示，决定开辟滦河以东地区，并派十二团总支书记杨春琅和一营营长欧阳波平率十二团一营和一个游击队东渡滦河作战，在迁安彭家洼突破战中，一营长欧阳波平不幸牺牲。而后，杨春琅带一个连返回滦西，副营长马骥带3个连和1个游击队，留下坚持开辟滦东地区。

马骥率部队利用敌人在滦东防御力量单薄的弱点，继续率队东进，经卢龙、抚宁，进至秦皇岛以北的敌占区，然后，从峪门口登长城，插入“伪满国境”，跨过绥中西部、建昌西南部，达凌源南部地区，最后又返回青龙东部，3个月时间，流动游击千

余里，首战抚宁董各庄，击溃抚宁县伪警备大队300人的阻击；二战建昌县老达杖子，奇袭伪警察分驻所，烧了住房和岗楼；三战青龙安子岭，全歼武修讨伐大队200多人，从此取消了武修讨伐大队的番号；四战青龙鲇鱼洞沟，击溃张金祥讨伐队300多人的阻击；五战临榆操营，偷袭伪皇协军独立旅旅部，俘伪旅长以下70多人。这些战斗给日伪的殖民统治以沉重打击，振奋了人民的斗争精神。当地的群众传说“八路军神兵天降”，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同时，开辟出数百村的游击区，站住了脚跟。

1942年11月，临抚凌青绥联合县成立后，除重点加强统战政策，积极向东北发展外，还着手在青龙县境内建立了5个区政权和部分村政权，使游击根据地得到巩固。1943年春，将临抚凌青绥联合县一分为二，单独在关外成立凌（源）青（龙）绥（中）联合县工委和办事处，由张化东任工委书记兼办事处主任，集中力量隐蔽开辟辽西地区。7月，在十二团一营的基础上，组建了第七区区队，罗文任队长，马骥任副队长，刘光陆兼政委。当月中旬，七区队成立后第一仗就打开了秦皇岛以北的柳江煤矿，歼灭日军40余人，伪矿警百余人，缴获轻机枪2挺，步枪200余支，黄色炸药2000多箱。秋季，派出多支武工队深入到绥中、凌源地区，开辟出多块小块游击区。1943年10月，凌青绥工委在绥中羊崖子召开会议，确定在绥中建立两个区政权，在凌源建立一个区政权和3小块游击区，并开始建立区小队和村政权，发展了一批坚定的抗日分子入党，凌青绥工委又以塔子沟、大黄羊沟为基地，派出华裕民等向兴城、锦西、义县进击，也取得了很大的战果。1944年3月，马骥率七区队经凌源喇嘛洞、后槽大岭、茶棚等地，到达锦热路的三十家子车站，深入敌占区三四百里，给敌伪的统治以打击。

凌青绥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开辟，“不仅扩大了冀东游击战争的回旋地区，而且大大激励了敌后军民，特别是东北人民的胜利

信心，扩大了党在国际国内的政治影响”。^①1944年9月，日伪军在凌青绥进行灭绝人性的“集家并村”的同时，又疯狂地进行“分区扫荡”。凌青绥八路军主力奉命转移口里，在日伪重兵“扫荡”下，凌青绥游击根据地缩小，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苦时期。针对这种情况，冀热边特委作出了《对恢复口外工作决定》，指出在日军实现“集家并村”以后，“我口外既得阵地未能巩固”，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是由于“口外敌人有长期统治基础，后备力量雄厚，我之工作历史短，基础薄弱”，加之在坚持口外工作上关心群众疾苦差，未能培养起口外地方武装等教训，致使“口外大部工作不能坚持”。凌青绥工委根据冀热边特委的指示，认真总结了前期开辟工作的经验教训，在思想上明确了4个问题：

第一，在战略思想上，明确开辟与发展口外抗日游击根据地，对于巩固冀东，解放东北的重要战略意义。口外广大山区游击根据地是冀东的依托，“历次环境紧张时，我们均依靠口外山地得到整理、苏息，并依靠此有利阵地驱除口里敌人，恢复我被摧残地区”；同时也是开辟和解放东北的前进基地，为解放东北打下基础。

第二，在恢复口外工作的指导思想，“要有自力更生精神，不依赖口里，自谋打开局面”，要切实依靠群众，发动与组织群众开展斗争，解脱群众现实苦难；要创造条件，建立政权，发展党的基层组织，积极培养与建立群众自己的干部、武装队伍，重新创造新阵地，但不放弃原阵地。

第三，在恢复口外的武装斗争策略上，因为处于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要“以机动灵活分散与集中的游击战术”，以争取时间，积蓄力量，利用时机，有效地夺取阵地，稳固地向前发展；在我军事力量尚不能控制的新区，不宜打大仗和破坏敌人交通，

^①中共中央北方局：《对冀东工作的指示》，1943年3月25日。

过早暴露目标和实力。

第四，在发动群众斗争的策略方法上，要从实际出发，依据斗争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如反“集家”斗争，由于形势的变化，要适时转向开展“人圈”内部工作，正确执行“两面”政策，争取上层分子，变“人圈”为抗日的“两面村”；同时，也要在不危及“人圈”群众利益的条件下，解除“人圈”武装，为最后解放“人圈”创造条件。

此外，还根据冀热边特委的指示，在组织结构上，改变不适时宜的组织形式，“使党政军民工作，在组织领导上完全统一起来，组织武工队，统一领导口外地区工作”，并于1945年春撤销了凌青绥工委和办事处，组建了党政军统一的领导机构——十六地分委和十六专署驻锦热办事处。地分委书记由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担任，办事处主任信修。同时，成立抚（宁）青（龙）联合县委和县政府，县委书记何济民，县长张仲三。成立凌（源）绥（中）兴（城）工委和办事处，工委书记兼武工队长刘云鹤，办事处主任信修（兼），负责开辟与坚持凌源以南、青龙以东、绥中西北一带；成立朝（阳）建（平）新（惠）工委和办事处，工委书记兼武工队长周鸣岐，办事处主任许明，负责开辟与坚持建平、土城子、叶柏寿等地。成立朝（阳）锦（西）义（县）工委和办事处，工委书记兼武工队长华裕民，办事处主任田丰，负责开辟与坚持朝锦义地区。从此，大力向东北发展的抗日战争又跨入了新的阶段。

凌绥兴工委和办事处的干部和武装人员越长城进入绥中后，以葫芦套沟、塔子沟为基地，深入发展到黄家、宽帮和兴城的碱厂，建昌的大屯一带，建立了永安、秋子沟、明水、宽帮4个区政权。工委还派出突击组到兴城的新台门等地发动群众，开辟新区。朝建新工委和办事处的干部和武装人员，按照地分委“进入朝阳老虎山等地，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建立地方政权”的部署，从抚宁荒地出发，爬山越岭，挺进朝阳，沿途多次甩掉日伪军

的尾追和堵击，经梨树沟、明水塘门、黑山科，进入朝阳六家子地区，遭到日伪军和蒙古骑兵的围击，经过激烈战斗，终于打退敌人的围攻，转入老虎山区，并争取朱杖子村伪甲长朱福义和玲珑塔伪警察分驻所所长朱福庭，站在了抗日一边，稳住了脚跟，进行了广泛的抗日活动。朝锦义工委和办事处人员从绥中的大小黄羊沟一带进入朝锦义地区，在梨树沟门、老沟、大屯、六家子一带进行抗日活动。活跃在凌源南部的岭上武工队，在队长齐英的带领下，于5月29日奇袭盆子窑部落，炸倒围墙，攻下炮楼，活捉并处决了铁杆汉奸李万昌，缴获步枪15支，并放火烧了警防所和炮楼，使日伪军苦心经营二年多的“人圈”，一夜之间化为废墟。

二、大规模地开辟与恢复热辽地区

1945年上半年，日本已预感到自己末日的来临，在中国战场上开始收缩战场。日本参谋本部的作战计划是，“阻拦华南，决战华中，退守华北，死守东北”。冀热辽和平北解放区正处在敌人“退守”和“死守”的结合地带，日本帝国主义在这一地区进行垂死挣扎，斗争特别激烈残酷。

在冀热辽区，从1944年9月到1945年6月，连续两次从东北调来2个日军旅团、9个特种警备大队和24个团的伪满军，共七八万人的兵力，进驻冀东、热南地区，连续9个月，进行两次大规模的“总体战”，企图打击八路军首脑机关，寻找主力部队决战。对于敌人的进攻“扫荡”，冀热辽解放区军民早就作了充分准备。冀热辽区党委向全党发出的指示中指出：敌寇越接近死亡，“今后之扫荡必将空前残酷，扫荡更加频繁”要求克服“敌人已无力向我进行扫荡”等的麻痹思想和错误认识，随时做好反“扫荡”的准备。^①在长达9个月的艰苦奋战中，冀热辽军

^①中共冀热边特委《对恢复口外工作的决定》，1944年9月19日。

民总动员，进行总力战，共进行336次主要战斗，毙、伤、俘和反正敌伪军8000多名，拔掉据点66处，最后粉碎了敌人的垂死挣扎，取得了总力战的重大胜利。

冀热辽军民这次连续9个月两次反“扫荡”作战，与以往历次反“扫荡”作战不同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主动出击次数达70%以上，并一度攻入平谷县城，基本上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6月份，敌人停止进攻以后，冀热辽部队立即发起开辟与恢复热辽，扩大解放区的战役。

开辟与恢复热辽地区的战役行动，是经过周密计划和精心安排的。

早在1944年12月28日，毛泽东就致电程子华：“希望你们努力向雁北、绥东、察哈尔、热河及冀东敌占区发展，扩大解放区。同时努力从事城市工作。”^①

1945年2月28日，晋察冀中央分局和晋察冀军区发出了《关于一九四五年扩大解放区的方案》，指示冀热辽区“在青纱帐开始，十四、十五、十六分区各以一部分主力配合多数武工队组成三个梅花形集团（三个集团界线由冀热辽规定），向锦热路北之热河中部及绥中地区进行战役行动，作一定地面的发展，以建立根据地并把伪满军全部或大部调回伪满境去。”并指出冀晋、冀察、冀中等地的战役性行动，“在时间上，各地均以冀热辽开辟热河中部及绥中地区的时间为基础”，“配合冀热辽的开辟热辽战役。”4月12日，晋察冀中央分局在《关于日苏中立条约废除后若干问题的指示》中，再次指示：“冀热辽区党委，对开辟热河工作，在热河建立根据地，站稳脚跟，应下最大的决心，认识开辟热河对巩固冀东有很大作用，而且要把热河作为进一步开辟东北，直接配合苏联的前进基地。”

①《平北人民抗日斗争大事记》第106页。

1945年4月，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毛泽东在大会上再次发出号召：“在目前条件下，应向一切被敌占领而又可能攻克的广大地方，发动广泛地进攻，借以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①他还指出：“在沦陷区中，东北四省沦陷最久，又是日本侵略者的产业中心与屯兵要地，我们应加紧那里的地下工作”，准备收复失地。^②

冀热辽区党委认真执行了这些指示，早在1945年2月5日就作出了《关于对热辽工作的初步总结意见与恢复开辟热辽工作的决定》，总结了历次开辟热辽的经验教训，明确了恢复与开辟热辽的方针，并决定由十四、十五、十六3个地委分别派出武工队，进入热河、辽西山区，与坚持“无人区”的干部和游击队配合，采取隐蔽方式，开展“集家”区工作，聚集力量，恢复和建立情报网、运输站，侦察敌情。5月1日，十六地委召开干部会议，专门研究了开辟与恢复热辽地区问题。冀热辽区党委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李运昌在会上对开辟热辽战役作了全面的安排部署。随后，冀热辽区党委又作出了《关于恢复与开辟热辽的各种政策》的决定。决定指出，热辽地区的文化、经济、人情、风俗都比较特殊，因此，在各种政策的执行上，也应根据不同情况而与冀东有所差异，并对“人圈”的政策、武装政策、统一战线政策、锄奸政策、财政经济政策、干部政策以及发动群众问题等一系列政策作出了详尽具体的规定。同时，跨长城各联合县准备了近百万斤粮食，两万多双鞋袜，3000匹布和其他大量军用、生活物资。各地委分别建立了地分委，抽调一部分部队主力和地方干部，组成3个挺北支队，并集中起来，进行一个时期的训练，明确北进的方针、任务、政策，认识到挺进热辽，解放沦陷区人民，是冀热辽党委的光荣任务。6月中旬，准备工作就绪，三支挺北支队象三支利箭，飞越长城，分别射向热北、热中和辽

^①《毛泽东选集》横排袖珍本第991页。

^②《毛泽东选集》横排袖珍本第990页。

西敌人的心脏。



战斗间隙的小憩。左至右：李运昌、
彭寿生、李中权、李楚离（约1943年）

的公路、电线全部破坏。十二团四连在青龙县老沟伏击一队从界岭口去牛心山的日军，除1名日军漏网外，其余70多人全部被歼。月末，曾克林率部进入叶柏寿以南山区，在绥中砬子山遭300多日军包围，并有敌机盘旋轰炸，经数小时激战，日军伤亡惨重，撤退包围。战后，曾克林率部返回绥中塔子沟一带。

东路十六地委组织的挺北第三支队，由十二团和十八团各一部主力组成，共800多人，在十六军分区司令员兼十六地分委书记曾克林率领下，6月22日开始，从义院口、界岭口、九门口三路出关，向青龙、绥中、朝阳进发。沿途连克白家店、下抱榆槐、大马坪、马杖子等9个敌据点，进抵明水塘门地区。并将义院口至大马坪

中路十五地委组织的挺北第二支队，由十一、十七两个团和赤峰、平泉、宁城、建平4个县的武工队组成，共700多人，在十五军分区司令员赵文进和热南地分委书记宋诚率领下，于6月20日从喜峰口、马兰峪越过长城，进入热南“无人区”，连克大屯、孟子岭、南天门等据点，进抵宽城。然后兵分两路，一路是十一团和4县武工队进抵平泉县棒楞树川，袭占上谷火车站，掩护北进支队和地方干部突过锦热路，与坚持承平宁地区的干部、游击队会合，恢复了承（德）平（泉）宁（城）联合县的建制，又前进到赤峰地区，成立了宁赤办事处，由张立文任办事处主任。另一路是十七团，转战兴隆县的五指山区，配合当地党政干部和游击队，领导群众摧毁“人圈”，开展反“割青”斗争，经过20多天的苦战，缴了19处“人圈”的武装，恢复了五指山抗日游击根据地。

西路十四地委组织的第一支队，有十三团两个主力连和两个武工队共500多人，在地委组织部长李越之、十三团团长师军和政委王文的率领下，于6月27日从滦平县小关门出关，经8天急行军，7次战斗，冲破敌人的封锁堵击，穿过滦平“无人区”，进入隆化、围场县境。然后兵分两路，一路由王文率领，前进至围场北部坝上；一路由李越之、师军率领，活动在凤山以北，大阁以东地区。第一支队挺进热西，使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煎熬挣扎的隆化、围场县人民，第一次看到了共产党、八路军的部队，望见了解放的曙光。伪热河第五军管区司令官赫慕侠和顾问根东大佐，曾先后纠集3个伪满军旅和6个讨伐队进行围剿。在这种情况下，第一支队化整为零，分散活动，在深山老林与敌人周旋，几乎过着全部露营生活，仅靠群众送饭菜充饥。即使是这样，仍抓住敌人空隙，组织小股部队出击，曾攻克牛肚子沟门警察所，缴枪30多支。这支部队深入敌人深远后方，苦战两个多月，牵制住敌人2万多的兵力。

冀热辽军区三支挺北支队，出长城，穿越集家区，在无后方

作战的情况下，昼夜与敌周旋，历尽千辛万苦，如同三把利刃插入敌心脏，使热河、辽西的日伪当局极度恐慌。日本侵略者急调进关“围剿”冀东抗日根据地的3万伪军回热河，围追堵截这三支挺北部队。

1945年7月中旬，冀热辽军区挺北第二、第三支队的主力先后撤回长城内的青山口和临榆、抚宁地区，留下少量武工队坚持斗争。挺北第一支队则在围场、隆化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三、热察边的攻势作战

1944年上半年，热察边的抗日游击战争也发生了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变化，平北军民主动出击，围困据点，拔除“人圈”，使被敌蚕食的基本区大部得到了恢复。6月4日，平西地委发出《目前平西形势与工作方针的指示》，确定平北的工作方针是“用大力向敌后之敌后积极伸展”，要求“步调一致，在统一的意志下南北并进”。接着，平北军民发动了夏季攻势作战，从7月23日至8月10日，共出击作战11次，攻克敌据点4处，逼退据点7处，破交40里，毁桥2座，收割电线1万斤。龙赤联合县县委书记赵振中率300多民兵，围困后城伪满军达一个月之久，最后迫敌逃窜，缴获大批军需物资，受到晋察冀军区表扬。平北八路军还逼退塞外重镇独石口的日伪军，威震塞内外。

平北的夏季攻势作战，给敌人以打击，但也引起了日伪军的警惕和报复。对此，晋察冀军区于8月10日发出指示说：“平北对张家口、宣化、北平近郊及平绥路沿线开展工作将有重要意义，但目前不宜过早引起敌人警惕和报复。”还指出了4条具体办法：一、以武工队或分散主力密切配合地方工作，大力开辟铁路两侧及城市郊外地区，平西、平北要互相策应配合进行。二、非战略上所必需，平绥路不要轻易破坏。三、宣化以东地区，仍以一二个连积极开展地方工作。四、对伪满境内，注意利用当地人民来往关系，有计划地训练干部，逐步点滴推进工作。这一重

要指示，为热察边抗日游击战争的顺利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9月，晋察冀军区命令撤销平北支队，恢复平北军分区（第十二军分区），归晋察冀军区管辖。詹大南任司令员，段苏权任政委，钟辉琨任副司令员，王亢任参谋长，吴涛任政治部主任。热察边抗日游击战争走上了巩固发展的道路。

1944年末和1945年初，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虽然败局已定，但日伪仍想死守“满蒙”地区，进行垂死挣扎。1944年8月中旬，日伪当局在热察边实行“固边推进”，增派日本关东军一〇八师团和大批伪满军，联合伪蒙军大举向平北根据地发动进攻，再次侵占独石口、后城等地，并由西向东蚕食平北根据地二三十里，疯狂地进行烧杀扫荡。9月22日，在张家口召开伪满、伪蒙疆高级军官会议，确定日、满、蒙联合固边，并重划各自“警防区”范围，妄图确保其占领区。日、满、蒙的联合扫荡进攻，遭到热察边军民的顽强抗击。平北地区1944年共毙俘敌伪2000多人，解放同胞20万。

1945年1月，根据斗争形势的变化，晋察冀分局决定撤销平北地分委，恢复平北地委，段苏权任书记，陆平任副书记。3月，又成立冀察第十二专署，张孟旭为专员。共管辖赤城、龙关、崇礼、涞源、宣怀、延庆、昌平、怀顺等8个县。

1945年上半年，热察边的抗日斗争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平北军民频频出击，连战皆捷，伪满军和伪蒙疆军军心动摇，江河日下，平北军民掌握了战场主动权。3月15日至4月15日的春季政治攻势，运用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相结合的办法，加深了日军中早就存在的思乡厌战情绪，伪满军和伪蒙疆军则预感末日来临，惶惶不可终日。3月下旬，詹大南和段苏权指挥四十四团和警卫连，在南梁村一战，毙伤日军七八十人，伪军300余人，使日伪军只能龟缩在少数据点里，再也不敢出来扫荡。5月，为配合冀察军区发动的察南战役和冀热辽军区发动的热辽战役，平北部队连续发动两期战役，扩大解放区面积1万多平方公里，将伪满军

推过外长城一线。第一期战役从5月15日开始至25日结束，共克敌伪据点4个，逼退据点12个，基本上打破了被分割的局面，平北根据地连成一片。第二期战役由5月25日至7月20日，奇袭崇礼县城，伏击龙门所，逼退伪满洲国第一防线的伪满军，收复独石口、云洲、后城、大庄户、二道关等据点。两期战役共攻克与逼退敌据点32处，毙伤日军323人，毙伤伪军810人，解放村庄172个，人口10余万。特别是龙门所一战，段苏权率部采取佯攻东卯，设伏龙门的战术，一举歼灭伪满军主力第六团的4个连，击毙副团长大田茂以下50余名日军，使伪满军不敢越过长城一线。

与此同时，平北地委还积极组织力量，大力向热西推进。5月，将丰滦密联合县由冀热辽划归平北管辖，并成立平北地委热西分委和热西支队（由关涛任分委书记，王亢任支队长。热西地分委领导昌平、怀顺、丰滦密三联合县县委）。7月，晋察冀军区发出《冀察深入开展热西南工作指示》，指出“平北6月份至7月初战役结果，已实现了将伪满军向独石口至四海全线挤退至外长城以外的目的。为巩固平北既得胜利，应继续对东撤之伪满军积极进逼，……向热河西南部扩大解放区。”根据晋察冀军区这个指示精神，平北地委决定成立滦平（西）、丰宁两个工委和办事处，隶属热西地分委领导，并组成武工队，先行恢复和开辟热西地区。

随后，滦平（西）工委、办事处在四海成立，工委书记刘文科，办事处主任张振东。滦昌怀县大队，攻克汤河口、琉璃庙敌据点，歼敌300多人，恢复了滦平西部地区。同月，冀热辽挺北第一支队政委李越之建立滦平（东）办事处，张静之任主任，在滦平东部地区开展抗日活动。丰宁（西）工委、办事处在龙门所成立，工委书记王子明，办事处主任陈道明，并组建一个武装中队，三进龙赤特三区，作恢复和开辟工作，很快在黑河川建立起3个区政权，发动群众，拆毁“人圈”，重建家园。从此，热察边的抗日斗争已进入了大反攻的前夕。

第三节 抗战胜利 热河全境光复

一、苏联对日宣战，解放区军民大举反攻

1945年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8月9日，苏军在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指挥下，150万大军，分兵4路；在4000多公里战线上，与日本军开展全面作战。

进入热河的为马利诺夫元帅指挥的外贝加尔方面军和由乔巴山指挥的蒙古军队也分4路：第一路为第六近卫坦克军，翻越大兴安岭，到达鲁北，经开鲁、通辽直趋沈阳。第二路为五十三集团军，沿农乃庙、富山屯到林东，进攻北票、朝阳、阜新、锦州。第三路为十七集团军，从尤奇吉尔庙发起进攻，占领林西后，经赤峰进到凌源、平泉、绥中。第四路为苏蒙军骑兵机械化部队，主攻张家口方向，其一部经多伦到承德。苏联红军所到之处，日本关东军纷纷溃败，伪满洲国各级政权顷刻瓦解。

苏军出兵我国东北和英美在太平洋战场上的胜利，促使中国的抗日战争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猖狂已极的日本帝国主义灭亡在即，中国人民经历8年之久的艰苦抗战斗争已经胜利在望。冀察热辽边界地区人民坚持12年之久的浴血奋战，也终将取得最后胜利。

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的8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全国一切抗日力量，举行全国规模的大反攻，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武装，向日寇及其走狗展开全面的反攻，为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而斗争。8月10日至11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又连续发布7道受降和进军命令。命令各解放区武装部队向敌伪发出通牒，限其在一定时间内缴械投降。命令各地人民军队积极举行进攻，迫使敌伪无条件投降，收复包括东北在内的一切失地。其中第2号命令指示：原东北军吕正操所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原东

北军张学思所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原东北军万毅所部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现驻河北、热河、辽宁地区之李运昌所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



冒着敌人的炮火冲杀！

毛泽东主席的号召和朱德总司令的命令下达后，对日伪军的大反攻作战在各个战场上全面展开。冀热辽部队奉命以大部主力迅速进军东北，配合苏联红军和其他人民武装解放东北，收复失地；同时进攻唐山、承德等主要城镇，完全收复冀东、热河。平北部队则奉命进攻张家口，收复察哈尔广大地区。

大反攻的命令鼓舞了冀察热辽边界地区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军民，热河人民无不欣喜若狂，庆幸终于盼来了这一天！解放区人民踊跃参军参战，农民群众碾米磨面，赶制鞋袜，支援前线；自卫队组成担架队、运输队，参加运送伤员、物资及各种后勤工作；民兵则编成班排等战斗组织，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区队、县支队、区小队等地方武装，以按级升编的办法，编成正规部队，开赴大反攻前线。这样，冀热辽区的主力部队由1945年1月的10个

团，到1945年9月已扩大到27个团。平北军分区也新组建了新四团和新六团。

坚持热河“无人区”斗争的人民更是欢欣雀跃，唱着“天明了，天亮了，‘无人区’人民解放了”的歌曲，走出深山老林，配合主力部队和集家区人民，捣毁警察所和牌、甲等伪政权机关，镇压罪大恶极的汉奸、特务，拆除“人圈”，返回故里，重建家园。冀察热辽边界地区军民掀起了大反攻的浪潮。



在欢庆抗战胜利大会上

二、进军东北，收复失地

在大反攻作战中，冀热辽区党委和军区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依靠地理位置上的有利条件，发挥主观能动精神，敏于应变，雷厉风行，迅速进军东北，同东北抗日联军、山东部队一起，配合苏联红军收复东北失地，在与国民党争夺东北的斗争中，争得了先机之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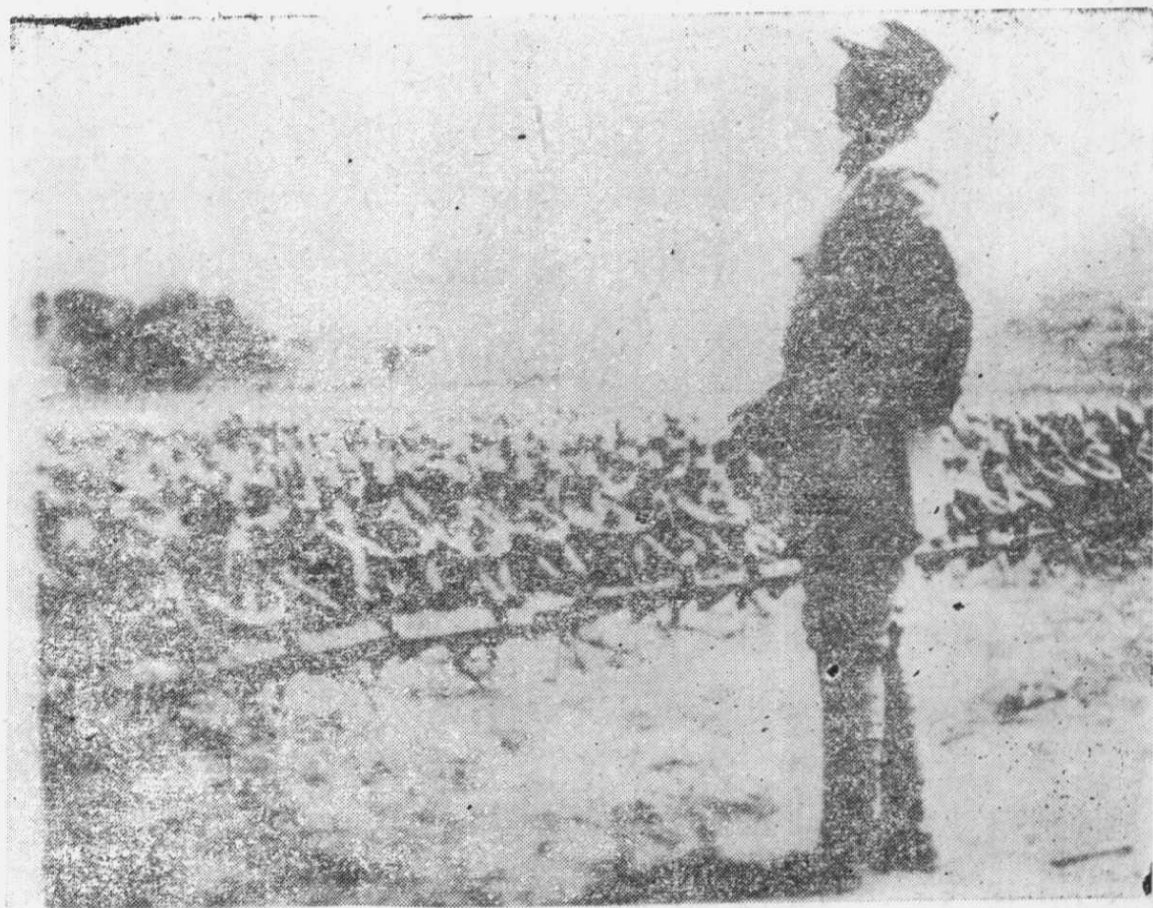
苏联红军在八路军和抗日联军配合下进军东北后，日本关东军迅速崩溃，伪满洲国政权土崩瓦解。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停战诏书》的形式正式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

降。这是中国人民反对外国帝国主义侵略的第一次完全性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的斗争形势也随之发生了急剧变化。长期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国民党政府出来“劫收”抗日的胜利果实,在8月11日连续下达3个“命令”:一个是要解放区抗日军民“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敌伪“擅自行动”;一个是要他的嫡系部队“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一个是要伪军“切实维持地方治安”。国民党中宣部发言人对于延安总部所发出的限令日伪投降的命令,竟诬为“非法行为”。国民党急切要抓到东北,蒋介石在一次军事会议上说,国民党的命运在东北,丢了东北就不能控制华北。美国也认为,国民党的最大危险莫过于共产党进入东北。国民党的宣传机器甚至叫嚣:“没有东北便没有全中国”。在这种情况下,迅速出兵东北,争得先机之利,就至为重要了。

冀热辽区的党和军队,多年来一直肩负着挺进东北,收复失地的战略任务,对进军东北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当得到苏军出兵东北的消息后,就积极酝酿进军东北,配合苏军作战。8月11日,接到延安总部第2号命令后,12日就在丰润县大旺庄召开区党委紧急会议,讨论了执行延安总部第2号命令的具体方案,确定部队进军东北的任务是:一、配合苏军作战,消灭东北和热河的日伪军及伪政权;二、收复东北失地,接管城市,建立人民政权;三、收缴敌伪武器资财,扩大部队;四、为后续部队和干部开辟进入东北的通道。会议决定,成立由李运昌、朱其文、焦若愚、李荒和王亢等组成的中共东进委员会和冀热辽挺进军前方指挥所,李运昌任书记兼司令员。还决定由李运昌率冀热辽军区部队8个团、1个营、2个支队共1.3万余人以及4名地委书记和2500多名地方干部,分三路两个梯队迅速向热河、辽宁和吉林进发。

向辽、吉地区进发的是由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副政委唐凯率领的东进军先遣纵队。8月25日,曾克林率十二团、十八团、卢抚昌支队和朝鲜义勇军支队等



冀热辽区党委书记兼军区司令员、政委李运昌在动员部队挺进东北。

约4000人，由抚宁的台头营地区出发，首战歼灭范各庄据点的日本宪兵队120余人，之后沿榆关、海阳和石门寨方向前进，绕过山海关，29日进占绥中前所，与由赤峰南下的苏军先遣部队会师。该部在苏联火炮配合下，于30日攻克山海关，歼灭日伪军1000余人。9月3日，该部从山海关沿北宁路乘火车继续东进，沿途收复绥中、兴城、锦西。4日收复锦州，解除了一个旅伪军的武装。十六军分区政委徐志、参谋长王珩及十八团留驻锦州，成立了中共辽西地委、专署和锦州卫戍区司令部。

9月5日，曾克林率部由锦州乘火车向沈阳进发，沿路收复了黑山等地。6日抵达沈阳车站，受到数十万沈阳人民的热烈欢迎。由于受中苏条件的限制，开始时，苏军不准冀热辽部队进驻沈

阳，经过反复交涉，终于争得了苏军的谅解，冀热辽部队改称东北人民自治军，接管了沈阳市的政权。后来，十六军分区部队又分别向辽宁全境和吉林进军，解除了近万名伪军武装。

继东进先遣纵队之后，1945年9月初，李运昌率冀热辽军区第二梯队十五团、四十六团、四十七团、军区直属队及特务营5000余人出关，沿北宁路前进。9月14日抵沈阳。旋即成立辽宁省行政公署，朱其文任主任。成立沈阳市政府，白希清、焦若愚任正副市长。18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在沈阳正式成立，东北的各项工作全面展开。

冀热辽军区部队挺进东北后，进行了下述工作和斗争。

第一、配合苏军继续消灭日伪残余武装力量。苏军击溃日本关东军的主力后，进占了东北四省的一些大城市。但是，关东军残余武装并未完全投降，许多地方的日军还在负隅顽抗。苏联外贝加尔方面军司令马利诺夫斯基、参谋长扎哈罗夫在回忆中说：就是日本天皇颁布投降之后，个别分散的日军集团和筑垒地域的某些守备队，长时间没有停止战斗行动。至于伪满军警则有成团、成队、成旅的武装不但没有缴械，还继续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冀热辽部队进入东北后，经过战斗或发出通牒，才将他们歼灭或解除武装。据不完全统计，冀热辽军区部队出关作战共解除伪军5个旅、2个团和60个县市的伪警察大队等约4万人的武装，解除日本关东军5000人的武装，争取了两支伪军起义。

第二、与苏军交涉，取得共产党、八路军在东北立足的地位。苏军由于受《雅尔塔协定》、《波茨坦公告》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约束，对进入热河、东北的冀热辽军区部队，开始曾表示怀疑和限制，不准进入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冀热辽出关部队向苏军首脑机关及其负责人员，反复说明我军是奉延安八路军总部命令挺进东北，收复失地的。经多次交涉，坚持原则，据理力争，取得了在东北立足的合法地位。并派出曾克林陪同苏军代表，飞赴延安，及时向党中央汇报了东北情况，促进了全国

战略方针的转变。这对于后来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挫败国民党政府的企图通过外交途径，从苏军手中接收东北的图谋，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放手发展武装，迅猛扩大部队。冀热辽部队进军东北后，除吸收一部份愿意参加八路军的伪军士兵外，特别注意从失业工人和从关内抓来的劳工中吸收兵源，扩大军队。这个部队由出关时的1.3万余人，迅速发展到了12个旅、2个支队、10个独立团，达10余万人。

第四、镇压汉奸特务、国民党地下军，消灭政治土匪。国民党为争夺东北的控制权，除积极调兵遣将进攻东北外，还利用敌伪的军警宪特等残余势力，加以委任，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的地下军、政治土匪。共歼灭政治土匪和国民党地下军2万余人。

第五、协助地方建立人民政权。在国民党军对东北发动大规模进攻之前，辽宁46个市县，吉林东部8个市县，黑龙江西部2个市，都建起人民政权。

第六、收缴敌伪武器资材，装备部队，支援后续部队。冀热辽部队从日伪军的手中和一些军火库内，抓紧收缴了一批武器资材，除装备本部外，还支援了从山东、延安等解放区来东北的各部队，并通过葫芦岛、营口等港，运往山东解放区一批武器弹药。

综上所述，冀热辽部队进军东北是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的。

在冀热辽部队挺进东北的同时，热察边境地区的平北军分区也奉命向张家口方向挺进。8月15日，平北骑兵大队（辖3个骑兵连、2个步兵连）在张北与苏蒙联军会师，并接管了张北县城。16日，平北军分区政委段苏权率主力十团、四十团和教导大队由赤城出发向张家口挺进。与友邻部队配合，经3日连续猛烈进攻，于23日下午收复了张家口，毙伤俘日军200多名，伪军伪警2000多名，缴获枪炮等大批军用物资，活捉伪蒙疆政府副主席于

昌卿和伪张家口市市长韩广森等，为建设冀热察根据地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三、日本投降，热河全境光复

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很快传遍热河全境。冀热辽挺进军中路军赵文进、宋诚部和西路军舒行、李子光部，越长城向热河北部和中部进发。分布在热河各地的八路军游击队、地下工作人员也纷纷起来，配合苏联红军、八路军，围据点，拆“人圈”，接收敌伪政权，很快收复热河全境。

冀热辽挺进军中路军是由第十五军分区的十一团、五十一团组成的，约3000多人，由分区司令员赵文进和地委副书记宋诚率领，8月17日从喜峰口出关，向平泉、赤峰猛进。首先摧毁青宽地区的“无人区”，然后在宽城附近收编伪满洲军一个旅，进至平泉，与苏军会师，并分兵进击宁城、凌源，直达赤峰。

冀热辽挺进军西路军是由第十四军分区的十三团、十六团各一部及已在热西的挺北一支队组成的，共约2500余人。在军分区司令员舒行、政委李子光率领下，8月19日越过长城，进入热南“无人区”，冲破兴隆县地区国民党的阻挠破坏，促成即将接受国民党委任的伪第五军管区西南地区司令黄方刚和伪兴隆县长于佩珊率所部2万余人起义，独立收复兴隆县城，成立县委、县政府，县委书记李文玉，县长王佐民。然后西路军挺进承德，与苏军会师。

在冀热辽部队胜利进军的影响下，驻青龙县的伪满讨伐队2000多人，在张金祥率领下举行起义，接受改编。同时，接收青龙县城，并成立中共青龙县临时行政委员会，政委张凯，主任张笠生。

在冀热辽各路大军挺进热河的前后，原在冀察热辽边界地区坚持“无人区”斗争的八路军游击队、武工队及地下工作人员，在收复热河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热中和热北地区。8月17日，共产党地下工作者王逸伦与

苏联红军会合，组织队伍，扩充武装，与苏军联合剿灭日伪残余武装，维持赤峰、平庄（建平县城）、乌丹一带治安。宁赤办事处主任张立文，24日接收了宁城县马占城子大村伪政权，25日接收了大明城伪政权，然后带游击队开赴赤峰，组建赤峰市政府，张立文任市长。由冀中解放区流落到热北的张英信以八路军身份收编了驻防喀喇沁右旗王府的一部分伪军，也组织起一支游击队。到9月份，成立赤峰县委、县政府，县委书记陈光，县长李继昌，张英信部被改编为赤峰县支队。

8月18日，苏联红军进占平泉。19日，先期出关的冀热辽挺进中路军迁青平支队在平泉小寺沟与苏联红军会师。次日，在平泉人民和苏军热烈欢迎下进入平泉县城。9月初正式接管日伪政权，并成立平泉县委和县政府，由夏洪林任县委书记，贺文涛任县长。至此，热中地区和热北的部分地区已在共产党、八路军的控制之下。

在热西地区。8月18日，苏蒙联军一部在冀热辽挺北第一支队师军、李越之部配合下，解放丰宁凤山镇，俘敌300多人，随后成立丰宁（东）县委、县政府，彭寿年任书记，陈庆云任县长。8月20日，挺北第一支队王文部独立收复围场县城，然后与苏军会师，解放全县，成立县政府，王文任县长。8月21日，冀热辽挺北第一支队派出的滦平工委、办事处，接收滦平县城鞍匠屯，遂成立滦平（东）县委、县政府，由王泽民任县委书记兼县长。同月，平北派出的滦平（西）工委、办事处也改为县委、县政府，县委书记刘文科，县长张振东。8月22日，挺北第一支队配合苏军收复隆化县城，成立县委、县政府，县委书记罗平，县长张东屏。9月15日，冀热辽挺北第一支队师军部，配合苏军进占丰宁大阁，将伪满军第五旅缴械，随后，丰宁工委和办事处人员进驻大阁，并成立丰宁（西）县政府，陈道明任县长。这样，热西人民获得了彻底地解放。

在热南地区。8月19日，苏蒙联军进占热河省会——承德，

缴了日伪军的械。伪军第五军管区中将司令赫慕侠等17名将校级军官、日本顾问根东大佐、高级参议南清一等人被俘。在东边道及热河制造“无人区”的元凶、伪热河省次长岸谷隆一郎举家自杀身亡，终于难逃灭亡的可耻下场。同时，苏军打开承德监狱，营救出300多名被关押的抗日军民，经协商成立八路军临时办事处，由李清超任主任。月底，原遵化县长郑旭奉命进入承德，成立热西工委、办事处，开始接收日伪的武器资财，负责维持社会秩序，并与以伪热河省长孙柏芳为首的维持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8月20日前后，承兴办事处三区队捣毁了大彭杖子、八家和柳河口等伪据点，缴获步枪五六百支；四区队捣毁了上板城、下板城、西大庙等伪警察机关，并在下板城成立承德县委、县政府，县委书记安璞，县长张瑞霖。承兴和承兴密联合县的联合接收工作组，也接收了聚集几千伪军警的热南重镇——鹰手营子，伪军警全部缴械投降。至此，劫后余生的热南人民，完全从殖民主义枷锁中解放了出来，他们敲锣打鼓，扭秧歌，踩高跷，跑旱船，耍龙灯，兴高采烈的欢庆胜利。

在热东地区。8月20日，苏军由赤峰进占凌源县城。21日，南下建昌，然后进军绥中。另一路苏军于8月31日进占朝阳、北票、阜新，然后南下锦州，热东全境光复。在苏军进军热东后，活动在凌青绥山区坚持敌后武装斗争的信修、齐英两支武工队和党的地下工作者赵子卿、刘永生等，配合苏联红军，同形形色色的敌对势力进行了短兵相接的斗争，并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早在八一五光复前，冀热辽区东工委就派共产党员赵子卿到热东重镇朝阳做地下工作，了解敌情，秘密发展党员。日本投降后，朝阳国民党地下组织网罗伪军警，成立保安军，公开挂出国民党牌子，妄图接收朝阳。面对这种情况，赵子卿在群众的支持下，闯入国民党党部，以东北工作委员会朝北工作组组长的身份，严令国民党书记长叶相桐：（一）摘去国民党县党部的牌子；（二）不准收编伪警察；（三）不准成立保安军。叶相桐只

好一一照办。辽西地委建立后，正式建立了朝阳县委和县政府，张荣远任代书记，赵子卿任县长，从而赢得了与国民党争夺朝阳第一个回合的胜利。

在北票，日本投降后，党的地下工作者刘永生就公开了八路军的身份，并面见伪旗长沁布多尔济，正气凛然地宣告：（一）废除伪旗公署，伪职人员一律听候共产党命令；（二）伪旗警队改编为保安自卫队；（三）选举各方代表保护矿山财产。沁布多尔济不得不答应这些要求。

与此同时，锦热办事处主任信修率武工队接收了绥中县城，成立绥中县委、县政府，信修任书记，华裕民任县长。齐英的岭上武工队接收了凌源、建昌和喀左等县旗，并分别建立了县委和县政府。凌源县委书记邓述文，县长江田；建昌县委书记李贺年、县长师小帆。喀左旗委书记刘茜，旗长鄂其尔旺宝。阜新县也建立了县委、县政府，书记林沛然、县长刘哲生。辽西的锦县、兴城、义县和锦西县等也由锦热办事处派出干部，分别成立了县委和县政府。热东、辽西大地完全成为人民自己的天下。

冀热辽部队挺进热河后，经一个多月作战，消灭和改编伪满军3个旅、12个讨伐队和20余市县的伪警察队约2万余人，收复了热河全境。

抗日战争胜利了，这是热河人民和全国人民付出了极大的牺牲换来的。据不完全统计，从1933年至1945年，热河人民被日伪军杀害4.5万余人，伤残3000余人，被日伪当局抓去充当“劳工”的共计14.4万余人，大部惨死外地。被日本侵略者抢去的猪、羊和耕畜达1261万多头（只）。被烧、拆毁房屋382万多间。被日伪强迫劳役123万余人，造成59万多人衣食完全无着。日本侵略者对热河人民所犯的罪行，是罄竹难书的。

在12年的艰苦抗战中，共产党、八路军与热河人民同生死共患难，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在热河的广大原野上到处都洒下了抗日英雄、爱国志士的鲜血。共计牺牲军政干部500多人，战士

6000多人，其中仅县团级以上干部就有包森、杨大章、田野、白乙化、阎正化、耿玉华、王波、高桥、廖峰、占中、陈荣、李建国、张真理、姚铁民、刘全民、张更生、樊凌玺、沈爽、胡毅等20多人。

具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中国人民，在共产党、八路军的领导下，进行前赴后继，艰苦卓绝地斗争，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9月2日，在东京湾美舰“密苏里”号上，日本正式签订了投降协定。从此，9月3日就成为世界人民抗战胜利纪念日。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近代史上反侵略战争唯一的一次完全胜利，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弱国战胜一个帝国主义强国的光辉典范。同时，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和壮大，为夺取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准备了条件。

第六章 反对国民党武装进攻 解放区实行民主改革

第一节 抗战胜利后的热河形势

一、国民党“接收”热河的阴谋

由于热河战略地位的重要，控制热河具有极其重大的战略意义。日本一投降，国民党与共产党就展开了争夺热河的激烈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了，经过十多年苦斗的热河人民，渴望和平民主的新生活，以便休养生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被日本侵略者严重破坏的工农业生产，进行经济建设，重建家园。但是，热河人民这种良好愿望，一开始就受到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威胁和破坏。

对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热河人民还记忆犹新：1933年，10几万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退，把热河拱手让给了日本帝国主义。正如一首民谣中唱的：“十二年亡国苦难当，盼望祖国早解放，左盼右盼不见面，好象孩儿离了娘。汤玉麟，国民党，抛弃热河跑得忙，一跑再跑去的远，我们向谁诉衷肠！”在以后多年的浴血抗战中，国民党没往热河派过一兵一卒，热河抗战的胜利，完全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取得的，是几百万热河人民艰苦奋斗，流血牺牲换来的。但是，国民党却要来抢夺人民的胜利果实，妄图在热河重建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国民党的倒行逆施虽然受到了美帝国主义的大力支持，却必然会遭到共产党和热河人民的坚决反对，热河人

民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热河，绝不准再回到殖民地或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老路上去。这样，共产党领导下的热河人民同美帝国主义支持的以国民党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矛盾迅速上升为主要矛盾，展开了争夺热河的激烈斗争。

国民党为了从人民手中抢夺热河，1945年9月，在重庆宣布恢复热河省政府的建制。10月8日又进行一次改组，由东北军将领刘多荃出任热河省主席，并于12月4日由重庆迁往北平，31日迁往锦州。

国民党热河省政府成立后，多方活动，准备“接收”热河省政权。首先将热河省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谭文彬、毛韶青、成蓬一等网罗在一起，成立起热河省政府的班底。通过他们再网罗热河地方汉奸及地主阶级分子，控制热河政局。其次，大肆收编伪军、伪警，给汉奸头目封官加委。在兴隆的伪满军、讨伐队全部摘掉伪满牌子、帽徽、烧毁全部档案，换上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挂出国民党“先遣军”的牌子，等待国民党接收。后因冀热辽西路军逼近兴隆，黄方刚率部起义，国民党的阴谋才宣告破产。在丰宁的伪满军第五旅副官张锡福，被委任为国民党先遣军司令，导演了一出假“光复”的丑剧。昨日的汉奸卖国贼，一夜之间变成了国民党的官员，并继续到白草等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屠杀抗日群众。9月15日，在冀热辽挺北第一支队师军部配合下，苏军回师大闹，才粉碎了这起假“光复”的阴谋。再次，收编土匪，破坏热河人民的和平生活。林西县的反动地主于秀成拉起300多人的土匪武装，接受国民党的委任，占据林西县城；丰宁惯匪韩继功、张福元等被收编为国民党第十一战区第五纵队，于10月1日攻占了丰宁县城大阁镇，到25日，由平北军分区副司令钟辉琨指挥所部，并在热河二旅配合下，向敌进攻，才收复了大阁镇。

热河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粉碎了国民党“行政接收”的

阴谋。

二、共产党控制热察和东北的总方针

日本投降前，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方针是全面扩大解放区，深入敌后创建根据地，重点是“向南发展”。所以，派出多路部队和干部，南下作战，并曾一度拟定了发动上海起义，首先解放江南的计划。苏联出兵东北和日本投降以后，形势起了急剧变化。一是国民党军队在日伪军的配合和美国的帮助下，迅速抢占了华南和江浙一带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在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区形成了力量对比的敌强我弱局面，人民革命力量在这些地区大发展是有困难的。因而，毛泽东于8月21日为中央起草一个指示，停止了上海起义的计划。二是在长江以北，“连任何一种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没有，”，①大城市、铁路及海岸，几乎都在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包围和控制之中，这就使国民党不但不能控制华北，连进入东北和华中，“都有极大的困难”，②特别是东北与热察两省，在这些地方形成了力量对比的我强敌弱的局面，是当时最有利于人民革命力量发展的地区。因此，8月26日，毛泽东起草的党内指示中指出：“中央决定派千余干部由林枫同志率领去东北。万毅同志所率军队仍须进至热河边境待命，可去则去，不可去则在热河发展，造成强大的热河根据地（热察两省不在中苏条约范围内）”。三是国民党长期消极抗战，主力部队远在大西南，与热、察和东北隔开一个辽阔的解放区，运兵非常困难。而冀热辽和平北两解放区，完全控制了冀察热辽的走廊地带，便于派部队和人员进入东北；胶东解放区又与辽东半岛隔海相望，可以从海上运兵；东北抗日联军坚持长期抗战，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因此，8月29日，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后，又对当时形势作出了新的估计，发出了一系列指示，指出：“我党还有很好的机

①②《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第70——71页。

会争取东三省和热察”，要求“准备派到东三省的干部和部队，应迅速出发”。并指出进入东北的部队“可用东北军或义勇军等名义”，“走小路控制广大乡村和红军未曾驻扎的中小城市，建立我之地方政权及地方部队”。特别指出：“热察两省不在中苏条约范围之内，我必须完全控制，必须迅速派干部和部队到一切重要地区去工作，建立政权和地方武装”，“一切只要红军不坚决反对，即应放手进行。”^①

通观这些有利条件和部署，不难看出，党中央依照变化了的形势，正在酝酿全国战略方针的重大转变，即由“向南发展”转变为“向北发展”。同时，也由于对东北情况不明，特别是对苏军的态度不明，还没能最后下定转变战略方针的决心。

就在这关键时刻，先期进占沈阳的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沈阳卫戍区司令员曾克林，于9月15日同苏军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代表别斯洛夫乘飞机抵达延安。中央政治局在刘少奇主持下连夜召开会议，听取曾克林关于冀热辽部队进入东北后各方面情况的详细汇报。同时，朱总司令也同苏军代表进行了谈判。这两方面的情况，对中央实行新的全方位的战略转移起了重要作用。

首先是东北的情况明了，冀热辽部队大反攻后，完全控制了热河、锦州地区，还进占辽宁、吉林、黑龙江的广大地区，部队由1.3万人迅速发展到了12万多人。苏军只驻扎在交通沿线大城市，许多中小城市及广大乡村我军能够自由发展。其次是苏军的态度也明朗化起来。苏军代表携带的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给朱德总司令的信中说：“元帅转告朱总司令，他不论对总司令个人，不论对八路军均抱深厚之同情。”“红军统帅部转告朱总司令，红军不久即将撤退，届时中国军队如何进入满洲，应由中国军队自行解

^①1945年8月29日中央电报指示。

决，我们不干涉中国内政。”^①在这封信中，承认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都是中国军队，都有接收东北的权利，这比中苏条约中只承认国民党为全权接收东北的“合法政府”的态度来，已经有了本质的不同。更为重要的是，苏军承认热河、锦州两省（伪满建制）属冀热辽解放区范围，决定提前从两省撤军，这就给我们完全控制热河创造了条件。

根据这些新的情况，将全党的战略方针由“向南发展”转变为“向北发展”的条件已经成熟，中央政治局于9月15日决定成立东北中央局，以彭真、陈云、程子华、伍修权、林枫为委员，彭真为书记，并于次日乘苏联飞机赶赴沈阳。17日，刘少奇、朱德给正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周恩来发电报指出：“东北为我势所必夺，热察两省必须完全控制。”正式提出“我们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并具体提出了将新四军江南主力转移到江北，调华东新四军北上到山东，再从山东、冀鲁豫抽主力北上的意见。毛泽东、周恩来立即回电表示完全赞同。19日，党中央发出了《关于目前任务和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和部署的指示》，明确指出：“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们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②“九一九”指示的下达，标志着抗日战争后全党新的全方位战略方针的确立。后来，党中央又进一步提出了“巩固华北，争取东北，坚持华中”的战略部署，使“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更具体化、完善化了。

新的战略方针确定后，党中央以极大的魄力，采取许多重大措施，组织战略方针的转变和实施。（一）为了控制热察，发

^①陈平：《冀热辽部队进军东北的经过及其战略作用》，载《热河革命史资料》第14期。

^②《刘少奇选集》下卷第371页。

展东北，决定大规模调兵北上，共调集13万大军（包括先期进入东北的冀热辽部队）、2万干部迅速开赴热河、东北（其中包括中央委员、候补委员25人，占七大中央委员、候补委员的三分之一）。并且反复强调“时机万分紧迫”，“不容许片刻迟缓”，否则，“将逃不了历史的惩罚。”终于争得东北的控制权。（二）有效地组织了向南防御，连续打了平绥战役、津浦战役和平汉战役，切断了所有通往北方的陆路交通，阻止和迟滞了国民党四路大军到平、津、张建立基地，抢占热察和东北的计划。

总之，从抗战后期的南下战略，到抗战胜利后转变为北上战略，是一个为适应形势发展而逐步变化的过程。这个转变在中国革命的严重转折关头，发挥了巨大作用。在这个战略方针指导下，不仅建立起巩固的东北根据地，而且建立起联结东北和华北的冀热辽根据地，结束了革命根据地在战略上长期处于敌人四面包围的历史，为迅速打败国民党军队的进攻，由北而南夺取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创建新的冀热辽根据地

苏联红军和八路军进入热河全省后，摧垮了日伪政权，但在苏军驻扎的地方却出现了伪政权的变种——维持会。伪满汉奸走狗——伪省长、伪县长乃至伪村长等，都改头换面，成了各级维持会长。他们打着拥护苏军，维持地方治安的旗号，继续欺压人民，对抗共产党的领导。当时，摧毁一切旧政权，建立人民的新政权，创建以热河为中心的，新的冀热辽根据地，就成为一项最为紧迫的任务。

为了把热河全省掌握在人民手中，建成强大的热河根据地，早在日本投降前夕的8月14日，晋察冀中央分局就决定派胡锡

奎、王国权、①段苏权②等领导干部，分别带一部分军队和干部开赴热河，筹建热河省委、省政府和省军区。又派杨雨民带一部分热河籍干部、战士回热河工作，准备接收敌伪政权。9月中旬，胡锡奎、王国权、段苏权以及李子光、杨雨民等一批党政军领导干部相继到达承德，开始建党、建政、建军工作。

当时的热河省会——承德，还在苏军的控制之下。伪热河省省长孙柏芳当上了热河省维持会长，一些伪军、伪政、伪警人员麇集在维持会的大旗之下，继续为非作歹，欺压群众。他们公然张贴布告，宣称一切要经过伪省长处理；又明目张胆地挂了一天国民党的招牌；还不断地派特务打黑枪，搞暗杀，阴谋暴乱，造成人民不能彻底解放，社会秩序异常混乱的局面。苏军囿于中苏条约的限制，只承认维持会的合法地位，不能公开承认共产党、八路军的合法存在，明令禁止共产党在市区25公里以内驻扎军队，不准上街宣传，更不准建立政权，还一度要求进入满洲的共产党军队退出苏军控制区，其中包括承德、平泉、朝阳等城市。这

①王国权，原名康午生，字厚庵，河南省巩县人。1923年在开封读书时加入左联组织，1934年东渡日本求学，1935年参加联共并转中共党员，1936年回到北平后又转赴延安抗大学习。1937年底，到晋察冀根据地，任一分区地委书记。1945年日本投降后来热河，任热河省委民运部长兼承德市委书记，后又任热东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解放后，任热河省委第一书记，1955年调外交战线工作，曾任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澳大利亚等国大使。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外事委员会副主任。

②段苏权，湖南茶陵人，1916年7月生，1930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后历任少共茶陵高陇区委书记、少共茶陵县委书记、中共岭东特委书记兼红岭独立师政委等职。1938年后历任总政治部教育科长，平北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军政委员会书记，平北地委书记兼平北军分区政委。1945年9月后历任热河军区司令员兼赤峰、承德军调处执行小组中共代表，冀热察区党委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东北第八纵队司令员、党委书记，东北军区副参谋长。1950年后历任东北军区空军司令员、福州军区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政委等职。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样，严重限制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活动，助长了国民党和维持会的气焰。

中共中央对热河的这一情况非常重视，对苏军进行了有理有据的交涉。9月15日，由朱德、刘少奇、任弼时联合致电苏军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提出“在热河、辽宁之各一部，自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即有八路军活动，并创建有根据地（见附图），请允许该地区八路军仍留原地。”这一点得到了苏军的承认。对这件事，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和哈扎罗夫大将在其回忆录《结局》一文中，也明确地记述说：“特别指出的是，当苏军给日本占领军以致命打击和进行追击时，国民党将领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支援解放中国东北的红军”，“可是当苏军在所有作战方面胜利发展进攻，并向满洲腹地猛攻日军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应为八路军一编者）也转入对日本占领者的进攻。”“我们记得，在8月11日，八路军便开始大举进攻，几乎整个华北地区，其中包括张家口、热河（承德）等大城市转入到八路军手中。在这些地区，后贝加尔方面军的右翼部队，同八路军协同作战。”

为了使苏军对热河、锦州解放区的口头承认变为实际行动，中共中央于10月19日电示中共中央东北局：“速向友方交涉，让出热河政权，首先是承德、朝阳地区；以便我方放手武装民众，摧毁伪军伪组织，组织热河人民自治政府，否则无法抵抗蒋军从北平向热河之进攻。”

与此同时，胡锡奎、赵毅敏等一批党政干部进驻承德后，也多方与苏军交涉，终于争得了苏军的同意和默许，承认热河和锦州两省（伪满建制）为冀热辽解放区范围，苏军提前于10月22日开始从承德、朝阳、锦州等地撤军。这是热河外交上的一个重大胜利。这一胜利，既是冀热辽军民长期艰苦抗战的必然结果，也是冀热辽军民开展大反攻，配合苏军解放全热河的必然结果。这一胜利，不仅使我方在军事上控制了重要战略地带，而且在政治上

也取得了合法地位，为嗣后在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斗争中争得了主动权。

在中共中央、东北局与苏军交涉让出热河政权的同时，9月中旬，热河行政公署在承德成立，李子光、杨雨民分别担任正副主任，开始做接收热河省政权的工作。9月20日，晋察冀中央局决定，成立冀热辽区党委热河分委和热河军区，由胡锡奎兼分委书记和军区政委，段苏权为分委委员兼军区司令员，李子光、王国权为分委委员兼副书记。在这前后成立了热中、热东、热北、热西、热南5个地委、专署、军分区和中共承德市委、市政府，分别接管了各地方政权。中共承德市委书记由王国权兼任，市长郑旭，副市长史立德。

10月14日，经过召开各界人士会议，民主协商，热河省民主政府宣告成立，委任李子光为主席，杨雨民为副主席，并举行就职仪式和接交仪式，伪热河省省长、维持会长孙柏芳正式交出政权，赤峰、朝阳、平泉等县市也分别接收了伪政权。从此，热河省的政权真正回到了人民手中，使热河成为共产党、八路军完全控制的全国唯一省份，实现了党中央控制热河的战略部署。

抗战胜利之初，党中央对于能否争取到完全控制东北没有把握，因此把热河的战略地位看得非常重要。9月19日，中共中央决定的在承德成立冀热辽中央局，扩大冀热辽军区，以李富春为书记，林彪为司令员的方案，就是以热河为根据地，进而夺取东北的计划部署。后来，因东北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军开进去了，站稳了脚跟。随着情况的变化也变更了部署，中共中央决定李富春、林彪都到东北去。10月27日，又决定成立冀热辽中央分局和冀热辽军区，原冀热辽区党委和军区改为冀东区党委和军区，归冀热辽分局和军区管辖。11月9日，中共中央任命了冀热

辽中央分局和军区的领导干部，程子华^①为书记，肖克、罗瑞卿、李运昌、胡锡奎、赵毅敏、吴德、詹才芳为委员，以后又陆续增加黄火青^②（副书记兼副政委）、杨清（欧阳钦）、高自立等为

①程子华：1905年生，山西解县（今运城）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1927年参加广州起义和保卫陆海丰革命政权的斗争。1929年领导大冶兵暴，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五军团长、第五军团师长、师政委，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1934年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任第二十五军军长、政委，参加领导第二十五军长征和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到达陕后，任第十五军团政委，参加了直罗镇、东征、山城堡等战役。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冀中区委书记，冀中军区政委，领导和坚持了冀中平原抗日游击战争，后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代理书记、晋察冀军区代理司令员兼政委。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冀察热辽中央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创造了热河和辽西走廊根据地。1948年任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在辽沈战役中指挥塔山阻击战。后参加平津战役并任北平警备司令兼政委、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司令员，参加了渡江等战役。建国后，历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商业部长，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兼西南第三线建设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民政年增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是中共第部长。1980七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共第八、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三至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②黄火青：湖北枣阳人，1901年生。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赴苏联学习军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历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总支书、政治营政委，红军五军团十四军政委，红一方面军九军团政治部主任等职，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延安军政学院副院长、中央党校秘书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冀察热辽中央分局副书记、中共热河省委书记。建国后历任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市长，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东北局书记。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五届全国人大当选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

分局委员。同时，任命肖克为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为副司令员，程子华为第一政治委员，罗瑞卿为第二政治委员，后来又增加陈奇涵为副司令员。



冀察热辽中央分局领导同志在一起。从左到右：杨清（欧阳钦）、李运昌、赵毅敏、程子华、黄火青、高自力

11月27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热河极为重要 所去干部留热河工作”的电报指示，先后将去东北的1万多部队和1000多名干部留在热河工作。这些干部和热河人民相结合，放手发动群众，进行了建立政权、扩大武装、清剿土匪等多方面的工作和斗争，取得显著成绩。这样，一个新的以热河为中心的冀热辽根据地就全面创建起来。



热河留影 李运昌、韩纯德、胡锡奎在一起

第二节 反对国民党武装进犯

热河解放区的斗争

一、第一次承德保卫战

对于热河的战略地位，国民党也是极为重视的。在重庆谈判中，国民党妄图通过谈判夺取热河，毛泽东据理力争，严加驳斥。国民党和平夺取热河的阴谋破产后，就妄图用武力夺取。在杜聿明就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之初，蒋介石、何应钦就要他“指挥十三、五十二、九十二及九十四各军先向热河进攻，收复承

德。”^①但由于国民党内部派系矛盾，进攻热河的计划被搁浅了。1945年11月26日，国民党十三军、五十二军攻陷锦州后，蒋介石立即命令杜聿明停止向东北前进，并回师热河，与北平、唐山方面向热河进攻的蒋军相配合，梦想实现早已搁浅了的进攻热河的计划。

中共中央和冀热辽中央分局早已预料到国民党会对热河发动进攻，并作了保卫承德的多方面部署。1945年10月，在国民党大举向平津运兵的时候，中共中央就发出了在热河“大规模作战不久就到来，必须严重弄清这一形势”的警告，并命令山东现到冀东之刘其人师，“立即星夜兼程开古北口、承德之线，其任务为歼灭由北平进攻承德之顽军。”^②11月26日锦州失守后，冀热辽中央分局、热河省委联合发出《关于热河形势与军事方针的指示》，指出：“目前，热河党的紧急中心任务是打退顽军进攻，肃清土匪，建设热河根据地。”紧接着，中央又连续发出电令，指出“蒋军进到锦州后，不向沈阳、长春前进，而向热河进攻，企图先控制热河，截断交通，然后再向东北。”蒋介石狡猾地要求苏军迟撤，利用推迟接收东北，可使集中力量，先取承德、张家口”。并强调指出：“最近数星期内是热河命运决定的关键，我能否控制热河，对全国战略意义及我党在全国地位均有极大关系。这是决定我党在今后整个阶段中的地位问题”。电报还要求迅速集中主力，“不惜一切牺牲，坚决打击进攻热河之顽军，保卫承德。”^③

国民党为在“停战令”正式生效前抢占热河，蒋介石亲自下令：“各部在停战令生效前，应速抢占战略要点，在热河方面最

①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集》第42辑第9页。

②中共中央《为应付大战冀热辽归东北局指导》的电报，1945年10月22日。

③1946年1月2日——6日中央电报。

好于停战命令前占领承德，同时必须抢占古北口、建平及凌源为要。”^①为达上述目的，国民党纠集了六个军的兵力，从西、南、东三路猖狂向热河进犯。热河的党、军队和人民，以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展开了艰难困苦而又错综复杂的承德保卫战。

西线古北口方向。根据蒋介石的密令，十一战区行辕主任孙连仲，指挥九十二军、十六军、三个保安团及日军800余人，沿平古路东进，直取承德。1月9日开始攻击古北口外围阵地。当时，守卫古北口的只有冀东第十四军分区的十六、五十三两个主力团，但他们不畏强敌，死打硬拼，节节抗击，苦战三天三夜，粉碎敌人多次整团兵力的集团冲锋，给敌人以重大杀伤，使其始终未能接近古北口。12日，热河纵队一旅、二旅分别从怀来、丰宁星夜兼程赶到古北口，立即投入战斗，打退了敌人的进攻。13日，国民党军队在5架飞机的掩护下，继续进攻，双方激战竟日，多次展开白刃战，冀热辽部队夺回新开岭一带阵地。14日拂晓，也就是停战令生效后5小时，国民党军队又向香水峪方向发起猛烈进攻，并在新开岭一带作钳制性佯攻，到中午，敌虽占去几个山头，但损兵折将，伤亡惨重，已无力继续进攻。这时，冀热辽部队发动全线反击，敌军溃败，狼狈逃回石匣地区。承德保卫战的西线古北口战场取得了完全胜利。是役共歼灭国民党军1500多人，冀热辽部队亦付出近千人伤亡的重大代价。

承德保卫战西线战场的胜利，也是热河人民全力支援的结果。在战斗开始之前，滦平县委、县政府就准备了260万斤粮食、250万元现款（当时纸币），主要供应军需，又组织了380多付担架和1400多民兵支援前线。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以热河省副主席李子光、承德市市长郑旭为首的战地工作团来到前线，

^①魏宏运主编《中国现代史稿》第267页。

进一步鼓舞了参战军民的斗志。战后1月中旬，在古北口召开了庆功祝捷大会和追悼烈士大会。冀东第十四军分区十六团七连被授予“英雄阻击连”的光荣称号，并决定在战斗最激烈的兵马营修建纪念碑，悼念古北口战场阵亡将士。

南线喜峰口方向，1946年1月11日晨，国民党九十四军第五师、四十三师两个团及伪军一部，从唐山分两路向丰润、遵化进犯，妄图攻占喜峰口，直取承德。冀东军区十三旅两个团和唐山工人总队以及遵化、丰润、滦西县支队在正面阻击的同时，还广泛开展游击战，牵制敌人。十三旅二团神速出击敌后侧翼之东黄各庄，歼敌大部；旅指挥部派出小分队协同唐山工人总队，插入敌后破坏交通运输线，夜袭张家洼；滦西县支队袭扰任各庄……，打乱了敌人的指挥，使其首尾不能相顾。

13日中午，敌又以两个团的兵力，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分四路发起进攻。冀东部队依靠有利地形节节抗击，在给敌以沉重打击后，放弃丰润县城，撤到第三道防线阻敌。

14日，国民党军队又向罗文口、豆各庄进犯。十三旅二团、六〇团和地方人民武装并肩战斗，击退敌人多次进攻，迫敌停止于丰润县城、柴草坞、罗文口以南一线，未敢再犯，取得了承德保卫战南线战场的胜利。是役经四昼夜的浴血奋战，歼敌700余人，粉碎了国民党策应东、西两路进攻承德的企图。

承德保卫战的主要战场在东线朝阳、平泉方向，国民党军队的主攻方向也在这一线，但东线战场与西线、南线不同，却打得十分艰难复杂。

东线的热东朝阳一带地区，丘陵起伏，地势复杂，是热河的东大门，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同时，日本投降后，即被八路军收复，有一定的群众基础。早在国民党军队对热河发动全面进攻前，中央军委和东北局就连发三封电报，要求担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的林彪作必要部署，配合热河作战，并告诫：“再不要重复锦州战役时之慌乱情况。”中央还具体指示：“顽军如进攻热河，除古北

口、喜峰口两路外，锦州方向以至绥中方向必有蒋军（至少一军）同时动作，而打击与消灭自锦州、绥中向热河进攻之蒋军，必须由你们部队负责。”^①当时，东北人民自治军已达27.4万多人，在义县、阜新一线由林彪直接指挥的主力部队也在五六万人以上，完全有能力按照中央指示，配合热河作战。但林彪不仅不出兵拒敌，反而于12月20日兵发西满，致使国民党十三军、五十二军于12月28日陷义县，30日陷阜新，解除了进攻热河的后顾之忧，然后聚集重兵，于1月4日突然掉头向热东杀来，使东线战场呈现出极为险恶的局面。

当时，冀热辽军区所指挥部队不足5万人，主力配置于冀东和古北口，在热东的只有热辽纵队（黄永胜）1.4万多人，冀中纵队（黄寿发）1.3万人（三分之二徒手）。冀热辽中央分局在致中共中央、东北局的电报中指出：我们除巩固西线外，无力兼顾热东作战，万一锦州顽军与西线同时向热河进攻，须由东北抽一部分兵力作战。1月6日，中共中央致电林彪：“国内和平有希望，保卫热河的战斗是带决定性的，目前阶段中并可能是最后一战。决战方面是程肖部队担任，你们在阜新、义县方面是钳制作用。但须由你们作有力之钳制，你们应集中适当的兵力（两个旅）积极向阜新、义县间动作，求得歼灭敌人一部，拖住敌人不能放胆西进，以帮助程肖决战方面争取时间，集中兵力，打击敌人。”就在这个电报发出的时候，已放弃义县、阜新多日了。

林彪兵发西满，热东大门洞开。冀热辽军区命令黄永胜纵队在北票、朝阳间，黄寿发纵队在叶柏寿、凌源间节节抗击，迟滞敌人，以便争取时间，集结军队，按照中央军委电令，在平泉、凌源间进行决战，打一胜仗，但黄永胜纵队已按林彪指示以旅为单位独立活动，发动群众，清剿土匪，整训部队去了。12月29日才下

①陈平：《冀热辽部队进军东北的战略作用》。

令集中在牯牛营子、朝阳一线，结果只集中两个团的兵力，部署未定，敌已打来。4日陷北票，5日陷朝阳。黄永胜没有执行冀热辽军区令其在朝阳两侧打击敌人的命令，扔下二十七旅不管，带纵队直属队和二十二旅（欠六十七团）向赤峰方面去。只有三十旅张德发、谢镗忠部在西官营子至金厂沟间与敌激战两日，后亦北撤。位于叶柏寿、凌源间的黄寿发纵队周仁杰旅和热河纵队三旅九团在叶柏寿至凌源间节节抗击了两日，陷入敌人重围，突围后转移到锦承路北的大明城。这样，热东再无阻击部队，大门完全洞开。国民党军队10日陷凌源、建平后，分数路迅速向平泉进犯，在平泉、凌源间与敌决战的计划已不能实现。

为应付这种险恶局面，冀热辽军区命令杨（得志）苏（振华）纵队和冀东军区十二旅、十四旅和十三旅的十四团，日夜兼程跑步向平泉前进，肖克、李运昌也到平泉会合指挥。当时平泉街只有1个警卫连和县公安大队的3个连。国民党军队占领城东40里的杨树岭时，肖克司令员才撤出城外。13日下午，国民党一九五师突破王兆湘旅先头部队在平泉东部黄杖子的防线，侵占平泉车站和南山各制高点，但惧怕城中有埋伏，不敢进街。这时杨苏纵队跑步赶来，双方在平泉街展开巷战，至13日24时停战令生效后，冀热辽部队才撤出平泉街。

另一路国民党军队（五十二军第二师一部），从平泉南侧迂回奔袭小寺沟，妄图从西面包围平泉县城。肖克司令员亲自指挥跑步赶来的冀东军区十二旅前卫十七团及后续部队，在道虎沟川与敌军展开激战，终将敌击溃，迫其退回杨树岭。冀东十四旅也在小寺沟东面和北面阻止了另一路敌军的前进。是役歼敌1100余人，俘敌30多人，取得承德保卫战东线战场的第一个胜利。

冀热辽部队在西、南、东三面同时作战，又无友军支援和配合的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虽丢失了热中重镇平泉，但粉碎了国民党妄图在停战令生效前抢占承德的狂妄计划，取得了第一次承德保卫战的胜利。

二、承德三人小组谈判和第二次承德保卫战

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发动的军事进攻屡遭失败后，被迫于1945年10月10日签定了《国共两党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但这并不是蒋介石改变了他发动内战的政策，而是感到新的进攻部署尚需时间，发动全面内战的时机尚未成熟。于是，在美帝国主义的导演下，蒋介石虚伪地同意准备召开双十协定规定的政治协商会议，并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立即无条件停战的建议，在美国代表马歇尔的参加下，国共双方开始停战谈判，于1946年1月10日签署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命令和声明》（即《停战协定》），双方向所属部队发布了1月13日午夜停战的命令。根据停战协定成立的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也开始办公，并派出若干军事调处执行小组，分赴各地冲突地点进行调处。当时热河省是争夺重点地区之一，军事冲突时有发生，所以先后向热河派出了两个执行小组，即赤峰第二执行小组，国民党代表谷礼汉上校，中共代表段苏权少将，美国代表杜锐孟·德梯乐上校。承德第十一执行小组，国民党代表岳昌赢上校，中共代表陈伯钧少将，美国代表葛瑞夫上校。



热河军区司令员，承德执行小组中共代表段苏权少将。

军调执行小组的主要任务是，监察停战令执行情况，调处双方有争议的事宜，防止发生军事冲突。但事实上远非如此，美蒋代表把执行小组作为扼制中共军队行动、扩大国民党军队占领区的工具。执行小组名为三方，实为两方。美蒋为一方，中共为一方。这样，就使军调执行小组的工作处于尖锐、复杂的斗争之中。特别是热河方面，斗争就更为尖锐复杂。对此，新华社在驳斥重庆军委发言人时做了彻底揭露：“还在停战协定当时，国民党即坚决要求将热河地区置于停战范围之外。停战令公布后，国民党军队仍然不顾该约之存在，继续向我热河驻军进攻。因此，虽然执行小组已派出前往，但国民党不是不调处，而使谈判毫无结果；就是今天签订协议，明天又把它撕毁，甚至乘机取利，向我袭击。国民党通讯社和它的所谓军委发言人在这个方面造的谣言，更是离奇多样，颠倒黑白，其目的无非是混淆视听，以配合其军事进攻罢了。”^①热河的军调活动，正是这样打打谈谈，谈谈打打，假谈真打，由美蒋合演的“双簧戏”。

赤峰第二执行小组是于1946年1月19日抵达赤峰市的。对于赤峰，国民党早就垂涎三尺，在停战谈判时提出接收赤峰和多伦问题，当即遭到中共方面代表周恩来的坚决拒绝，迫使国民党方面撤回了这个要求。接着又妄图用武力抢占赤峰，就在赤峰小组抵达的当天，国民党十三军五十四师猖狂西犯，侵占了天义、莫里河、乃林、平庄等地，但仍没有抢到赤峰，被冀热辽部队用武力阻止于莫里河一线。赤峰小组开始工作后，国民党又想在谈判桌上夺到赤峰的控制权，也被中共代表段苏权据理驳回。经过这些斗争，于1月20日双方才勉强达成协议：国民党军队停止在太平地，共产党军队停止在北井、双庙。赤峰由共产党领导的保安队维持治安。这一协定得到了北平军调执行部的同意。但国民党抢

^①《新华社记者驳斥重庆军委发言人谈话》，原载1945年1月30日《晋察冀日报》。

占赤峰之心不死,又唆使中央社记者公开造谣说:“军调部命令杜聿明进驻赤峰。”中共代表立即向北平军调部揭露此事。军调部于1月27日发表声明,否认曾命令杜聿明进占赤峰,并召开记者招待会,将这一造谣事件公诸于众,粉碎了国民党抢占赤峰的阴谋。

建平也是赤峰小组重点争议的地区之一。建平当时属赤峰管辖,停战前没有蒋军的一兵一卒。1月27日,冀热辽部队为了自卫,派保安队进驻建平。美蒋代表以此大作文章,诬中共方面不恪守协议。对此,冀辽热军区司令员肖克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我27日占领建平虽在1月13日之后,但是在国民党军继续不停之进攻更直接危及承德的严重情况下占领的,其目的仅仅是为了自卫,现下如国民党在平泉已停止进攻,我自可退出建平,但国民党军在1月13日以后,所强占之土地,亦应完全退出。”^①事实上,当时中共方面的保安队已经撤出建平,倒是国民党派所谓的建平县长徐长亮去“接收”,半路上被愤怒的建平群众赶了回去。此后,美蒋代表又节外生枝地说:“在建平附近仍有共军2000人。”3月18日,赤峰执行小组赴建平调查,在事实面前,美蒋代表不得不承认:“1月12日至28日建平村民自行管理村政,并无国共双方之驻军。”^②至此,赤峰小组的调处活动取得很大进展。

承德第十一执行小组是2月1日到达承德市的。在此之前,国民党军队违反停战协定,不断向承德发动进攻。对此,新华社发表消息称:在冀热辽区“国民党军自1月13日至2月1日,向我进攻达30余次,占我城镇14座。在此间我曾几次派员向驻平泉之十三军军长石觉交涉,要求停止进攻,但石觉置之不理。”^③之后,国民党九十四军主力第五师又以开入东北“接收”为名,进至绥中后,折向热河,违约北犯,竟不顾中共方面谈判代表的一

①晋察冀日报资料科:《军事调处执行情况汇编》,第63页。

②段苏权回忆录:《调处是美蒋合演的“双簧戏”》。

③晋察冀日报资料科:《军事调处执行情况汇编》,第64页。

再警告，连续进犯建昌、明尔登等地。2月11日，进攻至平泉东北50公里之棒楞树川，遭到热河三旅的猛烈阻击，八团团长王占一、政委周文乃在侦察敌军阵地时，遭敌炮击牺牲。与此同时，国民党十三军五十四师由天义出发经八里罕、甸子等地，于2月10日侵占平泉北部之黄土梁子，造成多路进攻承德之势。

对这些事件，承德执行小组的美蒋代表采取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在国民党军队猖狂进攻时，美蒋代表拒绝到冲突地点“调处”；当冀热辽部队发动反击，国民党军队处于被动挨打时，他们又于2月10日匆忙赶至平泉。11日，执行小组在平泉与十三军军长石觉会谈。但石觉态度蛮横高傲，要冀热辽部队从“铁路两旁各退百里，平泉西、南、北各退60里。”甚至狂妄地提出，要冀热辽部队全线“退至热水车站、黄土梁子、小寺沟、党坝、界岭口以西”，却只字不提国民党军退至何处。尽管如此，中共方面代表陈伯钧仍答应从正面撤退20里，也遭到拒绝，没能达成协议。

2月18、19两日，在承德执行小组美方代表主持下，于两军前线的平泉县下坝村举行高级将领会谈，谈判的重点是：①停止冲突问题；②双方恢复1月13日24时停战令生效前位置问题；③双方部队遵照命令实行隔离问题。此时，在东北的苏联红军即将撤离回国，美国一再督促蒋介石放弃进攻热河的计划，首先抢占东北。为调兵去东北参战，国民党十三军军长石觉急于求得协议，不得不降低谈判条件。冀热辽军区司令员肖克，洞察国民党的阴谋，为钳制在热河的国民党军队，将计就计，采取“拖”的策略。两日的高级将领会谈，遂无结果而终。

国民党在平泉的谈判桌上没有捞到什么，于是，就撕掉“调处”的假面，在承德执行小组返承的第二天（2月21日），即兵分四路，向承德发动武装进攻。新华社记者为此发表消息指出：

“解决热河停战问题之症结，在于杜聿明氏之态度，该部不但不执行执行部恢复13日24时前位置之命令决定，反而继续不断进

攻，目前国民党军正以平泉为中心，用四个师的兵力展开对承德威胁态势。”^①冀热辽军民忍无可忍，展开了英勇顽强的阻击作战。于是，第二次承德保卫战爆发。

第一路黄土梁子方向。自国民党十三军五十四师占领黄土梁子后，就不断向杨苏纵队发动进攻。2月11日，执行小组到黄土梁子调处，冲突暂时停止。2月21日晨，敌军突然发动猛烈进攻，在二道河子北山反复争夺，展开白刃战，迫敌退回原防地。2月26日，敌军再次发动猛攻，在柳溪川、七家岱川推进20余里，杨苏纵队发动反击，又夺回已失阵地。杨苏纵队两次反击作战，歼敌一部后，战场呈胶着状态。

第二路二道河子方向。2月21日，驻平泉之国民党五十二军一九五师，沿承平公路向承德方向猛进，在西二道河子、红山嘴一带遭杨苏纵队顽强阻击，数日激战，敌曾深入到凤凰岭一带，双方多次展开拉锯战，进犯之国民党军终被击退。

第三路小寺沟方向。2月21日，驻平泉之国民党十三军第四师，分两路沿锦承铁路向小寺沟方向猛攻，冀热辽部队詹才芳部第十四旅进行节节抗击。27日，敌两路会攻小寺沟，欲突破十四旅阵地，南下解梹榔树川五师之围。十四旅进行顽强抵抗，许多阵地反复争夺，进行肉搏，迫敌不能前进。3月1日，十四旅发动全线反击，夺回部分阵地，是役共歼敌1500余人，受到中央军委通令嘉奖。

第四路梹榔树方向。国民党第五师，经半个多月的不断进攻，侵入梹榔树川30多公里，占领10几个村庄，并妄图进占党坝，然后与其它三路会攻承德。冀热辽军区首长肖克等亲临前线视察，调整部署，决心围歼这股孤立之敌，在党坝设前线指挥部，由詹才芳具体指挥，调集第二、第三、第十二、第二十七旅，于2月26日午夜前完成对五师的包围，27日发起攻击，迅速攻占马杖子、金杖子等敌军阵地，歼敌大部。到3月1日，残敌被压缩在郭杖

^①晋察冀日报资料科：《军事调处执行情况汇编》，第66页。

子、葛杖子不足三里的狭小地域内,前指继续发动总攻,准备全歼该敌。

在这关键时刻,承德军调执行小组驱车奔赴前线,命令停火,并在党坝谈判达成临时协议:

一、中共军第二旅撤至大吉口以西;

二、政府军第五师退回平泉原防地,以上均限24小时内撤完;

三、占大石桥、五十家子、小寺沟的政府军,亦撤回平泉原防地;

四、双方不许调动和冲突,一切待执行小组用会议方式公平解决。^①

对于《党坝协定》,冀热辽中央分局在给党中央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此协定除第三条未限时间外,一般尚无问题。但在执行此协定时,陈伯钧同志不要求首先撤退对方小寺沟线之部队,反亲自与国方代表(美方代表坚决不去)首先停止我向五师行动,以解五师围。且不经军区司令部与纵队首长,即直接写信旅级首长,令前线部队撤退……,结果我们按协定撤了,而顽四师大石桥、五十家子一线的未撤,”^②而且修碉堡,筑工事,准备固守。刚签订的协定就被国民党方面撕毁了。这样,就造成两个严重后果:一是使正在被围歼中的国民党五师残部得以脱围逃跑,免遭全歼命运;二是按约撤退的冀热辽部队二旅反遭国民党军队夹击,造成伤亡。承德军调执行小组中共方面代表受到冀热辽中央分局和军区的严厉批评。

棒楞树战役前后共歼敌1300余人,俘百余人,缴获枪炮一部。虽然由于党坝协定的干扰,没能达到全歼敌五师的预期目

①晋察冀日报资料科:《军事调处执行情况汇编》,第67页

②中共冀热辽中央分局:《关于外交谈判工作总结报延安、张垣、北平》,1946年4月8日。

的，但“棒楞树战役是热河军区形势发生变化的关键，即由过去的被动开始走上主动。”^①棒楞树战役后终止了国民党军队向热河的进攻，热河战场暂处双方对峙状态。

前后两次承德保卫战，是反对国民党破坏和平谈判，武装进犯解放区的一个重要战役，是在敌强我弱，非常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这次战役共历时50天，不仅挽救了东线失利的被动局面，阻止了国民党5个军的猖狂进攻；而且取得了歼敌6800余人的重大胜利。这一胜利，既破除了美械装备不可战胜的神话，也揭穿了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保卫了热河解放区。同时，承德保卫战也是有严重缺点的，主要是有些同志对当时形势认识不清，存有和平麻痹思想，对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准备不足，作战上曾在—个时期中束缚了自己的手脚，对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未能组织积极自卫反击。在参加军调活动中曾表现有以让求和的因素。这些因素影响了承德保卫战获得更大的战果。^②

三、朝阳谈判和五月战役

国民党发动内战的部署是：“稳住华北，抢占东北”，到1946年4月已经出现了“关内小打，关外大打”的局面。在热河地区，国民党既想抽调兵力，增援东北，又害怕北宁路有失，截断后路。所以国民党在军事上采取守势，极力保住既有阵地；在谈判上则采取攻势，用以拖延时间，掩盖对东北地区的军事进攻。在这种情况下，又产生了朝阳第二十六军调执行小组，中共代表李逸民上校，国民党代表马××上校，美国代表汉夫海军上校，并于4月初赴朝阳，开始朝阳谈判。朝阳小组主要任务是谈判《叶柏寿协定》和《凌南协定》问题。

①冀热辽中央分局：《向毛主席、中央及中央局的报告》，1946年4月25日。

②参照程子华在冀察热辽第一次党代会上作的《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

《叶柏寿协定》和《凌南协定》是由承德第十一军调执行小组签定的。早在3月1日，承德小组赴平泉、叶柏寿、建昌一线调查，冀热辽中央分局为中共代表规定的方针是：“党坝协定未执行前不与对方谈判任何新协定”，且规定主要任务是调查1月13日24时双方位置。^①3月中旬，热辽纵队二十二旅向锦承线之敌出击，首战建平，歼敌一部，余敌逃窜。后又攻击叶柏寿，将国民党十三军辎重队包围，正当欲全歼该敌之际，纵队下令停止攻击。随后，陈伯钧不经请示，即于3月20日签订了《叶柏寿协定》，竟然规定护送早被群众赶跑了的国民党建平县长徐文亮及保安队“回镇建平，并负责推行全县县政，所有八路军及地方部队均不得妨害。”^②3月22日，又签定了《凌南协定》，承认热东著名土匪于大川部为国民党军队，驻守建昌，并保证凌绥公路的运输安全。^③这两个协定完全是片面的，错误的。4月3日，冀热辽军区司令员肖克召见承德执行小组，严正声明不承认《叶柏寿协定》和《凌南协定》，并向北平军调处执行部提出备忘录抗议。同时，调换了承德小组中共代表陈伯钧的工作，由段苏权接任。

朝阳小组成立后，美蒋代表要求执行两个协定，中共代表强调两个协定是承德小组超越职权签定的，不能算数，必须重新谈判。当时，美蒋代表害怕在热东、辽西一带引起大战，只好终止了这两个协定，中共方面取得了朝阳谈判的胜利。

进入5月份后，东北大战已经全面展开。国民党抽调原在热河的部分兵力投入东北战场，在热河战场上只有国民党十三军的3个师和收编的于大川、“大明字”等匪队，分布于平泉以东，赤峰以南的8座县城和锦承路，叶赤路沿线据点。为配合东北作

①②③均引自冀热辽中央分局《关于外交谈判工作总结报延安、张垣、北平》
县1946年4月6日。

战，中共中央电示冀热辽军区：“务望肖（克）程（子华）指挥热河各部积极动作，尽量歼灭该军有生力量及彻底破毁铁路。”同时，中央军委也发出了“配合东北作战，乘胜出击，收复失地”的命令。根据这些指示和热河战场的实际情况，冀热辽军区有计划有组织地发动了五月战役。

冀热辽部队的战役部署是：北路黄（永胜）朱（涤新）文（年生）纵队，由赤峰沿叶赤线向凌源、叶柏寿方向进击。中路杨（得志）苏（振华）纵队及周仁杰旅，歼灭黄土梁子及平泉可能向叶赤线增援之敌，并以一部破击凌（源）平（泉）间铁路。南路詹才芳纵队和辽西支队，破击山海关至锦州间铁路。东路热东、热辽军分区部队向北票、朝阳间出击。赵（尔陆）韩（伟）纵队则控制于小寺沟地区为总预备队，负责牵制平泉之敌。

5月13日，五月战役全面展开。独第十六旅进行了古山、平庄战斗，由13日到19日，经过三次强攻，将号称“铁团”的国民党十三军一六二团大部歼灭。除团长易惠带百余残兵逃窜外，共毙伤400余人，俘虏700余人，投诚160余人，缴获枪炮等军用物资一部，叶赤线中段和北段之敌被肃清。十三旅和热中军分区部队，攻克天义，占领叶赤路南段唐大门至乃林路段，并将铁路及车站全部破毁。热辽军分区部队攻占北票冠山、三宝煤矿和金岭寺车站，并将发电所等矿山设备炸毁。热东军分区部队占领锦承路公营子、波罗赤等车站，炸毁车站、桥梁，控制朝（阳）凌（源）间铁路，赵韩纵队第三旅攻占锦承路三十家子火车站，炸毁凌源、平泉间大部铁路桥梁。詹才芳纵队破毁山海关、绥中间铁路，炸毁桥梁18座。

五月战役是正规军、地方部队、游击队和10多万群众密切配合，共同进行的一次胜利战役。是役共毙伤俘敌2000余人，缴获各种炮15门，枪690余支和一批军用物资。同时，捣毁车站19座，铁路400余里，炸毁桥梁44座，破毁公路630余里，达到了牵制敌军，配合东北作战的战略目的。

第三节 解放区各项民主改革的初步实施

一、第一次全省人民代表大会

1945年11月1日，热河省人民代表大会在省会承德市隆重举行。全省各族各界代表聚集一堂，共商建设民主、自由、繁荣的新热河的大计，民主选举产生了新的热河省政府。这次全省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热河解放区民主政权的进一步巩固和提高；同时，举起第一面由共产党领导的省级民主政权的旗子，对全国产生很大影响，是热河历史上的一个大事件。

这次大会的筹备工作，由10月初开始，是在晋察冀边区政府委任的以李子光为主席的热河省政府领导下进行的。由于许多地区正处在战争环境中，无法进行基层选举，代表的产生主要采取了两种办法：一是由各县、市召开民主参政会或联席会议共同选举，这是大多数；二是由县、市政府根据代表资格和具体情况聘请。这样共选出代表175人，代表了全省25县（旗）、市（开鲁、鲁北、天山等县因路不便未能参加会议）的450万各族人民。选出的代表也多是在抗战中有功，在群众中有威信，在社会上有声望的优秀人物。还特别注意推选了少数民族代表和妇女代表，有回族代表9人，蒙族代表17人，妇女代表15人，并吸收了一批爱国民主人士参加，使这次代表大会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热河人民代表大会是热河历史上空前民主的大会，也是第一次由人民当家做主的大会。会议之初，各代表本着集思广益，为人民兴利除弊，建设民主政治的精神，广泛提出议案，民主议决。这次会议共提议案267件，所有关于民主、民生的改革事项以及全省范围或地方性的问题，几乎无不涉及。这些议案，经整理合并为7个部分37件。然后逐件审议，做出决议案，再由主席团提交大会讨论。多数原案顺利通过，有几个比较复杂的议案经过热烈辩论，加以修改，始成决议，充分表现了大会的民主精神与

负责态度。在政府委员的选举中,实行无记名投票和差额选举制,从52名候选人中选出15名政府委员和2名候补委员。投票选举李运昌为省主席,李子光、杨雨民为副主席,并于1月13日晚宣誓就职。

在大会召开期间的11月9日,中共热河省委正式成立(原中共热河分委撤销),由胡锡奎任书记,谭余宝任副书记兼社会部长,委员还有李运昌、段苏权、王国权、李子光、马载、^①王逸群、李六如、李德仲,后又陆续增加韩纯德、王孝慈、王逸伦等。热河省建联会、工会、青年、妇女等组织也相继建立。中共热河省委成立之后,立即向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了《热河目前施政纲领(草案)》,并由胡锡奎代表省委到会对纲领的各项原则问题作了说明。这个纲领获得全体代表一致通过。

《热河目前施政纲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较早的一个省级政权的施政纲领,是一个重要历史文献。全纲领共分19条,全面完整地规定了热河省施政方针和建设大计。其要点是:

彻底摧毁一切敌伪法西斯组织及其残余势力,并严厉镇压其活动,在和平、民主、团结方针下,建设新民主主义的热河;

建立各级民主政权,由人民选举代表,组织代表会议,选举并监督政府。人民代表会议是人民最高权力机关。实行各党派各阶层合作与政权中的“三三”制;

严惩战犯及罪大恶极的汉奸,没收日寇及大汉奸的财产。对协从的小汉奸及愿意改悔者,则采取宽大政策;

保障人民的人权、财权及一切政治权利,除汉奸特务外;均

^①马载:河南省安阳人,1905年生。192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1926年后历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教导团连党代表,中共河南安阳县委书记。1937年参加磁县农民暴动,后任晋察冀孟平县委书记、冀中十分区地委书记。1945年10月任中共热河省委组织部长,后任冀察热辽中央分局党校副校长,中共热辽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中共热河省委副书记。1949年8月后任衡阳铁路管理局政委、书记、新疆中苏石油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四川石油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国务院轻工业部顾问等职。是第四、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信仰及居住之自由；

奖励私人企业，发展工、农、商业、牲畜业生产，实行自由贸易，严禁奸商垄断居奇，操纵国计民生的大企业，统归政府经营；

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及敌伪经济统治，按财富等收入实行统一累进税制；

严惩贪污，建立廉洁政府，实行减租减息，废除高利贷；

实行产业部门的八小时工作制并适当增加工资；

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大汉族主义，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文化经济事业，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及自治权利。

施政纲领还就清剿土匪，安定社会秩序；实行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废除敌伪奴化教育制度；保护外侨及外贸等问题做了明确规定。后来的实践证明，《热河省目前施政纲领》的提出和贯彻实施，对于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安定社会秩序，发展生产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扩大人民武装和清剿土匪

在这个时期，扩大人民武装，整编部队，清剿土匪，安定社会秩序，一直是热河省党政军所面临的重要任务。

早在日本投降之初，进入热河的八路军部队只有冀热辽军区部队和坚持“无人区”斗争的地方游击队，总兵力约5000多人。进入热河后虽有了较大发展，扩充到1.2万多人，但新兵较多，战斗力较弱，不足以应付敌伪残余捣乱，土匪武装蜂起，国民党进攻在即的那样极其复杂的局面。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于1945年10月25日致电胡锡奎、赵毅敏，指示他们要发动群众，扩大武装，清剿土匪，镇压反动派，在热河建立革命秩序。同时，增调杨苏纵队、赵韩纵队、黄寿发纵队等主力部队相继进入热河，对稳定热河局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根据中央和东北局的指示，热河的党、政、军及各部门大力

进行扩大人民武装的工作。当时发展人民武装主要采取三种办法：一是以冀热辽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县区游击队为基础，采取逐级升格的办法，多数县游击队扩大为团；二是往起义、投诚的伪军、伪警部队中派出主要干部编成主力部队或县、区游击队；三是“找来工人农民学生中的群众领袖或用新兵去扩兵，扩来一班即编一班，扩来一排、一连、一营即编为一排、一连、一营等，他们的领袖即任班、排、连、营长或副的；另由老的干部或战士任正的或副的，并派政委教导员指导员等。”^①用这些办法扩大武装，在短时期内，主力部队得到迅速而大量的发展，地方军队和游击队也普遍建立起来。从1945年8月至12月底，在热河的主力部队已达5万多人，其中就地扩军近2万人。热辽纵队进入热河时仅有警一旅、教二旅和冀中的三十一团，约4000人，与冀热辽部队十八团近2000人合编后，发展到1.4万多人，增加3倍多。赵韩纵队在热河扩建了4个团，热河省军区和6个军分区也有地方军1.3万多人，县支队1万多人，区小队4000多人。在这些武装力量中只有小部分是原来的骨干，大多数是新发展起来的。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的武器装备也得到了充实和改善。

在大力发展人民武装的同时，为巩固新部队，充实老部队，对新老部队进行了整编和整训。1945年11月26日，冀热辽中央分局、热河省委发出了《关于热河的形势与军事方针的指示》，规定“热河党的紧急中心任务是在打退顽军，肃清土匪的胜利中以建设根据地”，而发动群众，扩大人民武装和整编整训部队则是完成这个中心任务的关键环节。指示还确定了“野战军与地方军并存，在不过大的削弱地方军的情况下，迅速整训并尽可能扩大野战军的建军方针。”“整训巩固部队，应从政治上、思想上、党的组织上、军事上、生活管理制度上同时进行，尤其新扩大部分队，成份复杂，应首先强调提出思想上政治上的教育，连队迅速

^①《林彪、彭真关于整编军队与扩兵问题的指示》，1954年11月1日。

建立支部堡垒”。并指示要用开训练班的办法发展党员，克服在一部分干部中浓厚的和平建设思想和人民群众中的正统观念，发动群众，进行反对国民党武装进攻的人民自卫战争。这个指示下达后，抓住承德保卫战的战前和战役中的空隙时间，进行了整编和整训，以一个老团与二至三个新团合编为野战旅，同时保持老团的战斗力。这样使许多老的部队得到充实，新部队得到巩固。

冀热辽初期的建军与扩军工作表明，以老的部队为基础，改编伪军或扩大新兵的做法是成功的，它保证了扩军的质量和部队的战斗力。而单纯地招兵买马，甚至用封官加委的办法进行扩军，或简单地把伪军、伪警接收过来的做法，却有很大的弊端，造成了部队素质降低，成分复杂，群众纪律差，战斗力不强等问题。当国民党军队由山海关侵入解放区后，在一些部队和县支队、区小队中开始发生逃跑或有组织叛变的现象。在国民党向热河东部大力进攻时，竟出现了大规模地叛变活动。据不完全统计，仅热东、热中、热辽三地区就发生38起叛变事件，叛变人数3080人，伪警长（大地主）张桐轩混入赤峰县支队，被任命为连长，1945年11月6日夜晚，杀死支队长张英信公开叛变，并袭击了五六两区公所，打死区干部多名。建昌县和尚房子伪警察署长姚焕章，被委任为代理区长。11月25日，他阴谋杀害了县支队队长贾俊儒等2人，叛变投敌。这些叛变活动，给新生的热河省各级民主政权，造成了很大危害。

对于这种情况，冀热辽中央分局和热河省委及时地总结了经验教训。在给中央的关于《扩大武装中几个严重教训》的电报中指出：干部不懂得现在与抗战时期的情况不同，而滥发委任，无原则吸收伪组织人员，满足上层拉拢；部队迅速扩大，原伪组织人员虚伪奉承，混入进来，而我们又对清洗坏分子不坚决，对汉奸特务缺乏镇压；叛乱发生后，未能及时通知防范，以致遭受更大损失；干部对发动群众认识很差，表现右倾，在清理物资时，未以大汉奸作对象，没收物资不注意分给群众，工作脱离群众等

等。在后来的部队整训中，这些问题得到了一定的解决。1946年5月4日，冀热辽中央分局和热河省委发出关于扩兵工作的指示，决定在热西、热辽、热中、热东4个地区扩兵4500人，地方军和县支队也有很大的发展。6月份，热河省成立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使人民的武装组织走向正轨，在很短时间内，就发展34万多自卫队员和近5万人的民兵基干队。热河的人民武装在斗争中逐渐成长壮大起来。

在扩大和建设人民武装的同时，热河解放区还进行了第一阶段的清剿土匪斗争，并取得了初步的胜利。

热河在历史上就是个土匪肆虐的地方。抗战胜利后，各地的土匪又有较大的发展，“在我地方军尚未大量发展和主力军尚未整编就绪以前，各处土匪特别是政治性的将在一定期间更加疯狂起来”。^①国民党反动派在热河又极力推行利用伪军和武装土匪的政策，加委伪军及惯匪组织为所谓的地下军、先遣军、挺进军等。据不完全统计，1945年前，热河全境共有土匪百多股，达15000余人，其中被国民党委任的就有19股，7500多人，小股几十人，大股的千余人，主要活动在热辽、热东和热中地区。当国民党向热河进攻时，他们积极配合，到处抢占地盘，如蒙奸沁布多尔济的匪队配合抢占了北票，蒙奸李守信、惯匪刘清林、张子怀配合抢占朝阳，刽子手王发匪队配合抢占凌源，于大川匪队抢占了建昌等等。他们杀害干部，蹂躏人民，扰乱后方，严重地威胁到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和新生的民主政权的巩固。因此，清剿土匪，肃清敌伪残余，在当时就成了发动群众，建设根据地，巩固民主政权的重要环节。

这些土匪的主要社会基础是敌伪军、警察宪兵、伪官吏和当地的地主封建势力，他们与国民党反动派勾结起来，组成汉奸伪军

^①冀热辽中央分局、热河省委《关于形势与军事方针的指示》，1945年11月26

警、国民党特务、恶霸地主和惯匪四位一体的反动武装大联合。因此，清剿土匪就是彻底肃清敌伪残余，打击封建势力和国民党的社会基础，巩固解放区的后方，以便集中力量粉碎国民党的正面进攻。在当时，匪患不除，各项工作就不能前进一步，就没有巩固的后方，又要被迫长期处于两面作战的困难境地。对于这种严重情况，冀热辽中央分局和热河省委都有足够的估计，并把肃清土匪做为当时的重要军事任务，抽调热河纵队二旅、三旅，热辽纵队二十七旅、三十旅和黄寿发纵队一个旅的主力部队和各军分区独立团、骑兵团、县支队共四五万人，大规模地进行了剿匪斗争。

在热西地区。热河二旅（陈云中旅）在平北部队配合下，围歼了抢占丰宁县城的韩继功匪队后，又全歼和改编了张福元、李德林匪队。热辽纵队三十旅、热西骑兵团和热北军分区部队，联合围剿了流窜在经棚、林西、围场等地的张桐轩、伊相臣、郭九江等匪队，大部土匪被歼。据统计，热西地区从1945年11月至1946年4月，共消灭土匪5100余人，收缴枪支6000余支，使热西地区一度出现了安定的局面。

在热中地区。1945年11月，热中军分区召开军事会议，统一部署剿匪斗争。热河三旅首先在八里罕将惯匪“大明字”（王近喜）打垮，接着又在宁城马战城子包围了惯匪“野狼”（杜耀亭）匪队，当场击毙80余人，“野狼”只带10余名匪徒逃跑。

在热辽地区。热辽纵队三十旅和热河纵队三旅，在热辽军分区部队配合下，先后两次围歼蒙奸沁布多尔济匪队，11月又与之激战三日，攻克其老窠黑城子，打死百余人，俘30余人，沁布多尔济率残队逃往锦州。六十四团围剿了八道壕崔兴武匪部，毙俘300余人。

在热东地区。二十七旅在热东军分区部队配合下，两次围歼于大川匪部，三次围歼刘清林匪部，共歼匪1700余人，两大股匪队基本被摧垮。其它如“交的宽”、“扫北”等小股匪伙被彻底消

灭。

在城市中，主要搞了反特斗争，不仅清理了日伪的残余敌特分子，还清理了国民党新派遣的特务人员，国民党热河省党部、赤峰县党部等地下组织被破获。

热河全省经过5个多月的（1945年10月至1946年2月）第一阶段剿匪斗争，不仅使热西、热北地区股匪大部被消灭，在热辽、热东、热中地区的敌后根据地内，土匪活动也大大削弱。

三、反奸清算斗争和群众运动的兴起

热河解放后，人民群众切齿痛恨的主要对象是汉奸特务等敌伪残余势力。冀热辽中央分局和热河省委适时地发动了控诉复仇，回头自新的清算运动，领导热河人民开展了反奸清算斗争。

反奸清算斗争，是以反对外国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残余的民族斗争形式出现的国内阶级斗争，是主要矛盾由民族矛盾向阶级矛盾转化时期的群众斗争的必然阶段。斗争的主要对象是敌伪统治时期欺压群众，作恶多端，为群众所痛恨的伪官吏、汉奸、特务、恶霸。在城镇工矿企业中，主要是放手发动群众，向恶霸、汉奸及其走狗和大配给店的经理等进行清算斗争；在农村则发动广大农民向恶霸地主、汉奸及其走狗进行斗争。斗争的主要方式是召开群众大会，首先揭发控诉其罪恶，燃起群众斗争的火焰；然后根据本人罪恶事实，依法予以惩办。对大汉奸恶霸的财产，由清算委员会进行清算，把斗争果实交群众处理。斗争策略则是团结各阶层爱国群众，争取多数，孤立少数，打击反动分子。

这个斗争，首先是在承德市工人群众中开展起来的。当时，承德市只有4.7万多人口，工人不足2000人。但工人受日伪的压迫剥削最深，生活最苦。同时，工人集中，团结力强。承德的工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多数是从外地（特别是关内）来的，知道八路军在华北和冀热边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的事实，对共产党有一定的认识。这些就决定了工人阶级在城市反奸清算斗争中的

先锋作用。热河省委、承德市委和省、市建联会针对这种情况，到工人比较集中的承德铁路监理所和电业局去发动工人群众，很快打开了局面。

承德铁路工人发动的最彻底，斗争也最坚决。首先是利用召开群众大会，个别发动等方法广泛宣传讲解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和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使许多人明确地认识到工人翻身解放的日子到了，提高了阶级觉悟和斗争的自觉性。继而，发现培养工人骨干分子，成立各段站工会组织和铁路系统工会组织。一批工人骨干分子如马海富、王作才等，被推选为工会主任、副主任，使工人有了自己的组织，增强了凝聚力和战斗力。群众发动起来后，省委、市委在工人群众中提出了“有冤报冤，有仇报仇”的口号，工人们纷纷起来揭发控诉恶霸、汉奸及其走狗的罪恶，清算大汉奸的财产，与之展开面对面的清算复仇斗争。省、市委领导胡锡奎、王国权、史立德等亲自听取工人的揭发控诉，带领群众游行示威，给群众撑腰。同时，根据广大群众的强烈要求，民主政府逮捕并公审处决了伪热河省省长孙柏芳等一批罪大恶极的汉奸、特务。有近千名一般问题的汉奸、特务、伪警察向人民低头认罪，搬掉了压在人民头上的石头，人民群众真正感到翻身解放了，扬眉吐气了。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开斗争会61次，参加人数近2万人，斗争果实有现款649万元（边币），粮食1900多石，有3451户群众分得了胜利果实。

中共冀热辽中央分局和中共热河省委，及时地总结了承德市发动群众的经验，于1945年11月25日发出了《关于热河发动群众的指示》。《指示》指出：承德发动群众的经验证明了：“第一，开展这个清算运动，可以打击反动势力，提高群众政治上、经济上的地位；第二，可以打击国民党的社会基础；第三，给减租减息清除了一部分障碍。因此，控诉复仇，回头自新的清算斗争，是目前发动群众的中心环节。”

《指示》还就发动群众的组织形式（成立工会、农会和清算

委员会)、斗争策略(团结大多数人,不能多杀人)和领导方法(反对包办代替和恩赐观点)等做了具体规定。《指示》特别强调“城市群众斗争的发动往往能够波及农村,首先是工人起着决定作用。承德市的工人斗争,在整个运动中已经起了先锋的领导作用”。“各地要开展发动群众的斗争,必须首先发动一切城市的工人运动”。

这样,就把承德市发动群众的经验推广到全省,在全省掀起了以清算斗争为中心的群众运动。在热东煤城北票,开展了以工人为主体的反奸清算复仇斗争。根据群众的揭发控诉,逮捕了汉奸、特务、工头80多人,并将冠山村伪村长武汉章和残酷虐待矿工的矿山警务系日本人森木及其他罪大恶极的汉奸、特务、矿工把头处决。与此同时,广大农村的贫苦农民,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也纷纷组织起来,向残酷剥削压迫他们的敌伪残余势力展开了猛烈斗争。到1946年3月统计,仅热西、热中和承德三地区,组织大的清算斗争1868次,参加人数37万多,斗争果实有土地1万多亩,粮1300万石,款1300多万元(边币)。“我们在短期有这样的成绩,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群众运动。”①广大城镇工人、农村贫苦农民,通过参加清算复仇斗争,不仅得到了部分经济利益,而且政治觉悟也得到迅速提高。一批在斗争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参军参政,一批骨干分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工会、农会等群众组织的威信也得到提高。

著名的《关于热河发动群众的指示》,是热河历史上又一重要历史文献,它突出地强调了发动群众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纠正了热河党内、军内存在的不注重发动群众和脱离群众的思想倾向,确立了发动群众与实行自卫战争二位一体的,创建热河根据地与进行长期艰苦斗争的新方针,这是模范地执行党的群众路线的一大创举。因此,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肯定和赞扬,将这

①胡锡奎《在热河省委扩干会议上的总结报告》,1946年4月1日。

一文件批转全党，并在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中明确指出：“最近热河省委的发动群众斗争的指示，可以应用于东北”。

但是，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来看，这个文件也是有缺点的。主要是两点：一是曾把清算复仇与减租减息机械地划分为两个阶段，束缚了部分干部的思想，使运动发动起来后没能迅速展开和深入；一是“复仇”的口号含义太广泛，又没有做出恰当的解释和说明，致使有些地方歪曲了这个口号，形成没有阶级内容的复一切仇，曾发生了斗工人、斗中农、斗贫农、，“无人区”群众斗“集家区”群众等偏向。这些现象的出现，固然有其历史的、具体的、多方面的原因，但是如果掌握引导得好，也是能够避免的。

1946年2月底，中共热河省委研究了前一时期发动群众的情况，肯定了发动群众反奸清算运动的主流，也认识到清算与减租脱节的弊端，于是发出了《关于减租减息增资和生产的指示》，指出“目前发动群众的重点主要是减租减息，但应与清算运动联系起来”，并提倡大批干部下乡，组织突击力量，突破一点，推动全面。这样，斗争的中心就由城市集镇转向了广大农村，由清算复仇转向减租减息，农民群众起来向汉奸、地主清租清债，造成了退租退息，还地还粮的浪潮。反奸清算，减租减息运动在农村的广泛开展，不仅发扬了民族正气，打击了汉奸走狗的威风，群众开始抬起头来了；而且还使贫苦的农民群众获得了经济利益，特别是已初步触及到土地问题。热辽专署仅三个县就分散土地6万多亩，为下一步的土地改革斗争打下了基础。

四、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和群众运动的高潮

随着减租清算运动的深入和广大贫苦农民政治上的翻身解放，他们已感到清算减租已不能解决问题，而提出了分配土地的要求。群众发动越好的地方，这种要求越迫切。他们说：“先把土地

弄过来,再说减租。”“给我几亩地,即使是一亩地也好。”农民群众的这个要求是合理的,是从经济上进一步翻身解放的必然趋势。但有些干部囿于1942年时的土地政策,思想还停留在民族斗争的阶段,害怕伤害大地主的利益,害怕破坏统一战线,不敢放手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影响了群众运动的深入发展。“今天的障碍不是什么超过群众觉悟的急性病,而是落后于群众的慢性病。”^①

针对这种情况,中共热河省委组织了几个调查组,深入农村,对热河的土地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发现热河的土地制度极不合理,主要是土地的高度集中和剥削的无比残酷。

热河大部地区在历史上属于蒙区,多为蒙古民族的游牧场所。土地开垦的历史比较短,大约从清初至乾隆年间,耕作区域才大面积形成。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清政府趁山东、河北遭灾之机,正式制定了“借地养民”政策,公开允许汉民进入蒙区从事农业耕作。于是与热河毗邻的山东、山西、河北等地的汉族人口大量迁徙涌入。土地开垦速度空前加快。清末民初,官方又实行“放垦”,“挂地”政策,土地放垦规模与数量愈来愈大,农业人口迅速增长与集中,随之而来的便是土地的兼并与掠夺,土地问题日益突出。在土地关系的急剧变化中,除蒙古王公等世袭土地所有者外,又产生了大量的汉族地主(大多是经营地主),从而形成了热河地区的地主与农民两大对立阶级。

蒙古王公贵族是热河地区最早的世袭统治者。清代以来,在蒙古区建立了盟、旗体制,清庭以满蒙的特殊关系,以“恩赐”的方式将蒙区的土地、牧场划归蒙古王公、台吉等贵族所有或管辖。其土地占有方式大多为如下几种形式:(一)外仓地。即属于国家所有地,由王公为首领的官府代管,租给汉人耕种,收租归旗政府。民国及伪满时期,几经变迁,仍保留了这样大量的“国有地”。(二)内仓地。为蒙古王公贵族私有地,亦由汉人耕

①胡锡奎《在热河省委扩干会议上的总结报告》,1946年4月1日。

种，收租归王府所有。（三）圈口地。大部分系喇嘛庙的土地。少部分为贵族土地。（四）乱箭地。为一般蒙古平民地主（牧主）所有的土地。这类土地从伪满时开始，可以自由买卖，一般以25倍的租金可把地权转让给买者（这些买者大都是汉人）。（五）庄头地。即由庄头经营，由农民分散耕种的皇地，大多分布在热河南部承德附近。民国5年实行所谓皇地变民，挂地出售，这部分地大多被庄头地主和官僚封建势力“挂”了去，农民因无钱“挂”地，所得甚少。

由于热河土地开垦的历史较短，原来这一地区的农业人口极少，大量的农业人口系属外地移民及其后代。因此，这里汉族的世袭大地主较少，有些地区甚至没有。汉人土地占有者大都是后起的大地主和经营地主。这些地主占有土地方式，最初是用商业高利贷、欺骗等办法向蒙人占地。军阀时代，以诱惑或威胁等办法掠夺蒙人的土地。在所谓“旗地变民”时，豪绅恶霸又与官府勾结，“抢挂”、“乱挂”由农民租种的皇粮庄头地。日伪统治以后，热河地区土地兼并与掠夺日益加剧，一些豪绅恶霸更加疯狂地霸占农民土地；土匪，包括坐居分赃的窝主，以掠夺钱财“购置”土地；一般地主又以残酷的剥削手段霸占农民的土地。蒙古王公贵族也不满足自己的生活现状，以各方式和手段兼并土地，抢占农奴。因而土地发生了高度的集中，造成“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严重局面。北票黑城子王府占有“内仓地”面积跨朝阳、北票、阜新三县，计21.4万亩，各种地契装满了三间房子，年收租8320多石。府内有瓦房300间，海青房700间。设有花园、鹿园、戏台、养鱼池等生活游乐场所。喀左旗王府仅有家族人口几十人，而占有奴仆150人。占地连跨几个村的汉族大地主也不乏其人。据有关资料统计，热河地区约占总人口10%的地主，拥有土地总数的60—70%，最高达80%；而占人口总数60—70%的贫雇农，仅占有土地15—20%。全省各地土地集中状况也不尽一致，热北与热西最集中，热中、热辽次之，热东、热

南、辽西更次之。热北经棚五区的白家树林乡，地主富农人口不足7.5%，而占有土地高达81%以上；中农人口占11%，占有土地10%，贫雇农人口80%以上，而占有土地仅9%。还有些地方，一户地主占有几个村子的土地，而几个村子的农民完全没有土地。从上述数据中可以看出，热河地区土地集中的特点是：土地占有与人口的比例形成两个锥子形的交叉，即地主人口最少而占有土地最多，贫雇农人口最多而占有土地最少，中农则介于两者之间，土地占有与人口数量比例均等。这种情况，无疑造成了地主垄断土地，从而垄断粮食，使高租高利贷以及不等价的商业剥削成为可能。这些剥削又反过来增加了财富的集中，以致恶性循环，使两极分化愈来愈严重。王公贵族、恶霸地主过着荒淫无度的生活，如喀左旗默尔更额王府，每日生活费用为600银元，相当于王府长工30人一年的工钱，每年消费的鸦片烟折合粮食达740石。但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贫苦农民却挣扎在饥饿的死亡线上，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干活如牛马，生活十分悲惨。

王公贵族等世袭土地所有者多以雇工、租佃等方式剥削榨取劳动人民血汗。汉族地主除采用雇工剥削外，还采取“无力青”“有力青”等剥削方式，其中以“无力青”最为残酷，剥削量占一个劳动力的全年所得的70%以上。绝大多数是“一年血汗一身债”。当时民间流传这样的歌谣：“一年青，踏进坑，儿子孙子还不清。爷榜青，爹榜青，我榜青，娶不上媳妇断了根。”形象而生动地反映了地主对农民残酷的压榨勒索。雇工除物质待遇异常恶劣和被虐待打骂外，剥削率约在90%以上，他们实际上已成为地主与王公贵族的农奴，至于其它剥削方式以及各种形式的高利贷盘剥，无不是加在广大贫苦农民身上的沉重枷锁。

地主阶级为了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不仅对农民实行沉重的经济剥削，而且实行残酷的政治压迫，建立经济、政治、武装“三位一体”的封建剥削体制。更为阴毒的是，恶霸地主利用热河地区的民族矛盾，常常把农民对他们的斗争转移到汉族与蒙古族的种

族冲突上去，引起民族纠纷。因此，这里农民与地主的阶级斗争，又常常表现为民族矛盾，民族斗争的形式。这就形成了热河地区封建土地关系的严重性和复杂性。

根据热河土地高度集中的情况和农民对土地的迫切要求，1946年3月底，中共热河省委召开了扩大干部会议，提出了由土地的高度集中到适当分散的方针。具体办法是：用退租退息退押租等办法解决减租减息问题；用挂地归农，收回滚利盘剥地，清理黑地等办法解决分散土地问题，受到广大贫苦农民的欢迎，群众运动迅速展开。搞得最好的是热西、热辽地区，分散土地23万亩，其它几个地区则分散土地很少，这就形成了运动的不平衡。

省委扩干会议，在解决热河土地问题上及其它重大问题上，迈出了非常关键的一步，这是应该肯定的。但也存在着一些缺点，主要是：（1）没能打破1942年土地政策中某些已经过时的限制，仍强调实行“分散土地”还不是“耕者有其田”，因之束缚了干部和群众的手脚；（2）没有明确提出没收汉奸土地问题；（3）没有吸收部队参加到这一运动中来，致使一些部队不了解这一方针，有些行动障碍了运动的顺利发展。4月中旬，中共热河省委将扩干会议决定及执行情况报告党中央，中央两次复电肯定了分散土地的方针，并称赞说：“这些工作你们做得很好，是完全正确的，与中央最近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是符合的。”电报指出：“减租还应进行，但只靠减租不能解决土地问题，应利用清算租息，清算负担，清算抢掠霸占，清算黑地挂地，清算劳役及其它剥削等多种方式，使地主土地大量转移到农民手里。”电报还就扩干会几个不足的方面做了具体明确的指示。中央的电报指示对热河的群众运动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①

^①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给冀热辽中央分局的指示》，1945年5月11日，中共中央《关于热河发动群众工作的复示》，1946年5月17日。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已经下达，中央决定改变土地政策，由减租减息改变为清算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受到广大贫苦农民的坚决

拥护，一些干部的思想也开始转过弯来。

5月底，中共热河省委又检查了热西的运动情况，召集各县领导干部讨论了运动中出现的若干问题。会后，中共热河省委发出了《关于贯彻中央土地问题的指示的指示》，即六六指示，明确指出：土地改革是一切工作的中心。没有土地改革，群众发动不起来，一切都将成空谈。“号召党政军民各级机关、团体、部队及所有人员，一起动手来完成这一工作。”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热河全境掀起减租运动消息。

中央五四指示和热河省委六六指示，结束了各地普遍存在着的“要地主还是要农民”的争论，干部的思想得到一次大解放，害

怕发动群众的右的错误思想得到纠正，并组织起由党政机关和部队干部参加的1000多人的工作团、工作队，深入各地，贯彻中央、省委指示，放手发动群众，全省土地改革运动猛烈展开，造成热河群众运动的第二个高潮。到7月底，热河农民已由地主手中分得400多万亩土地，有将近百万人参加了这一伟大运动，并直接获得了土地改革运动的利益。在土地改革基础上，许多地区群众建立了自己的武装，组织了自卫团体，改造了旧政权，斗争中涌现出大批积极分子，有8000多人入了党，2万多人参加了军，共产党在热河大地上真正扎下了根。8月初，由赤峰开始，各地先后召开了农民代表大会，由群众自己检查各地执行政策的具体情况，讨论如何贯彻政策的办法，总结推广各地群众的创造。有些地区农代会代表组织工作队，突击落后地区，使土地改革运动进一步深化。后来，由于国民党向热河解放区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形势一时恶化，党政军机关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各地的土改运动相继陷于停顿状态。

热河减租减息和解决土地问题的斗争，使身受几千年封建压迫的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中解放了出来，他们欢天喜地地说：“头一次见到晴天！”“拔出万年疔，从此一身轻！”“共产党为咱穷人办了这么多好事，两扇心门都开啦。谁要反对共产党，我们就不饶他！”中农则说“得地不多，但出了几口押在喉咙里多少年的冤气。”但大地主则完全站到反对的立场上，说：“这是什么世道，驴粪蛋也生光了。”他们有的威胁群众说：“现在你要我的地，我把你当肥猪养着，等中央军来了，叫你脖子上冒凉风。”有的拉拢腐蚀干部，有的操纵成立假农会，有的则公开拉杆子当土匪。这些都增加了解决土地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

五、克服财政困难，支援革命战争

热河解放之初，在财政经济工作上遇到很大困难。

在历史上，热河就属于农业经济地区，工业基础十分薄弱，

商品经济也不发达。日本侵热后，推行畸形的殖民地经济，鸦片收入成为热河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由于实行配给制，商业处于消亡状态。对北票、元宝山等煤矿区则进行破坏性的掠夺开采，民族工业摧残殆尽。所以，在日伪投降前，热河就是个千疮百孔，入不敷出的穷省份。

热河解放后，铁路、工矿企业遭到破坏，不仅不能增加收益，反而需要大量投资，才能恢复生产；部队和干部队伍迅速扩大，由原来的5000多人扩大到7.4万多人，还有大批干部和军队经热河开赴东北，财政支出大大增加。加之始终处于战争环境，军费开支约占各项经费支出的80%以上，因此，在财政经济方面遇到了很大困难，主要表现是财政收支不平衡，入不敷出；金融紊乱，通货膨胀，物价波动；物资缺乏，军需民用均感不足。

当时解决财经困难的办法主要有4个：

一是靠晋察冀边区供给。主力军经费由边区完全供给，地方军经费由边区部分供给，银行、贸易基金和农业、工业贷款、投资也均由边区供给。1945年9月~1946年9月，晋察冀边区供给热河款物折合小米1.71亿斤，占财政总支出的42.8%。

二是接收敌伪物资。进入热河之初，一切供给主要靠接收敌伪物资，当时数量相当多，主要是粮食、大烟、军装、布匹等。但重要物资多被苏联红军消费或运走，还有部分散给群众，国民党在东线进攻时又损失一部分，加之当时无统一财政管理制度，分散接收，分散分配，浪费甚大，这样就所剩不多了。这期间共接收敌伪物资折米1.55亿斤，占总支出的38.5%。在当时曾经提出过“收集物资，扩大部队，发动群众，准备作战”的任务和口号，对解决财政困难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这个口号没有明确以发动群众为中心来完成其它任务，在实际执行上造成了单纯搞物资和一些坏分子混入部队的现象。在接收物资中，一部分干部的太平享乐观有了发展，甚至产生了贪污腐化等问题。这些弊病造成的危害在国民党向热河进攻时就明显的显露了出来。

三是征借公粮。开始，热河准备征收公粮，后因热东战事关系，又改为向地主借粮。热河省政府曾发出《筹借粮食与清理敌伪物资及鸦片惩罚办法的指示》和《筹借粮食与清查敌伪物资运动》的文件，规定了筹借粮食的对象、范围、分配办法以及组织领导等具体事项，使清查物资和征借粮食工作走上正轨。1945年、1946年先后两次征借粮食约6000万斤（包括敌伪存粮、没收汉奸恶霸粮食和向地主借粮三项），占财政总支出的15%。

四是自己生产，主要是商业贸易。彻底推翻敌伪经济统制与封锁配给，实行商业贸易自由，发展解放区内部物资交换，建立了张家口、承德、冀东、赤峰之间互相依托的贸易网，在一年间贸易盈利折米600万斤，再加上自己生产的部分产品，占财政总支出的2%。

另外，还有税收折粮700万斤，占财政总支出的1.7%。这些措施，对解决当时的财政困难，保证部队供给，支援战争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946年下半年，晋察冀边区政府采取紧缩发行，以税收支持财政的财政金融政策。由于热河是新解放区，又处于战争环境，行政机构尚不健全，税收制度难在短期内发生应有作用，因之造成热河边币缺乏，被驱逐的满币回潮，财政困难进一步加深，以致机关部队的菜金都不能照发，部队无菜吃，生活艰苦。针对这种情况，冀热辽中央分局致电党中央，提出了发展冀热辽财政金融的方针：“我们从冀热辽目前具体情况出发，财政金融政策目前不是收缩而是大量发行，不是完全不支持财政，而是一部分支持财政，不是绝对统一而是统一领导，分散经营。今冬征收是打开边币市场好机会，发展生产准备明年大生产的重要关键，如果不能预先给冀热辽大批准备的边币，明年仍处于财政异常困难情况，则冀热辽就应当有发行权（这是因为交通条件关系）”。到1947年秋季，遂发行了热河省钞。

第四节 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四三会议

一、热河民族问题和党的民族政策

热河是多民族杂居地区，除汉族外，还有蒙、回等10几个民族。热河民族问题主要是蒙、汉族民族关系问题。处理好蒙、汉族关系是建设巩固的热河根据地的关键问题之一。

热河蒙古族地区位于热河的北部和东部，历史上属于内蒙古东部地区，通常称为东蒙。蒙古族人口有40万左右，多分布于西拉木伦河南北。河南为卓索图盟，包括翁牛特旗（乌丹）、翁牛特右旗（赤峰）、敖汉旗、喀喇沁左旗、喀喇沁中旗、喀喇沁右旗、吐默特左旗（阜新）、吐默特中旗（北票）、吐默特右旗（朝阳），人口约25万。农垦较早，蒙古族人大部农业化，半农半牧与纯游牧的占少数。河北为昭乌达盟，包括克什克腾旗（经棚）、林西、巴林左旗（林东）、巴林右旗（大板）、阿鲁科尔沁旗（天山）、扎鲁特旗（鲁北），人口约15万，农垦较晚，游牧民占大多数。

长期以来，热河的蒙族同其它民族一样，始终处在反动阶级的统治压迫之下，是个受压迫的民族。而广大蒙族群众更受着多重的剥削与压迫。蒙古封建王公贵族300多年的世袭统治，始终是压在蒙族群众头上的一座大山，到抗战胜利后，仍以多种形式保留着惨无人道的农奴制。此外，蒙民还要受一部分汉民的剥削和欺凌，他们往往利用商业高利贷、廉价典当、赌博，甚至武装掠夺的办法，霸占蒙民的土地和其他财产，露骨地推行大汉族主义。另一方面，蒙古民族也是个具有强烈革命性和斗争性的民族，民族自决运动此伏彼起，接连不断，是冲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统治的一种伟大的革命力量。日本投降后，热河蒙族进步人士与最先进入蒙区的冀热辽部队一起，摧毁日伪残余，建立各级政权，民

族解放斗争迅速兴起。但国民党势力也乘机而入，派遣特务，拉拢一部分蒙族上层统治者，并勾结土匪，秘密建立国民党党部，成立光复军。还在北票和锦州分别成立了所谓的卓索图盟政府、昭乌达盟政府，妄图把热河地区的蒙古民族置于其带有浓重大汉族主义色彩的反动统治之下。这些活动自然遭到了蒙族人民的强烈反对。冀热辽部队也给以严厉打击，消灭一部分反动武装，使他们的所谓政府形同虚设。

中共中央对内蒙古地区的斗争十分关注，1945年10月23日，发出电报指示：“在目前我们控制热察，发展东北，取得华北优势的方针下，内蒙在战略上具有极重要的地位。适当的解决内蒙民族问题，不仅关系内蒙民族本身的解放，而且能够建立我党我军巩固的后方。”电报指明：“对内蒙的基本方针，在目前是实行区域自治。首先从各旗开始，争取时间放手发动与组织蒙人的地方自治运动”。根据中央指示精神，11月25日在张家口成立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作为内蒙古人民自治运动的领导机关，选举云泽（乌兰夫）为该会主席。为了开展内蒙东部地区的工作，联合会于12月派出了以刘春为团长的东蒙工作团，1月到达赤峰，开展蒙族工作。

1946年1月，由东蒙进步人士和革命青年发起，在葛根庙召开了有中共党员参加的东蒙人民代表会议，博颜满都当选为东蒙自治政府主席，哈丰阿为秘书长。会上还宣布成立东蒙古人民自治军。阿思根为内防部（即军事部）部长。并把热河东北部16旗划归他们管辖。同时派出以萨嘎拉扎布为团长的工作团到林东，成立了昭乌达省政府和东蒙自治军第四师，萨嘎拉扎布任省长，和子章任第四师师长。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白云航也由王爷庙到达卓索图盟，建立了内蒙自治促进会，并要求冀热辽部队同意其成立蒙古正规军。

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对于团结东蒙各阶层人民，推动自治运动起了积极作用。但是，在这个政府的成员中，旧官吏和上

层人士占的比例很大，其纲领中也不提发动群众进行民主改革。特别是将热河省属16旗划归其管辖，破坏了热河的完整性，这就同配合苏军，从日伪手里解放了热河大部蒙族居住地区的冀热辽部队发生了矛盾，曾一度发展为武装冲突。

冀热辽中央分局和热河省委、省政府对热河的民族问题给予极大的关注，凡涉及到民族问题都采取慎重的态度，调查研究，做细致工作，从实际出发，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早在1945年11月，针对初步显露出来的民族矛盾问题，分局和省委就曾指出：“蒙民回民有建立自己军队的权利，我党我军有帮助的义务，必须诚心诚意地帮助，才能消除他们对我们的怀疑。”“不应为大汉族主义思想所影响，应有宏阔的风度，确信经过艰苦忍耐的工作，特别注意发现培养提拔蒙、回民中之群众领袖，可以处理这一些问题。”^①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以及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群众运动中，都照顾到蒙族问题，制定了一系列的特殊性政策。

热河回民问题解决的比较早，1945年11月就组建了热河回民支队，由丁坚任支队长、吴亚生任政委，有4个连队，400多人。回民支队依靠回民群众，团结回民上层人物和回民知识分子，开展反奸清算斗争，获得很大成绩。对于同东蒙自治政府的矛盾冲突，冀热辽中央分局和热河省委则采取了既坚持原则立场，又避免武装冲突的方针，由胡锡奎亲自到赤峰去做调查研究，并于1946年3月3日致电中共中央、晋察冀中央局和东北局，报告了东蒙问题情况，建议请云泽（乌兰夫）来热，“以便掌握对蒙古人民的正确领导关系”。3月7日，冀热辽中央分局也致电中共中央、晋察冀中央局、

^①冀热辽中央分局、热河省委《关于热河形势与军事方针的指示》，1945年11月26日。

东北局和云泽,提出了解决热河民族问题的八项建议。这八项建议的要点是:在热河蒙古人区域,采取旗县并存的政权形式,在省政府下建昭乌达盟;切实解决蒙汉土地与商业关系等问题,消除汉人对蒙人的欺压,使蒙人得到切实利益,促进蒙汉团结;在热河建立内蒙古自治学院,训练蒙古族干部,设立各级蒙古学校,在蒙古人中开展救济和卫生事业;在蒙人内部暂不进行清算减租运动。这些建议具体体现了党的民族政策,得到了党中央的肯定和赞同。

二、东西蒙承德会议

中共中央为解决热河与东蒙自治政府的争端,促进东西蒙自治运动的联合与统一,团结蒙古族各阶层人民,共同进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于1946年2月24日,电示东北局和云泽,要他们共同研究解决这一问题。后经东北局提议商定,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与东蒙自治政府各派7名代表,由云泽主持,在热河省首府承德召开会议,研究解决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问题。

会议从3月30日开始到4月2日,经过5次准备会议,围绕着内蒙古的领导权和走什么样的道路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有些人提出了“退出内战”,“独立自治”,“不参加国共之争”,建立“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等错误主张。自治运动联合会的代表,一方面严正阐明共产党的民族自治政策,批驳了那些错误主张;另一方面,又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以平等的态度,反复协商,终于取得了一致意见,确定了内蒙古自治运动的正确方针。

4月3日,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正式举行,通过了会议的主要决议:内蒙古地区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统一的民族区域自治;由东蒙自动解散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按照中央先由自治运动联合会做群众工作的指示,决定撤销东蒙政府,成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总分

会，领导东部四盟的工作；东蒙自治军改为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性质一致的内蒙古人民自卫军，接受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军区的领导与指挥。

会议还决定扩大原联合会的组织机构，选举执委61人，候补执委8人，常务委员24人。选举云泽（乌兰夫）为执委会主席和常务会主席，博颜满都为副主席。并决定以赤峰为内蒙古自治运动临时中心地，联合会迁赤峰，卓索图盟、昭乌达盟、锡林郭勒盟、察哈尔盟受联合会直接领导。

会议还作出了《关于昭乌达盟行政军事及蒙汉关系诸问题的决定》，规定了统一建制、统一军队等问题，妥善地解决了热河的蒙汉矛盾。热河省政府拨给东蒙3万元大洋，以便救济王爷庙机关工作人员和贫苦蒙民。在会议期间，经中共中央批准，接受哈丰阿、特木尔巴根参加中国共产党。

四三会议后，在王爷庙召开了东蒙人民代表会议，宣布撤销东蒙自治政府，解散内蒙古人民革命党。4月15日，热北专署代表与昭乌达省代表在林西谈判成功，昭乌达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并与热北专署合并，成立昭乌达盟行政委员会。和子章的东蒙自治军骑兵第四师也归属热北军分区领导。与此同时，成立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昭乌达盟分会，乌力吉那仁任主任，那苏图任副主任。成立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卓索图盟分会，白云航任主任，孔飞任副主任。以后又相继成立了各旗支会、支队武装和卓索图盟纵队。从此，热河的蒙汉各族人民，团结合作，走上了共同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争取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

四三会议，是内蒙古民族解放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加强了蒙古民族的团结，结束了东蒙、西蒙长期被分离的局面。四三会议，也是热河史上一次重要会议，它不仅解决了热河的蒙民问题，而且巩固发展了热北地区，为后来冀热辽中央分局和热河省领导机关迁往热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七章 让开大路 占领两厢 在艰难困苦中建设热河解放区

第一节 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 热河解放区的严重困难局面

一、“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战略方针的提出和在热河的实 施

五月战役之后，热河战场上出现了暂时休战的局面，全国形势却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民党政府自恃有美国的援助和10个多月的战争准备，竟背信弃义地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公然于1946年6月27日，向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从此，爆发了全面内战。

全面内战爆发前后的热河形势是十分严峻的，各方面的斗争极其错综复杂。

一方面，国民党抢占热河之心不死。6月17日，在南京召开的国共谈判的五人会议上，国民党节外生枝地提出五项荒谬条件做为停战的前提，其中第三条即要求中共“撤出热河南部及承德”，遭到中共代表的坚决拒绝。最后又提出用嫩江、兴安两省来换热河和察哈尔两省，妄图把华北与东北切成两块，然后分别吃掉，也同样遭到中共代表的拒绝。但为表明和平诚意，中共代表提出了划承德以南冀东一带为不驻兵区的建议，却不为国民党代表所接受。6月26日，周恩来在南京招待中外记者时指出：

“我们不能允许地方已经民选政府，让国民党用‘接收主权’的名义去接收。如果是这样，那么谈判就不成其为两党谈判，而是国民党片面的以武装接收人民的地方民选政权，这就是内战。”^①6月30日，周恩来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驳斥国民党“承德、张家口威胁北平”的说法是“毫无道理”的。他说：“反过来，如果我们也说北平威胁承德、张家口，问题便无法解决了”。^②事实上，当时国民党就调集了十三、五十二、九十三、九十四军和七十一军的一部及部分保安队，再次形成从东、南、西三面包围承德之势，战争一触即发。

另一方面，热河解放区的形势也是很困难的。热东、辽西的大片富庶地区被国民党军队侵占，解放区的面积缩小，冀热辽部队一直处于敌强我弱的条件下，连续作战，力量遭到削弱；解放区的后方也不巩固，国民党特务、土匪和被斗的汉奸、恶霸、地主勾结起来，组织暴乱，进行破坏活动，杀害干部和群众积极分子，出现了混乱现象。同时，在财政经济上也出现了相当大的困难。这些情况说明，虽然前一个时期做了大量工作，但由于时间短，任务重，特别是由于没有认真地领会和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方针，缺乏建设巩固根据地的明确观念，“对敌进攻承德的战争发展的严重性则估计不足”。^③因而，出现了一种严重困难局面，影响了热河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

关于“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方针，是中共中央根据东北的实际情况提出来的。当时，国民党30多万大军开进东北，

①魏宏运主编《中国现代史》下册，第30页。

②周恩来招待中外记者答复有关时局各项问题，1946年6月30日。

③程子华：《目前形势与任务》，1947年5月3日在冀察热辽第一次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

苏联将各大城市及长春铁路交国民党接收。这样，在东北就形成了敌强我弱的局面，原计划控制整个东北，特别是控制东北的一切大城市已不可能，因而急需改变战略方针。1945年11月，中共中央及时提出了“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方针。刘少奇还针对东北局工作部署中的问题，电示东北局：“你们屁股坐在大城市附近，背靠有很多土匪的乡村，如果顽军一旦控制大城市，你们在城市附近不能立足时，主力以至全局就不得不陷于被动”。^①11月28日，在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中，进一步重申了这个方针。这样，就再一次实现了战略方针的重大转变。

中共中央关于“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方针是完全适合热河情况的。但在这个方针发布之时，正处于热河东部战场战斗紧张激烈的阶段，冀热辽中央分局和热河省委没能认真学习，深刻领会这个精神，跟上这个战略方针的转变；同时，当时冀热辽区归晋察冀中央局管辖，而晋察冀大部分是老解放区，根据地比较巩固，与热河、东北完全是新解放区没有巩固的后方的情况有所不同。所以，对这个重大方针的转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致使思想上仍停留在和平民主新阶段上，战略方针也还停留在“完全控制热河”上，没能把建设广大农村根据地放到一切工作的首位。

对于这个问题，“热河的战争环境使我们在领导思想上有了较早的转变”，复员工作决定不办，军工生产迄未停止，但未能在全党全军中完全贯彻，“以故这一转变过程，在全党来说，仍表现为不够迅速与不平衡”。^②为后来的革命斗争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

①《现代东北史》，第405页

②程子华《目前形势与任务》，1947年5月3日在冀察热辽第一次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

二、承德撤退，战略转移

在热河地区，由“完全控制热河”到“让开大路，占领两厢”这个战略方针的转变，实质上是从承德撤退之后才开始的。这就是说，一年多的两次转变都是同承德相联系的。第一个转变，即从战争到和平，从乡村到城市的转变，是从进占承德开始的；第二个转变，即从和平到战争，从城市到乡村的转变，则是从承德撤退开始的。

在承德撤退之前，冀热辽中央分局和热河省委对第二个转变是有思想准备的，但并不充分，在全面内战即将爆发的1946年6月4日，冀热辽中央分局发出了《关于保卫承德、赤峰紧急动员的指示》。这个指示基于“如果承德、赤峰不保，整个热河亦难保”的认识，提出了“不怕牺牲，克服困难，誓死保卫承德、赤峰，誓死保卫热河，誓死保卫冀热辽”的号召，又于6月13日作出了成立热辽区党委的决定：由胡锡奎任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杨雨民任行署主任，黄永胜、文年生任军区正副司令员。热河省则由黄火青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这个号召和部署，对于鼓舞群众，做好反击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固然是十分必要的，但誓死保卫承德、赤峰的思想，显然是与“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方针不相符合的。

6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请依敌我力量考虑承德弃守问题的电报，指出：如果敌于平泉集中3个师西调，我不能于野战中歼灭其主力，承德即有被占之可能。假如将来出现这一形势，则应考虑固守或主动放弃承德的问题。如有把握歼灭敌人，从根本上粉碎其进攻，则应当固守承德；如无此种把握，则应准备放弃承德。中央电报还特别指出，如放弃承德，一则保存杨苏纵队及其他有生力量，不致过于消耗，以便坚持冀热辽广大区域，等待土地问题解决后，兵力即可增强，那时我即能收复锦热路及承德；二则抽出赵纵队回晋冀，协同太行、冀中夺取保府、石门及正太路。冀热辽中央分局接电后，连续召开会议，进行讨论，最

后还是于22日向中央发出了“承德拟守对我有益”的电报，并且做出了东攻西守的保卫承德战役部署。25日，中央军委发出了做退出承德准备的电报，指出：如顽方确已集中优势兵力，我方不可能阻止时，你们即应作退出承德之准备，以免临时仓促，丧失物资。到7月1日，冀热辽中央分局发出了有关指示，才将誓死保卫承德、赤峰的方针转变为建设农村根据地的方针，开始做撤出承德的准备。这些指示，澄清了战争与和平、城市与乡村等问题上的混乱思想，把全党全军的思想统一到创造根据地与进行长期艰苦斗争的新方针上来。以后，黄寿发纵队、赵韩纵队和杨苏纵队相继调出热河。到8月，冀热辽中央分局和热河省领导机关主动撤出承德之后，“战争使和平思想为之扫除”。

冀热辽中央分局、热河省委、省政府等领导机关，是从8月初开始，分期分批，最后于8月28日前完全撤出承德的，这期间，做了大量的战争准备工作，如发动20多万群众，彻底破坏了锦古路和叶赤路，致使承德至古北口路段完全报废，始终没能通车。建立以郭耀臣为书记，郑起茂为副书记的承德工委，坚持承德外围的武装斗争。同时，加紧进行土地改革运动，动员群众，参军参战，都收到一定成效。

8月26日，国民党十三军在飞机配合下，由平泉分三路合击承德。一路沿锦承铁路经下板城、上板城进攻承德；一路由黄土梁子经头沟，迂回到承德北部，回头攻击承德；一路沿承平公路，经七沟、三沟进攻承德。当时，冀热辽部队只有4个旅，1.5万多人，力量十分薄弱，武器装备也差，无力阻止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就采取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和夺取地方为主的战略方针，主动放弃承德。对下板城、三沟两路进攻之敌，进行小部队阻击，集中主力歼灭头沟一路，并在高寺台附近展开激战，歼敌一部，冀热辽部队十三旅亦伤亡300余人，遂撤出战斗，继续向围场、赤峰转移。国民党十三军28日占承德，30日占

滦平，31日占隆化，9月11日占丰宁，10月7日占围场。国民党九十三军9月4日占建平，9月11日占宁城。至此，大半个热河被敌侵占。

承德撤退，战略转移，从总体上说是正确的，积极的，效果也是好的。但原计划国民党军队可能终止于隆化、围场之间，因此将后方机关设在围场的新拨一带，则是不切合实际的，冀热辽中央分局和军区转移围场后，随着情况的发展，“确定后方转移经棚，可是为时已晚。同时保持强大后方，集中资财，不适合游击战争为主的环境，以致遭到大的损失。”①

三、终止国民党进攻，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承德失守以后，热河的革命斗争形势更为严峻。一方面，国民党进攻不已，扬言要把冀热辽部队赶到西伯利亚去，地主、恶霸乘机反攻倒算，武装匪特又猖獗起来；另一方面，在革命队伍内部，一些不坚定分子和原收编而没得到彻底改造的敌伪武装，到处叛变、溃散，农民的“变天”思想也泛滥起来，就是在干部队伍中，也发生了“能否站住脚”的疑问。

面对这种情况，热河的党、军队和全体人民的紧迫任务，就是终止国民党的武装进攻，争取战略相持阶段的早日到来，以便腾出手来，进一步深化土地改革，清剿土匪，建设巩固的热河根据地。

在当时的热河战场上，局部地区已开始出现较为有利的形势。国民党十三军占领承德等地后，被迫分散兵力，处处设防，再也抽不出发动大规模进攻的机动兵力。因此，被终止于围场、丰宁一线。而冀热辽主力部队则全部集中于赤峰附近地区，面对的是非蒋介石嫡系的实力较弱的九十三军和一些保安队，且处于内

①程子华：《目前形势与任务》，1947年5月3日在冀热辽第一次党代表会议上作报告。

线的防御作战的地位，有天时、地利、人口，^{以逸待劳}等多种有利条件。这样，在赤峰这个局部战场上，冀热辽部队就占有一定的优势。冀热辽中央分局和军区，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发动了终止国民党武装进攻的第一期作战，重创了敌军，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终止国民党武装进攻热河解放区的第一期作战是由华石里沟、宁城和乃林3个战斗组成的。

华石里沟战斗。9月4日，国民党九十三军暂二十二师由朝阳侵占建平，随即派一个团向赤峰方向进攻，当日中午到达建平县华石里沟附近时，即遭到预先设伏的冀热辽部队的围歼，激战一夜，歼敌500余。正待全歼该敌时，敌暂第十八师赶来增援，冀热辽增援部队未能及时赶到，血战至晚，撤出战斗。这次战斗由于配合不好，冀热辽部队胜利后又受损失，没能阻止敌之前进。敌暂十八师侵占宁城，暂二十二师侵占乃林、天义。

乃林战斗。9月18日，冀热辽部队在地方部队配合下，对窜犯乃林之敌暂二十二师的两个团发起攻击，经两次强攻，占领大半个村庄，敌已动摇，但因通讯联络不好，指挥部下令撤出战斗。是役毙伤敌600余人，俘50人，缴获枪炮一部，敌退守天义。

宁城战斗。9月23日，热河军区司令员段苏权指挥十三旅两个团、十七旅一个团，对宁城守敌暂十八师第三团发起攻击。十六旅两团、十七旅一团和热中警各团阻击天义援敌，热东军分区两团阻击建平援敌。经两天两夜的攻坚作战，于25日下午占领全城，摧毁大小堡垒百余座，打援部队也于九头山、八肯中梁与敌展开激战，阻敌不能前进。是役共消灭敌一个整团和地主武装梁殿英部一个警察大队，毙伤俘1600多人，缴获火炮22门，轻重机枪53挺，各种步枪230支，军用物资一部，击落敌机一架。在宁城战斗中，赤峰、宁城地区广大群众，组织1000多人，400多副担架，冒着枪林弹雨抢救伤员，支援前线，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威力。

宁城战斗是冀热辽部队取得的第一个攻坚战的胜利，不仅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军队的嚣张气焰和对热河的疯狂进犯，迫使其不敢冒然进犯赤峰，敌暂十八师师长也被撤职；同时，还取得了攻坚战的经验，改善了部队的装备。

终止国民党进犯热河解放区的第二期作战，是从赤峰撤退开始的。10月初，国民党从东北调九十一师援热，冀热辽中央分局和热河省领导机关、学校、医院等，于10月9日前主动撤离赤峰，转移林西。国民党九十三军暂二十二师于次日侵占赤峰。但是，冀热辽部队却转移敌后的热东，一举攻克建昌，开始了终止国民党进攻的第二期作战。

建昌位于热河与辽西的接壤地带，地处北宁路和锦承路之间。日本投降后，即为于大川匪部抢占，成为国民党军队进攻热河的重要基地。驻守建昌的即国民党东北保安四支队的两个团和直属队，共1500多人，经过周密研究，以热东独立团和辽西支队为主攻，独立十三旅助攻，于10月15日对建昌守敌发起进攻，经过15小时的激战，全歼该敌，计俘保安第四支队少将副司令罗星光以下700多人，毙伪县长、国民党部书记长及正副团长以下700余人，缴获甚多。建昌一仗，打开了热东的局面，对整个热河战场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承德、赤峰撤退以后，冀热辽中央分局为适应战争环境，决定精减机构，充实下层和部队，并经中央批准，将热河省委、热辽区党委合并于冀热辽中央分局；恢复热河省政府，领导全热河各级政府工作；将热河、热辽两军区结束，另设冀热辽野战军司令部。同时，根据敌我力量对比的具体情况，以及敌占大城市和重要城镇，据守点线，解放区被包围分割的局面，决定改变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战略方针，实行暂时的以游击战为主的方针，扩充地方军和游击队，深入敌后，四面出击，占领广大乡村，建设小块游击根据地。这样，到1946年10月底，就形成了广大乡村包围个别点线的局面，形成“敌中有我，我中有敌”的犬

牙交错的形势，终止了国民党对解放区的大规模武装进攻，热河战场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11月，冀热辽中央分局于林西召开高干会议，分析研究了热河的形势与任务。11月21日，冀热辽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区司令员、政委程子华作了会议结论。

这次会议是在热河战场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召开的。当时国民党在热河共占领11座县城和一些村镇，分割了热河的完整性。然而大部野战军变成了守备部队，加之东北战场吃紧，十三军两个主力师调入东北（后被东北我军全歼），热河敌军兵力只有4个师。战场广，补给线长，兵力不足，蒋军只能守备重要点线，另以土匪地主武装，新编保安队等守备次要点线，已无力集中大的部队举行大的战役性进攻。但国民党军队由点线向面的扫荡还是不断，企图由点线扩张到面的占领。另一方面，冀热辽部队在热河尚占有11座县城和广大乡村，大部分地区的人民经受了战争的考验，觉悟程度不断提高，土地改革运动不断深入，以林西为中心的北冀热辽根据地已初步建成，冀热辽部队的数量和质量也有很大改善。但当时十三旅已调冀热察区，在热河的部队也无力发动大规模的反攻作战。

根据当时敌我斗争形势，冀热辽中央分局高干会议提出了土地改革、武装斗争与建立根据地三位一体的思想。同时，又对行政区划作了重大变动：

一、在乌丹成立二十二地委、军分区和专员公署（亦称乌丹兼备区），辖赤西、乌丹、围北、赤峰4县和翁牛特左旗。由邱会作任书记兼政委，吴烈任司令员，刘正文任专员。

二、将原属热河省辖的热南专区（即第十七地委）及其所属承德、平泉、兴隆、青龙、青西5县划归冀东区管辖，承德工委也划归冀东区领导。

三、将原属热河省管辖的热西专区划出，成立冀热察区党委、军区和行政公署，共辖察北、察东、平北、热西4专署和察哈尔、锡林郭勒两盟。段苏权任书记，曾思玉任军区司令员，杨

春圃任行政公署主任。

这样，热河根据地的建设开始走上了巩固发展的新阶段。

第二节 解放区各项民主改革的深入与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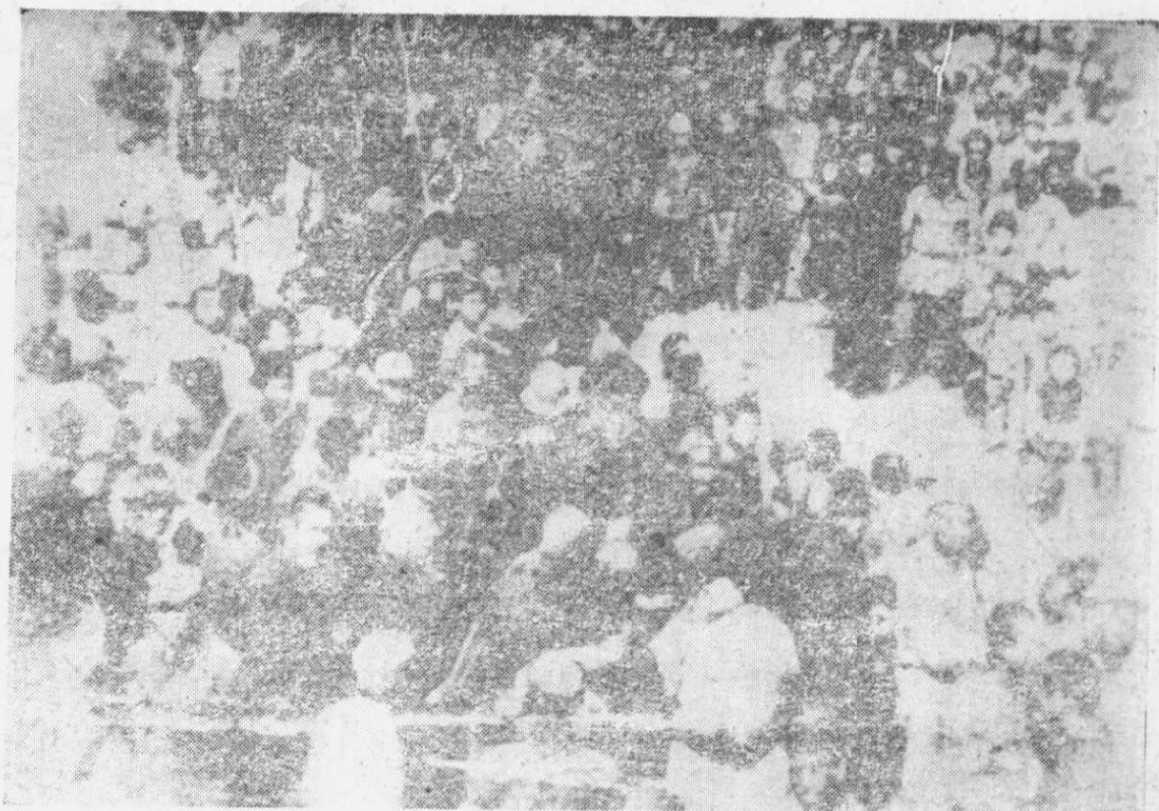
一、检查与深入土地改革

热河的土地改革，到1946年11月，经过减租减息，分散土地和贯彻五四指示等3个阶段，大部分地区已基本上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农村的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昔日地主阶级压迫统治人民的两块基石——政权与土地，已经回到人民手中，农村各阶级力量发生了显著变化。据滦平县兴州、陈栅子、西南沟3个村的调查，土地改革前有地主9户，占有土地1938亩，人均26亩多；土地改革后只占有土地440亩，人均不到6亩。20户富农，土改前占有土地590亩，人均3.7亩，土改后基本没动。中农72户，土改前占有土地898亩，人均2.4亩；土改后占有土地1116亩，人均3亩。贫农114户，土改前占有土地480亩，人均0.9亩；土改后占有土地969亩，人均1.9亩。雇农63户，土改前占有土地59亩，人均0.2亩；土改后占有土地418亩，人均1.9亩。

新东县八家村土地较多，土改前后的阶级力量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土改前大地主人均占地135亩，土改后下降到17.4亩。中小地主由人均79.4亩，下降到24.3亩。富农由人均45.9亩，下降到24.4亩。中农则由人均9亩，上升到22亩。贫农由人均10.9亩，上升到21.7亩。雇农由无地上升到人均21.6亩。

上述是土地分散较为彻底的两个例子，也有虽分散了土地，但还不彻底的。如林东尖山子村，地主占有土地量由人均78.2亩，下降到36.1亩，中农由人均8.8亩，上升到25.4亩。在35户贫农中，只有24户人均分得25.4亩土地，其余11户根本没分到土地，表现了明显的不彻底。

热河地区的前段土地改革运动，也存在一些缺点与错误，主



热河农民在开展土地改革斗争

要是地区上的不平衡和缺乏普遍性。城镇周围，交通要道两侧，工作进行的较普遍，偏远山沟与边境地带则做得较少，或没有进行。“这一方面由于地区大、干部少，在一定时期内照顾不过来，但主要的是领导机关及一些干部存在着和平思想与城市思想，缺乏在远离城市交通要道的广大农村建立根据地的明确思想。”^①在执行政策上有两种偏向：一是对地主应分散的土地分散不彻底，或明分暗不分，或只分动产不分不动产，或只分地不分耕畜、房产、农具等。二是群众运动起来后，又发生了对地主的生活出路缺乏应有的照顾，简单采取封门抄家，或锅碗勺盆一起拿走的“连根拔”等办法；也有的打击富农过重或伤害中农利益。在土地分配上，有租佃借贷关系的佃农得利多，照顾雇农贫农不够；有的积极分子分地过多；有的农会保留这多的土地、物资，未分给群众；也有的包办代替，恩赐分地等等。

土地问题的解决，是关系到巩固热河根据地，赢得自卫战争

^①《关于热河土地问题分局给中央暨中央局的报告》，1946年12月中旬。

胜利的最基本的决定因素。特别是当国民党军队向热河解放区大举进攻，占领一半城镇和主要交通点线以后，土地改革的作用明显地显示出来。

当时，国民党占领区的土地改革受到严重摧残。以汉奸恶霸为首的土匪大团，首先向群众进攻，他们的口号是：“兵不关饷，匪不开枪，专打八路，消灭穷党，抓住干部就听响”，并自称是“富党”，什么义务队、谍报队、还乡团等地主武装到处出现，抢占地盘，屠杀农会干部、积极分子和翻身农民。一些被分散土地的地主也跟着夺地夺粮，软硬兼施，强迫群众退回分得的土地，造成地主阶级向农民的全面进攻。伪满人员一律复职，恢复保甲制度，这些反动势力倒行逆施，横行乡里，使已经翻身的农民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但大多数经过土地改革斗争锻炼，享受过翻身后的自由和幸福的农民群众，面对敌人的白色恐怖，仍然英勇顽强地坚持斗争。他们或者组织武装，“拉山”游击；或者潜伏隐蔽，秘密活动；或者针锋相对，以死相拼，震慑了敌人，教育了群众。隆化县妇女会主任赵玉，一次同十几名干部、群众一起被敌包围，她掩护其他人安全转移，最后拉响手榴弹，与包围上来的十几个敌人同归于尽。兴隆县鹰手营子村年仅22岁的妇女主任骆凤英，在一次掩护干部和群众撤退时被敌人抓获，她不顾当特务的堂兄的威胁利诱，在敌人的屠刀下高呼“共产党万岁！”而英勇就义，尸体被敌人用铡刀铡为三截，被称为刘胡兰式的女英雄。

国民党和土匪武装在其占领区内的奸淫烧杀，苛捐杂税，较“满洲国”尤甚；群众怒斥他们是“二满洲”。这使一部分动摇观望的群众坚定下来；使少数自首叛变，充当敌人爪牙的分子也发生了分化；就是一些中小地主和富农，也逐渐打破对“中央军”的幻想，发出了“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的哀叹。1946年1月，国民党侵占平泉后，横征暴敛，倒行逆施，激起了平泉人民的反抗。他们编出歌谣唱到，“去年来了八路军，平泉人

民翻了身。‘民主政权建立起，笑容在面喜在心……。自从来了中央军，人民的苦痛又加在身。原来以为中央军好，谁知他们不是人。修岗楼来建碉堡，走路都得加小心。地痞流氓满街跑，汉奸特务又显魂，谁家姑娘长得好，压迫人家做二婚。如今人民明白了，谁是敌人谁是亲！”在这些地区，通过土地改革斗争，已经把共产党的事业和命运同当地基本群众的事业和命运深深地连在一起，虽然被敌人占领着，但基本群众“昼盼夜、夜盼明”的期待着人民的军队打回去。而在那些没有进行土地改革或土改工作搞得不好的地区，敌人一进攻，各方面的工作就都垮下去了。

在国民党的军事进攻下，热河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曾呈现相对停顿状态。一方面地主夺地，群众失去果实，遭此打击，情绪低落；另一方面，土地改革搞得好的地区的干部群众顽强地反击地主，继续进行分散土地。如在热中，既使在战斗频繁的8、9、10月，土地改革也未完全停顿，共分散土地2万多亩。这个相对停顿的时间，大体在8—10月，但具体到各地区也不尽相同。如热西因为征烟借粮，从7月就开始停顿。热北的停顿时间则延长到8月以后，热辽则在10月就开始发动群众第二次向地主开火了。

在11月份召开的冀热辽中央分局高干会议上，对土地改革问题进行了详细地研究和讨论，提出了检查与深入土地改革的问题，决定在分散主力，执行歼灭小股蒋军与清剿土匪大团的同时，努力进行恢复和深入土地改革的工作，以便达到巩固与发展热河根据地的目的。1946年12月19日，冀热辽中央分局发出了《关于检查与深入土地改革的指示》，系统地总结了前段土地改革的经验和缺点，提出了今后土地改革的任务与方针，是解放热河土地问题的又一重要历史文献。

“一二·一九”指示指出：目前热河总的任务是进一步发动群众准备反攻，转入大的运动战与准备扩大根据地。为实现这一任务，除军事上大量歼敌外，基本的一环是检查与深入土地改革，而后者又是前者的基本保证。这就把土地改革，武装斗争和

建设根据地有机地统一了起来，并且确立土地改革是实现其他两项任务的基本保证，在对土地改革重要意义的认识上前进了一大步。

指示规定检查与深入土地改革的总方针是：紧紧依靠贫农为骨干，紧密团结中农，真正做到90%以上人口站到自己周围，争取富农一道，分化地主阶级，争取中小地主，集中力量打击汉奸、国特、豪绅恶霸大地主。在有理合法条件下，迅速完成土地改革。这个总方针是总结了当时敌我斗争形势的特点，特别是总结了经过国民党军事进攻，热河的地主和农民的变化情况后提出来的，是来之不易的。

在前段土地改革中，热河的党对热河地主阶级的认识还停留在一般性的认识上，没有认清热河的地主是封建性与殖民地性（包括日寇影响和汉人地主侵占蒙人）融为一体的掠夺集团，是掠夺经济、掠夺政治和掠夺武装三位一体的结合，经过这次反复，认识到热河的地主阶级有三大特点：（一）热河地主的掠夺经济垄断了农村经济的一切，因此要摧毁他们不是一件轻易的事，不但在土地问题上要打得彻底，而且在全部财政经济政策上（如商业、金融等）也要有打击它的办法。（二）热河地主是有丰富政治经验的，善于随着斗争形势而改变斗争策略。在形势不利时，就采取伪装的办法，打进来，拉出去；在形势有利时，则公开反攻倒算，恢复其反动统治。对付这样的地主阶级则需要有更高的斗争策略和足够的警惕。（三）热河地主是直接掌握武装的，因此，热河的土地改革需要在武装斗争中进行，也需要武装来保卫。

基于这个认识，把团结90%以上的人，集中力量打击恶霸大地主阶级作为检查与深入土地改革的总方针是非常正确的，对后来的土地改革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二·一九”指示，还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提出了用不同办法来贯彻土地改革的方法。在我之根据地，已进行土地

改革的，依照填平补齐的原则进行复查，并规定了地主留地标准，基本符合的不再变动，违背这个标准的予以纠正。在未进行土地改革的地区，要依照五四指示精神迅速进行土地改革。在被敌摧毁的地区，主要是大力组织恢复工作，地主夺回或农民自动交回的土地与粮食，原则上一律退还农民，鼓励农民的斗争情绪；镇压少数勾结国民党军队，残害群众的罪大恶极分子；对为恶不多的分子，在促其坦白悔过后实行宽大政策，安定一般地主。在接敌区，主要是一手拿枪，一手分地，在土地政策上可放宽些。

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些措施的提出和实施是正确的，是卓有成效的。在这一阶段内，分散土地的数目没有完整统计，仅据热辽一个专区的报告，从1946年10月到年底，仅清黑地一项就有76万亩，连以前分散的共计200万亩以上，其他被夺土地也全部归还农民之手。这段工作的特点之一是查地工作与整理村政权组织，特别是组织武装工作结合得好，使土地改革扎下了根。另一个特点是把土地改革这个中心工作与扩军、战勤、征粮等临时的突击性工作结合，既不放弃中心工作，又完成了突击任务。第三个特点是工作细致深入，克服了过去“到处点火”“到处煽风”的做法，力求“微风细雨，点点入地”，在巩固中求发展，在发展中求巩固，使群众运动既轰轰烈烈，热火朝天，又不是火星飞溅，初燃即灭，而是把无数火花汇成一团大火“把封建枷锁烧断，陶冶出人民的新生。

经过检查与分散土地，开展反夺地斗争，群众情绪已开始稳定下来。他们说：“八路军，扎下根，越翻身，根越深。”热河根据地的建设已走向巩固发展的新阶段。

二、建设人民武装与清剿土匪的新胜利

承赤撤退后，冀热辽军区的战略方针，由以运动战为主改变为以游击战为主，一面保留一部分主力部队于热辽地区休整，整顿组织，补充新兵，改善装备，训练部队；一面将一部分主力配

备到各个军分区，执行歼灭小股蒋军与清剿土匪大团的任务，以便于恢复与深入土地改革，达到巩固与发展根据地的目的。实践证明，这一战略方针的转变是正确的，适时的。到1947年1月底就收到了大的成效；热东从混乱到稳定到扩大，热中由没有到有到大，热西由大部丧失到大部恢复，热辽和热南进一步巩固，逐渐发展，警备区也恢复不少地区的工作。与此同时，人民武装组织经受了战争的考验，有了极大的发展。

热河人民武装工作，在1946年6月以前隶属建联会管辖，当时只有两三个干部，领导机关弱，下层组织没有建立起来。6月中旬，冀热辽中央分局决定成立热河人民武装委员会，省人民政府也发布了人民武装组织章程，规定武委会的主要任务是实行劳武结合积极生产，维持社会秩序剿匪防奸，在七八两个月中，结合土地改革，开始重视人民武装工作，农民建立自卫队，站岗放哨，清查坏人，参加剿匪，保卫土改胜利果实，起到了很大作用。特别是承德撤退前，发动20万群众（大多是自卫队员和民兵）大破锦古路，充分显示了人民武装的力量。承赤撤退后，沦为敌占区的人民武装遭受摧残，部分叛变，引起了思想混乱，有的人曾产生过热河群众不可靠，土匪太多，人民武装不起作用的错误观点，经受了一次波折。转移林西后，在冀热辽中央分局的多次督促指示下，错误思想得到克服，人民武装工作受到普遍重视，在根据地和接敌区普遍建立了村、区、县三级人民武装组织，发展自卫队员34万多人，民兵基干队4.9万多人，区以上脱产干部1300多人。还对半数以上的民兵基干队进行了冬训。

人民武装在土地改革、清剿土匪与自卫战争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据不完全统计，1946年民兵单独作战537次，参加人数8000余人，配合主力参战人数1.5万余人。打死打伤国民党军和土匪600多人，俘300多人，缴获武器一部。涌现出许多英雄集体和个人。围场县羊草沟民兵两次击溃土匪鲍三疯子的袭击，保卫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其他如北票靠山屯的民兵情报组和城洼子村的

岗哨，新东县民兵的土城子战斗，建平县民兵以一当十的押花营子战斗等，都给敌人以打击，保卫了解放区，受到上级的嘉奖。

在大力发展人民武装的同时，冀热辽主力部队也有了很大发展。冀热辽军区正确地执行党的建军路线，在土地改革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大量的农民积极分子加入了主力部队，壮大了人民武装。如宁城县在1946年10月15日到11月15日的1个月时间里，就扩大新兵704名。新东县牛骨吐区开展参军竞赛，区直各单位扩军93名，下洼村扩军102名。1946年11月30日，冀热辽中央分局和军区，决定成立朱德骑兵旅（后改师），以庆祝朱总司令60寿辰。并规定各军分区成立骑兵团；从而奠定了热河骑兵队伍的基础。

热河的野战军、地方军以及人民武装，在清剿土匪的斗争中，经受了考验，得到了锻炼与发展。

1946年8月，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热河解放区时，为配合军队进攻，派遣了大批特务、匪队到解放区进行骚扰破坏，加之一些地方武装和民兵叛变，一时土匪蜂起，仅在热北、热西就有100多股，匪众7600余人。热东地区仅朝阳、建昌两县就有匪114股，6500多人。热辽地区3200多人，热中3300多人。全省境内武装土匪可达2万人以上。

这个时期的土匪领导成份很复杂，有的是被收编后叛变的。据热西统计，军分区部队、县支队、区小队和民兵等叛变30多起，达2978人，热北叛变2200余人。如伪警察署长白金辉，被委任为经棚县白岔区长，伪警察分驻所长任芳伍，被委任为围场县半截塔区区长，伪警察分驻所长岳子明、警尉补伊相臣混入建平七家区小队。国民党进攻时，他们都相继叛变，成为土匪大团，为害一方。丰宁县则是国民党特务、匪队、反动地主与混进地方部队的坏人，内外勾结，策动叛变。从1946年9月2日到19日，发生叛变事件19起，1100余人。全县15个区小队，有14个区

小队叛变，携去大枪800余支，手枪200余支，杀害革命干部、战士27人，其中区委书记、区长5人。也有国民党特务、反动地主勾结反动会道门组织叛乱的。1946年8月，在牯牛河两岸搞起“大刀会”400多人，他们身穿绿兜布，斜挎红布带，口含朱砂，手执大刀，自称天兵天将，在紫都台、清河门一带，捕杀地方干部，抢夺人民财物，曾猖獗一时。

这个时期的热河土匪，在性质上已与历史上的土匪完全不同。他们已经不是一群打家劫舍的流寇，而是为着推翻共产党在热河的统治，为着夺回土地改革中失去的财产，为着在热河建立以国民党为首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而建立起来的政治土匪集团，是国民党的别动队，是一股最坚决的反革命骨干力量。

这些土匪还有一套他们自己的活动特点：

1、由于这是一群“官匪”，同时又是一群“地头蛇”，与群众有一定的联系，有比较广泛的社会基础和社会影响。其中一些人还有一定的军事素养，他们利用群众中的盲目正统思想，有一定的欺骗性。所以，他们的活动也更加明目张胆，手段更加残忍毒辣。

2、这些土匪有自己的根据地——匪窝。在他们经常活动的地方有眼线，在一些通匪户中存有粮食、弹药，加之熟悉地理人情，又有国民党军队作靠山，所以，他们无论在行动时或隐蔽时，都有情报和粮食来源；不论是在进攻时或退却时，都能够运用自如，步调不乱。

3、这些土匪扰乱的方向主要是解放区的后方，攻击的目标主要是解放区的县、区、村干部和武装。他们很少和冀热辽主力部队打大仗，打硬仗，而是专门袭扰后方机关，截击运输车辆，砸抢区公所、村公会，屠杀地方干部和积极分子，策动地方武装叛变，造谣惑众，动摇人心，造成社会的不安定，破坏根据地建设。据不完全统计，全省被土匪杀害和在剿匪中牺牲的干部、战士1000多人。负伤和致残的不下数千人，其中被土匪杀害的县团

级干部18人，区委书记、区长80多人。

4、这些土匪有一套自己的战术。他们时聚时散，飘忽不定，有时化整为零，十几个人、几十人一起活动；有时又可几股集中一起，几百人，上千人集体攻击。他们匪性狡猾，打仗多是实行偷袭或长途奔袭，有时避实就虚，避强就弱；有时闪电攻击，打了就跑；有时回旋打圈，设置迷阵；有时流窜袭扰，出没无常。总之，他们在偷袭、突围、隐蔽、远走等方面都有机动灵活的特点。

正是由于热河的土匪是一群政治土匪，又有他们自己的活动特点，破坏性极大，使热河军民不得不进行两面作战。因此，就增加了热河土匪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土匪的猖獗，已成为热河解放区的心腹之患。

为了建设巩固的根据地，支持长期战争，就必须首先在最短的时期内，彻底消灭土匪，根除根据地建设中的隐患。为此，1946年10月3日，冀热辽中央分局决定“限期清剿热河匪患”，并成立了剿匪工作委员会和剿匪司令部。王逸伦任工委书记兼政委，张苏任司令员，统一指挥热河的剿匪斗争。并规定了“分化瓦解，剿抚兼施，先打后拉，打中有拉，严惩匪首，争取匪众，缴枪不杀，既往不咎”的剿匪政策，使这次“务须达到肃清匪患”的目的。冀热辽军区重新布置力量，动用一部分主力部队及所有地方部队，划分地区，分片负责，开始了清剿土匪的第二期作战。在方法上，先剿灭数量多、危害大的土匪大股，然后再进剿小股土匪，最后消灭残匪。

热北和热西地区，是冀热辽区的后方根据地，是剿匪的重点地区。在剿匪司令部的统一指挥下，调动5个骑兵团和一个步兵团，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联合清剿。第一次是在1946年秋，骑兵团将“压五洋”，“老二嫂”股匪包围在赤峰县桥头平房村，活捉“老二嫂”，并就地处决，这股土匪大部被消灭。骑兵一团在广德公包围徐国栋股匪，将其大部歼灭。白金辉联合其他股匪

1000多人，袭扰围北县新拨、山湾子一带，热西骑兵团、独立团和县支队连夜奇袭，将其击溃。这次共作战30余次，毙俘匪400余人，投降25人，缴马270匹，枪220余支。第二次是在1947年春季，集中兵力在热北沙漠地带追击韩桑杰股匪，歼其大部，余匪远遁。又将白金辉股匪包围在克什克腾旗洮力庙，一举将其击溃，击毙70多人，缴战马300余匹，骆驼400余峰，牛100余头，大车30辆和武器、弹药一部。这两次大规模的清剿，使流窜在热北、热西的土匪受到沉重打击，有的躲进国民党据点，有的远扬漠外。

在热东地区，军分区独立团在各县支队配合下，着重打击了几股较大的顽匪。1947年1月6日，独立二团奔袭王永匪部，400多土匪大部被歼。12日，又攻打羊山，将姜廷相、王老潜、金玉犀等3股悍匪击溃，共毙俘200多人。4月12日，围歼了盘踞在松树嘴子的卢金存、张继贤匪队，激战一夜，歼匪400多，活捉匪首张继贤等82人。经过这些剿匪战斗，热东土匪的气焰已被打击下去。

在热辽区，军分区警卫团和骑兵团与各县支队配合，于1946年8月对牯牛河两岸的大刀会进行围剿，一举全歼匪众300余人，将这股刀匪镇压下去，在以后的多次围剿中，又毙伤匪众200人，俘匪首“大狼字”、“铁字”、“吴老广”、“大家好”、“热北队”少校参谋长以下560多人，热辽基本区内的匪患已肃清。

热中、热南地区也积极出击匪队，取得了清剿土匪的重大胜利。据冀热辽军区公布，1946年11月到1947年2月，全区共消灭蒋记土匪5395人，在中心区的匪患被肃清或者被挤到敌占点线附近地区，巩固扩大了热河解放区。

1947年2月12日，冀热辽中央分局又发出了《关于建设和发展野战军的指示》，系统地总结了军队建设中的经验和问题，规定各地要开展爱护野战军运动，保证野战军经常满员，保证野战军的物资供给，解决军属的生活困难。野战军方面要开展拥政爱

民和立功运动，坚决执行政府法令，严肃群众纪律。指示还规定要有计划地从地方军抽调人员补充野战军，但同时要照顾地方军，反对“吞并”思想。指示要求加强一元化领导，统一对敌斗争，野战军的负责人员要参加各该驻地党委；各地党政负责人应经常到野战军中进行慰劳和讲话。指示还对野战军的扩大整训进行了具体部署。

经过大量的工作，到1947年3月，冀热辽主力部队已发展到10万多人，迎来了清剿土匪和人民武装大发展的新胜利。

三、蒙民工作和蒙族武装

承德四三会议后，热河的蒙民工作取得飞跃进展，开拓出新的局面。在农业区进行了除奸反霸、减租减息和初步土地改革，在牧业区则进行了削弱封建特权和民主建政工作，蒙民群众已初步发动起来；各级蒙民自治政权（盟、旗、努图克（区）公所和屯公所）相继建立，并实行财政独立，收入归盟，不足由省政府补贴等政策，基本实现了民族自治；由云泽兼任院长，金起铨任副院长的内蒙古自治学院正式开学，有500多名蒙族进步青年在校学习，为部队和地方工作培养了骨干；成立了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卓索图盟纵队，并将原东蒙自治军第四师改编为蒙汉联军第四师，成立蒙汉联军司令部，由喻楚杰任司令员，和子章任副司令员，权星垣、乌力吉那仁任正副政委。这样，冀热辽中央分局就基本上控制了昭乌达盟（热北）的局势，为把冀热辽解放区的后方和指挥中心放在林西创造了条件。

林西是座2里见方，周围有1丈多高土墙围着的小镇，紧靠在西拉木沦河畔的平原上。林西的历史并不长，还不到百年的时间。但林西的地理位置却很重要，是联系南北，沟通东西的交通要冲。早在民国初年，外蒙“独立”，乌泰叛乱，林西就成了西部边疆重镇，设有林西镇守使，派驻重兵把守。在米振标任林西镇守使时（1913年—1921年）统兵17营，约3万多人。民国3年

(1914)，修筑林西城和林西镇守使署，从此，林西就成了兵家必争之地。冀热辽中央分局和热河省领导机关转移林西后，林西成了冀热辽区的政治中心和后方根据地，又是连接东北、华北及晋绥解放区的枢纽和唯一交通要道。林西虽属汉地，但四周却在蒙地的包围之中。这样，蒙民工作就更加突出出来，稍一不慎，就会发生影响冀热辽全局性的偏差。特别是国民党占领赤峰后，不断派遣特务，组织地下军，收编土匪，建立别动队，又极力与蒙区地方反动势力相勾结，进行骚乱和破坏，使卓索图和昭乌达地区的敌我斗争形势十分尖锐复杂。

当时的林西，前面距国民党军队占领区仅200余里，后面的蒙汉联军第四师还不巩固，东面的开鲁被敌占领，天山被土匪包围，在林西城外就有3股土匪，活动非常猖獗，军区部队20余人出城打柴，被土匪抢劫一空。在林西西北面有布里亚特蒙匪500余人，在日本特务指挥下，经常截击东西蒙之间的来往人员，危害甚烈。而林西城内仅有军区教导队200余人，热河省公安局警卫队80余人，兵力十分单薄。面对敌人的进攻，蒙汉联军第四师中的一部分人发生动摇，三十五团团长期尔登格及三十四团连长乌尔塔和韩桑杰等叛变。李守信的伪热河人民自卫军韩祝三师第二旅旅长张魁武（匪号黑龙）潜伏林西城内，第一旅旅长田文魁潜伏经棚城内，他们收编林西、经棚一带土匪武装1500多人，又策动林西县支队二连、经棚县支队回民连叛变作内应、妄图一举摧毁冀热辽中央分局和热河省的党政军机关。当时的林西，确实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面对这种险恶的政治局面，热冀辽中央分局和热河省领导同志程子华、黄火青、李运昌、胡锡奎等审时度势，指挥若定。首先在乌丹布下重兵，使妄图进攻林西的赤峰国民党军队不能越过四道沟梁一步。其次，进行了天山保卫战，歼敌千余人，粉碎了开鲁之敌夺取天山，进占林东的企图。第三，经过周密侦察，于1947年1月31日，一举破获林西、经棚两起国民党特务暴动案，将潜

伏匪特一网打尽，并将张魁武、田文魁等13名匪首处决。紧接着，采取群众检举和军事清剿相结合的办法，一举将林西境内匪患全部肃清，保住了热河根据地的大后方。第四，整编了蒙汉联军第四师，使其完全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第五，组织新成立的朱德骑兵师剿灭了布里亚特蒙匪。采取这些措施后，林西的局势已经基本稳定下来。

在解放战争中，林西局势长期稳定的重要一环，是冀热辽中央分局和热河省政府正确地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又因地制宜地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政策，正确地解决了蒙古民族问题。

1946年12月，在云泽的参加下，冀热辽中央分局专门研究了蒙民问题。14日，发出了《关于热河蒙民工作的指示》。这个指示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全面地系统地阐述了热河蒙民问题的历史和现状，规定了热河蒙民工作的总方针和一系列的具体政策，为热河的蒙民工作指明了方向，是热河史上又一重要历史文献。

“一二·一四”指示规定的总方针是：内蒙古的成吉思汗子孙——包括王公喇嘛在内——团结起来，反对内蒙古民族的主要敌人——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为内蒙民族自治与自决而斗争。为保证这个主要斗争的胜利，在内蒙古民族内部又要实行必要的民主改革与民生改善，以发动与提高内蒙人民的革命热情。同时，内蒙古民族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帮助下，才能取得民族解放的胜利。

在这个总方针下，又规定了若干具体方针：（1）既要坚决反对蒋介石的法西斯大汉族主义，又要反对一般的大汉族主义以及受大汉族主义影响的所谓“只有阶级矛盾，没有民族矛盾”等错误思想。（2）对于勾结敌伪，压迫蒙汉人民的罪大恶极的蒙奸必须坚决清算，但应绝对避免发展成为蒙汉民族纠纷；对于各盟旗王公、扎萨克、喇嘛，以及伪满和伪蒙疆的蒙古族高级官吏，只要他们拥护人民解放战争和民族区域自治，都采取既往不

替和包下来的政策，给予一定的安排。（3）对于与国民党勾结的蒙族上层，要发动蒙民群众进行适当斗争，但不能由少数干部或汉人去代替。（4）在内蒙古民族内部今天只是削弱封建势力，而不是消灭封建势力，内蒙内部的阶级矛盾及其斗争，以不妨害并有利于内蒙民族团结反美反蒋与实现高度自治为原则。（5）在进行蒙民工作时，应深刻了解蒙古民族强悍刚直的优良特性，加以发扬；必须深刻体会蒙古民族的习惯，加以适应和逐步提高。（6）想方设法改善困苦贫穷蒙民的生活。

热河蒙民问题的中心点是土地问题，蒙汉民族纠纷的焦点也是土地问题，所以，解决土地问题是解决蒙民问题的关键。“一二·一四”指示规定：在内蒙古民族内部进行必要的民主改革与民生改善，这就是在农业区需要进行初步的土地改革，在畜牧区进行适当的减轻封建剥削的改革；在农业区应该保护蒙民的土地所有权，在畜牧区则是应该保护牧场，在阶级问题和民族问题双方兼顾，与首先照顾民族问题的原则下，对于土地问题采取下列办法：（1）在农业区，对汉奸恶霸的土地，除留以相等于中农生活之土地外，予以没收，分给无地和少地的蒙汉农民。蒙籍农民享有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并给予较好较多（以人口为单位如汉四蒙五）的土地，汉籍农民有土地的永佃权，所有权归旗政府，需交纳一定数量的租子。（2）对于王公贵族喇嘛与其他大地主的土地，以不变动为原则，只以低挂的办法，永佃给蒙汉农民。（3）取消汉人“二东家”的剥削，其土地根据各种情况处理。（4）汉籍军阀、地主所占之土地，清出分给无地少地的蒙汉农民，蒙汉民均享有所有权与使用权。另外，指示还要求在进行这些改革时，必须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对象与群众的觉悟程度，采取不同的办法，有步骤的进行，该等待时必须等待，切忌操之过急，并且宜多采用蒙汉联合方式，多用调解方式，不要采用剧烈斗争方式。这些具体政策规定，为热北地区土地问题的正确解决奠定了坚实基础。

这个指示在谈到建立内蒙民族的人民武装问题时指出：要实行内蒙人民高度自治，必须建立内蒙人民自己的军队。并要求加强部队的政治军事教育，建立各种制度，巩固提高战斗力。对已成立的蒙汉联军第四师和卓盟纵队要进行改造，灌输新鲜血液，使之成为一支坚强的内蒙古人民解放军。这就为建设蒙民武装指明了道路。

蒙汉联军第四师是由爱国进步的蒙族上层人士和子章组织起来的。共辖6个团，3300多人，是蒙族人民自己的武装，在稳定昭乌达盟局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支军队的成份很复杂，连级以上军官，有一些是大地主、伪军官、惯匪，存在着不稳定因素。国民党向热河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后，千方百计拉拢这支队伍，曾派遣特务马青山、任常信等诱降和子章。和子章立场坚定，态度鲜明，严词拒绝，并将3名诱降国特押送政府机关，执行枪决。在和子章的带领下，一批蒙族青年军人逐步懂得了必须依靠共产党的领导才能争得蒙古民族彻底解放的道理，积极靠近共产党组织，决心跟着共产党打天下。在这支部队里，也有一批蒙族败类被国民党收买，发动了武装叛乱，但遭到大多数革命青年和进步人士的反对。三十五团团政委道布钦巴拉珠尔、团政治部主任宝音乌力吉等人，反对额尔登格等人的叛变活动，竟惨遭杀害。师政治部主任孟和乌力吉，带少数人到三十四团制止乌尔塔、韩桑杰等的叛乱活动时，被叛匪绑架。在敌人的屠刀面前，他誓死不投降，最后高呼“共产党万岁！”而英勇就义。这些英勇不屈，为革命献身的蒙族青年英雄，真正代表了蒙古民族的革命精神。1947年3月，和子章奉调到王爷庙工作，由阿民布和继任师长，乌力吉那仁任政委，刘昌任政治部主任，原来的6个团也合编为2个骑兵团，1200多人。从此，这支蒙族人民的革命武装，更加朝气蓬勃地战斗在反对国民党斗争的最前线。

另一支重要蒙民武装是内蒙古自卫军卓索图盟纵队。这个纵队是1946年9月在赤峰成立的，白云航、孔飞任正副司令员，

1946年11月林东整编后,由孔飞任司令员.卓盟纵队开始只有3个支队,后来发展到14个支队,达三四千人.一支队是以蒙自学院一期毕业生为骨干组织起来的,一开始就有党的组织,军队素质较好,多次参加反击国民党军队进攻和围剿土匪的战斗,到1947年底发展到1200多人,成为一支重要的蒙民武装力量.二、三支队是收编乌丹东部秃喇嘛、高特劳等土匪武装,国民党占领赤峰后,又叛变为匪.四支队是翁敖旗支队,多次与韩桑杰股匪作战,兵力发展到3个连三四百人.五支队是收编的乌丹蒙民地方武装——鲍团,后发现有不轨行为,1946年二三月间,被三十旅集体缴械整编,清洗了其中的反动分子.六支队是由敖汉旗开明绅士李华亭组织的,后被收编,1946年10月改名为第六支队,乌兰任政委,李海涛任支队长,共四五百人,曾在西拉木伦河南分头地歼灭韩桑杰股匪.十一支队是由煤矿劳工、王府奴隶、下层喇嘛和小学教师等组成的,王景阳任支队长,乌兰任政委.这支队伍在“草原红司令” 乌兰的领导下,一举歼灭“老梁队”股匪200多人,威名大震.智擒混入十一支队的惯匪“打一面”,消除了隐患,巩固了队伍,乌兰仅带五六名武装战士,闯入有200多武装喇嘛的瑞应寺,争取了大多数喇嘛走上革命道路,组成了“喇嘛营”.由于队伍不断扩大,以后又成立了十二支队、十三支队和十四支队,由乌兰兼任这3个支队的政委,这4支骑兵部队发展到1000多人.

经过认真地贯彻党的民族政策,热河蒙民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他们在冀热辽中央分局和热河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积极站到了反对国民党斗争的第一线.1947年1月,北部5县旗一次就扩军9000多人.整个解放战争时期,在昭乌达盟地区扩军两个骑兵师,一个步兵师.热北地区的蒙汉族人民为冀热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第三节 在敌人进攻中日益巩固的热河解放区

一、热西地区（十六地委）

热西地区的管辖范围，在不同时期都不尽相同，但基本区为丰宁（包括大阁、凤山）、滦平（包括东、西滦平）、隆化、围场4县。热西专署初建时包括承德县，1946年8月划归热南。热西地区总面积2.6万平方公里，人口74万。是界临河北、察哈尔、内蒙古的三角地带，战略地位比较重要。

抗日战争时期，在热西的丰宁、滦平建有抗日政权，隆化、围场有抗日游击区，有比较好的群众基础。日本投降后的1945年9月，分别于隆化和承德建立中共热西工委和办事处。工委书记黄文（未到任）、副书记李越之，办事处主任郑旭。并着手接管敌伪政权，建立人民政权。不久，各县县委、县政府也都相继成立。11月，正式成立热西地委、专署和军分区，谢明任地委书记兼政委，周刚任专员，钟辉任司令员。这样，热西就成为由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完全控制的重要解放区之一。

热西地区领导机关成立之后，根据热河省委的指示，立即着手发动群众，进行清匪反霸、减租减息等斗争。特别是1946年4、5、6三个月，热西地委领导数十万群众进行了土地改革运动，分配土地达60余万亩，在热河土地改革中起到了带头作用。在斗争中，群众的觉悟大大提高，有万余积极分子入党，5000多青年参军，供给承德及部队粮食2400多万斤，还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革命群众组织和基层政权组织。人民武装也有相当发展，各县支队发展到六七百人，许多地区成立四五十人的区小队。热西的土地改革确实是有一定成绩的。

但是，热西的工作也确实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缺点和弱点，这在1946年8月国民党军队进攻热西时，就明显的显露了出来。当

时，除丰宁、滦平西部一两个区外，其他地区基本垮掉了，地方部队和民兵大部逃散或叛变了，一部分干部滋长悲观情绪，甚至个别的逃跑叛变了，有些干部则英勇的牺牲了，使热西的工作遭到严重损失与挫折。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方面由于敌人的强大和敌我力量的悬殊，在敌人的进攻下，丧失一部分地区是不可避免的；另方面也暴露出工作上的许多缺点和失误。

（1）领导机关与干部中存在着和平幻想和轻敌观念，对可能到来的严重挫折与长期反复的残酷斗争的局面，没有思想准备或估计不足，以致对战争的实际准备很差。当敌人没有打来时，遂认为敌人不一定会打来，即使打来也打不到热西，因而把有战斗力的热西独立团和骑兵团全部调走；当敌人真的打来时，没有有战斗力的部队的配合，就表现为手足无措，仓惶退却，地方武装和民兵大批叛乱、溃散，损失大量物资。

（2）部分干部受腐化思想的侵蚀，有的甚至发展为贪污堕落，侵吞土改胜利果实。如隆化二区的一个副区长，私吞金条5寸，金佛像4个，金戒指4个，伪币6万元，边币10万元。这种腐化思想的滋长，在平时表现为脱离群众，袒护地主；在战时表现为不坚决，怕困难，怕牺牲，或则逃跑叛变，或则要求调到安全的后方去。前面提到了那个副区长，在敌人进攻时，为了保存财物，首先缴械投降，结果被敌人杀掉。

（3）注重了地方武装的发展，却忽视了清理坏分子的工作，以致把一些坏人甚至惯匪选拔为班、排、连长或民兵队长，成为叛乱的领导者和组织者；还有的武装干部贪污腐化，而许多战士则没菜吃，没衣穿，造成官兵脱离。地方武装的训练与使用也不够，在土匪猖獗时，地方武装主要用于收缴物资、收割大烟去了。

（4）土地改革在4、5、6月搞得轰轰烈烈，到7月就因忙于征烟、供粮而停顿了下来，没能搞彻底，以致围场有名的大

地主，群众称为九沟十八岭，平地200顷的鼎丰裕都没动；在执行政策中也有“左”的现象，这些都造成了不稳定因素。

热西的教训是沉痛的，但也不是热西的一切工作都垮了。在一些土地改革搞得彻底的地方，虽经此次巨变，但群众情绪动荡较少，妥协情绪较少，多数能就地坚持斗争。如围场县羊草沟12名民兵胜利粉碎了200多政治土匪的进攻，打了4小时，毙伤匪16名，夺回许多被抢的群众财物。新拨岱尹梁民兵在敌人逼近时将100多名伤病员安全转移。大石头槽民兵先是配合骑兵团抗击敌人，后来单独抗击，掩护后方机关安全转移等等。这些都体现了热西劳动人民的英雄本色，证明热河人民的斗争性是很顽强的。

9月，热西地区的党政军机关撤到隆化以西的郭家屯，并在那里召开会议，分析了形势，进行了重新部署和组织上的调整。决定把地委机关分成两部分，主要部分位于北部地区，负责隆化、围场、大阁以西地区的工作指导。另外在滦平、丰宁西南地区组建地分委机构。10月初，国民党军队又向赤峰、围场、多伦进攻，位于郭家屯的地区领导机关、军分区部队没有按预定的“视情况背靠黑河川，逐步转移”的计划行动，而是向御道口、多伦方向，后又改为向经棚方向撤退。当时坝上天气十分寒冷，连续一个来星期，行程千余里，饥饿、寒冷一齐袭来，不少人掉了队，走散了，使革命的力量遭到了削弱和损失。

11月底，热西地区领导机关与部队由林西、经棚回到黑河川，与冀热察部队会合。地委在黑河川的西万口召开了扩大会议，进一步总结了经验教训，明确了今后的方针和任务，决定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并将分区独立营整编为独立团，又编成隆化、围场两县武工队，配合地方干部，打回县属地区，创立与扩大根据地和游击区，缩小敌人占领区。

1947年1月初，热西分区独立团，大阁、丰宁、滦平县支队与隆化、围场县武工队在十三旅一个营的配合下，在上黄旗、郭家屯、白虎沟、虎什哈、波罗诺、石人沟、窄岭、二道营子等地区开展游

击战争，多次打击小股敌人，先后毙伤俘敌200多人，恢复了农村政权，热西形势开始好转。

热西军民的积极行动，引起蒋军的恐惧与恼恨。仅从1月17日至2月27日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就进行6次奔袭扫荡。此时，十三旅部队已调走，热西党政军领导机构自身只有一个百人左右的警卫连，在2月下旬的一天夜晚，于曹家窝铺遭到国民党军队一个加强营的袭击，幸而及时转移，损失不大。四五天后，军分区独立团也遭到了敌人围攻，独立团的负责同志竟带队向经棚、林西地区撤退，途中缺乏组织与营救，以致200左右人被冻伤，有的成了终身残废。这就造成了热西的第二次大撤退，受到冀热察军区司令员段苏权的批评。

1947年4月初，独立团回到黑河川，热西地区领导班子也重新作了调整。韩纯德任地委书记兼政委，周刚仍任专员，谢明任军分区司令员。4月中旬，冀热察军区主力十三旅、五旅开进热西地区，在热西地方部队配合下，接连攻克和逼退盘踞在上黄旗、半截塔、虎什哈、波罗诺、白虎沟、窄岭、石人沟、郭家屯、大阁和围场20余处重要城镇的敌人，共毙伤俘敌4000来人，缴获步枪1600多支，轻重机枪30多挺，大小炮多门。热西地区武装也得到了锻炼和提高。到6月份，已由原来的千余人发展到3400多人。改变了被敌分割的状态，丰宁、隆化、围场连成一片，热西地区已开创出一个崭新的局面。

二、热南地区（十七地委）

中共热南地委、专署和军分区，是为适应承德撤退后的战争环境，于1946年8月在宽城建立的。由刘君达任地委书记兼政委，张兆仁任专员，吴烈任司令员。热南专署管辖范围，开始有承德、平泉、兴隆、青龙、青西县，后来虽迭有变动，但基本区变动不大。实际管辖范围在长城以北，锦古路以南，包括兴隆、青龙全部，承德、平泉南部的广大地域。总面积约1.5万平方公里，总

人口59万。

在抗日战争时期，热南地区的大部分是抗日游击根据地和游击区，各方面的基础都比较好。日本投降后，普遍建立了各级党的组织、政权组织和武装组织，建成了比较巩固的解放区。承德撤退后，热河省党政机关转移热南的兴隆山区，继续领导热河人民坚持反对国民党军事进攻的自卫战争。

国民党军队向热河发动进攻后，热南的形势也开始紧张起来。首先是驻青龙的队伍赵辅臣团叛变。赵原是伪满警察署署长，“八·一五”日本投降后，网罗400多人被收编。国民党发动进攻后，遂将派到该团的13名干部杀害，叛变投敌，并进攻青龙县城，虏走干部30多人，枪杀10多人。这股叛匪很快就被冀东部队剿灭，只有赵辅臣等少数人漏网。相继而起的是平泉的张其昌、兴隆县的刘茂廷（刘茂队）、承德县的姜怀义（老姜队），各拉起四五百人的地主还乡团武装，配合国民党部队，侵占平泉县的党坝、兴隆县的鹰手营子、承德县的安匠等地区，屠杀干部和群众，进行反攻倒算。承德、兴隆两县由翻身农民组织起来的热南地方武装承兴团（也叫长城团），多次给以打击，最后终将国民党兴隆县长张郁文和刘茂廷击毙，除了一大害。

热河省党政领导机关转移热南兴隆山区后，一方面领导热南人民开展武装斗争、土地改革和建设根据地的各项斗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另一方面也受到热南人民的支持和保护。1946年9月初，国民党九十二军突入兴隆县半壁山一带山区，妄图一举摧毁热河省领导机关，兴隆县军民摆下地雷阵，开展阻击战，进山扫荡的国民党军队到处挨打、挨炸，损兵折将，最后一无所获，只好撤走。

国民党还派遣游击马队，到处搜捕共产党干部，群众就在山沟里设立检查岗哨，在山梁上设消息树哨、靠山哨，了望敌情，盘查行人。遇有敌人大部队进山或少数特务奸细出探，都能及时发现，给以打击。秋夜天凉，山上更冷，民兵们没有衣服穿，只好光着膀子

站岗。为了御寒他们常常带上一捆草，冷了到草堆里坐一会。就这样仍然坚持不懈，使敌人根本进不到山沟里来。就连兴隆县城，国民党军队也只进去过一次，仅两天时间，就被兴隆军民赶跑了。

国民党还丧心病狂地进行细菌战，使用飞机播撒细菌，残害热南人民。结果闹得几乎家家有虐疾、痢疾病人，打摆子、发高烧，严重的病死，多数不能参加生产劳动。坚持热南斗争的热河省副省长李子光也染上了痢疾症。但热南人民仍顽强战斗，在与国民党军队进行武装斗争的同时，又同国民党的细菌战进行斗争，开展除害灭病活动，用土方土药，消灭细菌，医治疾病，终于赢得了最后胜利。

1946年10月，热南地区与热河省的热东、热中、热辽等大部分地区被敌分割，偏居一隅，不便于发挥领导作用。按照冀热辽中央分局指示，热河省党政领导机关于12月转移林西，与分局机关会合。之后，热南地区划归冀东区领导，行政区划也作了些变动。承德县党政干部转移到车河堡后，决定将该县一分为二，在铁路以北建立承北县，归热中专署领导；铁路以南建立承南县，仍归热南专署领导。平泉县则一分为三，在铁路以北建立平北县和宁城县，归热中专署领导；铁路以南建青平县，仍归热南专署领导，同时撤销青西县。

三、热东地区（十八地委）

热东地区的革命斗争，从日本投降后，由稳定到混乱，再到稳定，到扩大，走过了一个“之”字形的路。这个时期的斗争，既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热东大部为新开辟地区，只有南部的少数地区建立过抗日政权。所以，共产党在这个区的基础较差，力量单薄。1945年10月9日，中共冀热辽区党委派周治国等人到达朝阳，建立了中共热东工委和热东办事处。周治国任工委书记，张兆仁任办事处主任。同年11月，热河省委为加强热东地区的工作，又派遣一批领导干

部到热东，正式组建热东地委、专署和军分区，由段德彰任书记兼政委，农康任专员，刘兴隆任司令员。当时仅辖朝阳、凌源、建昌3县，人口120万。

热东地委成立后，做了大量工作。如建立和健全了各县、区的政权组织，粉碎了国民党地下组织夺取政权的阴谋；初步发动群众进行清匪反霸斗争，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汉奸恶霸，为人民伸张了正义；初建了地方武装，开展了扩军活动，为主力部队输送了一部分新兵等等。但热东的工作也存在一些缺点毛病，主要是和平麻痹思想严重，没有战争准备，更没有在艰苦的条件下，发动群众，坚持地区，打游击战争的准备。所以，当国民党军队向热东发动进攻，主力部队后撤时，热东也就不能坚持，400多干部，1000多武装无秩序的后撤，直退到热南青龙县的山沟里。这时，有人提出，派大兵团恢复地区是上策，派两个团是中策，以现有力量坚持是下策，表现了严重的等待和平和依靠大兵团的思想。对这种思想，冀热辽中央分局和热河省委给予严厉的批评，并且指示他们，要把上策变成下策，把下策变成上策，只要能把群众发动起来，依靠现有力量，热东也是完全可以坚持下来的，冀热辽中央分局和热河省委还号召他们打回去，就地坚持游击战争。经过工作，许多同志的观点改变了，他们组成精干的武工队，打了回去，局面有了改观。

1946年4月，热河省委对热东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派有游击战争经验的王国权任热东地委书记兼政委，仇友文任专员，丁盛任司令员。这之前已撤销了辽西地委和专署，将其管辖的部分县划归热东领导。这样，热东管辖朝阳、建昌、建东、绥中、兴城、锦西、锦义、凌源、凌建9县和喀喇沁左旗，总面积3万多平方公里，总人口220多万（包括敌占区人口）。

在调整领导班子的同时，又对干部进行了整顿，对部队进行了整编，坚定了打游击战，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信心。然后分4路进入中心区，首先恢复了建昌、凌源、朝阳、绥中、锦西、兴

城各县山地，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打击小股国民党军队和土匪。并在明水塘门、梨树沟门、六家子、黑牛营子、药王庙等大村镇，开始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清算复仇运动。凌源县在斗争山嘴子村恶霸地主齐振侯时，附近几个村的2000多农民群众赶来参加，经过一天斗争，减租退租粮食103石，土地10亩，群众情绪大振。紧接着又斗争了汉奸王一峰和伪保长滕俊峰，大长了农民群众的志气。这个时期的斗争是非常尖锐，非常艰苦的。由于热东的党和军队总结接受了大撤退的教训，依靠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和几次大的扫荡，将零散的、小块的游击根据地联成一片，建成了初具规模的热东根据地，使热东的局势由混乱走向稳定。



战斗在热东

热东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王国权（左二）及夫人常玉林（左三）和热辽地委副书记李东冶（左一）在一起。

1946年“五四”指示后，在热东普遍进行了土地改革。这次斗争，首先在热东地委驻地建昌县展开。在要路沟、碱厂、喇嘛洞等70多个村，建立村政权和农会组织，开展分青苗斗争，将数千亩土地连同青苗一起，转移到农民手中。在朝（阳）建（昌）凌（源）的结合部，先后清算了两大王府、三大老财、四霸天、八大绅士和十二鬼头等一批汉奸恶霸。蒙奸沁布多尔济，拥有土地21.4万多亩。6月22日，召开了有附近14个村，5300多群众参加的清算斗争大会，将99800亩土地没收，分给无地少地的蒙汉农民，受到蒙汉群众的热烈欢迎。会后，分三路进行大游行，沿途清算斗争恶霸地主和土豪劣绅，掀起了反奸反霸，清算斗争的高潮。建东县在斗争中还提出了三条原则，即罪大地多者，人地一齐斗；罪少地多者，斗地不斗人；罪大地少者，斗人不斗地。这三条原则形象生动地体现了当时党的土地改革政策，给群众运动指明了方向，防止了运动中可能出现的偏差。

热东地区在贯彻“五四”指示的6、7、8三个月中，共分散土地25万多亩，还发展自卫队员1.2万多人，民兵3.5万多人；建工农会350个，会员1万多人；建立党支部278个，发展党员4000多人。土地改革的斗争，不仅使热东解放区得到了巩固，而且还扩大了。曾将运动推至兴城的边沿区，锦西的白马石、王营子一带。1946年10月打开建昌后，热东形势更是大为改观，境内的70余股土匪，计3500余人，也被大部肃清。接着又打下羊山、南票，收复了锦义大块地区，人民武装壮大，群众情绪高涨。到1946年冬，热东已建成长宽各400余里，人口159万的重要解放区。

四、热中地区（十九地委）

在热河省所辖的几个专区中，热中专区进行游击战争的时间不算是最长的，却是最艰苦的。热中地区的游击战争，从1946年10月赤峰失守，到1947年6月赤峰收复，还不到一年时间。但热中是敌人重点进攻的地区，所以，大多数时间处于敌人的四面包

围之中，环境特别恶劣，斗争特别残酷。就连地委、专署和军分区机关都没有一次在一个地方住上连续一个月的时间，几乎每日都处在高度流动，高度游击的状态之中。1947年地委元旦团拜会，就是骑在马上，隐蔽到树林里召开的。热中的革命斗争，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逐步发展起来的。

热中地处热河省腹地，西部为七老图山脉，东部为老哈河流域，中间是以赤峰为中心的开阔地带。这一带早在20年代就有过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武装，抗日战争时期曾建立过抗日的联合县政权，有一定的群众基础。1945年9月，在赤峰组成中共热中地委、专署和军分区，黄文任书记兼政委，杨雨民兼专员，赵复兴任司令员。1946年4月，王孝慈任地委书记兼政委，王兴华任专员，黄文任司令员（9月改为欧致富）。当时管辖赤峰、乌丹、平泉、宁城、建平、新惠、新东、建西县和赤峰市、翁牛特左旗，总面积3.4万多平方公里，总人口126万。后将平泉划给热南，建平、新惠、新东划给热辽，赤峰、乌丹划给警备区，热中的面积和人口就大为减少了。随着游击战争的深入开展，收复了一部分敌占区，相继建立了平（泉）北、平（泉）凌（源）、建（平）中、建（平）赤（峰）、隆（化）东、承（德）北、承（德）隆（化）等联合县，解放区的面积和人口都有很大的恢复。

在赤峰撤退之前，热中的土地政策搞得是比较好的。在短短的三几个月中，数十万农民起来，开展清算反霸，分散土地的斗争。他们高唱着：“我有仇来我有仇，我有冤来我有冤，我们的冤仇深似海，重如山，今天一定要清算”的歌曲，向汉奸恶霸进行血泪控诉，发起猛烈冲击。“杀人的凶手要偿命，欠债的恶霸要还钱。今天人民做了主，当了权，汉奸特务要惩办！”这歌声鼓舞了人民，震慑了敌人。到1946年7月底，热中农民从地主手中夺回土地60多万亩，粮食1.8万多石，房屋3000多间。多少年始终在苦难中挣扎的热中人民，第一次尝到了翻身后的甘甜。

热中地委在土地改革中，总结了建平县的做法，创造了召开农民代表大会的经验，把热河的土地改革运动推向新的阶段。1946年7月19日，1300多农民代表齐聚赤峰市，召开热中地区的农民代表大会，热辽区党委书记胡锡奎、行署主任杨雨民都到会讲了话，号召农民生产自富，武装自卫。农代会主要是为检查土地改革的情况而设立的。农民把自己信赖的人选举出来，检查政策的执行是否对头，果实的分配是否公平合理等情况，由农民群众自己动手纠正土地改革中发生的一些偏差。同时，农代会还讨论如何剿匪，如何打退地主阶级的反攻以及保卫土地改革胜利果实等问题，这就将土地改革与武装斗争和组织工作（主要为农会、自卫队、民兵、村政权组织和党的组织）结合起来了，使农代会起到了团结农民，教育农民，武装农民，进行自卫战争动员与准备的积极作用。

从7月初敌占天义后到10月底，热中形势起了重大变化，即由全力进行土地改革，准备自卫战争时期，转到全力进行自卫战争，坚持土地改革时期，热中地区的革命斗争，进入了艰苦的年代。

赤峰转移后，热中地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地方武装1500多人，退到锦承路以北的七老图山区，继续发动群众，进行游击战争。当时，国民党进攻，土匪扰乱，地主反攻倒算，喀喇沁右旗的蒙汉地主武装竟敢截击冀热辽部队炮兵旅，反动气焰甚为嚣张。特别是国民党为控制热河中心区，对热中区进行逐步蚕食和残酷扫荡，使热中区四面被敌包围，与其他根据地隔绝；在热中区内，也被分割成若干小块根据地，斗争环境极其险恶。如敌十八师指定一个团，经常出击扫荡，捕捉热中领导机关。在11月的十几天中，热中领导机关转移3个驻地，却遭敌3次合击。特别是敌人的耳目甚多，稍一不慎，就要遭受战斗与工作的损失。

热中区军民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仍然英勇顽强地进行斗争，不仅多次粉碎敌人的蚕食扫荡，还主动出击，打击敌人，在10月

25日至12月15日的50天时间里，作战14次，攻克黄士梁子、二道河子、旺业店等据点，歼敌1000多人，扩大了我之占领区，缩小了敌之占领区。同时，在叶赤线上击毁敌汽车6辆，打乱了敌人的运输线。在斗争中人民武装也得到发展与壮大，热中军分区部队发展到4000多人，建起一个独立团和一个骑兵团，县支队和区小队也都普遍建立了起来，扭转了被分割的被动局面，热宁根据地已初步形成。

更为可贵的是，在战争这样频繁的条件下，热中的一些地区仍然没有间断土地改革斗争，又新分配土地2万多亩，宁城县党政机关由城镇退到乡村，由平原退到山沟后，一部分地主反攻倒算，杀害农会干部，夺取农民分得的土地和粮食，在农民中引起了“变天”思想，在干部中也产生了两种消极认识：一是认为战争环境中不能进行土地改革；一是认为山沟中可以取消土地改革。这些都是把土地改革与武装斗争割裂开来的错误思想，热中地委及时进行帮助和纠正，宁城的土地改革运动又重新开展起来了。

五、昭乌达地区（二十地委）

昭乌达地区位于热河北部，因此也称为热北。这个地区的区划变动比较频繁。1945年12月在林西成立热北地委、专署和军分区，由王逸伦任书记兼政委，张盘新任专员，喻楚杰任司令员。当时管辖林东、林西、开鲁、经棚4县和巴林左旗、巴林右旗、克什克腾旗、阿鲁科尔沁旗、札鲁特旗，总面积8万多平方公里，总人口40多万。实际管辖只有林西一县，人口10多万，其他地区多为东蒙古自治军第四师和子章所控制，热北的形势甚为严峻。

怎样对待和子章的部队，当时在热北的领导干部中意见也不一致，有的主张打，有的主张和，争论得很激烈。主张“和”的同志认为，怎样对待和子章的问题是个民族问题，弄不好会使矛盾激化，不利于争取蒙古上层分子；主张打的同志则认为和子章是伪满官吏，是反动武装。他们批评主张“和”的同志“右倾”，甚至

骂为“汉奸”。军分区的一位副参谋长竟带一连人往林东开，在冬不冷与和子章部遭遇，结果牺牲了几个同志，又撤了回来。

1945年12月，和子章在林西土匪张悦的诱使下，突然向林西境内发动进攻，包围了一、二、三、四区区公所，打死1人，抓捕2人，并扬言要将林西八路军完全扫清。在这种严重局面下，热北地委派张焕然、苏雷为代表，在苏军代表居中调停下进行谈判，和子章放弃接管林西的要求，放回抓捕的林西干部，并且达成协议：以查干木伦河为界，和子章部退至河东地区，双方不得越界。协议后，和子章部遂撤到查干木伦河以东，但对林西仍时有骚扰，热北地委从贯彻党的民族政策的立场出发，对和子章部坚持不称土匪，不超过界河，不打第一枪的“三不”原则，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避免了一些磨擦事件。1946年2月，在林西地主韩寿天等的挑唆下，和子章率一个团的兵力再次侵入林西的五十家子等地，在多次写信警告无效的情况下，热北地委派三十旅六十八团投入战斗，一举将其击溃。和子章部连长辛三点和一些士兵被击毙，其余被俘。这一仗使和子章大为震惊，主动派出代表于3月25日赴林西谈判，热北军分区放回被俘人员，从此双方相安无事。

承德“四三”会议以后，和子章的态度起了很大变化，林东问题得到了解决。4月15日，热北专署与昭乌达省的代表在林西谈判，双方达成协议，昭乌达省接受共产党领导，东蒙古自治军第四师接受改编。5月19日，热北地委、专署和军分区机关由林西迁往林东。6月5日，热北专署和昭乌达省同时撤销，成立昭乌达盟临时行政委员会，由萨嘎拉扎布任主席。同时将热北地委和军分区也改为昭乌达盟盟委和昭乌达盟军分区，由权星垣任书记兼政委，喻楚杰任司令员。9月3日，改昭乌达盟临时行政委员会为昭乌达盟政府，由伊德嘎苏荣任盟长。至此，热北的问题才从根本上得到了解决。虽然经过曲折和斗争，党的民族政策和统一战线

政策终于赢得了胜利。

在热北的革命斗争中发生的另一件大事，就是热水汤红枪会暴乱事件。

红枪会是清代白莲教的支裔大刀会的变体。起初，红枪会是个用迷信手段啸徒聚众的农民自卫武装组织，主要是“抗粮抗捐，反对兵匪”。后来，逐渐被封建地主阶级所利用，成为维护他们利益的工具。热河的大刀会组织几乎遍布全省各地，尤以热北和热中为盛。热中宁城一带红枪会中的进步分子，曾参加过冀热辽抗战。热北的红枪会中的个别人也以“反满抗日”的罪名被杀头。在日伪的镇压下，红枪会组织一度销声匿迹。日本投降后，社会秩序混乱，红枪会也再度兴起，以克什克腾的热水汤、土城子和林西南部一带最为活跃。

热北地委建立后，积极发动群众，开展清匪反霸，清算复仇运动，建立区村政权组织和武装组织，这是很好的。但也有一些问题；主要是在群众还没有真正发动起来的时候，就采取先搭架子后斗争的办法，组建了区村政权组织和武装组织，以致原来的旧的殖民地封建社会秩序机构没有完全打碎，又以革命政权的面目出现，使不少区村政权和武装被坏人掌握。另一方面，因处于开辟之初，供给困难，实行统一累进税，增加了农民负担，给群众带来一些实际困难。而减租减息等只是在部分地区展开，广大群众还没有得到实际利益。恶霸地主就抓住这一点，利用红枪会进行欺骗宣传，煽动暴乱。

对于红枪会的组织活动，热北的党组织早有察觉，但因认识不一致而未能引起高度警惕，以致1946年2月28日晚，发生了有计划地红枪会暴乱。60多匪众，分别包围了协和区和热汤水区，在混入区小队的坏人配合下，向区公所展开猛攻。热北地委组织部科长乔凤山等8人，进行了顽强抗击，但终因寡不敌众，又弹尽援绝而全部英勇牺牲。热北地委闻讯后，派出20多名干部前去制止暴乱，也遭到红枪会的袭击，只得撤回。3月4日，热北军分区派部

队镇压暴乱，击毙几名骨干分子，其余全部遣散。随后又抓捕了热水汤红枪会暴乱的幕后操纵者田明亮（混入我区政府任区长）和其他骨干分子，在林西召开了追悼死难烈士暨公审红枪会暴动主犯大会，镇压了田明亮、王山等主犯，宣布解散红枪会。至此，在林西存在长达20多年的红枪会组织基本绝迹了。

六、热辽地区（二十一地委）

中共热辽地委、专署和军分区，是1946年2月建立的。陈文彪任书记兼政委，李杰庸任专员，欧阳家祥任司令员，李东冶任副书记。当时只辖锦义、北票、北阜新3县，后来又陆续增加了建平、新惠、新东、朝北等县和敖汉旗、土默特中旗，锦义县和北阜新县合并为北（票）阜（新）义（县）办事处。总面积2万多平方公里，总人口126万。

热辽地委是适应国民党军队侵占辽西、热东等主要城镇后的战争环境建立的。当时，在国民党大军压境，占领县城和重要城镇的情况下，这个地区的一部分干部和地方武装没有实行大撤退，而是深入农村，继续发动群众，开展除奸反霸斗争。同时，组成精干的武装工作队，积极开展游击战争。这样，他们在当地站住脚了，扎下根了。

国民党军队占领北票和义县后，这两个县的干部和地方武装撤到敖汉。经过整顿，克服了恐顽、惧匪、怕地主的失败主义情绪。1946年3月，热辽区1300多人，重新组成朝北、锦义和北阜新3个武装工作队，在热辽军分区部队配合下，以敖汉的一个区为前进阵地，回师东进，开展游击战争，建设游击根据地。3月13日攻克黑城子，3月29日打下贝子府，轰开了热辽地区的局面。

朝北武工队以大黑山为根据地，首先开辟了北四家子、瓦房一带地区，然后向朝阳北部发展，经常活动于七家子、官营子、汤沟等地，发动群众斗争了一批恶霸地主；又将蒙奸沁布多尔济在东官营子的一个粮仓的粮食，全部分给缺吃少穿的贫苦农牧

民，很快打开局面，到1946年4月，就正式建立了朝北县。

锦义武工队回到北票北部地区后，也开辟出一块游击根据地，于4月正式建立了北票县。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北票三面半是敌人，整天战斗不断。但这里并没有主力部队，主要是依靠县支队、民兵和人民。特别是民兵顽强，岗哨严密。十八汰村的3个民兵，在干部带领下，曾和敌骑警队交战，追敌3个山头，缴了1支枪；半靠山屯的两名民兵迎战刘清林匪队60多人，子弹打光了，就退入村里，匪队到处搜查也搜不到。原来这个村有地道，两名民兵早就顺地道走了。因此，北票县被誉为“老根据地”，多次受到上级的嘉奖。但在斗争中，北票人民也付出了重大代价，有33名县区干部牺牲，战士、群众牺牲的就更多了。

建平县是坚持游击战争最好的县之一，在县委书记陈光的领导下，这个县的县委、县政府等领导机关，始终没有离开县境。县城被敌占领后，他们就撤到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当时，只有外来干部12人，本地县区新干部51人，主要依靠民兵、村干和区小队，加上80多人的县支队组成的各种形式的武工队、武工组，深入敌占区、游击区活动，就把这个地区坚持下来了。他们在斗争汉奸恶霸时，还编了许多民歌和顺口溜，如“张扒皮，李要命，王家钱最难挣，白家的伙计成痼病”等等，每当开斗争会时，群众唱起歌或念起顺口溜，斗争情绪就高涨起来。由于有人民武装作后盾，他们不怕地主的反攻倒算。当地主刚要反攻时，就被镇压下去了。

热辽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也是开展得比较好的。到1947年7月底，共分配土地82万亩，发展党员3000多人。国民党进攻时，土改停顿时间较短，到10月份就又发动群众，第二次向地主开火了。这次斗争，不仅夺回了地主反攻时夺去的土地，又新分配土地120多万亩，地主的威风彻底打了下去。过去逃亡的500多户地主，自愿受罚，返回解放区。热辽地委则采取宽大政策，凡自愿回来的逃亡地主，不杀不打；对当过土匪大团头子自愿交枪要求返回的，也不杀不打，只罚子弹，共罚子弹四五万发。这样，热辽

地区经过深入发动群众，开展艰苦的游击战争，到1947年2月，就建成了东西500余里，南北350余里的巩固的解放区，解放区人口67.9万。

热辽地区另一成功经验，就是统一战线工作做得好。当时，统一战线工作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怎样对待伪满遗留下来的旧官吏和社会知名人士；二是怎样对待蒙古上层人士。这两个问题解决的如何，对热辽区的开辟与坚持关系极大。

日伪时期遗留下来的旧官吏、警察和社会名流，是一股政治势力。对于他们，当时主要采取了以安抚为主，斗争为辅，分别情况，区别对待的政策。对罪大恶极的汉奸，坚决进行斗争，严肃处理；对一般伪官吏、警察和有一般罪行的人，则采取包下来的政策，留用他们继续工作，为人民效力，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对于安定社会秩序，保证接收伪政权工作的顺利进行，起到了重要作用。问题在于，有些地区对这部分人全部包下来后，既没能抓紧教育，也失去必要的警惕，以致国民党进攻后，大部叛变投敌，给革命斗争造成重大损失。热辽地委这方面工作做得好些，损失也就小些。建平接收的敌伪人员徐亚东、武兴汉在国民党进攻时阴谋叛变，县委及时发觉，并采取紧急措施，处决了二犯，避免了损失。而曾任过伪满监督警尉的庄家振，接受党的教育，成为一名坚定的革命者。他任建平县支队参谋时，在波克梁的战斗中，身负重伤，仍战斗不息。当遭敌包围时，他拖着被炸断的左腿，用机枪猛烈阻击敌人，掩护其他同志安全转移后饮弹自戕，表现了一个革命者宁死不屈的高尚情操。伪满北票炭矿医院院长陆祥父子，是社会知名人士，日本投降后陆祥当上了维持会委员，热辽的军政人员进驻北票后，仍安排他们做医务工作，使他们逐渐了解了共产党的政策，成为党的朋友。当热辽军政人员从北票撤退时，陆祥父子和冠山医院的一批医护人员都参加了革命，随部队转移。后来，以这批人员为骨干，成立了二十一军分区医院，陆祥被任命为副院长，在极端困难的游击环境中，始终坚

定不移，成为一名真正的革命者。

热辽地区古时为蒙地，在其管辖范围内，共有4个著名的蒙古王公，即土默特右旗的四王爷宝音乌勒吉，土默特中旗的小王子沁布多尔济，土默特左旗的王爷云丹桑布，敖汉旗的嘎王爷。中共热辽地委针对这4个蒙古王公在敌伪时期和“八·一五”光复后的政治态度，灵活地运用党的民族政策，制订了“团结嘎王爷，拉住四王爷，分化云王爷，集中力量打击沁王爷”的斗争策略，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朝阳的四王爷和敖汉的嘎王爷，已在解放区之中，嘎王爷出任了敖汉旗旗长，他们站在人民一边，一致反对国民党的武装进攻。阜新的云王爷则自己拉起一支200多人的武装，政治态度摇摆不定。热辽地委通过各种渠道进行争取说服工作，最后经过谈判，云王于1946年5月4日率部起义，其所部编为卓盟纵队第十三支队，争取云王的工作取得重大胜利。后来云王虽然又投靠了国民党，但当时起义一举，仍是统战工作的一个成果。对蒙奸沁布多尔济，则在政治上、军事上以及经济上与其进行了坚决斗争，他组织的反动武装“热北队”，多次被围歼，沁布多尔济也最终被人民镇压。

七、乌丹警备区（二十二地委）

乌丹警备区是1946年10月赤峰转移撤退后，由冀热辽中央分局指示成立的，由张苏任司令员，宋诚任工委书记，刘正文任办事处主任。到12月22日，正式成立中共二十二地委、专署和军分区，由邱会作任书记兼政委，刘锡三任专员，吴烈任司令员。辖乌丹、赤峰、赤西、围北4县和翁敖联合旗。总面积1.8万多平方公里，总人口50多万，其中解放区人口36万。

乌丹位于赤峰和林西之间，南部有雄险的四道沟梁与赤峰相隔，是阻敌北上的天然屏障；北部有西拉木伦河与林西隔河相望，东部是万顷沙海，西部接塞罕高坝，是一个自成体系的战略区

域。敌占赤峰后，热东、热中和热辽等地区被敌分割，联络困难，保住了乌丹地区就保住了冀热辽领导机关与这些地区联络的通道。同时，乌丹是由赤峰进攻林西的必经之地，加强乌丹的军事力量就能阻止赤峰的敌人越过西拉木伦河，保卫领导机关的安全。所以，这个分区配备的干部都比较强，主要领导干部都是老红军，又都是从延安来的，多在中央机关或中央军委机关工作过，有丰富的保卫工作经验。军事力量的配制也比较强，共有3个骑兵团，每团4个连，七八百人。一个步兵团，即警备四团，一千二三百人。军分区机关还有500余人，共有地方主力军4000来人。另外，还有6个县支队(其中包括卓纵2个支队)，33个区小队，也有3000多的武装力量。这些武装力量与50多万乌丹地区的人民相结合，就成为一面不可逾越的铜墙铁壁。

当时，驻守赤峰的是国民党九十三军暂编二十二师，原系龙云的滇军，士兵大多是云南人，不服北方水土，滇军又处于受压的地位，厌战情绪很大，战斗力不强。但国民党为截断东北与华北的联系，摧毁冀热辽领导机关，竟不顾其兵力的不足，冒然向乌丹发动两次大规模的进攻，都被乌丹军民粉碎了。

第一次进攻是在1946年12月，赤峰之国民党军一部，在土匪武装配合下，向乌丹发动进攻，被警备四团和赤峰、赤西两县支队阻击于四道沟梁，双方对峙了一天，经过多次冲杀，仍未能前进一步。当时正赶上天气奇寒，达零下40℃左右，国民党兵冻死冻伤数百人，只好窜回赤峰。

第二次在1947年春末，赤峰国民党军一部及地主武装1000多人，向四道沟梁发起进攻，警备四团和骑兵团密切配合，从早晨战斗到黄昏，阻敌未能越过四道沟梁，最后遗尸200多具，狼狽溃散。警备四团也伤亡80多人。

警备区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清剿土匪，配合地方干部搞清匪反霸，搞土地改革。

乌丹在过去就是个土匪经常出没的地方。日本投降后，社会秩

序混乱，土匪蜂起，有字号的就有20多股，数百人。开始，由热北地委书记王逸伦收编了几股，组成乌丹县支队，有3个连队，150多人。还有个鲍团（团长鲍青山），辖3个营，500多人，也被收编为卓盟纵队第五支队。这两支队伍成份都很复杂，营连级干部多数是伪满时警察、军职人员或当地的地主。当时把这些地方武装收编过来，起到了安定地方秩序，扩大武装力量的作用。收编后，他们加紧了对这些武装的整编改造，不仅没有发生叛乱事件，还把一些武装改造成革命军队。

第一次改造乌丹县支队是在1945年10月，派出老红军干部何扬文任支队长，胡文任政委，又吸收一些贫雇农参加进来，改变了队伍的成份构成。同时吸收虽为地主阶级出身，当过伪自卫团团总，但思想进步，真心跟共产党走的马子成加入共产党，委任他为五支队副支队长，这样，使这支队伍稳定了下来，并在多次剿匪斗争中经受了锻炼。

第二次改造是在1946年初，混进县支队任连长的大地主倪广文阴谋叛变，被及时察觉，利用洗澡的机会解除了全连的武装，并逮捕了倪广文，召开枪决倪的公审大会，群众上台控诉，一下子打开了乌丹的局面。当时，还利用检阅的办法，缴了不服从指挥的鲍团的械，鲍青山调到乌丹县政府任武装科长，几个有罪恶、民愤大的军官被关押起来，又清除了一个隐患。

经过这样的整顿改编，队伍纯洁了，战斗力提高了。在1946年国民党向热北发动疯狂进攻的险恶局面下，乌丹县支队没有叛变的，同时还成为平叛剿匪的骨干。当时，先是三区被土匪包围，区长赵学祖等3人战死，2人被俘。相继又在四区与区小队内外勾结，袭击了区公所，区长阎芳林、指导员康俊英遇难。他们还内外呼应包围了二区区公所，幸有准备，其阴谋未能得逞。乌丹县支队参加了平定这些叛乱的斗争。1946年初冬，水头一战，击溃白金辉股匪500多人的进攻。同年腊月，西兴隆庄一战，又全歼张桐轩股匪一个中队，近百人。在斗争中，县支队发展到4个连

队，500多人。

二十二军分区的骑兵一、二团，也主要从事剿匪斗争。这样，二十二军分区的人民武装，从1946年12月至次年3月的3个多月里，共与土匪作战80多次，毙伤400多人，投诚数十人，缴获战马250匹，枪200多支。在人民武装的打击下，到1947年4月，乌丹全境已见不到土匪踪迹，胜利地担负起保卫冀热辽领导机关的任务。

第八章 解放区土地改革的 胜利和战略性反攻

第一节 冀察热辽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

一、战略反攻前的形势

1947年2月以后，国民党军事危机日益加深，在一些主要战场上已经不能把握战争的主动权。冀鲁豫和晋西南战场的国民党军队已完全处于劣势，华北、华东、晋察冀的形势，亦开始转为劣势，西北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进退维谷，不能自拔。东北战场，人民军队在打退国民党军队4次对南满的进攻后，也开始转入反攻。

冀察热辽的形势同全国其它各解放区的战场一样，经过4个多月的敌后斗争和发动群众，到1947年2月，国民党军队由点线扩张到面的企图彻底失败了，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一）解放区日益巩固扩大，敌占区缩小。国民党军队将23个团的兵力分散在31座城镇和长达1000公里的铁路线上，加以在对南满进攻中，抽调十三军两个师支援东北，兵力更为空虚，士气低落，日益陷入被动。解放区则日益巩固扩大，热河解放区有兴隆、青龙、建昌、乌丹、新惠、经棚、林西、林东、大板、天山、鲁北等11座县城和310多万人口。热河的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也发展到10万多人（不包括热南），并在敌人点线之间站稳脚跟，地方工作向鹰（手营子）承（德）、叶（柏寿）赤（峰）、阜（新）义（县）三线边沿大步伸展，锦州、义县、北票、阜新、朝阳、承德、赤峰国民党军队占据的城镇均已直接受到热河军民的威胁。

(二)冀察热辽部队在大部分地区开始了进攻性作战，主动迫近敌人固守的据点和铁路沿线，深入敌后打歼灭战。从1946年12月到1947年2月中旬，先后对敌作战373次，歼灭国民党军4505人，土匪5395人。特别是在八里罕、建西、黑河子、甸子等地击退敌十三军、九十三军的进犯，热东要路沟歼敌，热辽奔袭青河边门等战斗之后，热河全区已处于战略反攻的前夜。

(三)由于国民党在其占领区强征暴敛，抓丁抓夫，奸淫抢掠，屠杀拷打，与解放区的民主生活形成鲜明对照，转变了各阶层人民的“变天”思想，以为八路军站不长的错觉，也转变为肯定地相信“五不了”^①。蒋管区人民则渴望人民军队前去解救，逃亡地主纷纷返回解放区。

(四)热河境内的土匪及被国民党军支持的地主武装，经过军事清剿，发动群众进行政治瓦解，若干地区已肃清，残余大小千余股已呈最后挣扎之势，内部非常动摇，有的向蒋军据点靠拢，难以独立活动；有的开始向人民缴枪。

为使冀察热辽和东北解放区形成统一的力量，造成对东北蒋军的東西夹攻之势，1947年3月30日，中共中央决定，将冀察热辽中央分局和军区划归东北中央局和军区领导。同时，中央军委电令：要热河、晋察冀采取大部队行动，发动进攻性作战，钳制和消灭敌十三军、九十三军，配合东北战场。至此，冀察热辽地区进入反攻作战的准备状态，随时准备发起总攻击，消灭敌人，解放全区，迎接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

^①当时在热河一带流传一个《五不了碑》的神话故事：有一天傍晚，王爷庙东（宁城到围场间）突然出现一座美丽村庄，村中升起万丈红光。当人们向该地走去时，村庄与红光均隐现不见，只剩下一块石碑，上面刻着五行字迹：（一）中央军长不了；（二）八路军走不了；（三）大户富不了；（四）穷人穷不了；（五）好人死不了。这则神话故事，形象地反映了热河人民的思想变化。原载1974年3月2日《群声报》。

二、冀察热辽第一次党代会的召开及其重要历史意义

1947年4月2日，冀察热辽地区第一次党的代表会议在林西召开。出席这次会议的共有10个代表团，218名代表，代表着全区23万党员，1600万人口。会议期间，程子华作了《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李运昌作了《关于军事问题报告》；黄火青作了《冀察热辽建党工作的报告》；赵毅敏作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高自立作了《关于财经问题的报告》。会议发扬了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对前段工作得失、经验教训作了深刻地分析和总结。会议历时42天，于5月14日胜利闭幕。会议结束时，与会代表一致通过了《关于一年来形势的检讨与今后方针任务的决议》（简称五·一四决议）。

决议首先分析了全国和冀察热辽区的解放战争形势和任务，指出由于人民解放军作战的胜利，解放区土地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蒋介石的军事、政治、经济危机日益严重。现在全国各解放区，正在动员一切力量，全力准备大反攻。冀察热辽地区在艰苦复杂的军事斗争与土地改革斗争中，老区更为巩固，新区业已建成初具规模的根据地，完成了坚持这个战略枢纽地带的任务。今后的任务是：“立即对敌举行反击，积极作战，大量歼敌，拔除可以拔除的据点，收复可以收复的失地，并动员党政军民一切力量，用斩草除根的办法，限期肃清地主、特务、土匪武装，巩固根据地。全区无例外地要进一步的发动群众，深入贯彻土地改革，坚持和扩大现有地区，缩小敌占区，消灭空白区，把我各区联成一片”，“为争取全国性反帝反封建革命新高潮迅速到来及其胜利而奋斗。”

决议指出：当前的最中心任务是一切为着自卫战争的胜利。为着保证这一中心任务的完成，全党必须一致努力，切实完成下列任务：

（一）关于作战方针与建军问题。要“采取一般以运动战为

主，配合以广泛的游击战”的作战方针，大量地歼灭敌人，收复失地，有力地配合全国各个战场上的反攻作战。在建军方面，首先要壮大主力，培植拳头，提高主力部队的攻坚战能力和战术水平。建立与加强炮兵、工兵、骑兵及地方武装和游击队、民兵等武装力量，集中整训，以配合主力作战；其次要彻底消灭土匪，巩固后方根据地，不断从地方武装中有计划地补充主力，要本着先主力后地方，先前方后后方，主力高于地方和前方高于后方等原则，保证主力部队的供给、兵源及装备。

（二）关于土地改革问题。要求在基本区必须消灭“夹生饭”，消灭空白区，要在精雕细刻中求得迅速与普遍提高与推广。大刀阔斧地开展游击区的工作，组织大批力量进行收复区工作。会议确定土改的工作方针是：确切满足无地少地农民的要求，在经济上彻底消灭地主阶级，集中力量打击汉奸恶霸大地主，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彻底肃清封建残余。对所有地区的群众工作，必须充分走群众路线，让群众翻心与自己动手，所有工作人员，只能是积极的启发、教育和指导，要克服某些包办代替与恩赐、命令的作风。

（三）关于财经问题。总的原则是贯彻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方针，广泛发展私营、合作及公营经济。在生产方面切实贯彻以农业为主，增产粮食，有计划地发展植棉，广泛发展家庭纺织，切实解决人民穿衣困难。发展合作事业，发展工矿业和副业、畜牧业，增加人民财富。发展交通运输，交流各解放区物资。贯彻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领导原则，聚集财富，支援战争，保证自卫战争的胜利。同时，要全党全军充分注意，大家动手，克服困难，以达到财政的完全自给自足。

（四）关于党的建设。决议要求在今后的群众斗争中，大量发展党员，并注意吸收青年、妇女、知识分子及蒙古族进步分子入党。在发展中注意巩固、健全支部，加强支部的核心作用，大批地培养提拔本地的新干部，教育提高老干部，洗刷坏分子，加

强本地与外地干部的团结。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坚决肃清党内自由主义与贪污腐化的思想，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与作风，以建设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党。

（五）关于政权建设问题。今后政权建设工作的重点是要加强区、村两级。改造村政权，彻底摧毁封建残余势力，使政权真正掌握在翻身的基本群众手中。政权工作的中心任务是领导人民进行自卫战争，满足前线人力物力的供应，开展群众性的大生产运动，帮助人民发财致富，迅速完成土改工作，加强除奸，肃清匪特，确立革命秩序，建立廉洁政治，发扬民主作风与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此外，关于蒙民工作问题，决议重申了以前的蒙民政策，并着重指出，必须深入下层，广泛宣传与正确执行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施政纲领，进一步发动蒙民群众，提高他们的觉悟，在此基础上，培养大批干部，改造与建设真正为蒙古人民服务的人民军队和人民政权。必须坚持蒙汉民族的团结，蒙族内部的团结。反美反蒋，实现内蒙民族的高度自治，团结各阶层，发动进步力量，削弱封建势力，以达到内蒙古民族的自决与彻底解放。

决议还要求加强蒋管区工作，发展反卖国、要独立；反内战、要和平；反独裁、要民主；反饥饿、要生存的人民运动，建立和发展蒋管区工作，广泛建立各种关系，为完全解放蒋管区做好准备。

决议最后满怀信心地指出：只要我们依靠人民，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毛泽东的思想与七大路线方针政策领导之下，全党团结一致，坚持贯彻代表会议精神，彻底完成代表会议所决定的任务，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冀察热辽党代会是冀察热辽地区党组织创建以来第一次规模空前的盛会，开得很是成功。这是攸关冀察热辽全区人民命运的会议，也是向国民党发动反攻，实现全区人民彻底翻身解放的一次

动员会议，它的召开，在冀察热辽地区党史及革命史上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首先，这次大会详细地检查和总结了过去全区的各项工作，深刻地分析了时局，明确了全区党政军民的中心任务，提出了“一切为着自卫战争”的战斗口号。在新的革命形势下，给全区军民指明了继续前进的方向，增强了胜利的信心。

其次，制定了新的作战方针，从战略高度确定了全区战略反攻的军事指导思想和战术总原则。不仅使全区军民从思想上有了一个战略转变，而且，在这一战斗原则指导下，迅速地瓦解了敌人，开辟了冀察热辽战场的新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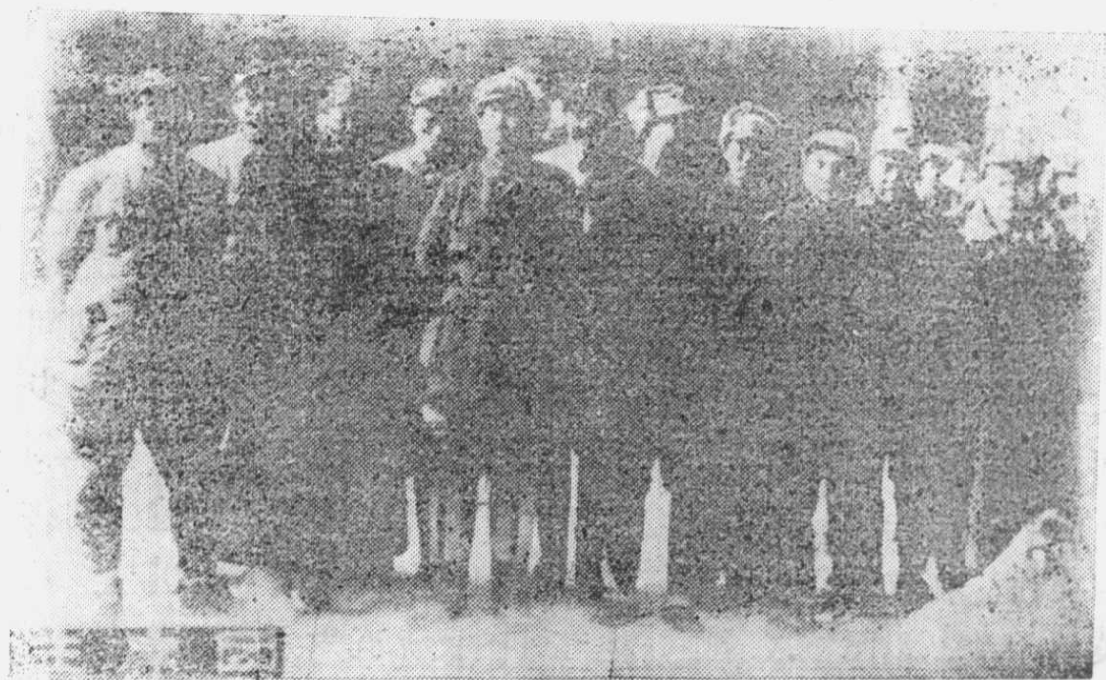
第三，总结了土改工作的经验与教训，根据全区特别是热河地区土地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制定了相应的政策与方针。并把这项工作做为全区各项工作的中心环节，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使全区广大人民群众走上了彻底解放的道路。

代表会议后，发生了柴火栏子事件。出席冀察热辽第一次党代会的冀东区代表团，在返回冀东途中，5月21日夜宿赤峰围场边界之柴火栏子，突遭白金辉、于秀成匪队袭击。护送代表团的警备区骑兵连临阵逃跑，代表团的干部、战士30多人，与近千敌人展开浴血奋战，代表团团长李中权，身负重伤，冲出重围。代表团副团长、冀东区党委组织部长苏林燕、冀东行署财政厅长王克如、十五地委宣传部长冀光、十五军分区副政委王平民、十二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胡里光等22人英勇牺牲，蒙受了重大损失。

第二节 开展战略性反攻

一、韩梅村起义与反攻作战的发起

在热河战场开展战略性反攻的准备工作，从1947年3月份就



冀察热辽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主席团

左至右：苏林燕、黄火青、李子光、胡锡奎、李运昌、黄永胜、程子华、赵毅敏、杨清(欧阳钦)、陈奇涵、高自力。

开始了，首先是加强了野战军的力量，将原先分散到各个军分区的主力部队重新集中起来，新组建了十八旅（丁盛任旅长，韦祖珍任政委），由冀热察抽回十三旅（黄鹄显任旅长，陈仁麒任政委）。这样加上原有的十六旅（张德发任旅长，黄文任政委），十七旅（周仁杰任旅长，谢镗忠任政委）和朱德骑兵团（何能彬任旅长，林茂源任政委），在热河战场上就有5个野战旅，3.7万多人（冀察热辽军区共辖部队10.4万多人），形成了拳头。相继，又建立健全了作战指挥机关，以冀察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程子华、参谋长黄志勇、政治部主任刘道生等组成了前方作战指挥部，统一指挥第五、十三、十六、十七、十八旅和骑兵团，准备投入反攻作战。冀察热辽中央分局的全面工作由黄火青负责，军区的全面工作由李运昌负责。同时，在各部队中进行作战训练，开展立功运动，提高了部队士气和战斗力。在部队武器

弹药的供给，粮食、鞋帽等供应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在反攻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中，也是冀察热辽党代会正在召开之际，发生了韩梅村将军率领的“五一”凌源起义，为冀察热辽地区的战略反攻拉开了序幕。

韩梅村原籍湖南华容人，黄埔军校第三期学员。在此期间，受到周恩来、鲁易、蒋先云等优秀共产党员的影响，具有进步倾向。1928年后，韩梅村一直在国民党嫡系将领关麟征、杜聿明部下任职。在桂林、昆明等地与共产党地下工作者曾有过密切接触与交往。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曾参加过长城抗战和台儿庄大战，英勇杀敌，以图抗战救国。他在任国民党五六六旅少将旅长时，因为治军方法类似红军，遭到上司和同僚们的非难和排挤。他一怒之下，托病辞归桂林，接触了地下共产党肖漪萍、邓钧洪等，使韩的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为抢占地盘，急忙调兵遣将开往东北，委任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韩梅村亦随之辗转来到东北，被委任为阜新市长，韩梅村在任阜新市长期间，蒙奸李守信、汉奸崔兴武以及政治土匪李华忱等的队伍也住在阜新。在地下党员邓钧洪等人的帮助下，他抓住了他们的劣迹，利用杜聿明之手，突然将崔兴武、李华忱逮捕，解除其部队武装，吓得李守信也赶快移师他处，这为起义消除了一大障碍。

1946年7月，根据东北保安军司令长官部的命令，改组原驻守凌源的国民党保安军第三支队，由韩梅村兼任司令，刘清林为副司令。该部下辖3个团，其中两个团是由原保安支队整编而成，另一个团是韩梅村由阜新地区的地方团队组建起来的。

为做起义准备，韩梅村和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决定从内外两个方面大力开展工作。首先在内部以在阜新组建的九团为工作重点，进行感情联络和思想渗透，收到了一定成效。其次，千方百计设法接通与当地党的组织与军队的联系，以便里应外合，一举

取得起义的成功，党的地下工作者邓钧洪、周太暄，多次冒生命危险，进入解放区，历尽周折，终于先后与冀察热辽部队第十七旅、第十六旅取得了联系，商定了起义的具体事宜，制订了起义计划。

4月30日晚，冀察热辽部队第十六旅，兵分三路，于黄昏后兵临凌源城下，午夜发起攻击。韩梅村则下令把所有城防部队集结于城内的一个大院里。因此，十六旅进展顺利，很快突进保安三支队参谋部、凌源县政府等地，击毙俘虏顽抗之敌千余人，打通了通往韩梅村司令部的通路。5月1日凌晨，十六旅旅长张德发，副政委曹德连亲自来到韩梅村司令部接应韩将军。韩梅村立即召集官兵集合，当众宣布起义。保安第三支队一部随韩起义，另一部随刘清林逃窜。冀察热辽部队占领了凌源县城，韩梅村起义成功。

5月9日，韩梅村将军发表起义通电，历数蒋介石发动内战，残杀人民的罪行，指出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正在一天天的加速走向崩溃，表示要为消灭蒋介石集团，建立新中国而奋斗。

这次起义虽然最后带出来的官兵只有600余人，但其意义及影响却是很大的。首先韩梅村将军反对内战，反对独裁，追求光明，在国民党军队侵占延安，企图一举消灭解放军主力，和东北战场敌我相持的紧急关头，毅然率部起义，对当时国共双方都产生了极大的政治影响。其次，韩梅村是国民党嫡系将领，他的起义对国民党军队上层，特别是杜聿明、郑洞国等是一个大的震动，对蒋军的士气起了一定的瓦解作用，对解放区军民则是一个鼓舞。再次，韩梅村起义为解放军壮大了一部分武装力量。起义后，冀察热辽军区即将起义部队改编为“热河民主救国军”独立第一旅，任命韩梅村为旅长。不久，又将该部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冀察热辽军区独立第六师，韩梅村继任师长。这个师多次参加著名的战斗，为全国的解放做出了贡献。

二、夏季攻势，收复赤峰

韩梅村起义，攻克凌源，拉开了反攻的作战序幕。紧接着，冀察热辽军区前方作战指挥部决定把围场作为反攻重点，首先开辟热西战场。

5月2日，各参战部队奉命分路向围场进发。5日，独立第五旅、第十三旅进至丰宁县上黄旗时，与国民党十三军四师十二团三营相遇，将其包围在鸡冠山地区。敌营长以下大部被歼，少数侥幸逃脱，热西战役首战告捷。

14日拂晓，担任主攻围场的第十三旅已进抵既定战略方位——吉布汰线。五旅也于14日11时到达四合永、黄土坎以西，并控制了公路两侧阵地。骑兵旅二团进至三道川，负责打援的其它部队也相继进到指定地点，完成了对围场的包围。围场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守军为国民党十三军第四师十团三营和保安队约1000余人。敌人为了保住塞外重镇，苦心经营，严密设防，修筑了完整坚固的环形防御工事，明碉暗堡，星罗棋布，被称为“热河第一坚强之据点”。

15日凌晨，攻城主力部队迅猛地展开攻击。在猛烈炮火掩护下，三十九团一部很快突入城内，激战数小时，打退敌人6次反冲锋。10时，该团另一部从城东南突入，掩护全团入城，与三十八团三营会合后，直逼敌团部指挥所。三十七团一部亦打通山路，突破敌人防线，攻入城西南角。此时，攻城主力已形成强大的战略包围。敌人腹背受敌，拚死顽抗，激战到18时，守敌千余人被歼，战斗胜利结束。

冀察热辽部队为了“继续扩大战果，攻取隆化，消灭援敌”，经过短暂休整，于5月15日晚，挥师南下，向隆化城挺进。战斗于20日晚打响，冀察热辽部队陆续投入十七旅、十六旅、五旅十三团的全部兵力，强攻隆化。由于火力配备劣于敌人，对敌情侦察不准，作战指挥不利等各种因素，攻城战斗历时



胜利后的喜悦——1947年5月攻克热河重镇围场后合影。左至右：十三旅旅长黄鹄显，冀热察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段苏权。

11昼夜，进展不快，对敌杀伤不大，遂于5月30日撤出战斗。

热西战役历时一个月，进行大小战斗3次，歼敌近千人，俘500余，击毙敌副团长、营长各1名，缴获机枪16挺，长短枪333支，各种炮13门，汽车一辆及部分弹药物资等。由于隆化战斗失利，冀察热辽部队亦付出很大的牺牲。

热西战役一打响，热中守敌就成为惊弓之鸟，叶赤线首先开始收缩。5月17日，敌暂二十二师以一个团的兵力掩护物资南运。冀察热辽部队乘机歼其一部，截击运输中的物资。月底，敌师部率两个团南撤，赤峰仅留两个营驻守。6月6日晨4时，又以演习为名，弃城南逃。同时，在头天晚上，即以开会为名，放200多土匪入城，大肆抢掠，各商号损失甚重。6月6日晨8时，冀察热辽部队入城，赤峰宣告第二次解放。不久，冀察热辽中央分局、军区和热河省政府机关相继从林西迁往赤峰。

从赤峰撤退的国民党军队，在三十家子附近遭到冀察热辽部

队十八旅的截击，“前指”命令十七旅迅速增援，准备当夜集中歼敌。敌军不敢恋战，遗弃全部行李、辎重，渡河东遁。十七旅跟踪追击，8日夜夺取天义城，19日进占叶柏寿，至此，热中主要城镇全部解放。

收复赤峰后，“前指”又指挥大军出击热东，发起热东战役，再克凌源。

凌源守敌为东北保安第三支队残部和土匪、警察大队共1980余人，该部虽反动顽固，但战斗力不强。“前指”以十六旅主攻，十八旅和警一团于凌源西南堵击。21日1时半开始攻城，战至22日中午，守敌纷纷弃城溃逃，1500余人被歼。冀察热辽部队战斗获胜，斗志更加旺盛。

在围歼凌源之敌的同时，“前指”指挥十七旅逼近朝阳，肃清外围据点，驱逐李守信骑匪，攻克朝阳火车站，歼敌一个排。当敌增兵朝阳时，“前指”又出其不意改攻坚固设防的北票。十三、十七旅攻城，十六、十八和二十一分区部队打援。28日夜打响，首先攻占北票的台吉煤矿，逼近北票发电所。30日黄昏，发电所守军一个连被迫投降，战斗取得决定性进展，正在攻击敌指挥所时，敌以3个团又一个营的兵力增援，分三路向冀察热辽部队猛攻，遭到顽强阻击。这时，“前指”果断地改变作战部署，以十六、十八旅的4个团组成左翼兵团，向东出击；以十三旅和二十一分区主力共5个团，组成右翼兵团，由东北向西南出击。7月1日19时开始总攻，援敌迅速渡河南窜。当夜，北票守敌2176人全部被歼，缴获大批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

这次反攻作战，从5月1日至7月1日，共历时两个月，以北票攻坚战为标志宣告胜利结束。冀察热辽部队转战热西、热中、热东广大地区，横扫强敌，重创敌人有生力量，收复了赤峰、围场、丰宁、宁城、建平、凌源、北票等市县，歼敌8000余人，缴获大量的武器装备和其他军用物资，控制了锦承铁路中段400余里，使热中、热东、热辽、热西等解放区连成一片，有效

地完成了牵制敌人，配合东北战场大攻势的作战任务。

三、秋季攻势与辽西大捷

夏季攻势后，东北战局发生了根本变化，国民党军占据的地区不足10万平方公里，被统治的人口只剩1360余万人，仅占东北人口总数的33%。中长路被截断，北宁路时断时续，国民党军作战的机动性已完全丧失。同时，由于国民党统治区域的缩小，财力、兵源大为减少，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国民党军已困难重重，惶惶不可终日。与此相反，解放区则处于优势地位，人口超过国民党统治区一倍，土地面积为国民党统治区的七至八倍。老解放区日益巩固，新解放区迅速扩大，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增加，经济稳定，生产发展，充满新的活力。

为夺取热河战场上的更大胜利，夏季攻势结束后，冀察热辽部队就抓紧进行新战役的准备。首先，由热河的第十三、十六、十八旅改编的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师组成东北民主联军第八纵队，司令员黄永胜（后段苏权），政委刘道生。由冀东区的第九、十、十一旅改编的第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师，组成第九纵队，司令员詹才芳，政委李中权。另外又在热河陆续组建了独立第一、二、三、六、八师和骑兵第一师，蒙汉联军第四师，在冀东组建第四、五师，在冀察热组建第七师。这样，连同16个军分区的地方武装，冀察热辽已发展成为拥有20多万大军的重要军区。其次，各部队进行了一个多月的休整整训，搞了形势教育和土地改革教育，吸收大量翻身农民参军，增强了为保卫土地改革胜利果实而战的阶级觉悟和战斗意志，军队的攻坚战术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与提高。

在同一时期，国民党也在拚命增强其在东北的军事力量。为挽救其在东北的彻底失败，蒋介石派他的参谋总长陈诚接替熊式辉、杜聿明出任东北的最高指挥官，并由关内抽调四十九师（到东北改为四十九军）增援热河战场，使东北的国民党总兵力，仍

达50万人以上。在热河战场上则有第十三、四十九、九十三军和其它游杂武装10多万人。陈诚到任后，竟狂妄地叫嚣：60天恢复东北的优势，“收复东北一切失地”。在战略上，实施所谓“确保北宁，打通锦承，维护中长，保护海口”的计划，采取“依托重点，向外扩张”的战法，第一步就妄图打通锦承路，使辽西与承德连成一片，解除对北宁路的威胁，尔后再相机于沈阳南北发动攻势。

按照陈诚这个作战计划，9月6日，国民党军队在从锦州至山海关数百里的战线上分三路向热河解放区进击。其左路为暂编五十师主力第一、二两团，由绥中向梨树沟门进击；中路为暂六十师，由兴城向新台边门进犯；右路为暂二十二师，经红螺岬进占江家屯，准备以江家屯、新台边门、梨树沟门三处为基点向西推进，以打通锦承路，确保北宁路。敌为长期扫荡，运来大批粮食、武器弹药到杨杖子。各路并随带还乡团、“花子”队等匪帮，所到之处奸淫抢掠，无恶不作。

9月初，中央军委和东总命令：“八九两纵队主力在北宁线附近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引沈阳敌人南下增援，以便减弱中长路敌人守备兵力；破击北宁路，阻止关内增援之敌”。^①正当冀察热辽主力部队休整完毕，兵强马壮之际，“前指”得悉锦绥之敌三路西犯，立即停止破击北宁路的计划，以每日平均110里，有的高达185里的急行军赶赴前敌。9天内，三战三捷，大获全胜。

梨树沟门战斗。9月14日拂晓，八纵二十四师、二十二师各一部，跑步奔向梨树沟门，将国民党军左路暂编五十师包围，乘其立足未稳之机，展开猛攻，战至17日，敌军溃败，暂编五十师二团全部、一团大部共1000多人被歼，辽西首战大捷。

第一次杨杖子战斗。国民党暂编五十师被歼后，进占新台边

^①程子华、黄火青、李运昌、赵毅敏、刘道生：《战斗在冀察热辽》。

门的国民党军右路暂编二十二师仓惶东逃，龟缩至杨杖子据点，企图遁回锦西，被冀察热辽部队第二十三师及二十二师、独一师各一团包围，热东军分区两独立团阻击锦西援敌。9月16日14时发起进攻，战至黄昏，战斗胜利结束，俘敌少将师长苏景泰、少将参谋长宁坚以下2500余人。辽西前线第二次大捷。由于没估计到敌人会如此迅速逃跑，未组织大包围，致使1000余敌人逃脱。

第二次杨杖子战斗。当被包围在杨杖子的国民党暂编二十二师告急时，陈诚急令刚开到热河的四十九军七十九师、一〇五师及军直属队，由军长王铁汉亲自率领，增援杨杖子。待其于20日进占杨杖子时，暂编二十二师已被歼灭多时了。王铁汉不敢贸然西进，就地大修工事。“前指”指挥由冀东赶来的九纵队，在热东军分区两个独立团配合下，急进至杨杖子以东地区，切断杨杖子敌之退路，阻击由锦州、锦西出援之敌。八纵队主力和独一师迅速将杨杖子之敌包围。9月21日，主攻部队连续组织两次总攻击，虽然夺占了一些重要阵地，但因国民党军整个防御体未被打乱，还在进行有组织的抵抗。22日晨，锦州地区之国民党军四十九军二十六师和暂编六十师一部，九十三军暂编十八师和暂编二十二师一个团，匆忙出动，从锦州、锦西两路出援，被九纵阻于九龙山、五岭山一带，距杨杖子仅20公里左右，情况异常紧急。“前指”一方面命令九纵（欠二十七师）坚决阻敌援兵，一方面加紧围歼杨杖子之敌。22日10时，八纵发起第三次总攻击，战斗进行3个小时，守敌全线动摇，企图夺路向锦西逃跑，集中一个多团的兵力向石湖南山阵地发起数次冲锋，均被独立一师二团一营击退。随即冀察热辽攻城总预备队及时从左翼投入战斗，一小时内，接连攻占数座山头，使整个战线形势急转直下。杨杖子、毛祁屯周围主要制高点大部被攻占，形成居高临下之势。即日16时发动最后一次总攻击，各参战部队集中指向敌军军部毛祁屯，并一鼓作气将敌全部压缩在毛祁屯附近狭小地域内。黄昏后，守敌全

线崩溃，向长茂河、旧门地区逃窜，八纵紧追不舍，九纵前头堵击，该敌纷纷缴械投降。另一部溃敌窜至下老庙附近，被热东部队围歼，并活捉敌一〇五师师长于泽霖。整个战斗至23日12时结束，除四十九军军长王铁汉带200余人逃走外，全歼四十九军军部、七十九师、一〇五师所属4个团，共1.2万余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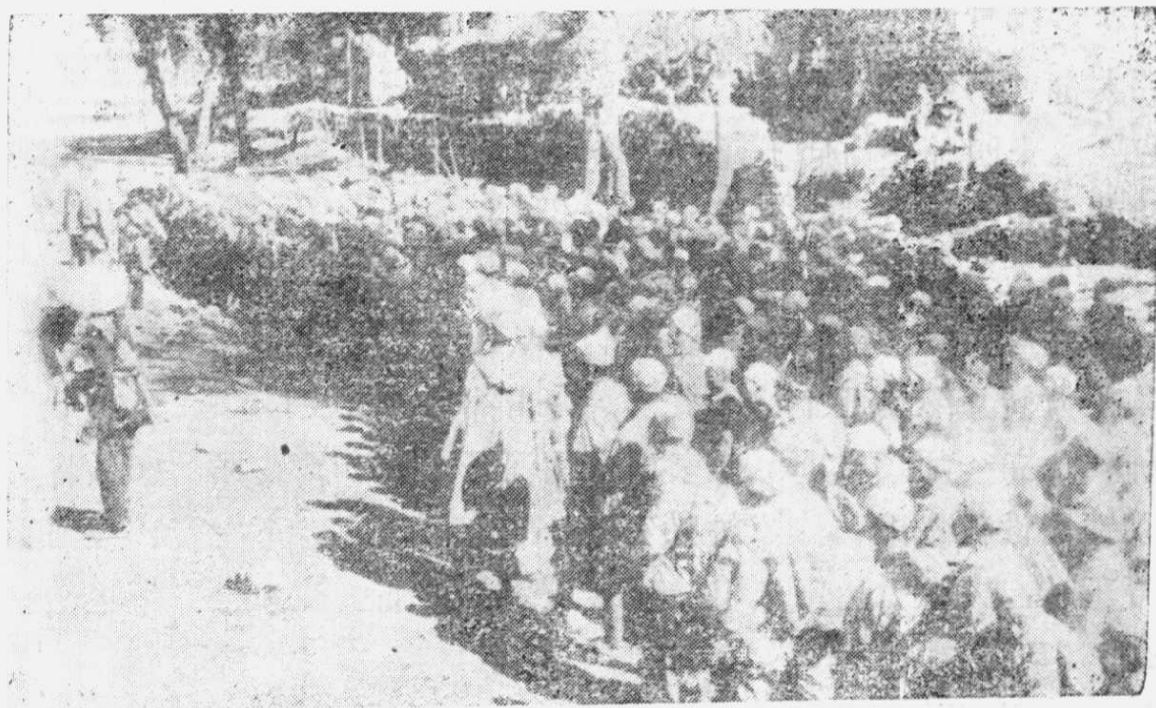
至此，辽西前线空前大捷，冀察热辽部队获得了三战三胜歼敌1.6万余人的战绩，其中俘敌将级军官4人，校级军官多人。彻底粉碎了“打通锦承路”的计划，对陈诚“重重的踢了一脚”。



奔驰千里进军辽西

1947年秋，冀察热辽部队千里跃进辽西，进行攻势作战，在梨树沟门和杨杖子三战三捷，歼灭国民党军队1.6万余人，图为向辽西挺进的冀察热辽骑兵部队。

铁路破袭战。遵照中央军委、东总“破击北宁路，阻止关内增援之敌”的指示，冀察热辽部队在辽西大捷后，经过短暂休整，遂集中主力逼进北宁路，在2.6万多热河民兵配合下，于9



第二次杨杖子战斗中俘敌四十九军之一部。

月28日至10月19日，进行4次连续大破击，使北宁路南段陷于瘫痪，锦承路段彻底破毁。

（一）破击兴榆段（兴城至榆关）。冀察热辽部队“前指”鉴于两锦（锦州、锦西）地区，敌囤兵雄厚，不易进攻，遂将主力开进两锦以南敌人防守薄弱地段。以八纵、九纵及独立第一师之主力首先破击兴榆铁路。八纵以两个师的兵力于9月29日破击绥中至兴城段铁路，两个师（含独立一师）在兴城以西旧门以东控制九龙山、五岭山，阻击可能南进之敌，保证破路部队的背后安全。九纵破击绥中到山海关段铁路，以一部分兵力控制老军屯附近及以西地区，警戒山海关方向。两纵队主力奋战三昼夜，除绥中尚为敌军坚守外，其余车站、据点均被攻占，破坏铁路百余里，炸毁桥梁23座，守敌大部被歼。

（二）破击锦兴段（锦州至兴城）。由于兴榆铁路被毁，国民党出关之军队企图海运至葫芦岛登陆，冀察热辽部队乘敌新六军第十四师调往东北，锦州守敌空虚之机，挥师北进，破击锦兴段

铁路。10月12日，八纵两个师（含独一师）将羊圈子至营盘段铁路大翻毁，攻克高桥及车站；另外两师控制住了锦州以西敌人据点。二十四师在白庙子歼敌一个营之后，袭击锦州飞机场。九纵将营盘至兴城段铁路拆毁一部，攻克营盘、韩家沟两个车站。

（三）破击锦义段（锦州至义县）。10月13日，冀察热辽部队主力转兵继续北上，围义县，破击锦承路锦义段。八纵二十四师、独立一师15日进至薛家屯、泥河子之间开始破路，16日将该段铁路设施烧毁，炸掉桥梁7座，攻克薛家屯、下七台、泥河子等车站；九纵抵达田家屯、班吉塔、火神庙、沈家台一带集结阻援。

（四）破击义金段（义县至金岭寺）。10月17日，八纵分兵破击锦承路义金段，炸毁铁路桥梁大部，攻克邹家屯、朝阳寺、南岭、金岭寺等车站，歼敌一部。

经过这4次大的破击战，冀察热辽部队控制北宁路200余里，攻克车站、据点40余处，焚毁枕木1.6万余根，炸毁桥梁数座，歼灭守敌一部，有效地牵制了敌人，打破了国民党迅速集结重兵，固守东北的战略企图，支援了东北作战。

解放朝阳。朝阳是热东门户，挽大凌河上游，扼锦承铁路中段。大破北宁路后，“前指”又布置回师围攻朝阳，打开热东门户。10月21日，冀察热辽部队九纵从朝阳西、西南和东、东北四面完成了对朝阳城的战略包围。大军压境，4000余守敌蜷缩一团。晚间发起攻击，首次攻城未克。各级指战员总结经验，调整作战部署，22日发起第二次攻城战斗，集中优势兵力和炮火，从西南和西北两个方向突击，攻城奏效，23日晨，守敌五十师参谋长以下2100余人被歼，朝阳宣告解放。

佯攻北票，歼敌九关台门。为引诱义县之国民党军出援，以便于运动中歼敌，“前指”于10月20日命令独立三师及热辽地方武装佯攻北票。围攻9天，至28日，义县之国民党九十二军军长

候镜如亲率两个师增援北票，一头钻进八、九纵队设伏的九关台门地域。11月1日2时打响，战至2日3时，用血肉搏杀，夺得350高地，将敌二十一师与四十三师拦腰斩为两段。四十三师见势不妙，仓惶缩回义县；二十一师大部被歼。师长郭惠苍率残部慌忙渡大凌河，企图东逃，行至破台子一带，伏兵四起，副师长李宗有被击毙，师长和师参谋长被活捉，二十一师被全歼。这时，蒋军飞机出动在空中盘旋，解放军战士唱出新编小调：“打死副师长，飞机来吊丧，你说死的冤，这要怨老蒋。”

余家屯战斗。11月3日晚，敌一七四师两个团千余人由七里河子向东南方面运动，冀察热辽骑兵师奉命出击，追歼该敌。次日拂晓前，骑兵师由大茂堡东山进到辛龙庄，兵分三路向猬集在余家屯之敌冲刺。激战一小时，除20余人乘马逃脱外，其余就地被歼，这是冀察热辽部队发挥骑兵优势的速决战，使敌人防不胜防，束手待毙，这次战斗共消灭敌人1000余人。

秋季攻势从梨树沟门战斗开始到余家屯战斗结束，历时50天，冀察热辽军区集中了9个师以上的兵力于辽西、热东作战，共毙伤俘敌2.7万多人，并把东北敌主力新六军十四师、暂二十二师全部牵调至锦州及以西地区，直接配合了整个东北战场的作战。又迫使蒋介石将关内之敌二十一师、四十三师及傅作义的暂三军调到关外，配合了晋冀战场的作战，受到东北军区的通电表扬。

四、冬季攻势，进军辽西

1947年秋季攻势的重大胜利，证明冀察热辽部队是一支能征惯战的英雄部队，不仅有高超的战略战术和攻坚能力，而且还具有英勇顽强，能吃苦耐劳的战斗精神。在第二次杨杖子战斗中，由于当时正处青黄不接时期，该地又经敌我大兵团连续作战，粮菜早已枯竭，冀察热辽部队指战员多以生玉米等充饥，更加三天大雨，山路泥泞，整日大雾，展望困难，但指战员硬是不顾这些困

难，苦战三昼夜，歼灭该敌，取得解放战争热河战场上一次重大胜利。九关台门350高地争夺战，更表现了冀察热辽部队的顽强战斗精神，经一个昼夜的十几次反复争夺，一个直径不到30米的小山头，成了一片血海，敌人整营的反冲锋，都被守卫部队杀退，最终奠定了整个战斗胜利的基础。象这样英勇奋战的事例是很多的。

秋季攻势的重大胜利，不仅支援了东北、华北两大战场，还使热河省东北部广大地区、除锦州、绥中、北票等少数孤立地点外，全部获得解放。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深入进行，广大翻身农民热烈参军支前，又使冀察热辽部队不断发展壮大，部队素质不断提高，驻守在热河和东北的国民党军队有生力量大量被歼灭，兵源枯竭，士气低落。在这种情况下，为免遭各个击破，陈诚采取更加集中兵力的部署，实行所谓“固点、联线、扩面”的防御计划，妄想利用冬季解放军停止进攻的时机，加修工事，整训部队，求得喘息之机。与敌人的估计恰好相反，东北解放军总部认为，江河封冻更易于解放军车马通行，有利于大兵团作战，决定继续发动更大规模的冬季作战，不给敌人以休养和喘息的时间。东总于1947年11月9日和16日，发出冬季攻势的战役部署和作战指示，动员全军积极进行准备。具体作战部署是：同秋季攻势一样，仍以冀察热辽部队为先导，首先对北宁路沈（阳）锦（州）段进行攻击，切断锦州与沈阳之间敌之联系，歼灭沈锦路段上及其两侧据点之敌和大量援军，然后转移主力，攻歼辽阳、鞍山、营口之敌，为最终孤立锦州、沈阳、长春之敌奠定基础。

12月9日，冀察热辽部队“前指”奉东总电令，由程子华司令员率八、九两纵队和3个独立师自朝阳东进辽西地区，参加冬季攻势作战。12日破击锦州至大凌河段铁路。14日东渡大凌河，占据北镇。24日攻克白旗堡，歼敌暂五十五师一部。30日八纵队攻占黑山、大虎山东北部地区；九纵队攻占大虎山及其附近地区；独三师于旗末营子将自北票东窜之敌暂二十二师三团截歼。1948年

1月19日，八纵队、独立一、二、三师和一纵队、总部炮兵纵队密切配合，奉命向困守新立屯之敌国民党第四十九军第二十六师发动进攻。25日扫除外围，26日发动总攻，战至10时，守敌四十九军第二十六师（欠一营），除师长带500余人逃窜阜新外，其余9000余人全部被歼。27日，九纵队与独立一师南取沟帮子，守敌一八四师闻风南逃，九纵二十七师跟踪追击，在石山站歼逃敌600多人。二十六师袭歼大凌河守桥部队6个连，二十五师远距离奔袭收复盘山。冀察热辽部队挺进辽西的攻势作战和二、三、六、七纵队全歼国民党新五军的作战，使蒋介石匆忙飞抵沈阳，调兵遣将，增援东北。叫嚣“60天恢复东北优势”的陈诚也被撤职，卫立煌当上了“东北剿匪”总司令。

在近两个月的冬季攻势作战中，冀察热辽部队挺进辽西地区，参加较大战斗45次，共毙俘敌人1.4万多人，收复重要县城和市镇7座。2月1日，“前指”由新立屯西返，第八、九纵队和独立一、三师交东北野战军总指挥部直接指挥。

第三节 土地改革的伟大胜利

一、“煮夹生饭”和“砍挖”运动

1946年12月冀热辽中央分局《关于检查与深入土地改革问题的指示》下达后，各地组织大规模的工作团下乡，领导机关只留少数人支持工作。分局本身组织了三个工作团，宣传部长赵毅敏带一个团到热中，副书记黄火青带一个团到热辽（有千多人），热河省民政厅长罗成德带一个团到乌丹，冀热辽军政干校近千人的学员也组织起来，开赴经棚，一方面剿匪，一方面发动群众复查土改。检查的结果，主要分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搞得比较好的，平分了土地，贫雇农与地主富农按人口分得差不多同

等数量的土地，甚至还有稍多一点的。但对175个村的调查中，这样的只占少数。林东县仅有苏家营子和池家营子两村搞得比较彻底，土改后，贫农、赤贫每人有地20亩，中农20亩，富农24亩，地主17.4亩。第二种情况是搞得一般的。地主的经济下降了，或者搞垮了，富农稍微动了一下，贫农的土地量虽然上升了，但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还比地主差。建平县的大西沟，曾经4次发动群众分配土地，但地主每人仍占有土地7.9亩，富农11亩，贫农3亩多，赤贫4亩多，相差比较悬殊。第三种情况是煮了“夹生饭”的。地主经济根本没有打垮，留地多而好，富农也没动。在这些地方地主在各方面都还占着优势。另外，还有部分空白区。

三种情况所占比例，各地不尽相同。据9个县770个村的综合分析，没进行土改的空白区128个村，占16.6%；搞得好的和比较好的358个村，占46.4%；“夹生饭”的284个村，占37%。也有“夹生饭”比较严重的，如建东县1947年春统计，已搞土改的146个村，仅有54个村搞得透或比较透，92个村煮了“夹生饭”，占63%，还有226个村尚未搞土改。这样，夹生和空白的竟高达85.5%，土地改革的任务还是很艰巨的。

从土地的分配情况中，也可以看出土地改革不彻底的问题。全省共有耕地4081万亩（包括辽西、热西、热南），应分散土地按35%计算，尚应分散土地1428万多亩。到1947年4月统计，全省只分配土地450万亩，占应分土地的31.5%，所以，程子华在冀察热辽第一次党代会的报告中指出：“在热河过去我们曾估计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这是根据下面报来的分散土地数字。虽然那时也曾指明明分暗不分、包办代替等现象应予纠正，但对这类夹生饭的严重性，由于缺乏具体了解则估计不足，为一严重缺点。现根据各地汇报，在热河基本区做得好与较好的约占半数，另一半则是较严重的夹生与空白（空白占少数）。游击区则没有坚持与恢复土地改革。”这个估计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此后，便开展起“煮夹生饭”运动。

所谓“夹生饭”，是指明分暗不分、包办代替或由坏人操纵掌权等造成的土改不彻底问题，是松江省委最先提出来的。1946年11月21日，东北局根据松江地区的典型调查，发出了《关于‘半生不熟’问题的指示》，提出要把“夹生饭”变为熟饭，并确定把解决“半生不熟”问题，作为当前深入和巩固群众工作的中心任务。12月27日，东北局又提出了“煮夹生饭”的方针政策，因而形成一个运动，成为东北地区土地改革中的一个阶段。冀察热辽中央分局划归东北局管辖后，由于热河与东北的情况大体相同，所以也接受了这个指示。

在热河提出“夹生饭”问题，是在1947年2月分局召开的土地改革汇报会上，在一个《土地改革与群众运动》的报告中提出来的。这个报告指出：“在已改革地区，虽然也是最好与最坏占少数，‘夹生饭’占多数，但如果把‘夹生饭’分成‘半生半熟’、‘生多熟少’和‘生少熟多’种种不同情况的话，那么，我以为，‘熟多生少’的情况在我们的‘夹生饭’地区中要占多数。自然，我们不能因为‘熟多’而忘记‘生’，更不能忽视‘生多熟少’地区，必须引起严重注意，决不能有任何自满，但也不能慑于‘夹生’，而得出‘夹生饭更难煮，弄乱更难办’的一般结论……，对于‘夹生饭’地区，‘既要严重警惕，又要已有某些基础’那样统一的来认识，自满与望而生畏都是不对的。”这个报告为“煮夹生饭”运动定了基调。

严格说来，“煮夹生饭”的提法并不科学，所谓“夹生饭”只不过是土地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种较普遍现象的形象说法。这种现象的出现，主要是由于热河是新区，加之战争频繁，政局动荡不定等客观原因造成的；其次是政策的不彻底性造成的，如中央五四指示虽确立了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政策，但也曾指出解决土地问题的方式不是没收，而是通过清算和购买实现有偿转移，允许地主保留多于农民数倍土地等等；^①而由于工作不深入

^①中央档案馆编《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第15~17页。

或坏人掌权造成“夹生饭”的固然也有，但毕竟是少数，是次要的。所以，笼统地提“煮夹生饭”运动，则更多的是追究造成“夹生饭”的主观原因，而忽略了战争和某些政策的不彻底对土地改革的影响。比较起来，冀察热辽中央分局提出的“检查与深入土地改革”的提法还是科学的，准确的。它的科学性在于：在肯定原来土地改革运动主流的基础上，深入检查，发现问题，修正政策，纠正偏差，使土地改革更深入一步。它对已经进行的土地改革的右偏状态也有否定，但是辩证地否定，不是形而上学的否定；是检查与深入，不是另搞一套。冀察热辽中央分局在执行中，把检查与深入土地改革与“煮夹生饭”运动结合起来（在热河仍以检查与深入土地改革为主，“煮夹生饭”实际没有形成运动），收到的效果是好的，这个时期的运动也是健康的，没有发生明显的“左”偏状态。但提法的不准确和认识上的一些糊涂观念，却为后来发生严重“左”偏状态埋下了种子。

1947年6月25日，东北局发出了《关于继续完成土地改革深入群众运动的指示》，提出了领导群众开展“砍挖”运动的口号。7月27日，东北局又发出了《关于挖财宝的指示》。从此，东北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又进入了“砍挖”阶段。

“砍挖”运动是在黑龙江省的海伦县首先开始的。所谓“砍”，就是砍倒“大树”，彻底打倒地主阶级。所谓“挖”则包括两个含义，第一是“斗财宝、挖干货、追浮财、挖地窖”；^①第二是挖坏根，即清洗潜藏的土匪特务，混入干部中的地主狗腿子和“两面光”等坏人。“砍挖”运动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普遍采取“大放手”的做法，“放手让群众自己行动起来，一切监督、逮捕、审讯、起诉、查黑地、登记保管、评定等级、分配果实等工作，全部交给群众自己办理。”^②干部“看到一些偏差，

①常城、李鸿文、朱建华著：《现代东北史》，第503页。

②1947年7月28日《东北日报》。

但并没有泼冷水，来个纠正。”^①“大放手”的结果导致运动严重“左”偏，打人杀人过多，侵犯中农，破坏工商业。二是正由于领导“大放手”，群众发挥了巨大的主动性，使运动获得前所未有的进展。

1947年8月上旬，冀察热辽中央分局发出了《关于反报复扫地出门与挖财宝问题的通报》，肯定了反报复（即向反攻倒算的地主展开新的复仇运动），否定了将地主“扫地出门”、“剿家灭种”的说法和做法，批评了挖财宝与土改没有很好结合，产生为挖财宝而挖财宝的偏向，强调要把恶霸地主与一般地主区分开，强调团结90%以上的人，这是正确的，这对正在发展着的“左”偏状态无疑起到了一定的扼制作用。所以，1946年12月至1947年10月期间，热河的土地改革，除个别的“左”偏或右偏的现象外，大多数地区是在正常状态下发展的。

热河省10多个月的检查与深入土地改革的斗争（一般每个村约3个多月，是分期分批进行的），一般地分为5个步骤：第一步组织工作团（队），培训队伍。各地委、县委都组织了土改复查工作团（队），全省可达万人左右（包括抽出来的非脱产积极分子）。在工作团未进村前进行了培训，主要是阶级教育和纪律教育，明确6条纪律：一是不准以任何形式、任何方法包庇地主，或者为被清算者转移、隐藏财物。二是要紧紧依靠贫雇农，吃住在贫雇农家，同被清算对象割断一切联系。三是清算出来的浮财，一律分给贫雇农，脱产干部不能窃据私吞，农村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不能多分多占。四是在发动群众进行清算斗争时，干部不能包办代替。五是干部，特别是部队干部和战士，对平分土地工作有意见时，只能向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提出，不能直接插手干涉当地的土地改革运动。六是罪大恶极的汉奸、特务、土匪头子需要镇压的，必须报县委批准，防止乱打乱杀。第二步是确

^①黑龙江省档案馆编《土地改革运动》，第210页。

定试点村,工作团(队)深入到试点村的贫雇农中去,调查访问,深入检查,发现存在的主要问题和群众的要求、斗争目标和积极分子,然后对群众重新进行阶级教育,启发阶级觉悟,发动群众起来对那些继续进行破坏活动的恶霸地主进行斗争。大多数地区利用召开公审大会(几百人到数千人)的办法打开土改复查的突破口。第三步整顿组织,纯洁队伍,清除混入群众组织中的坏人和坏干部,培养和发现新干部,建立健全农会、民兵等组织,把领导权掌握在积极正派的贫雇农手中。第四步丈量土地、分配土地和浮财。首先成立丈量分配土地和分配浮财的两个班子,然后定出分配原则和分配数量,经群众评议,进行公平分配。分配土地的基本原则是“中间不动两头动”。“中间不动”指中农的土地不管其是否超过全村人均亩数,一律不拿出土地;“两头动”指一头地主拿出土地,一头贫农与赤贫分得土地。浮财的分配办法是除金钱、大烟交政府外,其余的完全分给贫雇农,对于军烈属给予适当优待。第五步是促进生产,巩固斗争成果,号召发家致富,保护并提倡新富农。^①

热河的检查与深入土地改革阶段,被称为是向地主阶级的全面出击,基本上解决了“夹生饭”问题,取得了重大成果。

第一,在农村中,特别是广大新收复区中,基本上摧毁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制度,没收了他们的土地和一部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分给了贫农和雇农。据统计,到1947年10月,全省已有300多万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1000多万亩土地,比清算分地时增加500多万亩。热辽地区连续三次向地主阶级开火,分散土地200万亩以上,比前期增加120多万亩。此外,还分得大量的房屋、牲畜、农具和粮食。仅建平县9个区111个村的不完全统计,共清算斗争出土地18.9万亩,房屋4606间,粮食121.8万斤,大牲畜3618头,猪羊1.8万多只和布匹、被褥、衣服等大批物资。这些财物分给农民后,改善了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

^①见《冀察热辽党代表会议决议》

第二，基本上摧毁了敌伪残余和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统治，确立了以贫雇农为主体的基本群众的阶级优势，农村阶级关系发生了明显变化。在农村中，基本上消灭了地主经济，保留了富农经济，绝大多数贫农和赤贫上升为中农，使农村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由过去的两头大中间小形式，转变为两头小中间大形式。在斗争中清洗了混进积极分子和干部队伍中的少数坏人，发现和培养了一大批作风正派，劳而久苦的贫雇农干部，形成了一支以贫雇农为骨干的基本群众阶级队伍。热辽区还开办全体区干、村干和民兵训练班，分期分批地轮训了千余人。

第三，加强了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凡是搞得好的地方都建立了党的组织、政权组织和群众组织，建平县在开展运动的130个村庄中，建立党支部93个，党员由100多人发展到550多人。建立民选村政权115个，村干部多数是土改积极分子。建立农会和贫农团112个，武委会92个，民兵基干队2581个，有1260人自愿报名参军，补充了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

热河在检查和深入土地改革中，还创造了许多发动群众的新鲜经验。如农民代表会议，主要是开展诉苦运动，把穷人怎样穷的，富人怎样富的，从他们自己的切身体验中讲出来，以典型人带动其他人，以典型村带动其他村。再就是介绍翻身体验，制订翻身计划，这个办法发动群众既快又好。

用较老区的群众发动新区的群众。北票蟒牛河东边的一个村，地主武装力量很强大，工作队站不住脚。一次派蒙民十一支队和北票县支队去打，又发动河西的群众1500多人一起去。打跑敌人后，河西的群众做河东群众的工作，把碉堡拆了，还发现了30多窖粮食，50里外的群众都拿口袋去装粮，把土地也分了。这样地主就再也不敢来了。

热西创造了“滚雪球”的经验。就是已翻身村子的农民去帮助还没翻身村的农民，一个村子一个村子的往前推，象“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多，效果很好。再就是工作团集中兵力打歼灭

战。分局工作团、地委工作团、县委工作团联合一起，一次就集中一二百人，一下子铺开十几个村子，把一个区突开，再拿这个区的经验去推动其他区的工作。这样规模大，声势大，有威力。

在工作方法上，既大刀阔斧，又精刻细雕，群众发动的充分。许多农民说：“这是一次天翻地覆的翻身运动。”地主威风不起来了，说“农民不组织起来是牛，组织起来是虎。”“一起来不得了，过去18年我才把他们制穷，他们两天就把我整穷了。”经过检查与深入土地改革，热河的农村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二、贯彻土地法大纲，全面开展平分土地运动

革命形势的猛烈发展，更需要深入土地改革，进一步发动农民群众，支援解放战争。因此，1947年7月至9月，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村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冀察热辽中央分局社会部长胡锡奎率领东北局代表团出席会议，并在会上作了关于热河土地改革的发言，比较系统、详尽地论述了热河的土地改革的斗争和经验教训。这次会议，肯定了“五四”指示以来的土地改革方针，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并于10月10日由党中央公布实行。

《中国土地法大纲》是一个彻底消灭封建制度的土地革命纲领。这个纲领规定，“废除封建性和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少，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个人所有”，征收富农的多余土地和财产。纲领还规定，“在平分土地时，应注意中农的意见，如果中农不同意，则向中农让步，并容许中农保有比一般贫农所得土地的平均水平为高的土地量”；“保

护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合法的商业，不受侵犯”。《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公布和实施，使已经进行两多年的热河土地革命斗争又跨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47年10月，冀察热辽中央分局组织千余干部、学生下乡，执行土改、扩军、征粮三大任务。当时，共组成3个工作团，北团500多人，由除懋庸、马洪带队，到叶赤线一带的热辽地区；南团400多人，由范儒生、郗占元带队，到热东、辽西地区；直属团一二百人，在赤峰附近。分局领导干部黄火青、欧阳钦、赵毅敏，热河省副主席李子光、杨雨民等，都分别参加了各团的工作。《中国土地法大纲》公布后，冀察热辽中央分局积极贯彻中央的土地政策，在建昌召开领导干部会议，传达了中央土地工作会议精神，调整了土改工作部署，确定了热东、热辽两专区为试点地区，派胡锡奎、李子光到北团，欧阳钦（杨清）到南团，加强两团的领导。并以两试点团为榜样，在全区普遍推开。这样，一个以宣传贯彻《中国土地法大纲》为中心的、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在热河大地上疾风暴雨般地迅猛开展起来（群众俗称“大风暴”）。

热东、热辽两地区，做为土改试点地区，是整个热河土改的一个缩影。这两区的平分土地运动，大体是分五步进行的。第一步，组成工作团，整顿队伍。北团以建平县为重点，组成中共建平县土改工作团委员会，由危拱芝任书记，郗占元、陈光任副书记，下边又成立了4个分团。南团以叶柏寿县为重点，也组成中共叶柏寿县土改工作团委员会，范儒生任书记，田志周任副书记，下边设立8个分团。然后，各自集中全县干部进行整训，学习中央土地会议文件，进行查阶级、查思想（后来发展到“三查三整”，即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整顿思想、整顿组织、整顿作风），开展“搬石头”，反右倾斗争。叶柏寿县537名干部，“易地革命”的48人，清洗33人，交群众处理14人，三项合计占干部总数的17.7%。建平县有干部230人，“易地革命”的35人，关押审查的11人，

两项合计占干部总数的20%。整顿队伍后，全体工作团员宣誓：“决心为贫雇农翻身事业立功，坚决遵守团规”，然后带着《告人民书》，分赴各区开展工作。

第二步，扎根串连，组织农村阶级队伍。工作团进村后，原来的党员、干部一律停职审查，由贫雇农接管领导权。工作团直接向群众宣讲土地法大纲，进行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用“滚雪球”的办法，逐步形成贫雇农积极分子队伍。

第三步，砍大树，搬石头，向封建阶级发动全面进攻。两县都采取了大拘捕的办法，即把全县所有地主、富农强行集中起来。叶柏寿县一夜之间抓捕2207人，并查封他们的全部财产。非试点县也采取统一行动，如喀左旗的后坎区，一次就抓捕1175人。然后召开斗争大会，群众诉苦，当场处决民愤极大的恶霸地主。会议规模一般都在数百至千人左右，少数有万人以上的。

第四步，挖财宝，填穷坑，分配胜利果实。全面拘捕地富分子后，一面由贫农团和人民法庭逐个审查他们的罪行；一面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开展挖财宝，分浮财活动。叶柏寿县分浮财粮食3.5万斤，银元1650元，大牲畜6725头，猪羊1.6万只，农具50多万件，共有9.7万多人分得了胜利果实。群众敲锣打鼓，喜气洋洋，互祝财宝还家。

第五步，查土地，定成份，平分土地，在斗地主、挖浮财的同时，即开始着手划定阶级成份和清查土地、平分土地的工作。阶级成份一般划分为8种，即雇农、贫农、下中农、中农、富裕中农、小地主、中地主、大地主。通过丈量土地，不仅查出地主、富农匿报的黑地，也订出了上中下三等土地标准，然后进行平分。在农业区，蒙汉一律平分土地，取消了蒙汉有别，照顾蒙民的政策。

平分土地是这次运动的中心环节，较有影响的平分方法有：
（一）“老牛赶山”。这种方法是在产量上平分，不在土地数量上平分。贫雇农分平地，产量高的土地，但数量很少；地主富农

分山地、产量低的地，但数量较多。有的地区，后者分地数量几乎是前者的一倍，致使无力耕作，一部分土地荒芜。（二）“两头打乱，中间匀和”。这种办法是在贫雇农自愿的条件下，与地主打乱，重新分配，中农的土地则抽出一部分，进行“匀和”，因此，侵犯了中农的利益。（三）“正二八、倒二八”。主要是地主富农分次等地八成，分好地二成；贫雇农分好地八成，分次地二成。（四）全部“打乱平分”。即打乱原来的土地所有权，将全村所有土地重新进行统一分配，在赤峰平庄等地推行过，实行的结果是严重地侵害了中农利益。（五）抽补办法。即在数量上抽多补少，在质量上抽肥补瘦。这个办法，弊病少，效果好，大多数地区实行了。此外，还有一些其他分地办法。

热河的土地革命，经过清算复仇、检查深入和平分土地等阶段的斗争，基本区80%以上从根本上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地主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被消灭，旧式富农的封建尾巴已被割掉，农民则已取得了进行生产的生产手段。同时，数以百万计农民被发动起来，形成了空前规模的群众大翻身运动，速度之快，范围之广，规模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通过这次运动，使几千年延续下来的封建剥削制度土崩瓦解，广大农民成了农村中的主人，真正掌握了政权，奠定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实基础。翻身后的农民踊跃参军，支援前线。4年来，热河共有16万多人参军参战，壮大了冀察热辽部队，有力地支援了人民解放战争。

土改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生产关系的最大一次变革，也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件大事。中国封建地主阶级是一个根深蒂固的剥削阶级，所以这场变革所引起的阶级对抗，也是空前激烈和复杂的。地主阶级企图维护即将覆灭的命运，在运动中进行了拚死抵抗与挣扎。因此，全省土改运动自始至终都与武装斗争相结合。土改进入中期和后期，敌伪残余势力及国民党收买的政治土匪，直接以武力破坏土改运动的顺利进行。全省各地反革命暴乱，杀害土改干部事件不断发生。1947年6月17日，经棚县委书记兼

组织部长赵芝瑞，率队在坤兑岭搞土改时，被地主武装包围，激战数小时，英勇牺牲，同时牺牲的还有梁敬等3人。据统计，仅经棚县被土匪、地主武装杀害的干部就达60多人。朝阳地区从1947年12月至次年1月，仅两个月时间，先后发生5起反革命叛乱，参加暴乱人数达230多人，打死土改工作干部和区干部6人，抓走干部群众10余人。宁城九区，平北四区和锦义二区的反动地主武装“红枪会”，于1948年1月21日夜发动叛乱，土改工作队长、平北县委组织部长刘乾庵等3名干部遭杀害。对于阶级敌人的暴乱活动，各分区地方武装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进行了有力的反击，除在土改中对一些恶霸地主、汉奸国特进行镇压外，还对一些反象已露的暴乱事件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对已发生的暴乱事件进行痛剿，打退了地主阶级一次又一次的武装进攻，保卫了胜利果实，使土改运动不断向纵深发展。

三、平分土地中“左”倾错误的发生及其纠正

1947年10月，高岗来冀察热辽区视察工作，一方面带来了东北地区在“煮夹生饭”、“砍挖”运动中放手发动群众的经验，给热河的土地改革烧了火，加了劲；另一方面也把“煮夹生饭”，特别是“砍挖”中一些“左”的东西带到热河来，一再批评热河地区的土改“右”了，“不彻底”，致使在土地法大纲公布前，热河的各个地方都程度不同地发生了“左”的倾向，如对地主吊、打、拖，乱杀人，侵犯中农和工商业等。但当时还是局部的，小范围的。1947年11月召开的建昌土改工作会议，则接受了这些“左”的主张，并有新的发展。

建昌会议是专门传达贯彻中央土改工作会议精神的 高干会议。当时，因各工作团已深入基层，正在积极行动，所以暂不召开全区大型会议，而由分局委员分别到各专区传达，并直接帮助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会议历时4天，总的说来，这次会议接受了土地法大纲的精神，检讨了过去土改中“右”的偏向，批评了

自满情绪和对成绩的过高估计，决定把土地改革进一步引向深入。会议还确定在土改中进行整党建党工作，使土改与其他工作结合起来。这些都是对的，应该肯定的。

但是，这次会议也存在着严重问题，主要是：

第一，对热河土地革命形势的估计不正确。土地法大纲前二年多的热河土地革命斗争，基本上是好的，正确的，成绩是大的。虽然也存在“不彻底”等右的问题，但这种“不彻底性”主要是由于战争环境和政策的不彻底性（如五四指示不提彻底消灭封建）造成的。特别重要的是，这种不彻底性随着战争的胜利和对政策理解的逐步加深，执行的渐趋彻底，已经得到一定的扼制和克服。恰好相反，许多“左”的东西却开始抬头，并且正在上升为主要倾向，建昌会议忽视了这个基本事实，却过于夸大过去工作中“右”的错误程度，一味地反“右”，以致把一些正确的东西也当成“右”去反，却不提防“左”或反“左”的问题，这就在干部中形成许多宁“左”勿右的思想。建昌会议后，高岗等亲自下去检查土改工作，得出了“热河土地问题十分严重，不是大部地区基本完成了任务，而是大部地区基本没完成任务”^①的错误结论，认为“许多地方的农会是地主富农操纵的假农会，斗争是假斗争，干部是假干部”，^②为“左”倾错误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作用。

第二，对热河土地革命的现状没有很好研究，就急忙去做。在全国土地会议上，刘少奇在结论时曾指出：“东北热河是个新区，如何作还可研究。”^③实际上，建昌会议没有很好地研究热河的现状，就急忙下去做了。在当时，热河土改的情况也是比较复杂的，有基本区，有新收复区，也有接敌区和边沿区；在经济上，有农业区，牧业区和半农半牧区；在工作现状上，有搞得彻底的，有不彻底的，有很不彻底或搞乱了的，也有空白区；在民

①②冀察热辽中央分局《关于热河土改中的一些问题》，1948年2月11日。

③黄火青在冀察热辽中央分局土改总结会议上的报告，1948年5月。

族上又有蒙汉之分。在贯彻土地法大纲时，应该既普遍贯彻，又区别情况，进行分类指导。如有些老区已搞过四五次了，只需要按新政策调剂一下就可以了，没有必要重新搞。但会议却把很不彻底和空白区估计过多，来个全盘重搞，打乱平分，犯了扩大化的错误。

第三，提出了一些与中央土地会议精神不一致的东西。中央规定要区分地主、富农，抽肥补瘦，抽多补少是对富农的。建昌会议却“通过‘地富不分’，‘抽补是对中农以下’的结论”。^①并说“土地法大纲（对）地富加以区别是对外宣传的，对内不区别”。^②还根据这个精神，于1947年11月19日给热中地委发了电报。这些都是直接违犯中央政策的，扩大了打击面，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据统计，一般地区打击面占总户数的13~15%，占总人口的20~25%。最严重的地区占总户数的21~27%，有的地区甚至达到37%；占总人口的34~53%。

第四，片面地强调一切权力归贫雇农的“贫雇农路线”。形成昨天是农民，今天当法官，决定政策，掌握生杀予夺大权，使贫雇农完全左右了运动的进程。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固然使群众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给地富封建制度以毁灭性冲击；另一方面，也由于失去党的领导，农民本身所固有的弱点产生出一些消极因素，导致破坏性很大的过火行为，如“老牛赶山”、“打乱平分”等，就是农民本身固有弱点的顽强表现。在干部问题上，强调“跳圈子”（即跳出依靠少数干部和积极分子的圈子），“搬石头”（即将家庭出身高的干部一律搬开），使许多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遭受打击、排斥，有的甚至致伤致残，遭杀头。在中农问题上，除“抽补”以外，还有“掐尖”、“磨尖”、“自动坦白”、错划成分等多种形式，几乎所有的中农都受到不同程度的侵害。建平县在大风暴中，仅扣押中农一项就有1535户，占总

①黄火青在分局土改总结扩大会议上的结论。

②黄火青在分局土改总结扩大会议上的报告。

户数的4%。侵犯工商业更为普遍，乡村作坊几乎一扫而光，城市工商业被侵犯的据凌源、北票、朝阳等地统计，最低的占30%，最高的达70%，使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受到很大影响。

第五，忽视民族政策，汉蒙地区不分。在蒙古民族居住区也要搞土改，但应与汉族地区有区别，打击面应更小些。牧区的经济和农区是不同的，农区的土地是生产资料，是不动产；牧区的牲畜既是生产资料又是生活资料，有很大的不稳定性。牧区的阶级差别不明显，不象农区那样好划分。应该根据牧区阶级结构和畜牧业生产的这些特点，制定适合牧区情况的土改政策。建昌会议及其以后改变了热河一贯慎重对待蒙古民族的政策，把在汉族区中许多‘左’的做法也搬到牧业区，如搞掉了90%以上蒙族群众信仰的喇嘛庙，在牧区搞“政改”，划分所谓贫牧、中牧等，使许多蒙族群众对党的政策产生不信任感，牧业生产受到损失。据估计，这期间牲畜数量下降50多万头。

1948年初，冀察热辽中央分局领导机关已意识到上述错误的严重性及其造成的影响。任弼时《土地改革中几个问题》的报告、毛泽东为党内起草的《关于目前平分土地运动中几个问题的指示》和东北局《关于平分土地运动中几个问题的指示》等一系列纠正“左”的错误的文件下达后，冀察热辽中央分局于2月召开会议，详细讨论了对中农的政策，并于2月17日发出了《关于中农问题给各级党委的指示信》，指出了侵犯中农利益的严重情况，强调团结中农的重要性，规定中农不动，纠正地富不分、乱打乱杀的错误倾向，对已打击的中农和工商业，要在精神上道歉，在经济上赔偿。不久，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全面复查与纠偏工作。

复查纠偏也是一场斗争。开始有些执行过“左”的错误做法的同志思想转不过弯来，产生一定的抵触情绪。但是，大多数人还是赞成“左”的错误做法的，纠正“左”的错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心愿，是大势所趋，所以，许多地方行动快，效果好。

建昌县委抽调了4000多人的复查纠偏队伍，对中农错划成分的纠正过来，错拿出土地、财物的，一般都退还了原物或折价赔偿。侵犯工商业的也进行了道歉赔偿。如建昌街土改时，把石计昌摆的小摊也给分了，土地复查后区政府决定赔偿损失3000元，并由区长亲自将赔偿款送到石计昌的手中，他感动的流了泪。

经过复查纠偏工作，许多错误偏向得到迅速纠正，取得显著成果。打击面户数由原来的13~15%，缩小到5~8%，人口由原来的20~25%，缩小到10~13%，从而使热河的群众运动走上了正轨，人民情绪及社会秩序均走向稳定。5月，冀察热辽中央分局又召开了土改总结扩大会议，由主持分局工作的副书记黄火青作了报告和结论，全面地总结了热河土地改革运动的成绩和经验，着重指明了“左”的错误的发生、发展、危害及其严重教训，说明了土改复查和纠偏的成果，并部署“今后当将土改压倒一切的思想让位于生产建设压倒一切”，这就使热河基本区的土地改革运动结束了下来。

四、土改中的整党建党工作

热河地区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经历了一个比较曲折复杂的过程。“八·一五”解放后，曾提出在群众运动的基础上，大量发展党员的方针，当时热西发展了近万名党员。但是在当时情况下，提出大量发展而没有提出应慎重发展，因而发生了盲目追求数量，忽视质量，满足于轰轰烈烈，缺乏细致而踏实的工作，使一些地痞流氓、地主走狗，甚至警察、特务混进党内来。而一部分正派农民积极分子，也因为只顾发展，不加强领导与教育而不能发挥应有作用。承、赤撤退后，在敌人进攻面前，有些地区曾一度遭受不少损失。敌占区的党员绝大多数丢掉了关系，少数的消极乃至投敌叛变。游击区除了丢掉一大部分党员外，又审慎地单线发展了一些党员，在后方经过部分洗刷，同时也发展了一些党员，这一时期，党员总数量比前段减少了，但经过了一次严峻的

考验，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进一步坚强起来。1947年夏季攻势后，群众运动转入检查与深入土改斗争，进一步发展了党的组织，吸收了一批成份较好的新党员。平分土地运动一开始，对原有党支部毫无区别地采取“冻结”与“一脚踢开”的方针，对党员的缺点与错误，不分轻重，也不区别其属于党员本身还是属于领导方面，一概交给贫雇农处理。于是，发生了“公审”党员、斗争党员，扣押吊打，甚至有的党员被打死等严重现象，这给广大党员群众的情绪以极大的损害。他们感觉党不要他们了，过去努力工作的结果反而遭受打击，因此灰心丧气，情绪一度低落。正由于在运动中“抛弃”了这些党员，放弃了这一批坚强的骨干，不仅给运动带来很大损失，而且使党员没有机会在运动中得到锻炼，对党的组织建设也造成不应有的损失。只有个别地区的几个支部，选派自己的党员参加了贫农团的领导。后来经过纠偏，党的组织生活恢复正常，党员队伍也有很大发展。

经过上述各个时期的发展，热河地区党组织的基本状况是，共有党员26500多名（不包括热西和热南），占全省人口的5.6%。其中热东9876名，热中7016名，热辽5842名，昭盟3743名。党员成份，贫雇农约占70—80%；中农党员约占20%左右；地富出身的党员约占10%。这些党员和党的基层组织，在热河的革命斗争中，起到了先锋模范作用。其中，有不少的同志，在对敌残酷的斗争中表现得很坚决，甚至流尽了最后一滴血。通过各个时期党的工作，基本群众已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形成一股强大的革命力量。但是，在党的组织发展与建设上，也存在一些问题，有的还比较严重：（一）思想上关门主义，对群众缺乏正确认识，存在不信任或信任不足，因而，不敢放手大量发展党员，以至使党员数量很少。（二）发展的不够平衡，在交通要道上，城市集镇周围，群众运动较热烈地区，党员比较集中，而广大偏远乡村，几乎成为“白点”。（三）党员的成份结构也存在一些问题。绝大多数农村党员是有租佃关系的“雇青户”、“佃

户”，没有吸收农村工资劳动者，成份比较单一，缺乏吸收各阶层、各方面积极分子和骨干力量加入党的组织。（四）党员的发展与教育巩固工作没有很好结合，只重视发展，不注意质量及加强教育，有的有特权思想，以为党员可以掌权，坐天下，多分胜利果实。也有少数阶级异己分子与特务分子混进党内。

为把共产党建设成为由先进分子组成的党，使党的组织真正成为战斗堡垒，根据党中央及东北局的指示，以及过去建党工作的经验与教训，在平分土地后期，开始了新时期的整建党工作。这次整建党，在基本区采取了“公开建党”的方针（在接敌区和边沿区还是秘密建党），使整党工作与群众运动结合，并直接依靠群众的力量发展和建设党的组织。在基础较差的地方，先采用个别慎重地吸收党员，建立组织后实行公开展；在基础好的地方，先整顿原有支部与党员，在整顿的基础上发展新党员，并着重于发展的方针；在没有进行土改的新区（包括过去的游击区），一般采取个别慎重吸收的方针。

鉴于过去的教训，整党中提出了坚决反对经验主义的问题，并清算了经验主义对党的工作的极大危害。改变过去思想上的片面性，盲目性、悲观论以及各种“土教条”，注意吸收新事物，克服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状态。在工作方法上，敢于创新，反对生搬硬套。要求广大党员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学习各地有益的经验。

整党中还进一步开展了党内民主和批评、自我批评，检讨过去工作中的失误和党员干部与群众关系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公开党的组织，接受党外群众对党的政策与党员干部的批评监督。经过整顿，除了那些真正为坏分子所操纵或大多数党员是坏分子的支部不予恢复外，其余的全部恢复正常的组织生活。对那些错误严重必须处罚以至不可教育的亦清除出党，对一般缺点错误进行了批评教育，并给予改正错误的机会。过去运动中对党员处分不当或处分过重的，取消或减轻了处分。这次整党，从政治上、思想

上、作风上纯洁了党的组织，提高了党员的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建立了支部工作和各级党委的党务工作。在恢复整顿组织的同时，在群众中公开发展党员，壮大了党的队伍。据统计，到1948年底，全省有党员76828名，组建了5137个支部。其中农村党员65670名，占农村人口的1.34%，农村支部4644个，占行政村的67.2%。省属12个大小工矿企业发展党员64名，占工人总数的9%。北票煤矿建支部17个，发展党员352名，占工人总数的8%。

第九章 参加与支援辽沈决战

热河全境解放

第一节 战略决战前的形势

一、摇摇欲坠的国民党反动统治

冀察热辽部队1947年夏、秋、冬三大攻势，给热河的国民党军队以沉重打击。在1947年的一年中，冀察热辽所属部队艰苦作战1596次，恢复县城19座，歼敌64851名，其中生俘校级以上军官52名。缴获各种炮320门，破击铁路344公里，炸桥120座，使国民党在热河的反动腐朽统治更加摇摇欲坠。

国民党侵入热河以后，实行了极其野蛮的反动恐怖统治，处在国统区的热河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首先是野蛮的军事镇压和统治。美机化装备的国民党十三军驻承德，半美机化装备的九十三军驻赤峰，各个县城、重要集镇及铁路沿线均驻有重兵。据不完全统计，国民党在热河的正规军、地方保安队和土匪武装开始时总计在10万人以上（不包括辽西锦州地区），后来由于被消灭和调走，已不足5万人。1948年1月，国民党为挽救其在热辽战场上的失败，又重新调整战略部署，成立冀热辽边区司令部，由范汉杰任司令官。国民党在热辽战场上的总兵力又增加到十四五万人。这些国民党军队所到之处，疯狂拉伕、抓兵、征粮，奸淫烧杀抢，无所不做，群众愤怒地称他们是“五阎王”：“中央军好似五阎王，抓丁抢马又抢枪。追的鸡飞狗跳墙，男的挨打女遭殃。好坏东西一扫光，临走还烧了咱

的房。”^①国民党政府规定，18岁至40岁的男人都要入伍当兵，并利用保甲把壮丁登记起来，由各县、区署下令，指派到人，不去就抓，见到壮丁就抓。一次，国民党热河省代主席于国桢（民政厅厅长），穿便服到承德街吃馆子，竟被十三军特务营抓去挖工事；十三军八十九师的一个副团长，穿便装到火车站闲逛，也被抓去“点名”。这些人当时有苦难言，直到抓到部队里，一经解释证明，才知道闹出了大笑话。强征民工，抢修工事，是热河国民党军事统治的一个重要方面。光承德一地，即强征数以万计的民工，修筑了150多个母堡，500多个子堡，在头道牌楼旱河内栽上铁轨墙，构成了纵深的防御工事体系。为修筑工事，将许多树木砍倒，房屋拆除，甚至老人的棺木也被抢走。仅承德一地就拆毁老省府、北大营和普陀宗乘之庙（部分）等600多处，修成了所谓“固若金汤”的“万里长城”。国民党官兵杀人不眨眼，制造了多起骇人听闻的惨案。在承德县的白旗、大甸子，以“私通八路”为名，一次就惨杀40多人。在兴隆县的鹰手营子，一次就被国民党和还乡团用铡刀铡死或刺刀挑死20多人，并把人头割下来挂在树上，血淋淋地挂了一大片。国民党军队在热河的反动罪行真是罄竹难书。

国民党在热河的政治统治腐败透顶。他们完全站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边，处处维护他们的利益。承德街的大地主关安侯被委任为少将军衔，官僚绅士尹锡三被委任为县参议长，艾克让被委任为商会会长，平泉街的大地主李浩轩也被委任为少将街长。国民党在热河的统治主要是特务统治，除军队专门搞情报特务的情报室、别动队、谍报队外，还有中统局、军统局和国防部保密局的特务组织，还有专门对付共产党组织的“防毒队”，警察、特务到处横行，查封进步刊物，迫害进步分子，大抓所谓的“思想犯”，“奸党嫌疑犯”，使人民没有任何言论自由，承德

①1948年春流传在热东一带的民谣。

师范的进步师生，就曾多次遭到审查逮捕。国民党统治的1947年，还在承德街演出了一出“还政于民”，竞选国大代表的闹剧。十三军军长石觉的夫人张馥权，花费法币40亿元贿选了一个国大代表（每投张馥权一票，可领到一张餐证，到著名饭馆大吃大喝一顿），又竞选中央立法委员。隆化县代表李化成，为争当中央立法委员，曾买了棺材抬进会场，也是无济于事，中央立法委员的头衔还是被张馥权夺去。就是在国民党内部也是明争暗斗，险象环生。隆化县长夏永盛，曾任过十三军少校团长，与十三军资料室主任韦作云有隙，韦就以“守城失利”为名，密报石觉，没经任何审讯即将夏处决。十三军在承德期间，还大量破坏古建筑，盗窃文物。军部驻进著名的避暑山庄，许多古建筑变成了军营和枪械库。11间宝物馆所藏之千余件清朝康乾年间古物，被洗劫一空。藏经楼所藏的藏贡品《大藏经》4种120余函，在日本投降时已经失散，后被著名历史学家吕振羽精心收集保存下来，竟被国民党兵烧毁，全国闻名的文庙的各种祭品，也被拿到十三军军部，外八庙的铜佛和金瓦，也被盗去甚多。国民党在热河的政治统治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

国民党在热河的经济统治更加厉害。不但国民党的高级官员发了“接收财”，成为“五子登科”^①的新贵，一些地方的土豪劣绅也乘机盘剥人民，大发其财。以赤峰为例，国民党仅占领8个月时间，以各种名目敲诈7.69亿元（国民党流通券），平均每户负担9.6万余元。其中，国民党赤峰县党部向商会借款5000万元，由商会向各商铺摊派，收缴武装自卫款4500万元，恢复发电厂借款400万元，修筑600个碉堡，摊款1.2亿元。至于加到每户上的零星杂捐就有三四十种之多，敲诈的费用无法统计。滦平县两间房乡有12保，每保一年要交纳捐税65500斤小米，每月还另送军马料10斤、草10斤、柴15斤。与此同时，热河70—

^① “五子登科”即买金子、占房子、吃馆子、玩戏子、嫖窑子，是群众对国民党官员贪污腐化、荒淫无耻生活的讽刺。

80%的工矿业，被国民党官僚资本侵吞，交通、商业、金融等经济命脉也被官僚资本控制。国民党在承德办了合作社、粮店等14个垄断性企业，又强征6家粮店的粮食507石，天益兴粮店就因被勒索慰问伤员捐2亿元流通券而破产停业。承德的民族工商业已奄奄一息，原来有大小千余家工商业的南营子大街，只剩数家商店维持局面。国民党十三军军长石觉的侄子石名芳，从隆化强购粮食，用汽车运到北平出售，再从北平买消费品到承德卖，大发横财。1948年下半年，国民党实行所谓币制改革，发行金元券以代替法币和东北九省流通券，一次就从承德街掠夺白银9000多两，银元3500多块。热河国统区的经济，通货膨胀，危机严重，已走向彻底崩溃。

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造成热河国统区灾荒奇重，土地荒芜，民不聊生。就连国民党统治下的《大公报》也不得不承认：“热河5个县（隆化、滦平、丰宁、平泉、承德）40多个乡的老百姓中，有90%已经陷入断炊危机，现在那里只剩下观音土、树皮、草根没有吃光。”“统计5县非饿不活的有20万人。”^①

面临着饥饿和死亡，热河国统区的各阶层人民纷纷起来反内战，反饥饿，为生存而斗争。首先起来斗争的是学生和知识分子。早在1946年10月，朝阳县中学为驱逐不学无术，贪污自肥的国民党校长张玉田，展开了一个月的罢课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与此同时，凌源县的小学教师开展罢教斗争，也取得了驱逐贪婪无厌的县教育科长，补发欠薪的胜利。1947年的三四月间，承德二仙居桥北出现一张名为《火炬》的壁报，抨击国民党弊政。有一期画了一个小学教员，擎着只破饭碗，作讨饭姿态。口里喊着：“我们要吃饭！”在群众中，特别是教师中产生很大影响，这张壁报是由承德师范的进步学生主办的。后来，在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曾改油印秘密发行，它确实象一只火炬，在国民

①1948年4月24日，天津《大公报》。

党反动统治的黑暗天空中，增添一点光明。

相继而起的是工人罢工斗争、饥民抢米风潮和农民的抗捐反抓丁斗争。北票煤矿被国民党垄断资本占有后，残酷剥削工人，榨取高额利润，工人无法生活。1947年4月，冠山矿和台吉矿的工人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有2500多人参加，终于取得胜利。当地的解放区军民几次破坏北票煤矿都没成功，后与工人内外配合，一举炸毁发电厂，使整个煤矿陷于瘫痪。工人、农民、市民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与学生的斗争会合在一起，形成了第二条战线，有力地配合了解放区军民的作战，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

二、夏季攻势，承德外围解放

到1948年初，国民党在热河的统治区域，已被迫收缩到两条孤立的点线上。一条是以承德为中心的，由平泉、承德、隆化、滦平组成的通往北平的公路线；一条是以锦州为中心的，由义县、锦州、锦西、兴城、绥中组成的通往北平的铁路线。两条线互不衔接，又处在解放区的重重包围之中，完全处于被动挨打地位。

与国民党统治区相反，冀察热辽解放区经过一年多的反攻作战，不仅解放区扩大，人口和土地面积增加，而且群众的觉悟程度也有了显著提高。由于土地改革的广泛深入开展，大大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支援解放战争的积极性，生产发展，后方巩固，踊跃参军，积极支前，为革命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这期间，冀察热辽部队的武器装备、人员数量以及战斗素质等方面也都有显著增长。到1948年2月，冀察热辽军区所辖主力军、地方军和县支队武装已达30多万人（包括八、九纵队），这对于已成惊弓之鸟的国民党在热河的十几万军队来说，已形成压倒优势。1948年1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以后，冀察热辽部队又以两个多月时间进行了以诉苦、三查为内容的新式整军运

动，和以“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为目标的大练兵，使部队士气更加高涨，战斗力大为增强。2月，又组成第十一纵队，由贺晋年任司令员，陈仁祺任政委。下辖3个师，即独一师改编为三十一师，师长欧致富，政委谢镗忠；独三师改编为三十二师，师长周仁杰，政委陈文彪；独七师改编为三十三师，师长陈宗坤，政委谢明。为保证大力支援前线，3月6日又成立了冀察热辽军区后勤司令部，由冀察热辽军区副司令员、政办处主任、热河省主席李运昌兼司令员、政委，老红军张令彬任副司令员，热河省副主席罗成德兼副政委。之后，各军区也相继成立了后勤司令部，先后两期组织了50个团的二线兵团，补充和加强了主力部队。5月5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任命黄克诚任冀察热辽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区政委，加强了领导力量。

为使华北、东北和冀察热辽三大战场连成一体，配合华北野战军，钳制河北、热河之敌北调，掩护东北主力休整，冀察热辽部队奉命南下作战。5月1日，冀察热辽军区司令员程子华，率“前指”和第十一纵队，从朝阳地区出发，直扑承德。13日，三十一师指挥九十三团首战承德北面仅几十公里的象鼻子山，以很小的代价攻破明碉暗堡，坚固设防的敌阵地，歼灭十三军第四师的一个工兵营，不仅打响了夏季攻势的第一仗，还取得了攻坚战的经验。

象鼻子山失守，敌人以为马上就会攻占承德，所以，承德敌人惶恐终日，一夕数惊。“前指”却出敌不预，指挥部队绕过承德，直插隆化，5月24日打响隆化战斗。

隆化位于承德西北，与承德成犄角之势。伊逊河从城西流过，河的西岸有一座苔山制高点，敌军在山上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地形险要，易守难攻。1947年的夏季攻势中，冀察热辽部队曾经打过隆化，未能攻克，造成很大损失，敌军就把隆化守军捧为“英雄”，并吹嘘隆化城“固若金汤，坚不可摧”。隆化守敌为八十九师二六五团（欠一营）及师属工兵连、战防炮连和保

安团共2000余人。“前指”的攻城部署是：以三十一师担负主攻，在炮兵旅的配合下，夺取敌苔山阵地。三十二师一个团从城东北方向攻击隆化中学，另两个团为纵队预备队。三十三师从城东南方向突击，支援三十一师夹攻苔山，掩护三十二师攻击隆化中学。独六师（师长韩梅村、政委钟辉）位于高寺台一线，阻击承德增援之敌。攻击开始后，先用炮火摧毁敌苔山制高点上的大部工事，步兵也攻占了县城大部，但在隆化中学遇到敌军顽强抵抗。敌人在校东北角外侧的旱河上筑起一座桥形碉堡，以猛烈的火力封锁进入学校的道路，两次派战士去炸碉堡，都中弹牺牲。班长董存瑞身带炸药包，和两名携支架的战士第三次炸碉堡。两战士中途中弹身亡，只有董存瑞冲到碉堡跟前，但没有支架，他毅然用手托起炸药包，将敌碉炸毁，打开了部队前进的通道。到26日凌晨3时，历经21小时，除敌团长汤池带一部残敌潜逃外，余敌1600余人全部被歼。战后，为表彰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的巨大功绩，将隆化中学命名为存瑞中学。三十一师副师长李荣顺也在战斗中英勇牺牲。



红旗插上隆化敌堡残垣。



董存瑞烈士遗像

隆了解放，使承德的守军更加惊恐不安，赶紧收缩兵力，以图固守承德。5月26日，平泉守敌八十九师二六七团两个营弃城西逃，在上、下板城之间被地方部队截击，歼敌406名，收复平泉县城及上、下板城两镇。全国女战斗英雄郭俊卿就是在收复平泉的战斗中立功受奖的。^①27日，安匠屯（新滦平）守敌八十九师二六六团一部弃城东逃，在张百湾、三间房之间被地方部队截击，歼敌529名，收复新滦

平。29日，又收复老滦平县城和距承德仅10多里的双塔山、三岔口，逼近承德。与此同时，丰宁守敌热河保安纵队2000多人，也弃城南逃，在丰宁、怀柔间被冀热察部队全歼，遂后收复丰宁。冀东部队击毙平泉惯匪张其昌，歼敌682人，收复青龙。

至此，夏季攻势结束，共解放6城，歼敌7000多人，承德外围都已解放。

^①郭俊卿。女，1930年出生在热河省凌源县三十家子北店村。1944年冬，跟随母亲讨饭流落吉林西，1945年女扮男装参加我军，1946年6月入党。5年时间，经过无数次的战斗洗礼，她荣立特等功一次，大功三次，小功四次，1950年被授予“全国战斗英雄”的光荣称号，誉为“现代花木兰”。



女战斗英雄郭俊卿

三、热南战役，再 断北宁路

热南战役，是在热河南部及冀东地区进行的一次有名的战役。当冀察热辽部队横扫承德外围，敌人妄图“固守承德”的时候，冀察热辽部队再一次出敌预料，挥师南下，同华北野战军的第二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委罗瑞卿，参谋长耿飏）一起，发起了热南战役。

进入1948年以后，全国的战局发生了根本

性的变化。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由120余万人增加到280余万人，且士气高昂，军心振奋；国民党军队则由430万人下降到360万人，其中用于第一线的机动兵力只有174万多人，而且士气低落，军心动摇。国民党军队虽在数量上还占有一些优势，但质量上亦不如解放军。国民党军的5个战略集团，被分别牵制在西北、中原、华东、华北、东北5大战场上，处于动摇、徘徊、被动、挨打的境地。这些情况说明，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的最后决战的时机已经到来。党中央全面地研究了5大战场的情况，决定把战略决战的突破口选择在东北，首先歼灭东北境内的敌人，解放东北全境。华北野战军则需进行战略配合，全力钳制关内敌军，不使出关，以便顺利地解决东北问题。热南战役主要是为这个战略目的发动的。

参加热南战役的华北野战军第二兵团，由三纵队四纵队和四旅组成。4月中旬，第二兵团突破敌人在平绥路上的封锁，楔入热南兴隆、滦平一带山区，与冀东军区独四师、独五师会合。5月29日，三纵队从兴隆县北双洞、六道河一带出发，直扑古北口、石匣、密云，做钳制性攻击。四纵队和四旅从兴隆县半壁山、遵化县马兰峪一线出发，迅速东进，直指唐山。6月14日攻克滦县重镇榛子镇，歼敌7000余人，逼近唐山市郊区。这时，敌以为解放军主力在东线，匆忙从平古路密云、古北口一线调集8个师的兵力向东增援，企图以东西夹攻之势，一举破坏冀东根据地，打通华北与东北的交通。平古路敌军东调，西线空虚，华北野战军三纵队和冀东军区独四师、独五师，向平古路各线之敌发起进攻，19日克石匣、小营，包围古北口，歼敌1800余人，截断由怀柔到滦平近200里的平古路，使北平、承德间的交通完全陷于瘫痪。

西线攻势，完全出乎敌之预料，又急调东援的5个师回援，这样就又造成滦东空虚。“敌人倾巢出去援助平古线，却把屁股翘起来让我们揍。他们在北宁线上只剩下了少数护路守点的部队。”①华北野战军四纵队十一旅乘势将昌黎包围，程子华率“前指”及十一纵队，从平泉小寺沟、党坝一线出发，急行军奔袭昌黎。23日兵临昌黎城下，24日拂晓开始扫敌外围的战斗。

昌黎守敌为交警第三支队司令部及其所属的第八总队全部；第五总队一部、保安二十一团及反动伙会武装共4000余人，倚仗美机装备和坚固的城墙，甚为猖狂。十一纵队以三十一师（由炮兵旅配合）担任主攻，三十二师攻取张辛庄和昌黎城南之火车站，三十三师攻取北戴河，阻山海关援敌。四纵队十一旅在城西滦河一线阻敌增援。战斗打响后，25日晨6时开始攻城，中午2时攻占全城，活捉敌交警第五总队少将总队长周铭勋、少将参谋长薛涤

①耿飚：《戎马生涯》，第283页。

然，歼灭交警总队3000多人。

昌黎一战，斩断北宁路，在敌人的大动脉上插了一刀，惊恐不安的华北傅作义集团集中西路的九十二军2个师，八军2个旅和九十五师向昌黎扑来，又集中东路暂六十师、四十三旅到北戴河以西，妄图东西夹攻冀察热辽部队。还没等两路敌军会合，冀察热辽部队早已神速地撤出昌黎，返回热南山区。热南战役（包括滦东）也就胜利结束了。

热南战役是在热河人民的大力支援下进行的。早在1948年3月，冀东、平谷、蓟县、遵化和热西的滦平等县的上万名民工，就往战役大后方热南的兴隆县运送粮食和饲草，共储备粮食3000多万斤，饲草280多万斤。又动员民兵组成担架队、运输队，老人、妇女、儿童组成支前小组，帮助做饭、护理伤病员。仅兴隆县就出动4万多人。热河人民为热南战役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第二节 解放区的各项建设

一、大生产运动与工农业生产初步恢复

在历史上，热河就是个以农业、畜牧业为主的地区，工业、商业很不发达。日伪统治时期的殖民主义掠夺和战争的破坏，又使很不发达的工农业生产走向破产。日本投降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工农业生产，特别是工业生产和商业贸易有过一度的发展与繁荣。热河省政府积极鼓励发展农业生产，分散土地，解放农业生产，1946年粮食产量达110多万吨（不包括辽西），是个丰收年。畜牧业也有了发展，仅据22个县统计，1946年底有马骡4.5万匹，牛54万头，骆驼3000峰，驴16.5万头，羊104万只，猪55.6万头。热河省政府还采取投资或补贴的办法，恢复和发展地方工业。1946年8月前，铁路、公路等交通业投资边币2.3亿

元，曾恢复了锦承路和叶赤路的通行；邮政电信业投资边币8000多万元，保障了主要城镇邮政、电话线路的畅通；采矿业投资边币5亿多元，重要的矿山恢复了生产，日产煤470多吨（不包括北票）、铁80多吨。商业也出现了向上发展的兴旺景象，仅承德一地，解放前商业倒闭，市面萧条，只有349家商户，1946年8月发展到4450余家，出现了物价稳定，市场繁荣，人民生活有所改善的局面。国民党大举入侵热河后，占据了锦州、北票、朝阳、赤峰、承德等工商业较发达地区，解放区的工商就微乎其微了。

解放区的生产，主要是农业生产、畜牧业生产和军工生产。在农业生产上，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是封建势力与封建剥削制度，要发展生产，就必须进行土地改革，推翻封建土地关系，解放生产力。所以，在热河解放区普遍进行的土地改革斗争，是发展生产的最大推动力。同时，为着发展生产，巩固解放区，冀热辽中央分局在1946年12月下旬，发出了《关于开展1947年大生产运动》的指示，要求各地在旧历前年订出明年大生产计划，提出生产任务与动员口号；大生产运动主要是发展农业，提高粮食生产，发展家庭纺织与植棉，争取穿衣自给；蒙民地区注意发展畜牧与盐业；提倡劳力与资力的广泛合作，组织农民的劳动互助，开展改造“烟、二、懒”^①运动。1947年2月，热河省政府也发出了《关于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指示，提出了“要使人民从经济上完成翻身，必须全体蒙汉军民用极大努力开展大生产运动，广泛发展国民经济，以期三五年内达到丰衣足食。”

在“勤劳起家，发财致富，支援战争”的号召下，热河解放区人民生产积极性高涨，普遍开展起大生产运动。在运动中，无论男女老幼，凡能劳动的都动员下地生产；还组织了拨工换工，记工还工等多种形式的劳动互助组织，发挥互助合作的优越性；

^①即改造烟民、二流子、懒汉。

发动儿童团拿懒汉，抓烟鬼，改造二流子；有的地方还开展了运盐、制硝、采集和各种作坊等副业生产，这些都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林西县还修了三条水渠，受益面积有680多亩。

1947年的大生产运动虽取得一定成绩，但总的看这一年的农业收成并不好。热河解放区有耕地2000万亩，粮食产量只有10亿多斤，征收公粮2.4亿斤。这一方面是由于自然灾害严重的，和战争的破坏等客观因素造成的；另一方面，在土地改革中忽视了对生产的领导，生产关系的大变化所引起的波动和一些“左”的错误，致使一些农民对政策产生疑虑，不敢勤劳致富，烟二懒户不事生产，吃喝浪费等，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生产力的破坏，影响了粮食产量。

由于1947年的严重歉收、土改分浮财中的严重浪费和征收公粮过多(人均60斤)，1948年全省大部分地区发生了灾荒，到五六月份灾民达230万人以上。最严重的是热中，全区120万人，灾民达90万以上，占75%。承德县一个月饿死600多人。

为纠正土改中忽视生产和分浮财后一度出现的大吃大喝等浪费现象，渡过严重灾荒，1948年2月土改纠偏开始后，各地也将工作中心由土地改革转为春耕生产，并将各地参加土改的干部和工团转为春耕工作团，省县干部也纷纷下去，加强对生产的领导。

首先是采取紧急措施，制止了灾荒的发展和蔓延。1948年6月3日，冀察热辽中央分局和政办处发出指示，号召全体党政军民动员起来，为生产自救，消灭灾荒而斗争。接着又发出第二、第三、第四号节约渡荒的紧急通知，决定精减机关勤杂人员和车马，取消小灶，禁吸纸烟，并开展节衣缩食和个人募捐活动，后方部队机关、企业多吃野菜稀粥，每人每天约1至4两小米，共节约30万斤以上，支援了灾民。热河省政府也作出了《关于生产救灾工作的决定》，发出了“紧急动员起来，救灾、救命”的号召，并发放无息农业贷款15亿元，发放救济粮、盐、棉折米1100万斤。各专署及各县发放200万斤。同时，省政府还将存粮1700万

斤，又从热北一些丰收地区调进粮食500万斤，降价20—30%向灾民出售。这些措施，使灾荒得到控制和缓解。生产救灾的主要措施是生产自救，在全省开展了大搞副业的运动，主要是组织纺织和跑运输，发展副业和商业，跑运输的收入颇大，仅昭乌达盟专区就收入小米92万多斤。因此，该专区没饿死一个人。群众高兴地唱到：“八路军，真不错，保护商业号召作。发贷款，叫发展。努力经营勿迟延。跑冀东，走赤峰，发家致富乐融融。”

其次是制定和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力发展的政策和措施，消除农民对发家致富的顾虑，进一步调动生产积极性。这些政策和措施主要是：

第一，确定与巩固农村各阶层财产私有 权。对已经分配了一切封建的土地财产，承认其为个人私有财产，一律予以保护，不得侵犯；允许个人自由经营和处理（但不准土地买卖），并发给地照、房照，确定地权、房权。冀察热辽行政办事处和热河省政府先后发布了关于颁发地照的命令和指示。到1948年11月，热河老解放区的数百万农民欢天喜地领到地照，敲锣打鼓庆祝翻身解放。这一措施，进一步巩固了土地改革的胜利成果，消除了农民怕发财，怕再斗的疑虑，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热情。在没发地照前，“穷人翻身得了地，不发地照不坦然，有的吃喝瞎浪费，没有心思搞生产。”发了地照后，“土地分好不再斗，马上发照确地权。得了地照心欢喜，永远为业不再变。”^①另外，对土改中错分错斗的土地财产进行了补偿，补偿后地权、财权不再变动；对错斗的工商业进行道歉补偿，并公布法令保护工商业；土改后地主、富农分子的劳动所得，也同样予以保护。

第二，实行奖励生产的政策。政办处和省政府发布了一系列奖励生产的命令，如保护与奖励繁殖牲畜，发展畜牧业；保护与奖励精耕细作，提高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奖励开荒种地，增加粮

^①1945年1月5日《群众日报》发表的诗歌《发地照》。

食生产：奖励植棉纺线，解决穿衣问题等等，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第三，统一战勤任务，实行合理负担政策。由于战争的扩大，战勤任务增加，且有许多部队直接派要民工，形成战勤负担倚轻倚重，苦乐不均的现象。冀察热辽军区后勤司令部成立后，统一了战勤负担，严禁各部队私自派民工。热河省政府也发布了战勤条例，规定爱惜民力，合理负担。对于缺乏劳力的军人家属和工作人员的家属，则实行公平合理的代耕制度。这些措施的实行，既支援了战争，又杜绝了民力的消费。

在工业生产上，1947年以前，解放区只有兵工厂、修械厂、被服厂、酒精厂、造纸厂、制革厂、纺织厂等少数供军需民用的厂家，产量和产值都是很小的，但毕竟建立了初步的基础。1947年夏、秋、冬攻势作战的胜利，相继解放了赤峰、朝阳、北票等城市，解放区的各项工业生产都有相当发展。沟通热河东西的交通大动脉叶赤线通车，赤峰发电厂和部分煤矿开始恢复生产。解放区的赤峰、林西、朝阳、凌源等10个城镇，共有工商业3000余户。1947年12月召开的冀察热辽财经会议，确定了广泛发展棉毛纺织业、农具、运输工具和造纸、编织、运盐及其他工业与副业的政策，并发放了工业及运输贷款20亿元（长城券）。

经过采取这些措施，基本上渡过了灾荒，农牧业生产和工业生产都有一定的恢复和发展，1948年又获得较好的收成，粮食总产量16.8亿斤，比去年增产6.8亿斤。为支援大规模战争，改善农民生活，满足城市人民生活及工业原料的需要，打下了初步基础。

二、财政和金融贸易建设

1947年的热河财政，因为经过前两年的工作，已有初步基础，加上交通断绝，依靠晋察冀边区供应已不可能，因此在财政上不能不力求自给。这时的财政，主要靠自给（包括缴获）、

征收（包括税收）与发行边币三个方面。在供给方法上，因各分区尚被分割，部队机关均有家务，地方军与党政机关，主要以专区为单位，分筹自给，税收亦归分区。两个主力旅则采取半年自给，半年供给的办法，来解决财政困难。在这期间，与东北的联系增加，取得了军火、汽车、汽油、通讯器材和布匹、棉花等的大量供应。1947年全年经费支出折粮35487万斤（平均人数包括马匹在内共78860人，包含辽西，不包括热西和热南），其中公粮及税收收入13532万斤，占25.3%；自给21556万斤，占40.3%；发行货币折米6151万斤，占11.5%；动用贸易公司家底6526万斤，占12.2%；东北补助3262万斤，占6.1%；赤字2460万斤，占4.6%。热河的财政不能自给，一方面不敢放手扩大军队，壮大力量；另一方面也造成穷区和富区之间财政收入的不平衡，出现了财政供给上的苦乐不均。进入1948以后，由于已经改变了被分割的局面，各个专区已联成一片，特别是热河部队的迅猛发展，要求有更多的财政收入，来支援战争。因此，必然要求财政由分散走向统一，由零乱走向有组织，由盲目走向有计划、有计算，动员一切公私财力，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支持空前规模的人民解放战争。

为了总结过去财经工作经验，确定今后财经方针，1947年12月——1948年2月，召开了冀察热辽全区财经工作会议，讨论并印发了《冀察热辽经济与财政问题》的材料，会议确定了“发展经济，支援战争，依靠群众，军民兼顾，统一筹划，分工负责，精密计算，结成整体”的财经工作方针，统一了财政制度，建立了财政系统。具体政策与制度是：

（一）军费实行统筹统支，免除军队生产自给任务，一切部队（主力与地方）的全部家务及生产单位（工厂、商业、运输等），除直接供给军需者外，必须统一交当地政府部门掌管与经营；（二）地方生产自给，一开始完全自给有困难的，可由部分自给过渡到全部自给；（三）改变税收划为国家收入和地方收入的办法，一

切公粮、税收、特贷专利、贸易盈利、缴获物资及银行发行等收入统一归省掌握，地方不得动用。同时取消牲畜和粮食的买卖税，以便利翻身农民从事牲畜和粮食的交换。（四）缴获物资归大公，组织随军财经工作队，一切缴获，除武器外全部归财经工作队掌握或做适当分配，不准各部队自由支配。（五）精减后方机关，充实前方部队，适当降低干部生活水准，取消中灶和小灶。（六）建立预决算及审计制度，加强财政监督。这样，基本上实现了全省的财政统一。这些方针实行后，热河省的财政经济状况有了很大的好转，1948年上半年不仅没要东北的补给，还上交中央一部分，剩余的收入折粮54576万斤，支出折粮38736万斤（其中包括补助冀热察2437万斤），结余15840万斤，尚有生产自给折粮800万斤未计算在内。这说明财政方针的转变，对于集中全省财力物力，支援大规模战争，起到了保证作用。

这个时期的热河金融工作，主要是驱逐伪币，推行边币，稳定市场，平抑物价，发展生产，支持战争，为热河解放区的建设和巩固做出更大的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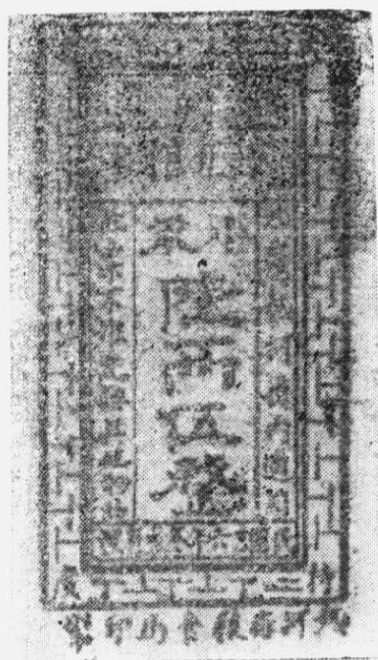
热河的金融机构建立的比较早。早在1703年康熙四十二年就有了近似金融机构的银库，1854年又建立热河宝德局，开始铸造钱币。第二年又建立热河官钱局，是全国16处官钱局之一。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经热河都统延杰奏请，创办热河官银号，发行五种纸币，并在赤峰设立分号，其他一些城镇设立兑换处。1917年改建热河兴业银行。1922年奉系军阀阎朝玺任热河都统时，向日本借款100万元，又发行纸币2000万元，后兵败撤走，使纸币毛荒，只好声明作废，热河人民蒙受重大损失。汤玉麟任热河都统后，继续用兴业票搜刮热河人民，1929年发行600万元，1932年10月发行了300万元，到11月就跌价75%。日伪统治时期又有满洲币、联银券和蒙疆票同时在热河流通。所以说，热河的金融史是一部紊乱的金融史。

日本投降后，热河解放区统一使用晋察冀边币。也同时流通

伪币。1946年3月成立晋察冀边区银行冀热辽分行，由曹菊如任行长。当时的金融方针是驱逐伪币，推行边币，开拓边币市场。热河依靠张家口的物资支持，驱逐伪币的斗争曾收到很大成效，边币吃香，伪币毛荒，金融形势大好。后因边币短缺，又加之缺乏货币斗争经验，国民党印制大批伪币和假边区票推向解放区，使解放区的金融形势变坏，一时又成了伪币市场。承德撤退后，边币贬值，且来源断绝，因而边币缺乏，伪币台头。

为了继续贯彻驱逐伪币的方针，热河就只能自印票币。先是冀东印行冀热辽版的小额边币作为辅币，在全冀热辽区流通。1946年末，在林西将原冀热辽分行改为热河省银行，并发行热河省流通券（简称省钞），共发行98亿元。省钞与伪满币的比值为1比1，与边币的比值为1比10。冀热辽边币和热河省钞发行后，就展开了对蒋币和伪币的斗争，先是准许省钞和伪币同时流通和自由兑换，并利用伪币做为推行边币的工具。到1947年初，禁用伪币的条件已经成熟，热河省政府遂决定由北向南逐步禁用伪币。1月15日，首由林西、林东宣布禁用伪币；2月1日，乌丹、经棚宣布禁用伪币；2月25日，热辽专区宣布禁用伪币；然后由省政府发布布告，规定3月5日限期停止伪币流通，存有伪币者可以兑换热钞，这样，就将伪币彻底驱逐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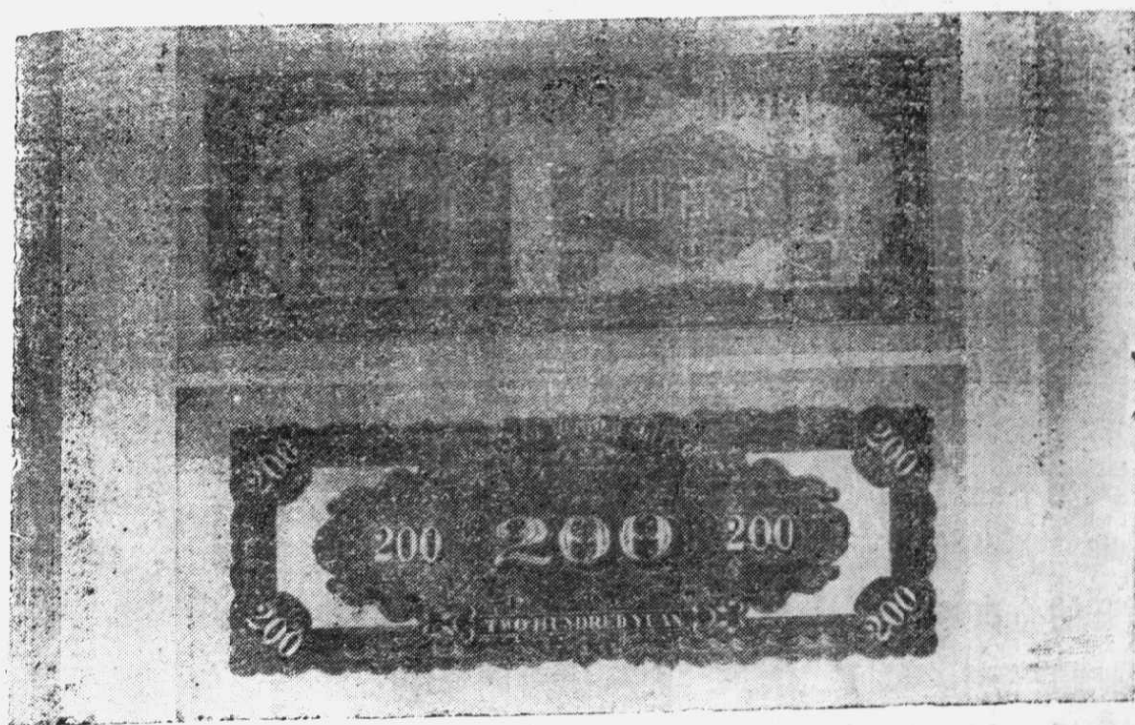
自印钞票的结果，虽驱逐了伪币，但也给各个解放区的经济带来一些不良后果。主要是热河、冀东和冀热察形成三种货币，互不流通，商贩往来不便，三地之间贸易陷于停顿，致使热河多余的粮食、皮毛、牲畜等运不出去，所需的布匹、纸张等工业品又购不进来，造成热河的工业品奇贵，农产品降价，农民感到困难，尤其是妨碍作战军队的供给。针对这种情况，在1948年初召开的全区财经会议上，确定了“统一货币发行，统一金融政策，扶植生产，支援战争，对内巩固发展金融，稳定币值 对外开展货币斗争，加强敌区金融崩溃”的金融方针。为此，于2月21日成立冀察热辽长城银行，由史立德任行长，同时成立了热河、冀



热河省粮食局印制的公用粮票（1947年冬）。

东和冀热察三个分行，热河省分行与总行合属办公，下设热东、热辽、热中和热北四个支行，并开始发行长城券。到11月共发行长城券2581亿元，另外发行本票653亿元。新币发行后，热钞和冀东币即停止发行，并准备逐渐收回，晋察冀边币则按1比10的比值限期收兑完毕，不再流通。东北流通券则按1比1的比值继续流通。

发行新币的目的，对外是驱逐蒋伪币，防止敌币夺取物资；对内则是统一货币，发展经济，支援战争，并以经济的发展，战争的胜利来支持金融。在开展对敌货币斗争方面，到



热河省钞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冀察热辽长城银行发行的纸币

1948年初热河基本区已完全成为长城券本币市场，边沿区与新收复区，仍是长城券与法币同时流通。进一步开展对敌货币斗争，就是进一步促成国民党统治区的金融崩溃，完全肃清解放区的蒋伪币，争取游击区主要成为长城币市场，并将长城券推往国统区市场。到1948年10月6日，冀察热辽中央分局指示各地，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各种货币，如法币、美金、东北九省流通券等一律禁止使用，取得了对敌币斗争的胜利。

热河的贸易工作，是在冀察热辽政办处和热河省政府的统一领导下进行的。早在1945年12月12日，冀热辽中央分局决定成立贸易管理局，到4月份又改为贸易公司，即泰华贸易公司。这个公司成立之初，只有资金2200万元（边币），干部不到50人，经过六七个月的努力，人员增加到数百人，资金扩大到28亿多元（边币），并在赤峰、热西、冀东等地设置了30多个分支公司，在承德市设立了利民商店和回民合作社、机关合作社、大众合作社等十多个销售机构。光承德一地，就购进布20多万匹，粮食5000多石，起到了稳定市场，平抑物价，推行边币，驱逐伪币的作用。在接收承德之初，各种物价猛涨，每斗小米由边币2000元涨到7000元。由于贸易公司在市内广设门市，多方运销物资，把物价不断上涨的趋势变为不断下降，到1946年4月份，每斗小米跌至1050元边币。由于贸易公司只收边币，不收伪币，在承德、隆化等城镇边币完全占据了市场。这期间，泰华贸易公司还拿5亿多元的资金、物资供给了军需。

承德撤退后，热河的贸易受到一定影响，为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办好贸易，又成立了热河省贸易公司，并开展了活跃的贸易工作，沟通了东北和冀东的贸易，又打入敌占区，购进了大批急需物资。1946年下半年，支持财政9亿元边币，1947年又负担了主力军的大部分夏衣，秋季又采购大批棉花和布匹，解决了冬装。

赤峰第二次解放后，各贸易机构更加健全，贸易活动飞跃

发展。泰华贸易公司设立了热南、热中、热北三个分公司和若干支公司、商店等，形成四级经营管理系统。1947年10月，冀察热辽中央分局决定，禁止机关、部队经营商业，从事贸易活动，各机关、部队的公营商业统交泰华贸易公司接管。从此，泰华公司成了热河解放区公营经济中的贸易专营机构。

1948年初，鉴于土地改革中严重侵犯工商业的现象，又重申了保护工商业的财产及其合法经营不受侵犯的政策，明确所要没收的工商业，只是敌伪投资办的，或是四大家族为首的垄断资本，或是某些罪大恶极的汉奸、特务、匪首在法律上判决应全部或部分没收其财产，因而也全部或部分没收其工商业的，其他的工商业一律不准没收，并受法律保护。并规定一切工商业是否应予清算没收，必须经县以上党政机关批准与执行，其他任何机关团体无权对工商业进行清算与没收。经批准没收的工商业，其财产不得自由分散，应完整地交国家和地方接收，继续营业。在这些正确地政策激励下，热河的商业贸易工作蓬勃发展起来。

三、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随着热河人民的彻底翻身解放和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热河解放区的文化教育事业也有了较大的发展。

在历史上，热河的文化教育事业非常落后，日伪的12年殖民统治，更是疯狂地摧残中国的民族文化和民族意识，极力推行殖民主义的奴化教育，造成了热河文化教育事业的更加落后，造成了知识分子科学知识的极端贫乏。

热河解放之初，省委和省政府就立即宣布：“废除敌伪奴化教育制度，肃清敌伪奴化（思想）及一切法西斯主义思想，实行新民主主义教育，提高人民文化政治水平，优待知识分子、科学家及各种专门人才。实行各民族人民的义务教育及干部教育，提高小学教师待遇，改善小学教师生活。”^①在这个方针指导下，

^①《中国共产党热河省委关于目前施政纲领》，1945年11月。

热河的文化教育事业有了较大的恢复和发展。

1947年8月，冀察热辽中央分局决定，在赤峰成立冀察热辽联合大学。这是一所抗大式的大学，也是热河历史上第一所高等学校。冀察热辽联合大学下设行政学院、蒙古自治学院和鲁迅文艺学院，由赵毅敏任校长，徐懋庸任副校长，杜星垣任教育长。

冀察热辽行政学院是由建国学院改建而来的。早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热河只有一些小学和相当于中学的所谓“国高”，热河的知识分子和学生由于受伪满洲国的奴化教育和愚民政策的影响，解放后仍表现苦闷、徬徨，不得出路。为了把这些知识分子吸引到革命队伍中来，并给他们以求学、转变思想的机会，在承德创办了冀热辽建国学院，由凌莎负责，招收学员五六百人，中央分局和热河省委的领导同志胡锡奎、赵毅敏等都亲自到学院讲课。1946年7月，建国学院撤离承德辗转搬到赤峰，并与赤峰中学、赤峰师范和承德文工团合并为新的建国学院，由徐懋庸任院长，凌莎任教育长。而后又随中央分局转移到林西。1947年6月再迁回赤峰后改为行政学院，为热河培养了一批行政管理干部。

内蒙古自治学院是一所专门培养蒙古族干部的学校。1946年3月1日成立于赤峰，由云泽（乌兰夫）兼任校长，齐永存担任教育长，设军事、行政、中学三部，有学生300多人。大多为伪满时蒙族中学的学生、伪满的下级蒙族职员和蒙汉联军第四师的中下级军官。学习内容以革命的启蒙教育为主，讲授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等。1946年10月以后转移林东，并与从张家口撤出来的内蒙古军政学院合并。这期间正是与国民党斗争的最艰苦阶段，蒙自学院的干部学员，组成三个武装工作队，分别到喀喇沁旗、翁牛特旗和敖汉旗一带农村打游击。后来，这部分学员陆续分配工作，成为热河蒙族干部的中坚。

鲁迅文艺学院的前身是胜利剧社。1945年8月，冀热辽部队进入承德后，第十三军分区宣传队与承德的部分文艺工作者共同组成胜利剧社，初期只有30多人，社址设在原承德国民会馆。同年10月，由延安等地赴东北开辟新区工作的大批干部受阻于承德，延安鲁艺的文艺干部和文艺工作者安波、骆文、李劫夫、莎莱、海默等十多人，被赵毅敏挽留于承德，壮大了胜利剧社的阵容。由安波任社长，骆文、李劫夫任副社长，下设戏剧部、音乐部和创作部，全社人员发展到50多人。胜利剧社成立后，配合当时形势，先后自编自演了《三江好》、《一双鞋》、《我认识了八路军》和反映清算复仇斗争的《李振铎回家》等小剧目。还排演了骆文创作的戏剧《红军让我们翻了身》、《放下你的鞭子》。为配合反对干部入城后滋生的享乐思想，排练并演出了大型历史剧《李自成》，承德市副市长史立德等领导干部也登台演出，引起了很大反响。胜利剧社还演出了大型歌剧《白毛女》、《黄河大合唱》等剧目，深受广大人民群众欢迎。1947年7月，由安波提议，以原冀察热辽军区文工团为基础创办鲁迅文艺学院，由赵毅敏兼任院长，安波任秘书长（后任院长）。下设文学系，由骆文负责；戏剧系，由杜印负责；音乐系，由程云、莎莱负责；美术系，由高庄负责。并附设文工团、群艺社、少艺班和短训班，后来又开办了蒙艺班。先后共招收学员1000余人，培养了一大批蒙汉族文艺骨干。

冀察热辽联合大学从成立到撤销，仅三年多的时间，就为冀察热辽地区培养了4000多名各方面的骨干人才。特别是当时在国统区北平、天津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的200多名大专学生来到解放区后，大部投入到“联大”学习和锻炼。这里的生活虽然艰苦，但却置身于民主自由的新天地里，他们饱受饥饿和迫害的心情为之一扫，高高兴兴地投入到土地改革和支援前线等各项革命事业之中。1948年11月，冀察热辽联合大学由赤峰地区迁往锦州。北平解放后，冀察热辽联合大学校部和

行政学院、教育学院（锦州解放后成立）全部迁往北平，归第四野战军指挥，招收平津大中专学生，加以训练，组成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第三团，开赴南方，投入新的斗争。鲁迅文艺学院则在辽沈战役结束后，就分别建立八个文工团，分赴全国各地。安波率一文工团赴沈阳，建立沈阳文联文工团，即后来的辽宁人艺。骆文、程云率一文工团南下天津，又转移武汉，组建成后来的武汉歌舞剧院。严肃率一文工团留承德，即后来的承德文工团。一个文工团跟随东北野战军第八纵队南下，后来成为解放军战士文工团。这样，冀察热辽鲁艺之花，已开遍全国各地。

热河省的文学艺术事业是以省文化界联合会为中心发展起来的。1946年1月，来自解放区和当地文化界百余人举行座谈，决定成立热河省文化界联合会筹委会，推举塞克、徐懋庸、施维民、方纪、安波等19人为筹备委员，并起草文联章程。4月，正式成立热河省文化界救国联合会，徐懋庸任主任，方纪、施维民任副主任。省文联成立后，广泛开展各种文化艺术活动。首先是成立了业余文艺研究班（也叫艺术夜校），有二三百人参加，分设了戏剧、音乐、美术和文学4个组，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文艺活动，历史学家吕振羽等经常去讲课。其次，挖掘出承德特有的一个音乐团体——清音会，^①有会员30多人，他们还保存了一部分在皇宫中演奏过的很高级的乐器和一部分乐曲。他们在日伪统治时期不敢公开，只能秘密传授练习，文联动员这批人出来为群众演奏，并在广播电台开设专题节目，使这些优秀文化遗产得以保存下来。第三，创办了大型政论性文艺刊物《热潮》，传播了马列主义知识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热河历史上第一个公开发行的大型刊物。由于战争的原因，《热潮》只出了三期，以后改为由《冀热辽日报》出《热潮》专页。1948年6月，冀察热辽联合大学鲁迅文艺学院又创刊了《群众文艺》，发表了一些好的戏剧、

①清音会是清朝时专门为皇帝演奏的一支乐队，后来流落民间，保留了不少清宫廷乐曲。

小说等。第四，创作了一批有响影的戏剧和歌曲。如反映战斗生活的《立功归队》，受到冀察热辽军区的通令嘉奖；由骆文和张帆（即海默）作词作曲的反映节约渡荒的歌剧《米》，受到广泛好评；由安波谱写的《热河解放》、《三头黄牛一匹马》，李劫夫谱写的《忘不了》，莎莱谱写的《纺棉花》等歌曲，在群众中广为传唱。这些都繁荣了热河的文艺创作。

四、《群众日报》和解放区的宣传事业

以报纸、广播为主的宣传事业，是解放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冀察热辽中央分局的机关报——《群众日报》，在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教育群众，鼓励群众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群众日报》是1947年6月1日由《冀热辽日报》改刊的。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45年日本投降的前后时期。热河虽在民国初期的1914年就有了相当于省一级的建制（当时称热河特别区），但并没有报纸，至到1931年8月1日，由奉系军阀汤玉麟控制的《热河日报》创刊，热河才有了第一家报纸。在日伪统治时期，承德出版一份汉文报纸——《康德新闻》，是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热河的工具。日本投降后，这张报纸还坚持办了一个时期。冀热辽部队进驻承德后，派林采接管了这家报纸，并与苏联红军合作，改名《中苏新报》，使之成为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型报纸。1945年10月22日，苏军开始从承德撤走，《中苏新报》又更名为《大众日报》，由热河的党组织独立承办。先后任社长的有林采、吴文涛、李锐，总编辑鲁森。这个时期，热河已聚集了一批从延安和其他解放区来的有经验的办报人员，除上述同志外，还有王揖、穆青、范元甄、朱九思、黄钢、华山、廖经天、黄华、沈毓珂等。他们把解放区的办报经验带到热河，从报纸的宣传内容，到版面、标题、语言文字都进行了根本的改革，使读者耳目一新。1946年2月1日，《大众日报》改为《冀热辽日报》，成

为中共冀热辽中央分局机关报，仍由李锐任社长。

冀热辽日报时期，是这张报纸的成熟期，无论是宣传的广度和深度，还是编排技巧、印刷质量等方面都比以前有较大的提高；报纸的战斗性、鲜明性和生动性等方面，也都有了较大的增强。使它成为冀热辽区党组织的重要喉舌和舆论工具，成为冀热辽人民的良师益友。当时，热河人民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反对国民党的武装进攻，建设巩固的热河根据地。《冀热辽日报》在这方面作了大量的、具体生动的宣传报道，揭穿了国民党反动派篡夺抗战胜利果实的阴谋，特别是6月12日发表的《不要二满州》的社论，把进犯热河解放区，到处烧杀抢掠的国民党反动派比喻为“二满州”，抓住了国民党的本质，说到了群众的心坎上，影响很大。一时间，“二满州”就成了国民党的代称。1946年8月，国民党军队进犯承德，《冀热辽日报》坚持出报到最后一天，著名通讯《我们还是要回来的》，就是在承德火车站已听到国民党军队的枪声时采访的。这篇通讯，一方面生动逼真地描写了共产党的干部、战士与承德人民依依惜别的感人情景；另一方面揭示了国民党的猖狂进攻只不过是暂时现象，最终的胜利还是属于热河人民的这个真理。并且庄严地宣告：只需要一年多不到二年的时间我们就会打回来！这个预言不仅当时鼓舞了热河人民的斗志，而且被后来的实践所证明。这篇通讯还经新华总社向全国广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冀热辽日报社由承德向林西转移的两个多月的艰苦征程中，天上有敌机扫射，地上有土匪扰乱，但仍坚持出刊油印的《每日新闻》，保持了与党中央的联系。从围场转移到赤峰后，又与从锦州撤下来的《民声报》会合一起，壮大了报社的力量。1946年10月转移林西，《冀热辽日报》恢复出版。

《民声报》是1945年9月11日在锦州创刊的中共辽西地委机关报，何畏任社长，陆锦任总编辑。11月，国民党军队占领锦州，报社人员辗转达到赤峰，于1946年5月正式复刊，由热中地

委领导。7月,以胡锡奎为书记的热辽区党委成立后,《民声报》就成为区党委的机关报,由区党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李德仲直接领导。在《民声报》也集中了一批很有经验的编辑、记者,如周立波、高翔、谢文清、鲁荻、安若等,他们为《民声报》的创立和发展,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两报合并后的林西,已偏于热河的北部,其他几个专区大多被敌人分割成小块的根据地,整个热河都处于游击战争的环境中,报纸的通讯联系和发行工作非常不便。为适应被敌分隔的局面,冀热辽新华社派出三个支社,配备电台,到敌人的眼皮底下去办报,加强了第一线的新闻宣传工作,发挥了很大的宣传鼓动作用。冀热辽新华社热辽支社由鲁蛮负责,1946年12月4日于敖汉的哈拉海吐创刊了《群声报》(1947年7月1日改《民声报》),是热辽地委的机关报。这张报纸由油印到石印到铅印,在艰苦的游击战争环境中逐渐成长壮大起来,成为同敌人战斗的有力武器。冀热辽新华社热中支社由廖经天负责,1946年12月16日于宁城创刊了《热中报》,是热中地委的机关报。《热中报》以地方稿为主,电稿则另出《每日新闻》。由于热中处于四面被敌人包围的高度流动游击之中,所以,这张报纸实际上是在马背上办的。在一个地方住上三几天的时间都很少,经常利用一些战斗的空隙时间办报。正因为如此,也更发挥了它的战斗作用,《热中报》成为热中的党、军队和人民不可缺少的精神武器。冀热辽新华社热东支社由黄钢负责,1947年1月1日于建昌的章京营子创刊《新热辽报》(同年7月1日改名《人民报》),是热东地委的机关报。《新热辽报》刚创刊两天,敌人来袭,报社立即随地委转移,一天行军80里,也是个“挎包电台”和“马背报社”。另外,热西地委创办了颇具特色的油印刊物《新作风》,1947年12月创刊,共出刊40期,是由热河本地的知识分子郭小川和徐亮主办的。热北地委也于1948年1月11日创刊了《牧农报》,是以反映蒙古族地区的生活和斗争为主的一份报纸,社长方驰辛。驻热河的

野战部队创办了《铁拳报》、《战斗报》、《前进报》等十多种报纸，地方部队也创办了热东《子弟兵报》、热中《前进报》、热北《立功喜报》、热辽《新英雄报》等报纸。这些报纸和刊物在热河大地上形成了强大的宣传网，对于发动群众，支持战争，巩固热河解放区起到了重要作用。

随着冀热辽中央分局改为冀察热辽中央分局，1947年6月1日，《冀热辽日报》也改名为《群众日报》，先后在林西、赤峰、建西、宁城等地出版。《群众日报》的电台还有三名日本人，是解放锦州时，由日本人经营的电报电话局接收过来，参加《民声报》工作的。他们收发报的技术高，工作态度也好，还带出了几个徒弟。另外两名日本人是在林西接收的。这五名日本人为《群众日报》的出刊发行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其中的钉崎卫回国后，将在冀热辽这段亲身经历写成了《黎明前的洗礼》^①一书，已在日本出版发行。

解放区的宣传事业，除报纸外还有广播。日伪统治时期，在承德的佟山上建立了放送局。抗战胜利后，冀热辽部队接管了敌伪放送局的人员和设备，但主要机器已损坏不能使用。热河省主席李运昌把在锦州接收的敌伪机器设备运到承德，经过安装抢修，承德新华广播电台于1946年5月20日正式播音，是由共产党控制的全国少数几个电台之一。电台播音后，及时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对时局的主张，使热河人民第一次听到了党中央的声音。8月，国民党发动进攻后，大部分人员和设备转移林西。因设备损失严重，又没有电力，决定将承德新华广播电台的人员和设备转移到齐齐哈尔，与西满新华广播电台合并。1947年9月

①钉崎卫，日本人，1940年到锦州市日人经营的电报电话局任报务员。1945年锦州解放后到《民声报》电务科工作，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冀热辽日报》、《群众日报》报务主任，并代理过电务科长。1956回国，写了《黎明前的洗礼》一书热情歌颂了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1978年在日本出版，后由鲁佃翻译，在中国出版。

又迁回赤峰，并第二次正式播音，直至热河全省解放，重建了热河省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宣传在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消灭鼠疫的斗争

消灭鼠疫的斗争，是热河解放区建设事业中的一项重大斗争。在中共中央、东北中央局以及苏联的支持下，取得了很大胜利。这一胜利，不仅拯救了热中、热北数百万人民的生命，还使热河的医疗卫生事业有了大的发展，打下个好的基础。

鼠疫是鼠疫杆菌引起的烈性传染病，一般先在家鼠、野鼠和其他啮齿类动物中流行，再由跳蚤叮咬，通过循环系统传染给人。发病者病原体侵入血液，引起败血症或肺炎，分别称为腺型、败血型 and 肺型鼠疫。鼠疫是一种死亡率很高的传染病，因为病情发展迅猛，传染极快，一经发病，很难抢救，死亡率可达100%。更为严重的是由一人传染全家，以致全村，使全村人灭绝。据疫区实际统计，在大力防治的情况下，死亡率还高达76.7%。

东北地区的鼠疫，最早是1946年6月中旬，在哈尔滨市平房区发现的。这里曾经是日本侵略者设立的细菌工厂，名为七三一部队。这个所谓的工厂是专门用活人试验鼠疫、霍乱、伤寒、破伤风等各式各样细菌的杀人场，也是细菌传播场。光传播鼠疫的“跳蚤培育器”就有4500个，具有两个月生产10公斤跳蚤的能力。热北地区带有疫菌的鼠类很多，野鼠有黄鼠（大眼贼）、沙土鼠，鼠的密度达120~150/万 m^2 只，个别地区达300只以上。家鼠主要有灰鼠和仓鼠，百把夹子日捕获量为30~45只，鼠类的密度超过控制值数的15~20倍。日伪时期曾在敖汉设立鼠疫观察所，每年六七月间，捕获带有病菌的野鼠500~1000只，送往哈尔滨七三一部队，从这些鼠身上取下病菌，作为培养鼠疫病菌的源体，再生产成杀人武器。

1947年6~7月，西满各地又相继发现鼠疫。到8月，疫情

蔓延到3个市县（旗）93个区，633个村。8月9日，赤峰建昌营、元宝隆一带首先发现鼠疫，死亡14人。11日，冀察热辽野战医院负责人亲赴元宝隆等地视察，看到田野、庭院、住室，野鼠、家鼠在疫病的驱使下四处乱窜，集结河边，大批淹死。相继又在乌丹南山发现鼠疫，并正在剧烈流行，其中的一家7口，已死亡6口，剩余1口亦重病待毙。新惠鼠疫也迅猛蔓延到南部黑水、莫里河一带。

对于鼠疫的发生和蔓延，冀察热辽中央分局和热河省政府十分重视。8月11日，冀察热辽军区司令员程子华、副司令员兼省政府主席李运昌和副政委黄火青等联合署名发出紧急通知，决定防治鼠疫的六条办法，号召大规模开展防疫灭鼠清洁卫生运动，并开始预防注射。23日，冀察热辽中央分局、军区和热河省政府再次召开党政军民学商各界各单位负责人会议，共同商讨防治鼠疫的办法，并决定成立热河省防疫委员会，由李运昌任主任，李资平任副主任，统一领导和指挥防治鼠疫的工作。从此，消灭鼠疫的斗争广泛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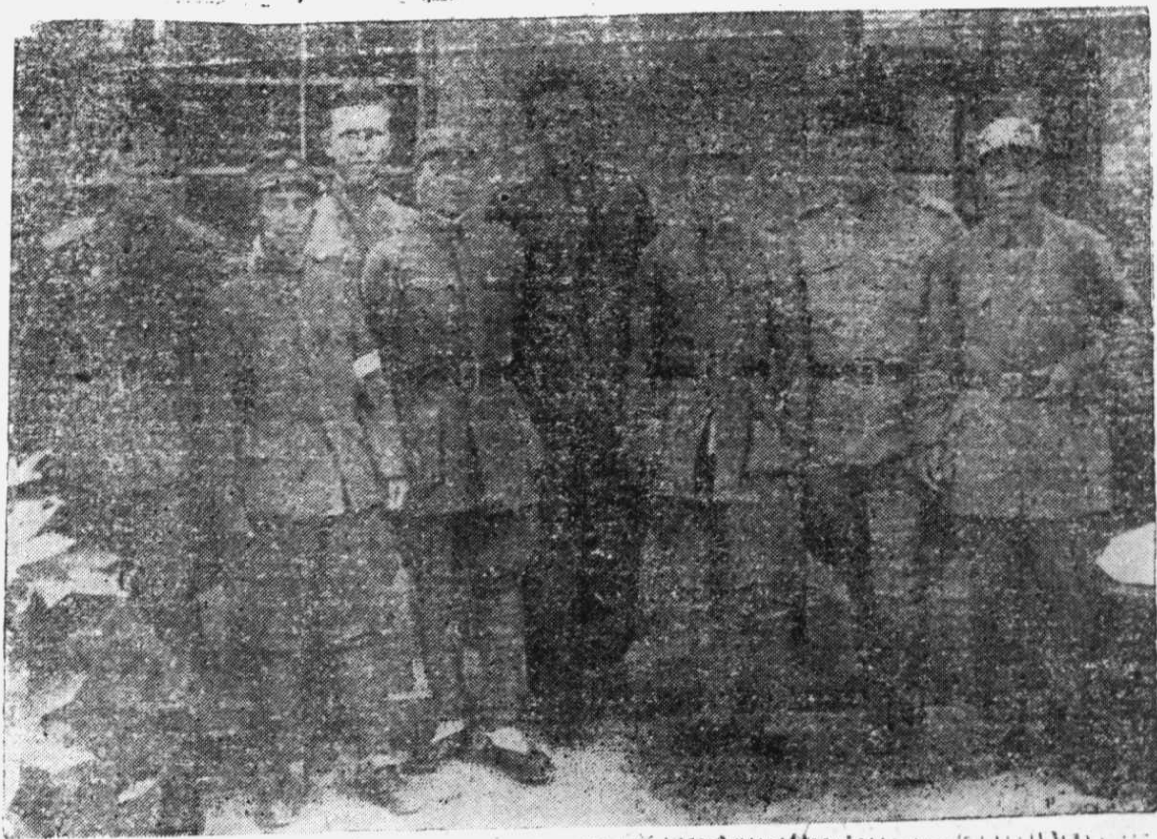
当时主要采取三种办法：（一）封锁疫区，这是避免疫情扩散和蔓延的主要措施。省防疫委员会明令规定在疫区和非疫区接壤的大小进出路口上，设立哨卡，派人昼夜看守。牲畜不准出境，行人要留住三日，观察消毒后始能放行；（二）注射防病疫苗，控制疫情发展，已发现的鼠疫病人，马上进行隔离，以村或片为单位，设立临时医院和治疗点，进行观察和治疗，并设哨卡严格管理。（三）消灭病源和传染媒介。在疫区和接疫区由共产党员、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组成强大的宣传队伍，向群众广泛宣传防病和灭病常识，讲解有关政令、规则，号召群众安定情绪，保持镇定，积极参加到防疫灭病行动中来。并带领群众垫圈、填坑、扑老鼠、灭跳蚤、撒石灰、喷药剂、清理环境、消灭病源和传染媒介。

采取上述措施后，初见成效，疫情曾一度得到控制。但在一

部分干部中仍存在麻痹思想，没有严格执行防疫措施，有的不顾疫情，强行通过封锁线；特别是由于缺医少药（如敖汉旗只有1名西医，赤峰市也只有一名西医，一名中医做防疫工作），对疫情得不到及时预防和治疗，到9月中旬，疫情转剧，疫区扩大。15日赤峰市发生鼠疫，省防疫委员会实行全城封锁，戏院停演，学校停课，市场解散。冀察热辽中央分局、军区和热河省政府等党政军机关迁往建平县农村，到9月底，疫情扩大，死亡人数已达3000以上。到1947年底，以敖汉、平庄、赤峰、翁牛特为中心，已波及到热北、热中的8县1市，发病3万多人，死亡2.3万多人。

疫情的迅速发展，引起了中央、东北局和地方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东北局于1947年9月派张玺阁等7人携带药品器械来热河。1948年9月又派了一支150人的医疗队，热河省也建立起一个有100多名学员的卫生干部学校，全力投入防治鼠疫的工作。冀察热辽中央分局还将从中国医大四分校的2000多名师生中，抽出一部分派到疫区，参加除害灭病工作。这样，在热河疫区组织起近3000人的防疫灭病队伍，深入病房现场，既宣传防治鼠疫知识，又治病救人。各防疫队还举办了短期卫生员培训班，给防疫灭病积极分子上专业知识课，使防疫灭病工作普遍开展起来。

热河的防疫灭病工作还得到苏联的大力支持，先后派两支防疫队50多人来华，到热河消灭鼠疫。第一支防疫队在队长麦亚斯基率领下，于1948年6月到达赤峰，立刻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第二支防疫队在队长赫赫洛娃的率领下，在平庄建立了医院，积极投入消灭鼠疫的斗争。两支防疫队先后工作了7个多月，均自带药品、器械，免费治疗，拯救了数以万计人的生命。苏联防疫队回国时，将剩余的药品、消毒车、救护车等全部无偿地留给了热河省防疫站。苏联防疫队严明的纪律，热诚的服务和高超的医疗技术，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热河省政府副主席杨雨民(右一)与苏联防疫队队长等在一起。

经过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干部、医疗卫生人员的持续奋斗，鼠疫疫情很快得到了控制。据统计，1948年的6~10月共捕鼠771万多只，对控制疫情，减少发病率，起到了决定性作用。1948年11月，赤峰市鼠疫渐趋停息。这一年共发病5493人，死亡3924人，发病率和死亡率都比上一年大大下降。

消灭鼠疫的斗争，促进了热河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各级民主政府对防疫工作在人力、物力、财力和技术条件等各方面都给予大力支持，在疫区的县、市建立了防疫队，区、村也建立了比较完整地防疫组织。特别是医大四分校（校长刘韵久，政委王中藩，副校长徐鸿图，教育长马旭，系承德医学院前身）迁来热河，不仅增加了一批专门医疗卫生人员，还为热河培养了一大批医疗卫生工作骨干，为热河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第三节 全力参加与支援辽沈决战

一、战略决战时机的成熟

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年多的攻势作战，已使敌我力量的对比和全国的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解放军由120余万人增加到280余万人，解放区的面积已占全国总面积的24.5%。解放区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35.3%。国民党军队由于大量被歼和严重逃亡，已从430万人下降为360万人，其中用于第一线的兵力只有174万余人。这样，国民党在全国战场上，就被迫由“全面防御”转入“重点防御”，一方面妄图防御江北，与解放军会战；另一方面准备一旦战局不利，即将主力撤到江南，巩固长江防线，以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1948年8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决定裁并“绥靖区”，组织新的机动兵团，并以精锐部队为核心，组成五个强大重点集团，分别防守西北、中原、华东、华北、东北五大战场，进行垂死挣扎，力图挽救败局。但是，国民党的五大战略集团，在人民解放军的大规模进攻下，已被分割牵制在各自的战场上，互相联系和支援都十分困难，处于被动挨打，动摇徘徊的境地。共产党领导的全国各解放区则相继连成一片，可以作战略上的直接支援。形势表明，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反动军队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到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全国战场的形势做了科学分析，紧紧抓住决战时机，毅然决然地部署和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并把决战的初战方向放在东北战场。

当时东北战场的形势十分有利。东北人民解放军经过1947年的夏、秋、冬和冀察热辽部队的1948年夏季攻势作战，歼灭敌人30万人以上，国民党军队抢占东北的地盘，1946年占43%，到1947年10月下降到10%，1948年6月以后，就只剩下沈阳、长

春、锦州、承德几个孤立据点了，虽然尚有55万余人的军队，但地域狭小，补给困难，战略上或撤或守，犹豫混乱，举棋不定。这些都说明，国民党的东北战场在全国五大战场中是最薄弱的。而东北人民解放军则愈战愈强，总兵力已发展到103万人，其中野战部队包括12个步兵纵队，一个炮兵纵队，一个铁路纵队和15个独立师，共70多万人。同时，东北人民解放军进行大规模作战的能力大为增强，无论是在质量上还是数量上都超过了敌军。东北解放区已拥有全东北97%以上的土地和86%以上的人口，并控制了2.15万里的铁路线，东、西、南、北满和冀察热辽根据地完全连成一片。在解放区内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消灭了土匪、敌伪残余和封建势力，建立和巩固了人民民主政权，工农业生产有了较大的恢复和发展。解放区的广大翻身农民，在党的领导与组织动员下，做好了随时支援前线作战的准备。这些都说明，东北解放区是全国各个解放区中最强大的一个。

东北国民党军队的薄弱和解放军的强大这个基本情况，决定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必然要把战略决定的初战方向放在东北战场上。早在1948年2月7日，即东北冬季攻势正在进行中，毛泽东就洞察到了这一点，他指出：“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要求东北人民解放军考虑以全力南下作战。^①7月22日，中央军委电报指出“南下作战具有各种有利条件，我军愈向敌后方前进，愈能使敌方孤悬在侧后之据点，被迫减弱撤退”。^②根据上述指示，东北人民解放军制定了南下作战计划，其要点是：（1）以部分兵力继续围困长春，牵制沈阳之敌南逃；（2）以冀察热辽部队奔袭包围北宁路唐锦段各点之敌，然后各个加以歼灭；（3）以主力南下包围锦州，并准备随时攻取锦州和其他更有力的作战。九十月间，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又发出了《关于辽沈战役作战方针》等电报，明确指示要

①②常城、李鸿文、朱建华：《现代东北史》，第549页

把主攻方向放在北宁线，“歼灭锦州到唐山一线之敌，并攻克锦州、榆关、唐山诸点”，“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该线，而置沈阳、长春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①因为占领了北宁线，就掐断了东北国民党军队通往关内的咽喉，完全关闭了冀热辽这个东北的“大门”，这样，既断绝了关内外的交通，断绝了沈长之敌的补给，又使沈阳、长春之敌成为囊中之物，“瓮中之鳖”，形成“关门打狗”之势，置东北国民党军于死地。

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东北野战军（1948年8月改称）集中了主力12个纵队和一个炮兵纵队，连同地方独立师共53个师70余万人，在东北人民，特别是热河（包括辽西）地区广大人民的热烈支援下，在全国其他战场的有力配合下，发起了大规模的辽沈战役。

二、全力参加辽沈战役作战

辽沈战役与以前开展的夏、秋、冬季攻势作战一样，也是由冀察热辽部队首先发起的，整个冀察热辽区全力投入了辽沈决战。当时冀察热辽军区已是拥有33.4万余人（其中野战军13.3万人）的重要军区。

辽沈战役是1948年9月12日开始的，首先由冀察热辽部队奔袭北宁路唐山至锦州路段，共出兵三路。第一路是十一纵队和冀察热辽骑兵师，奉命出击北宁路南段，在冀东地方部队配合下，分别包围歼灭滦县和北戴河各段孤立据点之敌，以截断东北国民党军队退路，阻止华北敌人增援。这路大军从9月12日起，一鼓作气，再克昌黎，攻占北戴河、留守营、烟筒山、起云寺等敌人固守的据点，破毁唐山、山海关间铁路150华里。第二路是冀察热辽军区“前指”，指挥独立四、六、八师、炮旅及热东军分区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37页。

两个独立团，奔袭山海关到兴城间的北宁路中段，重点是攻克绥中和兴城。各部队于9月1日先后出发，12日拂晓，独四、八师分别完成对绥中、兴城的包围，独六师位于兴城、锦西间阻援。从12日至15日，锦西敌五十四军4个团增援兴城，连续攻击独六师阵地，在独八师两个团的增援下，顶住了敌人优势兵力持续4天的猛烈进攻，完成了阻击任务。15日夜，独八师撤回兴城，向南吸引分散敌人，然后以3个独立师的优势兵力会攻绥中，27日发起攻击，28日全歼绥中守敌暂六十师二团和保安大队2800余人。攻克绥中后，“前指”率部南下继续扩大战果，攻占前所，与第十一纵队衔接起来。第三路是第四、第九纵队，奉命出击锦州、锦西、兴城间北宁路北段。9月11日从台安、北镇出发，迅速包围义县，然后将义县交第二、第三纵队，于24日夜间进至锦州以南地区，切断锦西、兴城间敌之联系，24日攻克砬子山要点，27日攻克高桥、西海口，29日攻克兴城，10月1日攻克义县。至此，完全切断了辽西走廊，完成了分割包围锦州的任務。

辽沈战役打响以后，蒋介石惊恐万状，急忙于9月30日飞抵北平，10月2日飞沈阳，连续召开紧急会议，亲自指挥东北作战，组织从南北两个方面增援锦州。一方面从华北、山东急调7个师，连同原驻葫芦岛的4个师，共11个师，从10月10日起猛攻塔山，妄图解锦州之围；一方面急令沈阳国民党军主力5个军11个师及3个骑兵旅组成廖耀湘西进兵团，进占彰武、新立屯，妄图截断东北人民解放军后方补给线，并威胁攻锦部队。至此，辽沈战役的决战阶段已全面展开。

防守塔山阵地，阻敌葫芦岛援军的是由程子华任司令员的冀察热辽部队前线指挥部，辖第四、第十一纵队和独四、六师及炮旅，布防于锦西以北的塔山、长宁山地区，并以塔山为重点，掌握了雄厚的突击力量和纵深的火力配系，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体系。10月10日敌人发动进攻后，天空的飞机，山头的大炮，海上的兵舰，同时以倾江倒海的炮火，猛烈轰击塔山阵地。步兵也

以密集的集团冲锋方式，每日都以三至四个师的兵力轮番攻击，阵地失而复得，工事毁而重修，毙敌一万余人，使其始终不能前进一步，保证了锦州城攻坚的胜利进行。沈阳的“西进兵团”也被第十纵队阻止于黑山、大虎山地区。

驻守锦州的是以国民党军冀热辽边区司令、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前线指挥所主任范汉杰所指挥的第六兵团的主力7个师及杂牌部队共10万余人，攻击锦州的是东北野战军第二、第三、第七、第八、第九纵队。10月9日开始攻击，经过5昼夜的激战，扫除外围设防坚固的大小据点。10月14日，对锦州市区发起总攻，经31个小时的激战，完全攻克，城内及外围守军10余万人被歼，范汉杰也在化装逃跑时被俘获。收复锦州后，东北野战军攻锦部队立即向东北方向回师，将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包围于黑山、大虎山地区。10月28日，全歼该敌，俘敌兵团司令廖耀湘以下10余万人。相继又攻占长春、沈阳，至11月2日辽沈战役结束。全战役共进行52天，歼敌47万余人，解放了除承德之外的东北全境。

锦州刚解放，中共锦州城市工作委员会书记胡锡奎，热东地委书记王国权等率机关工作人员进城，接收敌伪政权，建立人民政权。锦州城工委是在1948年10月13日组建的，在这之前是锦州市工委。锦州市工委是在1947年7月于朝阳县盘道沟成立的，由菇古香任书记，积极派遣干部，深入锦州做地下工作，搜集情报，瓦解敌军，并组织领导了锦州地下党支部和锦州纺、东关、北关等地下党支部。1948年3月8日，在羊山举行会议，决定加强和扩大锦州市工委，将热辽地委城工部部分人员和工作并入锦州市工委，由林肖硖、魏奇任正、副书记，并成立武工队，大力开展锦州地下工作。打入敌人内部的韩毓武搞到了锦州城防图等重要军事情报，为解放锦州做出了贡献。锦州地下党支部书记马云飞，冒着枪林弹雨，带领人民解放军顺利攻入城内，他中弹牺牲。铁路工人葛占鳌为解放军带路，消灭了固守旧城区（古塔

区)的一个师敌人,立了大功。

辽沈战役的胜利,使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动摇了国民党在全国的反动统治,缩短了全国解放的进程。在锦州战役的参战部队中冀察热辽部队占三分之一,是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辽沈战役的大部分战斗又是在冀察热辽地域上进行的,得到了热河省人力、物力、财力的大量支援。这些都说明,冀察热辽的党、军队和人民,对辽沈战役的胜利,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



我强大的炮火群正准备向锦州守敌猛击



塔山战役中敌人纷纷放下武器

三、全力支援辽沈决战

辽沈战役的主要战场是在热河省的热东和热辽两专署辖区内，热河的党组织、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以高昂的革命热情，全力支援了辽沈决战。

早在1948年初，冀察热辽中央分局就发出了《关于一切为了解放战争的胜利的指示》，号召全区党政军民一致行动起来，完成土地改革，发展人民武装，开展外勤工作，大力支援前线。据不完全统计，从1945年底至1948年底，冀察热辽全区共有39万多人参加人民解放军（其中热河16万，冀东16万，冀热察7万），壮大了革命队伍。在为主力补充兵员的同时，地方人民武装力量也有很大发展，至辽沈战役前夕，热河全省的人民武装已达32万多人，培养各级武装干部8000多名，拥有担架1.1万多付，各种运输车5000多辆，交通站27个。东北人民解放军即将大反攻的消息传来，热河人民更是欢欣鼓舞，积极修路、运粮、抬担架，踊跃支援前线。这次支前活动规模之大，人员之多，物资之巨，在热河是史无前例的。

热东地区是辽沈战役的前线，热东人民全体动员起来，参军参战，支援前方。全区从9月12日起，在一个半月的时间内，参战担架22704付，民工达13.6万多人；共修好公路干线8条，3000余里；完成公粮5220万斤，向第一、二线调运粮食3334万斤，慰劳猪肉63万多斤，苹果1.9万多斤，保证了前方部队供应。许多县委书记、县长、部长、区委书记、区长上了前线，亲自带队上火线抢救伤员，运输物资。兴城老区只有7万多人口，仅担架和运输两项就出工日32万多个，平均每人四个半。羊山县民工班长张庆贺，在月亮山战斗中一人抢救5名伤员，当敌机轰炸扫射时，他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伤员，荣立特等功一次，他所在的连队也被授予模范连光荣称号。黑山科区一次转运伤员1400余人，村村设病院，户户有病房，人人当看护，热情地照顾护理伤员。

被评为支前模范。

热辽地区也是辽沈战役的重要战场之一，支前工作搞得热火朝天。首先是成立了战勤指挥部，由专员李杰庸、地委书记马载分任总指挥和政委，统一指挥全区战勤工作。在辽沈战役期间，全区共修复公路1.3万多里，出动担架1.1万多付，大车4200多辆，出动民工11.5万多人，仅北阜义一个县就转运物资194万多斤，胜利完成了任务，保证了军需。

热中地区除组织担架运输外，还做军鞋26万多双，支援军粮2400万斤，军草800万斤。其他如热北、热西、热南等地区，虽离战场较远，但也积极出动民工，运送粮草，为支援辽沈决战做出了贡献。

为抢救伤病员，冀察热辽军区将医大四分校的2000多名师生，全部调到辽沈前线，在朝阳设立临时医院，还成立12个医务所，每所一次就接收400多名伤员，从护理到治疗一包到底。在百多天的时间里，共治愈10800名伤员，全部伤愈归队。

为了赢得战争的胜利，广大文艺工作者也深入前线战地，进行战地演出，鼓舞了干部战士的斗志。冀察热辽军区前线剧团，在团长安波的率领下，奔赴辽沈前线，随军演出了《白毛女》、《大生产》、《兄妹开荒》、《纺棉花》、《我是一个兵》等戏剧歌曲，安波在前线谱写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和《兵》等歌曲，在战役的前方后方广泛传唱，给广大人民群众、解放军战士以很大的鼓舞，增强了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的信心和力量。

热河省党政军民对辽沈战役的全力支援，得到了东北野战军的赞扬。11月19日，东北野战军后勤部发来感谢信，对在解放锦州战役中的支前工作上的高度热情和组织性，保证公路畅通，公粮充足等表示感谢。

四、承德的解放

驻承德的国民党军队十三军的两个主力师支援东北被歼后，

石觉痛心疾首，一气之下，要求蒋介石将其划归了华北傅作义集团，热河省主席一职也由云南军阀孙渡接任。这种部署虽使其偏安于一时，但终难逃覆灭下场。辽沈大战展开之际，孙渡、石觉眼见国民党军队被歼，惶惶不可终日。10月15日锦州一解放，石觉就慌忙将十三军军部撤到古北口，10月27日，蒋介石亲自飞临承德，为国民党官兵壮胆打气，大讲“承德在国防上之重要性”，要国民党十三军“保卫锦秀河山”。31日，还召开了一个“保卫热河大会”，石觉声称：“将死守承德，只要十三军还有一个人存在，决不放弃这一神圣使命”，并要承德市民“与国军共存亡”。11月2日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中央军委命令程子华率第四、第十一纵队先行入关，配合晋察冀部队作战。石觉闻讯后，于11月12日中午仓惶弃城西逃，人民解放军地方部队跟踪追击，歼其一部。下午17时，承德工委负责人郭洪德、郭耀臣、郑起茂等率南山部队和部分工作人员入城。从此，失陷2年2个月又15天的承德，又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承德工委是在1946年8月承德撤退时成立的，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开展承德市的地下工作，搜集敌人情报，领导和发动地方游击战争，并配备了一个300多人的公安保卫大队。承德工委在市内安排了地下工作人员，仅一、四两区就布置了由42名党员组成的15个地下工作小组，并安排了20名单线联系党员。冀热辽军区保卫部和热河省委社会部、市公安系统也留下一些特工人员，坚持承德市的地下斗争。承德工委于8月26日撤出承德市，到白旗一带坚持游击战争。后遭敌四面围攻，无法立足，曾转战隆化、多伦和黑河等地区，1947年5月返回热南的兴隆县鹰手营子、寿王坟和承德县的车河、柳河、全宝河一带，划归冀东区党委领导。这时期的承德工委有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重新组建了一支300多人的人民武装——南山部队，广泛开展承德敌占区的地下活动和游击战争。

在城市敌工方面，由于承德工委辗转迁移，原来的地下关系

人多已失掉联系，工委确立“以派遣为主，恢复为辅”的方针，派遣了一批地下工作人员，恢复了一批原有关系，发展一批新关系，很快形成了地下关系网，及时掌握了承德市内国民党的活动和各阶层的动向，并编印了《承德军事动态》，为上级机关提供了“蒋介石到承德”、“十三军兵力部署、工事设施分布”等重要情报。承德工委还派遣一批国民党军队军官、士兵家属、亲友及被俘人员进入承德，宣传党的俘虏政策，并在头沟、六沟、鹰手营子等地设立蒋军官兵接待站，接待逃出敌占区的国民党军队官兵，愿意回家的发给衣服、路费，愿意留下的经培训后分配工作。仅六沟接待站，就接待出逃、投诚蒋军五六百人。同时，承德外围的游击战斗也打得有声有色。1948年夏秋之间，南山部队配合韩梅村的独立第六师，在承德县头沟击溃十三军一个团，在二道河子消灭国民党军队一个连，生俘78人。一次，南山部队在全宝河突遭敌人袭击，为掩护部队和群众转移，副排长佟显文等与数百名敌人激战六七个小时，最后弹尽援绝，毅然跳下数十丈深的悬崖，英勇牺牲，被誉为狼牙山五壮士式的英雄。

1948年9月，根据冀察热辽中央分局的指示，热中地委成立了接收承德工作组，由热中地委书记李望淮亲自负责，并带领承德市工委和地委党训班30多名学员到承德县三沟、头沟一带活动。国民党军队从承德一撤走，承德市工委和南山部队进入承德市，宣布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对承德实行军管，并布告安民，安定秩序。11月13日，承德市8万群众欢迎人民解放军入城。16日，中共中央发来贺电，祝贺收复承德，解放热河全境的大胜利。19日，承德市委、市政府宣告成立，郭洪德任市委书记，张立文任市长（后郭耀臣任市长），从此，承德及热河全省走上了和平建设的新时期。

第四节 进入和平建设的新时期

一、重建省委、省政府，开始和平建设

辽沈战役结束以后，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已被肃清，中共中央东北局于1948年11月13日向中央报告，建议取消冀察热辽中央分局、政办处及军区，将所属热河省及新成立之辽西省，直属东北局管辖。经中央和东北局批准，冀察热辽中央分局于12月26日公布，热河省委由李运昌、马载、李望淮、李子光、阎颐行、杨雨民、权星垣等组成。以李运昌为书记、马载为副书记。省政府由李运昌兼主席、阎颐行为第一副主席兼秘书长、杨雨民为第二副主席兼民政厅长，王焕如为财政厅长，刘潜为建设厅长，农康为教育厅长，王延年为公安厅长。

1949年1月10日，东北政委会通令撤销东北政委会冀察热辽办事处，确定热河省政府直属东北政委会领导，同时也结束了冀察热辽中央分局和军区的工作。原冀察热辽中央分局干部除分配热河、辽西两省外，其余由黄克诚率领，派往北京、天津等城市工作。

热河省委、省政府成立后，于12月27日通令撤销了热东、热中、热辽三个地委和专署，所属各县旗直属省政府领导。12月30日，又将原冀热察行署所辖的热西的隆化、丰宁、滦平、围场四县，划归热河省管辖。2月19日，热河省政府正式接管热南的兴隆、青龙、青平三县。热河省共辖承德、赤峰二市，林西、叶柏寿、乌丹、建西、赤峰、宁城、建平、凌源、建昌、平泉、承德、滦平、丰宁、隆化、围场、兴隆、青龙、青平18县及克什克腾旗、巴林左旗、巴林右旗、阿鲁科尔沁旗、翁敖旗、敖汉旗、喀喇沁左旗7旗。^①

^①1948年11月29，热河省人民政府发出34号通知，决定将兴城、锦西、锦县、义县、朝阳、北票、羊山、北阜义8县划归辽西省管辖。1949年5月5日，朝阳、北票、羊山3县又重划归热河省。

热河省政府成立前后，为落实毛主席在七届三中全会上关于“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指示，立即组织全省人民掀起一个“改造家乡，重建家园”的群众运动。在毛主席“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方针指导下，经全省的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使农副业生产发生了很大变化。到1948年底，除个别县之外，一般县的农业产量均较1947年有较大的提高。如建昌、新惠等9县较上一年增产小米9390万斤，新惠等12县消灭荒地63144亩，占全部荒地的74%。全省人民于解放后所激发出的生产热情十分高涨，据22个县的统计，为了下一年的丰收增产，仅积肥即达198万车，全省初步呈现农副并举的局面，各种副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丰宁等9县打柴11.9亿斤。建昌等6县仅纺织收入即达152万斤米。在工业方面，由于热河境内仅有的双头山（即现在的双塔山）铁矿，北票、鹰手营子煤矿等重工业遭到严重破坏，主要进行恢复生产的工作，相应的加快发展轻工业生产步伐。

为了领导全省人民更快地改变热河贫穷落后的面貌，热河省委提出了1949年的生产计划及落实的措施：

1、农业生产增产粮食（小米）1.8亿斤。办法是扩大耕地面积、改进农业技术、兴修水利、恢复水田等。除此之外，多种特种农作物，扩大棉田22万亩，收棉450万斤并植树225万棵（平均两个人一棵）。

2、在畜牧业区，停止、降低牲畜的死亡率，提高繁殖率，增产牛2万头、马2000匹、羊5万支。

3、大量发展供销合作社，帮助与组织群众发展农业与手工业生产，调剂物资，尽可能廉价供给农民所需要的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并给农村生产品找销路。

4、城市生产，按照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原则，开办各种生产合作社，恢复与发展切合实际的真正有利的小型工业和手工业，给失业工人找到固定的职业，掌握全面工商情况，负起沟通城

市与乡村经济关系的任务，并抓紧改造“街流子”。

热河省委、省政府确立了以农业为主(牧区以畜牧业为主)，同时不放弃有利与可能条件下的轻工矿业生产的总方针，并结合救灾、防疫、除奸剿匪、建党建政及戒烟等项工作的开展，在全省的上上下下开始出现了和平建设的局面。

二、新收复的改造和新区土改的完成

1948年下半年，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热河扩大了新收复区和新收复城市，为了迅速恢复社会秩序，安定人心，冀察热辽中央分局发出了关于新收复区和新收复城市工作的指示，明确新收复区和新收复城市的中心工作，首先是积极肃清反革命的武装，其次是调查社会情况，宣传我党之各种政策，稳定工商业，救济贫困群众，安定社会秩序，对新收复区进行改造。锦州、承德等城市解放后，认真执行了东北行政委员会制定的保护新解放城市人民利益的“约法八章”，明确宣布：保护城市各阶层人民生命财产不受侵犯；所有私人资本一律保护，开市照常营业，不受侵犯；没收官僚资本，对于在官僚资本经营的工商企业等单位供职人员，准予分别录用；一切交通市政设备，一切文化卫生设备以及宗教寺院设备等，一律不准破坏，所有这些单位的供职人员，均应照常供职，民主政府一律加以保护；国民党省市县各级政府机关之官吏职员与市镇警察及区乡镇保长人员，不持枪抵抗，不进行破坏活动者，一律不加俘虏逮捕；所有流通市面之种种蒋币一律停止使用。这些政策和措施实行后，很快安定了人心，稳定了秩序，开创出新的局面。

热河的老区土地改革完成后，尚有滦平、隆化、承德、平泉、丰宁5个县和承德市，共35个区，1221个行政村的新区没进行土改。热河省政府于1948年底做出决定，利用春耕前的农闲季节，全面开展新区土改运动。至1949年1月新区的土改工作全面铺开，热河省委抽调省直机关干部180人，组成了两个工作团，

由马载、杨雨民率领，分赴滦平和承德县，另外派出1100余名干部分赴其它市、县。

新区的土改，一般是以区或村为单位，举办贫雇农积极分子训练班，然后以他们为骨干，回村发动群众，组织贫农团与农会，重新评定阶级成份，对地主、富农的土地进行接收与征收。

热河省委针对新区的土改提出：“土改就是为了生产，新区土改，要将分得的果实用到生产上去，准备春耕”，为此，新区土改工作经过短时期的发动群众，挖分浮财之后，立即转入打地分地的阶段。

在热河新区的土改工作中，由于各级党的组织掌握了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消灭封建土地制度的原则，慎重细致地划分阶级成份，使打击面维持在总户数的7—8%，所以减少了“左”和右的偏差。各级领导，点面结合，取得经验立即推广，发现问题及时纠正解决，保证了全省新区土改运动的健康发展，在春耕之前，新区土改工作胜利结束。

这次新区的土改运动，时间短、成绩大。据隆化、滦平、承德县和承德市的不完全统计，共分了496户地主、649户富农的土地5500余亩；牲畜（牛、驴、骡、马）1000多头；接收粮食5800多石；衣服9700多件；农具（仅隆化和承德市）近3000件。此外还有布匹、烟土、银两等财物。在新区的土改中，群众的发动是很充分的，仅承德县参加斗争的人数就占全县贫雇中农总数的60%以上，涌现出了一大批积极分子和干部。据平泉、丰宁、承德和隆化县的统计，土改中共培养提拔干部340余名。农村的党组织在土改运动中普遍地建立起来，仅隆化一县就发展党员430名，新建立支部42个。到1949年3月，热河全省农村党员已发展到3.8万名，支部1705个，党组织在热河农村中已扎下了根。

三、继续消灭“三害”的斗争

热河在全省解放的前后时期，继续开展了消灭匪患、鼠疫和

烟毒“三害”的斗争，并取得了除“三害”的彻底胜利。

彻底消灭土匪的斗争。1947年夏和1948年初，配合热河战场上的大反攻，热河地方武装又发动了清剿土匪的第三期作战。1947年5月下旬，冀察热辽中央分局和军区，命令彻底消灭制造柴火栏子事件的白金辉股匪，热西、热北两骑兵团立即投入战斗。与其进行了20多次战斗，终将该匪队摧垮，共歼灭500多人，只白金辉带百余人逃入国民党占领的多伦县城。热西独立团和围场、隆化两县支队、武工队互相配合，3次袭击盘据在张三营子等地的大股土匪，击毙俘虏匪首赵珍、郭九江（鲍三疯子）等以下700多人。流窜在热北的叛匪韩桑杰、二虎等，被蒙汉联军从巴林右旗追赶至扎鲁特旗，经过45天，大小数十战，歼匪200余人，迫使二虎带80余人投降，韩桑杰只身逃往蒙古人民共和国，后被逮捕归案，处以死刑。1948年5月平泉解放后，叛匪张其昌带千余人向青龙方向逃窜，被热河和冀东部队在义院口附近反复围剿，全部歼灭这股匪徒，张其昌被击毙。这一期作战共消灭土匪4000多人，大股土匪已消灭干净。

1948年11月热河全省解放后，又进行了清剿土匪的第四期作战，主要是清剿残余股匪。11月中旬，中共热河省委、省政府总结了3年来的剿匪成果，重新作了剿匪部署，规定了继续发动群众，组织政治攻势与军事清剿并重的方针，各县普遍建立了剿匪委员会，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发动群众搜山查村，开展政治攻势，消灭瓦解了一批土匪。仅据隆化，滦平、大阁、丰宁等县统计，共争取瓦解土匪3736人，缴步枪1588支，手枪49支，机枪32挺，炮2门。逃亡地户还乡的4423户，12281人。承德县下板城还乡团小头目刘成稳，在军事压力和政策感召下，带24人，15支大枪，2门小炮向区政府投诚，受到宽大处理，相继又有77人投降。

经过近半年多的清剿，股匪已被消灭，但仍有一些匪首在逃，并继续为非作歹。为此，热河省军区发布剿匪命令，要求各

部于8月5日开始，限在8~10月三个月内彻底清剿匪特。各地采取由公安、武装组成小分队或小组的办法，化装深入土匪活动地区，彻底清剿土匪。利用这种办法，使热西罪大恶极的匪首伊相乃、热东匪首于清泉、热中的刘汉章、热南的赵辅臣、姜怀义等先后被击毙或抓获。热河的剿匪斗争，持续到1951年9月，终 将残余的武装特务、土匪肃清。

清除烟害斗争，吸扎鸦片烟，是热河省的一大害。据日伪于1941年统计，热河省烟民60万，占全省总人口的10%。解放后，民主政府虽三令五申，严令禁绝，也收到一定的成效，但由于战争的原因，不能从根本上杜绝，到1948年统计，热河全省（热西、热南在外）尚有烟民30多万人，是土地改革后发展生产的主要障碍。第二次解放后，热河省政府再次做出了禁止种植罂粟的决定和禁止买卖鸦片的决定，对种植和贩卖鸦片者，轻者处以没收或徒刑，重者处以极刑。1948年12月1日，热河省政府又发出《关于戒烟工作的指示》，规定了5条禁烟措施：第一，开展群众性的戒烟运动，号召烟民戒绝嗜好，重新作人，人人劝诫说服，人人监视检举。第二，戒烟与生产、说服与强制相合，成立戒烟所，把烟民集中起来，强制戒烟。第三，加紧杜绝烟源，毁掉烟具。第四，认真督促调查，赏罚分明。第五，充分利用报纸，广造戒烟舆论与声势。这个指示还规定：凡45岁以下的青壮年烟民，一律于1949年4月以前全部戒绝，其余年老病弱的烟民，至迟于次年秋收前全部戒绝，不容拖延与忽视。

同时，为了加强对戒烟工作的领导，热河省政府成立了戒烟局，各专（盟）、县（旗）、市政府成立戒烟科（所）、区村建立戒烟委员会。热河省政府主席李运昌、副主席罗成德、杨雨民还联名签发《热河省戒烟禁毒奖惩条例》，规定凡染有大烟嗜好者，均须一律向村政府登记，并限期禁绝。凡未完成戒除烟瘾，不积极参加劳动生产的烟民，其土改分得的土地由农会代管并暂不发给地照，其财产亦由农会监督管理。不得自行典当，直至确实戒绝嗜好后，经政府

审查批准，才发地照与取消管制。对于继续种植、贩卖和吸扎毒品者，区别情节轻重，分别处以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对于知情不举，隐匿不报，或执行不力，借故袒护，徇情受贿；或贪赃枉法，纵容逃脱者予以惩处。对于凡热心协助政府劝诫他人不种烟或戒吸扎毒品，其成绩特大者；检举并缉获私藏烟毒者；烟民提前戒绝，并帮助2名烟民戒烟者都可以给予奖励。1949年5月15日，热河省政府发布根绝烟毒的7条布告，明令指出：

“一、自布告之日起，凡种植、吸扎、贩卖、存藏等行为者，一律严加禁绝。二、不论任何穷乡僻壤，任何借口理由，均坚决不许种植一亩一株。违者除惩办当事人外，并酌惩当地主管政府。三、为顾念公私困难，自布告之日起，以公价每市两十市尺解放布限期收买两月，凡公私所存之烟毒，应自动交省府指定之土产公司收买，领取公价。逾期不交者以私藏毒品论。四、自布告之日起以两月为限，凡本省境内烟民应不分男女老幼，一律自动向所属市、县旗、区村人民政府或戒烟委员会登记，按期戒绝。五、不论任何机关团体或个人，均不能贩卖毒品，无东北行政委员会与省府之证明文件者，亦不得在境内运输与输出。六、凡违反此规定者，均依照省府颁布之戒烟禁毒奖惩条例严惩不贷。七、凡机关团体或个人，均有对烟毒检举、缉查、劝禁之责，其确有成绩者，得依照省府颁布之戒烟禁毒奖惩条例分别给予奖励。”

采取这些果断措施后，热河省的戒烟禁毒运动收到很大成效。据1949年春至年末统计，烟民已由20余万减至数万人。到1950年初，共戒好烟民15.6万余人，占原有烟民总数的83.6%。1950年4月4日，热河省政府发出《彻底禁绝烟毒的指示》，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禁种、禁吸扎、禁贩卖、禁存储，查种、查吸扎、查贩卖、查存储”的“四禁四查”运动，并且指出：“务使家喻户晓，发动群众参加这一运动，彻底消灭全省烟毒”。在这场“四查四禁”运动中，采取了“强制烟民参加生产，加入换工组，成立劳动戒烟所”的办法 改变了过去“单纯

戒烟”的办法，劳动与戒烟相结合，开辟了一条戒烟的新路，使戒烟运动向前迈进一步。戒烟所中的烟民，专人负责领导，由生产救灾贷粮中解决吃饭问题，以后由烟民交还；每日规定生产任务，如送粪、翻地、耨地等，不参加劳动者不得食。这一措施的实行，使戒烟工作收到很大成效，到1950底基本上杜绝了烟毒。

消灭鼠疫的斗争。承德解放后，继续开展了消灭鼠疫的斗争。热河省政府下了很大力量，从人力、财力、物力上给予全力支持，仅1949年就拨出72亿元（热钞）专款，用于防疫灭病工作，使这项工作有了坚实的基础。经过从中央到地方的共同奋斗，到1950年已经持续了4年的消灭鼠疫的斗争，取得了完全胜利。共捕鼠1200多万只，注射鼠疫疫苗70多万人次，疫区消毒面积达170多万平方米，培养出防疫人员400多人，鼠疫的发病率明显减少，死亡率下降。到1950年得到了基本控制，这场消灭鼠疫的斗争取得完全胜利。

“三害”的消除，是热河历史上的一大进步，铲除了这三个祸根，热河人民就再一次获得了解放。同时，消除了“三害”，社会秩序安定，劳动力增强，生产积极性提高，为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打下一个好的基础。

第十章 国民经济的恢复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

第一节 恢复生产 重建家园的斗争

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形势与基本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社会迈出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历史较变的步伐。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恢复和发展生产，完成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从而顺利完成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伟大转变，已经成为党和亿万人民的历史使命。

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开始阶段，国内和省内形势极其错综复杂。

在国内，由于解放战争节节胜利，中央及各地政权相继建立，国民党反动势力土崩瓦解，全国解放指日可待，亿万人民欢欣鼓舞，情绪高涨。但是，由于战争的破坏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掠夺，整个国民经济百孔千疮，工农业生产萧条，财政经济困难，物价上涨，市场混乱，职工失业，人民生活十分困难，许多灾民需要救济。另外，国民党少数残余军队还在一些地区负隅顽抗，大批政治土匪和各种反革命分子还在进行种种破坏活动，战斗任务还十分艰巨。民主革命任务还没有完成。

热河省自1948年11月12日第二次解放以来，全省由直接对敌大规模作战，转为相对和平的环境。农村中大部分地区土地改革工作已经结束，地权基本确定；省内外公路交通已经恢复；加之近两

年来的生产救灾运动愈加深入,人民生活得到改善,便利了以农业为主的生产建设,为恢复发展热河经济创造了条件。但是,由于热河遭受封建军阀、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多年统治和掠夺,烟害、匪祸、鼠疫的多年流行,致使热河人民仍然吃不饱,穿不暖,生活穷困。而且,在连年歉收的情况下,1949年又遭受多种严重的自然灾害,全省农业普遍减产,相当数量的农田颗粒无收。人民最迫切要求恢复生产,重建家园,解决温饱问题,因此热河省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开展大生产运动,一方面改善人民生活,一方面支援全国解放战争,争取全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同时,还要用多种多样的方式进行生产自救,落实鼓励恢复生产和发家致富的各项政策,更好的发挥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召开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加强政权建设;积极做好防疫灭病工作,开展文化教育事业等,使热河人民早日摆脱贫困,走向富裕,为经济的建设和发展创造条件。

二、首届劳模会和“无人区”代表大会

随着生产救灾运动的深入开展,全省各地涌现出许多劳动模范,他们在运动中积极带头、组织和领导群众同灾荒作斗争。为了推动生产救灾运动的发展,奖励发家致富,支援全国解放战争,热河省政府于1949年2月26日至3月5日在承德市召开了首届劳模大会。

出席大会的100名劳模代表,来自农业、水利、忌烟、支前、优属等各个战线,他们在抗战支前上是英雄,在生产救灾上是模范。劳模们的到来,受到省委、省政府3000多名机关干部的热情欢迎。热河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同志李运昌、马载、李子光、阎顾行、杨雨民等参加了会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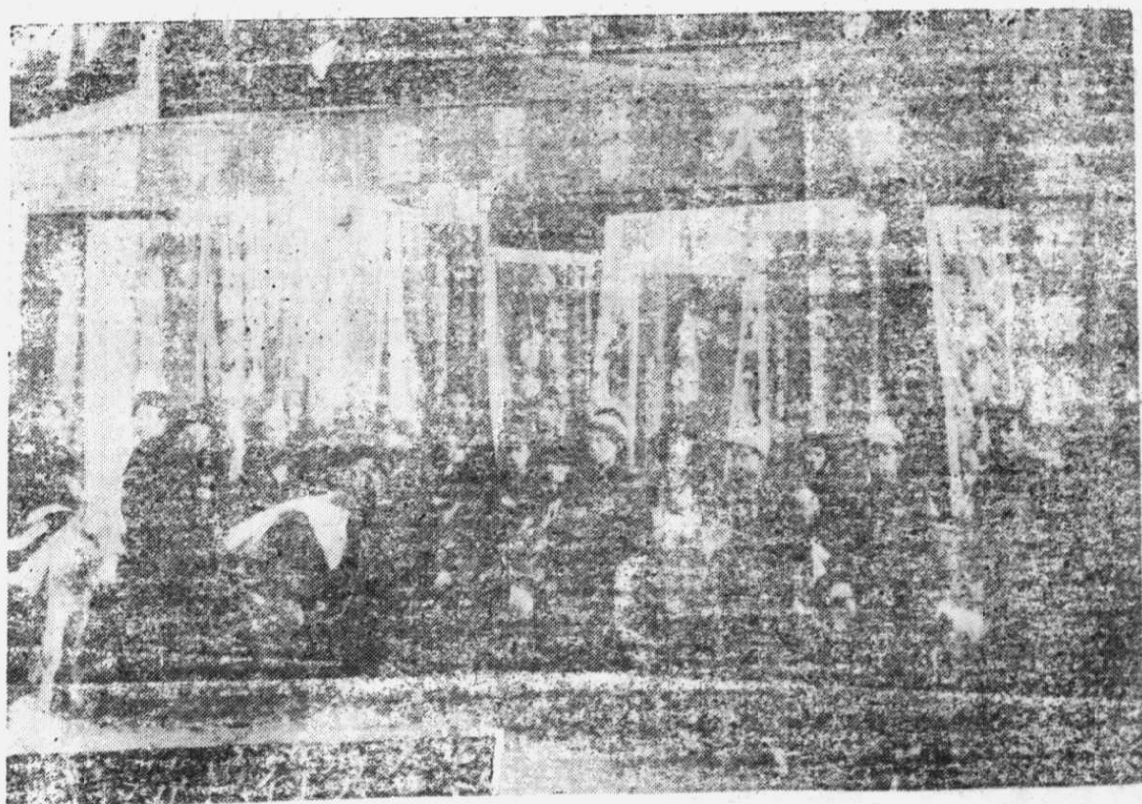
在这次会议上,热河省委书记兼省政府主席李运昌,提出了“三年有吃有穿,五年丰衣足食”的口号,成为热河人民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发展国民经济的奋斗目标。热河省委副书记马载在讲话中也指出:热河已步入整个和平建设时期,正是大家安家

立业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生产的时候，……要想办法叫今年不荒地，多打粮，改造烟民、二流子。大家都把日子过好，发财致富，才能支援全国战争的胜利，建设民主的新热河。热河省人民政府副主席阎顾行向代表们作了《1949年全省生产计划的报告》，着重指出，热河生产以农业为主，在有利的条件下，也要发展工业；其次是发展副业与手工业，在昭乌达盟则以发展畜牧业为主；使全省群众达到不挨饿，吃饱饭，有衣穿，不挨冻。

会议经过充分的讨论、研究，在农业、水利、合作社、妇女参加劳动等各种问题上制定了具体的发展目标。并选出省劳动英雄91人，其中王玉才、王秀英、汪其格、宋玉德、刘华山、李玉堂6人为特等劳动英雄。

首届劳模大会的召开，培养了生产救灾运动的骨干，明确了广大农民的努力方向，使他们认识到了自己在新社会中的地位，解除了发财致富的思想顾虑。通过对劳模的奖励表彰，不仅影响和带动了群众，起到了指导与推动全省生产的积极作用。同时也使广大干部学到了更多的生产知识和组织生产的经验，使以后的生产救灾运动变成了有领导有骨干的群众性的运动，为生产救灾运动的胜利完成，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首届劳模会之后，来自兴隆、青龙、承德、丰宁、平泉、凌源、建昌、宁城等9个县的136名代表，应省政府主席李运昌的邀请，汇集承德，参加了“无人区”、“集家区”人民代表会。这个会议是热河省委、省政府继首届劳模大会之后召开的又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目的在于培养抗战时的民族英雄成为今后的劳动英雄，以恢复饱受敌伪摧残的“无人区”人民的家园。代表会于3月16日开幕。李运昌在讲话中勉励坚持“无人区”，坚持抗战的骨干和民族英雄们，不要骄傲，继续前进，争做领导群众发家致富的劳动英雄。他还鼓励大家：在旧的房基上重建新房，在荒芜的草野里再种上庄稼，把破旧的粮仓打扫干净，准备装进新粮，齐心协力建设我们的新山区。他重申：现在我们的任务



热河省特等劳动模范得奖后合影

就是恢复与发展生产，今年要增产粮食1.8亿斤；要开生荒、恢复熟荒170万亩，南部要种20万亩棉花；每村1群羊，每家一头猪，两人栽活一棵树，5年成林，10年成材。在这次大会上还向代表们宣布了省政府关于拨出大批粮款，扶助“无人区”、“集家区”人民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决定。号召“无人区”、“集家区”人民把过去坚决勇敢的对敌斗争精神，继续发扬到生产上来，在今后一年生产中打下基础，三五年内做到丰衣足食。

这次大会的召开，沟通了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增进了党与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鼓舞了全省人民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斗志。

三、生产救灾的胜利

热河省经历了日本帝国主义12年多的殖民统治和国民党反动派近3年的抢掠与摧残，再加上战争创伤和连年水旱灾害，人民

生活极端贫困，生产力下降到最低点，曾经出现了严重的灾荒。1948年全省农业增产，灾荒有所缓解。1949年又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一些地方粮食绝收，粮食产量下降到55.2万吨，使一度缓解的灾荒又严重起来。全省有15个重灾县，灾民最高达到190万人，有120万人靠贷粮扶持过活，在这种情况下，热河省委、省政府掀起了生产救灾的高潮。省直领导机关首先行动起来，组织了千人工作团，深入灾区，村村坐阵，分片包干，配合各县旗干部组织、领导生产救灾。

在热河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灾区人民积极行动起来，开展搞运销、挖药材、打柴等各种副业，进行自救。丰宁县的农民积极开展运销副业，用本地土特产换回大批莜麦，不仅解决了吃粮问题，而且人人穿上了棉衣，没有饿死和冻死人，还增强了抢荒耕作的力量，没有留下一亩荒地。承德县409个村1.5万余户打柴渡荒，因灾荒粮少，柴价甚低，有时甚至1担80斤左右的柴禾卖不到6斤豆腐渣。在如此困苦的条件下，热河人民没有妥协和退缩，靠生产自救运动，减缓了灾荒的发展。

与此同时，热河省政府认真执行了“以群众生产自救为主，社会互助互济及政府扶助为辅”的方针，在财政、经济比较困难的情况下，仍对重灾区予以物质扶助。1949年底，热河省政府将收回的贷粮1000万斤重又如数贷下。1950年从春至夏，东北人民政府先后拨给热河省救灾原粮4000万斤（其中多数是为支援辽沈战役而从热河征购的存粮），中央和东北各省捐助热河省救灾原粮400余万斤；农业厅修堤筑坝造林等以工代赈粮740万斤，热河省竭尽全力紧缩各项财政开支，节衣缩食挤出原粮3000万斤用于救灾贷粮。共计为救灾贷粮9140万斤，于春夏全部贷给灾民。又发放农业贷款1500亿元（旧人民币），贸易公司贷出食盐500万斤，部队拨给救济衣30多万件。在生产救灾中，供销社也发挥了很大作用，他们积极收购灾民的药材、鸡蛋等土特产品，换回大批粮食、食盐、土布等生活必需品。

灾区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出人出粮，支援前线，为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很大贡献。在灾荒严重的时候，政府也时刻在关心着这些曾经参军参战和正在参军参战的烈军属们的生产和生活。在救灾中，开展了优属代耕工作。1949年底20个县旗统计，有军属4.6万户，22.6万余人急需予以扶助，解决其生活、生产困难，以渡过灾荒。据此，热河省政府于1950年2月下发了《优属工作指示》，1950年普遍实行了包耕制，使军属的生活在灾荒年达到一般群众的生活水平。

社会各界都对热河灾区表示了深切的关怀。非灾区人民努力生产，厉行节约，支援灾区；城市人民紧衣缩食支援灾区农民。形成了灾区有难，各界支援的局面。东北各地戏剧界进行了救灾义演，将演出所得全部捐献灾区。1950年3月11日，中央内务部长谢觉哉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我们一定要战胜灾荒》的文章，号召在全国“机关部队人员要普遍的掀起节约救灾运动”。他说：“为了救济灾荒，花钱的事情，不必花的可以不办或少办。许多地方机关人员正在号召每人每日节约2两米。暂无作战任务的部队正在号召每人每日节约一两米，不仅机关部队人员应这样做，非灾区的人民也应这样做。集腋成裘，对灾民将起很大的支援作用。”

1950年5月29日，热河省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会议以努力生产，战胜灾荒，走向富裕为中心内容，讨论并通过了政治工作报告和省委对今后工作的建议。1950年10月，热河省召开协商委员和政府委员第二次会议，热河省政府主席罗成德作了生产救灾工作简要总结。在严重的灾害面前，热河省“贯彻了以生产自救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的精神”，夺取了生产救灾的初步胜利，完成总耕地面积146万垧（每垧为15市亩），其中开生荒6.1万垧，增开稻田5800垧，植棉5.6万垧，原耕地除极少数涝洼地外，凡可种之地得以耕种，施肥面积亦由1949年的60%，达到82%。

经过全体人民和干部的共同努力，1950年热河省农业生产获得大丰收，粮食总产104万吨，比1949年增长95%，棉花总产2.1万多吨，比1949年增长5倍多。农业总产值达2.5亿多万元。从而扭转了当时的灾荒局面，取得了生产救灾的胜利。



热河省人民政府委员合影。（1950年3月）

四、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兴起

热河省委、省政府在解放区的土地改革结束以后，立即提出“组织起来，赛过单干”、“多打粮食，增加生产”的口号，积极领导农民开展互助合作运动。当时，农民虽然分得了土地，但由于反动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以及连年的战争创伤，农民家底空虚，劳力、畜力、工具严重不足，又加上解放初期自然灾害连年不断，疲于救灾，许多农民靠一家一户仍无力耕种土地。

“组织起来”的号召正是顺应了农民发展生产的强烈愿望。在各



热河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委员合影(1950年3月)

级党组织和政府的领导扶助下，到1949年6月，省内不少区、村的农民在自愿两利原则下，组织起了换工互助组，承德县郭家营子村的换工互助成为当时热河省的典型。该村77户，均自愿组织起来，成立19个换工组，4个“烟民”也参加了换工，全村生产情绪高涨，在换工互助中余出的劳力进行副业生产。

换工互助，是互助合作运动的起点。在换工互助中也发生了侵犯中农利益的偏向和领导不力的问题。承德县十一区南台子村一中农将牛借给外村使用，本村强行拉回，致使该中农将牛杀掉。三沟村中农、贫农联合座谈牲口换工问题，有些贫农提出中农将牲口交贫农喂，贫农则再借给中农使用，引起了中民的恐慌，有的中农则将大牛换成了小牛。还有的干部强令农民组织换工互助组或过份强调自愿两利，不加领导，使换工互助陷入自流。

针对上述情况，热河省政府在1949年6月下旬召开的农业科长会议上强调：组织换工时，应在旧有基础上，依自愿两利原则

扩大巩固,任何形式上的编组,放弃领导的现象都必须纠正。1950年初,热河省委书记王国权在凌源县人民代表会上再次强调指出:“我们必须认识,在缺乏牲口的条件下,想要多打粮食,必须组织起来,如一个人单干一天做八分地,组织起来就能做一亩地,组织得好,对劳动好的无坏处,对增加整个社会财富有很大好处。今年农贷主要贷给互助组,要提倡大家发财致富。过去做的有毛病,今年必须纠正,说服大家真正组织起来。”

到1950年6月,热河省已出现了三种类型的换工互助组。

第一类:是停留在旧有习惯上自发的换工组,多为不固定的临时换工,没有组长,牲口不顶工,不记工。这种换工组简便灵活,忙则换工,闲则单干,是互助组合作的最初级形式。全省各县旗均较普遍,尤以兴隆、建昌、承德为最多。

第二类:有领导、有骨干组织起来的小型季节性换工组。自愿结合,以工换工,畜牧插具,齐工找价,初步做到了互助两利,有些则逐步转为常年互助组。这类互助组形成了当时互助组的样板,代表着当时组织起来的主流。这类换工组,全省各县旗均有分布,其中以喀喇沁、建平、围场、隆化为最多。喀喇沁占20%以上,围场占39%以上,建平和隆化均占16%以上。

第三类:虽然也是有领导组织起来的换工组,但多数不等价,记工制度不尽合理。这类情况,各县都有相当一部分,较多者为喀喇沁旗,占组织起来的60%。

经过两年实践,到1952年6月,全省互助合作运动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显著的提高。据9个县旗统计:组织起来的劳动力已占总劳动力50%,其中常年组占多数。在互助组的基础上,根据中央和东北局“稳步前进,重点试办”的指示精神,在热河省委直接掌握下,1952年6月试办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1952年8月办起38个(包括宁城、翁牛特两个畜牧合作社)。其中:承德、凌源各4社,建平、喀左各3社,平泉、朝阳、敖汉、建昌、青龙、隆化、丰宁、宁城县(旗)各两社,北票、兴隆、承德市、喀喇沁、翁

牛特、乌丹6县(旗)各1社,只有围场、赤峰尚未建社。据21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报告材料统计,入社331户,土地44900余亩,男女劳力600余名,耕畜167头,新农具50余件。这些社大部分是领导骨干较强的常年互助组和三大季节组在组员自愿的情况下,由省、县主要干部亲自领导,有计划地组织起来的。建社后社员生产情绪高涨,除自留少数种菜地外,全部土地评产作股入社,由社统一经营,按股分红,劳力与土地分配比例,开始地多于劳,逐步增加劳力分配比例。社员由社统一指挥,评工记分,这些办得较好的互助合作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提高了农业生产技术,多打了粮食,为广大农民做出了示范,使广大农民群众对走“组织起来的道路”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农业互助合作的空气比以前大为浓厚。热河省的互助合作运动勃蓬兴起。

五、工商业的合理调整

全国经济工作实行统一管理和统一改革之后,工农业生产开始有所恢复,国内市场开始变为以国营经济为主体的为恢复生产和提高人民生活服务的市场,对外贸易的主动权也基本上掌握在国家手中。整个国家经济正在逐步从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轨道转上新民主主义的独立自主的轨道。同时,在国民经济这个历史性的转变中,由于某些原来依靠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工商业失去生存的依据,由于过去因投机商人囤积抢购所造成的虚假购买力的突然消失,因而若干物资一时供过于求,市场萧条,资金周转不灵,私营工商业大批停业,不少工人失业,劳资关系紧张,国民经济出现暂时困难。

热河省工商业规模和基础不但比较小,而且零星分散,大多数是分散的手工业,其萧条的原因除受上述问题的影响外,还由于:1、伪满与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苛捐杂税、掠夺破坏比较严重;2、在农村土改运动中,对保护工商业政策曾发生过一些偏差,使有的私营企业在恢复和发展上受到影响;3、战争的影响

和遭受各种灾害，造成了广大群众的贫困境地，购买力低，阻碍了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失业人数不断增加；4、由于资方把困难转嫁给工人，继续对工人无限制的剥削与劳资纠纷日益严重，也造成了工商业的不景气状况。

1950年下半年，热河省委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决定，对全省工商业进行调整，重点是调查公私关系，同时调整劳资关系和产销关系，调整国营工商业和私营工商业的关系。通过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和经销代销等形式，引导私营工商业按照国民经济的需要进行生产，并使之获得合理的利润，从有利于生产出发，按照“劳资两利”的原则，协调解决劳资之间的纠纷。调整产销关系，即逐步实行计划生产，使产销渐趋平衡。

在工业方面，根据承、赤两市及北票、朝阳、平泉、凌源等县的调查，1950年初共有952户，到1950年10月有966户。在这期间，废业133户，开业146户，总计增加14户。开业的大都是手工业、修理业。废业的多是迷信品制造业与纺织、染织工业。

在商业方面：1950年初共有3747户，到1950年10月，有3487户。在这一时期，开业395户，多系饮食、运输、煤炭等业。废业655户，多是百货、米、面等商业。两相比较共减少365户。

热河省人民代表会议召开以后，工商业者了解了政府的工商业政策，打破了某些工商户的顾虑，安定了情绪，歇业的开始筹划重新开业。加之秋后农民购买力增强，季节性商业由淡季转向旺季，逐渐有了起色。在此期间热河省针对本省实际情况，从1950年5月至10月间，对工商业进行了初步调整。

（一）国营贸易合作社减少了零售店，承德市国营商业取消了3个门市部，赤峰市取消了固定与游动摊床及打鼓敲锣的推销方式。

（二）劳资关系上，在有雇佣关系的私营企业普遍签订了劳资集体合同，组建了主要行业的劳资协议会议。承德市1950年有雇佣关系的15个行业，共签订13个劳资集体合同，组建了10个行

业的劳资协议会，初步形成了新型的劳资关系。

（三）国营商业对公私营企业进行了加工订货。

（四）组织了私营工业联营。承德市组织了工业8个行业60户联营，商业两个行业30户联营，起到了增加销售额，防止大小户间倾轧排挤，资金周转不灵的困难。同时，为了加速部分商业资金周转，6至8月银行对私营企业贷款27.7亿元（旧币）。

（五）根据中央规定调整了税收。提高起征点的有临时商业税、利息所得税、印花税，全部停征及一部分停征的共387种，合并征收的87种，降低税率的13种。促进了私营商业的好转。

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人民政府不仅帮助私营工商业克服了困难，恢复了正常的生产和经营，而且引导它开始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整个市场趋向繁荣。

第二节 党的建设与政权建设

一、热河省首届党代表会议

1949年上半年，热河省的各项和平建设事业已全面展开。中共中央和中央东北局为加强热河省的领导力量，于5月前后将原在热河工作后分配到辽西省的一批领导干部调回热河，对省委、省政府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较大的调整。调整后的省委领导班子仍由李运昌任书记，王国权任第一副书记，强晓初任第二副书记，李东治任秘书长，省政府由罗成德任主席，阎顾行、杨雨民仍任副主席。对热河省的行政区划也作了些变动。5月5日，省政府发布通令，重划本省行政区划为2市4旗19县。即承德市、赤峰市，喀喇沁旗、喀喇沁左旗、敖汉旗、翁牛特旗、承德县、赤峰县、凌源县、平泉县、建昌县、建平县、宁城县、围场县、乌丹县、青龙县、叶柏寿县、隆化县、丰宁县、滦平县、兴隆县、北票县、朝阳县、羊山县。将西拉木伦河以北的经棚县、林西县、

巴林右旗、巴林左旗、阿鲁科尔沁旗、克什克腾旗由热河省划归内蒙古自治区管辖。

7月，在省会承德市召开了中共热河省委第一次代表会议。到会代表125名，列席73名。大会选出李运昌、罗成德、王国权、阎厥行、李东冶、孙文彩、郭洪德、邱瑞华、程超杰等9人为主席团成员。会议的中心任务是传达贯彻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精神，转变热河全党的工作。

会上，李运昌同志传达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王国权同志传达了东北局高干会议的总结；罗成德、欧阳家祥、李东冶同志分别向大会报告了春耕夏锄、生产救灾和剿匪除奸工作。并通过了《中共热河省委第一次代表会议决议》。

《决议》首先分析了热河省当时面临的形势，指出热河省目前“仍存在许多严重的困难，如还有40万人民无饭吃，10余万人民无衣穿，及某些地方的旱灾、雹灾、虫灾、匪灾、病灾等。”同时指出“由于热河全境解放了，土地基本上平分了，封建反动势力基本被打垮了，广大群众大部分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的锻炼，具有一定的阶级觉悟和高度勤劳生产的积极性，因之目前困难虽然严重，只要我们不麻痹，抓紧领导，积极设法，是完全可以克服的。”

《决议》指出，由于热河无大城市，工业很少，矿山（除北票外）目前无力开采，铁路未修复，农村极困难，因之目前生产建设工作仍以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为主，因而目前工作的重点，一般也应在农村。但这绝不是说党的二中全会决议中所指出的，由农村转向城市，城市领导农村的方针不适用于热河，恰恰相反，我们必须在目前热河具体情况下，坚决地、十分有效地贯彻执行城市领导农村的方针。首先要积极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为工业建设服务，使农业生产尽快地满足工业原料与粮食的需要。

同时，又不放弃一切可能条件去恢复和发展工业。如除已有的火柴厂、肥皂厂、皮革厂、铁工厂、织布厂等继续发展外，还应



中共热河省委书记 王国权

革命秩序，建设整党，整编机构和节约开支等方面的工作，提出了具体的方针和政策。

1949年11月，李运昌调中央工作，由王国权接任热河省委书记职务，强晓初任第二书记。1950年8月召开中共热河省第二次代表会议，组成了由王国权任书记、强晓初任第二书记，罗成德（省政府主席）、杨雨民（省政府副主席）、肖佐汉（组织部长）、李东冶（秘书长兼社会部长）任常委，鲁森（宣传部长）、李荆朴（军事部长）、黄明政（军事部副部长）、王延年（公安厅长）、郭洪德（组织部副部长）任委员的中共热河省委员会。

发展土产的麻黄素、骨胶、猪鬃、打蛋和小规模的采金、采石棉等工业和矿业，发展小型机械工业、原料加工业以及手工业等。“只有这样，才是从热河具体情况出发，实事求是的贯彻二中全会的路线”。

《决议》强调，今后工作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仍是生产建设，必须百分之百地完成计划。

《决议》还就剿匪除奸，巩固农村的

二、热河省各届代表会议

1950年5月29日至6月4日，热河省各届代表会在省会承德市召开。来自省内各民主党派、机关部队、人民团体、工商界、文化教育界、医药界及各少数民族的315名代表出席了会议。

大会的主要任务是听取和审查省政府工作报告，讨论和决定热河省今后的工作方针与任务，特别是关于发展生产与战胜灾荒等重大问题，选举省政府、省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的领导人员。会议的总精神是进一步发扬民主，加强全省人民的团结，努力克服生产中的困难，战胜灾荒、完成春耕、组织劳动互助、为完成全省增产10万吨粮食的任务而努力！

热河省人民政府主席罗成德在《关于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支援前线、土地改革、生产救灾、财政经济、民主政权建设等方面的工作，向代表们作了详细的报告。

热河省委书记王国权在《努力生产，战胜灾荒，走向富裕》的报告中，阐述了灾荒的由来，以及我们能不能战胜灾荒等情况后指出：目前主要应以大力恢复农业生产。在农业生产中抓紧一切空隙，组织各种有利的副业生产，并做好贸易合作、交通运输工作，以扶助农业和农村副业的恢复与发展。关于工矿业今天还不可能大力恢复，只能面向农村，有计划有把握地进行。另外，应结合进行防疫卫生和戒烟工作，认真改造烟民二流子，开好人民代表会，增强基层工作，转变领导及干部的工作作风，进一步团结广大人民，巩固人民民主专政。

大会讨论并通过了罗成德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同意王国权代表中共热河省委对热河今后工作的建议，并同意将建议作为全省今后工作的方针。

大会选举罗成德、杨雨民、于振河等30人为热河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选举王国权、罗成德、李东冶等27人为热河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委员，并由省人民政府委员推选罗成德、

杨雨民为省政府正、副主席，省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推选王国权、罗成德为协商委员会正、副主席。

热河各届代表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全省人民空前的大团结，人民民主专政在热河的巩固与发展。

三、党内整风运动

建国后，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者。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是加强党的战斗力，促进革命事业胜利前进的根本保证。在七届二中全会路线的指引下，党领导的革命事业成绩巨大，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很高。绝大多数党员能够继续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谦虚谨慎，艰苦奋斗，联系群众，努力工作。但是随着党的地位的改变，新党员大量增加，少数党员产生了以功臣自居，贪图享受的“退坡思想”，有的领导干部竟因为别人叫他一声“同志”而不满，有的高高在上，不了解下情，布置工作脱离实际，强迫命令，个别的被“糖衣炮弹”打中而蜕化变质，甚至混入少数投机分子和坏分子。热河省委从1948年热河第二次解放以来，虽然不断地注意加强党的思想和组织建设，整顿不良作风，使这些问题有所收敛，但仍没有彻底解决，并且有蔓延和发展的趋势。为了克服党内这些不良作风，提高党员质量，改善党的组织状况，更好地担负起领导的重任，1950年5月热河省委按照党中央《关于整党的指示》精神，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整风运动。热河省委在《关于整风的补充指示》中指出：“我们这次整风主要是通过检查政策、检查思想与作风，发现我们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找出根源，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目的在于提高全党同志的思想政治水平，加强党员干部的政策观点，群众观点，进一步依靠群众，彻底转变我们思想作风上的毛病，克服各种脱离群众不讲政策倾向，以求进一步团结全党，发动全党的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加强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更好地完成党给我们的伟大而光荣的任务。”“整风的主要对象

是“第一，整官僚主义，不钻研文件，不很好领会党的政策，不深入群众，不了解下情，不很好根据实际情况与党的政策确定切合实际政策的办法。第二，整强迫命令，打骂群众，工作方式简单化，老一套，不宣传教育，不说服解释，不倾听群众意见，自己说了算，不民主等脱离群众的思想作风。”

热河省委于7月1日召开了党员干部大会，进行全党整风总动员，热河省委书记王国权作了动员报告，宣布运动开始。热河省委以省委、省政府的主要负责同志及各部、委、厅（局处）以上及省的主要企业单位负责干部为主，进行重点整风。领导干部首先以身作则，主动进行检查问题，然后自上而下地逐级进行。在按照党章检查个人思想和作风的基础上，各级党的领导机关按照党章评定干部党员的功过是非。在省委、省府及各有关部门整风的同时，还着重抓了财经部门的整风，做到了以上带下，以点带面。

8月份省委、省政府及主要企业单位整风结束以后，9月份各县开始整风，9月末结束。10月到12月底县以下一般企业干部、区一般干部及村支书、村长（党员）进行整风。农村党员整风在1951年春耕前结束。

通过整风运动，提高了党员的政治水平，改善了党的作风，密切了党群关系，纯洁壮大了党的队伍，提高了党的战斗力。使共产党真正发挥革命和建设的核心领导作用，保证了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各项任务的胜利完成，并为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作了重要准备。

第三节 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斗争

一、抗美援朝运动

正当热河人民同全国人民一起恢复生产，重建家园，为争取

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而奋斗的时候，美帝国主义于1950年6月悍然发动了侵朝战争。同时派遣第七舰队侵占我国领土台湾省，并派遣飞机侵入我东北境内侦察、轰炸和扫射，妄图灭亡朝鲜，侵略中国。

面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我国政府多次严正声明，中国人民不怕帝国主义的威胁，坚决站在被侵略者方面。为了维护祖国安全和朝鲜独立，党中央及时作出抗美援朝的重大战略决策，组成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怀着战胜帝国主义的坚强信心，跨过鸭绿江，到达朝鲜前线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

热河省委、省政府和热河人民，坚决支持党中央的正确决定。省委首先在市、县宣传部长联席会议上，布置了反对美国侵略与保卫世界和平的宣教工作。之后，召开了省直干部大会，省委书记王国权代表热河省委作了动员报告和具体工作指示。

通过广泛深入的抗美援朝宣传教育，提高了全省人民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觉悟，清除了一部分人中存在的亲美、崇美、恐美思想，广大人民群众纷纷以实际行动支援前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

热河人民向前线输送了8000余名子弟兵，1400余名干部，230余名军干校学员和1个“热河志愿担架团”（2000人），人数总计为13000余人。他们在前线英勇作战，艰苦工作，涌现出许多立功受奖的战斗英雄。承德县六沟区的青年农民徐森，参加志愿军后英勇杀敌，一人用三支枪打死打伤200个敌人，荣立一等功，并应邀回国参加了首都国庆观礼；热河志愿担架团某连，在第五次战役中英勇抢救伤员，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全连荣立了集体功，担架队员陈和通立了特等功。

在前方战士浴血奋战的同时，热河省广大人民在工矿企业中积极开展了生产竞赛运动；在工商界开展了不偷税、不搞投机倒把运动；在农村开展了交公粮、搞副业、支援前线运动。全省普

遍开展了捐献飞机大炮运动，经过全省人民的努力，共向前线捐献飞机17架，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正义战争。

二、镇压反革命运动

全国解放后，大陆残留的政治土匪和大批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及反动会道门头子，疯狂进行破坏和颠覆活动，严重地危害人民的生命财产和社会治安。尤其是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以后，他们的反革命活动更为嚣张。在热河省内，敌特先后在承德市、平泉、宁城三地组织先遣地下工作队；在滦平组织“东北救国军冀热察边区挺进队”；在喀喇沁旗等地组织“无极道”。这些组织勾结省内残余土匪，在热河省边沿地区、山林地带拦路抢劫，破坏生产；大肆造谣，写反动标语；装神弄鬼，动摇人心，扰乱社会治安；纵火焚烧，破坏道路。不对这些反革命分子实行坚决镇压，人民民主专政就不能真正巩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就不能顺利进行。为此，1950年10月，热河省委按照党中央《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的右倾偏向的指示》，全面贯彻党的“镇压与宽大结合”的政策。热河省委认为：过去强调宽大，利于瓦解和分化敌人，迅速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今天，中国大陆上已基本获得解放，且已经过了两年的和平建设，对于仍不痛改前非而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已不应再讲宽大，特别在目前紧张的战争形势下，对敌特的猖狂进攻，必须坚决实行镇压。否则，我们就会脱离群众，工作就会吃亏，人民就会流更多的血，革命事业就会受更大的损失。热河省委迅速发动群众，采取专门机构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法，从1951年4月起，大张旗鼓地展开了镇压反革命运动。

热河省镇反运动是从承德、赤峰、北票、朝阳、凌源、平泉等城市开始的，然后扩展到广大农村。农村把重点放在解放较晚的新区和工作薄弱区。在具体做法上，首先开展了反特除奸教育，召开公安局长会议和机关干部会议，进行关

于镇反工作的检查和动员，使领导和干部、群众从思想上解除和平麻痹思想。然后由热河省人民检察署、公安厅、省法院联合组成检查组，以省市监狱为重点进行检查。公安部门集中力量在工矿、城镇、交通线、山沟小道等敌特活动较突出地区进行侦察。对机关内部进行审查，查获并镇压了职业特务、贯匪，清理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反动道会门头子等170余名，破获特务案件²¹起，打击了反革命分子的嚣张气焰。这个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得到了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鼓舞了人民的斗志，提高了政治觉悟。全省出现了许多检举反革命分子的模范事例。由于广大群众积极行动起来，协助政府镇压反革命，布下了天罗地网，反革命分子纷纷向人民政府坦白认罪，交出反动证件与枪支。据10个县（旗）市的统计，有698名反革命分子向政府坦白自首。仅朝阳、围场、翁牛特、敖汉等地，反革命分子就交出枪支23支，子弹1000余发。

通过镇压反革命运动，全省的社会秩序安定了，反动谣言减少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安定局面。对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证抗美援朝，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和生产积极性，都具有重大意义。

三、“三反”、“五反”运动

随着私营工商业的发展，资产阶级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方面也暴露出来。一部分不法资本家不满足于获取正当利润，反对党限制资本主义的政策，采用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手段，对抗国营经济的领导，牟取暴利，妄图瓦解社会主义国营经济。资产阶级还采取“拉出去，打进来”等手法，腐蚀国家干部，在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下，国家机关中的“三害”（即贪污、浪费、官僚主义）也滋长起来。有的干部甚至蜕化变质。

国家干部中的贪污浪费现象，在1951年10月起开展的增产节

约运动中被大量揭发出来。为了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反对资产阶级的腐蚀，党中央及时号召全党进行一次大清理，彻底揭露贪污事件。

热河省委坚决贯彻执行了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在1951年12月25日召开的中共热河省委第三次代表会议决议中指出：大张旗鼓地继续深入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这是我们能不能完成增产节约任务的首要关键。因此，我们必须从上到下，从内到外，全面动员全党和全体干部大张旗鼓地放手发扬民主，号召坦白、检举，同时，由省到区均要成立节约检查委员会，并组织检查小组，向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展开尖锐的斗争。此后，“三反”运动在全省展开。

1952年元旦，毛泽东又在团拜会上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

热河省委书记王国权在1月13日热河省协商会议第五次会议闭幕式上，作了题为《大张旗鼓地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动员报告。同月22日，热河省政府依法逮捕了一些重大违法乱纪、贪污腐化分子。自此，“三反”运动迅速进入高潮，一批贪污盗窃分子受到党纪国法制裁。

随着“三反”运动的深入开展，揭发出资产阶级不法分子同国家机关中的贪污分子密切勾结，向全党猖狂进攻的严重情况。这就说明，资产阶级的“五毒”（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不除，国家机关和国营企业的“三害”也不能彻底扫清。为此，党中央于1952年1月26日发出了《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在全国各大城市，向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以配合“三反”斗争的深入开展。在“五反”斗争中，全省揭发了侵吞隐匿敌伪物资、贩卖金

银烟土、偷工减料等违法乱纪行为，并依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3月11日公布的《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分别给予了罚款、没收财产、逮捕、判刑、枪决等惩处。热河省委在“五反”运动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本家及其他市民，实行分化瓦解，孤立、打击少数不法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绝大多数。到1952年10月“五反”运动胜利结束。

“三反”、“五反”的胜利，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巩固了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创造了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有利条件；挽救教育了一批干部，提高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政治思想觉悟，增强了防腐蚀能力。但是，热河省的“三反”、“五反”运动也同全国一样，曾发生过扩大化的错误，出现“逼供信”的现象，伤害了一些好的干部。这些错误虽然在运动后期得到了纠正，但从思想上、政治上解决问题做得还不够。

第四节 国民经济的恢复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

一、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1952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周年纪念日，在这短短的三年中，热河省的工农业生产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农业方面，1951年全省粮食总产量达到78万吨，棉花总产4.5万吨，农业总产值近3亿元。1952年全省又获得了大丰收，农业总产值4.2亿多元，比上年增长40%。粮食总产量159万吨，比上年增长一倍多。棉花7.1万吨，比上年增长58%。畜牧业方面，1951年大牲畜发展到86万多头，比上年增长14%；羊107万多只，比上年增长29%；猪76万多头，比上年增长14%。1952年大牲畜发展到103万多

头，比上年增长19%；羊170多万只，比上年增长58%；猪121万多头，增长53%。三年来，封山136万亩，造林65万亩。过去许多遭受封建军阀、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严重破坏的山林，重新茂盛起来。而且，除去封山育林外，还在主要河流两岸建设护岸林和水源涵养林。水利方面，3年来基本完成了水利工程的恢复和主要河流的治理工程，全省开渠、打井使灌溉面积较1950年增加了10倍。

工业方面，1951年全省工业企业发展到3287家，工业总产值达到3400万元，比1950年增长47%。1952年全省工业企业发展到3517家，工业总产值6300多万元，比上年增长98%。工业生产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1952年达到7.8%。

贸易合作方面，由于贯彻了扩大土产内销的方针，活跃了城乡物资交流，农村土副产品得以畅销。对农村土副产品的采购，1950年比1949年增加180%，1951年增加310%。由于工业品价格降低，农副产品价格提高，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提高了购买力。

二、文化 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

解放前，热河省文化教育事业非常落后，一方面敌伪利用仅有的几所小学大力进行奴化教育；一方面劳动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求生尚所不能，更无受教育的机会，几乎人人都戴着一顶文盲的帽子。解放后，人民政府在大力肃清奴化教育遗毒的同时，贯彻文化教育“为国防建设和生产服务，学校教育向工农开门”的方针，使教育事业逐渐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省立一中（即原赤峰中学）学生180多人。省立二中（在建昌）举办27期训练班训练出行政、土改、财政经济等各种工作人员1100多人。省立三中（即朝阳中学）有学生200余名。各学校课程及教育设备已渐趋正规。除此以外，还创办了农业专科学校、医士学校、北票矿区职业中学等培养技术干部的学校。创办了工农速成中学和荣军初级中学。全省有55

万多儿童在5400多所小学中学习。由于全省财政经济情况的明显好转,1952年8月省政府接办了全部民办小学。小学校从1952年起改为秋季始业,实行五年一贯制,从而给小学教育的巩固和提高奠定了基础,给工农子女受完全初等教育开了方便之门。由于贯彻了毛泽东主席发展少数民族教育的指示,到1952年全省少数民族教育事业得到迅速发展。全省设有蒙民中学3所,回族、朝鲜族都有专为本民族办的小学校,共有2.3万多名少数民族儿童在校学习。1952年底,热河全省中等学校增加到19所,有教师600多人,学生1.6万多名;初等学校5783所,教师1100多人,学生59.7万多人。

在发展在校教育的同时,工农业余教育也得到了发展。1951年有56万多农民参加冬学学习。1952年转入常年民校的约有30万人。由于推行“速成识字班”,全省有许多文盲学习识字,从工厂到农村,从机关到街道,到处掀起了工农群众文化翻身的热潮。1953年冬学结束时,有6000名职工,20万农民摘掉文盲的帽子。

热河省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全省有1个职业文工团,3个电影放映队,1所戏曲实验学校,21个文化馆,9个文化站。全省有农村俱乐部500多个,业余剧团865个,秧歌队2100多个,歌咏队1100多个。此外,全省还有戏院9座,曲艺班13个,皮影班146个,洛子班14个,一支前所未有的文艺大军活跃在全省各地,并起到了推动各项中心工作的作用。

三、群众有吃有穿的目标实现了

从1949年初提出“三年有吃有穿,五年丰衣足食”的口号后,极大的动员了全省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生产自救,战胜灾荒,到1952年底,群众有吃有穿的目标已经基本实现了。

实现这个目标的主要标志是:第一,人均粮棉持有量提高

了。全省粮食生产从1949年至1952年的4年中，虽然由于自然灾害的影响，出现了低—高一低—高的两个小马鞍形，但粮食产量总的是大幅度上升了。1949年人均粮食持有量仅有220斤，1952年人均持有量即达到662.5斤，增长两倍多，初步解决了温饱问题。棉花人均持有量也由1949年的1.75斤增加到1952年的29.6斤，增长近17倍，穿衣的问题也得到了基本解决。第二，人民群众的购买力提高了。人民群众总的购买力，1950年比1949年提高149%，1951年比1950年提高51.4%，1952年比1951年提高157.1%。花布等日用百货的销售量，1950年比1949年增加230%，1951年增加700%，1952年增加1580%。从购买力和销售量两个方面都反映出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第三，国营厂矿职工的生活福利事业也有很大提高。1951年工资比1950年平均提高18.87%，1952年比1951年提高39.28%，并享受到了劳动保护待遇，老年工人开始享受养老金待遇，百人以下的企业厂矿已签定了劳动福利合同。1952年省内还新建了一所可容纳百名职工休养的疗养院，供职工疗养。第四，彻底消灭了土匪、鼠疫、烟毒“三害”，社会秩序安定，人民安居乐业。

同时，有吃有穿目标的实现也是经过许多斗争的。首先是同自然灾害斗，1951年遇上了严重的旱、虫等自然灾害，全省掀起打井修渠，兴办水利的热潮，共完成治水防洪工程503处，农田灌溉工程384处，扩大水浇地面积40多万亩。1952年打井2万多眼，开渠7900多道，扩大灌溉面积240多万亩，大大提高了农业的防旱防灾能力，其次，是同保守落后思想斗。这个口号提出后的第一年，农业生产就因灾减产，于是有人埋怨这个口号提的不对头，有不满情绪。针对这种情况，省委第一书记王国权在1950年召开的第二届党代会的总结报告中指出：“三年有吃有穿，五年丰衣足食”的口号是正确的，这个口号的意义是号召与动员广大群众争取经过三个秋收（不闹灾）一般能达到有吃有穿，经过五个秋收，一般能达到丰衣足食，这是动员群众努力生

产的口号，从今天许多上升村庄的情况看，大体上是可以达到的。但这个口号提出后，接着遭受了严重灾害，情况起了变化，时间当然可能拖长些。因而又提出：“战胜灾荒，较快地达到有吃有穿和丰衣足食的境地”的口号，这些都是正确的。存在的问题是，当时提出这个口号后，对于如何贯彻落实缺乏周密的考虑，缺乏较长期的规划和实施步骤，这是应当检讨的。但我们不应在这个问题上作空想，主要应实事求是的组织动员人民生产，争取做到热河人民的经济状况在三两年内起到相当大的好转。这次会议促进了干部思想的解放，增强了实现“三年有吃有穿，五年丰衣足食”这个奋斗目标的信心，把热河省的经济建设工作推进了一步。

有吃有穿的目标实现了，热河人民正在向丰衣足食的目标前进。

第十一章 贯彻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 开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第一节 1953年初的热河形势和第一个五年 计划的基本任务

一、1953年初的热河形势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胜利结束以后，大规模进行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条件已经具备。从1953年开始，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新时期。

在短短的3年经济恢复时期，热河省已经初步医治好多年来的战争创伤，并取得了民主革命补课的一系列伟大胜利，工农劳动群众的觉悟大为提高。

工农业生产经过3年恢复时期的努力，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1952年，农业战线上由于大力推行了互助合作运动和改革耕作技术，开展爱国丰产竞赛，农业生产获得了空前大丰收，粮食产量达到159万吨，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的25%，成为热河农村经济恢复与发展的转折点。^①全省出现了31个达到中央丰产奖励标准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互助组和农户，建平县黄元龄社，围场县董桂芝组和组员程永桐获中央政府农业部农业爱国丰产奖。此外，全省试办了36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两个畜牧社和一个集体

^①《中共热河省委关于7年来党的工作总结》和《热河省人民委员会关于7年来政府工作总结》。

农庄，有47%的农户参加了互助合作组织。

随着农业经济的恢复，热河地方工业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从小到大逐步发展起来，到1952年已有了农具厂、麻袋厂、打蛋厂、麻黄素厂、发电厂等工业。并建立了交通、邮电企业，支援了国营煤矿生产与热河经济大动脉叶赤、锦承铁路的修建工程。

适应恢复农业和工业生产的需要，国营与供销合作社营商业网已经健全起来，到1952年国营商业与合作社营商业的零售额占社会零售总额的74.6%，稳定了市场物价。

工农商各业的发展，为热河省开始大规模有计划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热河省开展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建设面临的困难还很大。从热河全省范围来看，虽然经过3年的经济恢复，但由于基础差，仍然面临很多严重困难。1953年初，正处在土地改革已经结束，集体化还未到来的过渡时期。经过土地改革，广大农民得到了土地，农村生产力已从封建制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农业生产已经开始恢复与发展起来，但农民绝大多数还是人畜个体经营，依靠人力、畜力、旧犁耕地，依然是具有很大局限性的小农经济。在工业方面，由于底子薄，破坏重，发展速度缓慢，远远不能满足农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需要。加之热河省经济开发较晚，地理条件较差，交通不便，商业很不发达，所以还比较穷困落后。热河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

二、“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

1953年，党在宣布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同时，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热河省委、省人民政府也制定了热河省在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基本任务：在农业战线，“继续推行和贯彻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巩固提高和发展各种类型互助组，积极稳步地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办好国营农

场，广泛开展技术增产与互助合作相结合的爱国丰产运动，并普遍增产，大片丰产，积极发展畜牧、林业和小型水利，做到以农业为主，农、林、畜牧、水利相结合，全面发展农业生产。到1957年粮谷总产量计划达到198.6万吨，比1952年增加16.6%；大牲畜达到183万头，山羊、绵羊达到543万只，猪达到158万口；计划造林25万垧；农业生产合作社达到1.5万个，入社户数占总农户的57.1%。通过农业的发展支援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并有计划地发展为农业服务的地方工业；积极稳步地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国营工业总产值1957年将比1952年增长435.2%。地方工业总产值1957年将比1952年增长404.9%。在地方工业中，国营、合作社营、公私合营工业生产所占比重由1952年的87.3%，上升到94.8%，私营工业基本上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轨道。手工业人数中约有28.5%加入手工业合作组织。同时，相应地发展贸易、交通运输和教育事业。商业社会零售总额1957年将比1952年增加124.6%，其中国营、合作社营商业比重，由1952年的74.58%增至78.3%，私营商业由1952年的25.42%下降为21.7%，私营商业中经销、代销及合营部分由1952年的0.03%，上升到13.66%。交通运输方面，公路货运周转量，1957年比1952年提高377.5%。教育方面，1957年中等学校在校学生将比1952年增加163.4%，小学将比1952年增加5.87%，其他文化、卫生、体育事业也都得到相应的发展，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

热河省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基于热河省农业省份的特点制定的。因此，为了保证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现，保证人民生活的需要和本省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就必须把发展农业生产，实现粮食增产，作为热河省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最突出的中心任务。这个计划，成为全省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依据。

第二节 宣传贯彻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

一、全面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

1953年9月，党中央正式公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就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并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号召全国人民为实现总路线提出的任务而奋斗。热河全省人民立即掀起了一个大张旗鼓的宣传学习总路线的热潮，进一步激发了全省人民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同时也为下一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热河，“一化三改”的重点是农业生产合作化。农业是热河省经济发展的基础。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不仅关系到农业这条重要战线社会主义革命的成败，也关系到全省工业建设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成败。所以，通过合作化的道路，首先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热河省土地改革任务完成以后，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已经改变，雇农、佃户和广大贫下中农有了自己的土地，翻身农民生产情绪高涨，为了解决畜力不足、无力耕种的困难，农民迫切要求组织起来，互相合作。党的互助合作政策集中代表了广大农民的意愿，一场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农业生产运动在全省普遍展开。

1951年9月，党中央召开第一次全国互助合作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同年12月，党中央把这个《决议》以“草案”形式发给各级党委试行。热河省委按照《决议》中指出的“各级党委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和可能的条件，根据积极发展、稳步前进的方针和自愿互利原则，逐步引导

农民走集体化道路”和“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的指示，很快把互助合作运动由以办互助组为主的初期阶段，发展到了试办农业合作社阶段。到1953年1月，全省已创办了38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一个集体农庄，占全省60%的农户参加了互助合作组织。为了总结经济恢复时期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情况，热河省委于1953年1月28日至2月2日在丰宁召开了全省第一次丰产模范暨互助合作代表会议。省政府主席沈越作了《全省人民动员及组织起来，争取1953年的更大胜利》的动员报告，提出了“以农业为主，农、林、畜牧、水利相结合，全面地发展农业生产的方针”和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计划，受到与会代表们的拥护和支持。这次会议，促进了热河省互助合作运动的新发展。到1953年7月，建昌、赤峰等7个县统计，有82%的农村党员，65%的农村团员参加并带动了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新组织373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全省241个区中试办4个社以上的有10个区。全省进入了试办合作社的新时期。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土地入股分红，劳动力评工记分，这种生产关系的变化适合群众的觉悟程度，符合生产力发展水平。人们之间的关系是互助合作、共同发展生产的关系。社的结构是自愿互利的经济组织。有利于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有利于改变旧的耕作方法，有利于推广新式农具和新的农业科学技术，因而增产效果很明显。农民非常欢迎，积极报名入社。省委、省政府在政策上主张积极发展，稳步前进；在做法上，先少点试验，再多点试办，逐步发展，大体上做到了基础扎实，步子稳妥。

1953年10月，全国第三次互助合作会议通过《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这个《决议》，是继第一个互助合作决议之后，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社的又一重要文献。全国第三次互助合作会议以后，热河省委加强了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领导，不久把热河省互助合作运动由试办合作社阶段推向了以发展初级社为重点的新阶段。到1954年2月，热河省召开第二次互助合作暨丰产模范

代表会议之前，全省已成立409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一个集体农庄，7万多个互助组，组织起来的农民占全省总农户的62%；会前不久，又批准建社1168个。

但是，在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过程中，个别地方也出现了违犯自愿互利原则，强迫入社和一轰而起、粗糙、草率、贪多求快的现象。1954年3月13日，赤峰县委向热河省委作出了《对新建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检查情况的报告》，热河省委在对这个报告所作的指示中指出：“赤峰县委报告说明今年建社中普遍的存在着粗糙、草率；个别地方曾违犯自愿原则，错误地采取了强迫命令，甚至形成了‘群众斗争’，这虽然是个别的，但是严重的，必须坚决克服”。1954年3月15日，热河省委副秘书长郝达对承德县三区互助合作情况进行检查之后，向省委报告说：“全区组织起来的农户，已占全区总户数80%。一般农民走社会主义的劲头很足，……但由于我们的一些干部尚缺乏办社经验，事先对运动发展估计不足，掌握不够，因之目前互助合作运动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健康的观念，个别问题表现得还很严重。”有的只凭热情办社，王家庄互助组基础很差，一下就办了三个社；有的追求百分比，山嘴村的干部在要求参加合作社的户数达到80%的思想支配下，把原来不愿入社或其他社不要的户凑合在一起，组成被干部群众称之为“筛子底下的”“破烂社”等等。

另外，由于政策宣传上的偏差，群众在总路线的宣传教育之后，一轰而起，自发建社，使领导在建社工作上失去了控制。承德县三区新建的41个社中，区直接掌握办起来的仅有18个，其余都是村干部和党员搞起来的，这种自发办社，完全脱离了原定的“由试点到试办，有计划稳步发展”的方针，建社数量失控以后，使出现的问题一时难于处理。结果许多互助组、合作社名存实亡，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撩荒无人过问”的状态。^①

①《中共热河省委关于赤峰县委对新建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检查报告的批示》，载1954年《工作学习》第114期。

针对这种情况，热河省委在《批转郝达同志检查承德县三区互助合作与备耕情况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一般应坚决停止新社的发展”。^①同时，热河省委作出决定：1、抽调一批办社有经验的干部，立即检查办社情况；2、对强迫入社的，应积极进行教育，征求本人意见，对不愿入社者，可允许其退社；3、新成立的社，尚未生产，不能搞过多的公共财产，使社员负担过重，更不能“摊派资金”；4、坚持自愿互利原则，民主解决以劳力为主的土地分配比例；5、加强对新社的具体领导和帮助，培养充实新社力量；6、当前中心巩固新社，提高老社，带动互助组大发展。随后，在全省范围内本着“巩固为主，局部调整，充实内容，解决问题，提高一步”的方针，对新老社初步进行了整顿。通过整顿，急躁冒进情况得到纠正。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阶段，由于有常年互助组作基础，前段发展比较健康，后段出现一些偏差，但纠正的比较及时，对生产力的发展影响不大。

1954年，由于在全国人民当中宣传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合作化运动又有新的发展。3月10日，经热河省委批准，赤峰县十二区小西牛波罗村的“五三”、“五四”、“红旗”、“黎明”、“光荣”5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联合起来，召开了2000多人参加的成立典礼大会，正式命名为“五三”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是热河省继“五一”集体农庄以后成立的又一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它的成立，成为热河省农业合作化运动进入发展高级社时期的标志，各地纷纷效仿，到8月全省有5万余互助组纷纷报名挂号，准备入社，致使一度曾被纠正的急躁冒进情绪又高涨起来。据建昌、翁牛特、围场等县（旗）报告，由于某些县区干部，不顾当地具体情况和群众觉悟程度，用主观主义和强迫命令的工作方法代替自愿两利原则，盲目追求建大社、高级社。凌源一区东山

^①《中共热河省委批转郝达同志检查承德县三区互助合作与备耕情况的报告》，载1954年《工作学习》第115期。

村看到东官营子村建立高级社，干部不分白天晚上天天开会，全村已报名入社97%还嫌少，仍连续开会动员入社。喀喇沁有一个村，全村除一户外都报名了，对该户仍强行动员入社，结果愿望与效果相背离，农民思想波动，生产情绪低落，部分农民甚至卖掉了耕畜。8月27日，热河省委发出了《关于在个别试办高级社工作中必须贯彻自愿互利，克服急躁冒进，迅速制止农民出卖耕畜的通报》，要求克服急躁情绪，保证建社工作的顺利进行。11月20日，热河省委农村工作部发出了《关于赤峰、滦平两县秋前建的社目前存在的几个主要问题的通报》，指出目前存在的三个主要问题：一、部分社建社粗糙，社员思想不稳定；二、社内生产搞不好；三、部分干部丧失办好社的决心和信心。并且指出：“如果不抓紧整顿，将会有一大批社员退社。甚至个别社有一轰而散的危险。”^①在这关键时刻，1955年1月，党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1月11日，热河省委正式作出了“暂停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大力进行整顿”的决定。1月18日，热河省委又作出了《关于切实整顿巩固现有1.2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草案）》。《决议》指出：在整社的方针上，首先应明确当前农村合作化运动的主要形式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而不是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生产资料上，主要是使土地、耕畜、大农具等集中经营和使用，至于小牲畜、果树、山林等入社问题则不应操之过急，待形势稳定并经过试办成功取得经验后，再逐步慎重发展。整社的顺序，一般应是先整问题严重的新社，后整一般的社。整社内容包括：

（一）思想整顿。普遍深入地学习社章，以合作社为中心，通过社员向广大群众宣传党的互助合作政策，纠正某些干部不敢使政策和群众见面的错误思想，使广大干部明确任务与政策一致

^①《工作学习》第137期。

性，启发群众觉悟，做到“依靠群众的自觉性，把合作社巩固起来。”

（二）组织整顿。对于社员户数，经过审查加以固定，新社经过民主酝酿，选出公道能干的干部，组成社务委员会，在社务委员会内，树立贫农的领导地位和组织上的优势，同时又有一定数量的中农参加，具体地体现依靠贫农、团结中农的政策。

（三）根据互利原则以劳力分红为主的精神，合理地解决社员入社的土地、牲畜、农具和社员劳力等报酬问题，为巩固新社创造条件。

（四）生产上整顿。加强生产的计划性，大部分社制定了农业生产计划，部分社在制定农业生产计划的同时，制定了劳力使用、财务管理计划。

对于老社的整顿，则是注意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借以提高社员办社的积极性。在整顿合作社的同时，带动了互助组的整顿，对因建社而拆散的互助组重新建立起来，对于退社或暂不愿入社的农民进行适当的安排，不但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也为将来合作社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截止3月10日，热河省已整顿的合作社占实有社的75%左右。社内主要问题已基本解决。盲目发展合作社的情况基本上得到了控制。3月29日热河省委向中央作了《关于整社工作的情况报告》。经过整顿合作社以后，建社工作比较慎重一些了。热河省委规定：“凡是建立高级社、畜牧社、果树社或新社50户以上、老社100户以上的大社，都要经省委批准；建立30户以上的新社，应经县委批准。”这一规定，对盲目建大社起到了一定的限制作用。

6月上旬，围绕着合作化发展速度问题，党内发生了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少发展一点好，还是多发展一点好。中央农村工作部一些人主张少发展一点，使合作化运动结合实际情况逐步推广；中央另一些人认为应当大发展。这场争论，本来是对合作化运动

形势的估计、步骤和方法上的分歧,^①但当时却把这些分歧上升为路线高度,批判了农村工作部的所谓“右倾”,肯定了合作化应当大发展的意见,这再一次助长了党内合作化问题上的急躁冒进情绪。这场讨论和批判也波及到了热河省。热河省委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检查了所谓的“右倾保守思想”。9月16日,热河省委召开县、区委书记会议,发出了“做好准备,迎接合作化的新高潮”的号召,这就再次使热河省农业合作化运动出现的偏差不但没有得到彻底纠正反而继续发展了。到1955年底,热河省全省入社农户71.7万余户,占总农户的72%,新老社共2.7万余个,全省基本上实现了农业合作化。这一阶段,由于从中央到地方不断批判合作化运动当中的“右倾保守思想”,合作化运动出现了较大的偏差,主要是对合作化的发展建设要求过急,规模过大,形式过于整齐划一,违背了由低级到高级逐步过渡的原则,一步登天地跨入了初级社和高级社,这给合作社的巩固带来了不良的影响,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从整体来看,热河省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还是好的。在热河这块贫瘠的土地上比较顺利地实现了深刻的社会变革,完成了由互助组到初级社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1954年和1955年在热河全省普遍遭受水、旱等自然灾害的情况下,获得了连续丰收,粮食总产量都超过了恢复时期。1954年达到157万吨,1955年达到175万吨,比上年增长11%。

二、增产节约运动和工业生产的发展

1953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热河省在工业战线认真贯彻“巩固与提高”的方针,在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实行经济核算,定额管理,采用科学技术,改善劳动组织等工作的同时,大力进行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开展了以技术革新

^①参见《中共党史教育提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4年5月版。

和增产节约为主要内容的劳动竞赛运动，从而保证了生产发展。

4月27日，热河省总工会、省人民政府工业厅和热河人民广播电台等单位，联合举行全省职工劳动竞赛检阅大会，号召全省广大职工把劳动竞赛计划变成全体职工的行动，推广先进经验，开展找窍门与合理化建议活动，提高质量，改进工具与生产管理，创造新的技术标准定额。全省广大职工纷纷响应这个号召，掀起了劳动竞赛高潮。

9月15日，热河省委又召开了增产节约运动动员大会，给劳动竞赛增添了新的内容。热河省委要求各个厂矿企业、行政单位和全体人民开展增产节约竞赛运动，以保证完成国家计划。在工业方面，“必须注意以下四点：（1）要实事求是，注意产销平衡；（2）要从产量、质量、成本三方面均衡完成计划，防止片面观点；（3）注意安全生产，防止加班加点突击运动，把生产与安全对立；（4）生产中要结合做好下一步及明年生产准备工作。”热河省委、省政府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组织了200余人的工作团深入厂矿企业，省委工业部和省府工业厅组成10个检查组，由陈光部长、郭耀臣厅长率队分赴北票煤矿、麻黄素厂、铁工厂等厂矿工地深入动员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增产节约运动的开展，激发了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了工业生产的发展，截止1954年12月中旬，全省共提出大小窍门和合理化建议达853（个）件。热河省劳动竞赛的特点是：紧密围绕发展生产，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把日常生产与劳动竞赛紧密结合，时间长，收效大，全省工业（小手工业除外）产值以1949年为100，1953年为1158；1954年又比1953年提高76.8%。生产数量及生产品种逐年增加，产品质量不断提高，生产成本不断降低。地方国营工业，1952年到1953年增加10个新厂矿；1954年扩建、改建及新建的又有21个厂矿。

与此同时，热河省的冶金、采矿等重工业也逐步发展起来。1951年4月1日寿王坟铜矿开始勘探，其后组建热河省金矿管理

局，负责寿王坟铜矿、小寺沟铜矿、大庙铁矿和双塔山选矿厂的发展建设。1953年5月15日，热河钒钛联合工厂（包括女儿河冶炼厂、大庙铁厂、双塔山选矿厂）恢复工程动工兴建，从此，热河有了规模较大的重工业。

热河省工业在恢复与发展中壮大了国营工业，保证了社会主义工业比重的不断增长。1950年国营与地方国营工业产值占58.46%，公私合营企业占1.72%，私营工业占34.87%。到1953年，国营与地方国营工业为67.94%，合作社营工业为10.53%，公私合营为0.6%，私营工业为21.46%。

在工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中，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壮大。1954年，热河省工业厂矿、基本建设及交通运输业已拥有一支3万余人的队伍，随着工业生产的发展，逐步地改善了职工的物质文化生活。工人工资以1949年为100，1953年已达到195.9。根据国家劳动法令到1945年9月，已有25个企业厂矿的1.5万余名职工享受了劳动保险。保护了工人的身体健康，提高了工人的劳动热情，保证了生产的不断增长。

三、对手工业和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手工业生产与农业和家庭副业生产有着密切联系。热河是个农业省份，手工业的基础很广泛，这对于补充热河工业产品之不足，对满足人民生活、生产之需要起着重要作用。热河全省有手工业者4323户，1.6万多人（半工半农者除外），这些手工业者60%分散在农村，30%以上集中于城镇，经营着缝纫、针织、食品加工等13种行业。其中，为人民生活服务的行业约占总户数的65%左右，为工农业的生产服务的铁、木、麻加工业约占总户数的30%左右，其余是为基本建设服务的烧窑、造纸、玻璃加工等业。

热河手工业的突出特点是，零散手工业多，多数是二、三个

入的“连家铺”，资金少，周转慢，无力储备原料，生产呈现季节性，易被私商所掌握，易遭受中间剥削。随着人民生产和生活的提高，手工业生产也在逐年发展。1952年全省手工业生产总值达2516万元，占工农业生产总值的4.6%。但是，这些手工业独立生产者，生产分散、落后、盲目、保守，限制了手工业生产力的发展和新技术的采用，不能适应经济建设计划性的要求和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

热河省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早在1949年就已经开始了。当时采取的办法是：说服教育，重点示范，引导手工业者自觉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由于手工业者是从事商品生产的，原料的供应和产品的销售对他们有着密切关系。根据这一特点，在开始试办手工业合作社时，一般是从供销入手，过渡到生产合作。首先有计划地供应手工业者以必要的原料，大力收购和推销其产品。这样，解决了手工业生产者的困难，保证其生产不断发展，从1951年到1953年，全省建立和发展了64个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社员739名，占总手工业人数的17%左右。其中有29个社是属于主要生产资料公有，有一定的公积金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占总社数的45.8%。由于合作社的生产由个体生产逐渐走向集体生产，生产资料由个体所有制逐渐改变为集体所有制，解决了个体生产不能克服的困难，不但保证了连续生产，而且促进了生产力发展，提高了生产水平，改进了产品质量，打开了销路，增加了收入。特别是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贯彻，提高了手工业者的政治思想觉悟，激发了广大手工业生产者的积极性。1953年全省手工业总产值达4566万多元，每个社员平均产值为2900多元，比个体手工业增加90%。广大社员亲自看到了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优越性，走合作化道路的信心更高了，纷纷要求组织起来。因而，热河省的手工业合作化运动有了进一步发展，进入了由重点试办到全面发展的新阶段。

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热河省委于1954年3月15日召开

了全省供销合作社暨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总结了几年来领导手工业生产、组织手工业合作社的经验，提出热河省手工业发展的方针和任务。会上，热河省委书记王国权作了题为《贯彻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为进一步提高与发展供销工作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而奋斗》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论述了热河省手工业的情况及其对人民生产、生活的作用，对个体手工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和热河省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发展情况和显示的优越性等问题，提出了今后对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应注意解决的几个问题。报告中指出：“采取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引导手工业劳动者在自愿互利基础上组织起来，走向合作化、现代化，是对手工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明确了“从供销入手，进行对手工业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的改造步骤。”会议还根据手工业的特点和手工业者的觉悟程度，提出“手工业生产小组，手工业供销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三种组织形式。这三种形式，大体上也是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一般过程。手工业生产小组是手工业合作化的初级形式，由独立的小手工业者或家庭手工业者组织起来，与国营商业或供销社建立联系，由国营商业或供销社供给原料，销售成品或给予加工订货任务。手工业供销生产合作，较手工业生产小组的组织规模，经营范围都有较大发展，它是由几个手工业生产小组或若干个个体手工业者组成的，它的特点是手工业者建立了自己的供销机构，来统一解决原料采购和产品推销的问题，使生产的采购、推销有所分工，并建立了各种生产管理制度。这种生产形式，已逐渐变分散生产为集体生产，逐渐积累了公有财产，与国营企业的关系更加密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是手工业者组织起来以生产为主的集体组织形式。它是城市或乡村的手工业者自愿联系起来从事集体生产的手工业合作工厂，一般是由手工业供销合作社或手工业生产小组发展提高而成。在国营经济指导下，集体进行生产。这种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资料已经集体所有，并实行了按劳分配原

则。这样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是把个体手工业私有制改造成为集体所有制的主要形式。

热河省手工业合作化运动，经过此次会议总结推广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经验以后，有了更大的发展。为了加强对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领导，在省、市、县（旗）先后成立了手工业管理局和手工业联社筹委会，并在个体手工业中建立了手工业劳动者协会等组织。这些组织有力地推动了手工业合作化运动全面深入开展。1954年3月，全省已成立的64个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中，有铁工社18个，翻砂社2个，木工社18个，服装社17个，鞋业社2个，皮麻社3个，针织、石灰、采煤等生产合作社各1个。有职工2000多人。据47个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统计，共有资金46万多元（新人民币），总产值472万元（新人民币）。

1954年手工业合作化运动的大发展，大量的个体手工业者参加了合作社。但由于手工业合作社猛烈地发展，小生产者旧有的经营思想和作风，也带进了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中来，出现了一些缺点，不少基层社（组）在生产上忽视产品质量，粗制滥造，高估工料，甚至偷工减料，以次充好。在分配上分光吃净不留积累，损害了国家和社员的利益，影响着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巩固和发展。根据上述情况，为了进一步巩固与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在1955年初，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组）开展了整社运动，批判检查了损害国家和群众利益的经营思想和作风，进一步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改进了经营业务。同时各社（组）也进行了一次严格的审查工作，从组织上纯洁和巩固了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组）。经过整顿，不但使大部分手工业合作社（组）得到了巩固，而且许多初级形式的生产小组和中级形式的供销生产合作社，过渡为高级形式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随后开展了勤俭办社、反对浪费、厉行节约的生产运动，树立了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风尚，改进了生产程序，改善了管理，提高了

生产，增加了社员收入，改善了社员生活。

随着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巩固、提高和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更加发挥了它的优越性。根据典型社的调查，1955年上半年社员劳动生产率比入社前提高50%左右，社员每人平均年产值比单干增加2倍。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在群众中的威信日益提高，广大手工业者纷纷要求组织起来，手工业合作化的运动又前进了一步。手工业社（组）的生产更加活跃起来，除以大批的手工业产品供应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需要，活跃市场外，基本上贯彻了为农业服务的方针。仅1953年一年就生产小型铁器农具20万件，金属器皿42万件，比1951年增加近4倍，以后逐年有所增长。到1955年，全省各地普遍建立了手工业联社。

（2）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热河省地方国营工业基础比较薄弱，相比较而言，私营工业稍具规模。全省共有铁炉、锅铤、汽车、大车修理、木器、陶瓷、造纸、皮麻、肥皂、印刷、榨油、碾米、磨粉、副食、被服、轧花、制毡等18个行业，雇用3个工人以上的私营工业144户，职工1047人，年产值约2900多万元。其中铁锅炉、木制造业占私营户55.6%，其他平均每个行业只有4个左右的从业者。私营工业户数承德有55户，赤峰54户，朝阳35户。承德、朝阳、赤峰、北票、青龙、凌源、丰宁7个市县占私营总户数的86%。其主要特点是：小型多、大型少；合资多、独资少；行业多、户数少；手工作坊多，机械动力少；资本家带技术参加生产者多，纯剥削者少。

由于工业分布状况和地理条件的决定，除北票是主要工业区外，承德、朝阳、赤峰、平泉、凌源同时又都是商业区；其他地区均是半农、半商的农村集镇。热河省私营工业的特点和地理自然状况的特点又决定了热河省资本主义商业的特点。热河省工业产品的商业市场基本上是农村市场，有些小城镇实际上是联系城市和农村的供销纽带。商业的对象主要是广大农民。商业任务主要是供应农

民生产和生活需要。由于热河多山，地区辽阔，村庄分散，交通不便，因之市场带有极大的分散性；由于民族杂居，又形成了商业经营上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由于热河城市位于京、津、唐等大城市之间，自由市场流动性大，因之又形成了私商中大商少，小商多，座商少，行商多，摊贩普遍的现象。这些特点决定了热河省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非常弱小这个特点。

热河省解放不久，省委、省政府就按照党中央指示，确定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争取逐步将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后来又通过打击投机资本、合理调整工商业、“五反”运动等多项斗争，开始把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引向社会主义改造的轨道。

1953年5月，中央统战部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给中央写了《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报告。报告根据3年多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和限制政策的经验及其存在的问题，向中央提出了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尽量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那些足以利用的积极性，积极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并通过国家资本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业的重要建议。1954年，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导下，热河省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进展很快。私营工商业的棉花、煤炭、西药、茶叶、烧酒、肉食、铸铁、造纸等行业成立了合作小组，通过经销、代销、加工定货等初级形式，纳入了国家计划的轨道。特别是对资本主义工业的改造按照以大带小，以先进带落后的原则，在生产和经营有一定基础的私营企业中进行了公私合营试点和试办。热河省省会承德市是私营工业比较集中的城市。1954年6月10日，承德市较大的私营企业大兴铁工厂正式成为公私合营厂，第一个月产量就增加一倍。1954年9月14日，承德市又在全市私营工厂大户之一的东光铁工厂进行公私合营试点。从此，热河全省私营工业改造工作拉开序幕。到1955年底，在全省工业总产值中，私营工业只占5.69%。通过公私合营等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控制在国家计划中的产值占私

营工业产值的51.9%。在社会零售比重上，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零售比重占3.1%，私营经济零售比重则由1952年的25.4%，下降到13.1%。

热河省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原来的规模就很小，解放后又曾一度受高岗的影响，^①对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排挤多于利用改造，始终没有大的发展。所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任务并不大，完成的也比较顺利。

四、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

土地改革完成之后，农民生产积极性日益高涨，热河省连续夺得了1951年、1952年、1953年的大丰收，粮食产量超过了解放前的最高水平，保持了粮食市场的基本稳定。但由于城市和工业需要的逐年增加，人民生活水平逐年提高，食用量增大，政策执行不利和粮食投机商人的捣乱，使农村中的余粮户贮存观望，等待高价，对全省和国家的粮食收购计划不能按时完成，粮食销售则远远超出计划，造成产销不平衡，出现了粮食市场紧张现象。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使粮食收购和供应得到长期稳定，1953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决议》，决议指出：“必须在全国范围内，采取如下措施：（一）在农村向余粮户实行粮食计划收购（简称统购）政策；（二）对城市人民和农村缺粮人民，实行粮食计划供应（简称统销）的政策；（三）经实行由国家严格控制的粮食市场，对私营粮食工商业进行严格管制，并严禁私商自营粮食的政策；（四）实行在中央统一管理之下，由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粮食管理政策。”并要求各地在时间安排上在1953年10月底以前完成各级的动员和准备工作，12月初，在全国范围内同时开始统购

^①《热河省委关于对私人工商业问题向东北局的报告及东北局的批示》，载《工作学习》第53期。

工作。热河省委、省政府决定组成工作组，在围场县广发永村和朝阳、宁城等地进行征粮、购粮试点。并从省到村派出两千多名干部，组成宣传队伍下乡宣传，各县旗都召开了数百人到千多人的区、村干部大会，组织干部学习总路线和购粮政策，宣传踊跃卖粮的先进人物的先进事迹，打消了农民的思想障碍，激发了爱国热情。1953年底，全省范围内粮食统购工作全面展开，广大农民群众开始积极送粮，宁城榆树底村9个村干部，带头把2.7万余斤余粮卖给国家，并积极动员群众卖粮，仅10天时间，全村就超额完成了原定的售粮计划，各地出现了许多丈夫劝妻子，儿子劝父亲卖粮的动人事迹。

在购粮中，参加互助组、合作社的农民卖粮数量多，质量好，又一次显示了组织起来的优越性。“五一”集体农庄一次卖粮11万斤，省著名劳动模范杜昌领导的“富强”农业生产合作社卖粮7.5万斤。

但是，由于有的地区互助合作运动搞得过粗过快，某些措施不尽合理，农村供应工作缺乏经验，统购统销缺乏具体办法，也挫伤了部分农民群众售粮积极性，使一些农民对统购统销工作感到心里无底，出现了突击杀猪、宰羊，不热心积肥，不积极准备春耕等消极情绪。

针对这种情况，1955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决定采取定产、定购、定销措施，即在每年春耕之前，以乡为单位，将全乡的计划产量大体上确定下来，并将国家对于本乡的销售数字向农民宣布，使农民知道自己生产多少，国家收购多少，留用多少，缺粮户供应多少。这样使农民心中有数，情绪稳定。中央的这个指示发表后，热河省委于1955年4月1日发出了《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的指示》，《指示》指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

是缓和目前农村紧急情况，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进一步搞好生产，搞好粮食工作，巩固工农联盟的重大措施，是推动春耕完成农业生产计划的钥匙。根据我省具体情况，深入贯彻中央这一紧急指示，是刻不容缓的大事。”1955年全省力争完成统购粮食计划53.8万吨的目标。为了完成这个任务，省委结合贯彻中央粮食三定工作的指示，分批对各村进行三定工作。到10月20日前后，全省第一批1031个村的粮食三定到户工作结束。1955年9月25日到27日，热河省委和省人民委员会共同召开了粮食“三定”到户工作座谈会，总结各地“三定”到户工作情况，推广了两条先进经验：“首先，充分进行思想教育，发动群众，摸清情况，做好准备。其次，在做好宣传教育工作的基础上，进行逐户核定产、购、销数字工作。定产是三定的关键，采取划片选点，分等挂钩，逐户评定的定产办法较好。”9月25日，热河省委作出了《关于深入开展粮食“三定”到户工作的指示》，要求在完成第一批村的三定到户工作基础上，继续做好第二批两千多个村的三定到户工作。11月4日，热河省人民委员会召开县长会议，再次对第一批村的“三定”工作进行了总结，并对第二批村的“三定”工作进行布置。到1955年12月底，热河省“三定”和粮食征购任务基本完成。1954年到1955年热河省掌握了47万吨粮食，除销粮和必要的库存外，完成了18万吨粮食上调任务，比1952年热河省掌握的24万吨粮食增加将近1倍，改变了1950年底依靠国家调入粮食的情况，胜利完成了国家统购计划。

粮食统购政策的实行，取缔了粮食市场投机，保证了国家日益增长的粮食需要与粮食市场的稳定，对于热河省的经济建设和支援国家工业化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宣传讨论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公布以后，热河省成立了宪法草案讨论委员会。1954年7月12日，省宪法草案讨论委员会召开会议，通过了在全省深入宣传讨论宪法草案计划。8月12日，

热河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会上听取了热河省委书记王国权关于宪法草案的报告。王国权在报告中对宪法草案的制定及其伟大意义，基本精神等作了详细解释，并号召全省广大人民以实际行动来迎接我国宪法的诞生。接着首先在全省2.9万多名县以上机关干部中进行了学习讨论，省县负责同志均亲自向干部作了动员报告和讲课。对1万余名区级干部进行集中学习，组织了宣传员培训班，训练宣传骨干2.5万多名。全省有250余万群众听了宪法草案报告。

广大人民群众经过学习讨论，明确了宪法草案的主要内容，认识到了宪法草案与自己的切身利益，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和爱国主义热情，进一步增加了主人翁责任感，激发了生产积极性。群众反映：“过去有钱就有权，现在人民掌了权！”“过去茶馆、旅店都写着‘莫谈国事，现在宪法草案交给人民来讨论，人民真是当家做主了！”广大群众纷纷以实际行动拥护宪法草案的公布。全省工业战线开展了以“好、快、省”为中心内容的劳动竞赛，农业战线开展了以压绿肥、防汛和防治病虫害为中心内容的生产竞赛运动。

为了使宪法更能集中全国人民的意志，全省广大干部和群众认真负责对宪法草案提出了562条修改和补充意见。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胜利召开，大会正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它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奠定了基础。

第三节 发扬艰苦朴素作风，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的斗争

“穷”，是热河省的一大特点，在艰苦的工作条件和环境中，热河省的干部保持和发扬了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和密切联系群众的

工作作风，取得了战争和革命的胜利。随着和平生活的开始，工作性质和工作条件的改变，一些干部放松了思想改造，逐渐沾染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恶劣作风，给各项工作的开展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1952年的“三反”运动，对端正干部作风起了很大作用。但是，

“三反”运动，只是基本解决了县级以上各级机关工作人员中的贪污、浪费问题，以及某些领导者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问题。至于压制民主、不倾听群众呼声、强迫命令等许多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这些现象的存在，影响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热河省检查领导机关中官僚主义作风的突出表现是：高高在上，脱离群众，不进行调查研究，主观主义地布置工作，追求形式主义的单纯任务观点，满足于形式上完成任务，单纯要数字，不检查完成任务中的执行政策情况和工作方法。^①

这种官僚主义作风，给工农业生产及各项工作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在爱国增产运动中，不从实际出发盲目号召打井抗旱，甚至要求有些不需要打井的和在不适合打井的地方打了一些“看井”，造成了许多浪费。据北票统计，1952年抗旱运动中打了3200多眼井，有三分之一不能用。据朝阳统计，1952年打1100多眼井，有400多眼不能用。领导不顾客观效果，满足于数字成绩，并在1952年3月14日以敖汉沙漠地区尚能完成打井任务为典型事例通报各地，批评一些对抗旱打井有不同意见的干部思想保守。省税务局忽视政策执行情况，对超过缴税任务的各局盲目表彰，造成错征、错罚事件多起。官僚主义是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的温床。由于省及各部门有些领导存在着官僚主义，对下情所知甚少，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的现象不但随之发生，而且没有得到及时解决。朝阳、喀左旗用砸木橛子划棉区的办法强迫农民植棉。据朝阳9个区统计，就有1760多亩大田苗子被拔掉，翻种了棉花，因为土质不适宜，造成严重损失，仅五区郭家窝铺一村就损失20多万斤

^①见1953年2月13日、2月21日《群众日报》。

粮食。在收购棉花、猪肉，处理民事案件等许多问题上强迫命令的现象也比较严重。

违法乱纪虽然没有强迫命令现象那么普遍，但后果却很严重。主要表现为乱捕人、乱押人、乱吊人、乱打人、刑讯逼供等。据兴隆、敖汉、平泉、凌源等10个县旗统计，1952年就有逼死人命案15件，逼死人19名。

这些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现象，不仅在经济上给人民造成了严重损失，而且在政治上给党和人民政府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热河省委按照毛泽东主席指出的“如果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先克服了官僚主义，下面的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坏现象，也就会得到克服”的指示，首先在省直机关和各级领导干部中开展了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1953年2月19日，热河省委在承德市召开省市直机关干部大会，王国权作了《反掉官僚主义、强迫命令、违法乱纪坏现象》的动员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要认识我们省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基层干部中的强迫命令、违法乱纪是严重的，已成为完成伟大建设任务的严重障碍，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斗争，给顺利完成1953年的各项任务铺平道路。”新“三反”运动在热河省直领导机关率先开展起来，使广大干部从思想上认识了官僚主义的本质和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危害性，自上而下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并以省政府商业厅、公安厅、省人民法院、合作总社、农业厅、军区为重点，揭表现，挖根源，抓住主要问题和典型事例，大张旗鼓地进行处理。

热河省把开展新“三反”运动结合1953年中心工作进行，在各项工作中贯彻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精神，坚持边工作、边检查、边揭发、边纠正。

热河省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的斗争，在党中央和东北局的领导下，经过全体干部的努力，取得了很大成绩。广大干部认识到了官僚主义、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严重性

和危害性，提高了思想觉悟，懂得了做好工作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必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同群众商量的道理和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加强了领导机关的责任。以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代替了强迫命令的工作方法，以加强思想政策的领导代替了单纯追任务的形式主义的领导。1953年4月，为了搞好抗旱播种工作，省委书记王国权同志亲自率员到承德县三区三合、上台等五个村进行调查，对这些地区的抗旱工作亲自进行检查，发现这五个村的小型水利建设搞得很好，80%耕地可以按时播种。王国权根据这5个村的做法，总结并在全省推广了他们开展小型水利建设的经验，热河省委、省政府发出了“大力发动群众，开展水利建设，战胜干旱，保证增产”的号召。这一做法，对水利建设发展起到了好的推动作用。

通过这场运动，党、政府和干部的威信提高了。朝阳县犯严重强迫命令错误的领导干部在群众中进行了诚恳的检讨后，许多曾经受害的农民说：“共产党的干部知错改错，真是人民的好干部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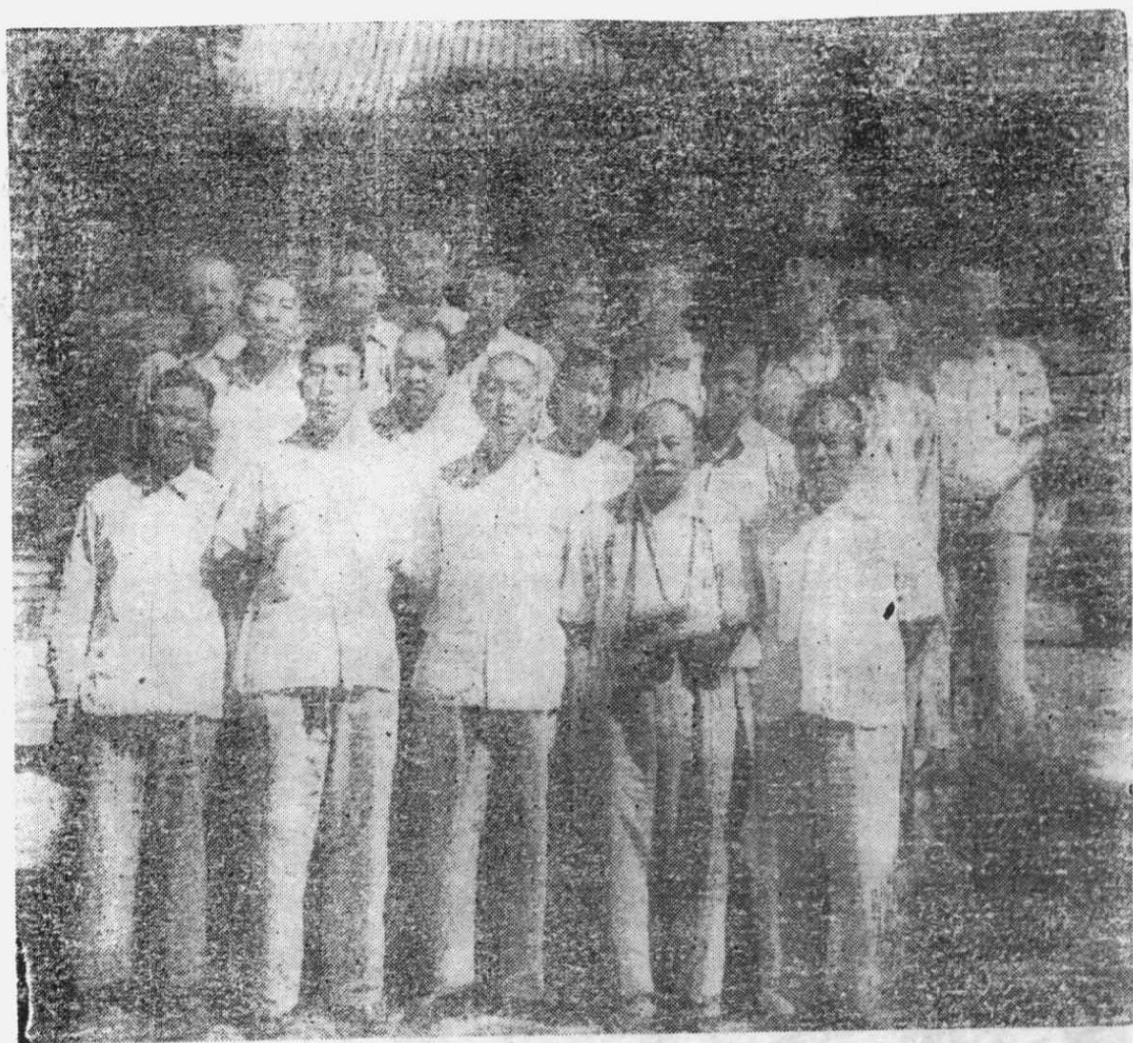
热河省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的斗争，得到了东北局的充分肯定。1953年6月13日，《东北日报》发表了王国权同志撰写的《热河省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斗争体会》的文章，并发表了社论《学习热河省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经验》。社论总结了热河省新三反运动的三条经验：

- 1、“有效地开展反官僚主义斗争必须领导有决心，广泛发扬民主，发动群众，激发干部和人民群众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行为的义愤，进行自下而上地揭发和自上而下的检查。”
- 2、“开展反官僚主义斗争和做好当前工作是紧密相关、并不矛盾的。只有密切结合当前工作，才能深入地有效地开展反官僚主义斗争，使反官僚主义斗争获得积极的建设性的意义。而正确地开展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结果，必然是大大改进了领导，推动了当前工作”。
- 3、“为了有效地开展反官僚主义斗争，在初步检

查与批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现象之后，必须及时指导干部学习新的工作方法，表扬好人好事，使全体干部都向好的典型看齐。发扬正气，压制邪气，对官僚主义斗争的成果巩固起来”。社论最后指出：“热河省的经验是值得各地广泛学习和运用的。……各省县应该结合这次学习，运用热河省的经验，进一步开展反官僚主义斗争，彻底揭发和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分散主义、主观主义及命令主义。”



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热河省代表。左至右：前排栗德萃、王国权、杨雨民、尔德尼。后排李耀先、刘长贵、赵斌。



热河省委领导同志在一起。(1953年)

前排左起；王延年、李东冶、王国权、杨雨民、肖佐汉。

第四节 工、青、妇群众团体的作用

(一) 工会组织

随着国家经济、文化事业的恢复与发展，工人阶级队伍也在不断壮大，绝大部分职工群众参加了工会组织，热河省1950年有工会基层组织344个。截止1955年6月底，热河省职工总数比1950年增加了88.1%；建立了邮电、店员、教育、建筑、公路运输和重工业6个产业工会，建立了铁路工会承德分区委员会，共有强

1207个工会基层组织，工会有了专职干部和不脱离工作岗位的工会积极分子1.7万余人。由于各产业工会、各市县工会、各基层组织以及广大工会积极分子在工人群众中的积极活动，更加密切了工会与职工群众的联系，增加了工会的号召力。

热河省总工会和各级基层组织带领工人群众在热河省的社会改革和经济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突出的一项是发动和组织全体职工群众开展了劳动竞赛。竞赛规模逐年扩大，参加人数逐年增加，内容逐年广泛。从1950年至1955年6月底的统计，全省职工共提出合理化建议1.7万余条，采纳实现1.1万余条，据能计算价值的3000余条计算，共为国家创造900余万元的财富。由于充分发挥了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劳动效率、企业管理水平和工人技术素质不断提高，在总工会的组织下，工人的技术学习和技术研究、技术讲座等各种形式的技术教育也逐渐形成制度。并通过生产会议形式，使职工群众参加了企业管理，发挥了工会组织的群众监督作用。

工会组织通过专门训练、业余训练以及实际工作的锻炼，六年来向各级党委、团委以及国家机关输送了825名优秀职工担任各方面工作，提拔行政管理和技术干部920人。

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了职工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1954年比1949年厂矿职工工资提高127.8%，建筑工人工资比1952年提高42.9%。到1955年10月，30个单位的3.3万余名职工享受了国家劳动保险待遇。开办了疗养院、托儿所，改进了食堂等福利设施。职工的劳动条件也相应得到了改善。在文化生活方面，工会与企业行政举办了业余文化学院，3.9万余名职工参加了文化学习，举办了70个职工俱乐部，130个图书馆，24个广播站，工会通过这些文化活动，鼓舞了职工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二）青年团组织

1946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建立民主青年团的

提议》。根据中央建团提议精神，热河省委于1946年12月1日首先在林西热河建国学院建立了全省第一个民主青年团支部。此后，在较巩固的解放区，在党的领导下，也试建了青年团组织。

1949年初，按照党中央《关于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热河省委于2月8日正式成立了热河全省的第一个正式团组织——承德市青年团。4月25日，热河省委发出《关于1949年建团工作指示》，各市、县、旗的建团工作迅速开展起来。全省团员发展到1000余名。

在热河省委的领导下，1949年5月21日至25日热河省首届青年工作会议胜利召开。会上，正式产生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热河省筹备工作委员会，强晓初、陈光担任正副主任。会后，全省各地有领导、有组织的建团工作普遍展开。到1949年10月底在工厂、机关、学校、农村、街道共建起两个团区委、两个总支、40个支部、发展团员613名。到1949年底团员猛增到1.5万余名。1950年3月7日，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发出《关于召开县区团代表大会的几个问题的指示》，承德市等一部分条件成熟的市、县、旗的团员代表大会相继召开，正式产生了市县一级团的组织。1951年4月2日，青年团热河省首届团员代表大会正式召开，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热河省委员会，陈光当选为团省委书记（陈光调走后由刘保胜继任）。大会经过认真研究、讨论，确定了今后团的中心任务是全力投入农业爱国主义丰产运动和开展工业生产竞赛，支援抗美援朝。至此，全省团员已由开始建团时的1000多名发展到4万多名，建起团支部2000多个，主要城镇、乡村都建立了团组织。热河省统一的比较健全的青年团组织正式建成了。

热河省青年团建立以后，积极参加生产和社会改革运动，有力地发挥了党的助手作用。在解放初期农民生活极其困难，遭受旱、涝严重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团组织从一建立就积极组织团员

和广大青年同群众一道展开生产自救运动，同严重灾害展开了顽强地斗争，尤其是在当时严重缺少耕畜的情况下，各地团员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带头参加或组织领导了各种换工互助组。仅1950年热河全省农村团员就有60—70%参加了互助组。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斗争中，广大青年团员积极参军参战，全省共向前线输送8000名子弟兵，1400余名干部，其中60%以上是团员青年；两千余人的热河志愿担架团中有50%是团员青年。在参加军干校的231名青年中，有169名是团员。另外，在解放初期的民主改革以及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斗争中，各级团组织领导团员青年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经受各项运动的洗礼，发挥党的助手作用。

全省各级团组织，在教育和组织青年立足本职岗位，同成老年人一道发挥作用的同时，经常结合青年的特点，通过组织青年突击队等各种形式，领导团员、青年参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开展生产运动。这种适合青年特点的生产组织形式，对突破劳动定额，提高生产效率，节约挖潜，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任务方面，起到了显著作用。据1955年9月承德市、北票矿、朝阳县、一〇二勘探队、省工程公司等6个单位统计，在厂矿生产单位和基本建设单位共建成青年突击队等组织329个，参加人数达8000余人，其中团员、青年占6800余人。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各地青年突击队等组织仅拣废金属一项就为国家创造价值26万余元。

在农村，全省共建立青年突击队、科学技术小组等组织2600余个，参加人员达2.6万余人，这些青年突击队等组织在修路挖渠，打井抗旱，抢种收割，植树造林，互助合作等各方面都发挥了很大作用，仅植树造林一项，1955年统计，热河全省61万青少年共造青年林2.5万余亩，植树1200余万棵。由于组织领导工作细致具体，准备充分，技术指导及时，成活率普遍较好。1955年8月20日，青年团中央发出了《关于发动农村青少年在秋收中开展减少粮食、棉花损耗运动的指示》，全省参加这一运动的青少年

达140余万名，占150万农村青少年的90%，共拣回粮食44 0万斤，籽棉6万多斤，并且组织了3000余个护秋队，参加人数达5.5万余人。另外还以团支部和合作社团小组为核心组织了1100余个秋收突击队，参加人数达7万余名，抢收庄稼9千余亩，增收粮食9万多斤，充分显示了青年团员在各次运动中的生力军作用。到1955年，数以万计的青年、团员成为全省城乡各条战线的先进人物和骨干积极分子，其中有39名团员当选为省级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19名青年团员被选为出席全国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和积极分子。

（三）妇女组织

热河省早在抗日战争时期，部分村就建起了革命的妇女组织——妇女抗日救国会。解放战争和土地改革运动中，在妇救会的基础上，大批建起了妇女会，成为协助农会开展反封建运动的有力助手。1949年热河省妇委召开省直女干部代表会议，建立省妇联筹委会。同时根据1948年东北妇女代表大会的精神，全省各县开始重新组建与整顿妇女会，在原有村妇女会的基础上，按照东北妇女组织条例，普遍建起了村妇代会，县以上建起了民主妇女联合会。1949年11月1日，热河省召开第一届妇女代表会，产生了热河省民主妇女联合会，常玉林任主任，张敬宽任副主任，成为热河省各界妇女的领导核心。

几年来，热河全省广大妇女积极参加了工农业生产运动以及各项政治运动，她们不仅在各种运动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作出了很大的成绩，同时也锻炼提高了自己，从根本上改变了妇女的政治、经济、社会与家庭的地位。特别是宣传贯彻总路线以后，广大妇女的社会主义觉悟有了显著提高，她们在热河省民主妇女联合会的带领下，踊跃参加了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较为突出的是广大农村妇女，踊跃参加了互助合作运动。据1953年统计，参加互助合作组织的妇女劳动力已占全省妇女总劳动力的55%；

1954年、1955年参加互助合作组织的妇女劳动力又逐年增多。热河省民主妇女联合会在1954年10月1日总结妇女工作的发展与成就时指出：“大部分妇女懂得：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生活才能更幸福，也才能获得妇女的彻底解放。”在互助合作运动开展较好的地区，妇女亲眼看到了或亲身体会到了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好处，就更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赤峰小西牛波罗村“五三”农业生产合作社女社员说：“水往洼处流，人往高处走，我早知道入社这么好，早就入社了。”

几年来，广大农村妇女在农业生产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她们和男子一起战胜灾荒，赢得了连年丰收，每年都有85%以上的妇女参加农业生产。在牧业区，妇女成为饲养牲畜的能手；在产棉区，妇女成了采棉的主要劳力。

由于广大妇女在生产运动中做出了重大贡献，因而大大提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大批妇女被选为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副主任和管理委员。生产和互助合作运动中共有万余名妇女被选为村人民代表和生产劳动模范，在经济上也转变了单纯依靠男子生活的状况，取得了较为独立的经济地位。

第五节 热河省建制的撤销

一、热河省委第五次代表会议和省人大一届三次会议

1954年8月，中央作出了关于撤销大区及合并若干省市建制的决定，并相继撤销了辽西、察哈尔等省。8月13日，热河省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会上沈越主席传达了中央关于撤销大区及合并若干省市建制的决定。热河省委根据中央决定精神，经过研究，呈请中央撤销热河省建制，并经中央研究批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公布。

1955年7月19日，热河省委发出了《关于认真做好撤销我省

建制宣传解释和准备工作的指示》，省委和省人民委员会一方面着手进行撤销建制的宣传解释工作，要求全省干部“不但不能因此对工作有任何松懈，而要认真做好当前工作，努力增产，厉行节约，兢兢业业，克服困难，全面完成国家计划，为迎接划省，做好移交准备工作”；一方面认真着手总结几年来党政工作的经验教训。在充分酝酿的基础上，热河省委和省人大分别召开了省委第五次代表会议和省人大一届三次会议。

热河省委第五次代表会议传达和讨论了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的各项决议和毛泽东关于农村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传达讨论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会议以农村合作化为中心，全面规划了各项工作。讨论和通过了《中共热河省委七年来党的工作总结》，作出了《拥护中共中央关于撤销热河省建制的决议》。

省人大一届三次会议经过小组和大会充分讨论，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热河省人民委员会关于七年来政府工作总结》、《热河省人民委员会1955年工作报告》、《关于拥护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撤销热河省建制的决议》以及《正式结束热河省人民委员会工作问题》、《关于修建革命烈士纪念馆与革命纪念碑》等项重要决议。

这两个大会，是热河省撤销前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党的七年工作总结》和《政府工作七年总结》，是热河省建制10年过程中对党政工作的主要总结，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会议通过的《拥护撤销热河省建制的决议》，对顺利进行划省交接工作，起到了重要的保证作用。同时，这两个会议又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三年任务基本胜利完成，第四年度即将开始的动员大会。会上对今后工作做出的安排，对划省后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基础。

二、省委、省人民委员会的两个《七年工作总结》

热河省委第五次代表会议和省人大一届三次会议分别通过的

《中共热河省委关于七年来党的工作总结》和《热河省人民委员会关于七年来政府工作总结》，对热河省党政两方面的工作基础、工作内容和工作成绩进行了全面回顾。

《总结》指出，热河省的工作是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基础上开始的。热河省党政领导机关自1949年第二次建立到现在（1955年），已经整整7年了，7年来的热河工作大体经过了两个阶段，即经济恢复与经济发展阶段。

《总结》指出，为了完成热河省经济恢复阶段的任务，1949年提出了“恢复生产，重建家园”、“战胜困难，走向富裕”的口号，在国家大量贷粮、贷物的帮助下，很快使热河省的战争创伤得到了医治，渡过了极端困难时期，完成了新区土改，清除“三害”的斗争，夺取了农业大丰收。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地方工业、国营与供销社营商业也不断发展，胜利完成了恢复时期的任务。同时，镇反运动的进行，“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展，党的发展和政权的建设，都为热河的经济恢复起到了保证作用。

《总结》指出，从1953年开始，热河省进入了发展建设新时期，为了适应新时期、新任务的需要，开展了“新三反”运动，改进了领导作风，密切了党群关系；大张旗鼓地宣传了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开展了爱国主义劳动竞赛，进行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些有力措施，促进了经济建设不断发展。农业战线连续获得了大丰收；国营和地方国营工业不断发展，商业市场日益繁荣兴旺，第一个五年计划头三年的任务基本胜利完成。

三、热河省建制的撤销

热河，自1723年（雍正元年）设立建制以来，经历了232个春秋，于1955年底正式撤销。

在解放前的漫长岁月里，清王朝、封建军阀、国民党和日本帝国主义对热河人民进行了残酷的政治压榨和经济剥削，把大好的热河搞得满目疮痍，民不聊生。但是热河人民是不屈的人民，

他们或是分食大户，抗捐抗税；或是揭竿而起，武装反抗，反对清王朝、封建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英勇顽强，前仆后继，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终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打碎反动派的反动统治，夺得了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

解放后，热河省经过经济恢复与发展建设两个时间，经济落后和受灾情况实现了好转，工、农、商各业都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提高，第一个五年计划头三年的任务基本完成。热河省建制的存在，对这个地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全国进入有计划的国民经济建设时期以后，随着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正轨，热河省暴露出了行政区划与经济区划不相适应的矛盾，在物资交流上经常受到行政区划的限制，发生不合理的逆转，使经济交流和发展受到障碍。因此，将热河省建制撤销，所属县市分别划归相邻的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和河北省，则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经中央、国务院反复研究，于1955年7月18日正式批准，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于1955年7月30日公布撤销热河省建制，把热河省所辖地区一分为三，将承德、围场、隆化、丰宁、滦平、平泉、青龙、兴隆8县和承德市划归河北省；将朝阳、北票、建平、建昌、凌源5县和喀喇沁左旗划归辽宁省；将宁城、赤峰、乌丹三县和敖汉旗、喀喇沁旗、翁牛特旗划归内蒙古自治区。

中共热河省委第五次代表会议和热河省人民代表大会一届三次会议分别作出决议，坚决拥护撤销热河省建制。省人民代表大会宣布，于1955年12月31日正式结束工作，并于1956年1月1日停止行使职权。

至此，热河省建制撤销。

编 后 记

经过三年多的努力，《热河革命史稿》终于完稿付印了，使我们如释重负，多少感到一点快慰。

《热河革命史稿》的编写工作，始终是在原热河省领导同志李运昌、段苏权、王国权和其他老同志的关怀和指导下，在赤峰、朝阳、锦州和承德五地市委的大力支持下进行的。王国权、王克东、陈光、沈毓珂同志对史稿进行了最后审定。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主任盖军教授、副主任范守信副教授及何明教授、杨圣清副教授对史稿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审核，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对此，我们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热河革命史稿》也是在赤峰、朝阳、锦州和承德五地市委党史办已有资料的基础上编写出来的，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同时，在编写过程中也曾得到中国中央档案馆、第二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河北省档案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人民大学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大连图书馆、承德地区档案馆、承德群众报社报史小组等单位及有关同志的支持和帮助，我们在此表示感谢。

我们在编写《热河革命史稿》的过程中，力求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较为全面系统地记述热河从1919年“五四”运动至1955年底省建制撤销这三十六年的历史，总结历史经验，接受历史教训。但由于热河省建制的撤销，热河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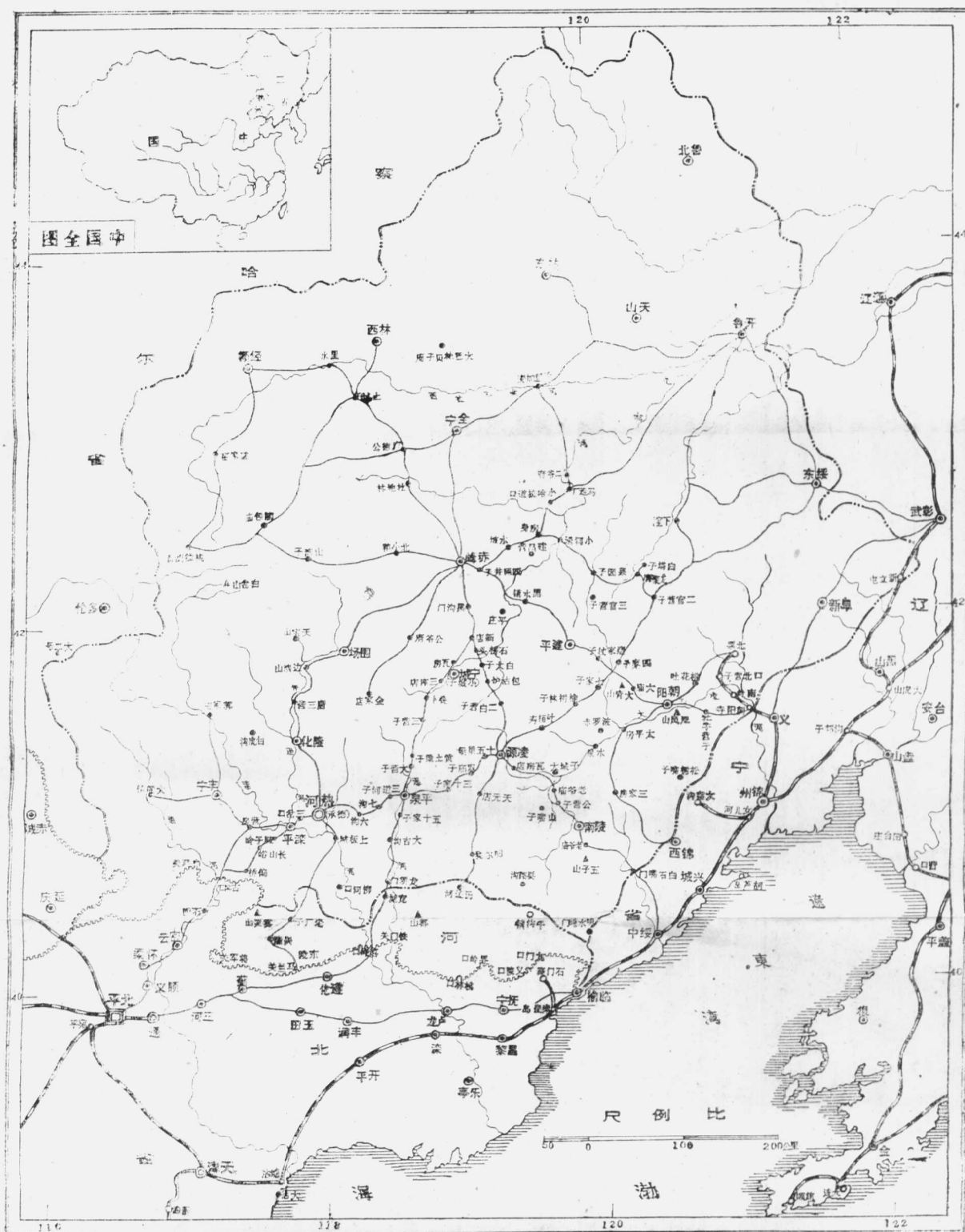
志之无人研究以及时间仓促和我们水平所限，在史料的选择和运用上，在史实的研究和推敲上，在史论的分析和评价上以及其他方面，都难免有纰漏和舛误之处，我们恳切期望在热河战斗、工作过的老同志、史家和读者，不吝赐教，极为感谢之至。

编 者

一九八八年九月于承德

热河全图

1933年



热河省图

比例尺
一之八万八千八百三

